

# 地 缘 看 世 界

## 西 域 ( 下 )

温骏轩 / 著

第 六 册



---

# 地 缘 看 世 界

西 域 （ 下 ）

第 六 册

温  
骏  
轩  
著

仅 供 学 习  
禁 止 商 用





## 整理说明

本书整理自天涯社区论坛的帖子——地缘看世界，作者天涯 ID 为鄙视抢沙发的（笔名为温骏轩）。其中微信公众号：地缘看世界，亦有更新和连载，也可关注。在帖子十年连载的过程中，创作出的文字内容比较多，涉及中国历史和全球各地的解读较广，为方便查找和阅读，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整理成册。当然，这些划分和整理只是基于个人的理解。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整理出的系列电子书可以用于个人打印，收藏，但不可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

书中的插图（以地图为主）基本沿用帖子的原图。因很多文字内容需要对照地图才能更容易理解，但又不想经常性地翻页查看地图，所以在很多需要用图的地方都配有地图，但也因此会出现部分的重复地图，好在对于电子书来说，因此增加的这点页数并无大碍。另外，有的地图理论上来说，插入文中时就应该保持完整的一张，即保持原图的完整性。只是由于页面有限，这样的话显示会比较小，地图看着不是很清晰，所以有时会只截取其中的部分插入页面，显示效果更好。相比于美观，我想还是把实用排在第一位。

除了沿用作者所作的地图以外，还另外补充了一部分插图，其中包括地图和实景图片。补充的地图来源于网络和个人制作。由于文字内容涉及范围广，原帖地图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新增图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个人制作的地图，因水平和制图能力有限，仅作为参考，如有发现错误的地方，也可指出修改，以免误人子弟，那就不是希望看到的了。至于哪些是原图，哪些是新增补充的地图，应该不难看出，况且帖子原图也已集中整理出来，大多数人应都存有，对每张原图大体比较熟悉了。

实景图片部分，则基本来源于网络。对于一个地缘板块的了解，只有地图和文字还是不够的，如果能够身临其境，会有更好的体验。如果一时不能做到，通过图片也能一定程度有直观的感受。有时候，对一些事物的描述，文字方面比较苍白，“一图胜千言”，一张精确直观的图片，所能传达出来的信息会更有效。当然，前者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文字作为铺垫，对图的理解同样会有局限性，二者相辅相成。

对于来源于网络的地图、图片，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对原图作者深表敬意和感谢。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敬请及时告知，会立即删除或做其他妥善处理。本书整理仅用于学习，不会用于商业途径。对于地图方面，只是自学之用，并未经过权威机构的核勘审查，所以地图没有等同于正规出版物的法律效力，切忌上纲上线。如存在任何问题，也可指出进行修改或者删除，以减少因扩散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关于划分章节方面，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内容、字数、版面等。基本上，每一章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但如果字数太多的话，章节也会作调整，以使阅读体验上能

够更佳。通过这些划分的章节，层层推进，更容易理解文章内容的思路和传达的信息。章节标题基本都是自取的，作为文字内容的提示。因标题比较多，所以不敢保证所取的都比较精确，可以作为参考之用。

在整理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文字校对方面，对此表示感谢。因个人水平和精力有限，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些问题和错漏之处，如有发现也可指出，以进行修改，使能够得到完善。最后，在此对沙发一直以来的付出和分享表示感谢！

清风

## 前言

### 【贴子写作总结】

开始以地缘的角度解析国际关系，最初只是来源于一时的灵感，觉得中印两国的地缘结构颇有些相似的味道，于是便有了《印度与中国的地缘情况对比》的主帖。只是写到后来，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于是便越写越多了。也许以后还要将视线从中国的周边扩散到其他地区，因此便请版主将名字改为了《地缘看世界》。没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主帖中将中印两国做这样一个类比，也成为争议最多的话题。我承认一开始并非出于技术的角度开这个帖，只是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罢了。不过后面的内容的确是经过一番探究的。

我并不认为大家需要全盘接受我的观点，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思路。大家尽可以在这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实用地缘的方法解析国际关系，很多高手都在做。我只不过是做些基础的分析，为部分需要的朋友答疑。就好像大家都知道  $1+1$  等于  $2$ ，但也许有人会更感兴趣为什么结果不会是  $3$  一样。就“地缘看世界”这个话题而言，实际上还是从中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或者说是主要探究与中国相关的地缘话题，包括中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地缘定位、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结构，以及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地缘关系。这部分目前已经整理成书稿，如果幸运的话，当会有机会出现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

在写完这部分之后，按照“地缘看世界”这个命题，应该会将视线投向其他地区，比如欧洲、美国，以从地缘的角度更为全面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不过混迹于国观也有些年头了，深感大部分朋友都对国家兴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有些时候也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对于激情，我向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一个国家将会了无生气。不过在激情的背后多了解些基础知识，想来不是件坏事。而在将视线投向更为波澜壮阔的国际舞台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本身的地缘结构。西方有句谚语叫“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也不是自古就形成现在的地缘结构的。

之前的部分，我们可以将之总结为第一部分，并暂命名为《中国崛起之地缘路线图》；而第二部分则以解读中国现有的地缘结构为方向。以地缘为角度，历史为脉络，沿着先人的足迹，渐进式地解读中国形成的过程。如果要为这部分取个名字，可以叫作《中央之国的形成》。以史为鉴，一则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二则可以从历史的兴衰探究出国际政治的规律，以利于我们更清楚地睁眼看世界。当然，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也许这部分可以成为你读史的助手，里面的内容或许能够帮助你解开心里埋藏已久的疑惑。

帖子不会写得太快，因为按照我个人的习惯，还是要以图明事，在线做些地图以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内容，但会尽量保证每天更新。对于这些地图，如果觉得还有些参考价值的话，尽可以拿去使用。由于由于是在线写和做图，难免会出现失误甚至硬伤，如果有看

出的朋友，也请指出，在此先行谢过。另外对于史料的采信，尽量会采用已有定论的史实，不过“周”以前的历史以及地缘格局，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推论，大家姑且当成一种参考。其实整个帖子的内容，都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不要抱着听课的态度来看，我亦担不起这个责任。大家并不一定要将每个部分都看完，尽可以在目录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参与讨论，也可以短信交流。

关于之前的内容，以及新近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与地缘相关的也会间或做一些解读，内容则会偏重于基础分析。至于预测和判断，在看过这些基础分析后，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写些时评或慷慨激昂的文字，更新速度会快些，也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更加过瘾。不过论坛上已经有很多方家在做这类事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还是做些基础的事情更有意义些吧。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写只是为了分享一点心得，一个角度。写的多了倒也可以集结成章，期间亦有不少编辑联系过，希望可以出版。不过经过一年多的操作，终因国际部分牵扯到的敏感话题过多，而告夭折。所以对很多希望能看到纸质书的朋友说声抱歉，特别是曾经答应过赠书的朋友。

按照计划，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央之国的形成》中先秦部分的章节，并且在抽时间整理、修改。至于出版的事，不会很急，毕竟这是关于中国的事情，需要抱着一份感恩、敬畏的心情来做，在考虑商业性的同时，不能在细节方面出现硬伤。如果有编辑能够抱着同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情，可以来共同完成这个心愿。对于希望看到地球其他角落的朋友，也不用急，待现在写的“秦汉第一帝国”部分完结了，会对欧洲的地缘结构、传承做详尽解读。写完之后，三国迷期待的三国故事就会展开了。时事的背景解读，依然会穿插期间。但不会每件事情都往地缘上面靠，除非这件事情的确有地缘博弈的成份在里面。

### 【时政解读的分析】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多写些时政，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闻，可写的素材丰富，感兴趣的人也多。其实这主要还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了，毕竟这个帖子只是从地缘的角度谈些基础的、战略性的东西。而无论是地缘还是战略，都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并不会随时变换的。如果有些时事有着强烈的地缘背景，也是会随时插播解读的。只不过可能只是一段话，一张图，看上去不如很多方家的时政帖内容丰富罢了。

当然，观察各种层面的时政要闻，并不一定都要从地缘视角来解读。也有朋友希望我从综合的角度，来周期性地解读时政。首先感谢这些朋友的信任，不过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说，还是不愿意这样去做，即使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和点击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陷入为了解读而解读的怪圈之中去。我曾经在回答一位长期跟帖的朋友问题时写到过：我之所以不愿意写时评，是因为现在的时评路子大多已经模式化了。先是按照冷战思维，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划成中、美两极。无论什么事情，包括一些纯粹的突发事件和刑事案件，



都能和所谓的中美博弈拉上关系。演变下去，就是“美国阴谋无处不在，中国高层深谋远虑”（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棋局”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模式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国内主流论坛的舆论环境。如果在导向相左的网络环境中，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读出“中国威胁无不在，美式民主力挽狂澜”的结论来。

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国家制定各项政策，做各种事情，首先都是基于自身利益、安全考虑的，而参与度也是与利益、安全关联度成正比的。大部分时候，大多数国家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只能是见招拆招，根据时事的变化，以务实的态度调整自己的政策，并非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深谋远虑，决胜于庙堂之上。所以如果以吸引眼球为目的，周期性地写时政的话，在思路很容易演变成“过度解读、上纲上线”；在方法上，则模式化为将石油、金融、宗教、党派、共济会、二分法的集团划分（中美）等等时评必备要素，用万试万灵的“阴谋论”将之串连起来的时政分析法，就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了。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做一些基础的分析。如果大家觉得这些分析有“渔”的成分在里面，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

上述对时政解读的态度，除掉不愿意陷入为了解读而解读的“逻辑怪圈”之外，技术上对这个时代有自己的看法，也是重要原因。基于国际关系当中博弈是永恒的主题，因此很多讨论，包括这个帖子的提问中，基于冷战思维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美两大阵营，并凡事都和两国的战略意图拉上关系的情况比比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办法，因为就博弈的复杂程度来说，多角博弈的情况总是比两方对决要复杂得多。简单的两分法，更容易让大家找准辩论的焦点。只不过在现实的情况下，切割世界的铁幕早在 1990 年就被撕裂。新时代的政治博弈，也已经不是冷战中那种两极对抗明显的模式了。如果让我为这个时代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暗战时代”。

一个时代总是有不同于前代的诸多特点的，就像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用军备竞赛这种战略博弈手段，来代替了那种动辄诉诸战争的大国博弈模式。能够实现这个“进步”，核武器这种毁灭性的战争武器的诞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从军事博弈的角度来看，核武器的作用在于极大压缩了对手的战略纵深，让大国们可以在一次攻击中就丧失战争能力，甚至生存能力的风险下，考虑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毕竟在双方都拥有核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同归于尽的风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承担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武器，居然成为了世界和平的保卫者。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前提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这项可怕的武器。

回到我们的“暗战时代”。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已经开启了 30 年的暗战时代，和之前的冷战时代有什么不同：

一：多极博弈取代了两极博弈模式。单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冷战或者二战当中，那种非敌即友的划分阵营的方式，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了。尽管美国的一超地位仍然

存在，但在地缘潜力上，中国、俄国、欧盟，甚至印度，都已经作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出现在核心政治圈中了。也许有人会觉得，在美、欧战略联盟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已经分化明显），中、俄在战略上也在背靠背。这似乎又在表明，世界又重回两极对抗的模式了（印度在中间游走）。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诸大国、板块之间并没有拉起新的铁幕。基于务实的态度，现在无论大、小国家都不会认为在某一层面的对手，就不能在另一层面进行合作。

二：经济取代军事，成为硬实力较量的主要指标。基于核武悖论的存在，大国们终于明白了，在你不可能毁灭世界的前提下，盲目地进行军备竞赛是多么的可笑。这并不是说拥有军事上的战略威慑力就没有必要，但这一切必须和自己的经济实力成正比。

三：合作取代对抗，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如果说在冷战及之前的一、二战时期，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结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对抗中彻底击垮对方的话，那么现在的国家竞争，则是为了在合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支配权。这种变化的产生，在技术上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最终成就了现在这种“暗战时代”。就大国关系的处理上来说，这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你能够在台面上听到的，总是关于“合作”的声音；即使是台下的博弈不可避免，表面和平的维护也是必要的。如果形势发展到有一天，大国们开始撕破脸，公开指责某一方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那么新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 【地缘研究的要素】

很多初看帖子的朋友，会回帖表示这个帖子所表达的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普及地理知识的帖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理也好，环境也罢，都只是“地缘”这个概念中的一个要素罢了。“人”才是地缘这个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不光要去考虑物理环境，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作出更事半功倍的决策。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的精英人物有所不同，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人类群体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相互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研究、解读这些地缘要素产生的环境背景，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要素会直接运用到地缘研究中去。

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标准，那就是它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按照这个标准，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基于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感，就是研究中国地缘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而那些阶段

性流行的所谓“日风韩流”，就不在考虑的范畴中了。

明确了地缘研究需要考虑的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地缘视角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了。由于这些要素都是相对恒量，所以解读出来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地偏向战略层面了。比如我们可以从地缘的视角来分析出，中国有哪些城市具备成为区域中心，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有可能直接辐射哪些区域，但具体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是光做地缘研究能够做到的了。

温骏轩

2011 年

## 我为什么写地缘看世界

我个人比较喜欢论坛的气氛，可以启发思路，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哪怕是一味地谩骂也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大家可能认为我是花了长时间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其实不是，我自幼喜欢读史，地缘方面的研究最初只是用来解读历史的一种方法。

小时读读史只是喜欢里面的人物情节，长大后也如一般人那样升华去体味史中人物的思想。不过看得越多，心中的迷惑就越多。中国的历史思路是“人本历史”，例如在里面只能读到诸如孙刘联盟略施小计，便能以数万之众击溃数十万敌人的经典故事。但却没人能告诉我，为什么长江那么长，曹操一定要走赤壁过江？从《三国演义》中我们看不到答案，从《三国志》当中我们也找不到结果。有的只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人定胜天的论调（不过三家归晋这一段收得甚急，避开了解释人气最旺的蜀汉政权，为什么是第一个被北方政权灭掉的原因。）

中国从来不缺乏“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只是讲述历史的史家们多是祖传的职业。自太史公以“列传”的形式将史书的模本固定为人物传记后，记录名人的行为和观察人际关系，成了史家们分析历史的不二法门（他们甚至不屑于分析，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只习惯于根据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划分黑白）。

当年明月曾经说他是从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历史人物的选择与放弃。这种角度已是一种突破，并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是这仍是站在历史重要人物角度来解析历史，仍不能够解开我心中的迷茫。偶然间又看到《窃明》的作者试图用军事的角度来解析历史（他用的是穿越小说的方式），亦是很有新意，但仍感觉这种方法偏战术性了。我需要一种能站在“人性”的角度分析历史的方法，这种“人性”不是个别伟人的性格，而是人类或者说一个族群的性格，或说是“人民的性格”。

直到我重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才找到“人民历史”的感觉。“大历史”观必须将视线从具体人物和事件上移开，才能够从更深层次感受到历史的规律和必然。于是我试着从“人性”（人类的性格）的角度沿着古人的思路去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个人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既然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么人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利害关系就是周边的环境。这需要暂且抛开人定胜天的勇气，去感受地缘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我曾经说过现实的国际关系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无论是对地缘还是对历史的研究，都不能只是为了显示学问的高深，它要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即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起到指导作用。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分析利害关系，为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展找到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向（例如你可以从地缘的角度知道，中国目前将精力放在东南亚会比放在墨西哥身上重要得多）。这就好像在图上找到可行的道路一样，



至于路怎么修，修好以后用什么交通工具走，就要靠其他的专业人士配合了。

完全从客观环境角度去解读人类历史是不够科学的，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思想，也就是说能够总结出经验反过来改变环境。因此也需要从人文的角度解读历史，地缘和人文并不互相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文化产生是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的。前面说过有机会我会开个帖细说的，切入点应该是宗教。

这个帖子能一直写下去，初始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著书立书，只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拿出来分享（一个人一旦有了些新的想法，却不能找到同道之人分享是很难受的，也无法再做提升）。你不能指望周围的人跟你有一样的爱好，好在网络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还是那句话，认同的捧个人场，不认同的砸个砖场也无妨。

温骏轩

2017年5月

# 目 录

<b>第一章 楼兰国位置变迁的地缘背景 .....</b>	<b>1</b>
第一节 张骞进入罗布泊周边区域 .....	1
第二节 楼兰国建立于孔雀河三角洲 .....	3
第三节 汉帝国认定黄河发源于西域 .....	7
第四节 塔里木河存在南北两河的说法 .....	10
第五节 楼兰受汉匈博弈影响而南迁 .....	12
<b>第二章 孔雀河上游与轮台绿洲分布的国家 .....</b>	<b>17</b>
第一节 尉犁国位处孔雀河上游地区 .....	17
第二节 墨山国的位置及其生存方式 .....	18
第三节 李广利远征大宛时屠灭轮台 .....	20
第四节 乌垒国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	23
<b>第三章 龟兹与乌孙的联系通道 .....</b>	<b>26</b>
第一节 龟兹故地的主要核心板块 .....	26
第二节 龟兹经夏塔古道沟通乌孙 .....	29
第三节 龟兹经包扎墩古道沟通乌孙 .....	33
第四节 龟兹经库车河谷至乌孙的通道 .....	34
<b>第四章 阿克苏绿洲分布的西域国家 .....</b>	<b>38</b>
第一节 阿克苏河上游优越的集水条件 .....	38
第二节 阿克苏绿洲三国的位置 .....	40
第三节 阿克苏绿洲经别迭里山口进入中亚 .....	43
第四节 阿克苏绿洲在沟通乌孙上更具优势 .....	47
第五节 阿克苏绿洲南部的枢纽点 .....	50
<b>第五章 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的地缘结构 .....</b>	<b>53</b>
第一节 天山南麓断续存在的塔格地带 .....	53
第二节 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缺乏绿洲 .....	54
第三节 尉头人到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畔放牧 .....	56
第四节 图木舒克地区的区位优势 .....	58

<b>第六章 疏勒沟通费尔干纳盆地的通道</b>	63
第一节 疏勒地理位置重要的原因	63
第二节 疏勒经吐尔尕特山口至费尔干纳	64
第三节 疏勒经伊尔克什坦口岸进入阿赖谷	68
第四节 阿赖谷至费尔干纳盆地的路线	73
第五节 张骞寻找到大月氏人后返程	75
<b>第七章 东帕米尔高原的地缘结构</b>	77
第一节 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	77
第二节 帕米尔高原内部的板块划分	78
第三节 蒲犁国位处塔什库尔干裂谷带	81
第四节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北段的地理结构	85
<b>第八章 西帕米尔高原的地缘结构</b>	91
第一节 无雷国位处西帕米尔高原	91
第二节 和什库珠克帕米尔位处喀拉湖地区	93
第三节 郎库里帕米尔和小帕米尔的位置	95
第四节 萨雷兹帕米尔位处穆尔加布河谷	97
第五节 巴尔坦格河以北科学院山的特点	100
第六节 阿尔楚尔帕米尔和大帕米尔的位置	104
第七节 瓦罕帕米尔与桃槐国的位置	106
<b>第九章 帕米尔高原与周边地区的地缘关系</b>	109
第一节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109
第二节 吐火罗盆地经帕米尔至南疆的路线	110
第三节 英国将瓦罕走廊划入阿富汗的背景	114
第四节 帕米尔高原与克什米尔的潜力对比	115
<b>第十章 青藏高原上安多和康巴的特征</b>	119
第一节 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地缘潜力低	119
第二节 安多地区未能控制河湟谷地	122
第三节 康巴在横断山区的农牧混合经济	124
<b>第十一章 青藏高原上卫藏地区的特征</b>	128
第一节 雅鲁藏布大峡谷对卫藏的影响	128

第二节 卫藏经羊八井盆地沟通北部 .....	132
第三节 卫藏经亚东谷地沟通南亚 .....	136
<b>第十二章 玛旁雍错与拉昂错的不同特点 .....</b>	<b>142</b>
第一节 玛旁雍错成为多宗教圣湖的背景 .....	142
第二节 玛旁雍错与拉昂错盐度差异的原因 .....	145
第三节 吐蕃引入佛教对抗象雄的苯教 .....	149
<b>第十三章 青藏高原上阿里地区的特征 .....</b>	<b>152</b>
第一节 阿里高原气候因素而潜力低 .....	152
第二节 象雄王国在阿里高原文明先发的原因 .....	154
第三节 马泉河谷在阿里板块的地位 .....	156
第四节 孔雀河谷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 .....	158
第五节 象泉河谷为象雄王国地缘中心处 .....	160
第六节 狮泉河谷干旱和荒漠化的环境 .....	163
第七节 班公错地区在阿里板块的地位 .....	165
<b>第十四章 拉达克地区的地缘结构 .....</b>	<b>173</b>
第一节 拉达克成为独立板块的原因 .....	173
第二节 拉达克具有战略通道的作用 .....	177
第三节 拉达克的宗教与族群结构 .....	178
<b>第十五章 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地缘结构 .....</b>	<b>180</b>
第一节 巴尔蒂斯坦的族群和文化特点 .....	180
第二节 巴尔蒂斯坦六大河谷地带的位置 .....	181
第三节 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的分割线 .....	184
<b>第十六章 克什米尔东部通往西域的商通 .....</b>	<b>187</b>
第一节 什约克河中上游指向藏北高原 .....	187
第二节 努布拉河谷和锡亚琴冰川曾为商道 .....	189
第三节 努布拉河谷通往克勒青河谷 .....	191
第四节 什约克河谷经阿克赛钦至南疆的困难 .....	194
第五节 喀喇昆仑山口连通的地缘板块 .....	200
<b>第十七章 克勒青河谷与周边的地缘关系 .....</b>	<b>206</b>
第一节 乌秣国在塔吐鲁沟设立都城 .....	206



第二节 由克勒青河谷进入蒲犁国的通道 .....	208
第三节 中巴两国在克勒青河谷的分界线 .....	211
第四节 喀喇昆仑走廊的位置和价值 .....	213
<b>第十八章 查谟 – 克什米尔沟通拉达克的通道 .....</b>	<b>215</b>
第一节 拉达克经欣库河谷至克什米尔盆地 .....	215
第二节 克什米尔盆地的地缘潜力 .....	216
第三节 查谟从英国获得克什米尔统治权 .....	219
第四节 查谟征服拉达克的进军路线 .....	221
第五节 卡吉尔因伊斯兰化成为独立板块 .....	226
<b>第十九章 巴基斯坦西北山地的地缘特征 .....</b>	<b>229</b>
第一节 巴控克什米尔内部的板块划分 .....	229
第二节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族群结构 .....	231
第三节 达尔德人阻碍普图什人向北渗透 .....	233
<b>第二十章 吉尔吉特和罕萨连接西域的通道 .....</b>	<b>238</b>
第一节 吉尔吉特经罕萨河谷进入西域 .....	238
第二节 罕萨的地理环境及其族群特点 .....	241
第三节 罕萨沟通西域时利用的山口 .....	244
第四节 罕萨人渗透入喀喇昆仑走廊 .....	249
<b>第二十一章 吉尔吉特与帕米尔间的联系通道 .....</b>	<b>252</b>
第一节 小冰河期影响喀喇昆仑山山口的通行 .....	252
第二节 吉尔吉特对接瓦罕走廊的山口 .....	254
<b>第二十二章 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沿岸的国家 .....</b>	<b>261</b>
第一节 疏勒国和莎车国的地理位置 .....	261
第二节 依耐国的游牧属性和种族特征 .....	262
第三节 西夜和子合特殊的地缘关系 .....	263
第四节 皮山国的地理环境与乌垒相似 .....	265
<b>第二十三章 于阗河和克里雅河沿岸的国家 .....</b>	<b>269</b>
第一节 于阗国因边缘位置得以扩张势力 .....	269
第二节 于阗与西藏及南亚交流的通道 .....	270
第三节 克里雅绿洲的扞弥国衰落的原因 .....	272

第四节 克里雅绿洲经克里雅山口入藏 .....	278
<b>第二十四章 尼雅河流域沿岸的西域国家 .....</b>	<b>282</b>
第一节 戎卢国和精绝国分据尼雅河上下游 .....	282
第二节 精绝国因尼雅河下游水量变少而消失 .....	285
<b>第二十五章 车尔臣河流域沿岸的西域国家 .....</b>	<b>289</b>
第一节 张骞途经昆仑山北麓小型河流地带 .....	289
第二节 且末和鄯善位处车尔臣河下游 .....	290
第三节 张骞可选择从若羌切入青海道 .....	293
第四节 由当金山口进入南山的路线 .....	298
第五节 玉门关和阳关分别承担的使命 .....	303
第六节 从阳关经阿尔金山至鄯善的路线 .....	306
<b>第二十六章 汉帝国策划马邑之围设伏匈奴 .....</b>	<b>309</b>
第一节 汉军诱使匈奴人进入包围圈 .....	309
第二节 匈奴骑兵经武州塞南下马邑 .....	311
第三节 汉军计划泄露使匈奴重返草原 .....	313
<b>第二十七章 汉帝国对匈奴发起龙城之战 .....</b>	<b>317</b>
第一节 游牧民族周期性劫掠农业区的根源 .....	317
第二节 匈奴在春季和秋季南侵的区别 .....	319
第三节 汉军在春季对匈奴进行反击 .....	321
第四节 卫青攻入匈奴龙城 .....	323
第五节 卫青出雁门郡反击再次入侵的匈奴 .....	329
<b>第二十八章 汉帝国在河套展开河南之战 .....</b>	<b>334</b>
第一节 匈奴控制阴山南麓的河套地区 .....	334
第二节 汉朝与清朝在河套面临的形势对比 .....	336
第三节 卫青在河套地区的攻击路线 .....	338
第四节 匈奴攻入上郡的战略意图 .....	342
第五节 汉帝国建制西河郡的原因 .....	344
<b>第二十九章 河套汉四郡出塞的通道 .....</b>	<b>347</b>
第一节 云中郡经白道出塞外地区 .....	347
第二节 定襄郡经大黑河源头河谷出塞 .....	348

第三节 五原郡经稒阳道出塞外地区 .....	350
第四节 朔方郡经鸡鹿塞和高阙塞出塞 .....	352
<b>第三十章 汉帝国对匈奴发起漠南之战 .....</b>	<b>356</b>
第一节 卫青以右贤王驻地作为作战目标 .....	356
第二节 汉军穿越戈壁进军右贤王部驻地 .....	359
第三节 卫青成功突袭匈奴右贤王部 .....	362
第四节 汉军在阴北草原与匈奴交战 .....	365
<b>第三十一章 霍去病第一次远征河西走廊 .....</b>	<b>368</b>
第一节 霍去病的作战特点与张骞的回归 .....	368
第二节 汉军经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 .....	370
第三节 霍去病进攻石羊河的休屠王部 .....	371
第四节 休屠王和浑邪王领地的分割线 .....	373
第五节 皋兰山地理位置的推测分析 .....	375
第六节 汉军在皋兰之战中击败浑邪王部 .....	379
<b>第三十二章 霍去病第二次远征河西走廊 .....</b>	<b>381</b>
第一节 霍去病没有从阿拉善和居延海进军 .....	381
第二节 霍去病从陇西进入河西走廊 .....	383
第三节 霍去病横扫河西走廊的匈奴人 .....	386
第四节 霍去病接受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投降 .....	387
<b>第三十三章 卫青在漠北之战击败匈奴 .....</b>	<b>389</b>
第一节 卫青与霍去病分兵远征漠北 .....	389
第二节 卫青由阴北草原和湖谷进军漠北 .....	390
第三节 匈奴在漠北政治中心的位置 .....	395
第四节 汉军与匈奴决战于翁金河畔 .....	398
第五节 汉军在漠北烧毁赵信城后撤军 .....	401
第六节 李广在漠北之战的悲剧结局 .....	403
<b>第三十四章 霍去病在漠北之战击败匈奴 .....</b>	<b>406</b>
第一节 狼居胥山和姑衍山的地理位置 .....	406
第三节 霍去病没有从呼伦贝尔草原进军漠北 .....	411
第四节 匈奴左贤王部驻牧地的位置 .....	412

第五节 霍去病出代郡沿坝上草原进军 .....	414
第六节 霍去病从达里冈爱进入漠北 .....	416
第七节 汉军与左贤王部决战于柽余山 .....	418
第八节 汉帝国在漠北之战后的举措 .....	420
<b>第三十五章 汉帝国扶植乌桓和攻灭朝鲜 .....</b>	<b>423</b>
第一节 汉帝国征服西南夷的目的 .....	423
第二节 汉帝国扶持乌桓以制衡匈奴 .....	424
第三节 汉帝国攻灭卫满朝鲜 .....	426
<b>第三十六章 汉帝国修筑受降城和外长城 .....</b>	<b>428</b>
第一节 匈奴因经济恶化而产生内乱 .....	428
第二节 汉军接应匈奴左大都尉时遭围攻 .....	429
第三节 受降城对匈奴南下的影响 .....	432
第四节 汉帝国在阴北草原修筑外长城 .....	433
第五节 外长城防御匈奴的技术手段和效果 .....	437
<b>第三十七章 汉帝国在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行动 .....</b>	<b>440</b>
第一节 汉帝国和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 .....	440
第二节 李广利在天山之战遭匈奴伏击 .....	441
第三节 李陵请求出塞征战的考虑 .....	442
第四节 汉帝国对羌人领地发动攻击 .....	445
<b>第三十八章 李陵与匈奴进行浚稽山之战 .....</b>	<b>447</b>
第一节 李陵到达浚稽山后的行动计划 .....	447
第二节 李陵军与匈奴骑兵发生激战 .....	449
第三节 李陵因匈奴增兵而退军浚稽山 .....	451
第四节 李陵军撤至龙勒水下游的大泽 .....	453
第五节 李陵军抵御匈奴攻击并穿越南山 .....	455
第六节 李陵军穿越鞬汗山时伤亡惨重 .....	458
第七节 李陵军余众突围后的命运 .....	460
<b>第三十九章 汉武帝再次发兵远征漠北 .....</b>	<b>463</b>
第一节 汉军面临兵员和战马的不足 .....	463
第二节 李广利与匈奴进行余吾水之战 .....	464



第三节 汉帝国趁匈奴受雪灾发起反击 .....	466
第四节 西路汉军遭遇李陵所领的匈奴骑兵 .....	468
第五节 李广利率军深入漠北时尽没于匈奴 .....	470
第六节 汉武帝去世与汉匈之战的总结 .....	473
第七节 汉帝国对匈作战做出战略调整 .....	474
<b>第四十章 汉帝国与乌孙结盟应对匈奴 .....</b>	<b>478</b>
第一节 匈奴西进迫使乌孙与汉帝国结盟 .....	478
第二节 汉帝国与乌孙联合出兵进攻匈奴 .....	480
第三节 匈奴面临来自四方的攻击 .....	482
第四节 汉匈争夺吐鲁番盆地使车师分裂 .....	483
<b>第四十一章 匈奴爆发争单于之位的内乱 .....</b>	<b>486</b>
第一节 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匈奴内乱 .....	486
第二节 匈奴形成五单于争位的乱局 .....	488
第三节 呼韩邪单于击败屠耆单于和乌籍单于 .....	489
第四节 致支单于击败闰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 .....	491
第五节 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后入驻漠南草原 .....	492
第六节 致支单于平乱后留驻大湖盆地 .....	494
<b>第四十二章 郅支单于渗透西域并被陈汤所灭 .....</b>	<b>496</b>
第一节 乌孙拒与郅支单于结盟并发生交战 .....	496
第二节 郅支单于西迁后控制的领地 .....	497
第三节 郅支单于杀害汉使后与汉朝决裂 .....	498
第四节 康居与郅支单于结盟并引其入境 .....	499
第五节 陈汤和甘延寿领兵进军郅支城 .....	501
第六节 汉帝国联军歼灭郅支单于部众 .....	504
<b>第四十三章 中原王朝与匈奴在后世的关系 .....</b>	<b>507</b>
第一节 汉匈和平局面在王莽时期被打破 .....	507
第二节 北匈奴在东汉王朝打击下西迁 .....	508

# 第一章 楼兰国位置变迁的地缘背景

## 第一节 张骞进入罗布泊周边区域

当我们花费几个月时间来解读天山北麓，直至整个中亚的地缘结构时，总是有朋友问到，为什么绕过了塔里木盆地。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先解读塔里木盆地的话，也同样会有朋友产生疑惑，那就是后来汉帝国所开拓的丝绸之路，为什么没有走天山北麓。就我个人的习惯而言，喜欢先扫清外围再推进重点。一旦外围的诸多疑惑都了然于胸后，再解读核心问题时就会轻松多了。

现在是时候探讨下张骞最终是选择了什么样的逃亡路线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张骞并没有穿越东疆盆地区、柴窝堡——达坂城盆地进入天山北路。因为他在逃离匈奴时，就已经知道大月氏人已经不在伊犁河谷了。即使此时的张骞，已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乌孙有可能取代大月氏成为汉帝国的联盟对象，但出于一个使臣的使命感，也是一定要以找到大月氏人为目的，去完成他的西域之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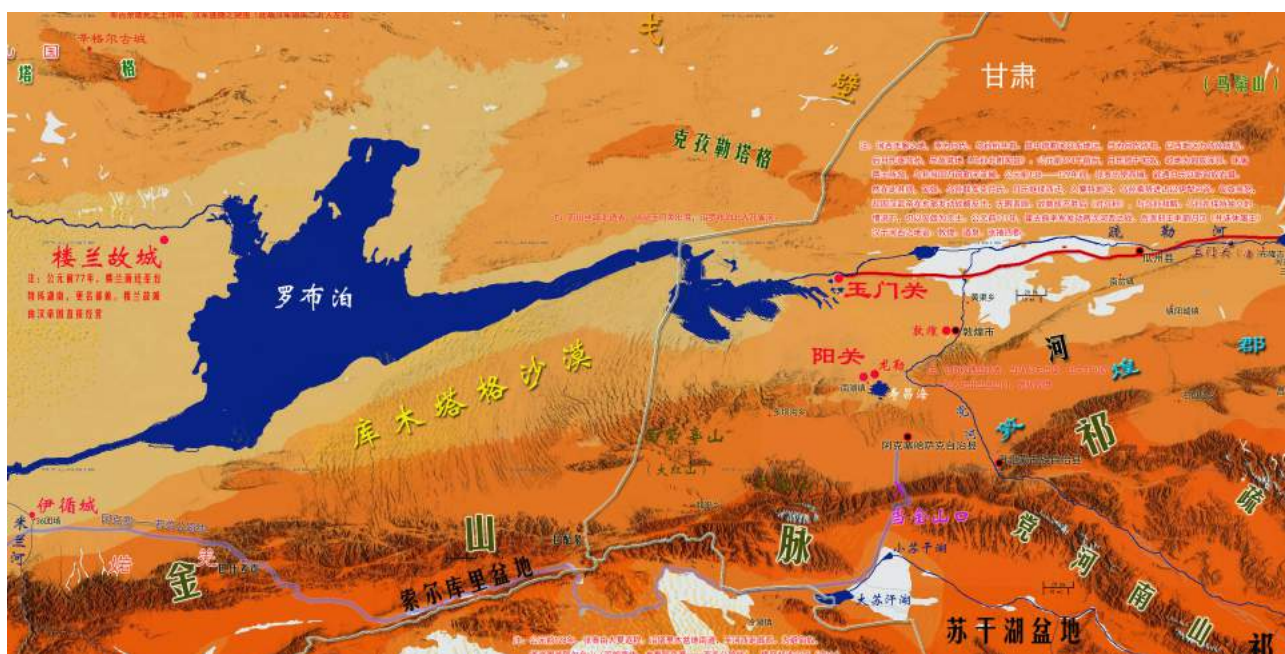
比较有异议的，是张骞到底是从哪里起程，开始他的逃亡之旅的。由于张骞在被俘之后，曾经被匈奴单于所召见，所以有认为他是从匈奴在漠北的王庭出发的。并由此而推断出，张骞是从西南方向插入哈密盆地，再经由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进入天山南麓的。然而这条路线最大的问题是距离实在太远了，很难想象张骞能够仅用数十日的时间，就穿越匈奴腹地（还包括大漠戈壁在内）、塔里木盆地，到达费尔干纳的大宛国。要知道，粗略估计这条路线的距离也在万里之上。

事实上，史书当中除了言明张骞逃亡至大宛所需时间为“数十日”以外，还说到他是“居匈奴西”。结合张骞并没有在逃亡当中接触到在准噶尔盆地与匈奴对峙的乌孙人的情况，这里所指向的“匈奴西”，所指向的应该就是河西走廊的西部，也就是他最初被匈奴俘获的地区。这样的话，张骞循天山南麓西逃，进入大宛的路程大约为 2000 公里出头。在数十日之内完成这段旅程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张骞是从河西走廊的西部，也就是敦煌所在的党河下游出发的话，那么疏勒河将成为他最初的向导。沿着这条河流一路向西的话，塔里木盆地的最东点——罗布泊洼地就将呈现在帝国使者的面前了。

作为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罗布泊”一词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更多的是与“原子弹”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核爆基地，罗布泊地区可以说是为了红色中国的政治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仅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罗布泊地区应该是一片面积巨大的无人区。事实也的确如此，即使没有核污染的威胁，今天的罗布泊地区也已经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了。而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没水。然而在历史上，尤其就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来说，罗布泊周边地区却是整个塔里木盆地最不缺水的

地区。因为在无法外流的情况下，发源于塔里木盆地周边山地的河流，除掉被自然蒸发、渗透，以及人类利用掉的水分之外，最终所流向的归宿地就是这片洼地区了。

对于像塔里木盆地这种，中央腹地几乎完全为沙漠所覆盖的地理单元来说，几乎是没办法寻找一个地缘中心的（就像地中海地区一样）。而单从水系结构来说，将塔里木盆地的地缘中心，定位在罗布泊地区是最合适的。那些在塔里木盆地腹地组网，并最终指向罗布泊洼地的河流，被总称为“塔里木河”。基于汉帝国的方位，如果能够控制罗布泊周边地区，那么就有机会通过塔里木河水系，将帝国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延伸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大部分绿洲。



汉西域全图

不过，在正式布局塔里木河流域之前，汉帝国要先解决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的战略连接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骞已经用他的逃亡经历为帝国指明了方向。因为作为塔里木河水系的最终归宿地，贯穿河西走廊西侧的疏勒河，最终也是汇入罗布泊洼地的。也就是说，在汉帝国渗透西域之后，在河西走廊通过罗布泊地区的战略通道——疏勒河畔选址建立一个军事据点，将是十分必要的。而基于河西走廊最后一块（西部）大规模农业开发之地的地理位置，这个军事地点也将会被视为中央之国的西大门。

最终在疏勒河畔被兴建的这座关口，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它就是“玉门关”。在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进入西域的人看来，西出玉门关其实就相当于正式进入了西域。即使那些西域国家再唯中原王朝马首是瞻，玉门关以西也已经是化外之地了。不过，玉门关并不是唯一留存在我们记忆当中，被认定为中央之国核心区西大门的地标。最起码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知名度并不会比“春风不度玉门关”要低。



而出现在唐诗当中的玉门关也好，阳关也罢，都不是唐帝国所兴建的。它们地缘价值的发现者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汉帝国。只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并不清楚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又为什么要在同一地区兴建两个关口。

简单来说，出玉门关和出阳关的区别，在于所选择的道路会有所不同。前者所指向往的，是丝绸之路北道（包括天山南北的路线）；而后者所指向往的，则是丝绸之路南道。由于张骞在逃亡之时，最初所选择的是北线方，因此阳关所指向往的路线，我们要放在最后面，也就是张骞从南道返回时再具体解读。现在的话，我们所关心的是，沿疏勒河——罗布泊通道正式进入西域的张骞，将最先接触到哪个西域国家。这个国家，最终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 第二节 楼兰国建立于孔雀河三角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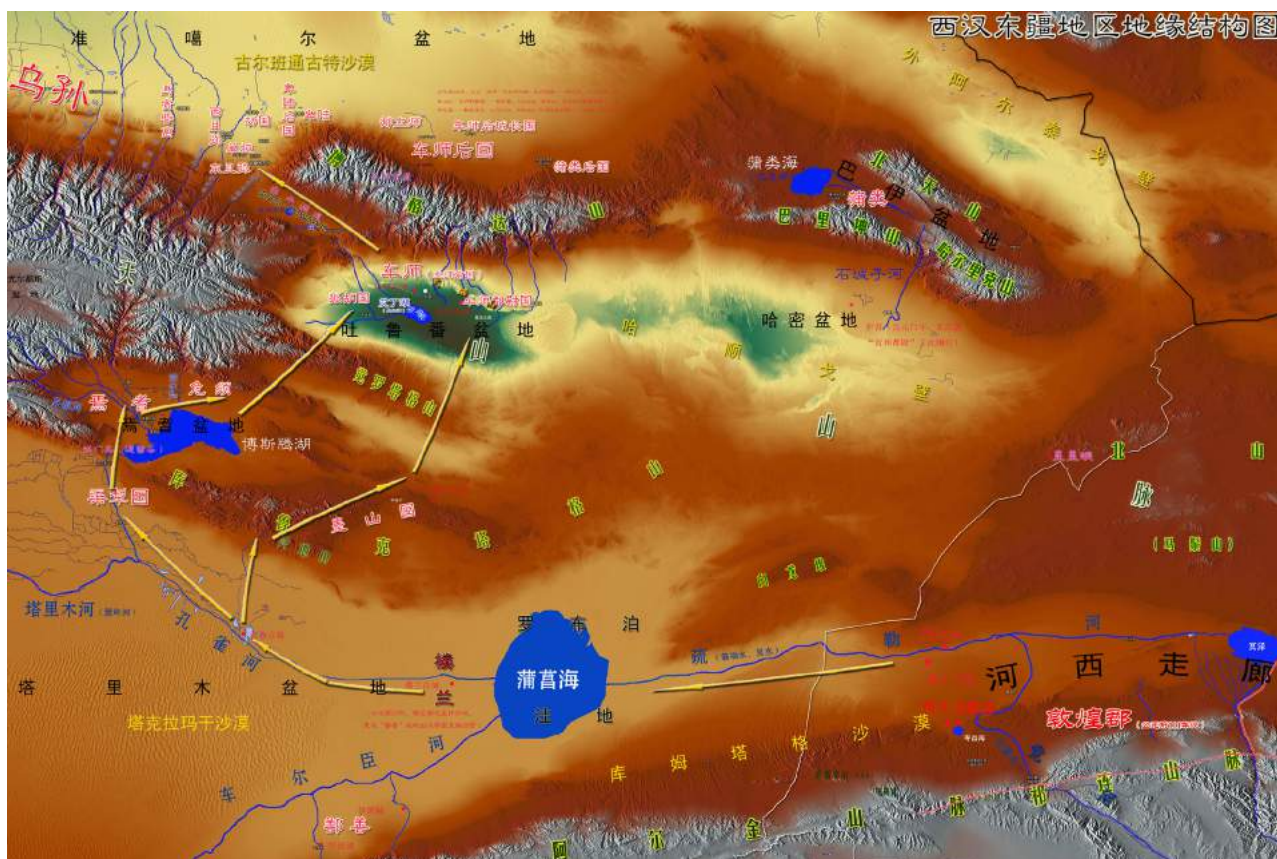
如果张骞是从疏勒河流域开始逃亡的，那么当终于出现在罗布泊西岸时，最先遇到的西域国家应该就是神秘的楼兰了。虽然说此时包括楼兰在内的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国家，大多已经慑于匈奴强大的实力，表示愿意接受匈奴的领导了。但以游牧民族的自然属性而言，他们并没有意愿去直接经营那些绿洲。相反，倒是后来渗透而来的汉帝国，对屯垦这些绿洲颇有兴趣。所以在到达楼兰后，张骞实际已经脱离了匈奴人的直接控制区了。

只是，既然这些绿洲小国名义上已经臣服于匈奴，那么被发现真实身份，并被送交匈奴人的危险也还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张骞和一直伴随左右的堂邑父才会仅用了数十天时间，就横穿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到达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张骞如此高效率的逃亡过程，应该让他无暇仔细考察沿途那些绿洲小国了。不过，只要汉帝国因为张骞的报告而最终动了开拓西域的心，自然会有大把的机会来研究那些绿洲小国的地缘结构和关系的。至于这些绿洲小国的技术参数是否是张骞所提供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西域诸国中，楼兰无疑是最为知名的一个。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遗址尚存，并且在上世纪初被西方探险家发现。那些被带入西方的楼兰文物，使得楼兰具有了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当然，有些朋友知晓楼兰，也可能是因为有“小河公主”之称的楼兰古尸。即使过了四千年的光阴和干旱的气候环境，仍然让我们有机会领略这位楼兰美女的异域风情。对于我们来说，这最起码表露出两个地缘信息：一是最起码在四千年前，罗布泊周边地区就已经整体沙漠化了；二是最初渗透至塔里木盆地的，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在沙漠化的土地上形成绿洲文明，你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些来自高大山脉的恩泽了。就与高大山脉的距离来说，罗布泊地区其实完全没有优势，尤其是无法就近受到天山山脉的补给。这是因为罗布泊洼地并没有与山顶常年积雪的天山主脉相邻，

而是与一条叫作“库鲁克塔格”的，四季干旱、戈壁化的山地相邻（库鲁克塔格的原意就是“干旱之山”）。这条曾经在分析东疆盆地区时出现的山地，实际是罗布泊洼地与东疆盆地区的分水岭。只不过，将这条既无高度优势，又无位置优势（被天山主脉阻挡了太平洋水汽）山地称之为“分水岭”，实在有些勉强，因为它实际上基本无水可分。无论是它北部的焉耆、吐鲁番、哈密盆地，还是它南部的罗布泊洼地，都没有指望它能为自己带来绿色。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对于东疆盆地区来说，它们的希望来自于天山山脉。尤其是拥有尤尔都斯盆地集水区的焉耆盆地，更是因为天山的恩泽，形成了西域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从尤尔都斯盆地受益的并非只有焉耆盆地和博斯腾湖。不能就近补水的罗布泊洼地，凭借其低海拔的地势特点，也成为了天山雪水的受益者。那些从尤尔都斯盆地汇流而下，经开都河汇入博斯腾湖的天山雪水，并没有最终在博斯腾湖结束它们的旅程，而是在蓄满这块洼地之后，继续向南突出塔里木盆地，将罗布泊洼地作为自己的归宿。连接博斯腾湖与罗布泊的这条河流，叫作孔雀河。通常情况下，楼兰与孔雀河这两个地缘标签总是如影随形。因为楼兰古国就是建立在孔雀河下游，也就是孔雀河注入罗布泊时所漫流形成那片三角洲地带。

如果焉耆盆地和孔雀河三角洲在今天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那么焉耆盆地的



统治者可能会对那么多珍贵的淡水资源流入邻国感到不满（虽然现在实际上也没什么水了）。但从地缘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博斯腾湖没有“贪婪”的成为终端湖，而是甘心作为一个中继湖，将多余的淡水补给罗布泊，才会为它争取到淡水湖的地位。反过来看罗布泊，这片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塔里木河水系最终归宿地的洼地，却和所有荒漠中的终端湖一样，在人类开始大规模开发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咸化过程。这也使得楼兰人最终所能指望的，其实就是孔雀河下游河水漫流的那片三角洲地带了。

如果仅仅是依靠孔雀河补水，那么孔雀河三角洲的地缘潜力，并不一定会比罗布泊东岸的疏勒河三角洲高。但事实上，孔雀河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整个塔里木河水系，才是楼兰古国繁荣昌盛的基础保障。以我们在中亚的经验来看，除非水量足够大（比如像阿姆河那样），才有机会在下游形成三角洲平原和终端湖。更多的河流，只是季节性的为这片干旱的荒漠带来融化的雪水，然后默默的湮灭于沙漠之中。就今天的数据来看，完全依靠博斯腾湖水溢出成流的孔雀河，年径流量不过 12 亿立方米。尽管这样的流量，已经能够保证孔雀河四季不断流，但要想在沙漠中蓄积出罗布泊来，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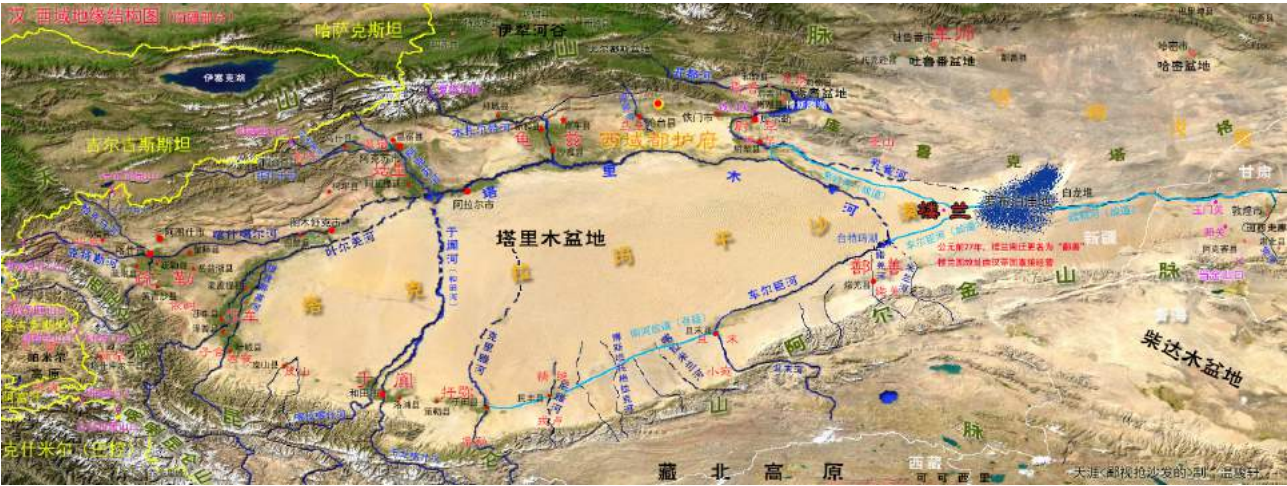
不过对于罗布泊洼地来说，孔雀河并不是唯一有可能注入这个塔里木盆地最低点的河流。最起码为张骞指引过道路的疏勒河，也曾经帮助将祁连山上的雪水带出河西走廊，奉献给罗布泊。问题是，有了这一东一西两条河流的补给，就能够形成罗布泊了吗？要知道，罗布泊在历史上面积最高曾经达到过两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青海湖）。在这片年蒸发量超过 4000 毫米，降水量却不足 10 毫米的土地上，仅仅依靠祁连山和天山尤尔都斯盆地的支持，罗布泊仍然摆脱不了干旱的命运。不过，我们前面也说了，罗布泊洼地实际上是整个塔里木河水系在理论上的最终归宿。这意味着，我们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其他河流身上。关键在于，这些河流有没有能力合力冲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阻隔，将雪水送到塔里木盆地的最东端来。

单从自然降水来看，塔里木盆地内部是没有任何机会形成河流的。对于塔里木盆地来说，最为悲剧的就是，它的周边所矗立的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等山地，都是这个星球上海拔排名靠前的高大山体。这意味着塔里木盆地内部，几乎没有机会从大西洋、印度洋获得湿润的水汽（遥远的太平洋就更没指望了）。正因为如此，塔里木盆地这个表明结构的地理标签，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与另一个表明土壤性质的地理标签：塔克拉玛干沙漠重叠。然而，这些让盆地腹地无雨可下的山地，也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它们当中那些位置、海拔占优的山地，有机会凭借高人一头的优势，将从印度洋、太平洋方向过来的水汽凝结成冰雪，然后再融化供给山脉两侧。

在综合考虑到与海洋的距离、海拔、地理位置等指标后，塔里木盆地内部在获

取雪水这一宝贵资源的问题上，呈现出了“西高东低、北多南少”的格局。这种格局反映在水系结构上，就是塔里木盆地西部山地所汇集而成的河流，最终沿着塔里木盆地北部东流，汇入了罗布泊洼地。这条河流就是“塔里木河”。

最初为塔里木河形成做出贡献的，是盆地西半部那些高大山体。从天山西段、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西段汇流而出的喀尔喀什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于阗河（和田河），在今天新疆的“阿瓦提县”境内合流成功，并开始以“塔里木河”之名，沿盆地北部横流向东，沿途再收集源自天山的河流壮大自己，抵消炎热气候所带来的高额损耗。在最后吸收了孔雀河之后，塔里木河开始向罗布泊洼地发起最后的冲刺。由此也成就了罗布泊这个咸水终端湖，以及河口一带有机会进行农业开发的三角洲平原——孔雀河三角洲。当然，从技术角度看，认定孔雀河其实是从属于塔里木河水系的。也因此这片孕育了楼兰文化的土地，更应该称之为“塔里木河三角洲”。



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

我们之所以更愿意以“孔雀河三角洲”来定义罗布泊西岸曾经存在的那片湿地，是因为无论孔雀河的河道如何变化（现在的河道在古河道的北方），它的大方向都是指向罗布泊洼地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水量帮助孔雀河冲破沙漠的包围，这些来自尤尔都斯盆地和焉耆盆地的河水，最终的归宿都是罗布泊洼地。然而那些汇集了孔雀河以西大部分水资源的塔里木河干流，却不一定会把最后的资源贡献给罗布泊洼地。而这也最终导致了楼兰的消失。

要弄清楼兰消失和塔里木河流域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要了解另一个未解之谜，那就是“塔里木河”流域的结构究竟有过什么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谓的“塔里木河”究竟指向何方，这似乎并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塔里木河干流河道，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与现在偏差个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对于一个腹地平坦的板块来说，这些都是很好理解的；参考黄河下游水系在华北平原的变迁），都不应当影响到我



们今天对塔里木盆地基本地缘结构的判断。因为那些支流在靠近山地之处所形成的冲积扇平原，才是绿洲小国所依附的重点。鉴于几千年来，这些集水山谷的地理结构并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今天的绿洲和古代的绿洲，基本都是可以对应得上的。至多只是因人类的开发，而出现大小变化罢了。这也使得当年张骞和随后而来的其他汉朝使者，所见到的绿洲小国，也几乎都可以和今天的县级以上城市相对应。

如果楼兰像其他绿洲小国那样，依附于某条刚从山地喷薄而出的河流的话，那么即使今天早已没有楼兰这个国家，我们也同样可以在行政地图上找到与其位置相对应的人口聚集区。悲剧的是，楼兰是一个不靠山地，完全依附于塔里木河下游而生的国家。无论是塔里木河流域的总流量出现变化，让那些河水不足以渗透到罗布泊洼地；还是因为河流之间的组合关系出现变化，使得其他洼地成为塔里木盆地诸河流的终端，都有可能影响到楼兰的生存。

### 第三节 汉帝国认定黄河发源于西域

每一条河流都会有一条正源。从位置上来看，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东、北部，最终在现在新疆喀什汇集而成的“喀尔喀什河”应该是塔里木河的正源。这一点，古人也已经通过丝绸之路的开拓而认识到了。由于帕米尔高原在古典时期被称之为葱岭，因此在历史记录中，这条直接影响塔里木盆地地缘结构的河流，也被称之为“葱岭河”。不过古人的想象力，显然比我们更为丰富。既然中央之国可以从黄河流域透过河西走廊——疏勒河——罗布泊——塔里木河，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葱岭，那么葱岭河又为什么不能在水系上与黄河连为一体呢？

以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地理知识而言，塔里木河显然是不可能成为黄河源头的。但对于古人来说，让他们在青藏高原上去寻找黄河真正的源头，的确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李白才会说“黄河之水天上来”）。相比之下，沿着帝国扩张的路径，去为黄河设想一个源头，要更为简单可行。这其中唯一的技术问题在于，疏勒河并不是一条贯穿河西走廊的河流。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流向问题，你也不可能从黄河岸边，一路沿河走到葱岭。不过，对于浪漫的古人来说，这也并不是大问题。就像他们无法从常理解释济水与河水的交叉问题时，就认定济水是潜行于地下，穿越黄河一样。如果一定要认定葱岭河是黄河之源的话，这种解释一样可以适用在葱岭河与黄河的连接问题上。

古人曾经的这个设想，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有点可笑。然而从地缘政治角度上来说，这样说却是十分有意义的。最起码黄河流域和塔里木盆地被有机的联系到了一起，让中央之国在西域的扩张显得更有地缘基础。事实上，类似的地缘设计，在中央之国整合西域的过程中也时有发生（其实今天也一样有）。如果要想拉近塔里木盆地与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关系，仅仅从地理上认定葱岭河是黄河源头是不够的。

因为地缘与地理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加进了“人”的因素。如果能让华夏民族与塔里木盆地发生渊源，中央之国在西域的统治就显得更顺理成章了。

最初为中央之国做这样设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为汉帝国凿空西域的张骞。只不过，在他交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喀尔喀什河并没有被认定为是整个塔里木盆地水系的正源。张骞为黄河所认定的源头，是塔里木河上游四支流中位置最南的那条——于阗河。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定，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塔里木盆地就不仅与黄河流域发生了一水相连的地理关系，更有了内容更为丰富的地缘上的渊源。

将牵强的地理关系进一步演变为地缘渊源的关键词是“昆仑”二字。在华夏民族的上古神话中，昆仑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并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起源地。就我们之前所做的地缘推理来说，这座承载了华夏文化源头的圣山，应该是在湟水河谷的东端（湟水与大通河相交处）。而湟水河谷也应该是华夏民族真正的起源地。然而在汉帝国准备染指西域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推理似乎有些太过保守了。最起码你没有办法在对外交往中理直气壮的来句“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民族的领土”这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昆仑山如果位于西域，那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将于阗河定位为塔里木河水系的源头，再将之认定为是黄河之水的初源。而这个源头又发源于华夏民族的起源地——昆仑山。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地缘关系设计。这样做不仅能够让汉帝国对塔里木盆地的政治扩张显得名正言顺，更能拉近两地民众的心理距离。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此时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土著，包括为盆地扼守东大门的“楼兰”在内，在种族上都明显有别于华夏民族；否则的话，太史公也许会想办法帮助这些绿洲部落认祖归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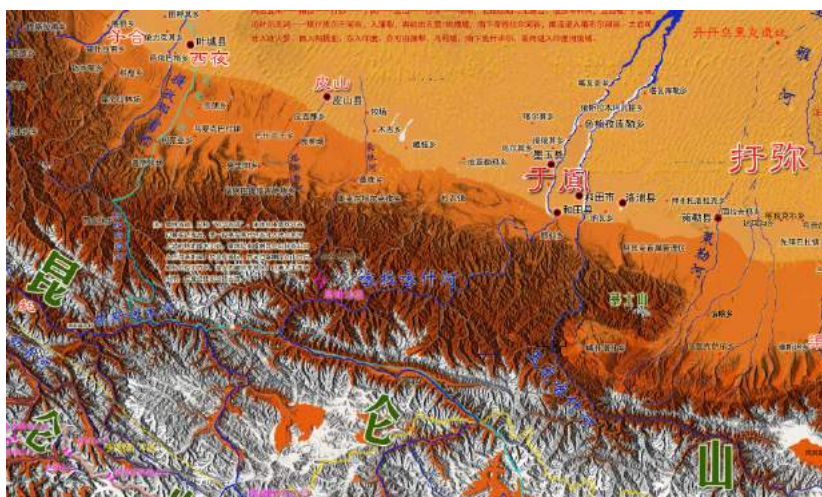
上述解读，可能会让一部分朋友感到不舒服。似乎是在暗示华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有明显的捏造痕迹，或者说现代中国在西域的统治有法理上的不足。一方面，有了汉、唐、清三代在西域的经营，现代中国已经不需要依靠张骞所陈列的这些证据，来拉近西域与核心区的地缘关系了；另一方面，单从地缘关系上来说，华夏文明也的确与西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诸多独特的因子中，以和田玉为代表的“玉”文化，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所谓“美石为玉”，玉文化实际上是石器文化的终极体现。在欧亚大陆上，之所以在中央之国的土地上能够形成如此登峰造极的“石”文化，根源还是在于东亚大陆在地缘上的孤立性。这种孤立使得欧亚大陆中、西部率先掌握的一些技术，无法快速传播到大陆的东端。这其中，就包括金属的使用。然而另一方面，东亚适于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大环境，又使得华夏民族的祖先可以较早的进入农业文明阶段，并由此产生更高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满足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富余生产力）。两者相结合，就产生了独特的玉文化。

类似的现象，其实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美洲大陆也同样有。同样因为封闭，成熟的象形文字、玉石文化在美洲文明中也同样出现。并因此而让人产生华夏文明



与美洲文明之间有某种传承关系的错觉。当然，我们这节的主题，并不是探讨半封闭的华夏文明与全封闭的美洲文明之间的异同点。我们所关注的要点，是在于华夏玉文化中的“和田玉”来自何方。



汉西域全图

既然我们将玉文化中的主角叫作“和田玉”，那么和田自然也就应该是这些玉石的出处了。相信大部分的朋友，脑海中都应该有和田位于新疆的概念。不过要说到它的具体位置，就未必有那么多人知道了。当然，这很容易在地图上查到。我们在这里能够提示的是，张骞当时之所以称这条河流为

“于阗河”，是因为当时依河而建的绿洲国家叫作“于阗”。而在今天，为这片绿洲所设定的行政区则叫作“和田”。至于河流，现在自然也叫作“和田河”了。

对于张骞来说，玉石无疑是他将于阗河认定为塔里木河源头，其发源地认定为昆仑山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最终也得到了汉武帝的正式确认。以至于我们今日所称的昆仑山脉，就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了。当然，随着中央之国在西域的进一步渗透，于阗河作为整个塔里木河源头，并充当黄河之源的定位，又有些局限了。因为从地缘关系上来说，葱岭对于帝国经营西域的重要性，要远高于产出玉石，流出和田河的昆仑山。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塔里木河水系的地理结构，又以葱岭为中心重新定义了一次。至于这次又是如何修正的，我们等到张骞走到葱岭时再揭晓谜底。

张骞、汉武帝，以及其他有志于拉近西域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的人，其实只是在政治层面上帮助塔里木河流域修订认知结构，并没有实际对塔里木河的结构做出主动改变。今天的我们，如果想从地理关系角度入手来拉近双方的地缘距离，就有机会做更多的事了。近年来在网上所热炒的“海水西调”工程，就是一种设想。尽管这个设想有些异想天开，但单从该设想所可能造成的地缘影响上来看，又何尝不是在塔里木盆地与黄河流域之间拉出一条水路关系线来呢？如果真有可能成行的话，那么它所能造成的地缘影响力，就不只是张骞当年所期盼的文化方面的联系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内容并不代表我个人认为此项工程在技术上可行。如果从地缘连接线的角度来说，沿丝绸之路打通一条贯穿东西的高铁线，会更为可行（现在也正在做）。同样的，在两千多年前的汉帝国，其实也没有办法真的将于阗河与黄河串连起来，拉近西域与中央之国关系的实际手段，关键还是在于丝绸之路的开



通。不过，相比古典时期人类有限的技术手段，大自然对于塔里木河流域结构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甚至让塔里木河干流有了南、北两线之争。而这两条线路的变化，不仅关系到罗布泊洼地的命运，也关系到楼兰的存废问题。

#### 第四节 塔里木河存在南北两河的说法

在历史记载中，塔里木河一直有南、北两河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的南河其实只是在现在塔里木河的主河道南部数十公里，又出现了一条并行的干流。对于一条完全在低地中穿行，且水量随季节不同，变量很大的河流来说，塔里木河的这种变化是再正常不过了（当日黄河下游，甚至有九河之说）。而这种河道的不稳定性，对于塔里木河北麓绿洲国家的影响，主要在于没有人敢真正把宝压在支流与塔里木河干流相交之处。相比之下，在支流的中游地带开拓农业绿洲会更为稳妥。至于塔里木河两岸，则更适合作为受绿洲国家所控制的放牧之地。当然，在塔里木河干流稳定时，河流两岸也是天然的道路选择。当日张骞仅花费数十日时间，就从河西走廊西部横穿整个塔里木盆地到达费尔干纳盆，应该就是得益于塔里木河在沙漠当中铺就的这条生命线。

另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南河其实是塔里木盆地南部河流汇集在一起，沿昆仑山北麓东行而成的。其实在《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上仔细观察塔里木河水系结构的朋友，应该也会有此疑问了：如果说发源于盆地西南角的叶尔羌河，沿着盆地的边缘流向盆地北麓尚可理解，那么像发源于昆仑山脉的于阗河，纵穿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跑去北线和其他几条河流汇合，就多少显得有些唐突了。当然，地势使然，于阗河这样的流向也是可以了。现在的和田河实际上也是这样走的。只不过由于上游开发的原因，和田河已经很少有水能够注入现在的塔里木河了。

和田河到底能有多少水注入北部的塔里木河干流，并不是我们的疑问所在。我们的疑问是，既然塔里木盆地整体是西高东低的结构，那么和田河有没有可能在流出昆仑山后，不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而是沿山麓向东，将塔里木河南部诸河，如克里雅河、尼雅河、喀拉米兰河等南北向河流串联起来，并最终注入罗布泊洼地呢？

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塔里木盆地可能在某一时期，同时南、北两侧平行存在两条干流。只不过，就塔里木河流域北多南少的补水情况而言，即使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塔里木盆地之水在北部汇集成流的机会还是最大的。而如果一定要把塔里木盆地之水视为同一水系，那么所谓“南河”之水，也可以泛指和田河及其以东诸河（这也是史学界对于“南河”的一种解读）。至于它们是否曾经在某一时期串连起来，反倒不那么重要了。对于汉帝国或者其他因各种原因步入塔里木河南部的人来说，那些支流两侧能够出现绿洲这样的战略支撑点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塔里木盆地南部，是否真的因为和田河改道而出现一条贯穿东西的“南河”。但在盆地的东南部，却的确有一条叫作“车尔臣河”的河流，没有老老实实的注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而是在本该湮没于沙漠中时，向东转了个90度弯，与北部的孔雀河相对应着向罗布泊方向渗透。然而无论是现在仍然存在的车尔臣河，还是历史上有可能存在的，由于阆河对接车尔臣河而形成的“南河”干流，都并不一定会渗透到罗布泊洼地。因为在它们东进的路途上，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洼地——台特玛湖洼地，横亘在罗布泊洼地的西面。在罗布泊已经完全消失的今天，台特玛湖洼地依然还能蓄积些水形成“台特玛湖”。



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



塔里木河

只不过，如果上游来水充足的话，台特玛湖之水本可以像博斯腾湖那样，在溢出后继续向东注入地势更低的罗布泊洼地。也就是说，历史上罗布泊水域最大时，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西南角延伸到了现在台特玛湖这个位置。在张骞经过楼兰时，车尔臣河以及汇集了孔雀河的葱岭河，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注入了罗布泊。至于和田河当时是对接车尔臣河还是葱岭河；葱岭河与车尔臣河在汇入罗布泊之前，有没有合流过一段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盆地南北两麓河流的支援，不仅罗布泊洼地



能够蓄水成功，它的西部也能够形成大规模湿地，并由此成就了人口达到四万之数的西域大国——楼兰（想想在西域，几百人就可称国。这个人口数量，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大国了）。

## 第五节 楼兰受汉匈博弈影响而南迁

对于楼兰来说，罗布泊和为它蓄水的河流，就是它的支撑所在。这时候的罗布泊，可以被视为三河汇集而成，即东部的疏勒河、西北部的葱岭河——孔雀河、西南部的车尔臣河。而对于楼兰和罗布泊来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葱岭河——孔雀河了。因为相比其他两条河流，这条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塔里木河”的河流，所拥有的集水区，无论在面积、海拔，还是位置上都要更优，也是罗布泊之水的主要来源地。而楼兰古国的都城，也正是在它的故道之侧。

然而楼兰和罗布泊最终还是消失了。导致它们消失的直接原因，就是葱岭河最终没有与孔雀河会合注入罗布泊洼地。至于它的新归宿，我们其实从现在塔里木河的走向也可以看出，那就是在即将与孔雀河会合之前（新疆尉犁县之南），转而向南注入了台特玛湖洼地。虽然在蓄满这片洼地之后，水流依旧有可能向东漫流入罗布泊洼地。但这样的话，罗布泊的主要蓄水区就在洼地的南部（三角洲湿地也因此位于西南角），而依附于孔雀——葱岭河故道的西北部三角洲，环境就将会急速恶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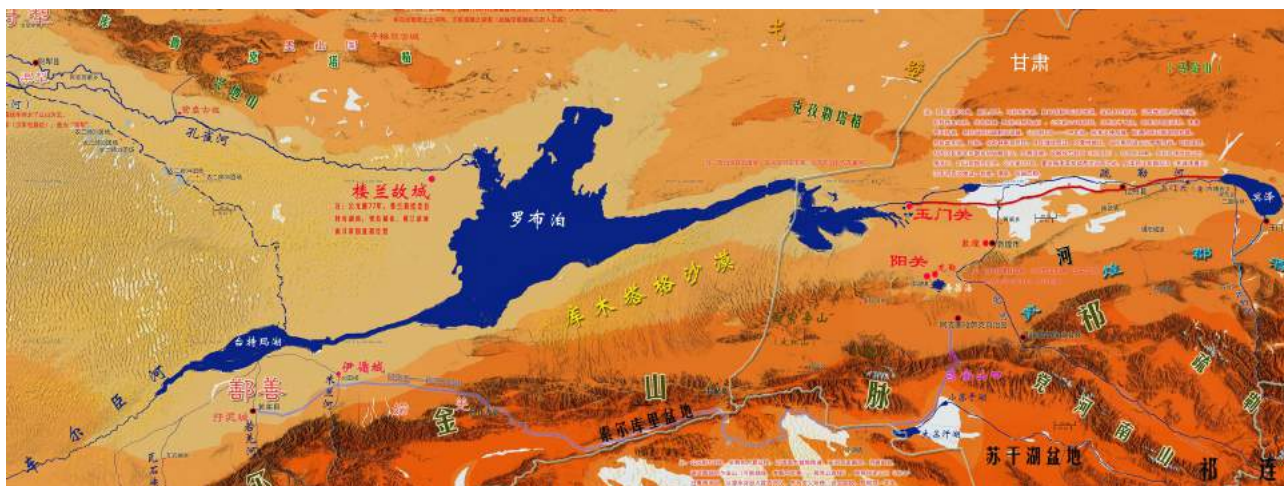
对于历史上塔里木河曾经顺着这条路径改过几次道，又因此而导致过罗布泊“位移”过几回，现在仍在研究当中。同样模糊的，还有这种变化的原因，即到底是因为自然力的周期变化（有说法是1500年一改道）；还更多是因为人类在上游的开发，而使得塔里木河流域之水（包括车尔臣河）无力渗透到罗布泊。解答上述问题，可能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努力了。不过今天罗布泊的消失，以及塔里木河的改道却可以十分明确的说是人为原因。

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塔里木河之水其实已经沿着今日之河道，流入台特玛湖了（只不过上游开发过度，已经无力溢出流入罗布泊了）。而在二十年代中期，在人力干涉之下，塔里木河又与孔雀河会合，并为罗布泊洼地带来了3000平方公里的水面。只不过，当红色政权接管西域之后，为了屯垦西域，主政者在50年代沿塔里木河流域兴修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并使得塔里木河之水再一次与孔雀河分流（最终由于开发过度，也只是名义上回归“故道”，而无水注入台特玛湖了）。几乎只能靠孔雀河在汛期补水的罗布泊，也最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完全消失了。而它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却是因为其不毛之地的身份。这使得罗布泊洼地有机会成为红色中国的核试验场，并因此而载入史册。

其实以罗布泊所处的位置来说，即使没有对塔里木河下游的人为改道，它的消失也是必然的。我们前面也说了，随着人类在上游地区的人口增加，那些古典时期

存在的终端湖几乎都在面临干涸的危险。事实上，早在公元四世纪，葱岭河就已经开始与孔雀河分流，转而向南流向台特玛湖了。这意味着罗布泊洼地不再是塔里木盆地南、北水系的交汇点了。至于楼兰，它当然也就不再会有赖以生存的湿地了。这时比较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向南迁移到台特玛湖附近，以远离这片即将成为魔鬼之地的土地。

事实上楼兰也的确这样做了，然而这一次迁移，却并非是在葱岭河改道的公元四世纪。而是在环境尚好的公元前 77 年。在那一年，楼兰国在征求了汉帝国的意见之后，向南迁移到了台特玛湖之南，即今天的新疆若羌一带，并更名为“鄯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楼兰“先知先觉”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



汉西域全图

要想了解楼兰为什么会放弃环境尚未恶化的葱岭河——孔雀河三角洲，我们需要先来看看，楼兰的地缘位置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从大方向上来看，疏勒河、孔雀河（或说葱岭河）、车尔臣河这三条河流已经为楼兰描绘出了一个三线相交的枢纽位置。从东而来的汉帝国使者，在沿疏勒河西进，绕至罗布泊东岸时，理论上可以选择溯孔雀河而上，走塔里木盆地北沿继续西进；也可以向南，沿车尔臣河至塔里木盆地南麓开辟丝绸之路南线。

虽然从楼兰而下，沿车尔臣河渗透塔里木盆地南缘是一种选择。然而对于汉帝国来说，楼兰所承担的中转任务，还是以北线为主。也就是说，试图溯孔雀河而上的旅者，才会选择经过楼兰。至于准备走南线的人，则会在即将到达玉门关时，转而向南直接插至阿尔金山北麓，然后一路向西，紧贴山麓进入昆仑山的山前绿洲带。这也就是汉帝国在兴建玉门关的同时，又在它的南部同时修建了阳关的主要原因。当然，自阳关而下的丝绸之路南线的战略意义并不止于此，只不过这个悬念要等到张骞回程时来揭晓了。

尽管汉帝国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南线，实际绕过了楼兰的控制区，但这并没有拉



低楼兰的地缘价值。因为对于楼兰和塔里木盆地来说，汉帝国并非是唯一的强力渗透者。相比已经在准噶尔盆地形成均势的匈奴、乌孙两国，汉帝国其实算是一个后来者。而这两个游牧国家，尤其是匈奴同样对控制塔里木盆地诸绿洲感兴趣。对于乌孙来说，要是没有汉、匈这两个强大的对手，他们应该很自然的会将塔里木盆地北缘作为渗透目标。而如果要独霸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北部地区的话，楼兰也同样会成为乌孙势在必得的目标。

乌孙人可以选择的路线，是先从尤尔都斯盆地顺开都河而下，控制焉耆盆地，然后再沿孔雀河东进，最终控制楼兰这个战略要点。当楼兰被乌孙控制之后，沿车尔臣河渗透塔里木盆地南缘，就将成为乌孙人的下一个选项了。在历史上，乌孙人也的确曾经试图通过多个山口试探性渗透过塔里木盆地，然而在汉帝国和匈奴两位强邻的身边，这些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反倒是强大的匈奴，利用上述路线而对塔里木盆地东部诸绿洲，保持了强大的压力。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匈奴人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为控制塔里木盆地而选择的战略基地，设在水草丰美的焉耆盆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既可以对塔里木盆地东部绿洲保持威慑，迫使他们臣服于匈奴；又可以打消乌孙与之争夺塔里木盆地的想法。如果汉帝国介入，匈奴在准噶尔盆地——河西走廊两线出击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尽得塔里木盆地，最起码也能控制盆地的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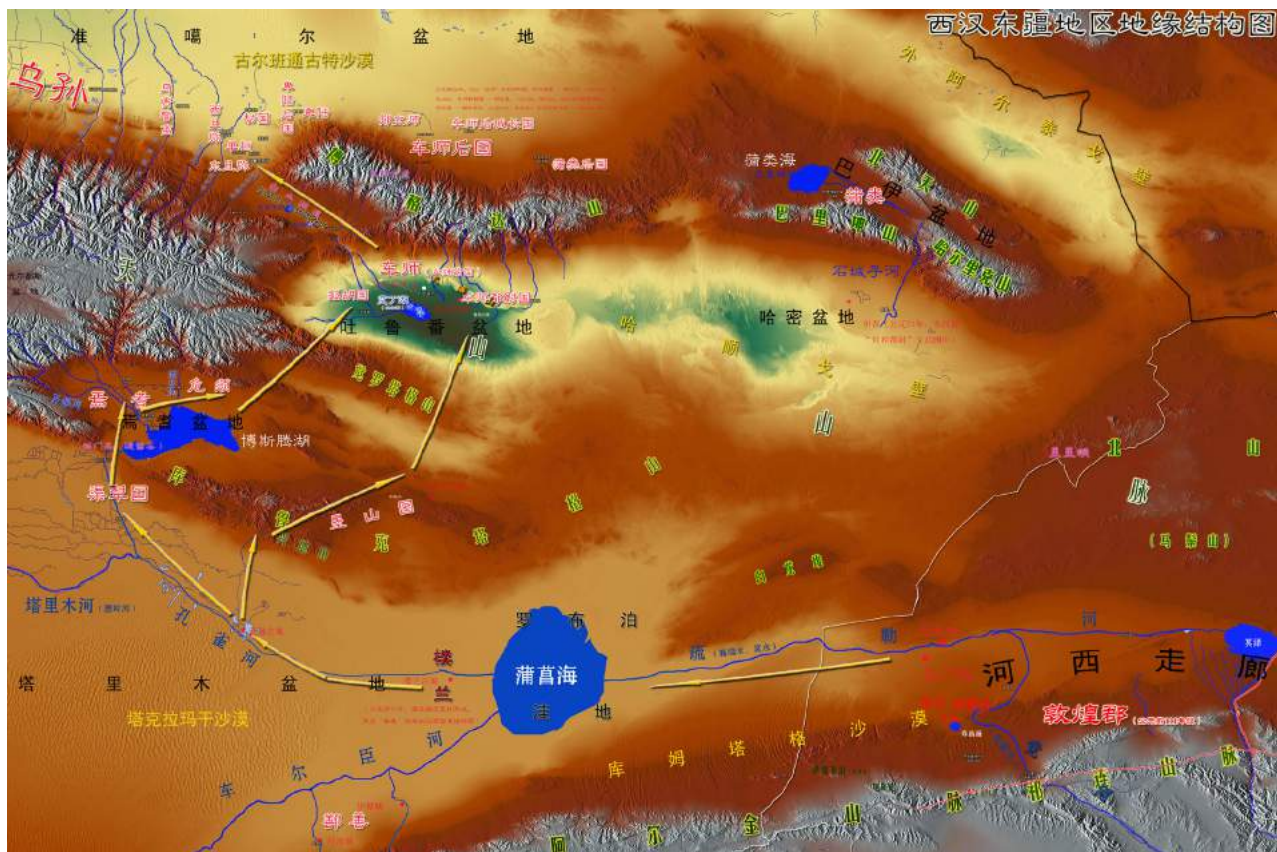
根据历史记载，为匈奴经营准噶尔盆地的部落，为匈奴“日逐王”部；而河西走廊的西段，则为“浑邪王”的领地。当浑邪、休屠王部从大月氏人手中得到河西走廊；而日逐王部又渗透到焉耆盆地时，匈奴帝国即使没有再进一步成为塔里木盆地的主人的想法，他们也一定会将楼兰作为征服对象。因为这样的话，匈奴右翼的日逐王、浑邪王两部就可以通过开都河——孔雀河——疏勒河通道连通，为帝国的西部疆土封口。

对于楼兰来说，这种地缘格局意味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臣服于匈奴（对抗是绝对没有机会的）。至于说到底是归属日逐王部管辖，还是浑邪王部领导，倒不是问题。这个问题，自有大单于去协调、分配。对于必须寄人篱下的选择，楼兰人内心深处肯定是不满意的。也许这个时候，他们会希望有更多的选项。然而当这个问题真的成为选择题后，楼兰人会发现，有时候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最起码你不用纠结，不用害怕站错了队。让楼兰人纠结的选项不是别人，正是汉帝国。

在汉帝国征服河西走廊之后，楼兰也成为了帝国进一步控制西域的战略要点。对于试图通过塔里木盆地打通丝绸之路的汉帝国来说，即使不准备染指包括焉耆盆地在内的“东疆盆地区”，也必须控制楼兰这扇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以理想状态来说，匈奴和汉帝国也许可以以焉耆盆地南沿的“铁门关”为界，划定彼此的势力范围。问题是，理想终究是理想，游牧民族如果肯把自己圈在草原上，汉帝国也就不用费尽心机来凿空西域了。



为了抵御匈奴对丝绸之路的干扰，汉帝国在战略上仅仅止步于塔里木盆地是不够的。最起码整个东疆盆地区，都应该成为丝绸之路的缓冲。而如果匈奴人想切断丝绸之路，将汉帝国阻隔在罗布泊以东地区的话，他们也同样不会满足于控制东疆盆地区。争取楼兰倒向自己一方，才能有机会同时切断南、北两线的丝绸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博格达山周边地区（博格达地缘图），以及焉耆盆地、葱岭河——孔雀河三角洲地区，都成为了双方拉锯的焦点地区。两大帝国在自己所处区域的长期拉锯，使得拉锯区内的绿洲国家都有些不堪其扰。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东疆第一大国“车师”，被汉帝国一分为四（战略意义在东疆部分已经分析过了）；而尽得塔里木盆地之水的楼兰，最终选择了主动南迁。将自己的都城和那片肥美的三角洲交由汉帝国直接经营。楼兰的这种选择，对于汉帝国来说也不算是件坏事。直接控制、屯垦这片绿洲，意味着帝国在控制丝绸之路北线、抵御匈奴渗透这件事上，将有更高的效率。那么接下来汉帝国还会怎么做，他们在丝绸之路北线上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布局？

不管楼兰故国在公元4世纪，到底是因为何种原因成为一片沙漠，它在汉帝国经略西域时，都是一片难得的沙漠绿洲。如果汉帝国选择在楼兰设置统辖西域的“都护府”，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帝国虽然在楼兰南迁之后，占据了战略要点。



却并没有将西域都护府设置于此。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楼兰的地缘位置不足以保障帝国在西域的全部利益。

以楼兰的位置来说，固然可以南北兼顾两条丝绸之路的路线，但对于帝国来说，南、北两线却并非具有同等的地缘价值。由于匈奴、乌孙这些游牧大国都位于天山北路，北线所承受的压力远非南线可比。如果经略西域的中原王朝希望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将游牧民族阻隔在草原地带的话，经营重心最起码不能脱离天山南麓（北线如果得保，南线自然也就无忧）。在地缘压力由北而至的情况下，楼兰的地缘价值更多体现在庇护南线安全上。



汉西域全图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军、政中心置于楼兰，实际意味着在执行“弃北保南”的保守战略。也就是说，无论塔里木盆地北线的绿洲小国，是否名义上还声称接受中原王朝的领导，他们实际上都更多的处于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了。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东汉、魏晋，乃至十六国时期，中央之国受内乱之扰无力完控西域时，便曾经出现过。只不过，那时西域的最高行政机构，已经不是级别更高的“都护府”，而是“长史府”了。既然天山南麓是汉帝国经营西域的重心所在，那么我们下一步，就顺着孔雀河——葱岭河的水流，去考察一下究竟都有哪些绿洲能够成为帝国在西域的支点。事实上，这也是张骞脱离匈奴控制之后所选择的西逃路线。

## 第二章 孔雀河上游与轮台绿洲分布的国家

### 第一节 尉犁国位处孔雀河上游地区

当张骞从楼兰境内出发，沿孔雀河向天山南麓逃亡时，他遇到的第一个国家，应当是尉犁。在西域诸国的版图上，这是一个人口近万的中等规模国家（汉书所记录数字）。当然，单纯提这样一个古国名，绝大部分人并不会留下太大印象。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究竟有哪些地缘标签与之相关联。从地理关系来看，尉犁与楼兰可以称得上是“共饮一江水”的邻居。只不过，后者处于孔雀河下游；而前者则位于孔雀河中上游地区。

相比下游因河流断流而消失的绿洲，尉犁国所处的上游地区要幸运得多。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在它故址上看到两个县、市（地）级的行政区——尉犁县和库尔勒市。当然，对于这种定位，可能会有关注新疆行政区划的朋友提出异议。因为在四个月前（2012年12月29日），在库尔勒的西部又诞生了一座新的县级市——铁门关市。与库尔勒、尉犁两级行政区域的设置一样，铁门关市也是依附于孔雀河而生的。不同的是，决定这座城市命运的地缘因素，并不是孔雀河，而是一片叫做“库鲁克塔格”的干旱山地。

在之前的解读东疆盆地区的内容中，我们曾经提到过这条山地。从地理结构上看，库鲁克塔格属于天山山脉的一条支脉，并与天山主脉以及可以称得上是主脉延伸的博格达山、巴里坤山、哈尔里克山，一起合围出了“东疆盆地区”。只不过库鲁克塔格的运气实在不好，平均两千米的海拔，本身就没有什么机会在这片干旱的陆地形成积雪甚至地形雨。而横亘在其北部的天山主脉，更像一堵墙一样，封堵住了西来的水汽。

库鲁克塔格山的恶劣环境，也影响到了它本身和山地两侧的地缘结构。不仅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哈密盆地南部不可避免的因无水可补而戈壁化（也就没有绿洲了）；它的南部也同样没有办法，为罗布泊洼地的蓄水做出贡献（孔雀河也因此无支流）。如果不是博斯腾湖拥有大纵深的集水区，并因此而有多余水量溢出形成孔雀河的话，库鲁克塔格以南直至车尔臣河地区，应当早就是一片恐怖的无人区了。而这也肯定会影响到张骞的西行路线，以及汉帝国在西域的布局。

不过，上天并没有完全抛弃库鲁克塔格以南地区。即使在孔雀河下游断流，罗布泊无水可补的今天，孔雀河依然能为古尉犁国的领地支撑百万人口（库尔勒市也是仅次于乌鲁木齐的全疆第二大城市）。并且由于孔雀河源出博斯腾湖的缘故，干旱的库鲁克塔格山地中，也天然形成了一条河谷通道——遮留谷。而这条直接连接焉耆盆地与塔里木盆地的通道，毫无疑问的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因此而会成



为军事家所关注的焦点。

在汉帝国入主西域之前，遮留谷的军事、交通价值，肯定就已经被周边国家所发现了。至于它的南部入口，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称为“铁门关”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无论对于二千多年前的汉帝国，还是今天的红色中国来说，铁门关之于整个塔里木盆地的门户价值，都没有改变。而无论古今，扼守它的重点也都不在于在这个谷口所部署有多少军队。既然这是一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通道，那么也就必须有战略级别的计划相对应。这个计划以及随之产生的地缘影响，在古典时期被称之为“军屯”；现在的话，我们则称之为“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

如果没有兵民合一的屯垦计划，中央之国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是没有办法支撑的。为了给那些驻扎在军事要点上的军队提供给养，就近寻觅绿洲屯垦是最为高效的补给方式；另一方面，在经历过一定时间之后，这些亦兵亦民的移民后裔完成土著化进程后，也可以为中央之国地缘融合西域，起到决定性作用（改变民族结构）。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汉帝国和今天的中国，都选择了在铁门关以南的孔雀河流域进行军事化的屯垦。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师市合一”的铁门关市（前身为兵团农二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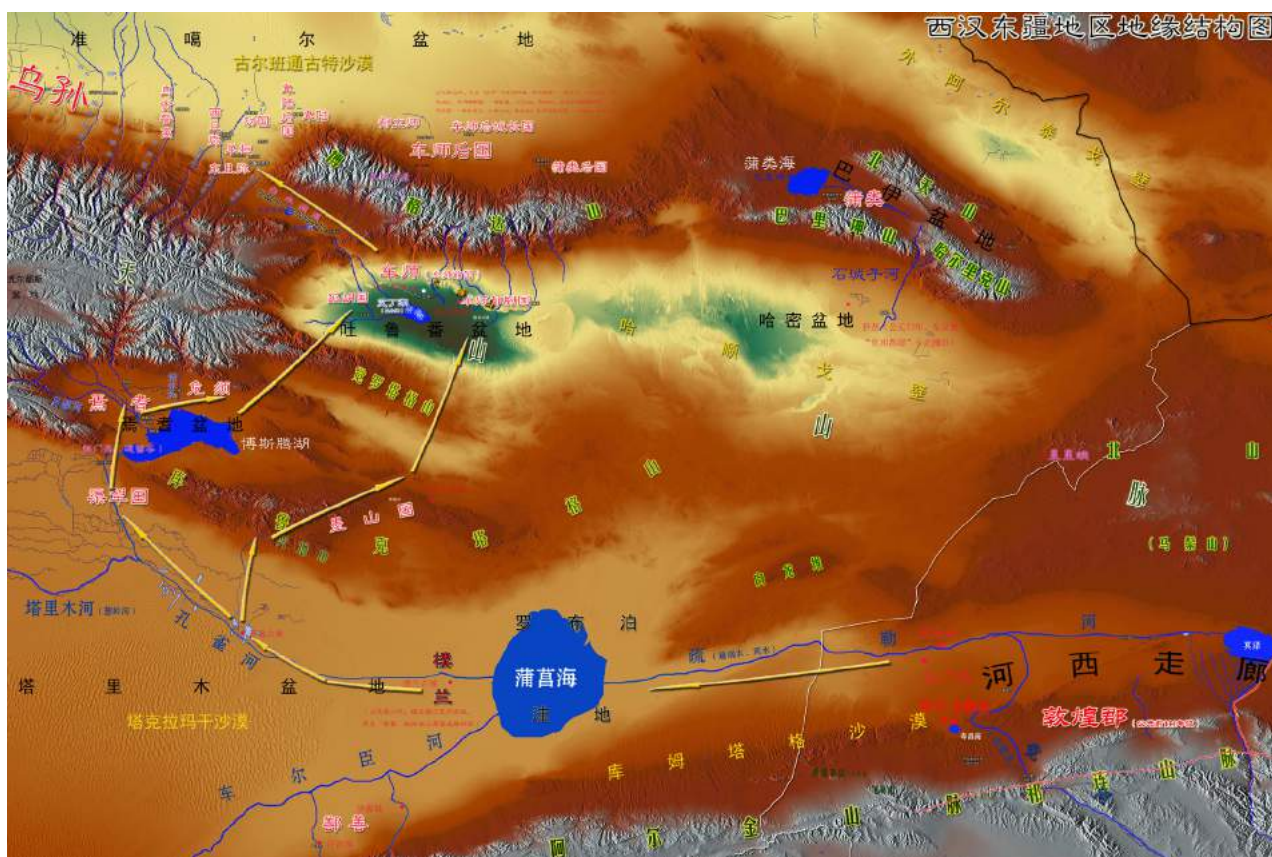
## 第二节 墨山国的位置及其生存方式

尽管溯孔雀河而上，经铁门关的线路，是切入东疆盆地区以及天山北路的天然选择，但对于试图翻越库鲁克塔格山进入东疆盆地区的人来说，铁门关其实也并非唯一的选择。这是因为在库鲁克塔格山的腹地，还生存有一个人口约 5000 人的国家——墨山国（也称“山国”）。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不想借由焉耆盆地进入吐鲁番盆地的话，那么在楼兰稍作休息后，就不要把下一站设定为尉犁国，而是放弃沿孔雀河前行的方案转而向北。在经由墨山国的领地之后，直接进入车师国境内。

在我们习惯了“按河索国”的规律后，墨山国在库鲁克塔格的存在应该会让大家感觉有些意外。尤其是这个“国家”看起来还算有点规模（比起那些几百人的“国家”来说）。不过想想阿拉伯地区那些在荒漠中求生的部落，我们就不应该为此感到意外了。这当然不是说，墨山国的子民们可以不需要水。只不过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并不是以河流，而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于山地内的某些低地中。

这些从地下冒出的泉水，源头应当还是指向于天山主脉。当一个山谷之中拥有数量不等的泉眼时，就有机会在干旱的大环境中，滋生出一个相对湿润的小环境来了。问题在于，这些从戈壁之下渗透而出的淡水，虽然有机会露头，却并不足以汇集成稳定的河流。也就是说，墨山国虽然能够依靠泉水解决饮用水的问题，但却很难依靠这些泉水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了墨山国的存在呢？答案是“铁”。

在古典时期的耕战生活中，盐、铁是两类非常重要的资源。前者事关基本生存问题；后者则是一个生产 + 军事层面的问题。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没有铁制兵器的话，他们的战斗力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铁资源的保有量不仅关乎战力，也直接影响到农业效率。这也使得历史上有个别族群可以不主要依靠农耕、游牧、渔猎这些基本生活方式，而仅仅依靠盐、铁资源（包括获取他们的技术）而生存下来。我们在先秦阶段解读过的，因盐而兴的“巴国”就是典型案例。不能说没有盐，就没有巴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盐泉，巴人只会是一个湮灭于历史中的山地部落。而有了盐之后，巴人就可以直接参与并影响中央之国的内部博弈了。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墨山国的存在也是这样一个特例。它所赖以生存的粮食，是从焉耆盆地的焉耆、危须等国输入的。当然相对应的，周边国家也可以从墨山国得到宝贵的铁资源。然而仅仅依靠一项特殊资源生存，是十分危险的。那些农业绿洲几年之内得不到新的铁器，依然能够生存下来，甚至不会影响生存质量（因为铁器不是易耗品，且可循环利用）；反过来，像墨山国这种以资源换粮食的国家，如果被断绝了粮食进口，能支撑多久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墨山国会与周边那些粮食出口国，尤其是焉耆这种“大国”（人口超过三万）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只不过，即使是这样，墨山国依旧摆脱不了被大国吞并的宿命（魏晋时期为焉耆所并）。就像巴国最终还



是被曾经向他进口食盐的秦国所灭一样。

鉴于上述原因，汉帝国在经营西域时，并不需要特别去关注墨山国的想法。只要像焉耆、尉犁这样的绿洲国家被纳入了帝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山地国家很自然的也会跟进。对于汉帝国来说，它的经营重点仍然是天山南麓那条由丝绸之路串连起来的绿洲带。从环境和地缘位置上来看，张骞如果想在逃亡途中为将来的汉属西域设定一个军政中心的话，得山、水之利的尉犁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最终帝国并没有这样选择，而是将“西域都护府”的位置设置在了尉犁国的西侧。在张骞沿天山南麓逃亡时，这个位置上曾经生存有一个叫作“乌垒”的国家。

### 第三节 李广利远征大宛时屠灭轮台

一般情况下，在控制西域这种边缘地区的时候，中央之国倾向于派驻军、政合一的机构。汉、唐之“都护府”，清朝之“将军府”，包括红色中国的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属于这种性质。质的变化出现在 19 世纪末。当西域差一点因为阿古柏入侵而脱离中央之国的版图后，行将作古的清帝国决定在这片汉唐故地建省，将之提升到与中央之国核心区同等的行政级别。不能说这一变化就能让中央之国在西域的存在去军事化（否则后来也不需要生产建设兵团了），但从行政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进步。也算是正式开启了西域融入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进程。

随着西域进入“郡县制”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一批新的县级行政区划也随之诞生了。而为了彰显中央之国在西域统治的合法性（自古以来……），那些曾经在汉帝国开拓西域的过程中出现过的古地名，也随之在新的行政版图上拥有了一席之地。焉耆、尉犁之名，就是翻牌成功的典型。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二千多年前的“国”，都有机会原地满血复活的。位于尉犁西侧的“乌垒”国，就还是只能待在故纸堆中。乌垒没能复活成功的原因，并非因为其所依附的绿洲因地理环境变化而消失（比如楼兰）。相反，在乌垒故址现在仍建制了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而乌垒没能在一百多年前抓住这次机遇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地缘标签——轮台，比它更有资格获得中央之国的青睐。

“轮台”之所以会比“乌垒”之名更有机会出现在新的行政地图上，是因为它比“乌垒”之名，要更早一步进入汉帝国的视线。这两个国名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楼兰与鄯善。相当于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名称。只不过和楼兰变身鄯善有所不同的是，轮台、乌垒两国所指向的地缘板块，并没有变化。相同的是，它们的变身都与汉帝国在西域的渗透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张骞凿空西域时，他在今日轮台县位置上所遇到的绿洲国家，还是“轮台国”。然而在他去世十二年后（公元前 102 年），这个西域小国却因为汉军的到来而遭受了灭顶之灾。直接导致轮台灭国的历史人物，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这个比飞将军李

广的名字多一个字的汉将，运气也比李广要好得多。当然这个运气，更多来自于他那身为皇妃的妹妹。只不过这层皇亲国戚的身份，最终也为他和他的家族带来了灭门之祸。

在李广利为汉帝国所执行的战术任务中，发生在公元前 104 年至公元前 101 年之间“汗血马之战”（汉征大宛之战），是最为知名的战役。这场目标指向汗血马的战争，也直接导致了轮台国从西域的版图上消失。历史上对于这场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战争，评价其实并不太好。以十万汉军为代价，去换取数千匹汗血宝马。怎么算起来，都是一笔亏损的买卖。不过，当我们把视角拉高，从战略意义上来评价这场战争的话。就会发现这场战争，其实是汉帝国控制西域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汉武帝决心在西域动用武力之前，西域一直是外交家建功立业的场所。汉帝国在塔里木盆地两端开辟丝绸之路的做法，相当于给一只习惯吃草的兔子，额外带去了美味的胡萝卜。仅仅出于商业利益，塔里木盆地诸国，包括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对于汉朝使者的到来，整体都是呈欢迎态度的（包括张骞也是由大宛引路，找到大月氏的）。问题是，仅仅依靠利益来维持的关系并不能长久。没有大棒配合胡萝卜，并不能让对方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最先被拿来开刀的，是西出河西第一国的楼兰。鉴于匈奴已经先期渗透到此，并展示过强大的武力。楼兰在汉帝国到来之后，政治上还是更倾向于匈奴（或者说更害怕匈奴）。在匈奴的支持之下，楼兰甚至扣留过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以期干扰丝绸之路的建成。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曾经在公元前 108 年集结过数万兵力，准备灭楼兰以立威。然而精心准备的计划却被一次意外所打破了。这个意外就是汉将赵破奴仅凭七百奇兵为先锋，就突袭楼兰得手，并俘获了楼兰王。

从战术角度来说，汉帝国的这次胜利当然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最终楼兰在深切感受到汉军兵威的情况下，在政治上选择了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其表现就是，楼兰王分别将两个儿子送至匈奴、汉朝为质。不过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骑墙派是很难真正做到左右逢源的。所以后来的楼兰索性选择了南迁，不再让自己处于左右为难的火山口上。

以一场奇袭而避免了本该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对于汉帝国和楼兰来说，应该都不是坏事。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汉帝国其实也失去了一次正面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机会（更多的会被认为，是战术得当所取得的战果）。换句话说，对于楼兰的征服，还没有让西域诸国建立起汉朝能够压倒匈奴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西域诸国至多能够采取的，就是像楼兰那样的中立态度了。

虽然楼兰阴差阳错的躲过了一场大战，但相比之下，以远征大宛来树立汉朝军威，却也有着难以替代的战略价值。一方面，对于古典时期的战争来说，“马”对战力所起的作用，几乎相当于现代军队机械动力的全部。而这恰恰也是农业国家的短板

所在。如果没有数量和质量上占优的战马，中央之国在面对游牧民族入侵时，就永远处于战略防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想办法获取整个亚洲地区最为优秀马匹的基因库，对于汉帝国的意义，相当于军事科技的一次飞跃（看看文物中那些明马形象，与汉马形象的巨大差距，就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点了）。



汉代青铜马



明代武士牵马陶俑

另一方面，大宛之所以敢于拒绝汉朝重金求购汗血马的提议，是因为它自认为不需要在匈奴与汉朝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说可以拒绝任何一方的请求）。三十万的人口加上相隔万里的距离，足以让大宛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然而对于汉帝国来说，如果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那对西域诸国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将是空前的。试想一下，如果远在万里之外，有葱岭之隔的“超级大国”大宛，都能被汉军所征服，那么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的国家当中，又有谁敢不唯汉帝国马首是瞻呢？

基于上述理由，大宛成为了汉武帝势在必得的目标。然而对于习惯步步为营，需要漫长补给线支撑的汉军来说，征服大宛必须得到沿线绿洲国家的支持。要知道，在这片荒漠之地，那些占据绿洲的西域小国仅仅保持两不相帮的所谓“中立”态度，

都会是致命的。这种情况，在李广利一征大宛的过程中，就真实发生了。沿途无法得到补给的汉军，最终还未攻击到大宛的核心地区，就兵败而归了。当然，除了沿途国家的中立态度以外，汉军的轻敌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受到七百骑兵破楼兰战绩的影响，帝国为李广利所配置的骑兵，居然也依照大宛、楼兰的人口比例（大宛约三十万人以上，楼兰约四万），而只是增加到了六千。用这点兵力去远征一个万里之外的国家，即使沿途补给充足，能够全数到达战场，估计也没有机会攻破大宛的。

一次立威的军事行动，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很显然是不能让汉武帝满意的。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汉帝国就此放过大宛的话，外交家们苦心为汉帝国开拓的丝绸之路转瞬间就会崩溃。正因为如此，汉武帝甚至没有让李广利回到河西走廊，而是立



即征调了十倍的骑兵（六万）发起二攻大宛的军事行动。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帝国甚至在河西走廊部署了三倍于攻击部队的步兵（十八万）作战略预备队。也就是说，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汉武帝都要让大宛和西域诸国真正感受到汉军大棒的威力。

远征军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加，只是汉军最后能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来说，后勤补给是否得力，才是能否笑到最后的關鍵。前面我们也说了，如此漫长而又环境恶劣的征途，只有沿途绿洲国家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汉军才有可能保有畅通的补给线。问题是，此时身处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那些绿洲小国，大家仍然对这场战争的结果持观望态度，并不愿意主动加入汉军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找个国家杀鸡骇猴了。

最终这个悲剧性的任务落在了位置靠东，人口数量又不多的轮台国身上。再一次对汉军关上大门的后果就是，汉军罕见的在西域进行了一场屠城灭国的军事行动。其实，与其说这是针对轮台国一次军事行动，倒不如说是一场意在全西域的外交心理战。其目的在于以非常手段让周边国家迅速感受到威胁，并由此主动倒向汉军阵营。纵观历史，对这一战术运用最为纯熟和成功的，要数成吉思汗了。而李广利在二攻大宛之始的这次“敲山震虎”之举，也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沿途国家再也不敢紧闭城门，保持他们那谁都不得罪的“中立”态度了。

#### 第四节 乌垒国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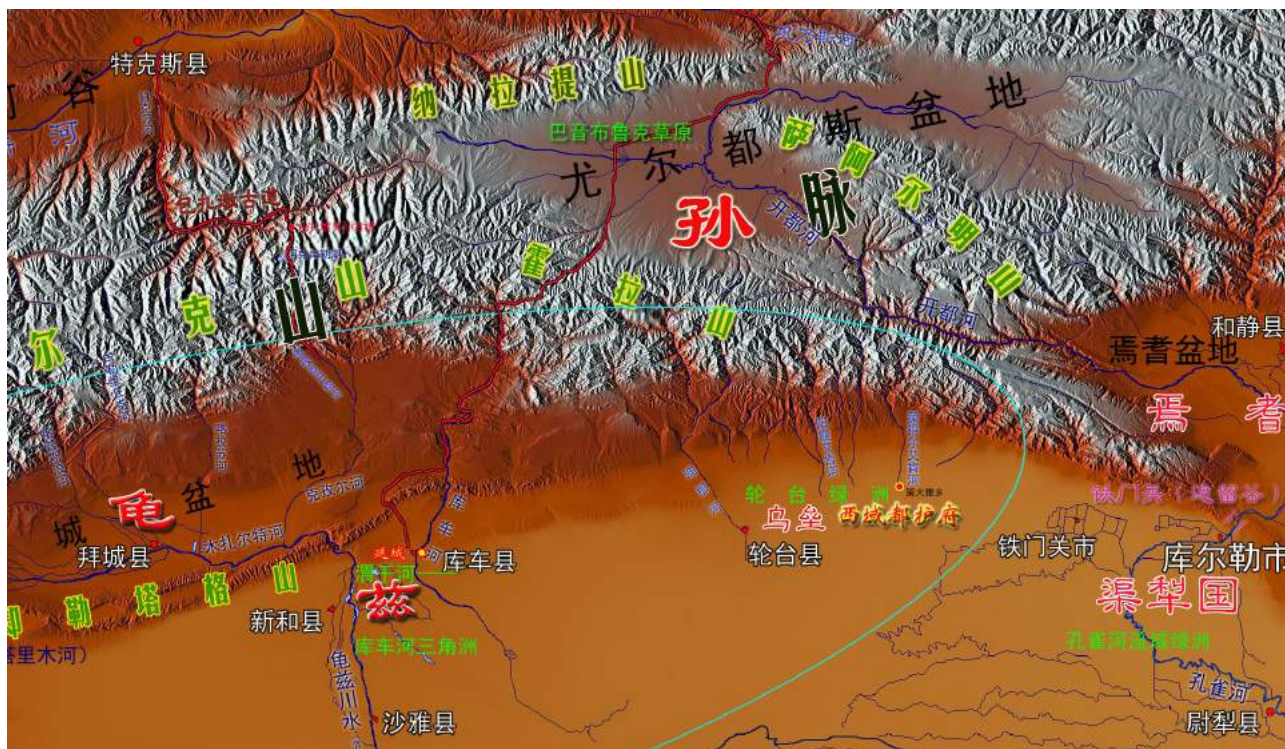
一份好的计划，通常能够获得几份收益。就像远征大宛，在立威的同时也能为汉帝国改良马种一样。李广利屠灭轮台的举动，也直接导致了一片成熟绿洲的空出。基于它既可东控铁门关，又可西顾丝绸之路北线的位置，汉帝国最终在建制“西域都护府”时，选址在了轮台故地。不过，对于汉帝国来说，治理西域的重点始终是在外交手段的运用上。合纵连横西域国家，让他们的人力、资源为汉帝国所用才是西域长治久安的保障。尽管军事这根大棒也必须在关键时刻祭出，但汉帝国更多的是采取“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远征军的形式，就像这次远征大宛一样。这与唐帝国大量部署军队在西域的做法不尽相同。以至于汉朝经营西域的成果，更多是通过外交家显示出来的（张骞、班超等）；而唐朝在西域扬名立万的，多是军事家了（比如高仙芝）。

由于汉帝国在经营西域时，更注重的是以“统战”的形式，即通过上层外交形式，争取西域之地为帝国所用。因此攻灭那些西域小国，将其所处绿洲变身为汉朝移民的安置点，并不符合汉帝国治理西域的战略取向。所以在轮台被攻灭后三十年，汉朝又允许当日屠城之后所剩余的轮台之民，重新在西域都护府的周边建立了“乌垒国”。只是这时的乌垒，人口已经缩减至了一千多人，完全不会对汉帝国造成新的军事威胁了。我们目前已经很难知晓，当日的轮台国究竟有多少人口了。但通过绿



洲大小，确定人口数量级还是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轮台国境内无一条大河的现状，让它没有可能拥有过万的人口。那么到底是哪些河流在支撑古今两个“轮台”的存在呢？

今日流经轮台县城的那条河流，叫做“迪那河”。然而就整个轮台县的县域，或者说轮台国故地来说，却也不能说迪那河就是母亲河。这是因为这片位于孔雀河以西，东西纵深约百公里的山前绿洲带，是由九条流量不大（目前轮台九溪的年径流量，总计约在5亿多立方米），水流湍急的山溪性河流所共同塑造而成的。而受流量所限，虽然这些河流因地形的原因，都有向心合流的趋势。但这些河道不长的溪流，最终还是未能合流并注入塔里木盆地。



龟兹地缘结构图

位处“轮台九溪”中最西部的迪那河，目前算是它们当中流程最长，滋养绿洲面积最大的河流。这也是它成为今日轮台行政中心的地理原因。不过，二千多年前的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轮台县东部的“策得尔艾肯河”的周边环境也许会更好些，以至于西域都护府选址在它的附近。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西域都护府的选址到底在哪个点上；之前的轮台国和之后的乌垒国，又曾经把政治中心设在哪个河流周边，已经不太重要了（可以肯定的是，汉军在迪那河流域也有屯垦点）。如果不是想去考古或者盗墓的话，通过地理与历史的结合，了解这个板块在整个西域的地缘地位以及潜力就已经足够了。

一个地区有多大潜力，很大程度可以通过人口数量体现出来。在汉书的记载当中，

复国之后的乌垒国人口为 1200 人，与孔雀河中上游地区的尉犁国 9600 人相比较，二者之间的比例为 1：8。这与今日轮台县之于“库尔勒市 + 尉犁县”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当。从这些数字当中，我们其实已经很容易判定，轮台绿洲原始的人口潜力并不大。不过，就地缘潜力这个概念来说，从来不能单看它的土地产出能够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提供多少热量。与之相比，区位要重要得多，而这也恰恰是轮台绿洲的优势。

轮台的区位优势，对它来说既是福也是祸。如果不是处在这样一个交通要道上，轮台也不会成为汉军杀鸡骇猴的对象；但这也为轮台成为了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并因此而闻名中原，成为了西域的代名词。然而轮台的这种区位优势，并不是无可替代的。毕竟它只是一条交通线上的一个点，而不是一个两线相交的枢纽点。即使因为故轮台国被屠，而空出空间成为了汉帝国在西域的行政中心，其本身的实力也还是不及周边绿洲的。换句话说，仅仅依靠轮台这九条溪流，是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能在西域显山露水的“大国”的。

## 第三章 龟兹与乌孙的联系通道

### 第一节 龟兹故地的主要核心板块

一个人能够取得多大成就，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更取决于你周边人的表现。与东面的孔雀河绿洲带相比，轮台绿洲已经是有了数量级的差距了。这使得轮台国在与尉犁国的竞争中，无法占据优势。轮台人想要扩大领地的话，看来只有沿山麓往西边走了。当我们跨过迪那河继续向西进发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一片体量比尉犁之地还要更大的绿洲。不过，当年的轮台人并无法窥伺这片土地。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片绿洲并不是无主之地。而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建立于这片绿洲上的国家——龟兹，比起轮台或者乌垒来说要更为熟悉。

龟兹在中央之国的名气与影响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要素，一为“佛”；二为“乐”。很多时候，这两个元素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为此，唐人称龟兹为“佛音圣地”。虽然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再聆听到当日的佛音盛况。但如果你有机动去龟兹故地中的新疆拜城县，还能够在“克孜尔千佛洞”中，用眼睛感受到这些千年之前的声音。

关于龟兹文化到底为中原文化注入了哪些要素，自有相关专家和兴趣爱好者去研究。龟兹的佛音盛况对于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应该是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文化跟经济的发达程度有直接关系。但事实上，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才越有实力的余力，去发展这些与温饱无关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最起码在西域诸国当中，龟兹很有可能是个实力突出的“大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汉、唐开拓西域的时代，龟兹可以说是塔里木盆地北线最大的国家。如果说楼兰是南疆的东部大国，那么北线的地缘政治中心就是龟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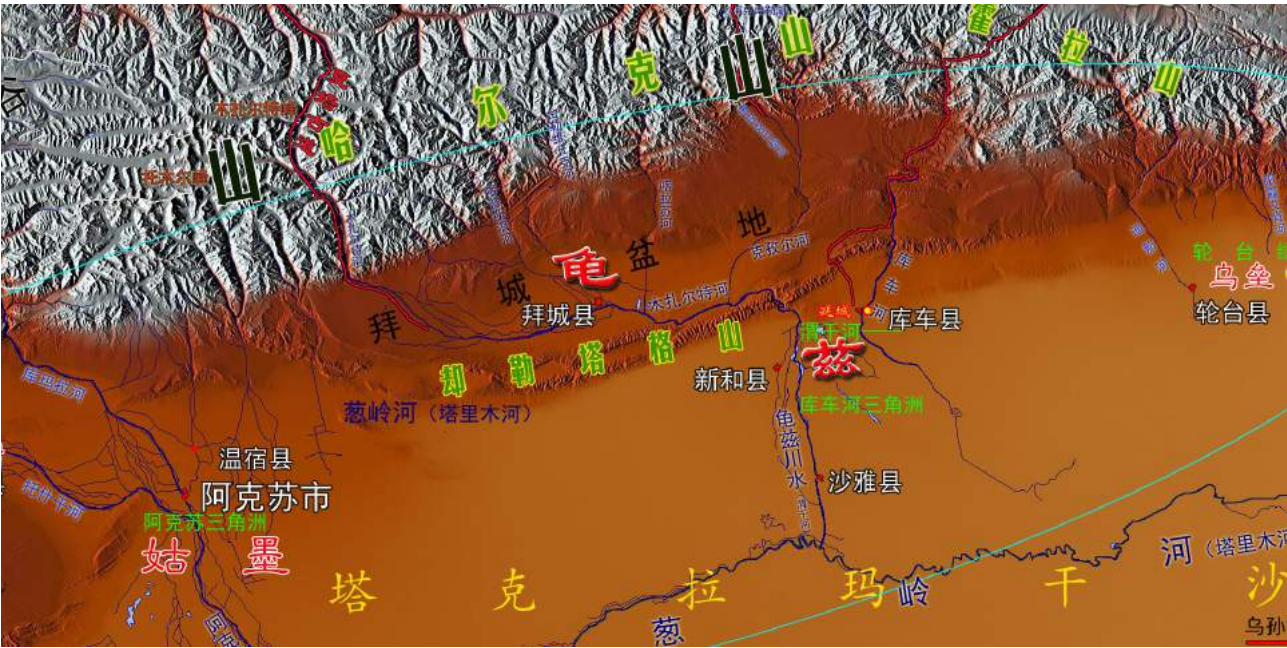
从现有的行政区划来看，龟兹故地的核心板块包括目前新疆的拜城、库车、新和、沙雅四县。之所以说是核心板块，是因为龟兹最为鼎盛的时期，统一了两侧包括乌垒在内的国家。所以，如果周边县市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旗下，也想从龟兹遗产中分一杯羹，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在汉帝国经营西域时，这种情况还未发生罢了。

依据“按河索国”的规律，我们应该顺着河流的脉络，来为龟兹故地寻找可能的绿洲了。相比在轮台故地进行同样的工作，在地图上为龟兹故地寻找河流的工作要容易得多。因为纵横于龟兹的河流，比之轮台九溪的水量更大，流域面积更广。以至于我们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中，都能够看到它们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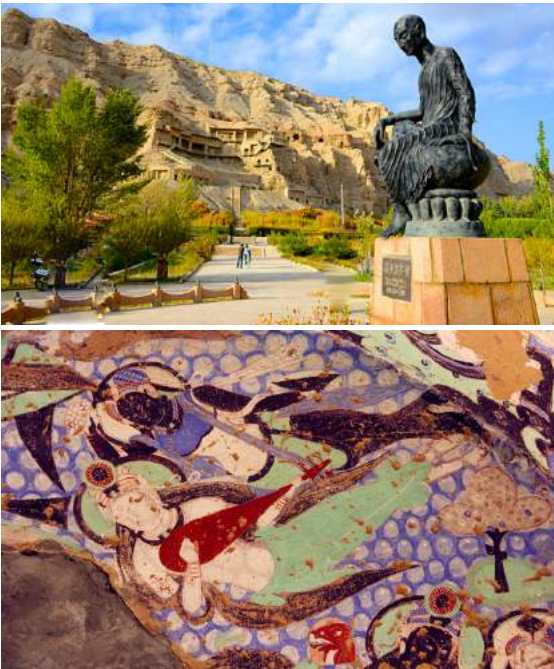
那些从天山主脉汇流而下的河流，并没有马上进入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地带，而是在一个盆地形的地理单元中，将收集到的天山雪水汇集到了一起。为这个狭长盆



地截水的，是一条海拔不过千米的细长弧形山地——却勒塔格（塔格既是山的意思）。我们前面提到的“克孜尔千佛洞”，就是依此山而建的。相比天山的体量海拔来说，像却勒塔格这种规模的山地，在一般的地形图上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不过对于地缘板块的划分来说，这种相对高度不过数百米的山地，却足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了。就现在的行政区划而言，覆盖盆地的行政区叫作“拜城县”，而这个盆地地区自然也就叫作“拜城盆地”了。



龟兹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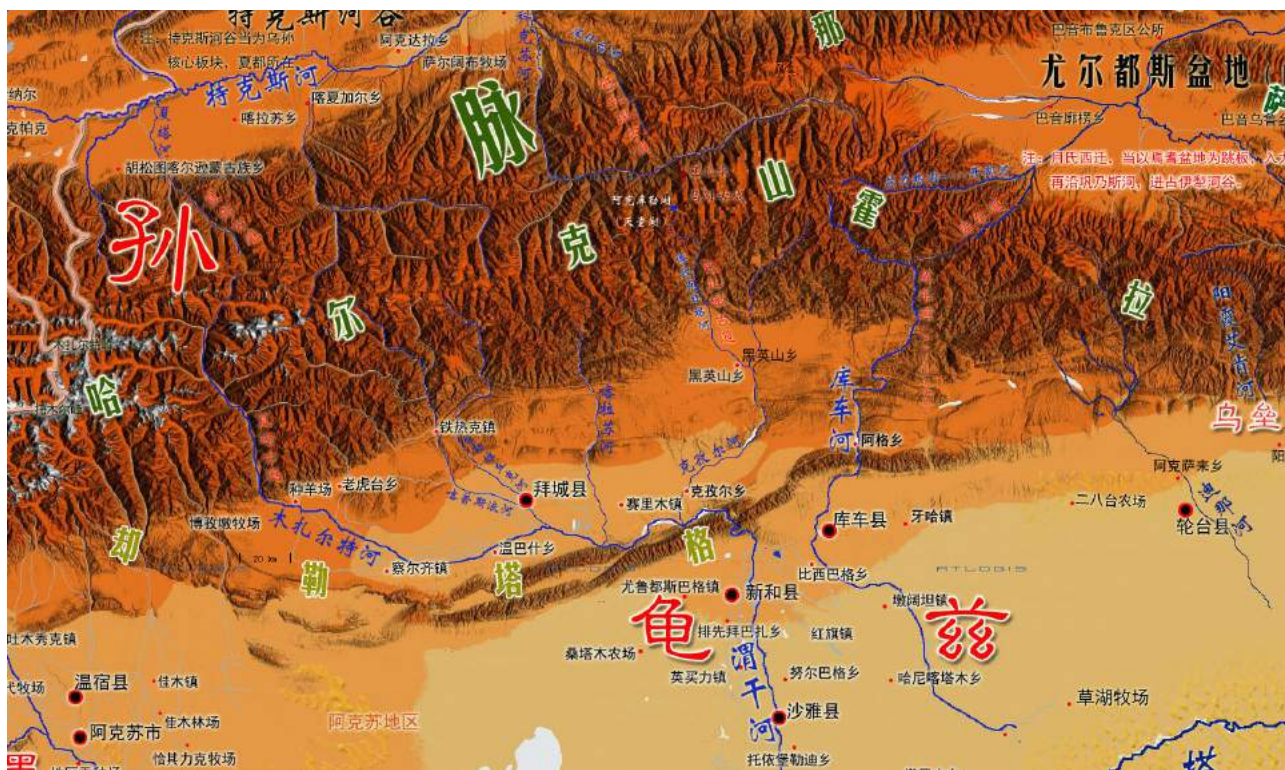
克孜尔千佛洞

一般情况下，每个盆地的腹地都会有一块由众多河流共同作用而成的平原地带。而这块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的平原，往往就是整个盆地区的地缘核心了。只不过由于地势的原因，这个地缘核心不一定就是在盆地的几何中心。就拜城盆地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它最据开发潜力的区域是在中西部。东部的地形则更为复杂些，海拔也更高些。用浪漫点的说法，也可以认为是河流与岁月，还没有把盆地东部的山地打磨出一片成规模的绿洲来。基于地势的原因，拜城县的县治和主要人口聚集地，都是在盆地的中西部腹地。在这里，有一条由西至东贯穿区域的河流，沿途收集了另外五条河流之水，共同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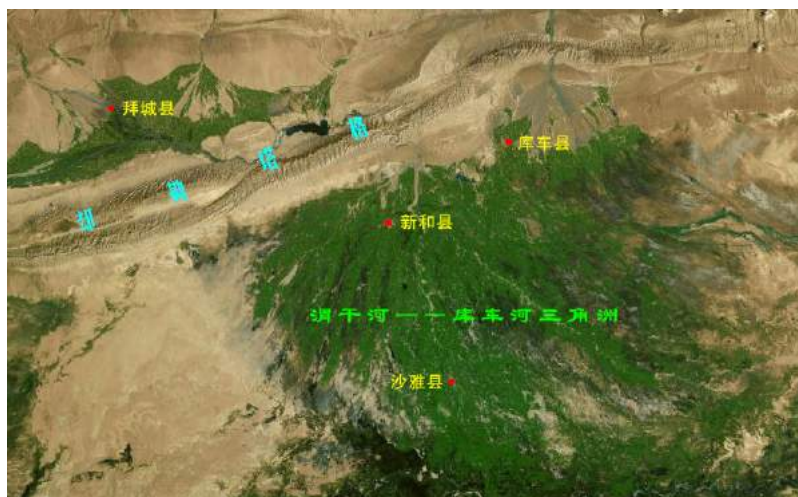


造出了一条河谷平原带。这条河流的名字叫做“木扎尔特河”。

毫无疑问，龟兹故地中流程最长的木扎尔特河，是对整个区域贡献最大的河流。它不仅在拜城盆地中，打造出了一条能够供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平原带。更在接纳最后一条支流——克孜勒河之后，很快就转而向南穿越却勒塔格，并在下游平原带漫流出了规模更大的绿洲来。只不过，合流克孜尔河之后的木扎尔特河，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渭干河”。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名字不熟悉，太容易忘记，也可以记一下它的古名——龟兹川水。



汉西域全图



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

很明显，所谓的木扎尔特河与龟兹川水，其实就是同一条河流。前者算是中上游，后者则是整个水系的下游。在东亚地区，我们一般会看到中下游地区的潜力优于上游地区。这是因为越往下游走，冲积平原的规模可能就越大。随之而增长的就是粮食产量和人口了。然而这种规律，在天山南北却不

一定适用。假如河流本身的流量有限,不足以在下游地区漫流出一片成规模的湿地来,它最受青睐的地点可能就是紧邻山地的山前平原了。不过,这种情况在龟兹水流域并没有发生,一则是木扎尔特河谷受地形限制,本身的纵深有限;二是那些从拜城盆地汇集而来的天山雪水,在却勒塔格以南漫流出了规模更大的绿洲“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来。而这片绿洲也正是龟兹国的崛起之地。

龟兹能够崛起,并在沙漠的边缘形成规模化的绿洲,却勒塔格的存在功不可没。它像一个漏斗一样,将东西纵深超过三百公里的天山集水区(南坡)所融化的雪水收集到了一起(年平均径流量,达到三十亿立方米),集中输送给了却勒塔格南麓的平原地带。不过,木扎尔特河——渭干河,并不是唯一为这片下游绿洲带作出贡献的河流。因为这个漏斗的下方并非只有一个孔洞。在渭干河东侧约三十公里处,还有一条河流在帮助导出拜城盆地东部之水,这条河流就是“库车河”。

从地理结构上看,库车河之所以未能在拜城盆地中就与木扎尔特河合流,主要是盆地东部地形相对复杂。山地阻碍使得库车河所收集到的雪水,在离渭干河还有一定距离时,就独觅得一条山谷,向南穿出却勒塔格了。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两条相隔不远的河流即使最终没有在下游交汇,它们各自所拓展的绿洲也很容易连成一片,并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形成提供的基础。

由于却勒塔格南部的绿洲带并非只由渭干河冲积而成,所以这片两条交汇而成的绿洲带,地理标签为“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当然,由于两河相距不远,在龟兹立国的年代,库车河可能也曾经汇入过当时的“龟兹川水”,并随之最终注入了塔里木河。不过,库车、渭干两河到底算不算同一水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下游地区能够无缝对接,共同打造一个统一的地理单元来。就像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就算在上古时期没有合流(现在在下游合流成了一段阿拉伯河),也能因下游绿洲相接而共同打造出了两河平原;而有山脉阻隔的湟水、大通河,虽然一直相接并共同汇入黄河,但湟水河谷与大通河谷,从来都是两个独立的地缘板块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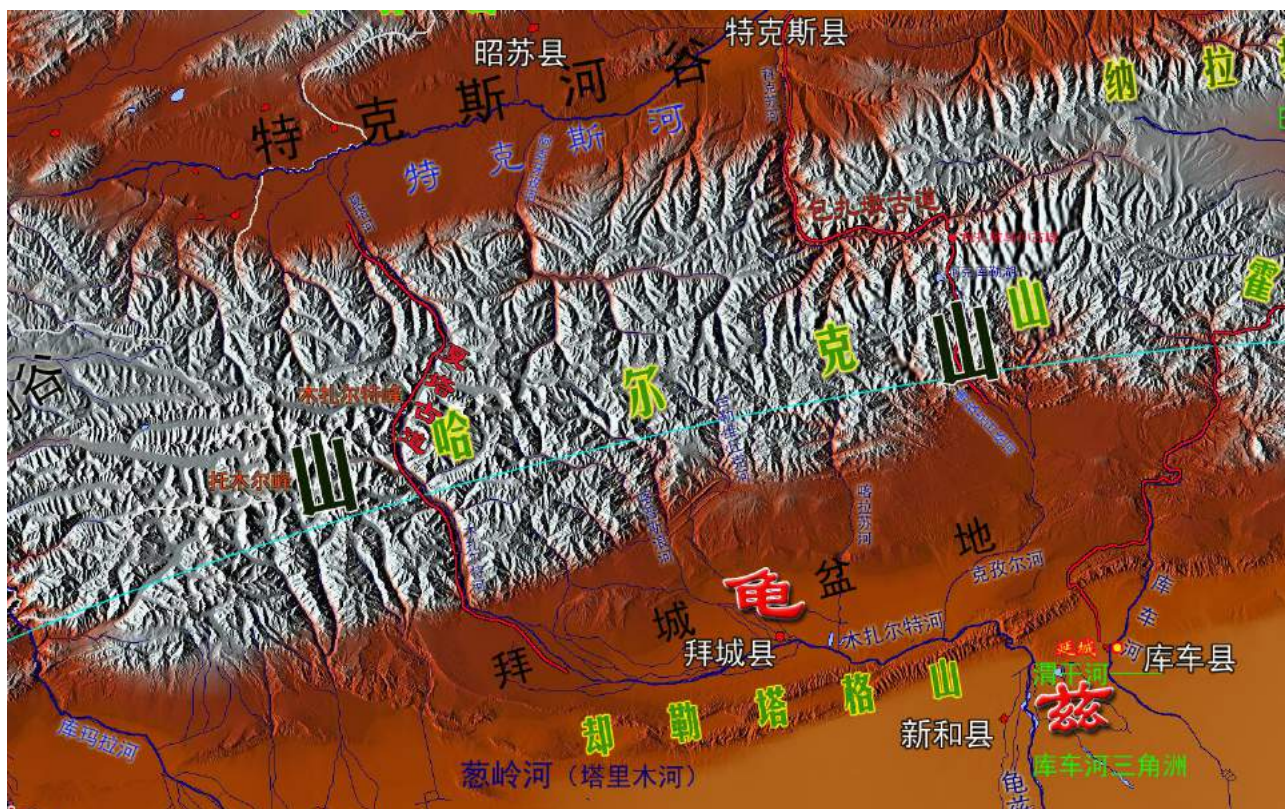
## 第二节 龟兹经夏塔古道沟通乌孙

对于龟兹人来说,尽管为其领地提供珍贵水资源的主要是渭干河流域。不过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更愿意把库车河视作母亲河。因为当日的龟兹王城——延城,就在库车河畔的“库车县”。如果说,整个渭干河——库车河流域曾经内部发生过部落博弈,并最终统一的话,最初的龟兹部落可能就是崛起于库车绿洲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了,因为在张骞和汉帝国到来之前,龟兹人已经完成这个进程,形成统一国家了。对于汉帝国来说,它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人口八万,壮丁两万的西域大国。



以绿洲面积、人口数量来说，龟兹东面的轮台（乌垒）显然与之不是一个层面的国家。如果没有汉帝国的直接保护，复国之后的乌垒是很容易被龟兹所吞并的。这种情况，在东汉之后也的确发生了。终汉一世，龟兹对于汉帝国的忠诚度也远没有那些小国高。这当中，匈奴对天山南麓的渗透固然是主要原因，龟兹在选择盟友上还有更多的选择也是一个原因。

在我们的印象中，西域似乎就只是匈奴和汉帝国之间博弈的战场，其他国家基本都是这盘棋局上的一颗棋子。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占据天山北路最为丰美草原的，并不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而是追杀大月氏至此的乌孙。单从地缘关系来说，如果没有匈奴在北方的压力，乌孙人会更有机会渗透天山南麓。如果乌孙想渗透天山南麓的话，从尤尔都斯盆地沿开都河而下进入焉耆盆地，然后再出铁门关的路径是一种选择。而另一种选择，就是从伊犁河谷的精华所在，也是乌孙核心部落最有可能直接经营的板块——特克斯河谷，直接向南穿越天山主脉，切入天山南麓的中段。而当乌孙人寻路下山之后，会发现他们已经处在龟兹所控制的拜城盆地了。



### 龟兹地缘结构图

连接乌孙和龟兹的这条孔道,叫作“夏塔古道”或者“乌孙古道”。无论叫哪个名字,其实都是从乌孙的角度来命名的。这也很自然,谁让龟兹的实力虽然可以在天山南麓称霸,但与乌孙相比又不在一个层级呢?基于对强者的重视,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商人来说,都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条帮助他们通往乌孙的道路。



相比“乌孙古道”之名，“夏塔古道”这个标签，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地理信息。因为“夏塔”本身也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一条自天山分水线起向北注入特克斯河的河流。也就是说，如果乌孙人想从伊犁河谷，或者说特克斯河谷，向南横穿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话。夏塔河能够帮助他们最大限度接近分水线。而在翻越分水线山口之后，接下来的旅程，就要指望天山南坡的河流了。这条帮助乌孙人对接塔里木盆的河流，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之前的内容中它才出现过。那就是“木扎尔特河”。

有了夏塔河——木扎尔特河通道的连接，乌孙与龟兹之间的直接沟通成为了可能。而这条古道的存在，也的确影响过历史。在汉帝国开始经营丝绸之路以后，作为对汉帝国渗透西域的反击，匈奴也开始转变方式，向塔里木盆地诸国抛出胡萝卜了（汉朝西拓之前，匈奴是不用这么客气的）。随着匈奴的渗透，汉帝国远征大宛之后在塔里木盆地所树立的影响力，也出现了弱化的迹象。在一系列战术博弈中，匈奴最为得意的一次操作，是在公元前 92 年楼兰王归天之时，抢先一步将留在匈奴的楼兰质子送回去继承王位。这直接导致楼兰在政治上倒向匈奴，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攻杀汉朝与大宛等国来往的使节，以截断丝绸之路。

作为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路，楼兰的这种转变不可能不影响到龟兹的外交取向。事实上，作为塔里木盆地东、北两线最大的国家，楼兰和龟兹也是匈奴重点经营的对象。在匈奴政治勾连楼兰、龟兹的过程中，出使两国的使者，一般是由天山北路切入焉耆盆地，然后先顺孔雀河而下至楼兰。然后再折转回去，溯孔雀河——葱岭河而上至龟兹。之所以将楼兰排在前面，是因为在龟兹之后，匈奴使者还可以顺势从夏塔古道北上，去联络与乌孙的感情。而在出使乌孙之后，就可以北出伊犁河谷，回到匈奴控制区了。

匈奴人遵循这样的路径来联络楼兰、龟兹、乌孙三国，可以说是最为省时省力的。而这三国如果都成为匈奴忠实盟友的话，汉帝国在西域会陷入什么境地，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在公元前 78 年，汉帝国决定派使出使大宛，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北线。此时为汉朝开拓西域的张骞，早已在四十年前作古。再通丝绸之路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叫作傅介子的外交家。

尽管在傅介子之前，已经有数位使者被楼兰所袭杀。不过出色的外交家自有技巧来保护自己。当傅介子向楼兰王表明，自己的背后是即将出征楼兰的汉朝大军时，那位匈奴扶植起来的楼兰王，便识时务的表示愿意认罪并重新倒向汉帝国了。对于帝国使者来说，当然并不会简单相信楼兰的承诺，不过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来帮助楼兰王和那些反叛者下定决心。因为在傅介子到达楼兰之前，匈奴使者刚刚离去，准备按照我们之前所划定的路线出使龟兹、乌孙。

如果汉使在西域受到礼遇，而匈奴使者被杀的话，龟兹、楼兰两国再想向匈奴自辩清白的话，就要花费许多口舌了。只不过当傅介子追至龟兹时，匈奴使者已经通过夏塔古道前往匈奴了。而在傅介子表明大军将至的情况下，龟兹王也像楼兰王

一样，再一次向汉帝国表明了忠心（在此之前，龟兹甚至袭杀了汉朝在轮台屯田的校尉）。对于必须在匈奴、汉朝之间摇摆的龟兹来说，这其实只能算是权宜之计了。谁也不敢保证当匈奴的大棒挥过来的时候，龟兹人会不会又一次转身投向匈奴阵营。

不过历史也同样给了龟兹王一个证明的机会，在傅介子出使大宛结束，原道返回至龟兹时，匈奴使者也并没有从准噶尔盆地回国，而是同样选择了原道返回，并行至龟兹。也许这位匈奴使者想再一次视察一下这些盟友，但这次路线的选择却给他和其随从带来了杀身之祸。在从龟兹王那里得到匈奴使者先至的消息后，傅介子和他的随从们便对匈奴人的营地发动了一次奇袭，将之一网打尽。

对于傅介子来说，这一次出使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不仅成功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大宛，让楼兰、龟兹两国重新站队，更额外斩获了和他抱有相似使命的匈奴使者。不过，对于傅介子和执政者来说，心里都很清楚，匈奴人并不会就此放弃与龟兹、楼兰结盟。而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两国完成政权更迭，以期扶植起亲汉的王室来。

最先被傅介子选中的刺杀对象是龟兹王。选定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上一次出使过程中，龟兹王并没有在汉使面前保持防范心，而是与之近距离交谈（相反，楼兰王就比较警惕了）。不过鉴于楼兰与河西走廊更近，不论得手与否，都更有利于回撤。因此倒霉的楼兰王，还是在公元前 77 年成为了牺牲品。关于这次传奇的刺杀，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

不得不说，当时为汉帝国开拓西域的外交家，在胆识方面决不逊色于大航海时代那些欧洲探险家。楼兰王被刺之后，汉朝及时扶植起了之前在汉朝的质子为新任楼兰王（之前也说过，陷于两难境地的楼兰曾经分别将二子送往匈奴、汉朝为质）。而为了避免再一次成为汉匈博弈的牺牲品，新的楼兰王也识时务的南迁至车尔臣河流域，并更名为“鄯善”。

相信对于希望在这里看到传奇故事的朋友，对上述内容应当相当满意了。只是要是将这段历史改编为剧本的话，却又有些缺憾。毕竟“拳头 + 枕头”的套路才更吸引眼球。不过真要想在龟兹的故事时加一点香艳的成分，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因为在傅介子在楼兰发动政变之后不久，龟兹也完成了政权更迭。新任的龟兹王一方面为了联盟乌孙，另一方面也为了示好汉朝，迎娶了乌孙王之女。之所以会把乌、龟两国的这次联姻视为示好汉帝国之举，是因为这位王女的母亲，就是继细君公主之后（详见乌孙部分），第二位和亲乌孙的公主——解忧公主。而在此之后，龟兹也的确与汉帝国进入了一段蜜月期（一定要编剧本的话，可以把龟兹王子与乌孙公主故事开始，提前一点至傅介子出使时）。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上述内容固然可以满足大家对传奇故事的好奇。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更多是在用历史来帮助大家理解龟兹国的地缘位置。对于龟兹来说，能够北通乌孙是它的一个额外地缘优势。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龟兹能

够控制拜城盆地。让龟兹川水全流域的处于同一政权控制下。至于说在天山南麓，是不是只有龟兹拥有北通乌孙的捷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龟兹经包扎墩古道沟通乌孙

有朋友说了，被称之为“乌孙古道”的道路，并不只有“夏塔古道”一条。的确如此，理论上一端能够连接乌孙的道路，都可以称之为乌孙古道。鉴于乌孙在天山腹地及北麓那庞大的领土面积，这些道路的数量并不会太少。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那些连接中亚国家的道路，并没有成为国内研究者的目标。被户外旅行者所考据出来的，争夺“乌孙古道”名头的，仅仅是国内的一些道路罢了。至于这些道路对乌孙人的政治和生活分别起了多大作用，更多的只能是推断了。一般情况下，一道古道的追捧者（特别是当地政府），都喜欢将自己境内的古道和那些重大历史事件挂钩，以此来提升当地的旅游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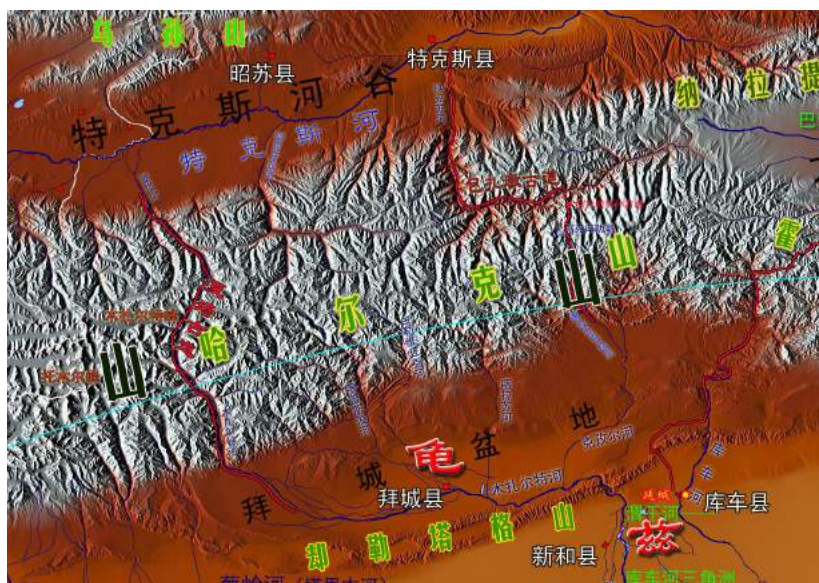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穿越天山入境乌孙的玄奘、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等，就“被迫”在不同地点一趟趟的穿行于天山了。鉴于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并不会提供准确的信息，所以这种争抢名人的行动也不会真的有结果。至于我们，倒不必有这个包袱一定要加入这场争论。对于从战略的视角解读的我们来说，知晓当中的地缘规律才是最重要的。就在山地中找寻道路这件事来说，有三个大原则可供大家参考：一是每两个相邻的地缘板块，都会有相应的道路相连通。我们一直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哪怕像蜀道如此艰难，都能够被开拓出来；二是绝大部分的道路，都要利用现有的谷地。由于谷地的地势原因，这些谷地通常又会是河流通过的“河谷”。最好的选择，是在分水岭两侧找到源头相近的两条河流，以尽可能的沿天然河谷穿行，缩短在分水线上的行程。

这些原则，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其实都已经写到过了，现在只不过是做一个总结。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并不能像户外徒步旅行者那样去亲身考察可能的道路（那些可以从周边居民那里收集信息）。但如果有河流显示清晰的高清地形图，这项工作也可以在电脑前完成前期的推定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做的图多是高精地形图做底图的原因。希望能够在地图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好了，回归正题。不管有多少道路去争夺乌孙古道之名。我们现在所展示的只是那些穿越天山主脉，将乌孙与天山南麓相连的道路。依照我们刚才所定立的原则，那条曾经被乌孙、龟兹所使用过的“夏塔古道”，就是一条通过“夏塔河”、“木扎尔特河”沟通伊犁河谷的精华部分——特克斯河谷与天山南麓的拜城盆地的通道。

很显然，仅从此段天山的高度以及南北纵深来说，夏塔古道就不是一条常人能够翻越的道路。即使在技术发达的今天，执政者也没有尝试沿这条古道开辟一条公路。也正因为这样原生态的环境，它成为了户外旅行者所热衷探险的一条道路。现在的





龟兹地缘结构图

问题是，以拜城盆地东西纵深三百公里的距离来说，夏塔古道是不是唯一被使用过的道路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拜城盆地的中东部，还有一条古道连通特克斯河谷的中部。这条古道目前被户外旅行者们命名为“包扎墩古道”。

与夏塔的命名原则不同。“包扎墩”并不是一条河流之名，而是分水线高点的名称。在西域，这

样高点通常被命名为“达坂”。支撑这条道路曾经存在的证据主要有二：一是分水线附近的一片高山牧场，直到今天仍然有哈萨克牧民（他们是最有资格继承乌孙文化遗产的民族）在此越冬；另外就是包扎墩一带据称被发现有乌孙人建立的军事据点。

为包扎墩古道玩接龙游戏的两条河流，北部汇入特克斯河的那条叫做“科克苏河”；南部那条则是最后也与木扎尔特河合流，成为龟兹川水的克孜尔河（具体是克孜尔河上源之一的“博孜克日格河”）。至于说到底夏塔古道还是包扎墩古道是当年乌孙连接天山南麓的主线路，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了。它们谁能获得玄奘、细君公主这些名人资源，更多取决于今日的地缘博弈。因为今天的特克斯峡谷在行政上是被一分为二，分别为西部的昭苏县、东部的特克斯县所辖。而夏塔河、科克苏河所指向的，也分别是这两个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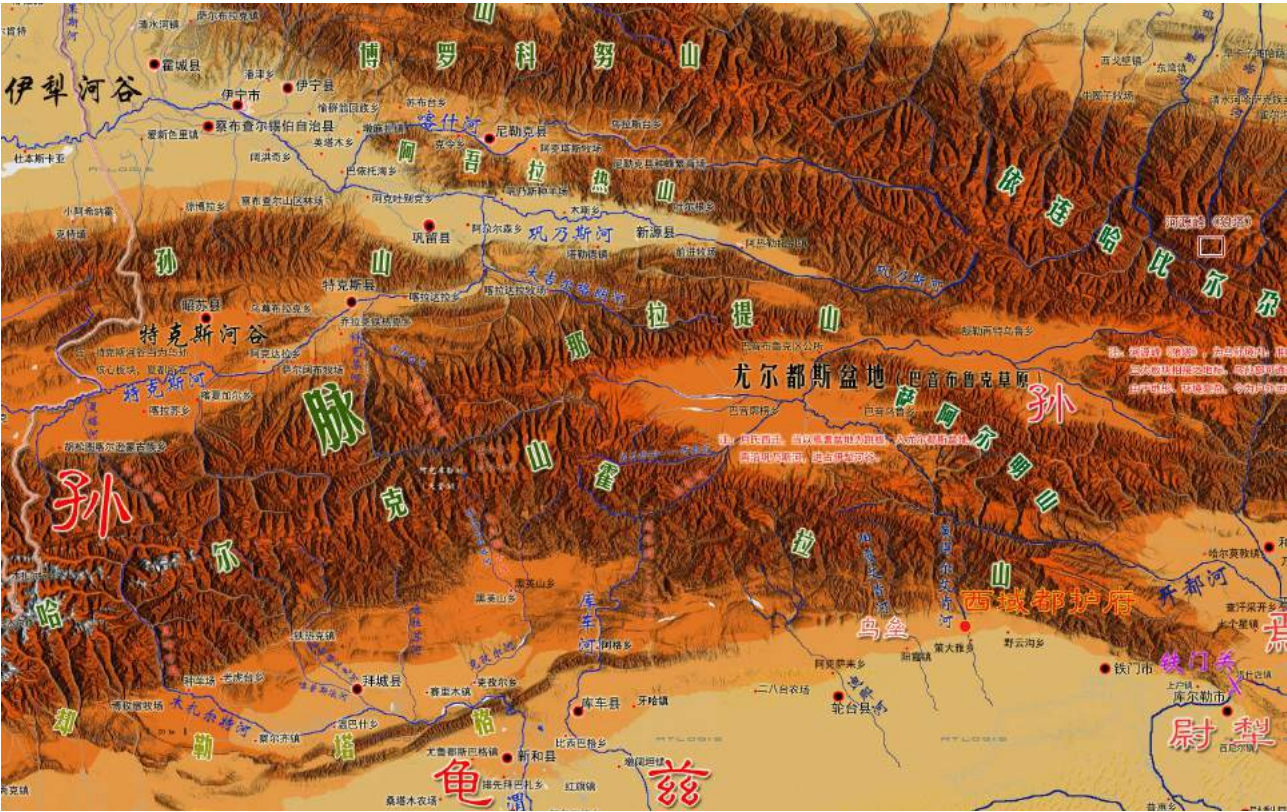
#### 第四节 龟兹经库车河谷至乌孙的通道

在我们分析乌孙之时，特克斯河谷曾被认定为是乌孙的核心之地。由于伊塞克湖盆之南的“赤谷城”，是有历史明确记载的乌孙都城所在。因此特克斯河谷也被研究者认为，是乌孙王室贵族夏季牧场所在。由此，也出现了所谓乌孙“夏都”的争夺。从技术上看，如果乌孙夏都最终被确认在了昭苏县，那么夏塔古道可能就被顺其自然的被认定成为乌孙通南疆的主干道（也就在争夺那些名人资源的博弈中占得先机了）；反过来，如果特克斯县成了夏都所在，那些包扎墩古道就会显得更重要了。说起来，古道之南倒是清静了许多，反正两个出口都在拜城县。

不过拜城和渭干河流域也并非完全能够垄断乌孙——龟兹古道的文化遗产。因为事实上，还有一条由库车出发，经由库车河的道路从龟兹方向指向乌孙。只不过



从这条道路进入乌孙，并非直接接入乌孙核心的特克斯峡谷罢了。由于特克斯峡谷之南是天山主脉所在，无论夏塔古道还是包扎墩古道，穿越起来都十分困难。如果只是用作通信一类的事情，倒不失为两条快速通道。但要是支撑一条商贸线或者战略补给线的话，就相当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天山腹地有一个高山盆地以为中继的话，穿越山脉的困难就要降低许多了。事实上，特克斯峡谷、伊塞克湖盆本身也在起这样的作用，为进入图兰低地的旅人提供战略补给。



汉西域全图

横亘于拜城盆地和特克斯河谷两块低地之间的这段天山主脉，又可单独称之为“哈尔克山”。我们很容易发现，结构紧密的哈尔克山腹地并不存在这样的高山盆地。不过当我们把视线稍微向东偏一点，就会发现一块我们曾经分析过的高山盆地——尤尔都斯盆地。作为开都河的集水区，尤尔都斯盆地腹地拥有非常充足的水资源。这也使得它有另一个让人神往的地理标签——巴音布鲁克草原。

如果从拜城盆地出发，不是将目的地直接定位为特克斯河谷，那当年从龟兹方向出发的商旅、军队，完全可以从沿着盆地的东部边缘，翻越哈尔克山东南方向的“霍拉山”进入尤尔都斯盆地。仅从纵深来看，我们也能感觉出，穿越霍拉山的难度要小于哈尔克山。更为重要的是，尤尔都斯盆地本身的面积足够大。当你欣赏完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美景，并接受沿途部落的补给之后，很容易就能够把盆地北部那条狭长的纳拉提山甩在后面，进入伊犁河谷的东端。



既然霍拉山实际上是尤尔都斯盆地的边缘山地，那么想进入这片美丽的草原，就需要找一条发源于霍拉山，并最终流入拜城盆地以及南部三角洲地带的河流，帮忙标定道路了。这条河流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就是库车河。这条发源于霍拉山西南麓的河流，并没有进入拜城盆地腹地与木扎尔特河流域合流，而是沿着东部边缘流淌，并独立穿透“却勒塔格”造就了库车绿洲。这种地理结构也直接影响了今天的行政区划。因为库车河的存在，却勒塔格东部的这个角并没有归入拜城县，而是成为了库车县的一部分。



独库公路

要是库车人说，当年两位公主是经由自己境内进入伊犁的，他们可能会更有底气。因为比起夏塔古道、包扎墩古道来说，这条道路虽然绕远，但通行难度相对要低一些。以至于红色中国在选择穿越天山，直接连接南北疆的道路时，选择了这条路线。由于道路的另一头，又穿越了一次天山进入了准噶尔盆地南沿的“独山子”（目前为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区），所以这条乌孙古道今天的名字，也叫“独库公路”。在国道序列里，它又被称之为 217 国道。

现在的情况比较清楚了。如果龟兹人想直接进到特克斯河谷去觐见乌孙上层人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夏塔古道或者包尔墩古道。而如果是需要在大量人力、物力上流通的话，那么尤尔都斯盆地会是一个不错的中转站。也就是说，二千多年前的龟兹人，最起码应该有三条道路与乌孙相连。当然，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三条道路呢？谁也不敢肯定。按照我们之前所分析的，寻找道路的地缘规律来看，夏塔河与科克苏河之间的“阿克牙孜河”也同样有机会将乌孙人带到哈尔克山分水岭。而在山那边，木扎尔特河流域的喀普斯浪河、台勒维丘克河，都有机会完成这个接应任务。也许有一天，某位户外旅行者走通了这条道路，甚至在沿途发现了历史遗迹。就又会增添一条“乌孙古道”了。

乌孙古道在一个区域里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板块与



板块之间的地缘关系，道路只是作为当中联系纽带存在的。道路越艰险，双方发生地缘矛盾的几率也就越小，越能互相保持独立。不过从乌孙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核心之地并不止于伊犁河谷。对于他们来说，领地内还有一个重要性与伊犁河谷不相上下的高山盆地，那就是伊塞克湖地区。那么伊塞克湖地区对应的天山南麓绿洲是不是龟兹之地，两个板块之间的沟通又主要通过什么路径呢？

## 第四章 阿克苏绿洲分布的西域国家

### 第一节 阿克苏河上游优越的集水条件

离开龟兹川水所孕育的那片绿洲之后，最让张骞期待的，无疑是下一个农业绿洲的出现。尽管对于希望快速摆脱匈奴势力范围的他来说，并没有时间去和这些绿洲国家正式沟通，但记录下这些绿洲的存在，将会是帝国开拓西域的第一步。也将让后来在此进程的外交活动有的放矢。在张骞的期待中出现的另一片绿洲位于塔里木河之北，这片绿洲叫作“阿克苏绿洲”，滋养这片绿洲的河流则是“阿克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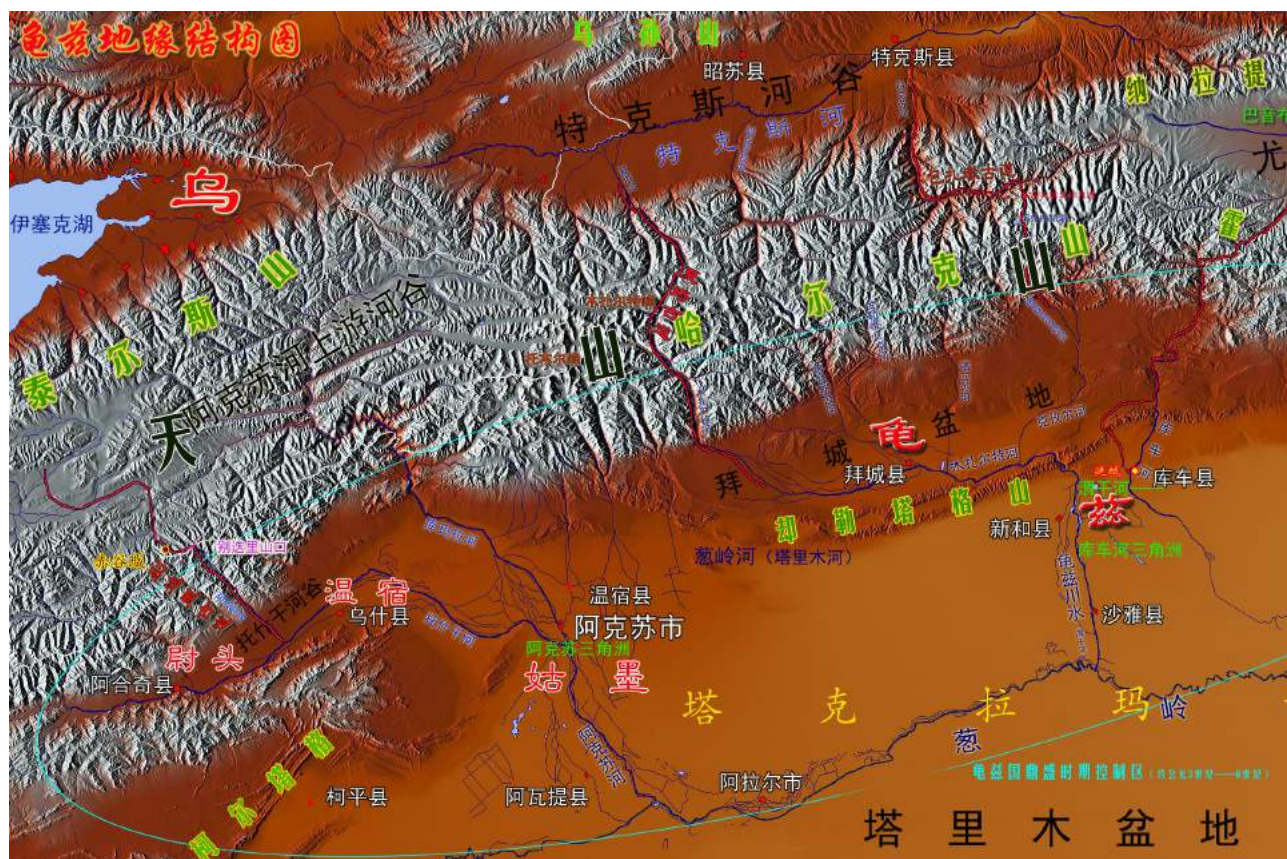
“阿克苏河”的名字，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中。不过，上一次我们说到阿克苏河时，它还是处在七河地区的东部，从阿拉套山北坡流向巴尔喀什湖。当然，这肯定不是说阿克苏河会“乾坤大挪移”了。只不过是在西域这片土地上，重名的地缘标签太多罢了。这些重复使用的标签，也对一些研究者造成了困惑。以至于他们经常不得不用尽各种方法，将一些历史事件指向一些错误的地点。好在我们的帖子，就是用来破解这些迷雾的。

从今天的行政区域来说，七河地区的阿克苏河是完全由哈萨克斯坦所领有；而流向塔里木河的阿克苏河流域，则分别由吉尔吉斯斯坦（上游）、中国所享有。如果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视为一体，或者说中亚游牧体系的继承者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两条阿克苏河流域的行政切割，也和两千多年前如出一辙。只是哈、吉两国被乌孙所替代罢了。至于我们现在所解读的这条阿克苏河，其在塔里木盆地的低地区，在两千多年前则分别被尉头、温宿、姑墨所据有。按照现在通行的历史领土概念，这些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后来都是西域都护府的管辖范围，自然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原始的地理结构来看看，这片土地的潜力究竟如何。在后面的行文中，如果不特别提醒，“阿克苏河”这个标签所指向的，就是今天流过阿克苏市的那条河流了。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决定每一条河流流量、绿洲大小的关键，在于它所依靠山地的高度和纵深。轮台绿洲之所以潜力较小，根本原因在于它所依靠的那片天山山脉，腹地中出现了一片大体量的高山盆地——尤尔都斯盆地。而这个集水区所收集的淡水，最终并没有向南流向轮台地区，而是向东南方向通过开都河——孔雀河，带旺了焉耆、尉犁、楼兰等国家。真正能为轮台（乌垒国）所用的，只是霍拉山南坡当中最“薄”的那一段罢了。

相比之下，阿克苏河就要幸运得多。尽管在它上游集水区所对应的区域，有一个体量比尤尔都斯盆地更大的高山盆地区——伊塞克湖盆。但这个湖盆实际上是位于天山主脉分水线的北侧。也就是说，伊塞克湖盆所截流掉的天山雪水，本来是应

该补给楚河等北坡河流的。至于分水线的南面，天山山脉留给阿克苏河的集水区，南北纵深甚至要比为渭干河集水的“哈尔克山”更深。



阿克苏河流域图

阿克苏河流域比之渭干河——库车河流域，更为优越的上游集水条件，也反映在了流域的水资源保有量上。其年平均径流量相当于渭干河——库车河流域的两倍，约在 70 亿立方米左右。作为天山南坡径流量最大的河流，也是目前唯一常年有水注入塔里木河的河流。其注入塔里木河的水量，占了四条源头（另三条为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的 70%。不过，这并不代表阿克苏河的流量，就要两倍于其他河流。更多的是因为它与塔里木河的距离更近，中途因自然、开发原因损失的水量更少罢了。

虽然阿克苏河所依靠的山地，为下流收集的雪水要比渭干河——库车河流域更多，但就今天的情况来说，二者的人口保有量都在百万出头（阿克苏河流域略多一些）。并且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经营渭干河——库车河绿洲的龟兹国，实力反而要强出许多。八万人口，已经能够让龟兹坐稳西域（仅指塔里木盆地部分）大国的位置了。而阿克苏流域中人口最多的姑墨国，人口约在两万四千人。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型国家。即使加上流域内的温宿（人口八千四）、尉头（人口两千四）两国，总人口也不及龟兹的一半。

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可能是龟兹绿洲开发的时间要更早些。对于早期迁徙至



塔里木盆地的人类来说，并不一定会选择最大规模的湿地进行开发。因为河流的流量越大，洪水所造成的威胁也就越大。在依靠雪水周期性补给的天山南麓，融雪洪水所造成的破坏力，并不亚于我们在长江下游所经常见到的洪水。在这种情况下，流量适中且相对独立的库车绿洲，将会更有机会先形成稳定的农业绿洲。当龟兹人将整个渭干河——库车河流域连成一片后，这种先发优势将使得龟兹国在人口保有量上面，获得明显的比较优势。

我们也可以通过汉帝国扩张至西域后，阿克苏河、渭干河——库车河两流域的地缘结构对比，来透视一下龟兹的这种先发优势。在张骞引领帝国经略西域之时，整个渭干河——库车河流域都属于龟兹国领土。虽然没有相关历史记录佐证，但根据地缘规律，龟兹人在此之前也一定经历过一个整合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汉帝国能够更早渗透西域的话，张骞在那里也许就能见到几个国家了。

反观阿克苏河流域，这种内部整合工作却还没有完成。或者说在汉帝国开辟丝绸之路时，下游的姑墨国还没有吞并在它上游的温宿、尉头两国。这种地缘分割的状态，也势必影响了整个阿克苏河流域整体的地缘实力（分裂意味着消耗）。至于说这种分裂状态会不会随着汉帝国的到来而结束，这三个国家在阿克苏河流域又分别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 第二节 阿克苏绿洲三国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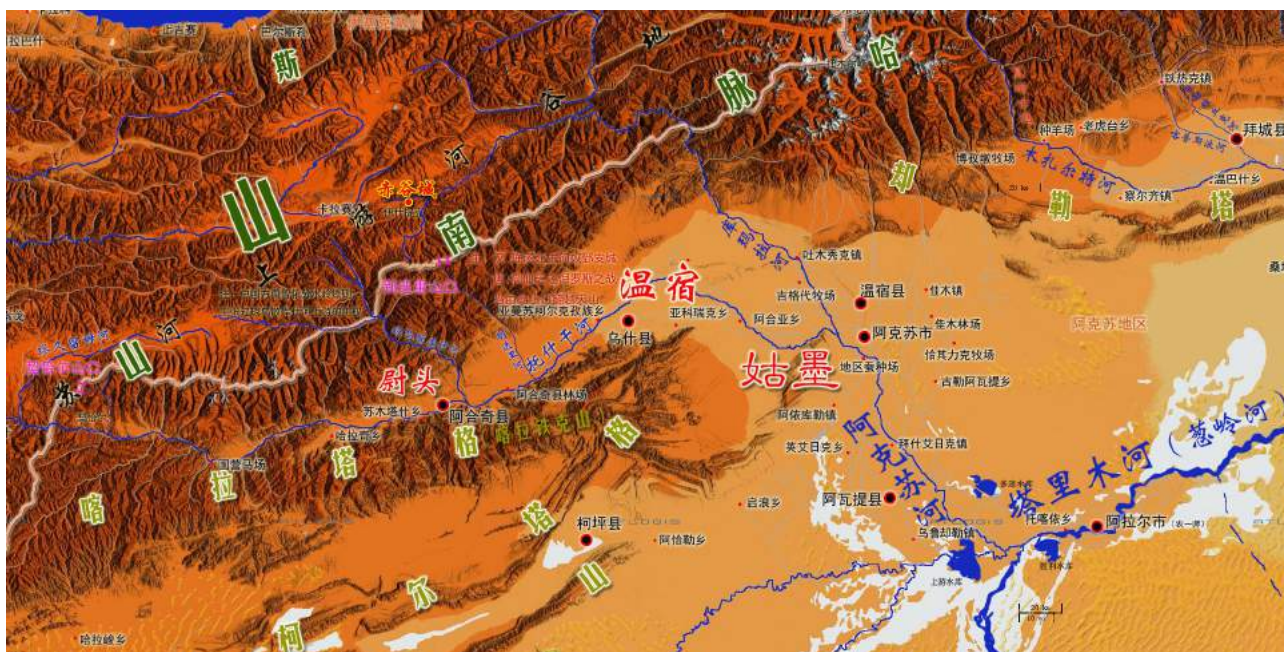
如果说“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是由西侧的渭干河和东侧的库车河共同打造出来的话，那么阿克苏三角洲也同样是由两条河流：西侧的托什干河和东侧的库玛拉河合力冲积而成的。只不过渭干河、库车河最终差之毫厘没有合流，而托什干河、库玛拉河最终则合流成为了“阿克苏河”。并在打造出阿克苏三角洲后，汇入了塔里木河。

一般情况下，两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带总是有机会形成最大规模的绿洲的。而处在丝绸之路主干线上，更能为这些三角洲的地缘潜力加分。在龟兹坐大于库车绿洲时，阿克苏三角洲的主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姑墨”国。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也就是现在阿克苏地区行署所在的“阿克苏市”，以及它旁边的温宿县。然而二千多年前的温宿国，却并不在今日的温宿县，而是它西侧的乌什县。

“温宿”这个地缘标签的张冠李戴，很可能源于命名者当时的认知。即 19 世纪末的清朝官员可能认为二千多年前的温宿国，应该位于阿克苏三角洲的北部。这样的话，这个人口不过万的农业国，所指向的绿洲就应该主要是由库玛拉河滋养而成的了。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乌什县所处的地理单元，指向的是托什干河谷的东部。我们这里所说的托什干河谷，并非东到托什干河与阿克苏河的相交点，而是指它的中

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天山主脉向外延伸了一段山体——“喀拉铁克山”。喀拉铁克山以北的河谷地带，即是我们所指的“托什干河谷”。单从地理结构上看，托什干河之于阿克苏河的位置，很像木扎尔特河之于渭干河。只不过，后者因却勒塔格的存在，处在了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盆地中；而喀拉铁克山看起来就要大方得多，托什干河谷下游地区的范围足够开阔。而今日乌什县城所在的位置，也就是在托什干河河谷的谷口。



汉西域全图

如果没有汉帝国的到来，更具优势的姑墨国可能很快就能吞并温宿国，并渗透进托什干河谷了。就像龟兹人以库车绿洲为起点，最终渗透进拜城盆地一样。然而在汉帝国到来之后，西域小国之间这种兼并、重组行为，很大程度被中止了。对于远道而来的帝国来说，分而治之永远是最好的间接统治方法。为了便于管理，像车师这样位置敏感的东疆大国，甚至被一拆而四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龟兹所吞并姑墨，还是姑墨想吃掉温宿，都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真正让姑墨看到扩张机会的战略窗口，出现在王莽上台执政之时。众所周知的是，汉帝国实际上分为东、西两段。而东、西汉的分割线，就是王莽篡政建立短暂的“新朝”时期。帝国内部的这次分裂，也让远在西域的姑墨国看到了“原住民自治”的机会。很快，苦命的温宿国就成了姑墨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墨也没有笑到最后。当东汉王朝也灭亡之后，陷于内战的中央之国再无力在西域经营丝绸之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姑墨也很快成为了龟兹的一部分。

现在看起来，姑墨国与温宿国的地理位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者所占据的是阿克苏三角洲，以及上游的库玛拉中下游地区；后者则是托什干河谷的主人呢？答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图



柯尔克孜族

案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托什干河谷的西部，还是一个人口虽少，却位置重要的游牧“国家”（部落）——尉头。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个国家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那么尉头到底有什么样的地缘价值呢？

温宿人并没有控制全部的托什干河谷，就像姑墨没有得到全部的阿克苏河流域绿洲一样。与这两个农业绿洲国有所不同的是，位于河谷西端的尉头国是一个游牧部落。按照汉帝国给这类国家的定性，尉头属于“行国”。在汉书的记录中，尉头国的风俗、穿着与乌孙类似。其实对于中央之国甚至有志于统一草原的雄主来说，这些住在毡房里、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本来都是属于一类人，并不需要刻意去区别他们。不过就尉头人的族属来说，他们的确应该和在天山放牧的乌孙人有着亲缘关系。

这一点，从今天尉头故地所在的“阿合奇县”的地缘属性也可以看出。这个从流域属性上应该归属阿克苏地区管辖的县级行政区，实际上却是作为西侧“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东部的一个县，存在于我们的行政版图上。而决定这一行政归属的，正是它千年未变的原始地缘属性。在中国所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划分中，柯尔克孜族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民族，而是一个因政治分割，不得不生活在国境线

两端的跨境民族。他们的境外亲戚，就是现在占据伊塞克湖盆地的吉尔吉斯人。如果用“吉尔吉斯人”来代指这个民族，也是可以的（柯尔克孜人来源于他们的自称）。不过这样可能会让政治家们有些地缘政治层面的忧虑，就像有类似情况的云南傣族，现在被改称之为“傣族”一样。

其实不是政治家的我们也不必纠结于这些跨境民族的定性，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地缘政治安全。所谓民族，本来就是因分割处于不同地缘板块，而逐渐形成的有独立文化属性的群体。从这个角度说，假以时日，这些因各种原因处于不同板块的族群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也是一种趋势。好在今天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族，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晓他们与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关系，并为我们推定二千多年前该地区的地缘属性提供有益的参考。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年的尉头人，就是乌孙人渗透而来所形成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尉头人是迁移到此的一支塞人。而当乌孙人鸠占鹊巢的成为天山草原之主后，这些进入天山南麓放牧的塞人部落，也就被认定为与乌孙同俗了。

塞人和今日柯尔克孜人的这种迁徙，在游牧民族看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扩张边界并不是后来地缘政治家们所习惯使用的山脉分水岭。草原的尽头才是游牧民族可能止步的地缘分割线。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将阿尔泰山南麓稳定为自己的直接控制区；以及天山北麓的游牧民族渗透到南麓山地草原，都是符合地缘规律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从最原始的地理结构来探究一下，这种地缘联系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完成的。

### 第三节 阿克苏绿洲经别迭里山口进入中亚

从大的地理关系来看，无论我们是沿着库玛拉河南北方向行走；还是由东至西沿托什干河向上游地区进发，最终都会碰到天山主脉的分水线。而翻越这条分水线之后，河流将转而向西、向北，或经由纳伦河注入费尔干纳盆地，成为锡尔河之水的一部分；或向北流入伊塞克湖盆，成为伊塞克湖的支流。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克苏河的这两大支流，应该都有更细的分支来对接天山分水线以北的锡尔河、伊塞克湖流域。

由于当代政治分割的原因，那些热衷于为伊犁河谷——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寻找古道的户外旅行者，暂时并没有机会去亲身探寻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纳伦河上游谷地、伊塞克湖盆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到底有多少曾经使用过的古道。仅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为阿克苏中、下游地区提供进入天山腹地孔道的任务，主要是由托什干河上游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尉头国和今日的阿合奇县，控制着通往乌孙、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口。

这些山口中最为重要的，是阿合奇县与乌什县之间的“别迭里山口”了。通向这个山口的河流，是托什干河左岸支流“别迭里河”。这条河流目前也是阿合奇县与乌什县的行政分割线。在二千多年前，它很可能也是尉头国与温宿国领土的分界线。当然，就国家、民族属性来说，真正能够做到控制山口的应该还是游牧属性的尉头人。

别迭里河并非唯一指引我们通往天山腹地的河流，如果我们顺着托什干河一路向西，到达阿合奇县的西部边界时，还会发现一个叫作“契恰尔”的山口帮助我们

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就是说，即使别迭里山口被东部那些绿洲国家强行控制，尉头人也同样能够和他们在天山腹地的亲缘部族保持联络。

后来吞并温宿的姑墨，以及并吞姑墨的龟兹，有没有将实际控制线推进到别迭里河，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东汉时期，帝国的军事家却的确将自己在天山南麓防线的终点，定位在了别迭里山口。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在别迭里山口看到汉军当年留下的烽燧。从这个角度说，别迭里山口也可以看作是汉帝国版图的边境了。以汉帝国在西域的统治特点来说，一贯是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的。除非是特别紧要的战略要地，一般并不会建立军事据点。毕竟在这远离核心区的土地上，支撑军事存在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在别迭里山口建立烽燧，意味着这个山口应该是通往天山北麓的主要通道了。



汉西域全图



别迭里烽燧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今天南疆与中亚的贸易交流中，别迭里口岸也是阿克苏地区及其以东地区唯一开放的，能够直通境外的口岸。对于中、吉之间的商贸往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汉唐开拓西域时期，也同样有两件大事件来佐证别迭里古道的重要性。在唐朝时期，为中央之国在别迭里留下足迹的，就是大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唐僧玄奘。在唐人的记载中，别迭里山口被称之为“拨达岭”或“勃达岭”。按照西域土著的命名方式，这个高点也可被称为“别迭里达坂”了。只不过，



在玄奘的记录中它是被称作“凌山”罢了。

尽管每一条穿越天山直通乌孙故地的古道，都试图和这位历史名人扯上关系，将自己贴上“唐僧古道”的标签。但明确经由阿克苏河流域入境伊塞克湖盆的玄奘，能够选择的应该就是别迭里古道。对于玄奘和其他唐朝之人来说，并不需要像张骞那样带着探路的心态去展开西域之旅。因为汉帝国在此数百年的经营，已经成功开拓了成熟的带有官方性质的通道。刚才我们也说了，汉帝国也曾经有大事件发生在这条古道之上。这个大事件的主导者，就是发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言的东汉名将陈汤。



#### 别迭里山口

陈汤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在解读康居时，陈汤就已经代表汉帝国出现在天山南北，并最终穿越天山，击败了试图以康居为基地，夹击乌孙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在这次远征当中，汉军穿越天山所使用的孔道，就是别迭里古道。而我们今天在别迭里山口所发现的汉代烽燧很可能就是这次远征之后，所设立的军事据点。

对于汉帝国和乌孙来说，别迭里山口并不仅仅是一条通道那么简单。因为历史记载的乌孙都城“赤谷城”，就在别迭里山口的西北方向。当然，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了，赤谷城并非乌孙唯一的政治中心，而更有可能是乌孙王族越冬的地方。如果说乌孙夏都是在特克斯河谷的话，那么赤谷城就应该是乌孙人的“冬都”。

决定一个政治中心的所在，除了环境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缘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不是赤谷城的存在决定了别迭里山口的地缘价值，而是别迭里通道南连塔里木盆地，北通伊塞克湖盆地的地缘位置，影响了乌孙人的选址。有鉴于此，汉帝国的军事将领从战略角度担忧乌孙或者吞并乌孙之后的匈奴，经由别迭里山口切断丝绸之路并非杞人忧天（这也是陈汤力主远征的主要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别迭里山口也好，之前我们提到的“契恰尔山口”也罢，其实都不是在天山主脉的分水岭上。也就是说，翻越这些山口，并不能马上插入纳伦河



流域或者伊塞克湖流域。事实上，要想真正进入天山北坡，那些徒步旅行者还必须在那些隶属阿克苏河上游的河谷中穿行一段距离。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托什干河和库玛拉河在天山腹地的上游集水河流，基本都是呈东——西流向横切天山山脉。而由托什干河谷出发的别迭里、契恰尔古道，所依托的河流都是北南向直接注入河谷的支流。这种地理结构使得别迭里山口也好，契恰尔山口也罢，实际上都只是阿克苏河上游谷地与中游河谷之间的分水岭。

对于试图经营塔里木盆地的农业属性政权来说，鉴于他们的机动能力不足，将与游牧民族的地缘分割线，定位在他们所能遇到的第一个分水岭已是极致。至于阿克苏河上游那些结构复杂的河谷，则注定是更适应恶劣环境的山地游牧民族的领地。这种地缘分割情况，实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吉划界方案中，双方在阿克苏河流域一带的国境线，大多是在阿克苏中、上游支流的分水线上。



汉西域全图

从地缘规律，以及一直以来的认知而言，上述地缘分割线的定位应该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不过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也并非完全满意，因为有一条直接注入托什干河谷的中游河流，其河源区当初并没有划归中国，而是归属了苏联——吉尔吉斯斯坦。这条河流的位置就在阿合奇县城的东侧，与别迭里河相邻。在今天的地图上，它被标注为“琼乌散库什河”。而在有的资料中，这条河流又被称之为“乌宗图什河”。其争议区也由此被称之为“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区”。

假如一直以来，用来沟通天山游牧民族与阿克苏河的通道，是沿琼乌散库什河开辟的。那么中吉之间的这块争议区可能就不存在了。琼乌散库什河与托什干河上游河谷之间的分水岭，将会随着道路的开辟而自然成为双方的行政分割线。在没有通道的情况下，在天山腹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会更有机会更深入一步。对这种实际据有与地缘政治原则相冲突的情况更为伤神的，应该是看起来吃了亏的中国方面了。其实要是严格按照分水岭原则来划分彼此之间的国境线的话，将中、吉之间的国境线，定位于整个阿克苏上游谷地与纳伦河谷、伊塞克湖之间的分水线上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

实际上，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方面也曾经一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过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因此后来的具体要求，也聚焦在获取阿克苏河整个中游流域的控制权上了。以中、吉双方后来签订的边境协议来看，双方各让一步解决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区”的问题。中国方面在“收回”860平方公里的吉方实占领土之后（约占当日要求的30%），放弃了将国境线划在分水岭上的要求。

通过上述内容，相信大家已经对别迭里山口的地缘价值有所了解了。那么说，今日别迭里山显得太有价值的原因，是不是仅仅因为它现在实际成为了中、吉两国的边境点，而不像夏塔古道、包扎墩古道两端现在都属中国境内的原因呢？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使在古典时期，别迭里山口和阿克苏河流域绿洲的战略价值，也会略高于龟兹故地和它那些通往乌孙东部的古道。至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 第四节 阿克苏绿洲在沟通乌孙上更具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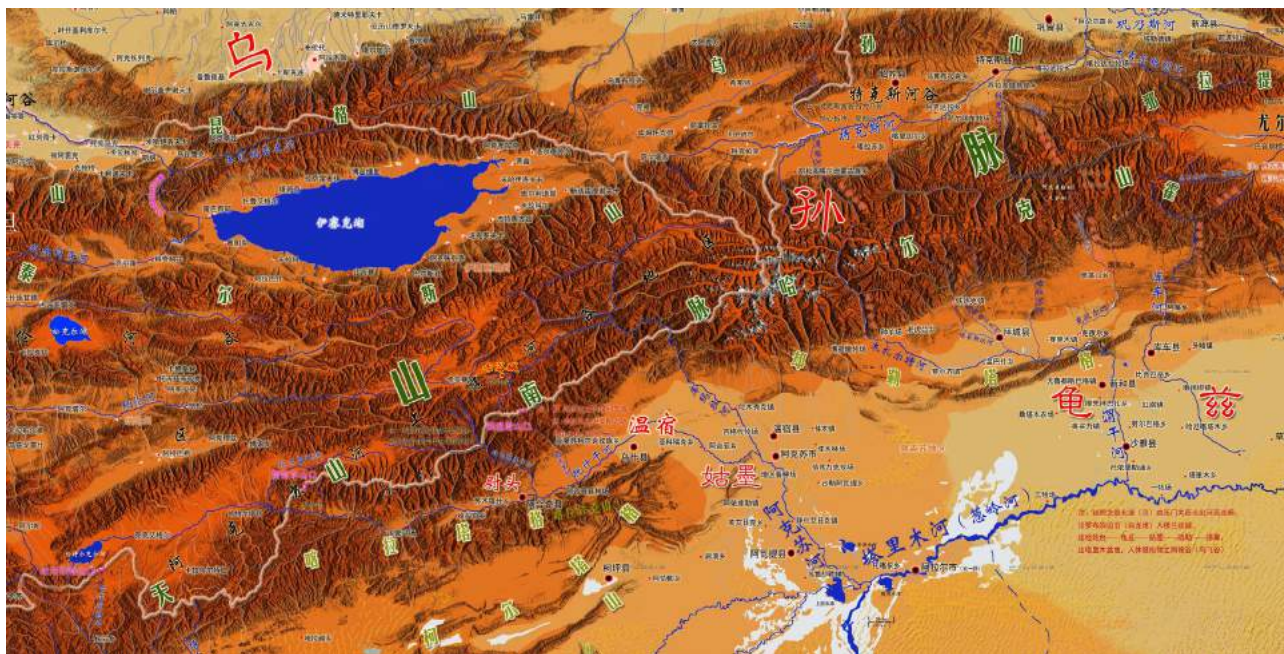
单从阿克苏河绿洲与渭干河——库车河绿洲的位置、体量来看，二者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同处汉丝绸之路北线中部的两块绿洲，只是一个位置偏西，一个位置偏东罢了。也就是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暂时并不能看出谁的地缘潜力会更大些。不过，我们经常说，你能有多大作为，不仅和自身实力有关，也和你的邻居有关。这就好像面对分裂状态的西欧，英国人能够在东大西洋地区获得的话语权要远大于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中央之国的日本。

姑墨也好，龟兹也罢，他们最重要的邻居自然是乌孙了。就地理位置来说，前者对应的是阿克苏河上游河谷——伊塞克湖，后者则对应的是伊犁河谷。单从这点来看，也不能分辨出双方位置的优劣。因为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这两个地理单元对于乌孙人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他们的王室核心部落，会因季节不同而在二者之间切换牧地。现在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谁所控制的路径，更容易与乌孙沟通？

无论从哪个方向穿越天山这样的山脉，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然而对于龟兹人



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要更大些。因为特克斯河谷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这段被称之为“哈尔克山”的山体，是整个天山山脉中平均海拔最高，纵深最“厚”的一段山体。整个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托木尔峰，也正是在这段山体的西部，现在中、吉两国交界处。即使是在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之前所说的夏塔、包扎墩一类的古道，也没有被开拓成公路（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势，穿越夏塔古道的难度最大）。



汉西域全图

反观阿克苏河流域，情况就要好得多了。纵横于天山主脉南坡的阿克苏河上游河谷，并不像木扎尔特河流域的集水区那样狭窄。其纵深足以让这些河谷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有“人”稳定生活其间的地缘板块。也就是说，阿克苏河上游河谷并不像渭干河流域在天山上的那些河谷一样，基本只能起到战术通道的作用（只有很少的点，能作小规模冬牧场），而是能够成为一些游牧部落的生息之地。要是乌孙人和之前的塞人没有将这些可以游牧的河谷整合入自己的旗下，西行到此的汉使应该能够有机会，在他们呈现给长安的报告中又记录进几个西域行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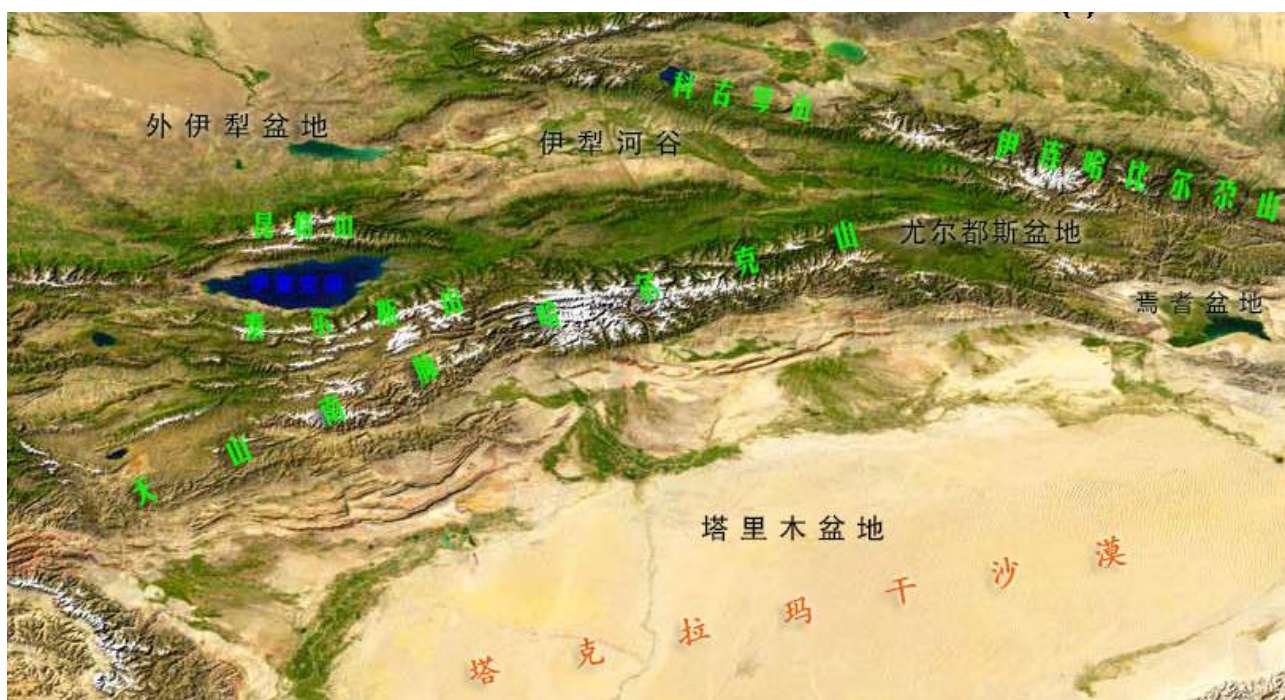
虽然这些在二千多年前有机会成为“国家”的部落，在阿克苏上游河谷地区的存在已经无从寻找了（不像那些湮灭于历史中的绿洲城国，还有可能因为遗迹的发现，而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但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行政版图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在阿克苏地区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线的另一侧，穿越山口的旅行者很快就能在那些分属托什干河、库玛拉河流域的高山河谷中，发现一系列因人口聚居而形成的行政点。比如：克亚伊格尔、恰特尔塔什、卡拉赛、阿克希拉克（这些都能在一般比例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图上找到）。

在我们这个以十亿计的人口大国看来，上述那些人口至多万级的行政点应该是



很不足为道的。然而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天山腹地。即使是规模很小的聚落区，在地缘政治版图中，也能够指向很大一片地理单元。也就是说，游牧的乌孙人、吉尔吉斯人，在天山腹地的统治是自然渗透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因为所谓的分水岭原则。

正因为这片由阿克苏河上游河谷所切割的天山腹地，本身并不是白雪一片的生命禁区（也包括与之交错的“纳伦河上游河谷”），才使得阿克苏河上游河谷地带与其中下游地区之间的分割山脉，事实上成为了这段天山山脉的地缘分割线。这条基本成为中吉两国在这一地区分水岭的山体，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与其体量极不相配的地理标签——天山南脉。



天山卫星图

从体量上来看，天山南脉是完全不能与哈尔克山相比的。比较直观的感受，大家可以从卫星图性质的《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得到。而从地缘角度，我们可以从上述内容导出的结论是，如果乌孙想对南疆地区施加影响力的话，穿越天山南脉，直达阿克苏流域绿洲的路线才是真正的战略通道。透过在阿克苏河上游河谷、纳伦河上游河谷的存在，天山游牧部落对塔里木盆地的渗透，最终也反映到了今日中国的行政版图上。今天我们在托什干河谷及其以西的盆地边缘地区，看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存在，就是这种渗透的最终表现。

从地缘潜力的角度看，能够拥有对接乌孙的战略通道，无疑算得上是一种优势。这使得阿克苏流域绿洲，看起来要比龟兹故地的渭干河——库车河流域绿洲，显得更有价值。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不是每个枢纽位置都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可以提供参考的，就是那些身处“博格达地缘圈”核心位置的车师。

处在汉、匈博弈焦点的位置，使得车师不得不被一分为四。

尽管我们认为，汉帝国的到来，稳定了阿克苏河中下游地区三国分立的局面。但乌孙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汉帝国到来之前。如果说来自中央之国的政治家，喜欢寻找那些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绿洲城国做盟友的话，那么乌孙人也同样对诸如尉头这样，同衣同俗的游牧部落有吸引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乌孙在背后的支持，很难想象尉头这样规模的游牧部落，能够在如此重要的交通要道上独立存在。

不管阿克苏河流域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表现如何，仅凭北接乌孙这一点（龟兹其实应该被定义为“北通乌孙”），就足以证明它和别迭里山口的地缘价值了。不过这并不是阿克苏河绿洲在地缘位置上，所具有的唯一优势。

## 第五节 阿克苏绿洲南部的枢纽点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塔里木河实际上是由四条源流共同汇集而成的。除了阿克苏河之外，其他三个成员分别是：由西而至的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以及由南而至的于阗河（和田河）。这四条源流的相会之处，正是阿克苏绿洲的南侧。

如果说，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本身算是汉丝绸之路北线的组成部分，那么于阗河在阿克苏河南部汇入塔里木河，就是额外惊喜了。因为这实际上为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绿洲带，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一条不用绕圈，而可以从塔克拉玛干腹地穿越的快速通道。如果统治天山的乌孙人或者其他游牧政权，想控制整个丝绸之路的话，那么阿克苏河——于阗河就将是他们横切丝绸之路的生命线。同样的，如果汉朝使者在过龟兹之后，想直接转入丝绸之路南线的话，也可以与阿克苏绿洲擦肩而过，沿于阗河接入盆地南部。这样一条沿河而建的快速通道，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于阗道”。

对于和田河配合阿克苏绿洲，所组成的这种十字相交的连接作用，今天的中央之国也同样认识到了。一方面今日领有阿克苏绿洲、渭干河——库车河两大绿洲的“阿克苏地区”，其行政中心正是在阿克苏河三角洲的“阿克苏市”。另一方面，虽然于阗河现在已经很少有水能够真正注入塔里木河了，但那条唯一天然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于阗道”，仍然在继续发挥着它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今日塔里木盆地内的 217 国道，就是沿和田河右岸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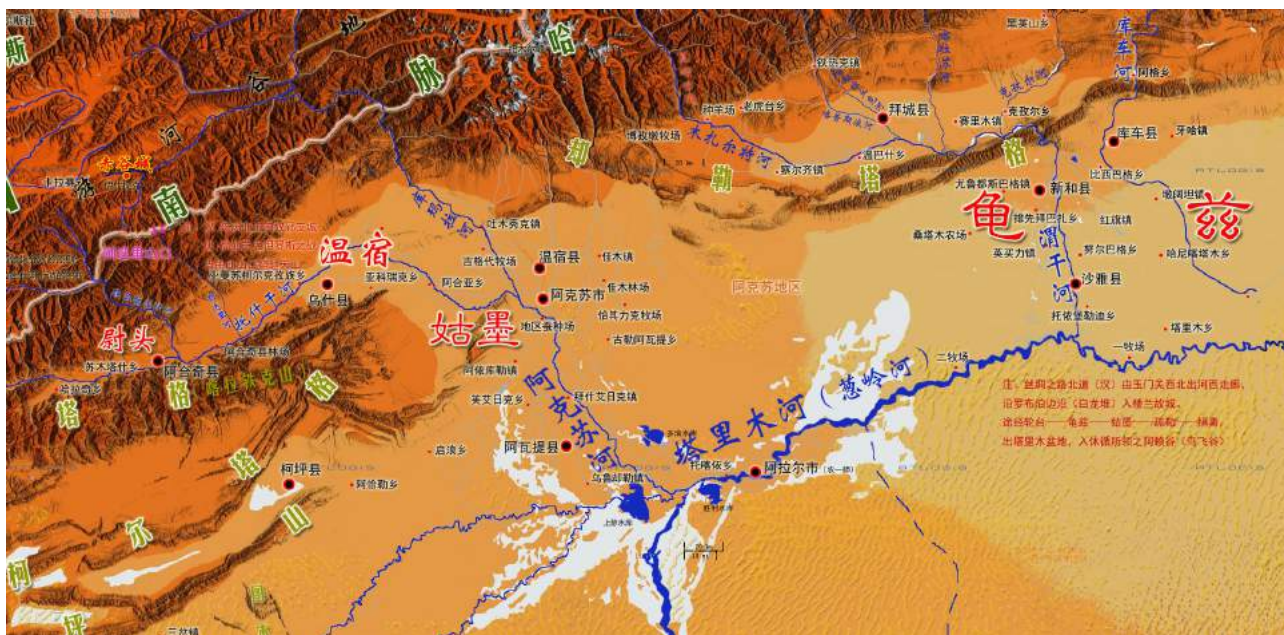
中央之国对于这个枢纽点重要性的认识，也反映到了另一项行政区划的问题上。单从地理结构上看，真正四源相交的点并不是阿克苏绿洲，而是绿洲南部的塔里木河河畔。问题在于，以古典时期的技术力量来说，像塔里木河这种远离山地，纯靠来自不同方位的上游来补给的沙漠河流，在河道位置以及水量上是充满着变数的。这也使得塔里木河周边很难形成独立的绿洲和国家。也正因为如此，与塔里木河干流起点位置最相近的阿克苏河三角洲，事实成为了枢纽点的控制者。



不过阻碍塔里木河周边出现农业绿洲的技术问题，在今天解决起来并非难事。在河道上修筑能够调节水量的水库，是均衡旱涝、变荒漠为农田的最佳方式。正是基于这一技术进步，今天在阿克苏绿洲东南部的塔里木河岸边，诞生了一座总人口接近 30 万的新城市“阿拉尔市”。很明显，这座新兴城市取代了阿克苏绿洲，成为了真正的枢纽点。而中央之国凸显其战略意义的认识，也反映在这座在荒漠中白手起家打造出来的枢纽城市。即虽然阿拉尔市位处阿克苏地区的核心位置，却并非隶属于阿克苏。它适用的是另一套专门为这样全新城市设计的军、政合一的体系。用专有标签来形容，就是“师市合一”的体制。这其中的“市”自然就是“阿拉尔市”了；至于“师”则是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序列中排序第一的“农一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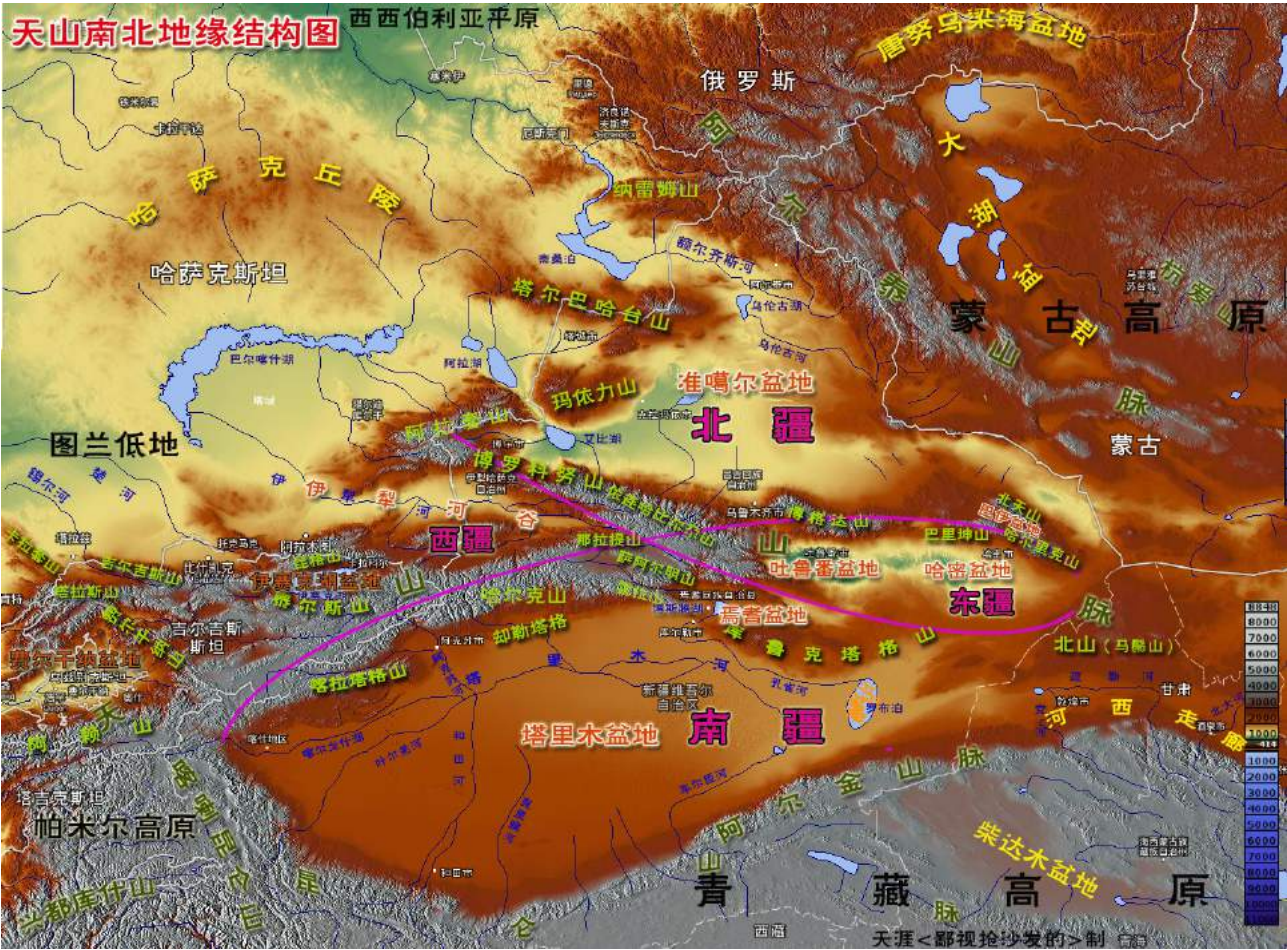
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



汉西域全图



从楼兰一路走来，我们已经沿塔里木河一路向西，走过了：孔雀河、轮台、渭干河——库车河、阿克苏河，四个绿洲带了。除了因此而了解了这些绿洲的前世今生以外，我们更从地缘政治角度理解了两个“师市合一”的行政区：铁门关市、阿拉尔市，究竟有何地缘价值。虽然说能够让这两个人口容量达到 20 万的城市生存下去的基础是有足够的水资源可以调用，但最终能让这两片原本的荒漠之地出现在行政版图上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们可以分别控制两个十字交叉枢纽点。



天山南北地缘结构图

## 第五章 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的地缘结构

### 第一节 天山南麓断续存在的塔格地带

对于在沙漠中穿行的张骞来说，在离开阿克苏河流域，沿着塔里木河继续向着大月氏方向进发时，心目中肯定在期待着下一个绿洲城国的出现。然而这一次，造物主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将近千里的路程当中，并没有农业绿洲的出现。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张骞和他的随从就必须忍受干旱之苦了。塔里木河及其沿岸茂密的胡杨林，足以让这位汉使获得补给。让我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如此漫长的距离里没有从事农耕的绿洲城国的出现。

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看，最容易产生绿洲的地方并不是流域的干流，而是支流的两侧。比起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干流河道（想想黄河下游），这些与山地距离不远的支流，流域范围要稳定得多，也更容易被开发成为稳定的人类聚居地。那么在阿克苏河之西，是不是很快又能出现一条由北向南，由天山南坡流下的大河呢？答案是否定的。而这也是阿克苏绿洲以西千里范围内没有绿洲城市出现的直接原因。

要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天山南麓的特殊地形。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天山南麓整体存在一片海拔相对不高（平均约在 2000 米）的山地。这片在高度上介于高山与丘陵之间的山地，与主脉配合形成了狭长盆地区，成为了主脉与平原地带之间的过渡。而我们在天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沿，以及阿尔泰山南麓，却很难看到类似体量的盆地结构的过渡带。在西域，这种类型的山地往往被缀以“塔格”之名。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之标注为“塔格地带”，或者塔格盆地区。

以我们在东亚的经验，一提到盆地大家都会想到大片的良田沃土。然而有了在东疆盆地区的经验，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在亚洲中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一个所谓“盆地”的边缘山地，是很难有力量收集到足够的淡水来滋养它的腹地的。事实上，我们所定义的“东疆盆地区”，本身也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塔格地带。只不过，天山主脉在东疆北部明显开始收窄，使得整个盆地区的体量够大，加之它沟通南、北疆的地缘位置，才使得我们将之单独列为一个地缘板块（在行政上，也还是属于“南疆”的一部分）。

如果把东疆盆地区视作整个天山南麓塔格地带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为这个盆地区围边的“库鲁克塔格”，就是这条塔格缓冲带的东部起点。只不过，这条塔格地带并非连续存在，在“铁门关——轮台”一线，我们就没能看到到类似的塔格盆地区。想再一次想看见“塔格”，需要继续西进，进入龟兹境内了。在这一区域，却勒塔格为我们完美围就出了“拜城盆地”。

当“却勒塔格”开始淡出我们视线后，塔格地带又出现了一个缺口。而这个缺



口成就了阿克苏河流域绿洲带，以及姑墨、温宿等绿洲国家。不过，希望继续看到塔格地形的朋友，并不会感到失望，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塔格”出现了。事实上，为托什干河南部围边的“喀拉铁克山”有时也被称为“喀拉塔格”或者“黑尔塔格”（“喀拉”、“喀喇”就是黑色的意思，“塔格”就是山的意思）。不过，要是按我们刚才为“塔格”的海拔限定在 2000 米左右的范围来看，最高峰在 4000 多米的喀拉铁克山，海拔有点高了。这条“天山南脉”支脉的西部山体顶上，甚至还会有一点积雪，并且为托什干河提供一些支流。

真正在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们刚才所定义的“塔格地带”范围的，是喀拉铁克山以南的那片弧形山地。这片弧形山地大致由内外两道“塔格”弧组成，内侧的一道，被称之为“柯尔塔格”；外侧靠近沙漠的一侧，则叫作“柯坪山”。由于柯坪山和喀拉铁克山是处于整个盆地区的外围，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片山地称之为“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

## 第二节 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缺乏绿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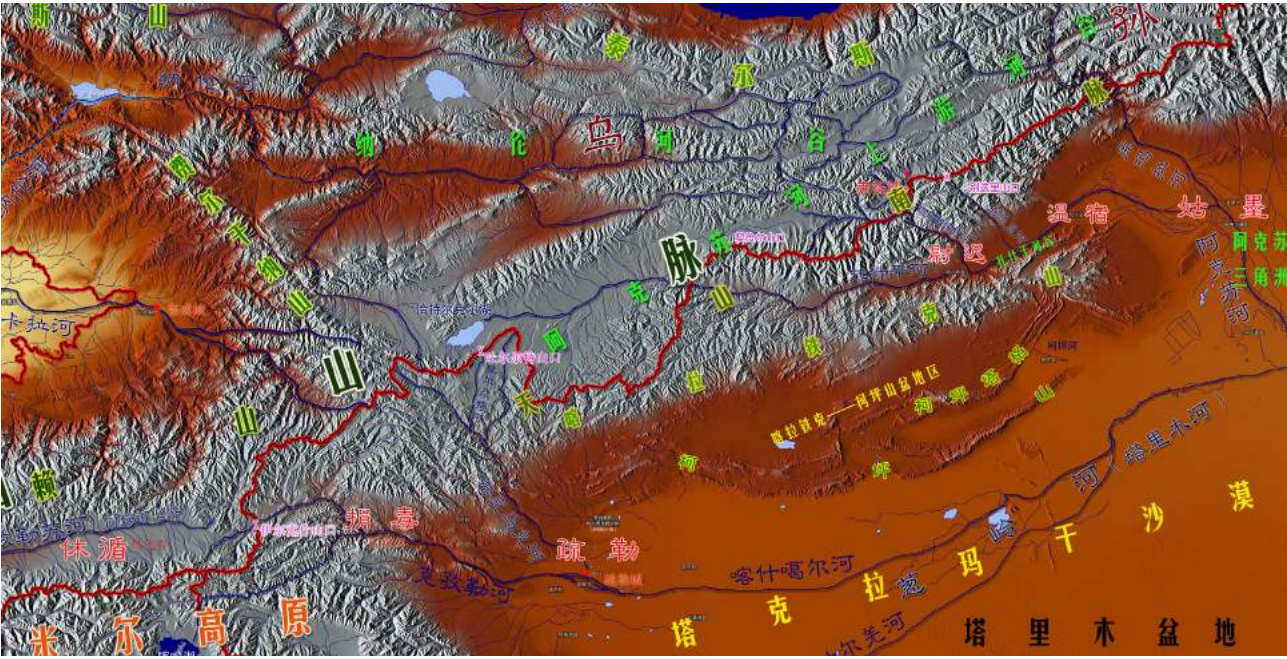
由于被海拔高出一倍有余的天山主脉所阻隔，整个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能够承接的水汽非常之少（一年也就几十毫米吧）。降水稀少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植被稀疏（甚至可以用寸草不生来形容），山体大多裸露在外面，并因为风化而剥蚀严重。其唯一的优点，可能是山体由于岩质不同会呈现出红灰相间，甚至红、黄、灰、黑相间的色系来。对于一些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来说，从旁经过能够产生梦幻般的感觉。以至于山地所在之地，为之打出了“七彩山”的招牌来。

既然柯坪山、柯尔塔格本身的条件极端恶劣，那么它们之间，以及与喀拉铁克山之间包夹山间谷地、盆地情况会不会好些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要知道，高山雪水才是低地的生命之源，山上都没有水，又怎能指望山下绿草如茵呢。所以整个喀拉铁克山以南，直至柯坪山的这片弧形“塔格盆地”区，绝大部分土地都属于尚未开发的戈壁荒地。唯一看上去能够有机会形成绿洲的土地，是柯坪塔格——柯坪山山间盆地的东北部，靠近阿克苏河流域的位置上。这里由于地下泉水的涌出（泉水之源自然还是天山了），形成了以柯坪河为主的一些小型河流。依靠这一点天山的恩赐，从事农耕的土著开发出了十万亩耕地、滋养了 4 万人口。并因此而在上世纪初，据此分治出了统辖半个“喀拉铁克——柯坪山盆地区”的县级行政区——“柯坪县”（西半部则为阿图什市所辖）。

对于柯坪县（城）这个点来说，能够得到泉水的眷顾固然是一种幸运，但对于整个喀拉铁克山以南，直至柯坪山南的这片土地来说，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如果依照拜城盆地的经验来看，天山南坡所收集到的淡水应该会先注入这片弧形盆地区，在滋养出一条狭长河谷平原后，通过峡谷切出柯坪山，并在柯坪山南形成大片三角

洲形态的绿洲来。以柯坪山所对应天山主脉的纵深来说，这条预想中的河流流量并不应该小于渭干河——库车河流域。

事实也的确如此，柯坪山以北的天山南坡集水区，也的确提供了足以和滋养出龟兹绿洲的河水来。只不过，这些淡水并没有径直流向南方去切开喀拉铁克山、柯尔塔格，以及柯坪山。而是在遇到喀拉铁克山之后就转而向东，和另一条从天山主脉南下的河流——库玛拉河，合流成为了“阿克苏河”。也就是说，本来应该在柯坪山以北形成的河谷平原，现在成了阿克苏河流域的“托什干河谷”；而本来应该用来在柯坪山南开发绿洲的天山之水，却转而经由阿克苏河注入了塔里木河。



汉·疏勒地缘位置图



伽师七彩山

其在地缘上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柯坪山南麓数百公里的土地上，没有机会出现农业绿洲。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为什么阿克苏河能够拥有超出渭干河——库车河流域一倍的水量，并且在人类过度开发的今天，仍然保持不断流注入塔里木河的纪录了吧。如果说却勒塔格存在的价值，是把自己集水区的河流集中汇出，在“塔格”之南打造绿洲的话；那么喀拉铁克山存在的意义，就是把本该属于柯坪山南的天山之水拱手送给了它东部的阿克苏河。



没有河流从柯坪山穿出，并不意味着柯坪山以南就完全是沙漠的天下。既然托什干河能够把本来属于柯坪地区的水送给阿克苏河，那么柯坪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同样能够指望其他方向上的山地不远千里的将雪水送来（前提是水量够大）。事实也的确如此，整个塔里木盆地的西侧，都为这一“西水东调”工程作出了贡献。落实到具体的河流及山地集水区上，为柯坪山以南地区作贡献的河流和山地河流有两条（片）：一条是源自天山、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河”；另一条则是源自喀喇昆仑山脉的“叶尔羌河”。

一般情况下，我们视这两河相汇之后的河道为塔里木河干流。而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开都——孔雀河水系、迪那河水系、渭干——库车河水系、阿克苏河水系，以及我们还未解读到的：和田河水系、车尔臣河水系、克里雅河水系，与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等九条河流一起，并称为“塔里木河水系”。尽管上述河流，现在大多数已经无水汇入塔里木河了。但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它们都曾经成为过塔里木河的支流。从这个角度说，上述河流也都有资格称自己为“塔里木河”。

### 第三节 尉头人到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畔放牧

对于张骞来说，甄别河流之间的关系，也是他此次出使考察的重要内容（所以才考证出了于阗河是黄河之源的看法）。毕竟在如此干旱的地方，无论是生存还是交通，都需要依靠这些河流。尽管与柯坪山并行的这段路程，有与塔里木河干流直线相通的喀什噶尔河一路为他指明西行的方向。但对于日后试图经营西域的汉帝国来说，如此之长的距离里没有农业绿洲，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除了试图横穿塔里木盆地的过客以外，真正能在柯坪山南利用这段沙漠之水（包括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的，很可能会是那些游牧部落。

类似的情况在我们所定义的“中亚农业区”就已经出现了。尽管沿天山之麓分布的那些绿洲最终都发展出了绿洲城国。甚至连阿姆河三角洲这样远离山脉的地区，都因为河水漫流而孕育出过定居属性的花刺子模国。但能够在那些沙漠腹地利用那些中游之水的，还是那些游牧部落。我们之前曾经分析过的游牧属性的土库曼人，就是这样成就今日土库曼斯坦的国土的。

就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中游地区的情况来说也是如此。那些绿洲城国虽然也会利用绿洲外围那些沿河而生的植被放牧一些牲畜，但让姑墨一类的绿洲城国沿塔里木河单线渗透那么远，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究竟是哪一支游牧部落曾经放牧于喀什噶尔、叶尔羌河畔呢？是乌孙人吗？以乌孙的实力来说，如果他们想的话，自然是可以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乌孙在天山北坡所占据的草原来说，并没有必要为了塔里木河沿岸那点水草（也养活不了多少人）千里转场。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只有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即为了控制塔里木盆地那些西域城国。

只是乌孙人真要这么做的话，势必将自己置于地缘博弈的焦点。变身成为汉、匈两国的眼中钉（尤其是汉帝国），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既然种种迹象表明，乌孙人不可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来放牧，那么到底是谁曾经填补过这绿洲之间的千里空白区呢？答案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内容中已经出现过了，这个国家就是托什干河谷西段的“尉头国”。以整个亚洲草原的环境而言，是很难找到一个四季青草如茵的牧场，让游牧民族过上定居、畜牧的生活的。在不同的季节里转换二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牧场，是亚洲牧民的生活常态。也正是这种生存状态造就了“游牧民族”这个概念。单从地理结构来看，托什干河谷和塔里木河沿岸，显然是具有不同的水文、气候环境，受这种环境差影响，两个板块植被生长期也会有所差异。



汉西域全图

而对于尉头人来说，他们有足够的空间来寻找这种差异，以让自己的牲畜在某一季节出现在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沿岸。因为从喀拉铁克山到柯坪山的这片荒凉的盆地区都是农业开发的禁区。能够利用那些有限植被的，只有喀拉铁克山北的尉头人。尉头人如果想从托什干河两岸，转场到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地区，并不会有人的障碍。也就是说，天山南脉（南坡）到柯坪山脉，再到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的广大地域里，都可以视为尉头人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名义领地中的绝大部分，实际并不能为尉头人所用。依附有限的水草资源，尉头国的人口（二千四）也还是不能够跟周边绿洲国家相比。

看起来，尉头人通过转场到柯坪山以南地区所获得的收益并不太大。即使将整个柯坪山所对应的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都视为“尉头之地”，也没有为它带来



太大的收益。这是不是说，这片尉头之地地缘潜力就仅限于此，抑或只能充当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衡量地缘潜力的原始指标中，并不只有土地产出（食物）这一项指标。其他可供交换的资源以及地缘位置也是两项重要指标。就那些非食用性资源来说，最为重要的当属盐、铁（铜）两项资源了。

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曾经多次提到过以资源立身的国家，比如库鲁克塔格中的“墨山国”；四川盆地的“巴国”。不过完全依靠资源而立身强国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像中东那些石油国，就属当代案例）。大部分的时候，拥有这些优势资源（比较竞争对手）只是一个国家强大因素中的一个。像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龟兹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线的中心国家，除了我们之前所分析过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拜城盆地边缘，包括喀尔克山南麓以及却勒塔格山区拥有丰富的铜、铁资源。针对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冶炼，以及输出、交换，极大加强了龟兹国力，使之在与阿克苏河绿洲带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然而，从资源的角度来看，尉头之地并没有特别的表现。如果尉头国拥有潜在的地缘潜力的话，那么就只能看看在地缘位置上有什么特别表现了。以地缘位置来说，尉头之地并没有让我们失望。尉头人在托什干河的核心区，以及被他们利用的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都处于重要的交通线路上。前者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与亲缘的乌孙人，包括游牧民族之间的“友谊”；后者则可能从丝绸之路北线的商路上，获得额外的商业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潜力和利益并不一定会为尉头人所挖掘、收获。

对于尉头人来说，如果想在丝绸之路上雁过拔毛（可以是和平方式，也可以是武力的方法），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并不是天天待在那。游牧属性使得尉头人在一年当中，至多只会有一小部分时间待在可能的商路上。更重要的是，在张骞为汉帝国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前，东、西方贸易量是非常有限的。那时的尉头国即使有心有力，也很难获得额外的利益；而在汉帝国强势控制西域、打通商路后，像尉头这种逐水草而居，无法定居成为战略补给点的“国家”，是不可能凭借一句“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就沿河向过往商旅收过路费的。

能够获得这个“土地溢价”资源的，还是那些强大的外来力量。至于说这个外来力量指向何方，又是在什么具体的节点上来实现这个溢价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 第四节 图木舒克地区的区位优势

既然丝绸之路是因中央之国的西进而开拓成功的，那么作为贸易终端和通路的维护者，自然也将占得最大的利益了。对于那些绿洲城国来说，定居属性使得他们与帝国有了合作基础。至于尉头，他们更像现在那些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因土地开发而获得的绝大部分溢价收入，被“政府”理所当然的收取了（政府的理由是，如

果我不开发，不进行基建投资，也不会有这些收益）。

虽然中央之国有充足的理由，在尉头人曾经游牧的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两岸获益，但最为现实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这份利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柯坪山本身并没有孕育出山前绿洲。在没有靠山的情况下，将建立据点的命运交给那两条横行于沙漠腹地的河流，是极为危险的。不稳定的水量、平坦的地形，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改道风险，随时都可能让帝国派驻的军政人员遭受灭顶之灾。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这片看起来并不缺水的土地，只能为游牧民族所用的根本原因。



汉西域全图

在如此漫长的路途中没有绿洲这样的战略补给点，是件很让人不安的事。即使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有困难，能够有个地理环境相对稳定的地方建立一个能够囤积物资的据点，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一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地理指标上，就是要有“山”有“水”。无论出于聚落还是军事需求，依山傍水之地总是风水最好的地方。在与沙漠相接的地方，山地不仅能够让你有机会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弱风沙对建筑和人的影响。当然，出于军事和控制交通的目的，如果在河畔通道上有制高点可用的话，无疑对于控制方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位置靠北的喀什噶尔河，与柯坪山之间也有数十公里的距离。你并没有办法在享用喀什噶尔河水的同时，又让自己得柯坪山之利。不过，我们也不用为此气馁，因为造物主已经为那些丝绸之路的经营者，准备了一条与柯坪山垂直，横切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的山地——图木舒克山。

图木舒克山可以说是一座山，也可以说是一组连续山地的总称。从位置和体量



来看，这组源出珂坪山的低山，并没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收集淡水，也更谈不上经营出自己的山前绿洲了。不过图木舒克山执着向南延伸的走势，还是让它有机会与从千里之外而来的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相交，并营造出几处“依山傍水”条件的交汇点来的。对于军事家来说，这些山地的存在可以说是解决了大问题。那几处河流穿过的山口地带，天然就具备了构筑要塞的基础。

而对于身负政治使命的帝国官员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可以依附图木舒克山建立战略据点，为帝国更深一步的渗透西域作出贡献。至于说屯田，如果有足够的人力，自然是可以尝试下（虽然很容易被沙漠所侵袭）。不过有了这样的地缘优势，是否能够自给自足真的那么重要吗？以图木舒克依山傍水，扼守交通要道的位置，依托中央之国的政治、军事优势，即使是单纯在此构筑一个雁过拔毛的关卡，也足以支撑帝国在此的存在了。



托库孜萨来古城遗址

虽然图木舒克山地区据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但它在我们所解读的汉帝国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图木舒克山真正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突显军、政价值的时间，是在唐朝时期。在唐帝国再一次代表中央之国经营西域时，帝国的政治家以图木舒克山为依托，建制了“尉头州”的行政区。而今天的考古学家也已经在图木舒克山一带，挖掘出了以“托库孜萨来古城”为代表的多处古城遗址。

可以肯定的是，沿塔里木盆地北沿一路向西的张骞，一定注意到了图木舒克山的战略价值。那么汉帝国为什么没有充分开发图木舒克山的战略价值呢？这主要还是因为汉帝国与唐帝国经营西域的思路不同有关系。我们之前说了，作为开拓西域的先行者，汉帝国经营西域的主要手段，还是通过针对土著国家的外交政策来实现的。通过经济上的胡萝卜，以及远征军形式大棒，外交家们得以成为帝国在西域政策的主导者。这种间接控制思维，也使得汉帝国在建立据点时，更愿意“偷懒”与那些现有的绿洲城国直接合作。

然而到了唐帝国，中央之国在南北朝时期所累计下来的胡化基因，使整个帝国显得更有进取心和张力，也更适应那些本来被认定为不适合中央之国直接经营的“化

外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设立了“安西四镇”这样的军事机构来事实管理西域。大量军事人员的进驻也使得帝国经营西域的花费比之汉帝国时期要巨大得多。有鉴于此，像图木舒克山这种兼具经济、军事价值的战略要点，就没有理由被忽视了。

既然唐帝国已经重视了图木舒克山的战略价值，第三次代表中央之国进入西域的清帝国，同样也没有理由无视它的存在了。在清帝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上，这片土地及其周边地区被称之为“巴尔楚克”，简称“巴楚”。其军事、交通重镇的价值，又一次得到了重视（巴尔楚克全称为“巴尔楚克军台”，军事据点的属性一目了然）。



图木舒克地缘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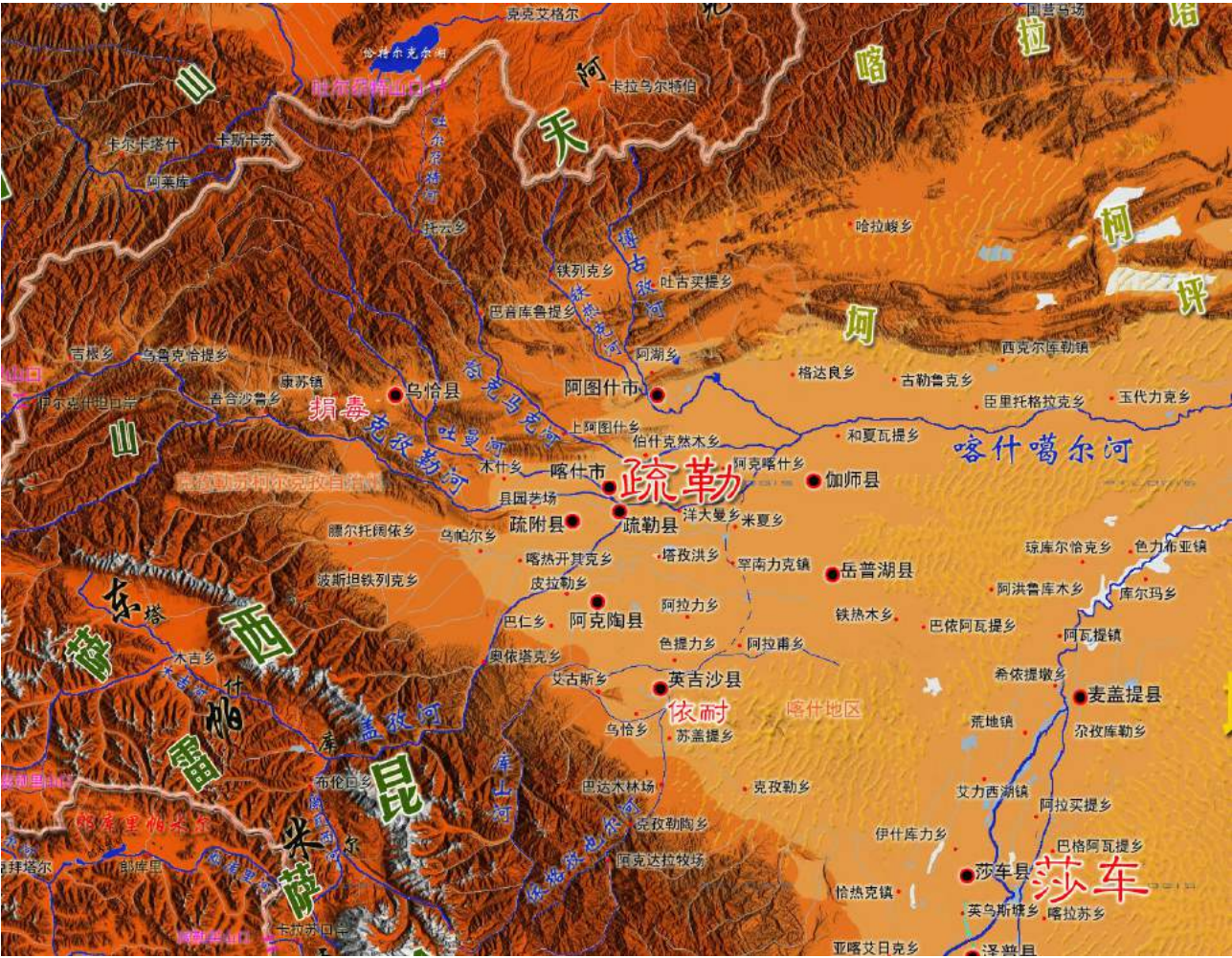
在唐、清二代都已经重视且利用了图木舒克地区区位优势的情况下，对西域控制力更深的红色中国，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这块风水宝地了。与古典时期的先人相比，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央之国拥有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来开发这片土地。具体的说，就是可以依托图木舒克山构筑蓄积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河水的水库，并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也就是说，依托图木舒克山及其周边地区而生的不再只是一个军事、交通据点，而是可供大规模人口聚居的“绿洲”了。

这样一片位置重要，且之前没有土著居民大规模开发的土地（这样就不会引发矛盾了），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点。在现有的行政版图中，我们会看到柯坪山以南，以图木舒克山地区为中心，建制了两个县级行政区。一个是看起来面积大出许多的沿袭原有建制的“巴楚县”；另一个则是中心开花，完全被巴楚县包围的“图木舒克市”。至于说山、河相交的战略要点，主要的蓄水水库到底是属于哪个行政区。只需清楚图木舒克市的特殊地位，就无需再行解释了。如果此时你的脑海中跳出了“师市合一”这个名词，那么恭喜你答对了。与我们之前解读过的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一样，这又是一个由生产建设兵团开垦而成的城市。唯一有



所不同的是，只是“农三师”的军事序列罢了。

最终成就图木舒克绿洲的河流，是两条塔里木河之源：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前者发源于天山——帕米尔高原相接之处；另一条则是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集水而成的。离开图木舒克山的张骞开始面临一个抉择：到底是选择沿喀什噶尔河一路向西，接近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角；还是沿叶尔羌河向塔里木盆地的西南方向逃亡。鉴于张骞努力寻找的大月氏现在已经在天山以北了，沿叶尔羌河转到塔里木盆地的南沿，只会让他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只有喀什噶尔河才能够让张骞进一步接近自己的目标。当张骞沿河西进，上溯到塔里木盆地西北角时，期待中的绿洲终于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伴随绿洲而生的国家，史称“疏勒”。



汉西域全图

## 第六章 疏勒沟通费尔干纳盆地的通道

### 第一节 疏勒地理位置重要的原因

“疏勒”之名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内容中，在之前的内容中，这个标签以“疏勒河”的形式，连接了罗布泊与河西走廊。而在我们曾经解读过的“车师”境内，其实还有一座“疏勒城”，位于博格达山北麓（今奇台县境内，时由“车师后国”所辖）。在东汉时期，名将“耿恭”曾经在此坚守，逼退了试图南侵的匈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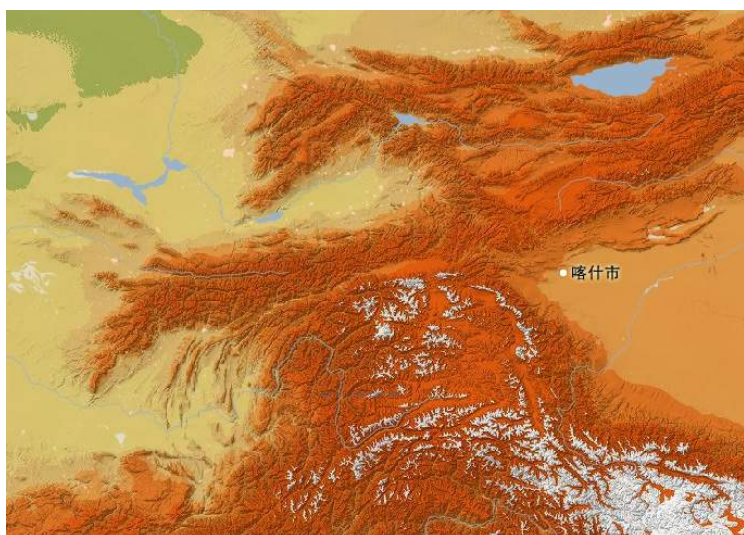
在解读西域的内容中，同名不同地的现象已经多次出现了。不过就“疏勒”这个标签而言，地缘价值最高，最为知名的，还应当是我们现在正在解读的“疏勒城”。疏勒城的重要性，从今天的行政规划中也可以看出来。相隔两千多年后，在同一片绿洲所诞生的新城市，就是今天的南疆重镇——喀什。

对于现阶段的中央之国来说，拉近地区经济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件。而作为“西北的西北”的新疆，聚集最多目光的当属喀什了。因为在2010年5月，喀什被批准成为了中国西北第一个经济特区：喀什经济特区。而这顶特区的光环，很自然让人联想起当年被“划圈”而白手起家，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大经济体的深圳市。基于这个预期，喀什能够吸引众多目光，并成为潜在的投资热土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说深圳的崛起，是因为它与香港一河相隔的地缘位置，使之在当年成为了中国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南大门”的话，那么比起仅仅相邻香港这个特殊地缘板块的深圳来，喀什会更有资格将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西大门”，并因此而具备了成为特区的底气。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喀什所处的位置，正位于喀什噶尔河几条上源相交的位置，这些汇集而成喀什噶尔河的河流共计七条，分别是：克孜勒河、盖孜河、库山河、依格孜也尔河、恰克马克河、吐曼河和博古孜河。对于数流汇集的山前冲积扇地区出现一片绿洲，我们应该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从方位来看，疏勒的确可以称之为塔里木盆地的西大门。如果说塔里木盆地的东部是由楼兰所控；北线是龟兹人在做主；那么疏勒也同样可以被定义为西部霸主了。

在《汉书》的记载中，疏勒的人口为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七。相比龟兹的八万人，这个规模只能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在东汉时期，获得匈奴支持的龟兹也数次试图吞并疏勒。而这一计划在当时被与张骞齐名，为东汉帝国重开丝绸的班超有力的制止了。对于中央之国来说，疏勒的得失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即使龟兹、姑墨，乃至轮台、尉犁，甚至楼兰故地，皆为匈奴所控制，丝绸之路仍然可以通过南线（塔里盆地南沿）走出塔里木盆地，与中亚乃至欧洲相通。然而如果疏勒也成为了反叛者，那么丝绸之路也就彻底断绝了。





喀什位置图

疏勒的位置为什么重要？看看它到底与哪两块山地相邻就明白了。作为喀什噶尔河的庇护者，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一方面为疏勒和塔里木盆地收集淡水，另一方面也将它们封闭了起来。至于山的那边，则是我们中亚部分已经分析过的两个重要农业区：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吐火罗盆地。费尔干纳、吐火罗盆地能够将我们带向何方，我们在中亚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了。不管中央之国

所定义的“西方”是指向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或者欧洲，这两个中亚农业区都会是最佳的跳板。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中亚两大农业盆地隔山相邻的喀什噶尔河水系山前冲积扇，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成为塔里木盆地西大门的潜质。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条丝路，最终会在此交汇，然后共同寻路走出塔里木盆地。

## 第二节 疏勒经吐尔尕特山口至费尔干纳

在古籍记载中，葱岭是走出塔里木盆地的最后障碍，而现在一般认为“葱岭”就是喀什西侧的“帕米尔高原”。不过古人所指的葱岭，其实应该并不仅仅指地理意义上的帕米尔高原。因为对于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人来说，但凡阻碍他们走出塔里木盆地的高大山体，都被归入“葱岭”的范围内。依照这个理解，喀什北部那段天山山脉，也就是被我们称之为“阿赖山”的那段天山西段山脉，肯定也算是葱岭的范围了。

对于张骞来说，他最有可能翻越的“葱岭”并非是帕米尔高原，因为他所要寻找的大月氏人，现在还没有进入吐火罗盆地，更没有进入南亚次大陆。在张骞逃出生天时，大月氏人正为得到以泽拉夫尚河谷为核心的“粟特”地区而沾沾自喜呢。而要想进入粟特地区，最好的跳板就是费尔干纳盆地了。我们的这一推断，也从历史记载中得到了验证。翻越葱岭后的张骞，的确是在占据费尔干纳的“大宛”国引领下，找到大月氏人的。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搞清张骞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进入费尔干纳的。这一路径甚至还能够帮助很多朋友搞清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那就是为汉武帝夺取天马的李广利，是如何攻入大宛的。在如此复杂的山地中穿行，河谷自然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天然通道了。我们之前为喀什噶尔河列举出了七条主要源流。而

在这些源流中，最有可能被张骞和后来者利用接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有两条河流：一条是喀什西北方向的“恰克马克河”；另一条则是被古人视之为葱岭河西源的“克孜勒河”（也称克孜勒苏河，“苏”本意既是河）。前者所指向的山口为“吐尔尕特山口”，目前也被开通为中吉贸易口岸——吐尔尕特口岸；后者则成就了另一个中吉贸易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



汉·西域全图

就目前中、吉两国贸易往来的情况而言，恰克马克河所指向的“吐尔尕特口岸”，是双方交流的主要通道。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吐尔尕特山口的穿越难度要更低。从地理结构上看，恰克马克河上游正处于天山南脉与阿赖山相接之处。根据之前所积累的经验来看，两条山脉相接之处，往往是最容易翻越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在之前的内容我们也已经分析过的，天山南脉本身很“薄”，它北部所对应的天山腹地并非全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白色世界，而是纵横有阿克苏、纳伦河上游的宽阔谷地。在古典时期，这些高山河谷虽然很难进行农业开发，但却可以成为游牧民族放牧的高山牧场。对于试图穿越天山的商旅来说，它们的存在也是一种福音。只要选择合适的季节穿越，即使沿途碰不到游牧部落提供补给，也将大大降低行走的难度。

基于穿越难度的考虑，最终帮助旅行者接近山口的，并非是与恰克马克河直线相接的正源，而是它左岸偏向天山南脉的支源“吐尔尕特河”（山口也因此得名）。张骞翻越山口，不再身处塔里木河流域时，他的眼前将会出现一条宽阔河谷，以及一个像伊塞克湖那样微咸的高山湖泊——恰特克尔湖（也称“恰特湖”）。在



吉尔吉斯斯坦众多的高山湖泊中，由 24 条小河汇集而成的“恰特尔湖”，体量居于第三。从地理位置上看，恰特尔特湖可以被视为是托什干河，甚至整个阿克苏河流域的源头。这样一个位置，也可使之直接对接阿克苏绿洲（而不用走疏勒或者伊塞克湖中转）。



恰特克尔湖

不过恰特尔湖和吐尔尕特山口的位置之所以重要，当然并不是因为可以为塔里木盆地的两大绿洲——阿克苏、喀什，提供一条绕经天山腹地的备选通道了。它的地缘价值体现在，可以与锡尔河上游的“纳伦河”相接，并将西行者们带入费尔干纳盆地。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图的话，就会发现托什干河谷在恰特尔湖这个位置上，几乎是与纳伦河谷无缝对接的。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水岭，来阻隔它们之间的交流。

这实际意味着，恰特尔湖相当于处在锡尔河流域（纳伦河谷段）——阿克苏河流域（托什干河谷段）——喀什噶尔河流域（恰克马克河谷段）相接的枢纽位置。只不过，由于这三大流域目前为中、吉两国分割，“一线障目”，被政治蒙住了双眼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罢了。

当张骞站在恰特尔湖西岸时，他接下来要做的选择就是如何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此时的张骞与费尔干纳盆地只是一山之隔了。这座“山”，就是为费尔干纳盆地东侧围边的“费尔干纳山”。单从穿越的难度来看，最为稳妥的方案应该是沿“纳伦河上游河谷”地带，南北纵穿至纳伦河干流，然后沿纳伦河穿越费尔干纳山的谷口而下，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这一路线，也是今天纳伦河谷地区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主要公路路线。也是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的选择之一（北线）。

然而对于张骞和后来的李广利来说，这一沿纳伦河谷而下的路线也有着明显的

缺点，那就是必须在天山腹地绕行良久。尽管我们认为，比起穿越哈尔克山的夏塔古道来说，在纳伦河上游河谷中穿行，已是比较容易的了。但对于抱有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穿行者来说，这片只可能被高山游牧部落利用的土地，并不值得花费那么多时间（对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却又不一样了。它需要这样的线路，把自己内部的城镇串联起来）。既然费尔干纳盆地已经近在咫尺了，那么有没有路线可以帮助张骞从恰特克尔湖以西，直接翻越费尔干纳山进入大宛之地呢？



中吉边境示意图

从地形来看，想从恰特克尔湖地区直接向西，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在费尔干纳山与阿赖山相接的位置，锡尔河两大上源之一的卡拉河（全名“卡拉达里亚河”）已经在分水线的另一侧，等待这些西行者的到来了。对于从疏勒（喀什）

出发，准备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西行者来说，卡拉河所能提供的路线，显然更接近于直线（与锡尔河上游的另一源头纳伦河相比）。

卡拉河是锡尔河的两大源头之一，而它本身在费尔干纳山——阿赖山的那个夹角，也同样拥有两条主要支流。北部那条叫做“卡拉库利贾河（Kara kulja river）”，南边那边则叫作“塔尔河（Tar river）”。如果从恰特克尔湖出发，向西翻越费尔干纳山的话，在翻越山口之后，最有可能对接的应该是卡拉库利贾河。这条路线最大的缺点在于，山口的位置正好在雪线之上（在卫星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不过比起夏塔古道所面临的地形来说，难度已经是大大降低了。

对于那些试图翻越高大山脉的人来说，那些雪线以上的山口的确是一大障碍。这也是吐尔尕特山口，目前成为中吉贸易口岸的主要原因（吐尔尕特山口以西至伊尔克什坦山口的中吉边境基本处于雪线范围，否则这段边境距离更近，更容易对接费尔干纳盆地的河流也更容易开通贸易通道）。如果我们在卫星图上观察，就会发现吐尔尕特山口虽然有点绕路，但其海拔却正好能达到不常年积雪的程度（山口以西就是连贯的雪山了）。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积雪的问题，从恰克马克河的主源（吐尔尕特河西侧）向西北方向前进，也可以直接对接上卡拉河的另一条支流——塔尔河（中国方向离分水岭最近的村庄叫“苏约克村”）。单从山口的高度来看，恰克



马克河——塔尔河路线，穿行的难度可能还会更低些，路线也更接近于直线。

就目前史学家的考证来说，似乎也在支撑着上述路线。因为在汉帝国第一次攻击大宛的战役中，李广利并没有攻入费尔干纳腹地，而是在大宛东部的附属国“郁成”就被阻击了。这个郁成国现在所对应的行政区叫做“乌兹根”，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从行政位置上看，乌兹根已经距离今天的吉、乌边境不远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这座人口数万的城市，正处在卡拉库利贾河与塔尔河之间，紧邻两河的相汇点（交汇点，即是吉、乌边境）。也就是说，无论张骞或者李广利是借助卡拉河的哪条上游河流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郁成国都会作为大宛的门户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反之，如果是借助纳伦河绕行至盆地西侧中穿费尔干纳山的话，郁成就会被完全无视了。

现在的问题是，以目前中、吉两国所建成、计划的公路、铁路线路，上述路线并没有被考虑进来。即使拥有了现代工程技术，穿行那些长年积雪的山口也是十分危险的。当然，如果有户外旅行者，有机会去沿着我们刚才所推断的线路（前提是别被人家当成偷越国境了）去探究一下，说不定能发现些历史遗迹，并借此在同行中扬名立万了。

对于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是没有机会在那些人迹罕至之地探险的。更多的时候，大家只能沿现有的公路、铁路线路，往来于各个地缘板块之中。不过，在绝大部分时候，古人所走出的那些古道并没有被历史所湮没，而是转换成现代道路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我们的地图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以乘车这种“偷懒”的方式，也足以让大家抒发怀古之情了。那么，到底还有没有路线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乘车重走张骞可能走过的路线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条路线所对应的山口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伊尔克什坦口岸”。

### 第三节 疏勒经伊尔克什坦口岸进入阿赖谷

伊尔克什坦口岸所对应的河流，是喀什噶尔河的另一条上游河流——克孜勒河。在突厥语中，“克孜勒”是红色的意思，所以在突厥语覆盖区域内，有很多红色的河流都被称为“克孜勒河”，比如土耳其的第一大河。这类同名不同地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制造的混乱也不少。至于克孜勒河有没有面临同样的问题，后面的内容会告诉大家的。

从地形结构上看，克孜勒河所切开的正是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角。克孜勒河谷也可以被视为天山山脉（阿赖山段）与帕米尔高原的地理分割线。在这样一个山脉相接的夹缝中诞生一条沿河而生的道路，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尽管在今天中——吉两国的贸易中，吐尔尕特山口的吞吐量要更大些（开放的时间更早），但对于当年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上来说，沿克孜勒河一路向西，穿越伊尔克什坦山口的频率

应该会更高些。

克孜勒河谷的通路作用，从汉帝国所记录的历史中也可得到佐证。除了疏勒这个绿洲国家以外，帝国的外交家们，还在克孜勒河上游的河谷地带，记录了一个以游牧为生的部落行国：捐毒。有了之前的经验，即使不用翻阅史料，我们也基本可以确定这个部落的人口应是极少的。只不过因为处在重要的通道上，才让他们有机会被中央之国的史官所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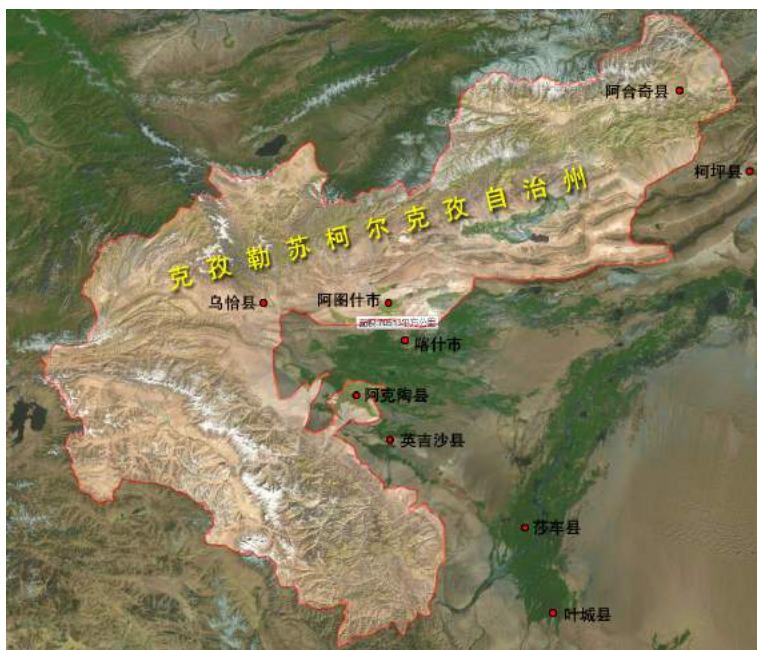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在汉帝国的使者看来，这个游牧于疏勒之西的山地牧场中的部落，又是一个与乌孙同俗的“国家”，他们的核心牧地被称之为“衍敦谷”。而“衍敦谷”这个地缘标签，其实就是指疏勒以西，一直到伊尔克什坦口岸的山中河谷地带。不过，捐毒人的实际游牧范围应该是要大于克孜勒河谷的。就好像被我们定位于托什干河谷的尉头国，其实也会向南游牧到塔里木河一样。就捐毒部落来说，从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的这片塔里木盆地边缘山地，应该都属于他们的游牧范围。这也使得在史书记载中，捐毒国能够“北与乌孙接”。这一点，从今天的行政版图上也可以看出。被我们定义为捐毒游牧区的这片山地，现在的行政标签为“乌恰县”。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乌恰县所辖的这片山地，正好位于中国版图的最西点。如果将中国版图的轮廓视作一只雄鸡，那么乌恰就是这只雄鸡的后门了。从战略角度来看，疏勒故地——喀什所处的那片三角洲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喀什三角洲”），无疑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只不过，基于山地与平原所适应的生产方式不同，无论是二千多年前还是现在，这片绿洲实际上与它西侧的这片山地在地缘属性上都是属于分割状态的。两千多年前捐毒与疏勒共存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同样出现在今



天的行政版图上。虽然西域目前被整体冠以了维吾尔自治区的后缀，但乌恰所属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山地，却是属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图

到帕米尔高原东坡。在这样一个相当于中国西大门的区域，建制这样一个不同于南疆绿洲土著的行政区，往往会被认为是有分而治之的政治含义。不过经由前面的分析，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这的确也是地缘规律作用的结果。

当然，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建制过程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以今天的行政需求来说，已经不可能完全以游牧部落为基础建立一个行政区了。最起码这个行政区需要有一些定居城镇作为行政中心。所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所在的阿图什市、阿克陶县城一类明显属于平原绿洲带了（换句话说，也是绿洲土著占优的城镇），这些低地也被划入了这个原始属性为游牧的行政版块。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自治行政区的设置中比比皆是了。很多时候（尤其是游牧民族标签的自治地区）那些被贴上某一民族标签的自治地区，所谓的主体民族并不是人口最多的民族。

至于说这种结构是否合理，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相比之下，二千多年前的西域，在地缘政治结构上就要简单得多了。绿洲城国与游牧行国比邻而居，彼此间有大片的无人区将双方隔开，并不需要再以明确的行政线来进行分割。对于试图控制西域的汉帝国来说，倒也省去了不少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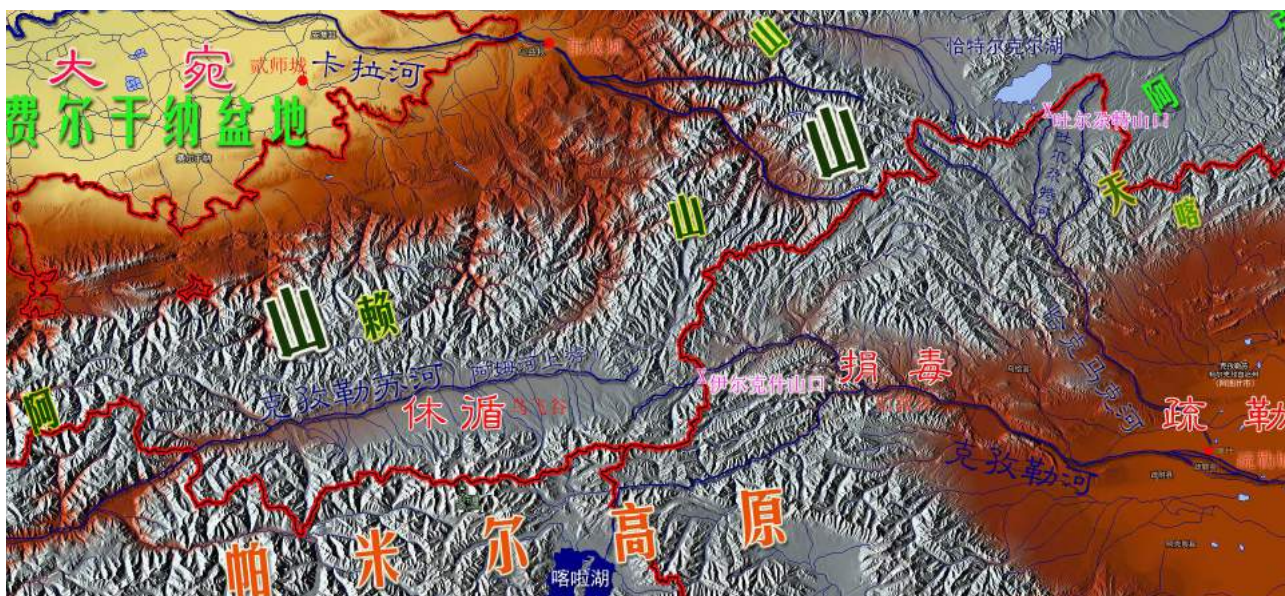
相比古人，我们今天在划定行政区上的烦恼就要多得多了。以分水岭原则来划定那些人迹罕至之地的归属，看起来是最为客观公平的。然而实际上，今天中、吉边境上的伊尔克什坦口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分割线。真正起到分水岭作用的

如果参照汉书当年的描述，今天中国境内的柯尔克孜人，应该也会被记录为“与吉尔吉斯同俗”了。而今天柯尔克孜族与维吾尔族的地缘关系，也的确可以为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那些“塞种”游牧部落，与疏勒一类的绿洲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证据。事实上，柯尔克孜人所领有的这片山地，并不仅限于乌恰县。乌恰县以东的阿合奇县，以南的阿克陶县都是属于这个自治州的管辖范围。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一区域相当于从天山南脉(南坡)



山口——铁列克山口，还要往西一些在吉尔吉斯境内才能看到。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并没有控制全部的克孜勒河流域。没能以严格意义上的分水岭来划定中、吉两国的国境线，也许是一种遗憾。不过，要想分辨这个分水岭的位置，的确也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克孜勒河谷的源头，实际已经延伸到相邻河谷的西南侧。

与克孜勒相邻的这条河谷地带，看起来要宽阔得多。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条谷地处在天山山脉与帕米尔高原的结合部。这两大地在此的分割，要比克孜勒河谷明显得多。具体到谷地南北两侧，为之直接收集淡水的山地来说，北边那条就是天山西段的阿赖山；至于南边那条帕米尔高原的北部边缘山地，其实也叫“阿赖山”，只不过为了区别开，它的前面加了一个“外”字，叫作“外阿赖山”罢了。



汉·疏勒地缘位置图

外阿赖山与阿赖山之间的这条谷地叫什么名字好呢？当然是“阿赖谷（Alay valley）”了。不过，要是上世纪中国能够得到这片土地的话，应该能有个更能验证“自古以来”逻辑的标签，将之与中央之国拉上关系。这就是曾经在汉书中出现过的“鸟飞谷”。与衍敦谷一样，鸟飞谷也是一个游牧行国的核心牧场所在地。这个人口几乎与捐毒国完全一样的部落叫做“休循”。

如果张骞走出疏勒之后，是沿着那条红色河流一路向西，走出塔里木河盆地的话。几乎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衍敦、鸟飞两条谷地，是他必经的两个板块。在这个过程中，分辨两个完全独立的部落，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只不过，当张骞离开伊尔克什坦山口，几乎没太大困难进入鸟飞谷后，他所看到的仍然是一条红色的河流。而这条归属于吉斯吉斯斯坦的河流，今天叫作“Kyzyl su”。全文音译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克孜勒苏”。半音半意的翻译，它就是“克孜勒河”了。

前面我们也曾经提到过，突厥语中“苏”就是河的意思。一定要在克孜勒苏后



面加个“河”字，其实有点画蛇添足了（就像在“塔格”后面加个山一样）。现在让我们头疼的是，中、吉两国这两条几乎对接的河流，实际上叫的是同一个名字。为了以示区别，我们暂时只好在地图上将中国境内这条流向塔里木河的红色河流，标注为“克孜勒河”；而吉尔吉斯人的那条，则称之为“克孜勒苏河”了。



阿赖谷

古人对于这两条颜色相同，方向相反的河流，印象也是十分深刻。也因此有了“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也就是说，在古人的思维中，伊尔克什坦山口一带（鸟飞谷东端），其实被定义为黄河之源，而这个源头之水不仅一路向东流向了“东海”。还分流了部分向西，注入了“西海”。假使中央之国当时真的能够在葱岭以西扩张的话，相信这一说法应该会成为华夏文明进一步西扩的理论基础。

至于鸟飞谷内的这条克孜勒苏河，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将华夏文明带到所谓“西海”，我们后面很快会分析到。对于张骞来说，他暂时

并不会再顺流而下，继续在天山与帕米尔高原的夹缝中探路了。为了尽快找到大月氏人，张骞将会在进入鸟飞谷之后很快转向，向北翻越阿赖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在那里，大宛人将很高兴的从这位汉朝使者那里看到巨大的商机。

对于游牧部落来说，阿赖谷是一片非常不错的高山牧场。如果你有幸从狭窄的克孜勒河谷穿越伊尔克什坦口岸，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话，相信很快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西行到此的张骞并不需要太过深入这片草原，而是在一个今天叫作“萨雷塔什”（Sary-Tash）的城镇转而向北，穿越阿赖山。之所以这么快穿越阿赖山，并非仅仅是出于缩短路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阿赖山整体所呈现的是西高东低的走势，如果不在阿赖谷的东北部就寻找道路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话，张骞很快就会看到，连绵的雪山阻隔在他和大宛之间。

#### 第四节 阿赖谷至费尔干纳盆地的路线

按照我们一贯的寻路方法，阿赖山分水岭两侧应该分别有一条河流为之指引道路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整条道路所依附的主要是分水岭北线的河流。略有不幸的是，我们对这条河流的了解并不多。这条最终注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河流甚至还没有个中文名字，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只是它的英文名：Kurshab。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的锡尔河的主要源头有两条：一条是由北向南注入费尔干纳盆地的纳伦河；另一条则是由东向西与之合流的卡拉河（卡拉达里亚河）。而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最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路线的就是卡拉河流域了。Kurshab 所注入的，正是卡拉河。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它河口的位置，就为发现这个位置正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根”地区。也是被认为是当年曾经阻击过李广利的“郁成国”领地。试图在地图上寻找 Kurshab 河，以及丝绸之路在这个地区可能路线的朋友，可以依靠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 M41 公路定位。



阿赖谷位置图



汉西域全图

顺着这条连接费尔干纳盆地——阿赖谷的公路。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河谷的位置，以及当年张骞可能走过的路线。需要说明的是，M41 公路现在的北部终点，是乌兹根西南 50 公里处的奥什。作为吉尔吉斯南部最大城市，将之作为交通终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技术上也没任何问题。事实上，在汉攻大宛之战中，最为知名的地标应该是大宛用来养天马的“贰师城”了。这个“贰师城”的得名，自然是因为李广利曾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此（贰师将军）。很多人认为，这个贰师城就是今天的“奥什”，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二者发音接近。



奥什到底是不是贰师城，我们并没有准确的答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上述路线最大的用处，就是提供了一条新的“中——吉——乌”铁路的路线。与出吐尔尕特山口的路线（北线）相对应，它也被称之为南线。至于说最终有可能选择哪条路线，重新打通西出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主要看吉尔吉斯斯坦内部的地缘博弈了。或者说，吉尔吉斯斯坦更想优先发展纳伦河谷的“纳什州”，还是费尔干纳盆地边缘的“奥什州”了。

好了，我们现在大致知道张骞和李广利当年的选择了。总的来说，经疏勒——捐毒——休循，再北入大宛的路线是最为可行的。对于李广利来说，大宛就是他此次出征的终点了。而那些汗血宝马就是他最大的战利品。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想知道这些珍贵的汗血宝马，在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留存下来。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现在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就是汗血宝马的后代。据此，甚至有人认为，大宛应该是在今天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巴哈德一带。然而通过我们之前的分析，以及大宛在当时的地缘位置，这种假设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如果大宛和汗血宝马当时真在伊朗高原北麓，那就不是大宛人带着张骞找大月氏，而是大月氏人告诉张骞，自己西南方向还有个宛了。



## 大宛——轮台测距图

其实即使阿哈尔捷金马就是汗血宝马，也并不能证明它们原本就生活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在经历过上千年的岁月后，这些宝马被游牧的突厥人掠夺、转移的距离并不算太远（尤其是对比它们在长安的亲戚）。当然，要想证明大宛就在费尔干纳盆地，我们还需要更为直接的证据。今天我们为张骞所探明的这条西入费尔干纳的路线，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在汉书的记载当中，要注意的是，这个距离单位是“汉里”，折合今天的计量标准，每汉里约等于416米。也就是说，大宛国都距离今天的轮台县东的交通距离，应在1677公里左右。

感谢技术进步，能够让我们很方便的在网络地图上测出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当我们把起点定位在轮台县东部的策大雅镇，终点暂定为费尔干纳盆地的西端出口——



阿哈尔捷金马

苦盏，并将伊尔克什坦口岸作为穿出塔里木盆地的出口时，所测出的交通距离为 1659 公里。这个数字，已经与汉书的记载无限接近了。当然，汉朝人走的路线跟今天的公路交通线，在位置上应该还是有些偏差的。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已经不需要沿塔里木河而行了。但就交通距离来说，二者并不会有多大误差。就整个距离的测距来说，正负 10% 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据此大宛国都的定位范围，应该在费尔干纳盆地的西侧）。

其实单就大宛在 2000 多年前就拥有 70 多座城邑，30 多万人口的地理单元这一数据来看，除了费尔干纳盆地以外，大宛已经

别无他处。在此之所以引出这么一段论证来，一是因为阿哈尔捷金马在土库曼斯坦的存在，的确影响了一部分朋友的判断；二是通过这段论证，更容易让我们了解到汉丝绸之路穿出塔里木盆地的主路线走向。现在，李广利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去向他的妹夫（汉武帝）复命了。然而我们的张骞，却还需要继续完成他的外交使命。

## 第五节 张骞寻找到大月氏人后返程

就张骞如何西出大宛找到大月氏人这件事来说，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交待过了。简单点说，就是张骞在大宛人的帮助下，经过康居人控制的南饥饿草原，穿越突厥斯坦山，到达了阿姆河北岸以“泽拉夫尚河谷”为核心的粟特地区，找到了大月氏人。从张骞此行所领受的任务来说，找到大月氏人其实就已经算完成使命了。尽管没能说服大月氏人联合抗匈，但基于大月氏人的变化，张骞即使就这样回去，也完全有理由获得汉武帝的嘉奖。然而对于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外交家来说，这样的结果始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因此在明确被大月氏人拒绝后，张骞的行程反倒不如开始那么匆忙了。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仔细考察整个“西域”的地缘结构，以期能为汉帝国直接经营这片西方之地做足功课。

基于这个目的，张骞离开粟特地区之后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进入了吐火罗盆地，进入了大夏人的领地。至于张骞是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进入大夏的，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很多笔墨来分析了。从张骞的角度来说，考察这些沟通大夏的路线，以及了解大夏这个国家，固然是他从粟特出发时的主要目的。然而当他真正踏上大夏国土之后，让他感到震惊和意外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一件足以证明大夏直通中央之国的证据。



这件让张骞感到震惊的事件，是他在大夏国内发现了产自蜀地的竹杖、布匹。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这些物产并非经由天山南北，而是由大夏东南方向的“身毒”（印度的古称）转运过来的。结合蜀地的地理位置，张骞很快得出的结论，就是四川盆

76

地与南亚乃至中亚之间存在一条不为帝国中央知晓的商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注，这就是一条“南方丝绸之路”。从理论上来说，这样一条道路的存在，对于汉帝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可以让汉帝国与西域——中亚之间，拥有一条完全不受匈奴干扰的沟通路线。如果帝国决心经营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话，那么即使匈奴又一次入主河西走廊，汉帝国也有机会在西域的“后方”合纵连横，包抄匈奴。

单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张骞的这种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如此大范围的区域内合纵连横其实是很不现实的。然而这一发现所展示的战略空间，已经足以让张骞说服汉武帝尝试打通这样一条西南交通线了。而这后来也成为了张骞生命当中最后的使命所在（虽然他没有完成）。关于汉帝国是如何试图开拓南方丝绸之路的事，是属于另一个分析方向了。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还是张骞在西域的作为。现在对于张骞来说，他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安全回到长安，把这些年所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汉武帝了。

从张骞后来给汉武帝的报告来看，他应该在考察大夏之后就开始返程了。也就是说，张骞应该是在吐火罗盆地准备东归的。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此时的大夏已经覆盖至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地区，而张骞此行最远也到过喀布尔。不过，如果张骞真的进入到喀布尔河谷的话，他应该会顺势穿越开伯尔山口，进入犍陀罗地区乃至五河之地（旁遮普地区），去探访一下传说中的“身毒”的。而如果张骞真的进入了南亚次大陆，他所选择的回程路线就应该是另一个方向了。

张骞此行没有到过印度，应该是一种共识了（第二次出使西域时，终于派副使去了）。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帮助他寻找的，还是从吐火罗盆地出发的返程路线了。如果只考虑回程的话，经铁门关——粟特——南饥饿草原——费尔干纳的路线应当是最被优先考虑的。这条将张骞带入大夏的路线，最大的好处就是比较“平”。虽然有些绕，但所遇到的高大山地也是最少的。然而对于张骞来说，这种安全并非他所追求的。他需要利用东归的机会，为汉帝国考察另一条出西域的路线。

当绕着阿赖山边缘向西北方向迂回东归的路线不被考虑时，向东北方向直接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切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就有可能被张骞所采用了。以几何原则来说，这也是一条接近直线的最短路线。问题在于，我们和张骞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二维，而是一个三维的问题。帕米尔高原的高度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要想从根本上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帕米尔高原的地缘结构做一个详细解读了。

## 第七章 东帕米尔高原的地缘结构

### 第一节 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

记得我们在国际部分，曾经说过塔吉克人认为帕米尔高原才是“世界屋脊”。单从高度来说，帕米尔高原也的确有资格去争夺这个称号。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这平均海拔高于 4000 米的高原，几乎就是生存的禁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片高原真的就只能成为无人区了。与青藏高原哺育了藏族一样，帕米尔高原也同样诞生了一个高原民族——塔吉克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塔吉克人与帕米尔高原所代表的地缘意义，很多时候是可以划等号的。由此将塔吉克人理解为高原民族，倒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从整个塔吉克民族的内部结构来看，这个认定并不全面，甚至是以偏概全。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那些生活在高原从事牧业的塔吉克人，在整个塔吉克人中的比例并不高。大部分的塔吉克人还是生活在低地，并以农耕的生活方式为主。前者被称之为“高原塔吉克人”，后者则被定义为“平原塔吉克人”。

塔吉克人内部出现这种分化，归根结底还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除非塔吉克人所占据的区域内只有高大山地而没有适合农耕的低地，否则这种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最大的困惑，应该是今天在低地从事农耕的塔吉克人，到底是从山上下来融入农业生活的（吉尔吉斯人就是这样转变的）；还是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拥有成熟的农业文明，只是因为领地内那些高山牧场的存在而保留了部分山地游牧成员。

从我们之前所分析过的内容来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毕竟从人种和地缘位置上来看，在中亚各族当中，塔吉克人那些源自欧洲的祖先应该比那些突厥民族更早进入中亚，也更早占据那些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只不过，后来在亚洲民族的不断挤压下，被迫向帕米尔高原收缩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帕米尔高原也可以被视为塔吉克人的保护者。而帕米尔高原，也可以称得上是塔吉克人唯一完全覆盖完整的地理单元。正因为如此，我为这部分内容所做的参考地图，也被命名为《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地缘结构图》。

尽管鉴于环境的恶劣，今天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高原塔吉克人，只有不到 30 万人。但这些“高原塔吉克人”却保存了最纯粹的塔吉克基因（简单点说，就是保留了更多“高加索人种”的基因）。相比之下，那些在低地与突厥民族紧密接触的“平原塔吉克人”，人种和文化上就没有那么纯粹了。塔吉克民族内部的这种差异，不可避免的也会对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塔吉克斯坦的地缘结构作出分析。现在，我们优先关注的地缘标签，还是问题的焦点——“帕米尔”。



如果高原塔吉克人最终分化成为独立民族的话，他们最有可能接受的族名应该是“帕米尔人”了。事实上，在今天塔吉克斯坦内部，这些高原塔吉克人也的确是自称帕米尔人，并以此来显示自己与平原塔吉克人的不同。这看起来只是我们邻居内部的一个问题，不过对于很多喜欢结合历史来分析国际关系的中国人来说，却有足够的理由希望了解这片神秘的高原和这些帕米尔人。因为在最后一个古典王朝——清帝国时代，整个帕米尔高原曾经被纳入过帝国的版图。而即使是在今天，红色中国也依然拥有部分的帕米尔高原，并因此让塔吉克人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序列中，占得一席之地。



塔吉克人（平原地区）



塔吉克人（帕米尔高原）

## 第二节 帕米尔高原内部的板块划分

以古典时期的技术力量来说，直接统治像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这样的极限之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央之国在这类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尊重地区原有政治、部族结构的方式，进行间接统治。至多只是派驻一些象征意义的行政、军事人员轮驻以示存在罢了。在清帝国控制帕米尔高原的时期，帕米尔高原就正是以这种形式被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此时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央之国地缘政治结构中所显示的标签，叫作“八帕”。

所谓“八帕”指的是八个以“帕米尔”为后缀的地缘标签，包括有：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瓦罕帕米尔。这些标签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地理概念，也可以被认为是部族概念。就像“满洲”既是一个族名，也可以代指一个地理单元一样。此类包含双重意义的标签，可以说是很好诠释了“地缘”这个概念。当一片土地加入了“人”的因素，它就由地理板块升格为“地缘板块”了。所谓的八帕，也就相当于把帕米尔高原划分为八个亚板块了。

“八帕”之名，至多让我们认为整个帕米尔高原应该有八个亚板块，或者八片适宜游牧的高山草场。除此之外，相信大家很难从那些标签当中了解更多的信息。



不过，也许瓦罕帕米尔是个例外。因为阿富汗直通中国的“瓦罕走廊”，在地图上实在太过显眼。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在脑海中帮助这一帕定位了。

仅仅定位瓦罕帕米尔的位置，对我们了解帕米尔高原的地缘结构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先从最基本的山形水势入手，来解构这片神秘的高原。从地形来看，整个帕米尔高原可以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即东帕米尔高原和西帕米尔高原。然而这种二分法，却并不意味着东、西帕米尔的分界线，接近这片高原的中线。

实际上，东帕米尔的面积不到西帕米尔高原的一半，整个高原的 70% 的面积属于西帕米尔的范围。如果地缘潜力仅仅是单纯面积的比较，那么西帕米尔高原的优势无疑是很明显的。但结合地形和区位指标来看，东帕米尔高原的地缘价值就有明显加分了。



葱岭地缘结构图

我们先从山形来看看东、西帕米尔的划分原则。简单点说，东、西帕米尔的区别在于山脉的走势相左。东帕米尔高原内的山地呈南、北方向延伸；西帕米尔高原上的山体，则呈东西向排列。形象比喻的话，东、西帕米尔的这种排列组合，很像是一个“三”字。只不过，西帕米尔内部的山地，并不只有三“横”，而东帕米尔也不只是一竖那么简单。

组成东帕米尔高原的山体有两条。东边的这条，也是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缘。从位置和走势上看，这条山脉与南部的昆仑山脉呈现明显的连续状态。因此，我们也可以认定帕米尔高原东边这段山体，是昆仑山脉的一部分。不过，一般在地图上标示出来的“昆仑山脉”，只是从帕米尔高原的东南部起，并作为青藏高原——塔



里木盆地的分割线出现。

实际上这段山脉到底应该被归类于帕米尔高原，还是昆仑山脉，并不让人纠结。因为帕米尔在地质学上的后缀本身就是“山结”（帕米尔山结）。亚洲腹地那几条重量级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都被认为是在此聚拢、纠结。这种纠结的结果，就是我们很难分清帕米尔高原内部的山体，到底应该和哪条山脉关系更近。

不过高原西侧这段可以归入昆仑山脉的边缘山体，在地势上倒是显得与众不同。它与帕米尔高原的其他部分存在明显的分割，这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可以属于昆仑山脉的一部分，并让整个昆仑山脉在伊尔库什坦口岸这个点上，与天山山脉对接。为了更加清晰标示出它的这种双重属性。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西昆仑山脉”。

现在看来，我们似乎纯粹在解构一个地理学上的问题。然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准确定位西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在汉武帝听取张骞意见，并将“昆仑”这个神圣的标签贴给塔里木盆地南侧这条出产玉石的山脉之后。昆仑山脉的走向问题，就变成一个关系华夏文明来源的问题了。西昆仑山脉的存在，使得一些学者相信，山海经所载的“不周山”就是西昆仑山脉。而华夏文明的最初，也应该是在这极西之地起源的。

将华夏文明与帕米尔高原联系起来，应该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推测。不过当中央之国的控制范围已经向西延伸到西昆仑山脉时，在夹杂进地缘政治因素之后，这样的推测倒也能自圆其说。比较无厘头的是，试图摆脱华夏文明影响，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某些半岛“在野史家”，也同样将自己的文明源头推理指向了帕米尔高原。只是这样推理出来的“历史”，在多大程度能够成为“共识”，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将不周山或者昆仑山定位于帕米尔高原（相当于界定华夏文明区的西部拓展边界）的看法，并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最为大胆的地缘政治构想。我们曾经解读过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交汇处的圣山——黑门山（赫尔蒙山），也曾经被国内的在野史家们论证过。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非当年蒙古帝国的建立者决定归化“华夏”，才有可能真的让人去论证这个大胆的设想。

好了，争夺西方圣山“黑门山”的事情，应该还是让那三大一神教的信徒们去做。至于我们，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解读，将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影响力的西点，定位于帕米尔——西昆仑山脉都是最容易形成共识的。之前我们也说了，所谓东帕尔高原，实际上是由两条南北向山体所组成的。西昆仑山脉只是其中一条，至于另一条，它的名字对于大家来说，就显得颇为陌生了。

这条与西昆仑山脉平行的山体叫作“萨雷阔勒岭”。从名字的后缀来看，它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应该都不如西昆仑山脉。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央之国来说，萨雷阔勒岭却有着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因为这条山脉几乎就是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行政分割线。从地理结构上说，萨雷阔勒岭的山脊就是东、西帕米尔高原的地

理分割线。这也就是说，中、塔两国各自得到了东、西帕米尔高原。这种格局也意味两国之间实际达成了地缘平衡。在苏联时代，中、苏双方在帕米尔高原，也正是以萨雷阔勒岭的分水岭作为实际控制线的。

如果不考虑中央之国曾经完全控制过帕米尔高原的历史，单以萨雷阔勒岭来地缘分割帕米尔高原的话，目前中、塔双方在此议定的边境线，可能还会更有利于中国方面的。因为有分析表明，根据中塔两国最新签订的边境条约，中国得到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约 1000 多平方公里的塔吉克斯坦实际控制区。然而根据目前中国官方认可的天地图网站<sup>1</sup>，目前还看不到类似变动（谷歌地图曾在 2011 年做出过改动，但现在又改回原来未定界了）。

在边界纠纷中，有一种情况是因为山脊线并没有完全承担分水岭的功能而产生的。像太行山脉内部由于断裂现象存在，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以至于很多发源于山西高原腹地的大河（比如漳河、滹沱河），最终穿越太行山，流向了华北平原。太行山脉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在地缘上的好处就是为山西高原与华北高原之间，提供了直接沟通的通道，所谓“太行八陉”就是依附于这些穿山而过的河谷而存在的。然而这种地理现象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精确定位行政边境的情况下，某些山脊线与分水岭线不吻合的地方，极易造成纠纷（尤其是这些地区原属无人区的情况下）。像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领土争端，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

不过，萨雷阔勒岭的山脊线倒是与分水岭线相吻合的。精于地缘政治的苏联人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它与中国的边境。至于今天的中、塔边境到底做了什么修正，我们还是以官方最终确定的版本为参照比较好。好在我们的解读重点，并不是所做的这些战术调整。在整体上确定了萨雷阔勒岭的地缘分割作用，就已经足以让我们理解帕米尔高原的大结构划分了。

### 第三节 蒲犁国位处塔什库尔干裂谷带

尽管我们经常把一个地理单元简单归类为高地或者低地，但实际上，即使是那些被赋予高地属性的板块，其核心地区也还是那些相对低地。从这点来看，东帕米尔高原的核心地带，相比它的邻居就要平缓和开阔得多了。即使是在一般比例的地形图上，我们也能够在西昆仑山与萨雷阔勒岭之间看到一条明显的狭长型谷地。这条谷地的存在，也使得西昆仑山脉得以独立与昆仑山脉对接成功。如果一定要将华夏文明的源头追溯到西昆仑山的话，那么这条被我们命名为“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相对低地带，才是最有可能成为华夏之根的地理单元（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这

---

1 “天地图”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建设的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



一荣誉应该归属于湟水河谷）。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得名，是因为红色中国以它的南部为核心建制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一地理单元，只是在上世纪才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谋得一席之地。实际情况是在张骞凿空西域的时候，这一区域就已经有所谓的“国家”存在了。这个游牧于高山牧场的行国叫作“蒲犁”。



葱岭地缘结构图

蒲犁国的“王治”在汉书中被称之为“蒲犁谷”。我们今天也可以用这个标签，来为整个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命名。就像休循人的王治“鸟飞谷”之于“阿赖谷”一样。从地形结构上来看，蒲犁谷算得上是整个帕米尔高原上最为开阔的地理单元了。鉴于地理环境所限，天山南麓的游牧行国人口比之相邻的绿洲城国都要少。相比之下，拥有 5000 人口的蒲犁国已经算是游牧“大国”了。

西昆仑山——萨雷阔勒岭相夹而形成的狭长纵谷结构，很容易让我们意识到，谷地中心应该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穿越而过，并以此为核心支撑了蒲犁国的存在。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谷地的最低处的确汇集成了部分河流，但这些河流最终却并没有汇成一条大河。从结构上来看，被我们以塔什库尔干标注的这条裂谷带，实际上分为南北两部分。今天真正被塔什库尔干所辖的地区是裂谷带的南部。

这段裂谷中的河流，也并非是一个方向流动，而是由南北两端方向相对而行，沿途收集两侧山地流淌下来的淡水之后，在今天塔什库尔干县城所在地合流，再往东穿透西昆仑山脉向塔里木盆地方向流去。就塔什库尔干河这个标签而言，后来并



没有出现在塔里木盆地。因为在即将穿透西昆仑山脉之时，它汇入了另一条源自喀喇昆仑山脉，由西昆仑山脉与昆仑山脉相接处穿出的河流。这条河流就是塔里木河五大源头之一的“叶尔羌河”。也就是说，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南部，实际上是叶尔羌河的集水区。

确认一个地理单元的流域归属，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鉴于河谷通常是天然通道的所在（无论陆路还是水路），生活在相同流域的族群往往会有更多的地缘联系，并更容易被拥有共同种族、文化背景的族群所覆盖。塔什库尔干裂谷带与叶尔羌河相连的情况，也直接影响到了它的地缘结构和地缘价值。



塔吉克族

今天我们审视整个南疆的种族、文化结构，基本可以将之定位为一个东、西混合体，越往西部，西来的基因所占的比例越高。就这个趋势来说，最容易被大家所观察到的，就是人种上的差异了。作为整个南疆地区的最西点，覆盖东帕米尔高原的“高原塔吉克人”，也被认为是红色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最具高加索人种特征的民族。不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地缘结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渗透、博弈，以及融合而成的。在两千多年前，当张骞的脚步出现在这片土地时，整个西域和葱岭的地缘结构并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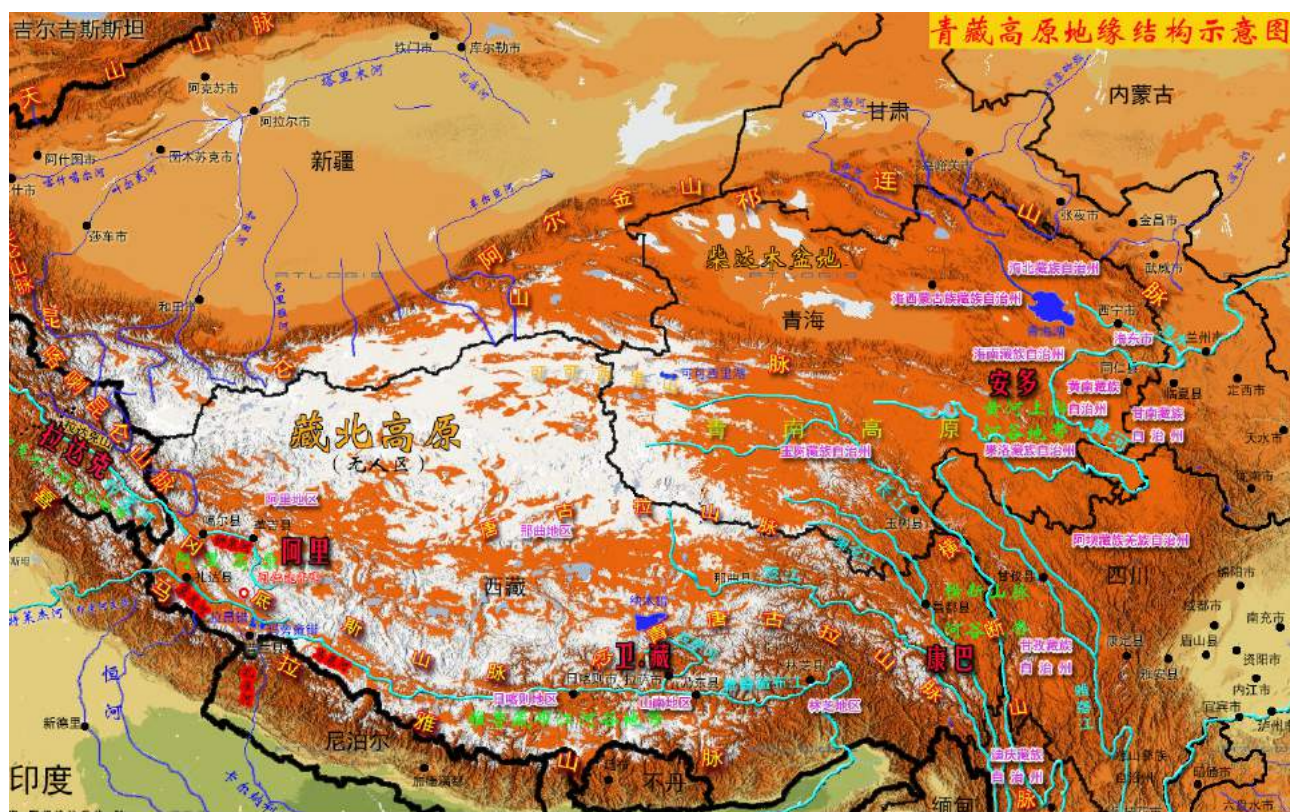
我们在分析整个西域——中亚板块的博弈时会有一种感觉，即来自东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两大游牧体系一直是作为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出现的。整个天山南北的族群（包括定居民族）都是这两大体系反复渗透、沉淀而成的。只是在汉帝国引领华夏文明出现在西域之时，这片土地才算是迎来了第三方的参与。然而当我们把研究方向指向塔里木盆地时，却发现来自东亚的华夏族却并非是“第三者”，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一个与之有着很深亲缘关系的族群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呢？看看塔里木盆地的地理结构就知道了。我们通常把整个中亚、西域称之为天山南北，而天山山脉也的确是整个地区的核心所在。不过，具体到北疆的准噶尔盆地，阿尔泰山就有着与天山同等的地缘价值了。那些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正是透过阿尔泰山渗透



天山南北的。至于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也同样存在与天山山脉竞争的山地，这就是盆地南部边缘的昆仑山——阿尔金山山脉。

阿尔泰山脉背后所依靠的是蒙古高原；而昆仑山——阿尔金山所依靠的则是青藏高原。如果说来自东、西干草原的游牧民族在竞争天山南北的控制权时会更有优势的话，那么青藏高原之于塔里木南部边缘的地缘优势，也同样明显。来自青藏高原的族群，参与竞争塔里木盆地控制权的典型案例，出现在中央之国再一次渗透西域的唐帝国时期。当时从这片高原下来的族群，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藏族祖先——吐蕃人了。



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

吐蕃人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的时期，固然是青藏高原最为辉煌阶段，但他们并不是最早从青藏高原渗透塔里木盆地的族群。与汉、藏民族形成有密切关联的“羌”才是最先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黄种人。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这些相对中原来说，算作西方民族的“羌”，曾经长期承担了输血作用。至于今天覆盖青藏高原的藏民族，也同样经历过一个反复吸收、融合羌系部落的过程。

应该说，自吐蕃由青藏高原南部崛起的那一刻起，生存在第一、第二阶梯相接地区的“羌”系部落，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过在此之前，包括我们现在重点解读的汉帝国时代，羌系部落还是有很大空间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在我们所熟知的三国故事中，那些来自陇西、河湟、川西高原的羌人，就曾经多次

直接参与中央之国内部的政治博弈（比如马超、姜维得以成名，都是因为能控羌人）。

基于中央之国的位置，我们会比较熟悉羌人向东渗透的那些故事。但这并不是他们扩散的唯一路径。原始属性为游牧的羌人，也同样向西移动。他们在覆盖今天的青海地区之后，出现在了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当张骞出使大月氏时，这些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羌系部落，有多少占据了那些山前绿洲，转而从事农耕生活，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迷。从地缘位置来看，塔里木盆地最早的农业文化，应该是由那些由西方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族群带入的。在二千多年前，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绿洲族群，出现高加索民族基因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融合了羌人基因后，呈现混血状态）。不过，汉帝国的使者们这一时期所看到，游牧于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的部落，却还是纯粹的羌系部落（详细的地缘政治结构，我们后面会分析到的）。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那些高加索人种的塞人开始向天山腹地渗透，并最终在天山南麓那些山地牧场建立休循、捐毒、尉头等“与乌孙同俗”的游牧“国家”时，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那些环境更为恶劣的牧场（降水更少），是被蒙古人种的羌系部落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位于两大山系之间，塔里木盆地西侧的“西昆仑山脉”，以及它背后的帕米尔高原，就很有可能成为两大游牧体系的碰撞之地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叶尔羌流域中上游地区那些适合游牧生活的土地（包括今天被高加索人种的塔吉克人所占据的“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南部地区”），当时还是羌族部落的覆盖区。这也使得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游牧格局，在两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个符合几何原则的地理分割线。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西昆仑山脉的中点，可以作为塔里木盆地南、北分割线的西部基点。而叶尔羌河流域就是南部水系的西部起点。

在汉帝国后来所划定的丝绸之路路线中，蒲犁国以及叶尔羌河流域国家，也是被认定为丝绸之路南线国家的。而在清帝国统治帕米尔高原时，塔什库尔干地区也位列八帕之列，被称之为“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塔格敦巴河即为“塔什库尔干河”）。至于其他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北部地区，以及西帕米尔高原，在相隔两千年时间后，地缘结构上有何变化，我们下节再分析。

#### 第四节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北段的地理结构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南段的情况，我们已经大致清楚了。在不同视角下，它会以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人自治地区、蒲犁、塔什库尔干河——叶尔羌河等标签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现在的话，我们需要顺着裂谷带向北，去看看裂谷带的北段又会出现哪几个地缘标签。

以地形和水系结构来看，北部这段裂谷几乎是南部的翻版。一北一南两条相对而流的河流，在汇集之后再向东穿透西昆仑山脉，注入塔里木盆地。这两条河流当中，



北边的那条叫作“木吉河”，南边那条唤作“康瓦西河”。两河相汇之后，合流而成的河流则叫作“盖孜河”。盖孜河这个名字，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并不熟悉。不过可能有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个标签在我们之前排列喀什噶尔河七条上游源流时曾经出现过。没错，盖孜河就是喀什噶尔河的上游河流之一（水量排第二）。

每一条河流，都有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地理单元。喀什噶尔河的另外两条支流：恰克马克河以及克孜勒河，已经分别把我们带到了吐尔尕特山口、伊尔库什坦山口前，并为西行的旅人连通了费尔干纳盆地东、南两面的：纳伦河上游谷地、阿赖谷。现在，盖孜河又将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一路西行的旅行者，带到了东帕米高原的核心地带——塔什库尔干裂谷带。



葱岭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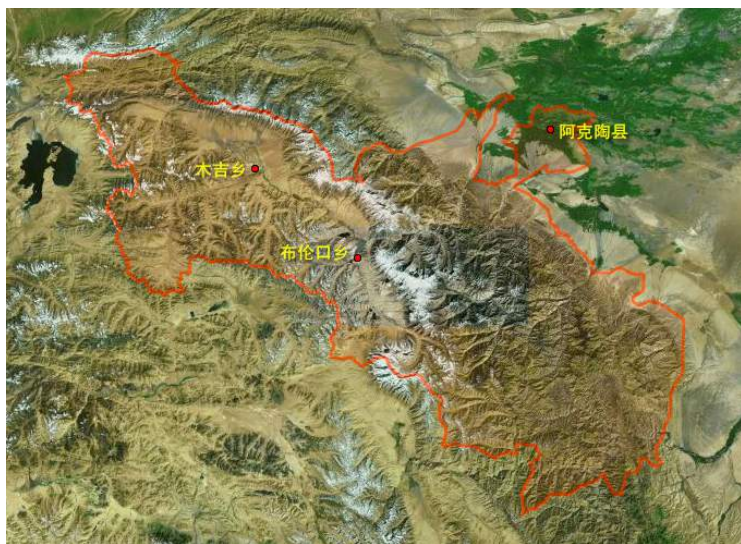
喀什噶尔河所指向的丝绸之路，无疑是丝绸之路北线（塔里木盆地范围内）。这也意味着当年试图从北线登上帕米尔高原的人，会溯盖孜河谷而上，进入这条东



帕米尔高原的核心地带。这样的话，盖孜河上游所覆盖的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北段，在地缘结构上也应该属于丝绸之路北线的一部分。前面我们解读的隶属叶尔羌上游“塔什库尔干河流域”的裂谷带南段，可以算是丝绸之路南线的西点。

这种南北相接的结构意味着，整个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实际上成为了南、北丝绸之路的交汇点。理论上，你既可以沿塔什库尔干河上溯至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县，再向北接入盖孜河流域，向东回到塔里木盆地；也可以反方向在丝绸之路南、北两线中转换。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应该很少有人会没事这样转圈玩。但这种一谷双流域的结构，的确让整个裂谷带在通路方面有了更多的组合选择。也由此提升了整个板块的地缘价值。

尽管我们从地形结构认定，整条裂谷带应该可以视为同一地理单元。但南北两端分属不同水系的情况，也使得裂谷带面临被分割为了两个地缘板块。就现有的行政区划、族群覆盖来说，也显示出了这个结果。如果裂谷带北段，也如南段那样以其为核心，建制了一个县级行政区的话，这种地缘分割应该会更易让大家理解。只是以现有的行政区划来说，裂谷带的北部并没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区的核心地带，而是隶属于“喀什三角洲”西南部的。



阿克陶县地图

如果不是因为有盖孜河下游、塔里木盆地边缘的这片绿洲（阿克陶县城所在地）。阿克陶县其实也和塔什库尔干县一样，是一个以裂谷带为核心的山地行政区。在有了平原绿洲加入之后，占据阿克陶县面积绝大部分的东帕米尔高原部分，就只能退而成为配角了。建制于北部裂谷带腹地的，是两个乡镇级的行政区。即北边木吉河谷的“木吉乡”；南边康西瓦河谷的“布伦口乡”。我们其实为公平起见的话，被我们

称之为“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这个地理单元，更应该被称之为“木吉——塔什库尔干裂谷带”。有了南北两点定位的话，此地缘标签所指向的地理单元会更为清晰。

需要注意的是，盖孜河上游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一带，并没有像塔里库尔干河流域一样，出现一个人口聚居的城镇（塔什库尔干县治所在）。这主要是因为环境所致，因为盖孜河谷一方面把葱岭之水带入了塔里木盆地，另一方面也因为狭管效应，把塔里木盆地风沙卷上了这片高原。由于遇到萨雷阔勒岭的阻挡，这些被吹上来的沙尘刚刚进入开阔地带就沉淀了下来。如果我们从今天的 314 国道沿着古人的足迹



穿越山口进入本来成为三角洲平原的木吉河——康西瓦河河口地区之后，就会发现一片白沙堆就的“白沙山”，以及一滩白沙垫底的“白沙湖”。



木吉河——康西瓦河河口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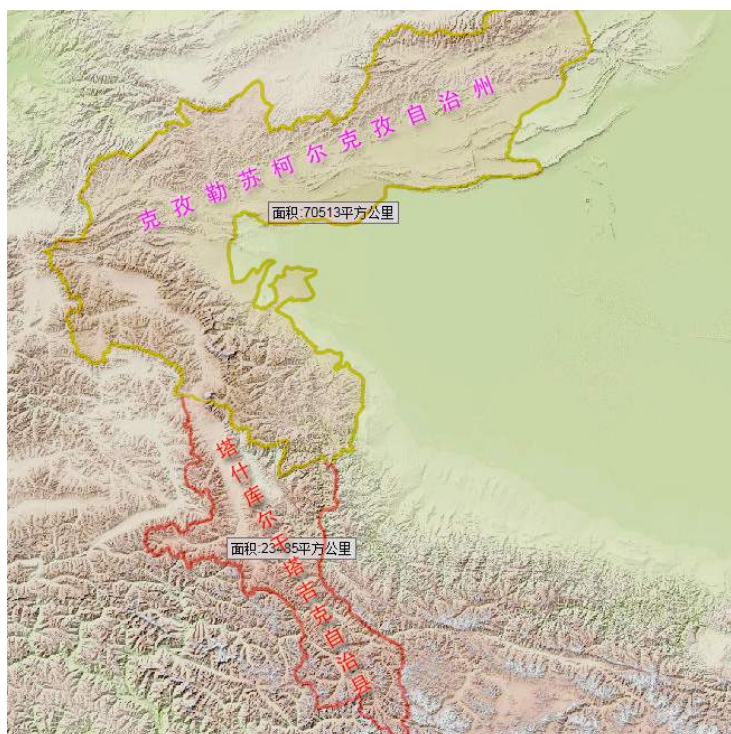
白沙山和白沙湖

这些来自塔里木盆地的风沙，显然对整个裂谷带北段的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地理核心没有成就地缘核心的现状，也应该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建制造成了直接影响。以至于今天，东帕米尔高原北部的这片山地，只能成为山下绿洲的附属板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以理解成这片山地傍上了“大款”。最起码如果单纯以阿克陶县和塔什库尔干县的各项数据来对比的话，阿克陶县肯定是完胜了。比如后者 3.3 万的人口数量，只有前者（17 万多）的五分之一不到。只不过，大家不要忘了，农业绿洲在承载人口上的巨大优势。抛开阿克陶县城所在的盖孜河下游绿洲不说，东帕米尔高原北部

所承载的人口数量，与南部基本是同一数量级。也就是说，塔什库尔干裂谷带，以及整个东帕米尔高原的南、北部分，在各项地缘指标上，都呈现出惊人的对称状态。

今天我们说裂谷带南、北两段，呈现出了明显的地缘分割状态。并不仅仅是从行政分割而导出的结论。事实上，行政分割只是地缘分割的结果罢了。直接让我们受到这种地缘分割的因素，还在于地缘因素中最重要指标：“人”的因素。因为这片被阿克陶县所辖的山地，并不是被我们认定为，高加索属性明显的高原塔吉克人所覆盖。现在成为这些山地牧场主人的，是那些与吉尔吉斯人同族的突厥系的“柯尔克孜族”。

这样看来，“阿克陶”这个名字，应该也要在前面冠以一个柯尔克孜族的前缀，以及一个“自治县”的后缀，才能更准确的反映它的地缘属性了。不过，在具体的行政设定中，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阿克陶县和它北部的乌恰县、阿合奇县一样，是更高一级的行政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一部分（悲剧的是，由于行政区中加入了下游绿洲，整个阿克陶县中人口占优的其实又不是柯尔克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南北分属的行政区



塔吉克族



柯尔克孜族

孜人，而是绿洲农业属性的维吾尔族了）。

从地缘博弈的角度来看，突厥系的柯尔克孜族与欧洲基因明显的塔吉克人，分别代表的是源自东欧、北亚的游牧势力。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博弈，也始终贯穿于天山以北地区的地缘结构变化中。双方在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竞争，只是这种博弈过程的一个现实结果。这种竞争，可以说起至我们现在所解读的历史时段。正是大月氏、乌孙，以及背后驱动他们的匈奴人，在逼迫欧洲游牧体系的塞人一步步西迁。并最终让那些来自欧洲的游牧基因，只能在帕米尔高原一带继承下来。

今天在东帕米尔高原，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西部山地所出现的这一幕，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也同样出现过。只不过那时强势渗透塔里木盆地和葱岭的，是代表欧洲游牧族群的“塞人”。至于防守方，自然就是那些从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南缘而来的“羌”系部落了。这看起来，更像是纯粹的欧亚，或者说黄白之争（代表北亚势力的游牧体系在混杂了塞人血统后，融合成了混血的突厥系民族了）。在张骞踏上葱岭之时，因为有了蒲犁国这个羌系部落在裂谷带的存在，看起来在争夺葱岭这座天王山的博弈中，代表蒙古人种的羌系部落，暂时还算稳住了阵脚。然而就整个竞争趋势来说，优势无疑是拥有天山山地草原这个大后方的塞人部落的。就像今天的



突厥系游牧民族能够对塞人后裔的塔吉克人，占据绝对优势一样。

相比之下，羌系游牧部落要想保住在葱岭的存在，要比塞人困难得多。因为从天山北麓山地草原一路败退下来的塞人，还能够在吐火罗盆地，乃至粟特地区保有一些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土地作为缓冲之地。而被天山山脉阻挡了西风的昆仑山——阿尔金山一线，能够为葱岭之上的羌人，所能提供的后援就十分有限了（天山北麓能成就几十万人口乌孙，昆仑山——阿尔金山北麓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了）。事实上，就葱岭这样南、北交汇的枢纽来说，塞人游牧体系的渗透、影响在汉帝国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至于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帕米尔高原上的其他地区是否已经出现了塞人游牧部落，我们后面再接着分析。



葱岭地缘结构图

## 第八章 西帕米尔高原的地缘结构

### 第一节 无雷国位处西帕米尔高原

在研究一个地缘板块时，河流总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那些地形复杂的山地，将河流标示出来更能够让我们知晓它的地缘结构。如果按水系划分东帕米尔的话，东帕米尔实际上被分为了南、北两块。即南边隶属叶尔羌流域的“塔什库尔干河”；北边归入喀什噶尔河上游的“盖孜河”。至于西帕米尔的情况，则要更简单一些。外阿赖山分水岭南侧的河流，都被一条从沿西帕米尔高原东、南边缘流淌的河流——喷赤河给收集走了。而喷赤河通常被认为是阿姆河的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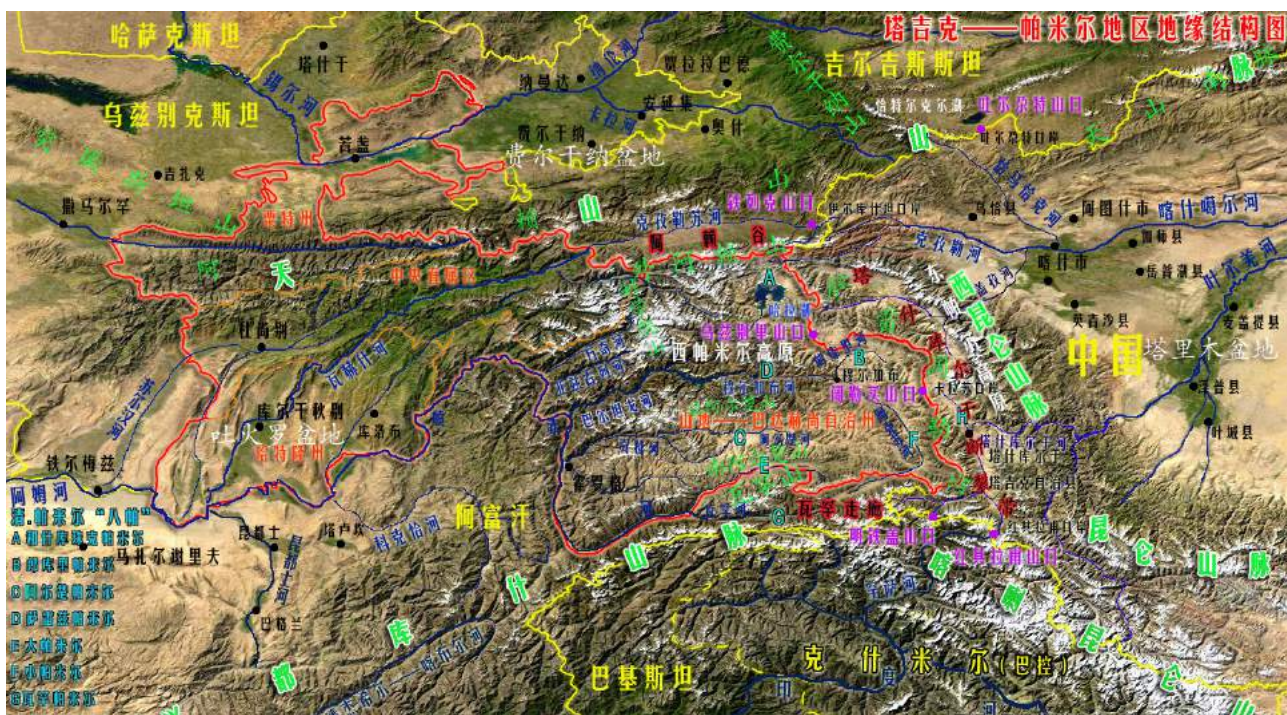
这种水系结构，事实上让萨雷阔勒岭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兼地缘分割线。岭东的河流注入塔里木河，并最终迎合了中央之国“大河向东流”的思维惯性（甚至可以被臆想为是黄河的源头）；岭西的喷赤河——阿姆河流域，则被古人认定为最终归入了西海（实际上只是个叫“咸海”的咸水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之国在心理层面上会更容易将萨雷阔勒岭作为自己的西部极点。同样的，那些自西向东控制帕米尔高原的政治家，也会认为萨雷阔勒岭是一条很好的地缘平衡线。

除了萨雷阔勒岭这条东、西帕米尔高原的分割线以外，为帕米尔高原寻找边界，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西昆仑山脉的存在，让东部的这项工作变得非常简单。要是以这个标准来看，阿赖山的东段也可以拥有和西昆仑山脉一样的属性，即作为帕米尔板块的北部边界。然而问题在于，阿赖山和阿赖谷很明显和天山山脉腹地诸板块关系更近（特别是费尔干纳这块精华之地）。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从地理角度还是地缘角度看，处于天山山脉南部的阿赖谷并没有像“塔什库尔干裂谷带”那样，被视为是帕米尔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天山山脉西南板块存在。这也正是阿赖谷现在归属吉尔吉斯斯坦，而不是塔吉克斯坦的根本原因所在。

相比北、东两侧，为帕米尔高原的西侧寻找边缘的工作要困难一些。因为帕米尔高原在这个方向，实际上是缓缓伸入吐火罗盆地的。这使得高原腹地和盆地之间，有大片缓冲的坡地存在。而喷赤河谷恰恰是处在高原腹地与缓冲坡地之间。如果说喷赤河以西的山地在维持人类生产生活上可以用“适合”来概括的话，那么喷赤河谷以东的高原腹地，就基本只适于用“支撑”来概括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南北流向的这段喷赤河谷，作为“帕米尔”板块的西部边界（准确说是河谷西侧的山脉）。这点在塔吉克斯坦今天的行政版图上也可以看出，外阿赖山以南、喷赤河以东，萨雷阔勒岭以西的高地，被作为高原塔吉克人的保留地（也就是帕米尔人）而建制为了“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喷赤河以西的帕米尔高原西坡山地，则归属了阿富汗同样叫作“巴达赫尚”的省份）。



从地缘角度来说，我们所说的“西帕米尔”地区，基本上也就是指向今天的“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既然今天的西帕米尔高原能够独立建制为一个省级行政区，那么在二千多年前，这里也没有理由是一片无人之地（尤其是东帕米尔高原，已经出现了蒲犁国的情况下）。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当时游牧于西帕米尔高原的这个国家被称之为“无雷”。



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地缘结构图

每一个所谓的“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核心领地的，无雷国也不例外。只是汉书中这个游牧行国的“王治”之名有些特别，因为它并不是指向一条河谷（比如鸟飞谷、衍敦谷），而是被命名为一座城——“卢城”。对于一个规模不大（7000人）的游牧部落来说，这显得有些特别。以游牧民族来说，如果要建固定地址的“城”，大致会有两个原因：一种是出于在部落联盟中树立政治威信的需要（对于统辖诸多部落的，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来说）而设立的。比如乌孙的赤谷城、匈奴的龙城；而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最大的可能就是用来控制交通要道，并在保障军事安全的同时获得额外的商业利益。

游牧的无雷人为什么会拥有一座城，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就对于这个高原部落来说（也可能是部落联合体，），最为重要的还是那些能够游牧的草原。另外，无论出于政治还是商业因素，建城的地点也不会远离这些草原的。因此，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看看西帕米尔高原的河谷草原，空间是如何分布，又有哪条河谷，有机会成为核心之地。

如果喷赤河谷足够宽阔的话，它无疑会成为西帕米尔高原的核心所在，就像塔

什库尔干裂谷带在高原东部的作用那样。问题在于，帕米尔高原地势“西高东缓”的走势，并不仅仅适用于东、西帕米尔高原的比较。就西帕米尔高原的情况来说，也同样遵循着这个规律。西部（尤其是西北部）山地交错，山脉海拔动辄 5000 米以上，顶上为大片冰川所覆盖。

对于吐火罗盆地，乃至图兰低地来说，帕米尔高原上的这些冰川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如果没有这些冰川存在，阿姆河也不可能有中亚第一的水量。然而对于身处帕米尔高原的游牧民族来说，太多的冰川和太复杂的地形，显然不是件好事。正因为如此，这段被我们视作帕米尔高原西部边界的喷赤河谷，本身并没有发育出宽阔的河谷地带。而真正能承担游牧民族希望的草原地带，主要是集中在东部那些靠近萨雷阔勒岭的河谷。

既然帕米尔人的草原主要在西帕米尔高原的东部，那么寻找无雷国的游牧之地也就在东部那些河谷之中了。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已经很难从汉朝留下来的那点文字中找到希望了。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的，是清帝国在帕米尔高原上设置的“八帕”。

## 第二节 和什库珠克帕米尔位处喀拉湖地区

所谓“八帕”，我们在前面已经罗列过了。除去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我们需要了解另外七个“帕米尔”的地缘结构。由于西帕米尔高原的山脉、河谷，大体上都是呈西——东走向，并最终汇流入围边的“L”型流向的喷赤河，所以我们可以以阿赖山南麓作为起点，一路向南，看看这七帕都是依附哪条河谷而存在的。

最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水域并不是一条河流，而是一个叫做“喀拉湖”（全称“喀拉库利湖”）的湖泊。这个在西帕米尔高原东北角的湖泊是帕米尔高原乃至整个塔吉克斯坦境内最大的湖泊。在周边冰川的补给之下，即使喀拉湖是个盐湖，那些汇入它的河流，也足以在湖畔低地形成连片的水草丰美之地的。在八帕当中位置最北的“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就位于喀拉湖地区。

对于西帕米尔高原来说，喀拉湖存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提供了一片草原。我们很容易在卫星图上发现，整个外阿赖山的西部远比东部要“厚”得多。阿喀拉湖盆地的存在，极大的削“薄”了外阿赖山的东段，使整个西帕米尔高原腹地与阿赖谷，乃至费尔干纳之间的交通变得更为通畅。那条沟通阿赖谷与费尔干纳的 M41 公路，也正是在喀拉湖的北部穿透外阿赖山，从喀拉湖东侧而过，沿萨雷阔勒岭西侧向西帕米尔高原南部延伸。

如果外阿赖山东南麓不是有喀拉湖盆地这样一块低地（而是像西段那样被纵深上百公里的冰川所覆盖），那么阿赖谷与西帕米尔高原之间的交通，很有可能就要转由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北部中转了。有一种说法是，这个直径约 45 公里的湖盆是由



一块陨石砸出来的。对于这个说法，我们目前无法考证。不过喀拉湖在阿赖山与萨雷阔勒岭夹角处的存在，的确使得喀拉湖盆地有机会成为沟通阿赖谷与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枢纽地区。

就穿越萨雷阔勒岭，沟通东、西帕米尔地区山口来说，最为知名应该算是“乌孜别里山口”了。这个山口的位置并不是在喀拉湖的正东，而是在其东南方向。不过，当我们越过山口，顺着接应的河谷行走的话，就会发现河谷所指向河流和道路，最终所指向的正是喀拉湖盆地（也就是说，乌孜别里山口西侧所对应的河流，属于喀拉湖流域）。



葱岭地缘结构图

乌孜别里山口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政治分割点。在 19 世纪末，清帝国与沙皇俄国议定帕米尔高原的国境线时，曾经以乌孜别里山口为分界线，大致沿萨雷阔勒岭的分水线划定了北部的分界线。至于南部，则模糊约定了中国方面的国境线一直向南，而俄方国境线偏向西南，两线之间的三角形地区则为待定区域。这样带有强烈欧洲殖民风格的划界方式，我们并不陌生。在非洲乃至美洲，欧洲人曾经多次这样分割过殖民地，并让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留下诸多横平竖直的国境线。然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向来不会认为这种机械分割的做法是严谨的。对于他们来说，分水岭才是真正的地缘平衡线。

事实上，在帕米尔高原上以直线来划定国境线，的确只能算是权宜之计。相信已经完整得到喀拉湖地区的俄国人，在和清帝国议定这条未定线时，就已经谋划好了以萨雷阔勒岭分水岭为中、俄双方的政治分割线了。而这也成为了后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问题是，在此之后，中、俄之间并没有新的条约来确定乌孜别里山口以





喀拉湖卫星图



喀拉湖

南这条看似更符合地缘分割原则的国境线。也正因为如此，一直有人认为，俄国人在萨雷阔勒岭以西，非法侵占了中国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像唐努乌梁海归属的认定一样）。

中俄（塔）之间在帕米尔高原上的种种恩恩怨怨，如果要细写起来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并不是现在的分析重点。我们的重点在于解读喀拉湖盆地，让我们了解这个板块在西帕米尔高原内部的地缘价值。基于喀拉湖盆地北连阿赖谷，东通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地缘位置，如果无雷国所设定的都城——卢城是在喀拉湖流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尽管喀拉湖流域看起来有着卓越的地缘位置以及生存环境，但我们还是不能确定它就是无雷国的核心之地所在。因为在萨雷阔勒岭的西部还有多条适宜游牧的河谷参与竞争。单从所谓的“八帕”之说来看，最起码就还有六条河谷等待我们去解读。至于这些河谷的地理位置如何，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郎库里帕米尔和小帕米尔的位置

尽管喀拉湖流域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但它的草原面积却并不突出。那些能够支撑游牧民族生存的草原，主要分散在外围那些隶属喀拉湖流域的河谷中。从这一点上来说，喀拉湖流域的人口潜力并不比它南边那些河谷更大，也不会是无雷国王城的唯一选择。

离开喀拉湖流域之后继续向南，另一条发源于萨雷阔勒岭西坡的河流将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条流程并不长的河流叫作“郎库里河”。仔细看过前面内容中所罗



列的八帕名称的话，就会在其中发现一个叫作“郎库里帕米尔”的帕米尔。很显然，郎库里河谷就是郎库里帕米尔的核心谷地。对于特别关注中国边境线变化的朋友来说，郎库里河和郎库里帕米尔应该要特别关注一下。因为据称中国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萨雷阔勒岭西麓得到的大约 1000 平方公里塔吉克实占领土，就是在郎库里河流域的东部（靠近分水岭的狭长地带）。如果消息属实的话，也可以认为中国在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又得到了部分郎库里帕米尔。



葱岭地缘结构图

郎库里河在西出萨雷阔勒岭之后，很快就会遇到另一条从瓦罕走廊北上而来的河流——阿克苏河。写到这里，估计有些朋友已经晕了。怎么又出现一条阿克苏河？其实这也实在是没办法。我们在中亚——西域部分解读过的很多标签，都会有重名兄弟出现在从小亚细亚半岛到青藏高原的范围之中。由此而引发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百度百科，在这类大家都可以参与编辑解读的文章中，经常会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发生）。

贴着萨雷阔勒岭北上的这条阿克苏河，几乎纵穿了半个西帕米尔高原。宽阔的阿克苏河谷，不仅能够成为南北连接喀拉湖地区与瓦罕走廊的重要通道。也意味着，阿克苏河谷的东侧，出现对接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南段的山口（塔什库尔干河上游），在数量上会很有优势。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曾经被往来于萨雷阔勒岭两侧的牧民所利用的山口，数量上多达数十个。不过我们也经常说，在地形复杂、环境恶劣的山地当中，那些可能通行的山口并不都会开辟成真正的道路（所谓“官道”）。从控制和维护角度来说，某一时期一般只会有一个山口会被正式开通（比如那些秦岭

古道)。至于其他能被利用的天然通道,除了当地居民会默默无闻的利用以外。要想青史留名的话,大多数时候只能是在战争中,以“小路”的身份被攻击的一方所利用了。

我们很难知道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阿克苏河谷与塔什库尔干河流域之间,究竟有哪些山口曾经被往来的商旅、使者利用过。不过,今天中、塔两国在这一线上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却是可以标定的。这个位于塔什库尔干县西北部,被中国方面称之为“卡拉苏口岸”的通道,目前也是中、塔之间唯一开通的口岸。而翻越中塔边境,或者说萨雷阔勒岭分水岭的山口,则被称之为“阔勒买山口(kulma pass)”。基于阿克苏河谷的位置以及纵深,这一地区并不可能被游牧部落所忽视。在清帝国控制帕米尔高原时期,阿克苏河谷地区(核心地区在南部靠近瓦罕走廊部分)被称之为“小帕米尔”。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搞清了萨雷阔勒岭西麓的地缘结构。清帝国在相当于西帕米尔高原东部三大板块:喀拉湖流域(北)——郎库里河谷(中)——阿克苏河谷(南),分别设立三个军事据点(时称“卡伦”),应该说是非常符合地缘规律的。理论上,今天的中、塔双方也应该以此为基础,打通最少三条连接东、西帕米尔高原的通道。事实上,中塔双方除了阔勒买山口以外,在中、北部也的确有通道相连。比如木吉河和康瓦西河流域,就分别有道路对接郎库里河谷。至今没有开辟成通商口岸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郎库里河谷一线那未定的国境线吧。

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内容当中,萨雷阔勒岭两侧四个“帕米尔”,已经分别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接下来我们将改变方向,由萨雷阔勒岭西麓开始向高原西侧推进,去看看还有哪些河谷要地,值得清帝国以“卡伦”的形式进行布控。

#### 第四节 萨雷兹帕米尔位处穆尔加布河谷

我们已经在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解读了很多河流,相信有机会前往西域的朋友,也会希望亲身看到这些承载了历史和人类希望的河流。不过真的身临其境,也许会很失望,因为你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条干涸的河谷。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地区所接受的湿润水汽主要来自大西洋方向的西风带,因此受高原西部高大山地阻隔的帕米尔高原东部,以及结构更为封闭的塔里木盆地的降水量本身都很少,像塔什库尔干一带的谷地年降水量不过才70毫米(裂谷带北部更少,只有30毫米左右)。这种降水条件使得整个区域内的很多河流本身就是季节河;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这些年人类大规模的在低地兴修水库、进行农业开发,使得很多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河流,实际上已经没机会继续向前延伸了。

好了,让我们把视线重新聚焦到西帕米尔高原那些河谷中来。过度农业开发这件事,在这片高原上暂时还未出现。但这些河谷地表水资源本身的不尽如人意,对



当地居民的影响还是巨大的。高海拔和降水的稀少，使得整个帕米尔高原上都很难见到乔木甚至灌木。那些依靠高山雪水补给而顽强生长的草本植物，也无法使得我们在地形图上所看到的河谷低地都变成水草丰美的草原。当然，对于生活在高原之上的帕米尔人来说，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环境而生的。只不过，恶劣的环境在增加他们转场次数、转场范围的同时，也极大限制了帕米尔人口潜力。



帕米尔高原



萨雷兹湖

从水系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郎库里帕米尔与小帕米尔之间的地缘关系应该是很紧密的。两条河谷一个西南方向，一个向东北向，最终相汇成为了一条河流——穆尔加布河。以穆尔加布河所处的位置来说，这条西向注入喷赤河的河流几乎可以说是整个西帕米尔高原的中轴线（东西向）。单从这个角度来说，穆尔加布河谷以及郎库里河——阿克苏河相汇之处（目前建制于此的城镇就叫“穆尔加布”），都应该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帕米尔八帕的划分当中，穆尔加布河谷也的确没有被忽视，萨雷兹帕米尔正是指向这条帕米尔高原的中轴线。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穆尔加布河谷找到“萨雷兹”这个地缘标签。在穆尔加布河的下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水域面积仅次于喀拉湖的中继湖——萨雷兹湖。很多时候，我们弄不太清一些前缀相同的地缘标签所产生的先后顺序，就像我们搞不清先有鸡还是还有蛋这个千古谜团一样。不过萨雷兹湖的得名，倒是可以肯定是来自“萨雷兹帕米尔”。因为这个因地震造成山体滑坡而形成的堰塞湖，形成的时间仅仅是在 100 年前（1911 年）。



葱岭地缘结构图

由于地质的不稳定性，萨雷兹湖一直是困扰下游吐火罗盆地数百万居民安全的大问题。很显然这个最深处超过 500 米，长度接近 60 公里巨大淡水湖，自然形成的坝体一旦崩塌，受影响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平原塔吉克人了。身处阿姆河两岸的阿富汗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都有可能瞬间遭遇灭顶之灾。当然，从技术角度看，如果解决的好的话。这座天然水库所蓄积的巨大淡水量，也可以被用来发电、灌溉，造福于人类。至于萨雷兹湖的存在到底是福是祸，就看人类怎么做了。如果没有萨雷兹湖的存在，穆尔加布河这条中轴线，应该是很有机会打通一条横贯西帕米尔高原的交通干线的。从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条交通线可以将人们从西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引领至高原西部的喷赤河谷。就这一点来说，没有



堰塞湖困扰的古人，无疑已经意识到了。

事实上穆尔加布河谷所指向的东部地区，并不仅仅只有郎库里、阿克苏水系。因为西帕米尔东北角的喀拉湖水系也同样拥有与穆尔加布河相通的通道。虽然喀拉湖的盐水湖属性，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只进不出的终端湖。但事实上，每到丰水季节湖中之水还是有机会溢出，并通过一条叫做 kokuybel 的河流，向西南方向渗透。

而当这些喀拉湖之水到达帕米尔高原中部时，迎接它们的的就是穆尔加布河。也就是说，穆尔加布河相当于整个萨雷阔勒岭西部地区淡水的终极收集者了。不过，拥有巨大流域面积以及卓越地理位置的穆尔加布河，很有可能没机会竞争西帕米尔高原母亲河的称号。因为在与喀拉湖之水会合之后，穆尔加布河最后注入喷赤河的这段下游河道，名字就转换为“巴尔坦格河”了。

## 第五节 巴尔坦格河以北科学院山的特点

以地缘结构来说，萨雷兹帕米尔的覆盖范围，也并没有指向下游的巴尔坦格河。从以下游河道之名为整个水系命名的惯例来说，巴尔坦格河或者巴尔坦格水系，才是覆盖西帕米尔高原东部，并位居中轴线位置的河流。不管巴尔坦格水系在一年当中，有多长时间是水流相通的。客观存在的河谷通道，都能够接近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清帝国当年在水系上游，萨雷阔勒岭西侧的三个点：和什珠克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以及三流归一的萨雷兹帕米尔设立军事据点，相当于在西帕米尔高原的核心地区布设了一张三角形的网络。控制了这张网，也就相当于控制了西帕米尔高原的核心地区。

被我们定位于西帕米尔高原的无雷国，所游牧的区域应该就是巴尔坦格水系（至于到底哪个点才是无雷国都“卢城”的所在，暂时还不能定位）。从现在的地缘结构来看，在巴尔坦格水系占据优势地位的族群，自然是那些与塞人游牧体系有着继承关系的高原塔吉克人了。而对这些塞人后裔全面控制帕米尔高原构成威胁的，则是那些源自蒙古高原的突厥系吉尔吉斯人。然而当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以当时葱岭地区的地缘结构来审视无雷国的地缘属性，就会发现情况有些变化了。

当我们把外阿赖山北部的休循、捐毒等游牧行国定位为由北而至的塞人部落；而把萨雷阔勒岭东侧的蒲犁国确定为由南而至的羌人部族时，就会发现，身处外阿赖山之南、萨雷阔勒岭之西的无雷国，实际上就是两大游牧势力的交汇之处。也就是说无雷国既可以从自己的北部受到塞人的文化影响，也可能从东部接受羌人的基因。在后来的历史中，这种混合性结构也出现在了中亚突厥系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只不过，这种混合体系的形成，已经没有羌系游牧部落的发挥空间了。

受两大游牧体系共同影响的无雷人，到底在人种、文化上呈现一种怎样的混合性，相信大家会很感兴趣。虽然我们肯定没办法穿越回去看看，但汉书的记载中，倒是

以中国史家特有的简洁方式，记录了一下帝国外交家们的直观印象。那就是“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子合为丝路南线的羌系游牧行国）。

现在看起来，整个帕米尔高原在二千多年前的政治结构，似乎可以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划分为无雷、蒲犁两国。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与东帕地区核心谷地明确的结构有所不同，西帕的覆盖面积要大得多。而巴尔坦格水系的“伞”状结构，注定了它无法全面覆盖西帕米尔高原。尤其是高原西部，巴尔坦格河以北、巴尔坦格河——穆尔加特河以南地区，一定会有一些独立汇入喷赤河的河流存在。这种地理结构使得西帕米尔高原的水系结构非常类似于福建省。后者在闽江流域这把大伞之下，两侧分别生成了晋江、九龙江、敖江、交溪等独流入海的水系。



汉西域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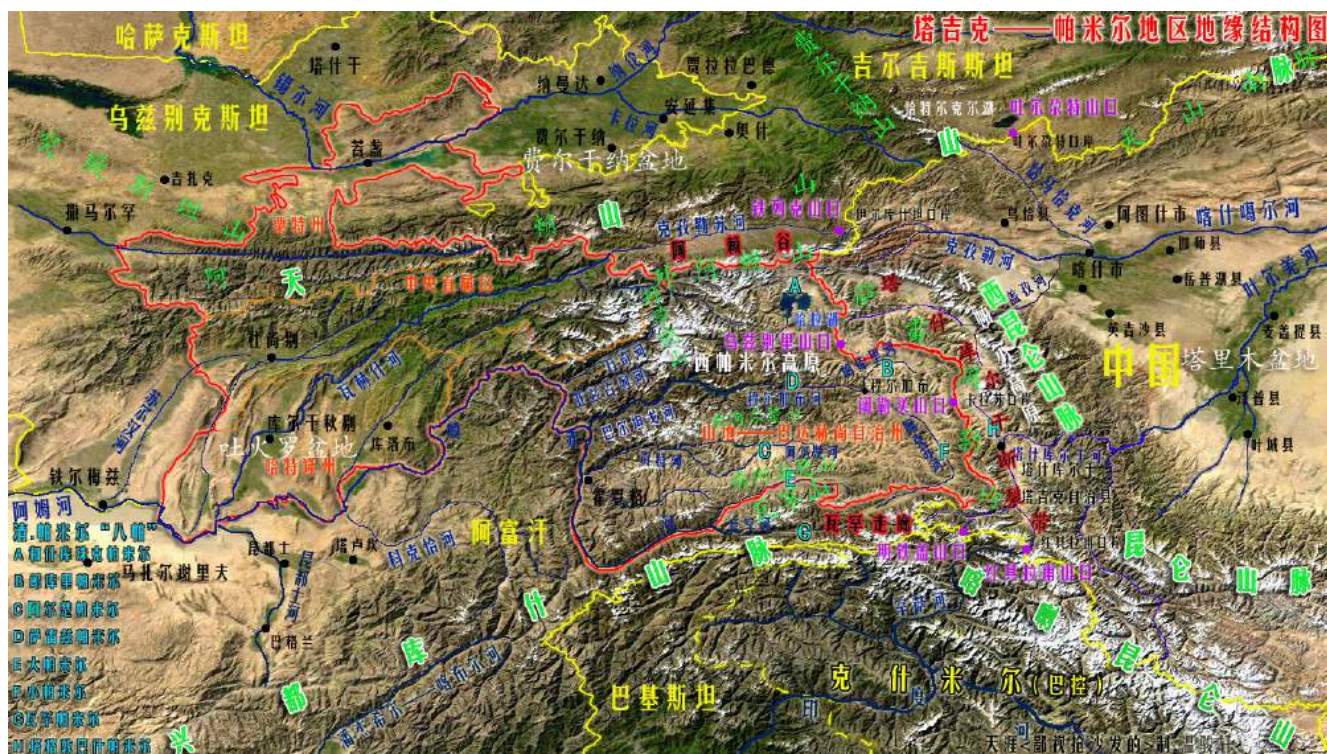
提到福建，受闽江板块控制，却水系独立、与外部板块相连的“闽南”板块，大家一定会有印象。在先秦的内容中，闽南板块作为闽越边缘亚板块的这种独立性，也在地缘政治上就有所表现（曾经出现了南海国）。那么在地理结构相近的西帕米尔高原，有没有类似闽南之于闽越的亚板块存在；在二千多年前的西帕之地，又有机会在无雷之外出现一个独立的游牧“国家”？

我们先来看看巴尔坦格河以北的情况。以地形来说，整个帕米尔高原当中最为险峻之处就是在这一区域了。我们很容易在地形图或者卫星图上，看到帕米尔高原的西北部存在一大片冰川覆盖的山地。从地形走势来看，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些山地是阿赖山在高原腹地的延伸。只不过，这片冰川实在是向南延伸太多了，以至于当



年考察此地的俄国人完全有理由将之认定为是一处独立的山地。而“科学院山”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唯物主义时代为之打下的烙印。

“科学院山”并非是红色帝国在此留下的唯一印记。山脉的最高峰——海拔7495米的“伊斯梅尔萨马尼峰”（1998年后的名字），也曾经因为它是苏联最高点的声名，贴上过斯大林峰、共产主义峰的标签。很自然的，这片山地以及这座高峰，现在也是塔吉克斯坦的“屋脊”之地了。从地理结构来看，科学院山应该是帕米尔高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从地缘角度来看，情况却不那么简单。过高的海拔以及复杂的地形，使得科学院山冰川融化之后的雪水，呈现出了不同走向，并进而影响到了山地的地缘归属。



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地缘结构图

我们在解读山脉时，总是会提到分水岭这个概念。像科学院山这样有着天然水塔功能的山地，当然也会拥有自己的分水线。总的来说，科学院山的分水线是呈东——西切割这片山地的。分水线之南的河流，最终的归宿地即喷赤河；而分水线以北，面朝天山山脉方向流动的淡水，所注入的就是另一条叫作“瓦赫什河”的河流了。在分析吐火罗盆地时，作为阿姆河右岸支流中的一条，瓦赫什河这个标签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只是对于吐火罗盆地的解读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这条当时被一笔带过的河流，未必会有多少人记得。不过不要紧，我们在进入帕米尔高原之前刚刚解读过的，纵横阿赖谷的“克孜勒苏河”，相信大家一定还有印象。而瓦赫什河与克孜勒苏河实际上就是一条河流的两个部分。或者说我们在阿赖谷中所看到的“克

孜勒苏河”，就是瓦赫什河的上游。

从地理结构上，我们很容易理解克孜勒苏河为什么会有单独的名字。毕竟阿赖谷的地形以及地缘位置，使之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这一点，也反映在了今天的瓦赫什流域的行政结构中。在今天的中亚地图上，阿赖谷和克孜勒苏河归属于天山之国——吉尔吉斯斯坦。而阿赖谷以西，以瓦赫什命名的河流及其两侧支流，则隶属于塔吉克斯坦。

作为瓦赫什流域的一部分，科学院山北坡与这条河流之间的关系，要比与南坡那些隶属喷赤河集水区的山地更加紧密。这种地理结构也反应在了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内部的行政结构当中。在那张《塔吉克——帕米尔地缘结构图》中我们会发现，被认定为领有西帕米尔高原之地的塔吉克斯坦“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轮廓线在高原的西北角有一个明显的缺失。这块被划入“中央直辖区”的高原，就是科学院山分水线之北的瓦赫什河流域。

鉴于科学院山北坡与帕米尔高原腹地存在明显的地缘分割，以及它那复杂、险峻的地形，在清帝国代表中央之国控制帕米尔高原时，并不会去翻越分水岭，从帕米尔高原方向尝试控制这片冰川（一定要做，也是从阿赖谷向西，沿瓦赫什河渗透了）。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中国能够抵御住俄国人的渗透，完整的将帕米尔八帕作为遗产留传给后面的政权的话，中国与俄国（塔吉克斯坦）的边境线，也不会超出今天塔吉克“山地——巴达赫尚省”与“中央直属区”之间的行政边界。

事实上，即使八帕被后来的民国以及今天的红色中国完整接收，上述边界也很难成为真正的国境线。因为清帝国在高原之上所设立的“八帕”，还不能说对科学院山北坡之外的帕米尔高原进行了全覆盖。如果我们再一次从地理结构上对西帕米尔高原进行切割的话，就会发现这片高原其实还可以被切割为东西两块。而“帕米尔八帕”所覆盖的区域，所指向的只是东部那些开阔谷地。

对西帕米尔高原再一次进行切割的不是别的山地，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科学院山”。这片从瓦赫什河谷向南，一直延伸到到巴尔坦格河谷的山地，在轮廓上本身就不是标准山脉所呈现的“线性”排列。被我们确定为喷赤河流域的南坡山地，在高原腹地还有一条南北分割的分水岭。分水岭的东侧之水，需要经由巴尔坦戈河中转，再转而向西注入喷赤河；而分水岭西侧，那些切割科学院山西坡的河谷，则直接指向了喷赤河谷。

这些位于巴尔坦格河以北，长度与巴尔坦格河相仿（不计算穆尔加布河及其上游支流的话）的河流，主要有万奇河、亚兹古列河两条。作为科学院山脉的组成部分，分割三条河谷的万奇山、亚兹古列山与河谷低地的落差，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区。中央之国要想进入这些谷地的难度，要明显大于东部那些地形开阔的河谷。这当然不是说，万奇河谷、亚兹古列河谷，乃至巴尔坦格河谷就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了。只不过，生存在这些河谷之中的部落，并不在清帝国军事据点的直接管理之下。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说的“帕米尔八帕”，所覆盖的区域并非帕米尔高原的全部。更为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涵盖了帕米尔高原上最为精华，谷地最为开阔的区域。



科学院山

那么，既然巴尔坦格河谷及其以北地区，由于高海拔的“科学院山”（海拔超过 6000 米的山峰就有 24 座）强烈切割，变得不那么容易控制。那么我们试图在巴尔坦格流域之外寻找“闽南”板块的希望，就应该在巴尔坦格——穆尔加布河之南了。而在这一区域，也将出现八帕当中的剩余三帕：阿尔楚帕米尔、大帕米尔、瓦罕帕米尔。至于两千多年前的汉帝国，在此会遇到什么样的“国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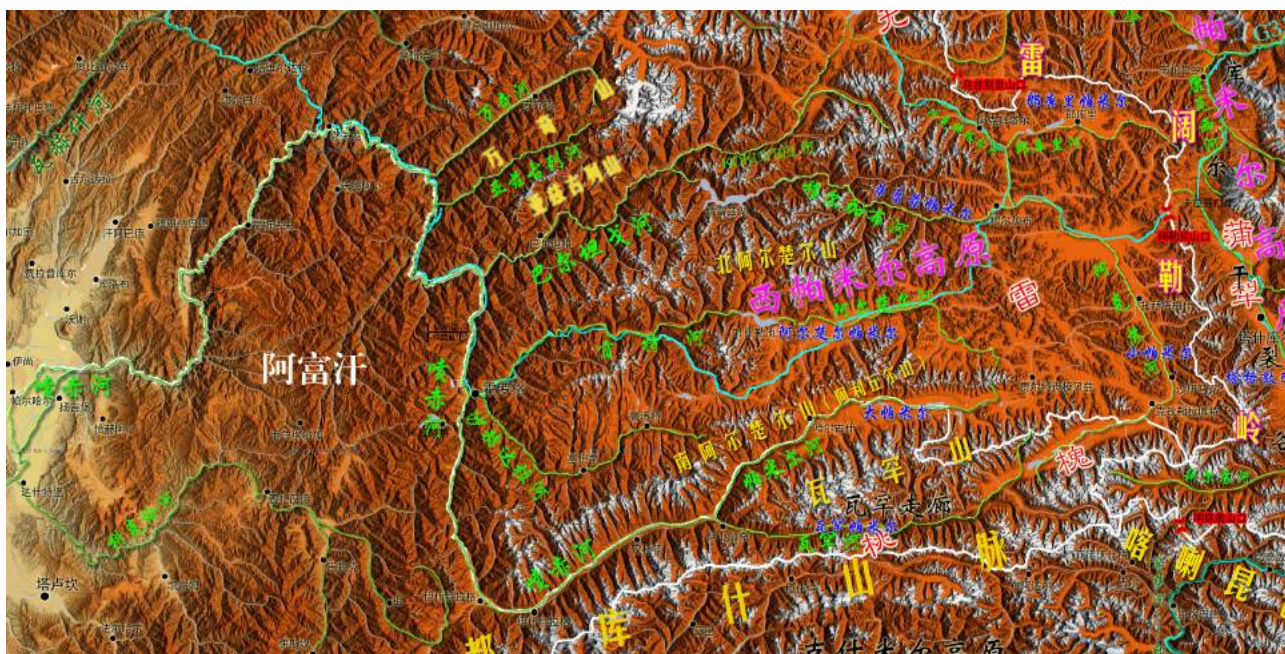
## 第六节 阿尔楚尔帕米尔和大帕米尔的位置

纵向切割了西帕米尔高原北部的科学院山，在巴尔坦格河这条中轴线前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越过巴尔坦格河之后，我们首先看到的那条河流叫作贡特河。由于没有了科学院山的横加干涉，贡特河的上游河谷得以向东延伸了许多。由于阿克苏河谷的存在，贡特河流域的东西纵深，基本上和巴尔坦格河 + 穆尔加布河相仿。仅就帕米尔高原内部那些独流入喷赤河的河流来说，贡特河的长度和流域面积，算是仅次于巴尔坦格河了。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西帕米尔高原整体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地势。这点在贡特河谷的地形结构中就得到了综合体现。贡特河的中上游河谷，看起来既比它的下游河谷宽阔得多，也明显要比北面与之位置相对应的穆尔加布河谷要更加开阔。依照我们之前的经验，这样一个开阔的谷地结构应该很有机会跻身帕米尔八帕之列的。情况也的确如此，贡特河中上游谷地的草原，所指向的就是帕米尔高原第六帕——阿尔楚尔帕米尔。之所以叫作“阿尔楚尔帕米尔”，而不是贡特帕米尔，是因为贡特河流域与巴尔坦格河流域的情况差不多，上、下游流域因地理结构不同各自独立。贡特河位于开阔谷地的中上游河道，被单独称之为“阿尔楚尔河”。

分割贡特河——阿尔楚尔河与巴尔坦格河——穆尔加布河流域的山地，和阿尔楚尔河同名，叫作“北阿尔楚尔山”。看到这个“北”字，大家应该很自然的想到还有一条“南阿尔楚尔山”，并且应该在阿尔楚河谷的南侧。所谓的阿尔楚河谷，实际就是南、北阿尔楚尔山包夹形成的一条开阔谷地。

阿尔楚河与贡特河之间的地理分割点，是位于阿尔楚河西侧河谷收紧处的“叶什勒池”。这个中继湖在历史记载中的原名要更为复杂些。不过，熟悉乾隆“十全武功”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伊西洱库尔淖尔”这个名字。在帝国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战争当中，“伊西洱库尔淖尔战役”是此战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清军在此役获胜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向西攻击前进了（在此之前，在阿尔楚尔河谷也打了一仗。被称之为“阿尔楚尔之战”）。



葱岭地缘结构图

清军之所以没有再继续向贡特河谷进发，主要是因为大小和卓并没有尝试向这条狭窄的河谷逃亡，而是转而向南穿越喷赤河谷，进入了今天阿富汗的东北部地区。这一逃亡路线，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寻找下一个帕米尔的方向，应该是在阿尔楚河之南了。而翻越南阿尔楚尔山，向南寻找另一片开阔谷地的游牧部落也不会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很快就会看到一个体量与阿尔楚尔河谷差不多的谷地——帕米尔河谷。

帕米尔河谷所对应的“帕米尔”，叫做“大帕米尔”。从河流的走向上看，帕米尔河与它北边那些注入喷赤河的河流，略有不同。这个不同在于它并不是在高原之西注入那段南北向的喷赤河谷的，因为帕米尔河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喷赤河干流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源头）。只是，如果将帕米尔河作为喷赤河的源头，另一条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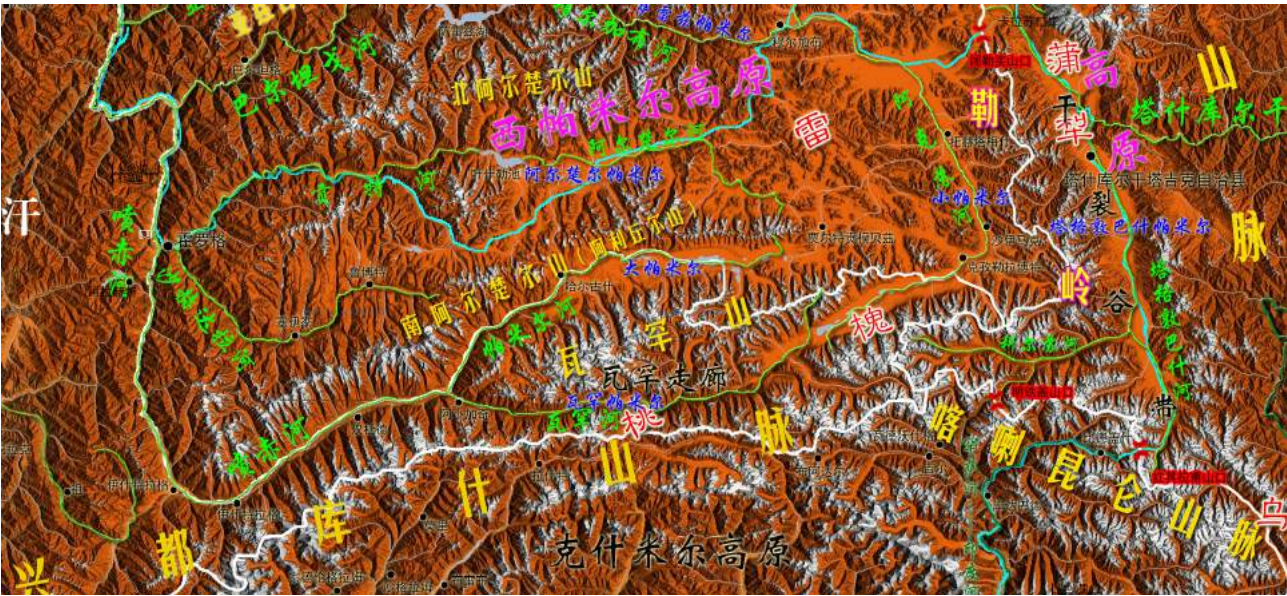


帕米尔河长度相仿、位置相邻的河流可能会提出异议。因为正是它与帕米尔河合流之后，才形成喷赤河的。标注在这条河流之前的标签，大家应该也十分熟悉，这个标签就是“瓦罕”。

第七节 瓦罕帕米尔与桃槐国的位置

瓦罕河谷指向的，正是八帕中最南部的“瓦罕帕米尔”。分隔瓦罕帕米尔与大帕米尔的山地，就叫作“瓦罕山”。瓦罕山也可以被视为是帕米尔高原的南部地理边界。问题在于，地理位置与北部阿赖谷相对的“瓦罕河谷”，到底应该算不算帕米尔板块的一部分。从地理结构来看，瓦罕河应该和瓦罕山一样，被视作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因为帕米尔河、瓦罕河这两条河流在瓦罕山这条梭形山地的南北两侧，拉出两条对称的弧线之后，很快就在瓦罕西侧成功合流了。如此密切的地理关系，让我们很难相信游牧于瓦罕河谷的部落，会与帕米尔河谷中的部落不互通往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瓦罕河谷结构的话，就会发现它最为开阔的区域是在瓦罕山的东南角。而这条开阔谷地的东段，也是阿克苏河的源头所在。这也意味着，即使大帕米尔与瓦罕帕米尔之间的交流因瓦罕山的存在变得有些困难。游牧于瓦罕帕米尔的部落，也能很方便对接阿克苏河谷，并借此打通与东、西帕米尔高原相通的交通线。



葱岭地缘结构图

当我们的视线触及到瓦罕河谷时，实际上也就相当于看到了帕米尔高原的地理南界。越过瓦罕——喷赤河谷之后，就将到达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地理单元——克什米尔了。比起阿赖谷、塔什库尔干裂谷带这样的谷地来说，瓦罕河谷并不宽阔。我

们甚至很难在山脉纵横的地形图上找到它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以水系为脉络探究两个地理单元的分割线，是最为有效的办法。记得曾经有很多朋友，在看到西方殖民者考察、划定出的那些符合分水岭原则的行政边界时，会很惊讶他们是如何准确找到山脉分水岭的。而实际上，他们的方法就是寻找每一条河流的源点，再将之连接成线的。这也说不上是创新，因为古典时期的人类也是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融合、分割地缘板块的。只不过，古人很少需要划定出具体边界来罢了。



瓦罕河谷

尽管瓦罕河谷本身的地理条件并不突出，然而它的知名度却远高于西帕米尔高原北、东两侧那两条更为宽阔的河谷。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行政地图上，阿富汗穿透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与中国相接的那条“尾巴”，实在太显眼了。以至于大家在不知道瓦罕山、瓦罕河存在的情况下，大多已经听说过瓦罕走廊的大名了。当然，行政版图中的瓦罕走廊，并非仅仅包括瓦罕河谷。瓦罕河、帕米尔河交汇后那段东西向的喷赤河谷，以及阿克苏河谷南端与瓦罕河对接的部分、差不多半条帕米尔河谷（帕米尔河的大部分河道，是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

边界），都在阿富汗境内并成为“瓦罕走廊”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将瓦罕走廊定义为一条沟通东西的通道的话，它的这个范围倒也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流程并不长的瓦罕河谷本身，并不足以单独承担横穿帕米尔高原的任务。而即使是瓦罕河谷承担的这部分任务，实际上也可以由与之隔瓦罕山相望的帕米尔河谷来替代。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瓦罕走廊的核心并不是瓦罕河谷，而应该是瓦罕山。鉴于帕米尔河谷要比瓦罕河谷更为开阔，瓦罕山北麓的这条河谷通道所承担的通行任务可能还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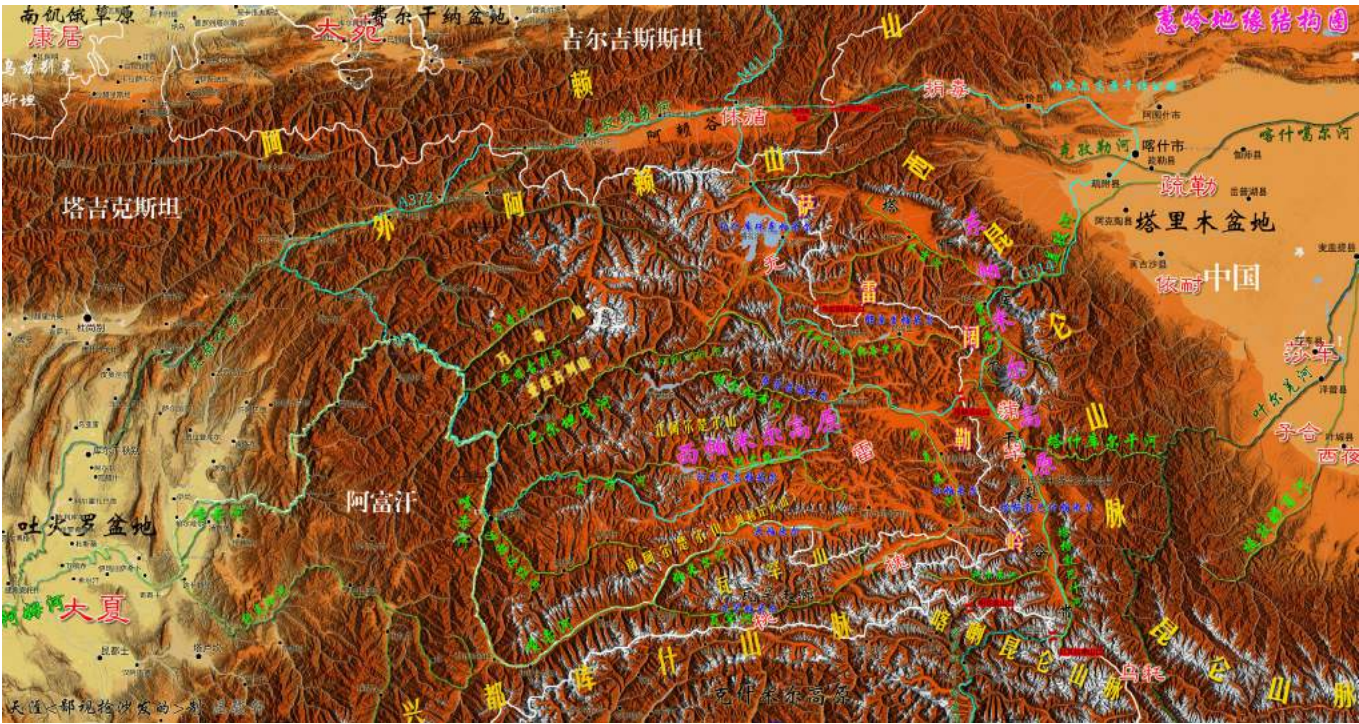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帕米尔高原中、东部那些开阔谷地的地缘结构了。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帕米尔高原地缘政治结构划分这个问题上来看的话，如果说以塔什谷尔干裂谷带为核心的东帕米尔高原是蒲犁国的领地，西帕米尔高原的核心流域“巴



尔坦格河”流域是无雷国势力范围的，那么最有可能在这片高原上出现第三股势力的区域，就是北阿尔楚尔山之南的阿尔楚尔河谷、帕米尔河谷、瓦罕河谷了。这三条河谷所在的帕米尔高原西南区，也正是我们之前所说寻找的帕米尔高原上的“闽南”。

当二千年后，清帝国再一次代表中央之国踏上被汉帝国称之为“葱岭”的帕米尔高原时，帝国的统治者在地图上为高原西南的这片土地划出了阿尔楚帕米尔、小帕米尔、瓦罕帕米尔三个亚板块。而在张骞所处的时代，帝国使者们所看到的游牧于瓦罕山、阿尔楚山一带的部落，被称之为“桃槐”。

在汉书的记载中，桃槐的记载可谓相当简略（相比其他几乎描述了风俗、王治的游牧部落而言）。我们仅仅知道这是一个人口与无雷、蒲犁相近（5000人），生活在葱岭的游牧部落。这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桃槐所经营的瓦罕走廊并非处在汉帝国经营的丝绸之路主路上，以至于汉帝国的使者认为没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了解。



葱岭地缘结构图

## 第九章 帕米尔高原与周边地区的地缘关系

### 第一节 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以我们现在所确定的帕米尔三国：蒲犁、无雷、桃槐三国的地缘价值来说，蒲犁无疑是最高的（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个游牧部落所经营的塔什库尔干裂谷带，实际处于塔里木盆地范围内南、北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处。当然，这种交汇、互通也可以在西昆仑山东麓来完成。不过，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西昆仑山脉西麓的这条谷地，无疑就有机会获得影响两条丝绸之路的潜力。

在汉帝国开拓丝绸之路之前，蒲犁人应该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占据了一块风水宝地。不过在丝绸之路为沿线国家所带来的利益越来越明显后，那些领地涉及这些交通线的游牧国家，也开始希望在这条商路上分一杯羹了。在这一背景下，像塔什库尔干裂谷带这样地缘位置极佳，低地民族又很难直接控制的地理单元，就很有机会诞生出因商而兴的国家了（像尉头人游牧的图木舒克山就比较悲剧，因为唐帝国完全可以直接控制）。

最终让塔什库尔干地区成为地缘枢纽的国家，并不是被汉帝国记入史册的蒲犁国，而是在唐帝国前后兴盛起来的“羯盘陀国”。这个立足东帕米尔高原的国家，都城就在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县城。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在那里找到一座用石头建筑的城市遗址——石头城。当你拥有足够的商业利益时，在交通枢纽上建筑一座城市是很自然的事情（无关你的原始属性）。事实上，为了控制这条裂谷带，羯盘陀国一共构筑了12座城堡。而为了适应定居生活，他们甚至还尝试开发了一些灌溉农业（尽管牧业还是最基本的生产方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不管生存于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国家是叫蒲犁还是羯盘陀，他们只是在理论上有机会影响两条丝绸之路。因为就张骞出使大月氏国所经过的这条：喀什噶尔河——阿赖谷——费尔干纳盆地这条路线而言，实际上是从帕米尔高原北麓擦身而过的。也就是说，葱岭国家真正能够影响的，应该是丝绸之路南线具体路线的选择。张骞和后来经由丝绸之路北线进入中亚的商旅，所需要注意和谐相处的山地游牧部落，只是捐毒、休循这两个塞人体系的国家。

其实，仅仅是成为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也足以让一个国家获得惊人的商业利益了。我们后面就将分析到，尽管不能对丝绸之路北线造成直接影响，但就塔什库尔干地区来说，它还是能够有机会通过控制丝绸之路南线，而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所以核心地区，也在裂谷带的南部）。对于力求不走回头路，希望全面了解西域地缘结构的张骞来说，在他从大夏回程的时候，应该会考察穿越葱岭腹地的路线，并由此进入塔里木盆地南沿。这样的话，张骞就能在一次旅程中，为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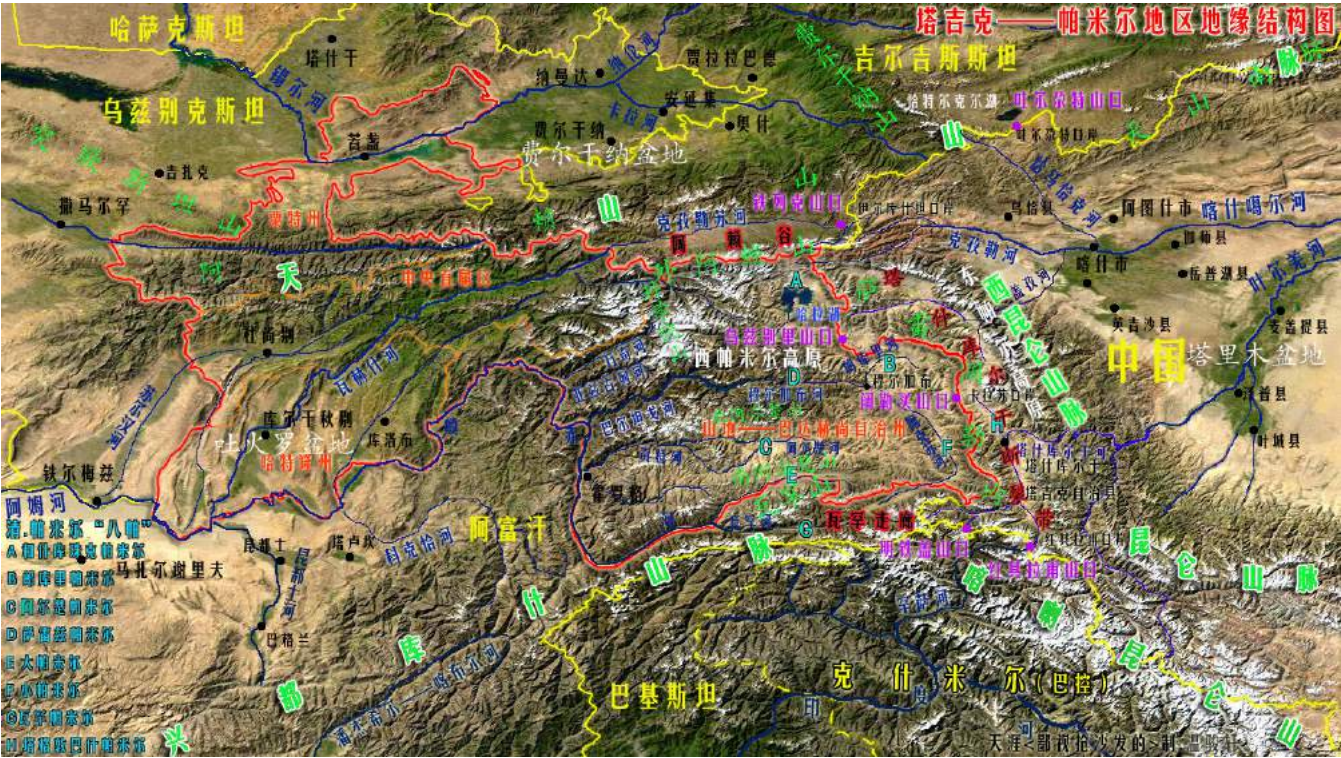


帝国划出两条丝绸之路的具体线路了。

第二节 吐火罗盆地经帕米尔至南疆的路线

通过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张骞的确在回程时，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南部。不过他这次其实并没有通过葱岭切入自叶尔羌河而起的丝绸之路南路。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从吐火罗盆地出发的张骞，会发现有一条直接将他从大夏带回阿赖谷，并由此接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需要考察。这条路线是什么呢？当我们回忆起阿赖谷当中的克孜勒苏河，其实与阿姆河右岸、吐火罗盆地北部的“瓦赫什河”是同一条河流时，问题就很容易找到答案了。

需要注意的是，张骞未必要从大夏国都蓝氏城东行至瓦赫什河——阿姆河口处再溯河北上。瓦赫什河西面的其他右岸支流河谷（比如铁尔梅兹所对应的苏尔汉河谷），也同样可以将他带到盆地北部，并接入瓦赫什河谷。要是遵循这样路线的话，今天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所处的“吉萨尔盆地”，就很有机会成为地缘枢纽了。我们很容易在附图中发现，这个位置可以很方便的让自阿赖谷而下的旅行者，选择进入吐火罗盆地北部的大部分河谷（反之亦然）。



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地缘结构图

当然，即使张骞选择了从吐火罗盆地溯瓦赫什河——克孜勒苏河而上的路线踏上东归的旅程。他依然可以切入葱岭腹地，并在此转向切入叶尔羌河所指向的丝绸



之路南线。这条路线我们并不陌生，就是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多次提到的 M41 公路所依附的路线。也就是说，张骞在回到阿赖谷之后，并不需要穿越伊尔库什坦山口，经由捐毒、疏勒，再转而南下考察塔里木盆地南线国家。他只需在当日转向穿越阿赖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转折点上右转，就能够找到一条全新的回家之路了。



葱岭地缘结构图



帕米尔 M41 公路

这条回家之路在我们之前的内容中其实已经分析过了。这条与今天 M41 公路基本重叠的路线，会将张骞带入无雷国所控制的喀拉湖地区。至于张骞下一步，是通过乌兹别里山口还是阔勒买山口，抑或其他我们现在不太使用的路线，进入塔什库尔干裂谷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所知道的是，张骞如果遵循这样的路线回国，不仅能够考察尽可能多的西域国家；更可以让无雷、蒲犁两国在惜字如金的史书中，留下更多的文字描述。从战略上看，考察这样一条路线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旦包括疏勒在内的北线绿洲国家被乌孙或者匈奴所控，是否有一条能够绕过北线绿洲，直通塔里木盆地南沿的路线，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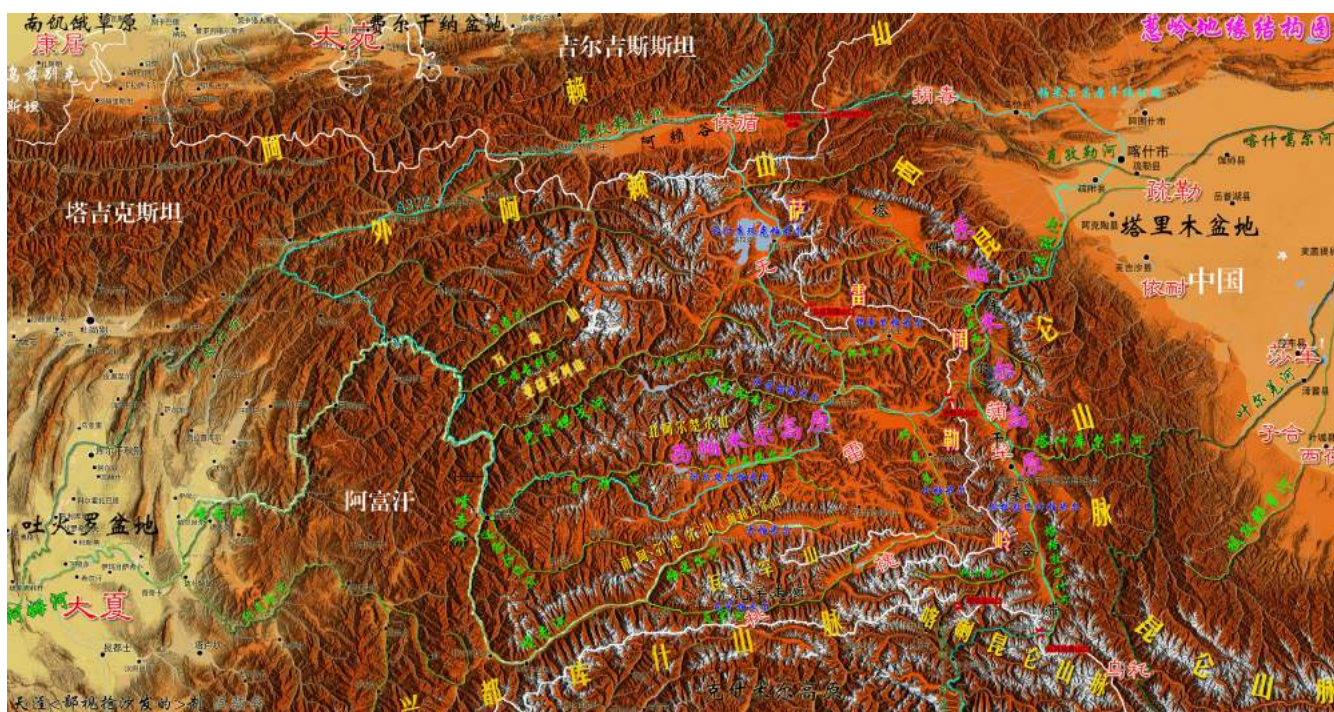
阿赖谷的存在，使得从帕米尔高原北麓西出塔里木盆地的路线成为了首选。驻足于阿赖谷的商旅既可以

选择沿克孜勒苏河——瓦赫什河南下，走入吐火罗盆地；也可以向北穿越阿赖山，先行进入费尔干



纳盆地。再经由粟特地区转入吐火罗盆地，或者南下伊朗高原、西进阿姆河三角洲花刺子模。通常情况下，即使是以吐火罗盆地为目的地，到费尔干纳和粟特去绕一圈的商旅也比较多。毕竟这两个板块是中亚最为繁荣、富庶的绿洲，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商业市场（而不仅仅是中继点）。

现在看起来，帕米尔高原本身似乎并没有通行价值。这片冰川覆盖的高原，远远看去就足以让人产生畏惧之心了。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更容易将其视为一个天然屏障，而不是沟通东西方通道的枢纽。然而经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大家应该已经知晓了，这片高原并非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尽管人口不多），高原之上也并非寸步难行。纵横高原的河谷，在为周边低地送去冰山雪水的同时，也为高原之上的居民提供了生存和交通的基础。既然高原内部的居民之间能够有路径相互交流，那么理论上这些路径也可以为穿越帕米尔高原而服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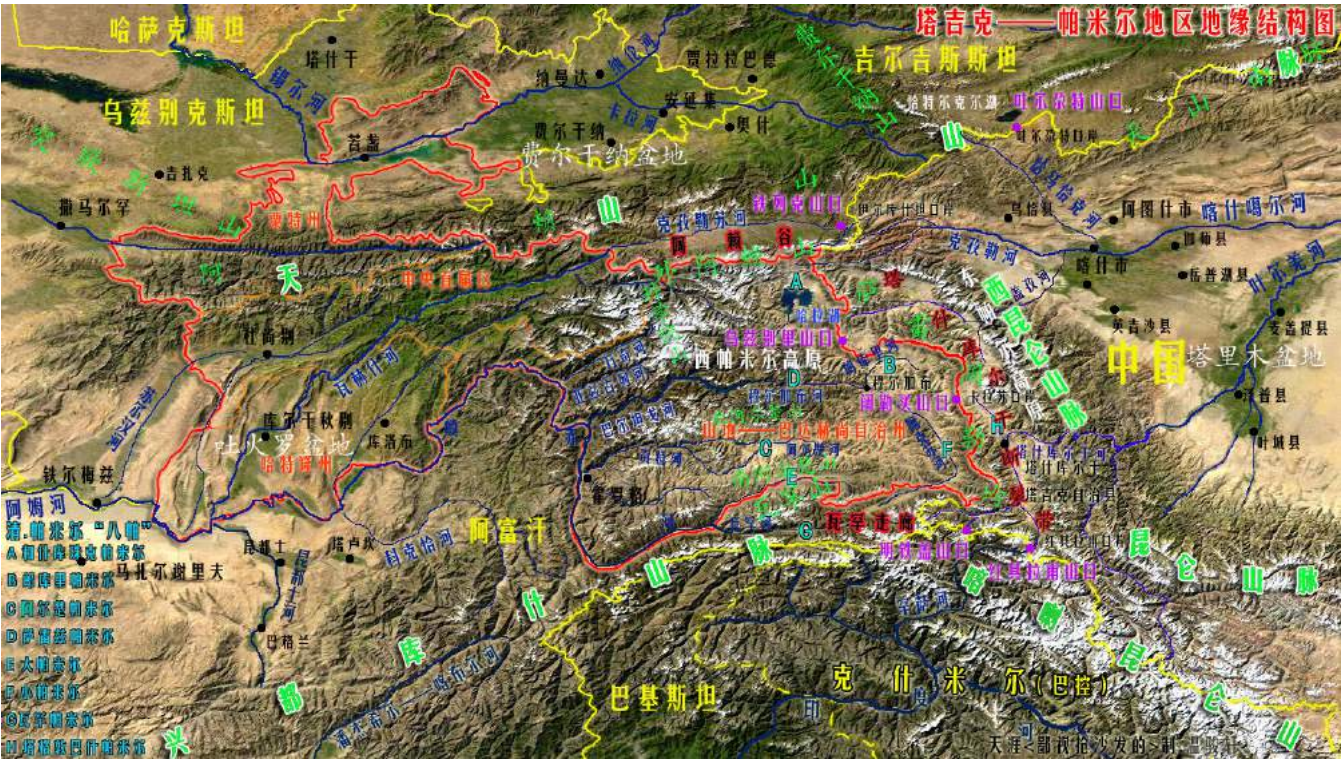
葱岭地缘结构图

在今天西帕米尔高原的交通网中，最为重要的干线是由北部喀拉湖流域切入，向南延伸至阿尔楚河谷转而向东，经贡特河谷接入喷赤河谷的 M41 公路。这条在西帕米尔高原腹地转了一圈的公路，最终在高原的西北部穿出喷赤河谷，与沿瓦赫什河谷进入吐火罗盆地的公路干线相接。这样的路径也使得贡特河与喷赤河相接的“霍罗格”，因地缘位置关系成为了“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的政治中心。

问题是，这样的交通格局并非完全是地理结构使然。单从地理上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说，如果一定要横穿帕米尔高原腹地，进入吐火罗盆地的话，并不需要沿喷赤河谷绕到瓦赫什河谷去。帕米尔高原西坡本身就有许多河谷，能够提供更为快捷的



路径。从地理归属来看，这片也可以被视为兴都库什山脉的东北部延伸。至于它到底算是帕米尔高原还是兴都库什山脉的延伸，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厘清的问题。就像今天占据这片坡地的主体民族是塔吉克族，而行政上又是阿富汗的一部分一样。而他们现在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叫“巴达赫尚”（阿富汗巴达赫尚省，以及塔吉克斯坦“山地——巴达尚赫自治州”）。



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地缘结构图

喷赤河西、南的这片山地被划分给阿富汗的后果，就是横穿帕米尔高原，直入吐火罗盆地的路径，没有出现在主干线上。当然，借助那些从左岸接入喷赤河的河谷，喷赤河谷东西两侧还是有很多低等级的道路互通的。只不过由于喷赤河本身呈现了90度转折，除非你完全沿喷赤河谷绕弯进入吐火罗盆地，否则在实际通行当中，还是需要两条河谷当中进行切换的（一条北向注入喷赤河的河流；一条东向注入喷赤河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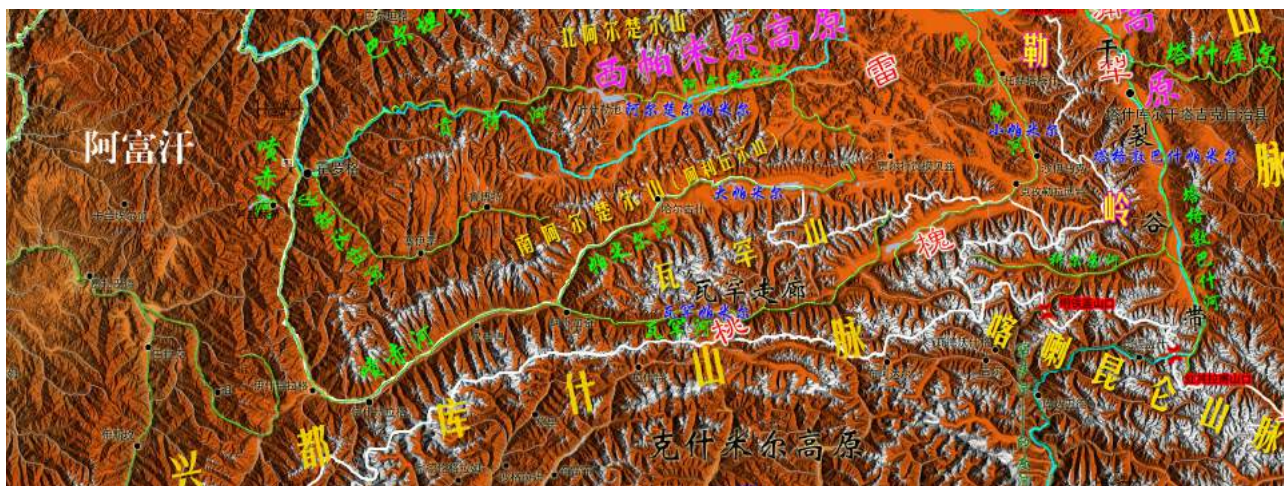
尽管帕米尔高原与周边地区的连通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差。但跨越喷赤河两岸的这些通道，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丝绸之路主线的选择。这其中地理环境对通行所造成的障碍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这片人烟稀少的高原，缺乏能够为商路进行补给的农业绿洲。即使是在西帕米尔高原西部，以及喷赤河以西那些左岸河谷的底部，因拥有更多的降水（处在迎风面）而生成了一些小型的定居村落，也不足以承载大规模的商业沟通任务。



### 第三节 英国将瓦罕走廊划入阿富汗的背景

帕米尔高原腹地被丝绸之路绕开的现状，也加深了外界对它的误判。在 19 世纪末，英国人沿印度河之水而上，触及这片高原之前。英帝国的政治家们一直认为帕米尔高原只是一座将之与中亚地区隔离开的天然屏障。即使俄国人已经通过征服中亚得到了这片高原，也不至于对英属印度造成真正的威胁。双方下一步要做的只是在喷赤河——瓦罕河之南，找到阿姆河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并划界，就足以保证英属印度在这个方向的安全。相比之下，英国人更为担心俄国人从兴都库什山脉方向南下，进入喀布尔河谷。毕竟几乎所有历史上的入侵者都是从这个方向入侵印度的。

基于这个理由，一个统辖整个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富汗，在英属印度以及俄属中亚之间诞生了。而英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使得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缓冲国的建立会更加有利于大英帝国。然而当英国的探险家们完成对帕米尔高原的考察之后，他们却惊讶的发现了我们前面分析过的事实，那就是帕米尔高原内部的天然河谷通道，只要经过简单修整之后，就可以让俄军很方便在高原上机动（据英国人统计，这些道路之间的组合方案多达上千）。也就是说，俄国人几乎可以在任何方向纵穿帕米尔高原，出现在高原最南端的喷赤河——瓦罕河谷。



葱岭地缘结构图

处在欧洲东西两端的英国人和俄国人，可能很难想象他们在亚洲的领土有一天会相接在一起。对于毫无疑问的海洋霸主——英国人来说，在地形复杂的大陆腹地进行扩张，并非他们的强项，尤其你的对手将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强大的陆地国家时。有鉴于此，英国人是非常不希望在自己边境线的对面出现大量俄国军人的。既然找到天然地理屏障的希望已经破灭，那么依靠地缘政治的力量来进行缓冲就成为 B 计划了。基于这个理由，阿富汗在瓦罕山一带获得了一条与中国对接的“瓦罕走廊”。

有了这片阿富汗领土的缓冲，英属印度的地缘安全指数也被大大提高了。如果以帕米尔八帕的划分方式来归类这条走廊的地缘属性的话，那么阿富汗在夹缝中得到了这片领土，所涵盖的就是瓦罕帕米尔和半个“大帕米尔”了。

英国人为自己和阿富汗在喷赤河——瓦罕河谷南部所划定的边境线，完全就是遵循分水岭原则了。也就是说，英国人并没有试图在帕米尔高原，或者说阿姆河流域插上一脚。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重点在于保卫价值远高于中亚那片干旱之地的南亚次大陆。而之所以费尽心机让喷赤河以南的这片山地避开俄国人的威胁，也正是基于这个目的。那么这片山地与山下那些低地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它与中央之国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可以预先告诉大家的是，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的朋友来说，这片山地的名字应该是相当熟悉了。它就是“克什米尔”。

#### 第四节 帕米尔高原与克什米尔的潜力对比

克什米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缘板块。说它熟悉，是因为这块土地曾经在新闻中高频率的出现过。并且至今仍在中国的西北边境之外，以一条虚线的状态分割于地图之上；说它陌生，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弄清这片土地的地缘结构，以及它与周边板块的地缘关系。即使我们在之前的国际部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它进行过解读，那些文字和地图也依然不能作为大家阅读历史、分析时政的有效工具。

既然随着张骞的脚步，我们已经无限接近到这片山地了，那么再花点时间对克什米尔做一个详细解读，就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才会花上二十多个小时做张 42M 的高精大图）。相信不管是喜欢回顾历史的朋友；还是更愿意立足当代，展望未来的朋友，都能够从中得到足够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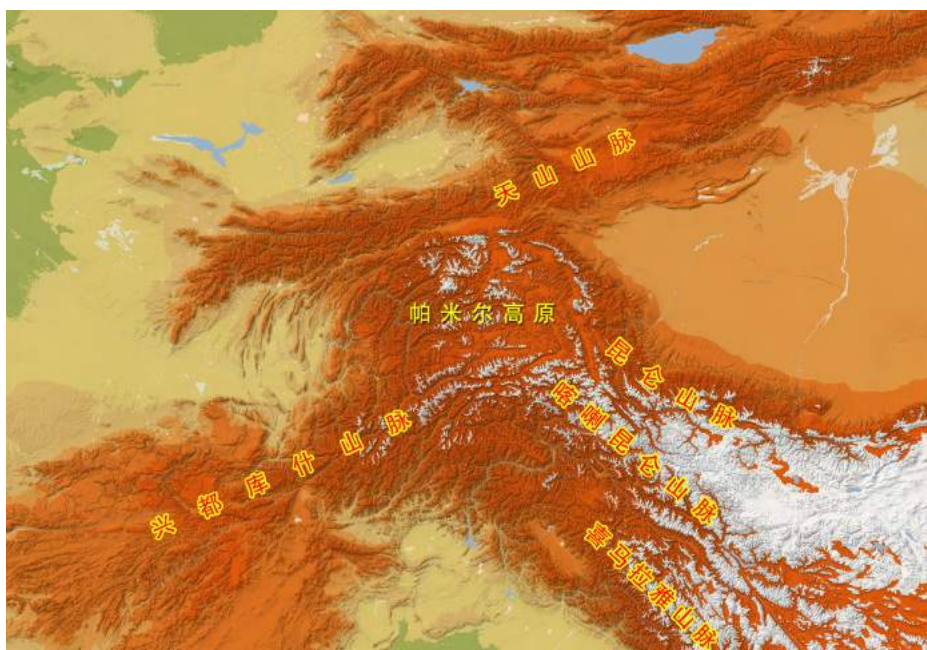
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帕米尔高原无疑会显得更为重要。单看亚洲腹地那几条重要山脉都与之对接的架势，将其定位为“万山之祖”、“地理中心”也不为过。然而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并不一定会显现在地缘价值上。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一片土地能够多大程度被重视，取决于它能够对人类作出多大的贡献（就像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把昆虫判定为“益虫”或“害虫”一样）。如果一片位置看起来非常重要的土地，基于自然环境的原因，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和承担战略通道的作用，那么它的地缘价值无疑将大打折扣。

帕米尔高原就是这种情况，即使不考虑通行难度。与费尔干纳、粟特地区那上千万人口的市场相比，帕米尔高原上那几十万人口（今天的数据对比），也不足以对过往商旅产生吸引力。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丝绸之路南线的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从塔里木盆地南沿而来的商旅，希望选择一条以南亚次大陆为目的地的路线时，



也不一定非要从帕米尔高原腹地穿行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在帕米尔高原南侧有一个无论在人口承载力还是在通行条件上，都优于帕米尔高原的板块。就像费尔干纳盆地在北线的相对位置一样。那么这个地理单元到底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我们后面的主角——克什米尔。

在地形图上看，很多朋友会感觉克什米尔所处的这片山地和帕米尔高原几乎连成一片。很难想象克什米尔的人口承载力会优于帕米尔高原。不过事实是，不管是巴控克什米尔还是印控克什米尔，都有数百万的人口。相比于帕米尔高原的人口数量，这已经是数量级上的差异了。



帕米尔高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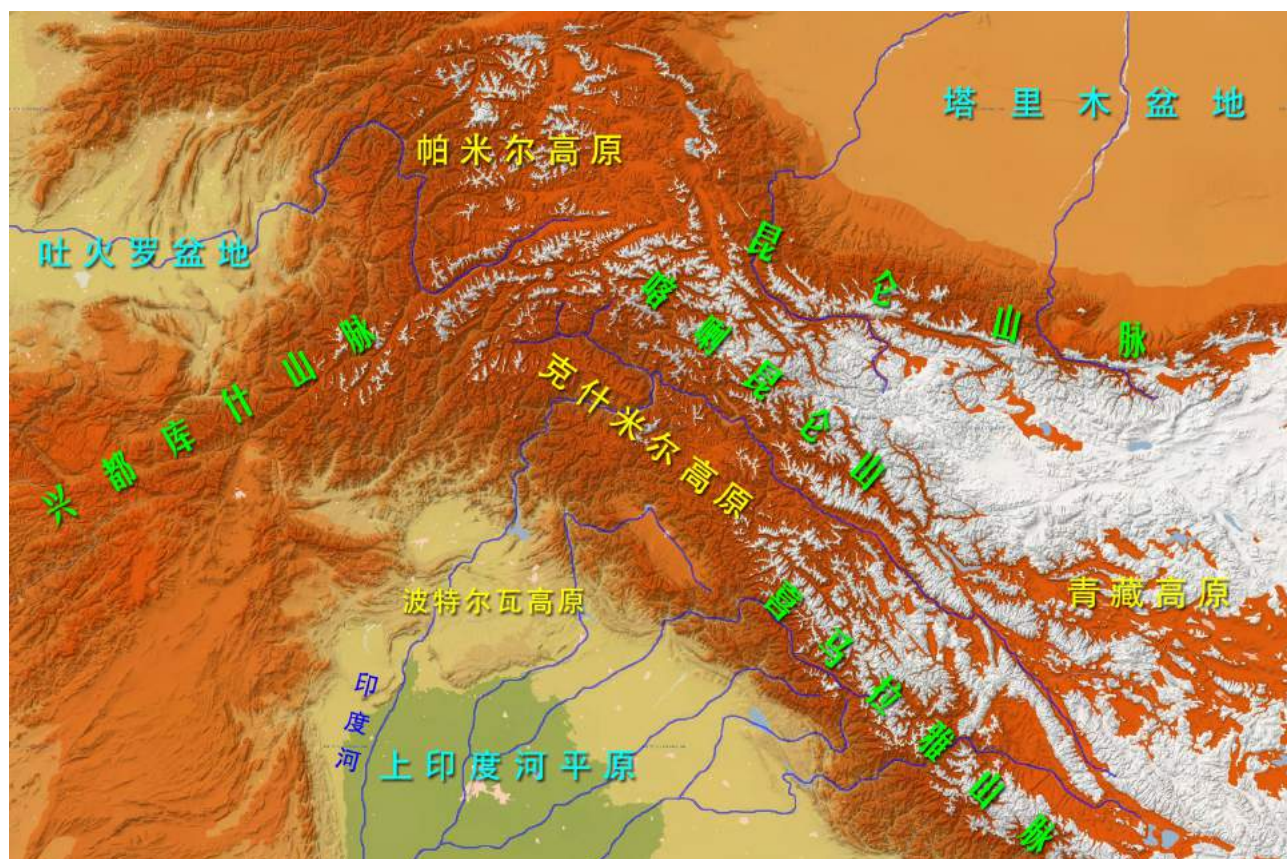
我们先从地理结构入手，来看看帕米尔高原和克什米尔的人口数量差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所谓“帕米尔高原”，也被称之为“帕米尔山结”。这片高原就像是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结。之所以会这样，源自于四千万

年前的一次剧烈地质运动。板块碰撞造就了这个山脉交汇的突起。这次碰撞也使得帕米尔高原的平均海拔，要比周边这几条山脉更高。

对于高原塔吉克人来说，他们固然可以因此而自豪一把，并认为自己所生存的这片屋脊之地是最接近蓝天的地方。不过在享受纯净空气的同时，帕米尔人在农业开发上却遭遇到了高海拔所带来的困境。这意味着那些能得到融雪补给，最有机会开发灌溉农业的河谷低地，无霜期也会短得可怜（绝大部分地区不足百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东、西两侧部分海拔相对较低的河谷底部以外（水往两侧流，故越往边缘，河谷海拔越低），高原上大部分有机会生长出植被的土地，还是只能被粗放经营的游牧民族所利用。

帕米尔人遇到的这个温度困境，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河谷当中，就变得没那么严重了。如果我们把帕米尔高原视作一个山结的话，那么克什米尔山地就是几大山脉边缘坡地的相会之处了。之所以看起来像是连成一片的高原，主要是因为这几大山

脉之间的距离过于接近，以至于我们很难看到它们之间的地理分割线。为这片山地形成提供赞助的山脉，计有西北侧的兴都库什山脉、东北侧的喀喇昆仑山脉，以及东侧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这种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出，将喜马拉雅山脉也视作与帕米尔高原相接是不正确的（尽管在地图上，它们看着很接近）。也就是说，一定要说帕米尔高原是万山之祖的话，喜马拉雅山的山神有权提出异议。



克什米尔与周边地区示意图

虽然喜马拉雅山脉并没有直接为帕米尔高原的形成作出贡献，但它的西端边缘山地，却实实在在成为了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不过，既然大家彼此之间的地理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能够形成一个整体，那我们其实也没必要一定要分辨出，哪一片山地是属于哪一座山脉的（就像我们不必去分析帕米尔高原内部山地的归属一样）。将之整体命名为“克什米尔高原”或者“克什米尔山地”，会更准确显示它的地缘状态。

从内部结构来看，克什米尔高原就像一个南面开口的簸箕。三大山脉就是这个簸箕的三条边。这意味着，从这三大山脉中收集而来的淡水，最终会向南注入南亚次大陆的西侧。事实也的确如此，只不过这些来自克什米尔的河流，并非全部在克什米尔山地中完成合流。它们实际是呈伞状流入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并最终在合流成一条河流注入印度洋的。这条河流就是我们之前所触及过的印度河，而印度河合流前后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就是上印度河平原（五河地区、旁遮普地区）和下印



度平原（信德地区）。

这样看来，所谓克什米尔高原其实也可以被定义为“印度河上游山地”了。如果不那么严谨的话，的确也可以这样理解。然而这样的理解，却有可能造成地缘概念上的偏差。因为印度河之水的源头并不是在这片缓冲山地，而是在另一片体量更大的高原之上。这片高原就是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和印度在中、西段边境线上才有了至今无法厘清的边境纠纷。至于青藏高原与克什米尔，乃至南亚次大陆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地缘关系。我们从西域拉过来的这条主线，又与这三者之间互相又有什么影响。我们接下来再接着分析。

## 第十章 青藏高原上安多和康巴的特征

### 第一节 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地缘潜力低

青藏高原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板块。尽管我们随口都能说出很多关于青藏高原的地缘标签，但真正了解这片土地地缘结构的人并不多。不过这片神秘的土地在今天却是一个热点，不仅引得国内众多小资、伪小资趋之若鹜，更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这其中很大成分，是因为青藏高原及其高原土著所代表的宗教、政治含义。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单就这将近 3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世界最高的平均海拔来说，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与青藏高原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世界屋脊仅仅养活了一千多万的人口。其中称得上原住民的藏族不过六百万，仅仅相当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人口。这意味着，这片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面积还要大的高原，其实真正能够被人类所利用的土地，是非常稀少的。而找到这些核心板块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任务。

提到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作用，除了那巨高的海拔让拥有它的中央之国倍感安全之外，高原最让地缘政治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就是“亚洲水塔”的称号了。这意味着，中央之国不仅能够让长江、黄河这两条母亲河完全在自己的国土内流淌，同时还有机会通过那些流入境外的河流，对周边国家施加地缘影响。而在我们寻找青藏高原核心地理单元的时候，河谷低地同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尤其是那些能够外流入海的河流，更是重点中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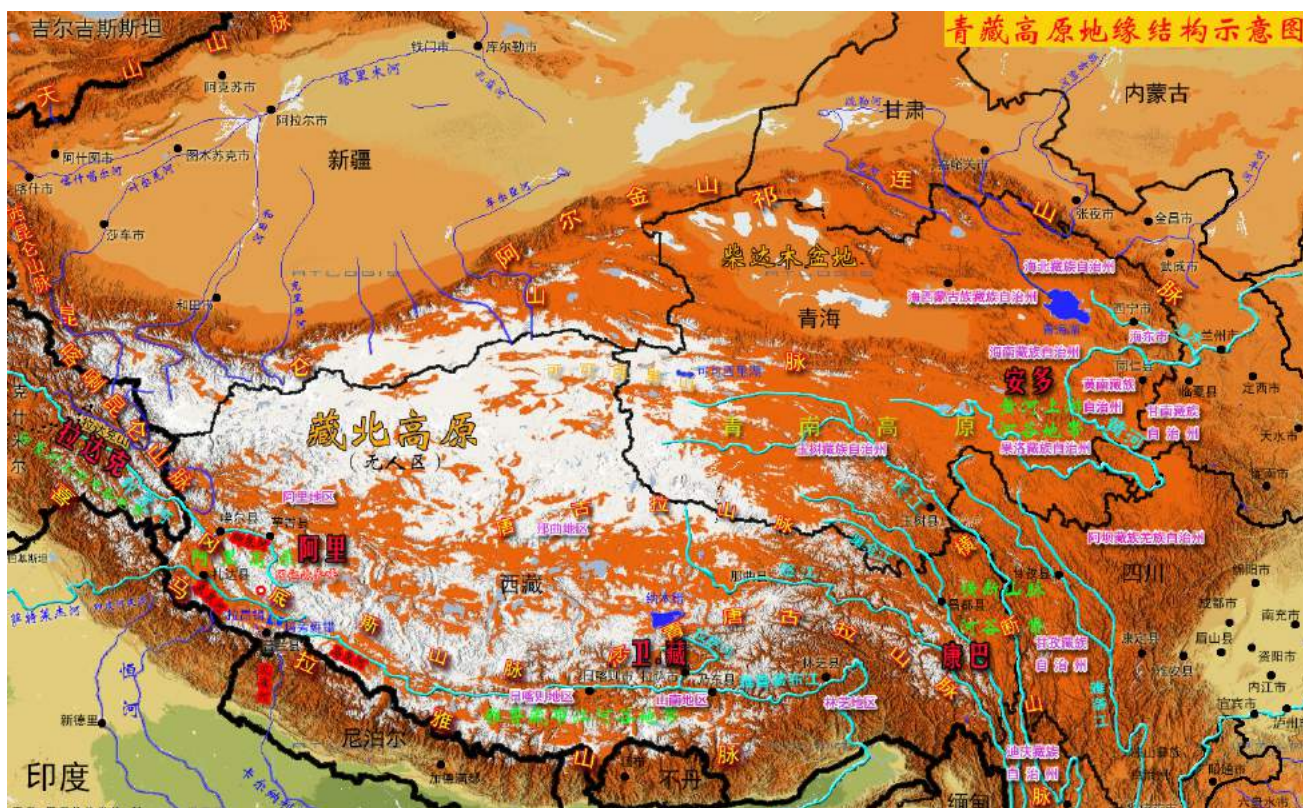
我们之所以那么关注一条河流是否能够归流入海，是因为这样的“活水”是最有生机的。从技术角度看，一条内流河流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将它从上游带来的矿物质，沉淀在下游地区。不管这些盐分是以盐湖还是盐碱地的形式出现在人类面前，对试图开发它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在解读过中亚那片完全的内流之地后，相信大家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看，亚洲腹地之所以有这么多内流河，是因为这一区域受高山阻碍，且远离海洋，没有足够的降水来淤高低地、冲刷出可以接入海洋的河道。

不管因果关系如何，天山南北的干旱环境已经是人力无法改变的现实了（只能微调）。对于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来说，它最应该责怪的并不是挡住了西风的天山山脉，而是让印度洋水汽几乎无缝可钻的青藏高原。如果当年牟其中或者葛优的想法再疯狂点的话，他们想到的也许就不是给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为青藏高原导入印度洋暖湿气流，而是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在青藏高原上撕个口子，想办法给塔克拉玛干沙漠送水了。这样的想法当然非常天真，也没办法忽悠到人的。所以整个



塔里木盆地不管在现实还是臆想中，都享受不到印度洋的风了。最为大胆的想法，无非是把高原东、南部那些“外流”河之水，调进这片沙漠之地罢了。

这些打青藏高原之水主意的民科，所推出的方案到底不可行，在论证时有没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不是我们的重点分析方向。不过研究类似方案的人，一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青藏高原之水主要集中在东、南边缘。而与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相接的西北部分，所搜集到的淡水能供自己都十分困难。从地理结构上看，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以位置来说，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还是有机会享受到太平洋水汽的影响；而它的南部，也是最有机会受到印度洋青睐的区域了。在这种情况下，高原的西北部不悲剧，谁悲剧呢？



青藏高原地缘结构示意图

影响青藏高原西、北部降水的，除了与海洋的距离以外，高原内部的地形结构也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在很多地图上，整个青藏高原被描绘成一片白色之地，看起来像是一整片起伏不大、顶面平坦的原地。但事实上，这片高原上面也是山脉纵横，几条东西纵横的巨大山脉将整个高原切割成了相对独立，环境各异的地理单元。这些为青藏高原及其内部板块划定地理边界的山脉，主要有如下几条：北线的昆仑——阿尔金——祁连山脉；中线的唐古拉山脉；中南线的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线的横断山脉，以及南线的喜马拉雅山脉。

无论是太平洋还是印度洋，想要越过高原东、南部那些山脉，将水汽输送到西、

北部地区都是十分困难的。在这场水汽阻击战中，南线的喜马拉雅山脉要显得更为霸道些。这条世界最高山脉在高原南缘所形成的完美弧线，成为阻挡印度洋水汽的一道天然屏障。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洋水汽就完全没有缺口登上这片高原了。只是当它们想尽办法渗透到喜马拉雅山北麓时，就会发现还有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所筑起的第二道防线，阻碍高原腹地获得降水。

相比之下，青藏高原东部的山脉就没有那么霸道了，高原东北部实际上并没有高大山体阻拦。当然，在横跨了整个东亚半岛之后，太平洋也没有多少水汽能够输送到此了。不过，这已经足够在高原东北角打造出一个比较优势明显（高原内部比较）的地理单元——河湟谷地了。至于东南部的横断山脉，也并没有隔绝高原内部获得水汽的希望。基于横断山脉的结构以及方位，它既可以拦截到太平洋、印度洋两方面刮过来的水汽；又可以让这两大洋的水汽顺着河谷爬升，输送到高原腹地。这种方式，比单纯的不设防还要输送得更远。所以我们会看到，借力横断山脉的长江、怒江、澜沧江，要比黄河的源头更加深入高原腹地。

当然，即使是有了横断山脉的帮助，高原西北部占据整个青藏高原面积一半的区域，还是没有办法蓄积出足够的淡水外流了。这些内流区中的流淌的有限降水，最终的归宿地只能是一个个或有水，或干涸的盐湖。加上高海拔对环境的影响，你几乎不能指望这样的土地，能够成为人类生存的乐土。

简单来说，青藏高原西北部的这片干旱的内流区，可以被划定为一高一低两个部分。高的部分指的是西北部介于昆仑山脉与冈底斯山——唐古拉山之间的“藏北高原”。这片东西长约 2400 公里，南北宽约 700 公里，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高原，可以说是高原中的高原，屋脊中的屋脊。就像西帕米尔高原西北部的科学院山，之于整个帕米尔高原结构中的地位一样。只不过，藏北高原的位置太过悲催，并没有机会像科学院山那样承担水塔的作用。这无疑也大大降低了这片核心高原的地缘价值。只是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尽管藏北高原目前对人类生存作出的贡献甚少，但缺少了人类的干预，这里却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天堂。那些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动物种群，如藏羚羊、藏野驴等，成为了这片干旱之地的守护者。

藏北高原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地理单元，当属其东部的可可西里了。而它之所以被大家知晓，正是因为人类试图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榨取这片高原的经济价值。我们不知道，藏北高原上这些野生动物对古典时期的高原土著经济，是否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藏北高原一定不是我们所寻找的，青藏高原地缘意义上的核心板块。

同样被我们排除在外的，还有昆仑山脉与阿尔金——祁连山脉之间的区域。这一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指的“一低”板块。对于这片以相对低地状态而存在的地理单元，我们可以称之为“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板块。相比之下，位置更靠西，低地纵深更大的柴达木盆地，情况要更为恶劣。这片盆地留给人们的最深印象，就



是覆盖湖底的盐了。如果当日怕被日本核辐射影响的人到过这片土地，相信就绝对不会花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钱，去参与那次抢盐风波了。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相比柴达木盆地，青海湖区的情况就要好上许多。依靠周边相对紧密的山地集水，青海湖至今还是中国最大的湖泊。而那些为青海湖补水的内流河，在维系这个圣湖存在的同时，也为对生存条件要求不高的游牧部落提供了小规模游牧的机会。然而，虽然有诸如青海湖流域这样的单元为游牧民族提供生存机会，但总的来说，青藏高原上的内流区是没有办法承载高原土著希望的。如果适应了高山反应的土著希望让自己强大起来，并将影响力扩张在高原以外地区的话，他们的希望就只能在东、南边缘那些外流河地区了。那么这些外流区内部究竟又可以分为哪些板块，每个板块的地理基础又是什么？后面接着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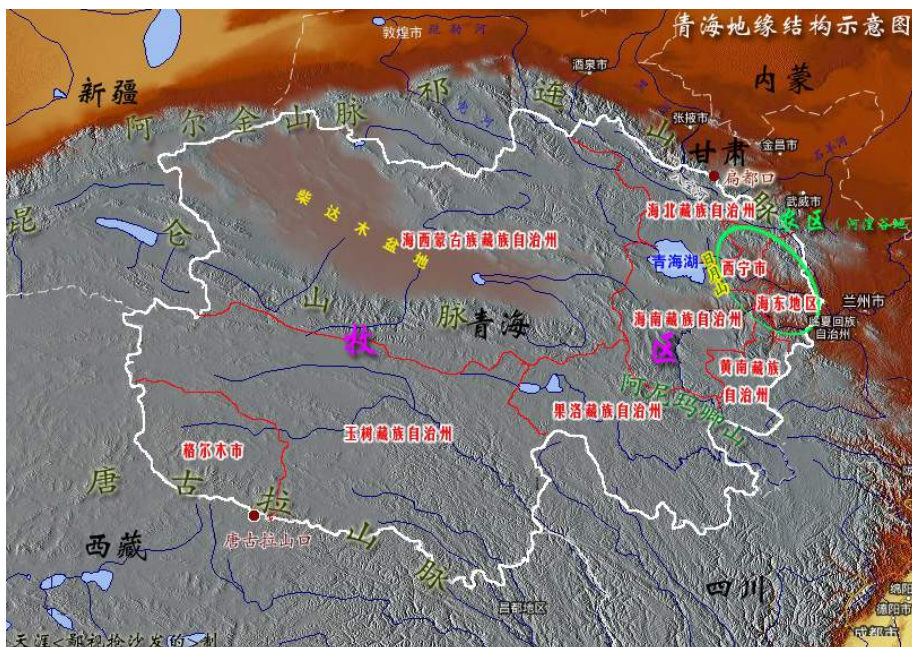
## 第二节 安多地区未能控制河湟谷地

以中央之国的方位来说，最为熟悉的当然是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了。在张骞为汉帝国打开西域之门之后，帝国很快也开始强势插入这一区域。只不过，此时藏族的先民还没有渗透到此，汉军将士所遇到的对手，主要是活跃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相接地带的羌人部落。至于说帝国在此控制了哪个板块，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张骞刚刚告别汉武帝，准备进入河西走廊时，我们就已经对这一区域做过详细分析了。这个板块就是“河湟谷地”。

从地理结构来看，河湟谷地应该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但就谷地东面开口的结构，使其成为青藏高原中最有机会接收太平洋水汽的板块。这也使得河湟谷地的整体自然环境更接近于黄土高原。黄仁宇先生曾经为中央之国设定过一条“15 英寸等量雨线”。也就是说，年降雨量在 15 英寸以上的区域是华夏农业文明自然扩张的

区域。低于这个降雨量，就很难形成大规模农业区了（除非像中亚——西域那样，有高山雪水补给）。能够适应这种干旱条件的，是那些自然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这一背景下，农牧分界线也就与这条“15 英寸等量雨线”基本重合了。

15 英寸折合成我们常用的毫米单位，相当于 381 毫米。这恰好也就是河湟谷地的年均降水量。也就是说，这片本有机会成为高原土著风水宝地的土地，同样有条件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西部边缘板块。至于结果，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在一场对耕地的争夺战中，占尽优势的华夏农耕民族没有理由不取得胜利。至于试图在黄河上游谷地立足的高原土著部落，能够覆盖的就只有那些降雨量小于 15 英寸的边缘地区了。



青海地缘结构示意图

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六个明显带有高原土著标签的行政区。而这些地区在藏区的内部结构划分中，被称之为“安多”。

“安多”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尾部、下部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安多藏区并非整个藏文化的发源地，而是后期拓展的边缘板块。由于整个黄河上游河谷地带适于农耕的土地，被从黄土高原而来的更为强势的华夏族所覆盖，草原成为了安多藏区的生存基础。这也使得“马”这个带有强烈游牧气息的物种，成为安多藏区有别于其他藏区最为明显的标签（卫藏的菩萨，康巴的汉子，安多的马）。

安多之所以没能成为藏文化覆盖区的地缘中心，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办法和华夏文明竞争河湟谷地。试想下，如果覆盖河湟谷地农业区的是藏族，那么黄河上游河谷地带肯定会成为和拉萨所在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竞争的高原核心板块。只是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高原土著，应该就不只是藏族了。最有可能

尽管在汉帝国扩张至河湟谷地时，青藏高原内部的民族结构还有些复杂。但今天我们已经将“藏”民族代指青藏高原的土著了。简单的从黄河上游河谷地带——青海湖区一带的行政建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河湟农业区的周边，分布着：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六个明显带有高原土著标签的行政区。而这些地区在藏区的内部结构划分中，被称之为“安多”。



的情况，就是青海、西藏被两个不同民族所覆盖。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当华夏民族还不能稳定控制河湟地区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出现过了。羌、吐谷浑这些民族都曾经试图据黄河上游河谷地，对抗来自青藏高原南部、黄土高原，甚至蒙古高原的地缘压力。

只不过现在，这两族的后裔虽然都还能位列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列（羌族、土族），但各自二、三十万的人口，以及外部的大环境，让我们很难再相信，百年之后还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存在。基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民族身份认定和吸引猎奇目光的旅游经济，将会是这些历史民族后裔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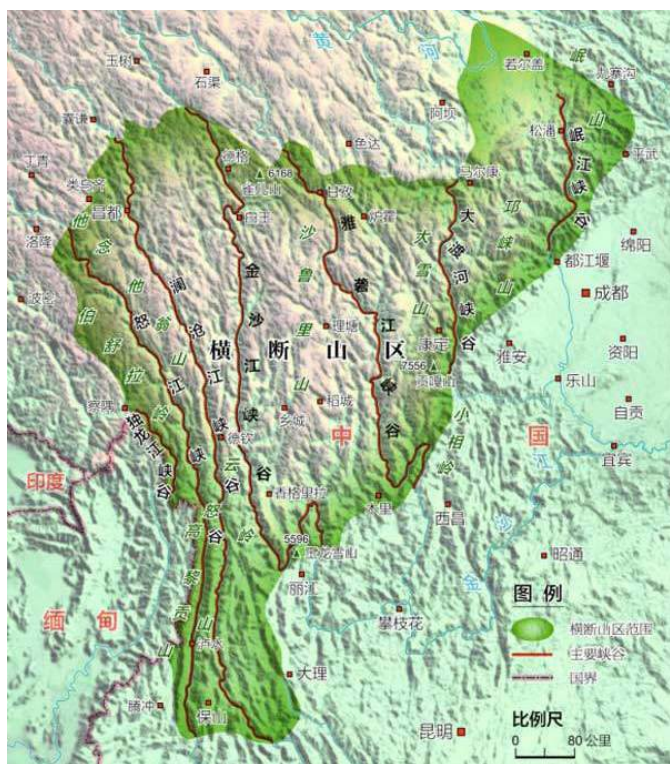
### 第三节 康巴在横断山区的农牧混合经济

既然安多藏区缺失了农业核心区这一环，让自己在整个黄河上游河谷地带，以及藏区中都处于边缘地位。那么黄河上游河谷地带南部，青藏高原西南边缘的情况会不会好些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一区域可以贴上一个范围更小的地理标签——横断山脉。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横断山脉这种河谷深切、排列整齐的结构，让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填充在这些河谷当中的正是中国南部的几条大江：长江、澜沧江、怒江（以及它们的上游支流）。将山、水特征都包含在板块标签中的话，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横断山脉河谷地带”。

横断山脉在中国的自然基因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大量热带、亚热带、温带、甚至寒带的物种。大落差的峡谷地貌，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水汽在各区位所施加的影响大小，是横断山脉地区物种繁多的环境背景。而这种环境的多样性，也影响到当地的地缘结构。在官方所定义的 56 个民族中，有一半能够在横断山脉中找到（其中还有部分是横断山脉所独有的）。

横断山脉河谷地带的地缘复杂性，在生产方式上也有反映。农、牧、渔猎，这三大古典生产方式，在横断山脉都能找到生存空间。当然，从地理关系上来看，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些土著民族，同样也面临着被华夏农耕族渗透、同化的风险。尤其是当华夏文明向南覆盖与之相邻的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之后。然后横断山脉特殊的地形，却有效的保护了土著民族的独立性，使得我们在今天还能看到这种多样性的存在。这是因为，尽管从太平洋和印度洋吹来的海风，“恰好”可以从横断山脉的南部开口溯河谷而上。在为河谷地带带来充沛降水的同时，也深入到了青藏高原的腹地。但对于从东面扩张而来的中央之国来说，这种地形却无异于在面前竖立起了一道道屏障。有鉴于此，当年试图为中央帝国凿空这些峡谷地带的使者，才会形象的将这些峡谷称之为“横断山”（一条条横断路径的山脉）。

缺少了华夏文明的干扰，青藏高原土著民族在横断山脉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有了整个青藏高原作为后台，从河谷地带北端切入的高原民族，在顺着河谷向下渗



横断山脉地区示意图



纳西族

透时，要比从东而至的华夏民族顺畅得多。真正能够对这一渗透造成阻力的，是来自云贵高原的地缘势力。在横断山脉南部，河谷落差趋缓的地带，土著民族受到来自云贵高原土著文化的影响就要更大些。

以地理结构来看，隶属青藏高原部分的横断山脉北部，最终也成为了民族、文化意义上藏区的一部分。如果一定要在它的南部找一个地缘分割点的话，让小资、文艺青年趋之若鹜的“丽江”，倒是可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丽江之北就是云南境内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

（境内最著名的地缘标签，就是抢注“香格里拉”行政标签成功的原中甸县，今天的“香格里拉县”了）。这种地缘文化交汇的特点，也体现在了今天丽江土著民族——纳西族身上。在这个因旅游经济而声名远扬的民族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藏文化影响。如果所谓的民族界定再晚 100 年的话，也许中央之国的民族序列当中，就不会再有纳西族了。

之前我们在介绍安多藏区游牧特征明显的时候，曾经提到了“康巴”这个标签。没错，所谓康巴藏区指的就是青藏高原部分的“横断山脉河谷地区”。基于横断山脉环境多样性的影响，农耕、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在康巴人身上都有所体现。这种有别于东亚华夏农耕民族，以及北亚游牧民族的农、牧混合方式，也是整个青藏高原土著民族的特色。而这片高原之所以能够让农、牧两种生活方式



如此稳定的融为一体，根本原因还在于这片高原实在是太高了，高到外来民族无法深入它的腹地；高到能够不受外来干扰独立形成农牧混合的高原民族。

基于农业文明在人口、技术上的优势，在高原农牧混合体中占据核心位置的，自然还是那些选择了定居生活方式的部族（就像某个渔猎部落联盟上升为“国家”形态时，占据核心统治地位的会是那些率先在边缘低地进入农业文明的部落一样）。而在高原内部寻找降水、地形、温度条件相对优异的土地来发展属于自己的农业文化，也有利于青藏高原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体系，并最终通过军事、政治、外交手段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当然，在这当中基于那些环境相对较为干旱的草原保存下来的游牧基因，无疑也在军事上保证了高原民族的战斗力。

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种生产方式、文化体系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劣势。能够在一个体系中兼容各种文化，其实是一件好事。藏民族基于环境而形成的这种混合文化体系，也使其有机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至于康巴藏区中的这种游牧基因，有什么让我们看得见的优势。也许大家能够从“康巴汉子”那彪悍的身影中感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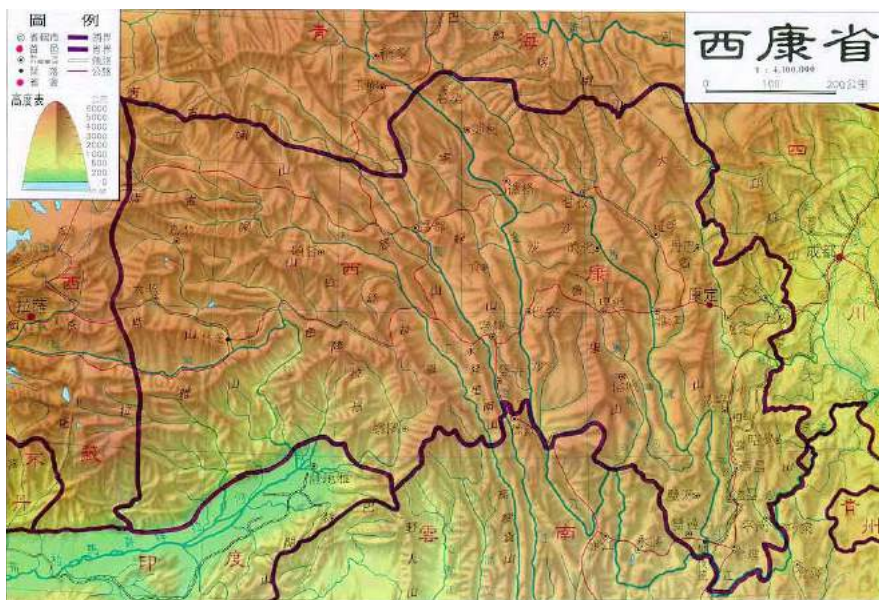
横断山脉区的牧业和农业



康巴汉子

如果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的话，以“马”闻名的安多藏区所指向的，主要就是青海省了。至于“以人为本”的康巴藏区，它本来在近代中国的行政版图上，也

独自占据过一个省级行政建制的。只不过此时的四川盆地已经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在以其为基地扩张云贵高原成功之后，四川盆地也承担收服最后一个边缘区——青藏高原的地缘重任。有鉴于此，本来在清、民国两代比照青海地缘政治定位，而在康巴藏区建制的“西康省”，被沿长江（金沙江段）一切为二，分别划分给了四川、西藏两地。至于这其中的地缘政治意义，相信已经不用我再画蛇添足了。



民国时期的西康省

尽管作为一个具有相似环境，相同人文背景的板块，康巴藏区已经在行政上被割裂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地缘结构。从生存环境来看，没有直接受到华夏文明挤压的康巴藏区，应该比安多藏区更有优势成为整个藏区的核心板块。最起码他们在横断山脉河谷地带的地缘优势非常明显。

不仅南部那些受云贵高原影响的土著民族无法与之抗衡。即使是古典时期处在最强劲的中央之国，也无法真正征服这片土地。在乾隆十全武功中，就有两项战役指向这片土地（二次大小金川之役）。虽然这位十全老人认为，大清帝国才是这场前后耗时三十年之久，用兵超过六十万（对手人口仅仅数万）的战争的最终胜利者。但当硝烟散尽之后你依然会发现，能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还是那些高原土著。

不过康巴藏区并非是整个藏区的核心板块，也非藏民族的龙兴之地。至于藏区的核心之地究竟在哪里，我想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很显然，核心之位是属于今天在行政名称中仍然带有一个“藏”字的西藏自治区。而我们将如何从地缘角度来解构这片以宗教文明为特色的土地（卫藏的菩萨），相信大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就能看到答案了。



## 第十一章 青藏高原上卫藏地区的特征

### 第一节 雅鲁藏布大峡谷对卫藏的影响

从水系划分来看，安多、康巴两区都是属于太平洋水系。其中黄河、长江两河最终是东向穿越东亚半岛注入太平洋，而怒江、澜沧两江则是南向穿越中南半岛注入太平洋的（在中南半岛，它们的名字也变成了“萨尔温江”和“湄公河”）。不过，当我们把视线西移到青藏高原南边缘地区，也就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时，河流的走向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

在喜马拉雅山北麓收集淡水的河流，既没有被封堵在青藏高原内部成为一条内流河；也没有“一江春水向东流”，最终注入太平洋。而是在喜马拉雅山东端与念青唐古拉山西端连接处，撕开了一个口子，转而向南进入南亚次大陆，并在与恒河合流之后汇入了印度洋。在中国境内时，这条河流被称之为“雅鲁藏布江”；至于印度人，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将之命名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河口三角洲地区的孟加拉人，也同样不愿意用一个印度名，“贾木纳河”是雅鲁藏布江最后的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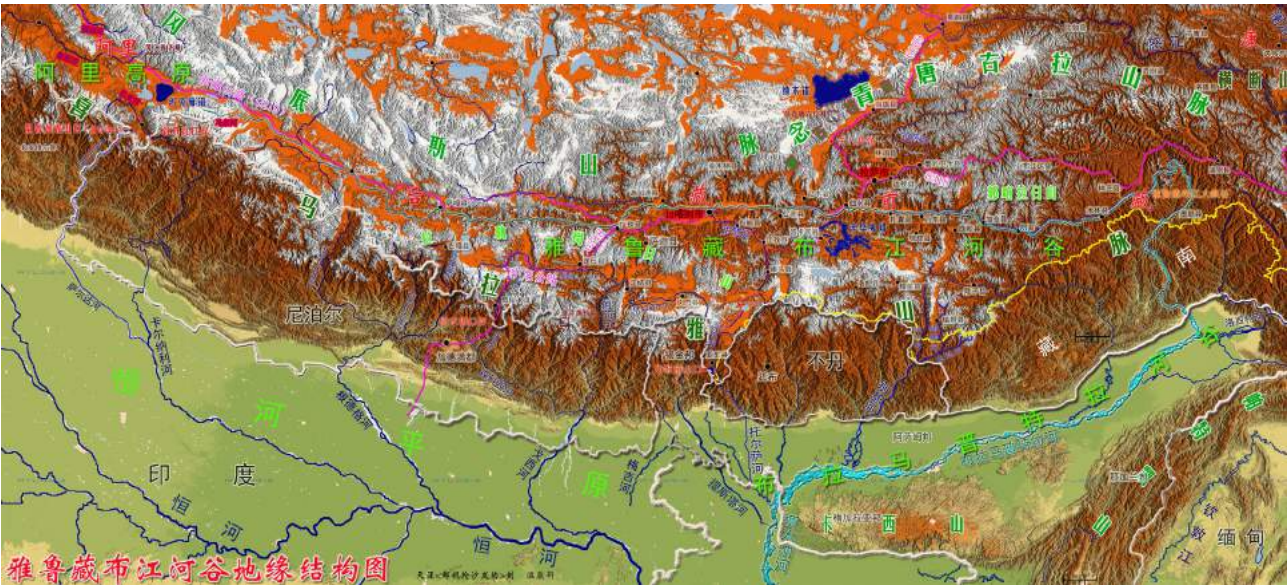
一般情况下，一条河谷会从两侧山地同时收集淡水。就是说，喜马拉雅山脉北坡并非是雅鲁藏布江唯一的集水区。与喜马拉雅山的连续性有所不同，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北侧，山脉的接合并没有那么紧密。其东、西两段可以被分列为两条不同的山脉，即西段的冈底斯山脉与东段的念青唐古拉山脉。相比之下，冈底斯山脉的走向要更加中规中矩些，看起来几乎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而念青唐古拉山脉则更像是一个凸面朝上的弧形。一头与冈底斯山脉相接，另一端则与横断山脉平行，转而向南延伸。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念青唐古拉山可以算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或者说横断山脉西边缘的山脉，是念青唐古拉山的延伸）。

这个地理结构上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面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对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念青唐古拉山脉东端的这样一拐，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挡住了雅鲁藏布江继续东流的希望。使之不得不以一个超过 90 度转角，硬生生折向南成为了一条注入印度洋的河流。不过这个惊天大逆转，对于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雅鲁藏布江河谷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极大改变了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风水”。

“风水”二字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解读中，只不过它们每一次都是以其字面本意的面目出现罢了。我们比较容易关注到的，是这个拐角对“水”方面的影响。毕竟这个拐角的角度和海拔落差都只能用“惊悚”二字来形容，加之雅鲁藏布江的集水区级别又足够高端（因此水量大）。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被我们称之为“雅鲁藏布河大峡谷”转角，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水电资源。

如果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处在印度境内，开发它所蕴含的巨大水电资源，相信一

定会被列入印度国家战略中去（鉴于印度的效率，是否在这个假设中能够开发成功，就很难说了）。然而为印度划出麦克马洪线的专家们，并没有能力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找到真正的分水岭。所以今天真正能考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开发的国家是中国。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同样只能存在于计划当中。因为无论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分水岭去修建水坝，还是将来把电送回内地，看起来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路都只是在 2010 年才通）。有鉴于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暂时还是以“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名头（河谷最深处达到令人恐怖的 6000 米），为我们增加一些民族自豪感罢了。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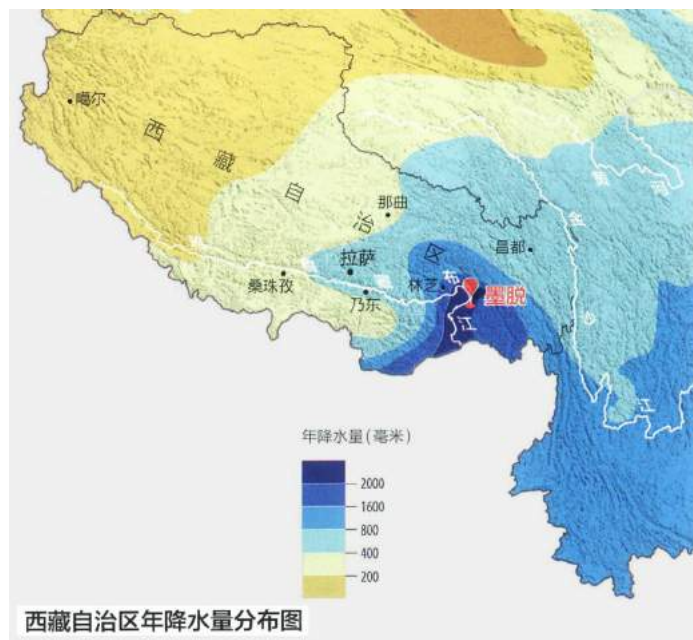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基于技术的发展以及政治方面的和解，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之水，也许有一天还是会成为影响西藏——南亚板块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不过在此之前的人类发展历史中，这个马蹄形峡谷就已经影响到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地缘结构了。对于下游



的影响，自然是以水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大峡谷送水，印度东北地区和孟加拉所处的“恒河——贾木纳河三角洲”，肯定没有今天的人口承载量了。这样一看，肯定又有很多试图用青藏高原之水救济西北、华北那些干旱土地的朋友愤愤不平了。凭什么让这些珍贵的水资源，白白便宜外国人？



西藏年降雨量分布图



西藏青稞

对于青稞这样只需要四个月就能成熟，且适应高原环境的作物来说也就刚好够了。

雅鲁藏布江河谷（中游）在各方面都刚好够上农业开发门槛的条件，放在东亚半岛是根本没机会出头的。然而处在一片无人区或者仅能提供牧草的板块中间，这样的比较优势就十分明显了。能够养活上百万人口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也因其农业优势而具备了竞争青藏高原核心板块的资格。

然而农业优势并非是成为地缘核心的唯一要求，地缘位置的作用往往会更为重要。单纯以地形、气候来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北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最东端

其实这个世界是公平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为下游送水的同时，也为中国境内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送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印度洋的“风”。印度洋季风可以顺着这个开口逆流而上，将水汽送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这种情况我们并不陌生，在之前分析横断山脉河谷地带时，类似情况就已经发生过了。正是得到了印度洋水汽的滋润，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才显得不那么干旱。其中中游核心地带的降水能达到400——500毫米（日喀则——拉萨一线）。

按照15英寸等量雨线的理论来看，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自然降水量，刚好让它有机会成为一片以农耕为主的土地。当然，要想开发农业，温度也很重要。但季风带的并不仅仅是降水，也有来自海洋的热量了。所以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的无霜期也有100——120天左右。虽然这样的无霜期，对于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粮食作物来说，实在有些短。不过



农业条件应该是最好的（也就是现在西藏林芝县所在的位置）。一方面这个位置是喜马拉雅山北麓最先接收到印度洋水汽和热量的板块（所以降水量能达到 600——800 毫米，无霜期有 180 天）；另一方面，念青唐古拉山脉向北弯曲的那个弧度，使得林芝一带的低地纵深要更多。加上整个河谷地带，越往东地势更低的因素（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低的地区，平均海拔 3000 米）。林芝在气候、环境上完全不像青藏高原的其他地区，而是让人有置身江南的感觉。也因此而得到了“西藏江南”的美誉。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 林芝地区



布江河谷中段，被冈底斯山脉东段、念青唐古拉山脉西段所庇护的这段谷地，综合优势就要更明显了。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段河谷地带在各方面都刚好达到农业开发的门槛。而沟通南北的地缘位置，才是让这一地区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地缘核心的根本因素所在。至于这一优势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地理结构产生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内部又可以再细分出什么样的亚板块来，我们后面再接着分析。

## 第二节 卫藏经羊八井盆地沟通北部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描述藏区三大板块的一个说法：康巴的汉子，安多的马，卫藏的菩萨。康巴和安多我们已经解读过了，那么卫藏是哪里呢？很显然，它应该位于我们现在正在解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也就是西藏首府拉萨所处的地理单元。不过“卫藏”固然可以整体看作一个大的板块，但这条狭长的河谷地带，内部又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卫，二为藏。所谓“卫”，指的就是今天的拉萨和拉萨以南，东接林芝盆地的河谷地带。以现在的行政标签来说，就是拉萨+山南地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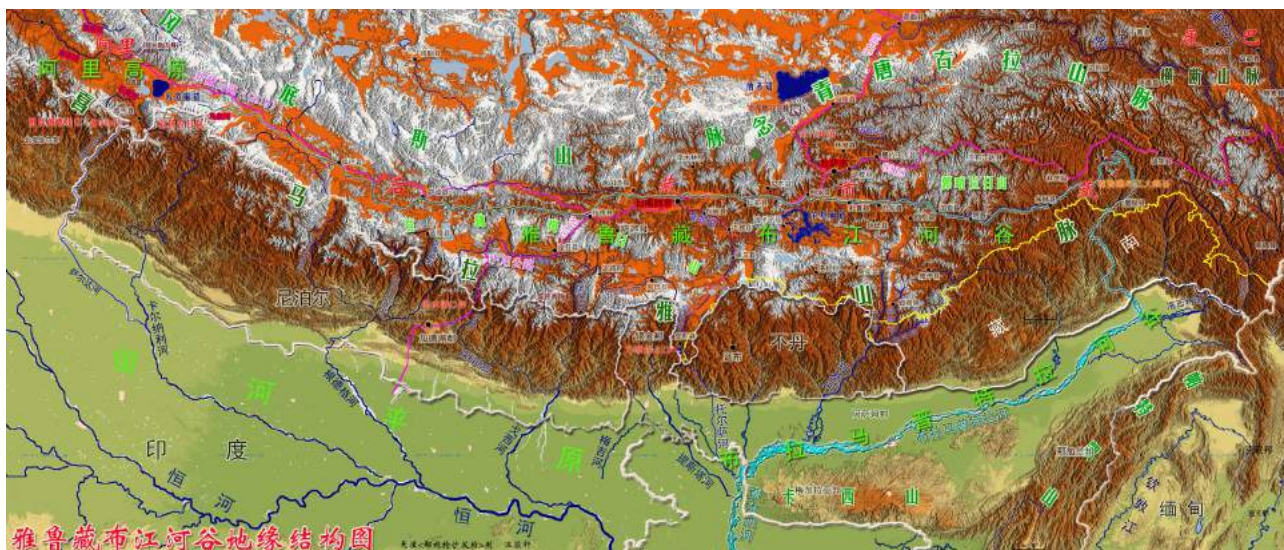
与很多城市的选址一样，拉萨并非是在河谷干流“雅鲁藏布江”之侧，而是在它的左岸支流拉萨河畔。如果“山南”二字指的是一个地缘板块的话，那么拉萨就是它的地缘政治中心了。在地形图上对照拉萨以及山南地区的行政范围，我们会发现这里指的“山”，是念青唐古拉山。那么与念青唐古拉山相接的冈底斯山脉，其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河谷地带，又会被贴上什么样的地缘标签呢？就现在的行政标签来说，被冈底斯山脉所庇护的这段雅鲁藏布江河谷，被称之为“日喀则地区”。其地缘政治核心“日喀则”，定位于一条叫作“年楚河”的雅鲁藏布江右岸河流的河口三角洲地带。而在“卫藏”这个地缘标签中，日喀则所占据的，正是“藏”这个后来成为整个高原土著族名的标签。

在清朝的设计中，卫、藏两个分立的地缘标签，已经被后藏、前藏所替代了。也正因为如此，之前为日喀则地区所独享的“藏”字，才上升为整个族群、地理单元的名称。不过，不管这两段雅鲁藏布江河谷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以它们的地缘关系来说，其实并不一定要再细分为二个板块的。就像一般人并不会观察到，冈底斯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分割线一样。如果一定要细分的话，康巴地区那些被横断山脉“横断”的河谷，似乎更有理由这样做。

前藏、后藏这两个藏区内的二级板块，之所以能够上升为与康巴、安多并立的一级板块，很大程度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当年清帝国为了有效控制藏区的这片核心之地，运用政治手段有意强化了二者的地缘差异。具体的做法就是将日喀则设为班禅的驻地，而让达赖驻锡拉萨，领有山南地区。从政治角度看，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的确为间接控制留下了操弄空间，以至于今天的中央之国在管理藏区时仍

在受益于这种设计。

前藏、后藏到底应该是以分立的面目出现在藏区的地缘结构中,还是更应该以“卫藏”之名看成一个整体,主要要看政治方面的需要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应该关注的是两大地缘政治中心:拉萨和日喀则的位置。仔细观察它们在各自板块中的位置,就会发现两座城市并不在各自板块的地理中心,而是一个在西端,一个在东端。这种格局让人感觉到,控制两大板块的政治家,在选择自己的政治中心时都在尽力向板块分割线靠拢,似乎这条分割线本身才是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地缘轴心。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西藏政区图

这两条相接的山脉之间应当会有机会出现一条接缝,一条能够被人类开拓为通道的谷地。而日喀则、拉萨所争夺的,就是这条通往青藏高原中、北地区的战略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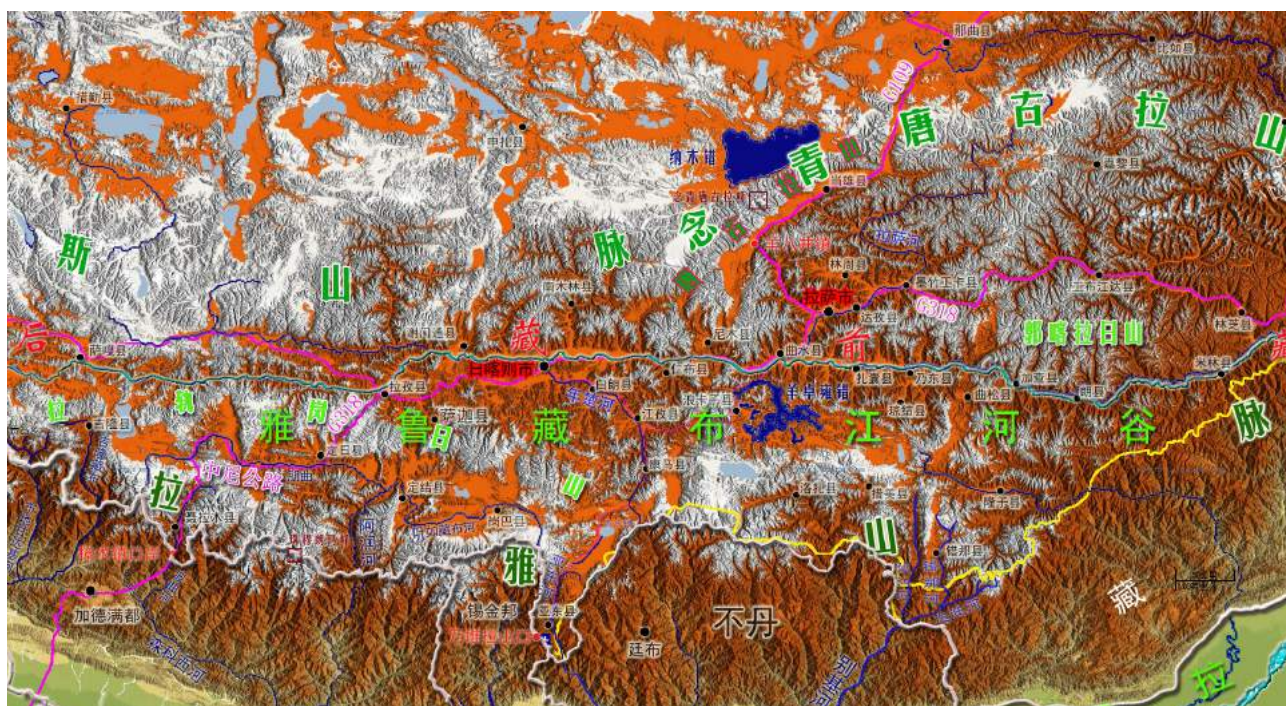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这两个大山脉相接处,最为显眼的地理单元并非是一条谷地,而是

既然日喀则和拉萨看起来在争夺一条地缘轴心的控制权,那么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二者的连线当中找一个中点。看看这个中点一带,到底有什么样的地理背景。不过暂时无视这些人类设计,单从地理结构入手,会更有利于我们得出客观结论。我们之前也说了,日喀则地区与山南地区分割的地理背景,是冈底斯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分立。很明显,



一条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细长形山地，以及山地西北麓的一个面积仅次于青海湖（中国境内）的盐水湖。这条山地就是狭义的“念青唐古拉山”；而那个依山而生的湖泊，则是位列藏区四大圣湖之列的“纳木错”湖。

在藏语中“错”本身就是湖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纳木错后面加个“湖”字有点画蛇添足了。不过为了照顾大家的语言习惯，这样的足已经添过很多次了，所以再添一次也无妨。从位置上看，念青唐古拉山正好位于东、西两大山脉之间，被认定为谁的一部分似乎都可以。不过从海拔和走向上来看，它显然与西边那道弧形山脉更加一致。因此它的名字，也扩张成为了东段雅鲁藏布江河谷北部山脉的标签。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虽然念青唐古拉山在地理上被归入了东部阵营，但就这段山体来说，它与山脉主体之间的连接却并不紧密，二者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分割谷地。基于这条谷地内所设置的行政区叫作“羊八井镇”，所以这条谷地的地理名称被标注为“羊八井盆地”。能够被视作一个“盆地”，羊八井所处的这条位置与纳木错湖相背的低地，东西纵深也就不会太窄了。而它也成为了雅鲁藏布江河谷与高原北部地区沟通的天然通道。当然，由于日喀则和拉萨分别在它的西南、东部两侧的年楚河口、拉萨河谷。由北向南穿越羊八井盆地的道路，其实并没有直达雅鲁藏布江畔，而是呈“人”字形分别指向前、后藏地区的这两个地缘核心。

仅从日喀则——拉萨与羊八井盆地的地理关系来看，这两个城市已经足以压倒被念青唐古拉山阻挡住北上去路的林芝了（虽然它的自然条件更好）。然而就这两座城市所处的地缘位置优势来说，还不仅仅体现在此。或者说仅仅依靠控制一条北



上通道的出口，还不足以凸显这两座城市的地缘价值。更无法让它们其中的一个，成为整个藏区的地缘中心。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如果拉萨或者日喀则的价值，仅仅在于更容易代表雅鲁藏布江河谷通向北方的话，那么它们比较安多或者康巴来说又是什么优势呢？

如果说安多因为缺少农业核心区而无法成为核心之地话，那么农牧条件兼备，看起来更有机会从中央之国核心区吸收先进技术、文化的康巴地区呢？这样说起来，拉萨、日喀则以及整个雅鲁藏布江河谷，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藏区的地缘核心，一定还有我们尚未分析到的重要因素。

如果将横断山脉河谷地带的河流单纯定位为“太平洋水系”的话，这样并不妥，最起码怒江——萨尔温江是注入印度洋的。其实结合横断山脉兼得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带的优势来看，水向两洋分的结构，也颇为符合康巴板块的过渡性质。当然，具体到水汽影响，并不是说怒江就只能接受印度洋水汽，而澜沧江、长江就只能受太平洋水汽影响了。毕竟“风”要比“水”更加活跃。



雅鲁藏布江

虽然横断山脉河谷地带在水资源上优势颇大，河谷低地加起来面积也不小。但这个板块最大的问题就是切割得太厉害。任何一个想直接统治所有河谷的想法，在古典时期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正因为此，从青藏高原到云贵高原的整个横断山脉地带，一直到红色中国建立之前，都是延续各自独立的土司制度。这些土司

虽然会基于民族、宗教、政治原因，接受版块外政治力量的领导，但任何想从他们手中夺取领地控制权的企图，都会遇到最为激烈的反抗。

相比横断山脉河谷地带各自为政的地缘政治局面。雅鲁藏布江河谷作为一条单一河谷地带，在纵深和统一难度上的优势，就要突出许多了。印度洋的水汽让这条河谷迈入了农耕的门槛。而受阻隔未能享受到多少印度洋水汽的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与唐古拉山之间的内流低地区（那曲地区），也并没有被浪费掉。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馀的板块，总是会有机会自然生长出一些草本植物，以滋养一些游牧部落。在南部那些依靠印度洋水汽，而获得人口优势的雅鲁藏布江流域部落的整合之下，有了这些生活今天西藏北部的高山游牧部落加入，也使得藏民族的祖先能



够成为一个农牧混合类型的族群。

说到这里，又要提一下当年那位中国首富了。他在向别人宣扬他那大胆设想时，其实不应该以喜马拉雅山为目标，而是以它北面的念青唐古拉山为对象炸开个口子，把已经上升到雅鲁藏布江的水汽，分一部分到念青唐古拉山与唐古拉山之间的内流低地。这样的话，这片降水量只够维持畜牧业存在的低地，说不定就有机会成就一条贯穿东西的河流，并成为西藏新的核心农业带了。当然，如果能在喜马拉雅山相应位置上多炸几个口子，降水肯定会更多。只是这样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生态后果，以及有没有技术可行性，就不是我们要深入讨论的了。

回到严肃话题上来。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崛起的过程中，来自印度洋的水汽所创造的小环境，固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因素。这个板块拥有从文明先发地区直接吸收技术、文化的地缘优势，才是它 PK 掉高原上其他河谷地带，成为地缘核心的关键因素。而这个文明先发地区，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所指向的就是“印度”了。

### 第三节 卫藏经亚东谷地沟通南亚

解读中、印之间的恩怨问题，是国际部分的最初内容。四周年之后，我们又将从新的地缘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下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的地缘关系了。在行政地图上，除了藏南和阿克赛钦这两个热点板块之外，相信最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点，应该是尼泊尔和不丹之间那个被中、印两国瓜分的中间地带了。以行政区划来说，中国向喜马拉雅山南麓延伸的这片领土，被称之为“亚东”（县）；而印度与之相邻的突出部，则被标注为“锡金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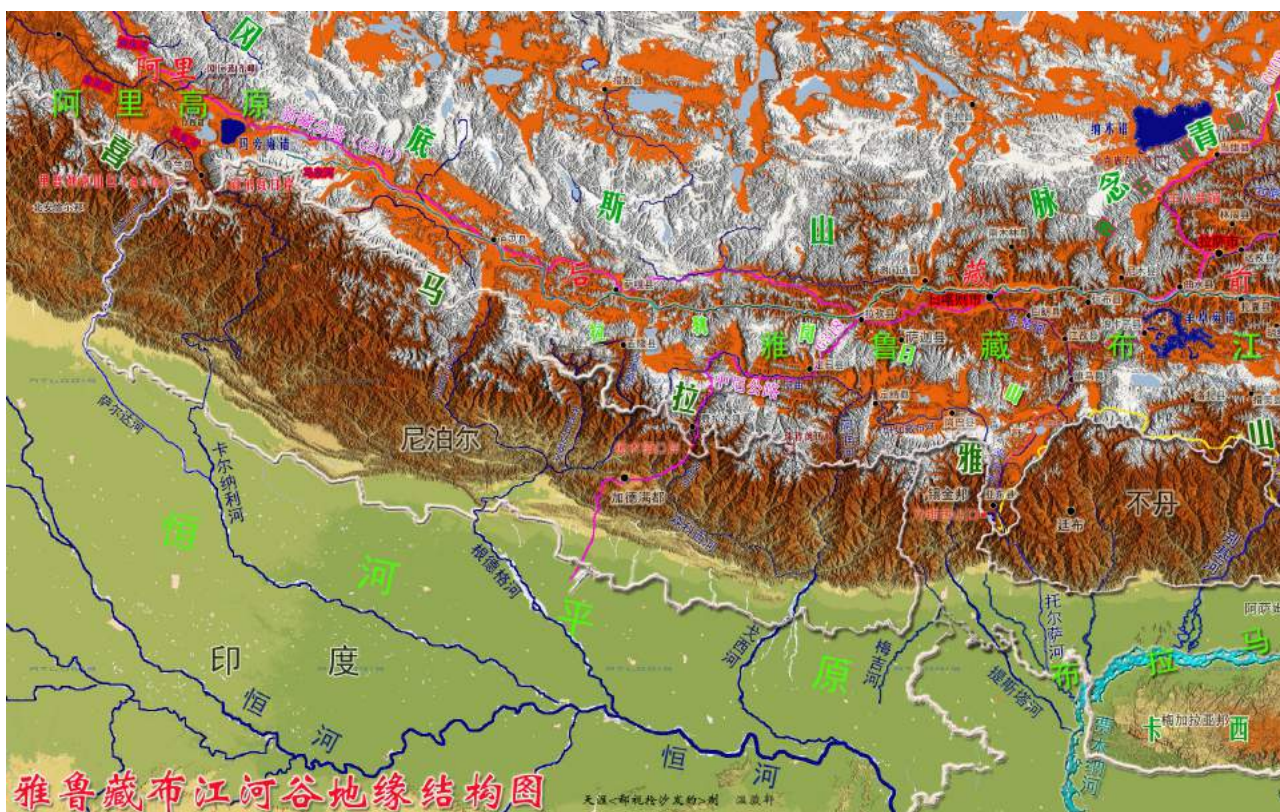
对于年龄稍长些的人来说，“锡金”应该都是以独立国家形象出现在自己的学习生涯中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只存在于中国地图上的小国，其实早在 1975 年就被印度以“民主”的方式吞并了（全民公投）。而中国之所以固执的要给这个不存在的国家以独立地位，无非是为了对冲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基于印度的态度转变，中国也已经在 2005 年从地图上抹去了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

以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渗透来说，古典时期的西藏土著做的要远比南亚低地上的印度人好得多。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这些山地板块，在古典时期都不是印度的菜。而相比更适应高温热带生活的印度人来说，习惯高原生活的藏人，对复杂山地环境的适应性就要更有优势了。凭借整合整个青藏高原而带来的实力优势，藏人在古典时期就已经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在面向印度洋的南坡山地上控制一些突出部。

在这些突出部中，亚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与它本身的地理结构，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很容易在地形图上看到，亚东所处的位置其实是喜马拉雅山

脉中间撕开的一个缺口，如果以行政名+地理形态的方式命名的话，可以称之为“亚东谷地”。从这样一个缺口穿越喜马拉雅山，肯定要比翻越雪线容易得多。更为重要的，亚东谷地本身的纵深已经足以承载一定人口聚落其间，并使之成为一个战略补给地。

亚东谷地并非是藏人或者中央之国所渗透的唯一一个，深入南亚水系上游的板块。如果大家仔细观察那张《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就会“欣喜”的发现，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之处，中国最起码具有了四条恒河水系的源头部分，分别是：阿润河、吉隆藏布、布地甘达基河、卡尔纳利河（孔雀河）。除了最西头那条著名的孔雀河之外，其他几条河流源头的控制，得益于一条界于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主脉之间的山脉——拉轨冈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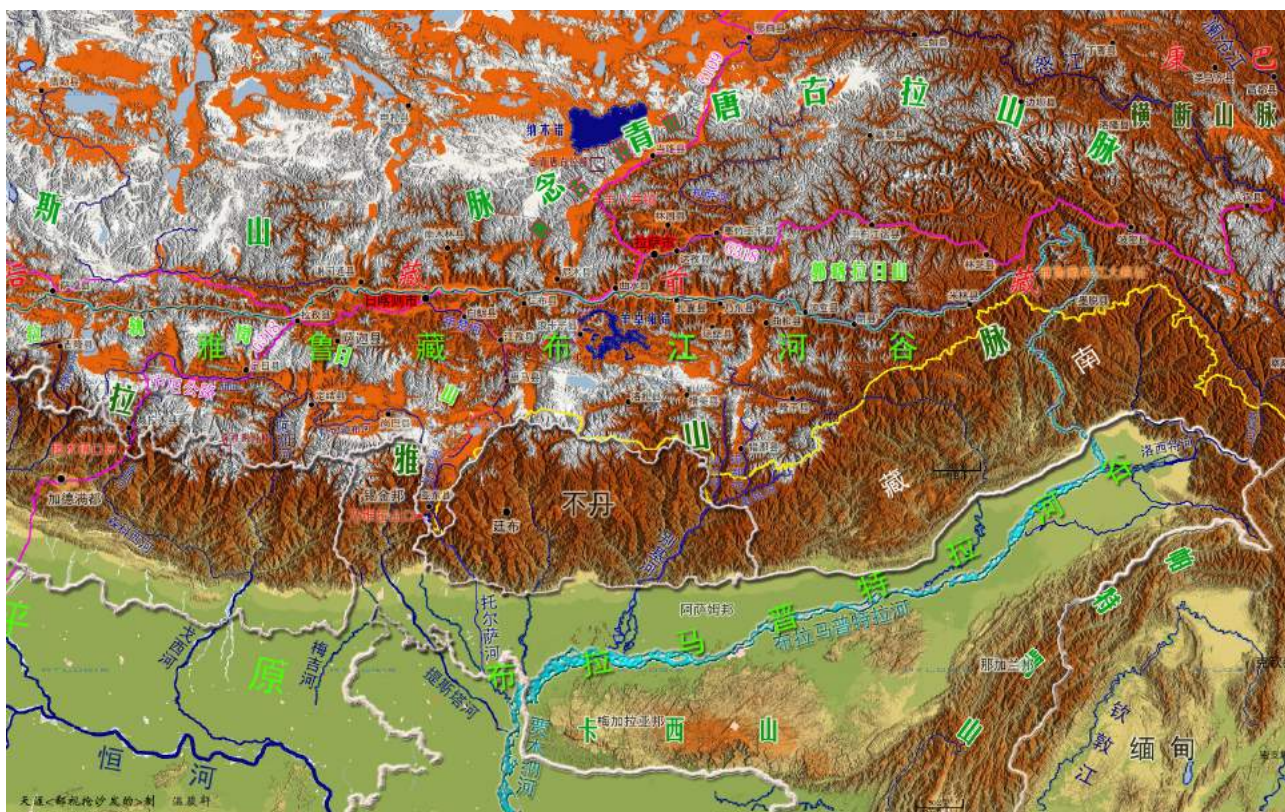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从结构上看，这条位于雅鲁藏布江之南的弧形山脉，应该也是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一方面与主脉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形成了一片纵横尼泊尔北部的盆地区（行政上包括吉隆、定日、定结、岗巴四县）；另一方面，尽管从雅鲁藏布江河谷方向，进入拉轨冈日山南麓要更为容易些。但基于地势原因，那些发源于拉轨冈日山南麓的河流，最终既没有向北成为雅鲁藏布江支流，也没有成为内流河。而是向南穿透喜马拉雅山主脉，成为了恒河的支流。这也使得来自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族群，更容易占据这条喜马拉雅山腹地的低地带，并获得进一步渗透南坡地带的桥头堡。



中、尼边境的具体地缘结构，并非我们这一阶段解读的重点。事实上，以分水岭原则来看，在中国与不丹之间存在着六处争议区域。而中国在藏南地区的渗透中，地缘优势无一例外都在中国方面（也就是说，都是处于恒河或者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支流地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那张《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自然来探究一番。我们的重心，还是在于解读亚东河谷在卫藏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交流中的连接作用。

虽然我们从行政地图以及地形图上，都感觉到了亚东谷地是切开喜马拉雅山山脊的一个缺口。但我们还需要从更微观的地理结构中，来探寻一下通道是怎么形成的。这当中，为亚东寻找一条“母亲”河的工作，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因为无论是成为一条天然通道，还是成为一个能够滋养人类生存的地缘板块，河流的存在都是最重要的。以地理结构来说，像亚东谷地这样一个北高南低的山间谷地，应该会有一条河流纵穿而过，并将收集到的淡水送往南亚次大陆甚至更远的印度洋。鉴于这条河流所涉及到的复杂地缘关系，我们可以为之找出三个名字：一是它的藏语本名“亚东麻曲”；二是它的汉语学名“亚东河”。至于这条河流流入印度的部分，印度人自然也会为它打上符合自己语言习惯的标签，这个标签被称之为“托尔萨河”。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托尔萨河最终汇入的河流是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迂回而来的雅鲁藏布河下游之水。当然，这个时候，这条能够同时收集喜马拉雅山南、北两坡淡水的河流已经改

了个印度名——布拉马普特拉河了。在托尔萨河汇入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后，这条已经拐了马蹄形大弯的大河，很快又将向南拐一个接近 90 度的大弯，并最终与恒河相会注入印度洋了。在拐弯之前，布拉巴普特拉河基本是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或者说和它上游的雅鲁藏布江平行而流的，只不过两段河流的方向正好相反罢了。之所以会有这么怪异的流向，是因为在喜马拉雅山东南角，有一条隶属“那加——诺开山脉”（南亚、东南亚地理分割线）的山地“卡西山”为之托底，使这段由西向东流向的河流，实际处于两山之间。基于这种地理结构，我们也可以称一地理单元为“布拉马普特拉河谷”。

从河谷低地的纵深来看，下游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要远超上游的雅鲁藏布江河谷。这也使得今天建制于此的印度阿萨姆邦，在人口上拥有对西藏的巨大优势（河谷人口超千万）。不过，尽管两个板块实际同饮一江水，并隔山相望。但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实际上使得二者之间并无地缘矛盾。高原土著并没有兴趣凭借高地优势，下降到海拔相隔几千米的低地上来发展；而包括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在内的南亚低地板块，也没有兴趣和能力将人口迁移至喜马拉雅山上去（更别说青藏高原了）。真正能够参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争夺的，还是低地民族。

在这场争夺战中，最初通过自然渗透而占据优势的，是来自中南半岛的民族（泰族等）。这似乎也让很多垂涎印度东北地区朋友看到了希望。问题是，作为英属印度的政治遗产，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已经是印度的一部分了。而同属低地民族的“印度斯坦人”（印度占据北部恒河流域的主体民族）向此渗透、定居的难度要明显低于克什米尔。在经过印度政府数十年的移民之后，今天的印度东北地区那些黄种土著的人口比例，已经快跌破一半了。这看起来，和中国在西域的经营情况很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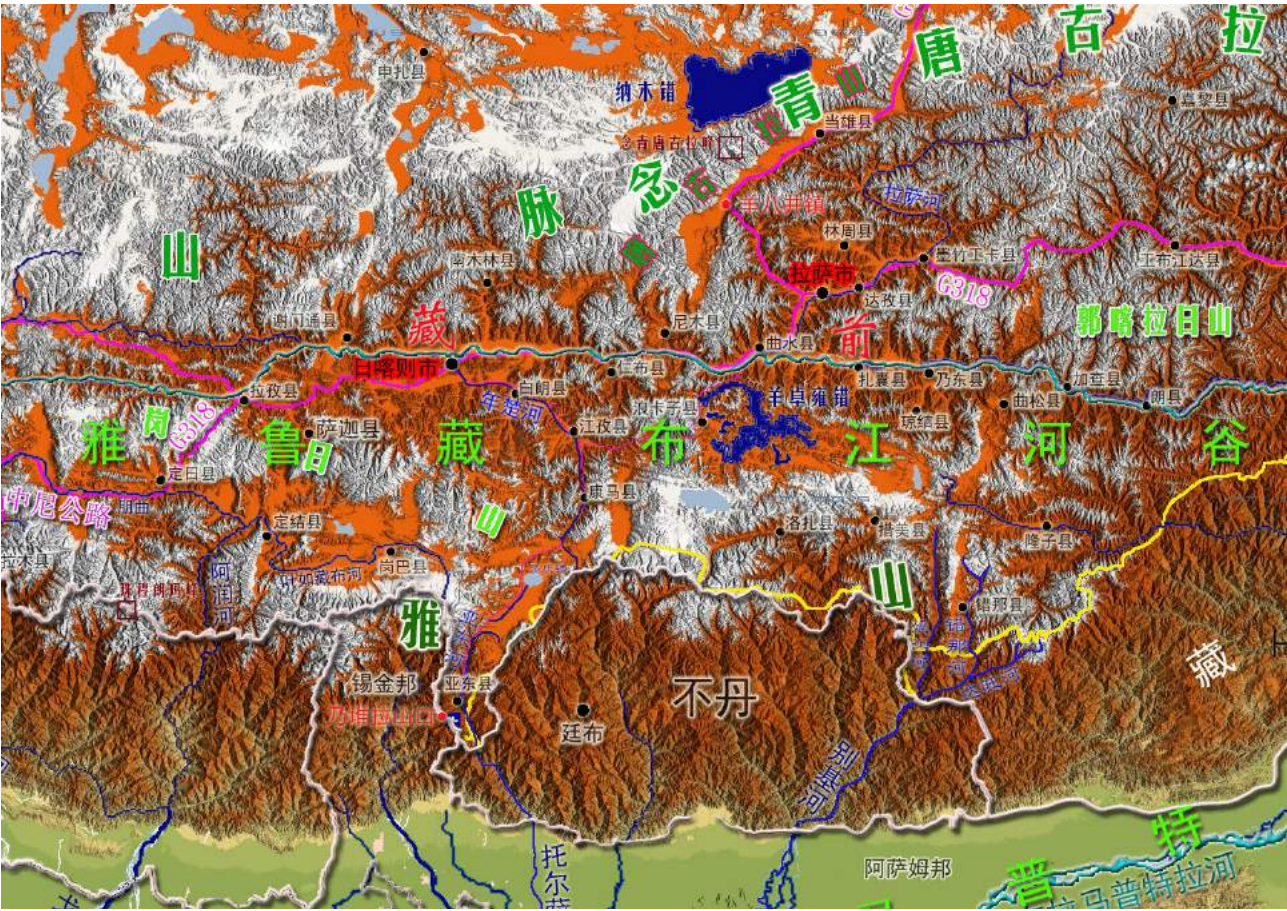
不过，印度在文化上的优势显然要更明显。这并不是说印度文明要优于华夏文明。而是说宗教天然所具有的扩张性、同化性，要强于华夏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天下”模式。正因为如此，在印度还没有得到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时候，那些黄皮肤的土著大多都已经成为印度教徒了。虽然印度要想彻底融合东北地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于种族结构本来就足够复杂的印度来说，共同的宗教信仰才是它能成为一个完整、独立地缘板块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还任重道远）。

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卡西山西端拐过那弯这后，又被改了一个新名字——贾木纳河。这个变化源于它进入了一个新的板块、新的国家。控制这个板块和国家的族群叫作“孟加拉”。从地理背景来看，孟加拉人所生存的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可以被称之为“恒河——贾木纳河三角洲”。由于孟加拉国的独立，我们在一般的行政地图上就可以看出，亚东谷地能够同时指向恒河平原、布拉马普特拉谷地、恒河——贾木纳河三角洲平原，三个人口密集的平原板块。控制这样一个突出部，对于西藏乃至整个中央之国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亚东在地缘位置上的重要性，并非在今天才体现出来。事实上，基于亚东谷地



的地理结构以及与卫藏地区的地缘关系，亚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与南亚次大陆交流的重要战略通道。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水系结构中更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当我们沿托尔萨河——亚东河穿越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带后，很快就能接入另一个处于雅鲁藏布江水系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系之间的山间盆地。这个盆地的核心是一个叫做“多庆错”的高山内流湖。从亚东河进入多庆湖盆，并不用费力翻越太高的分水岭。而同样的，从多庆错进入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也几乎没有障碍。为之接入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是一条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河流——年楚河。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年楚河的下游与雅鲁藏布江的河口地带，就是后藏的地缘中心——日喀则。也就是说，从日喀则出发的话，可以经这条由年楚河——多庆错——亚东河所组成的切割喜马拉雅山的低地带，避开难以通行的雪线进入到南亚次大陆，并选择进入三个重要的平原地带。结合拉萨河谷在拼接“羊八井盆地”时的地缘优势，我们可以拉出一条从安多藏区接入拉萨——日喀则——亚东，直至南亚次大陆的纵向切割整个青藏高原的交通线来。再结合雅鲁藏布江河谷本来所具备的横向交通功能（除了可以内部交流之外，还可向西向东，对接另外两个藏区亚板块——康巴和阿里）。拉萨——日喀则一线，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缘枢纽地位，就此被确立起来了。



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中段（也就是卫藏核心区）地缘优势地位确立这个问题上，南亚次大陆和它所承载的印度文明，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喜马拉雅山是一个完全将青藏高原与南亚隔绝的障碍，那么雅鲁藏布江河谷并没有可能成为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缘核心。相反，与中央之国核心区更为接近的安多、康巴板块会很有机会，从华夏文明汲取文化、技术优势，并最终以自己为中心辐射喜马拉雅山北麓。



亚东河谷

然而就青藏高原相邻的诸多板块来说，南亚次大陆北部在文明上的先发优势，以及在文化上的辐射能力都是最强的。最起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公元前五世纪，入主南亚的雅利安人，已经将恒河平原经营成为一片邦国林立、文化昌盛的文明之地了。而后来渗透青藏高原，乃至中亚、东亚的佛教，也已经在雅鲁藏布江河

谷所对应的恒河平原发展成熟了。在拥有亚东谷地等众多与恒河平原对接通道的背景下，占据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高原部落，最终得以厚积薄发成为整个青藏高原的主人。

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发力，以及“卫藏”地区能够凭借“菩萨”成为整个藏区的地缘核心，源自于公元7世纪在此建立的吐蕃王朝。也正是这个让唐帝国头疼不已的高原王朝，第一次统一了青藏高原，并让雅鲁藏布江河谷直接获得了与东亚地区交流的管道。从此之后，雅鲁藏布江河谷以及整个青藏高原，就实际处于东亚、南亚两大文明板块的共同影响之下。这种情况至今仍在持续当中。

现在的问题是，雅鲁藏布江河谷一定就是最早从南亚文明中汲取养分并崛起的板块吗？要知道，在雅利安人经营之下成为文明之地的恒河流域，并非是南亚次大陆的文明起源地。早在雅利安人入主之前，与两河流域地理距离、气候环境更接近的印度河流域，就已经诞生了成熟的“印度河文明”。即使在雅利安人入主南亚的初期，他们也是在融合、吸收土著民族所创立的印度河文明。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部落，受到文明辐射的时间很可能要低于青藏高原中，那部分隶属印度河流域的亚板块。至于这个板块到底叫什么，又有什么地缘证据能够证明这点，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十二章 玛旁雍错与拉昂错的不同特点

### 第一节 玛旁雍错成为多宗教圣湖的背景

以青藏高原的海拔来说，任何一个与之相邻的板块，都是会有机会在它上面获得一片集水区的。位于高原西南部的上、下印度河平原也不例外。在开启克什米尔部分之时我们也说过了，印度河的源头部分正是指向这片高原之地。当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一路上溯到它的源头处时，很快就会发现，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所包夹而成的这条谷地，并没有走到尽头。而接下来从两大山脉中收集而来的淡水，将沿着一条与雅鲁藏布江方向完全相反的路径，从南亚次大陆的另一面：阿拉伯海注入印度洋（雅鲁藏布江注入的是孟加拉湾）。

鉴于大家同处于一条低地带中，雅鲁藏布江与印度河之间的分水岭并没有成为一条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片位于雅鲁藏布江源头处的山地，被称之为“马攸木拉山”。穿越它的道路（219国道），修筑于马攸木拉山的北侧。相应的，分水点位置的山口，也就被称之为“马攸木拉山口”了。不过，将这个分水点定位为雅、印两江的分水点，其实还是不够严谨。因为当你兴冲冲的翻越马攸木拉山口，然后准备尝一尝印度河水时，却会被告知还不是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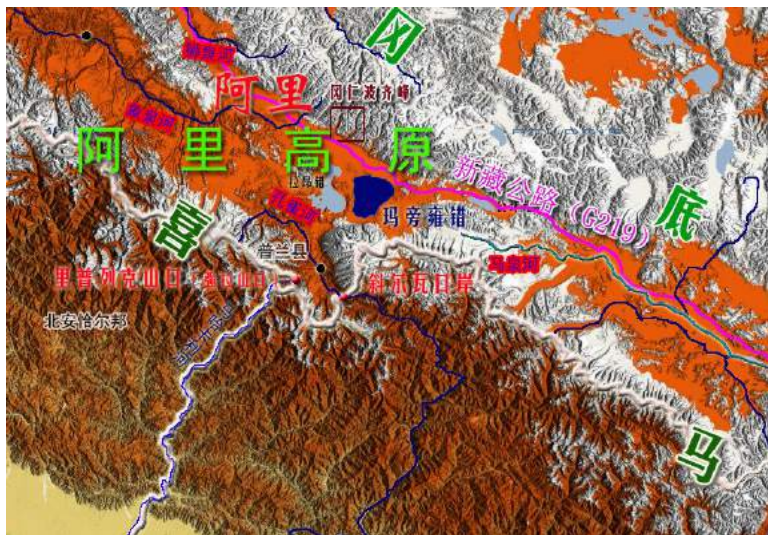
这并不是说，马攸木拉山口之西就没有水了。相反，你马上就能看到高原湖泊“公珠错”。只是湖水的味道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封闭的内流终端湖。也就是说，公珠错作为一个小型断陷盆地的最低点，并没有将从周边山地收集到的淡水送给印度河或者雅鲁藏布江。那么，当我们很快沿着公路从公珠错北部掠过后，是不是就能马上看到印度河之水了？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在青藏高原之上，两条外流河流之间因为地形关系出现一个内流盆地过渡一下，是很常见的。像我们在分析亚东谷地时，就会发现在雅鲁藏布江流域上游支流“年楚河”，与下游支流“亚东河”之间就有一个“多庆错”作为过渡。公珠错的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并不是唯一的过渡区，在它的西侧还有一个内流盆地区：拉昂错——玛旁雍错盆地。

对于绝大多数到此旅游（或者朝圣）的人来说，他们终极目标其实并不是印度河水，而是位于公珠错与拉昂错之间的“玛旁雍错”。在青藏高原那些被戴上宗教光环的湖泊中，玛旁雍错可以说是最为神圣的湖泊了。但凡到此一游的人，一般都会采取“转湖”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圣湖的崇拜之情。而除了那些在神秘环境中寻找精神寄托的小资、伪小资以外，来这片圣湖朝圣的主要还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者。

在青藏高原这片藏传佛教覆盖地，一个湖或者一座山被标注上特定的宗教含义，并为朝圣者所关注并不稀奇。然而玛旁雍错的影响力，却并不仅仅限于藏传佛教的

信仰者。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本土宗教“苯教”，以及来自南亚的印度教徒、耆那教徒也同样将玛旁雍错视为神圣之地，并前来朝圣。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玛旁雍错

玛旁雍错之所以能够成为多种宗教体系的圣湖，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位置。我们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或者《克什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中可以看到，这个盆地正好位于四条外流河中间。这四条河流分别是，东部的雅鲁藏布江；北部流经克什米尔的印度河上流；西部的萨特莱杰河（印度河中游最东侧的一条支流）；以及南部的卡尔纳利河（恒河中游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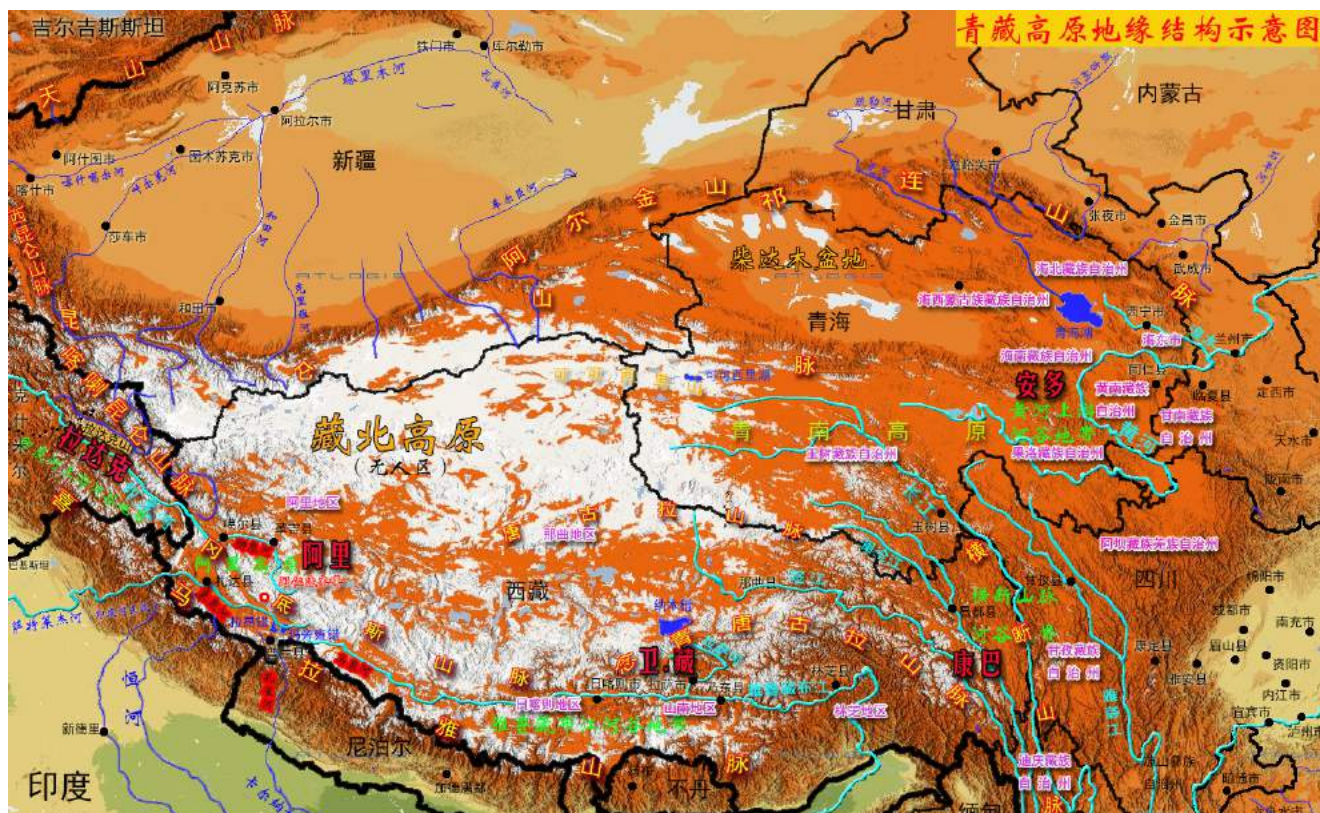
上述四条河谷的存在并非只有地理学上的意义。从地缘结构上看，它们分别可以指向“两高两低”，共计四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板块。这四个地缘板块分别是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地区；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卫藏”地区；印度河中游，上印度河平原的“旁遮普地区”；以及印度的核心板块

“恒河平原”。如果我们从宗教角度地来看，上述四个板块又“恰好”是将玛旁雍错视为圣湖的四大宗教的兴起之地。这也就是说，从克什米尔地区传播而来的苯教、成型于卫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定型于上印度平原的印度教，以及起源、发展于恒河平原的耆那教，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朝圣通道。而这也使得它们，能够殊途同归的将玛旁雍错定位为自己的圣湖。

在人类自然、宗教崇拜的心理中，将高山以及高山之上的某一处自然特征，作为神圣之地是一个普遍现象。作为人类难以大规模生存的高地，很容易被推定是神居住的场所。事实上，也曾经有来自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旅行者，试图沿着这一逻辑将玛旁雍错及其所属板块，纳入华夏文化体系。这和张骞从理论上论证塔里木河与黄河相连，并将华夏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坐标意义的“昆仑”标签，贴到塔里木



盆地的推定非常相似。而在这次文化扩张的尝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那位与昆仑概念紧密相连的西王母。至于玛旁雍错，当然就是西王母沐浴用的“瑶池”了。只是在这套逻辑中，玛旁雍错附近缺少一条与东亚半岛相连的河流（哪怕是塔里木河水系也行，反正张骞已经把黄河和塔里木河连上了），就像那四大宗教所拥有的朝圣通道一样。



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

如果中央之国在古典时期就已经直接经营青藏高原南部地区的话，相信一定会有官方的理论家完善上述推理的。可惜的是，现在的中央之国已经不需要这样的“地缘理论”来扩张华夏体系了。所以这类牵强附会的说法，主要是为当地的旅游业添点彩头罢了。对于我们来说，玛旁雍错及其所属板块的地缘结构，才是需要真正了解的问题。

四大板块同时指向玛旁雍错所属的地理单元，固然是它成为众方朝圣之地的地理背景。然而就这四大水系所指向的这一断陷带来说，玛旁雍错并非是唯一的湖泊。如果说它东部的公珠错，是因为体量相对较小而退出了争取圣湖头衔的竞争的话，那么看起来与玛旁雍错亲密无间，体量也相差不大的拉昂错呢？以这个高山湖泊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最起码应当有机会与玛旁雍错共享圣湖之名的。然而悲剧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在信仰者的眼中，拉昂错非但没有机会共享圣湖之名，还被作为一个反面典型树立在了玛旁雍错的对面。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鬼湖”，才是它

的宗教标签。



拉昂错



玛旁雍错

从表面看，拉昂错的命运之所以和玛旁雍错的反差这么大，直接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人畜无法饮用的咸水湖，湖内及周边地区都没有生命的迹象。其实作为一个咸水湖，也并非没有机会成为圣湖。高原四大圣湖中的青海湖、纳木错都是内流的咸水湖。只不过这两个咸水湖的咸度不算太高，还能够养育出鱼类等动植物。对于想跻身“圣湖”行列的竞争者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很难想象

一片死亡之地，会被人类和“神”选中戴上神圣的光环。

相比拉昂错黑暗形象，玛旁雍错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阳光的形象了。最为让人称奇的是，它居然是个淡水湖。在一个内流区寻找到一个淡水湖，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而这也与它成为四方朝拜的圣地，有着莫大的关联。

## 第二节 玛旁雍错与拉昂错盐度差异的原因

玛旁雍错并不是唯一生存在内流地区的淡水湖。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甚至不是青藏高原上唯一的淡水湖。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南侧，与拉萨隔江对应的位置上（直线距离不足 100 公里），就有一个面积比玛旁雍错更大的淡水湖“羊卓雍错”存在。如此稀少而又处于青藏高原核心地区的淡水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跻身圣湖之列了。所以在青藏高原四大圣湖的序列中，羊卓雍错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羊卓雍错的轮廓很不像是一个盆地形状的天然湖泊，它那枝节甚多的外形，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在狭窄河谷地区筑坝蓄水而形成的水库。比如那个大家因广告而熟知的“千岛湖”（本名为“新安江水库”）。其实羊卓雍错也的确可以被看作一个



水库，只不过它是由于泥石流堵塞河道而天然形成的水库。这种情况，我们在解读帕米尔高原上的萨雷兹湖时也碰到过。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羊卓雍错变成“水库”的时间可要早上亿年。



羊卓雍错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羊卓雍错卫星图

质，只能在湖区沉积，并使得湖水变咸。当然，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羊卓雍错还是一个湖滨水草丰美的淡水圣湖。即使将来有一天它的湖水变咸，但只要盐度不超过 47%（这意味着还能有鱼生存），估计都还是有机会继续接受朝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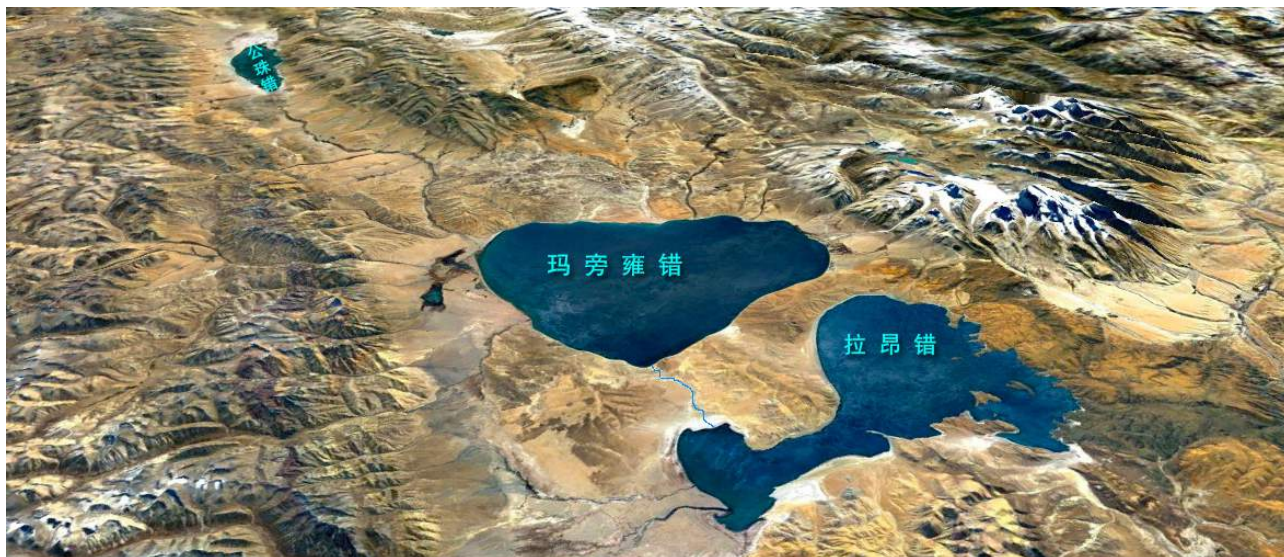
既然羊卓雍错长期的外流历史，使之成为了高原上难得一见的淡水湖，那么玛

尽管羊卓雍错因为地质灾害而成为了一个湖泊，但在变身成为堰塞湖的绝大部分岁月里，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终端湖。最起码在丰水期，湖内之水漫出湖区，借助水道输入雅鲁藏布江。这种进水与出水并非完全同步的现象，看起来很像一个吞、吐动作。因此我们也可以称此类湖泊为吞吐湖。说起来，由于人类的开发，像鄱阳湖这样连接赣江与长江的中继湖，现在也差不多成为一个周期性内流的吞吐湖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羊卓雍错据说也已经完全封闭成为一个内流湖了。

成为一个内流区的终端湖，意味着上游河流所带来的矿物质，



玛旁雍错的圣化背景，是不是也是如此呢？答案是：也是，也不是。说它是，是因为玛旁雍错也的确曾经长期是一个吞吐湖；说不是，是因为即使是在它“吐水”的时间里，这个神圣的湖泊依然不能说是一个外流江河流域的一部分。简单点说，就是为玛旁雍错溢出的水，最终并没有注入它边上的四大外流河中，而是就近流入了西侧的拉昂错。



玛旁雍错和拉昂错卫星图



玛旁雍错和拉昂错水道图

成功与失败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拉昂错正是以自己的“失败”，衬托出了玛旁雍错的“成功”。与集水区更接近，以及湖底海拔更高，都是玛旁雍错没有成为终端湖的直接原因。相比之下，拉昂错就要悲剧得多了，谁让它的海拔更低，并且西侧没有更低的盆地来帮助它成为一个吞吐湖呢？

像玛旁雍错与拉昂错这样近在咫尺，却命运完全不同的案例，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像西淡东咸的巴尔喀什湖也是如此。由于巴尔喀什湖东西两部分尚有长年蓄水的水道相连，因此它还能被看成一个湖泊。而这个中亚最大的湖泊，是否能够不被分身，说起来倒是与中国的经济政策有关了。要是中央之国决定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并试图获取更多伊犁河之水的話，哈萨克斯坦境内又多出了一



个湖泊的结果，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参照咸海变迁的速度，相信在我们都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

另一个相似的案例，是兴都库什山脉西侧锡斯坦盆地的“赫尔曼德湖”与它南面的济里盐泽。只不过在这个案例中，帮助赫尔曼德湖排盐的盆地，已经变成一片盐的世界了。对于古典时期的宗教信仰者来说，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科学解释这一切。尤其是两个距离如此接近，景象却完全相反的湖泊出现在面前时，一切就变得更加不可思议了。因为高盐度而呈现出的深蓝色，以及周边荒芜的景象，都让人感觉到，拉昂错与玛旁雍错仿佛是一个太极图的阴阳两面。由此，也更加彰显出了玛旁雍错的神奇（你要知道美女这个东西，跟鲜花一样需要有绿叶来衬托才会显出她的娇媚）。至于拉昂错，它甚至不会被当成一片绿叶。一个被魔鬼控制的“鬼湖”（拉昂错藏语本意为“有毒的湖泊”），才更能让玛旁雍错由“神奇”上升至“神圣”的层面。



拉昂错

既然古典时期的知识，无法解读玛旁雍错的淡水之谜，那么将它与周边的某一条外流河联系起来，将之视为一条河流的源头部分的推理，就很容易被人所接受了（河流源头处蓄有一个湖泊，是很常见的景象。比如加利利湖之于约旦河）。而玛旁雍错的特别之处在于，有来自四个方向的宗教信仰者通过四条河谷无限接近它，并争相将与之建立地理、宗教上的联系。至于并没有河道与这四条河流相连的玛旁雍错，到底是怎么与它们相连的，这个问题重要吗？既然是圣湖，当然会有自己的办法了。可以想见的是，潜行地下会是最“符合”逻辑的一种思路。不相信的话，可

以参照张骞是如何把葱岭河与黄河联系起来的案例。又或者济水，是如何被相信是“潜行”而过黄河的。

上述从科学层面的解读，并非和技术上的打假，也并非是为了去除所谓封建迷信。所谓“地缘”与“地理”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加入了人的因素。这当中除了那些符合科学逻辑的理解，也包括人类基于技术条件限制，而形成的某些能够自圆其说

的逻辑（比如中医理论）。只要这些逻辑能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对群体性的“人”造成影响，都应该被视为合理的地缘因素。

对于玛旁雍错及其所属板块来说，宗教方面的神化，其实只是该板块地缘位置重要性的一种表现方式。一种基于原始地缘关系，而升华到精神层面的“地缘逻辑”。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个板块，的确是几大地缘势力碰撞的焦点板块。

以地缘板块来划分的话，玛旁雍错只是所属板块中的一个点。这个板块真正的地理标签是“阿里高原”。在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行政版图中，阿里是一个地区级行政机构的名称。它管辖着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青藏高原西部（中国境内）约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面积如果用来单独建省的话，已经足以在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9了。当然，经过前面的解读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在青藏高原这种极低人口密度的地区中。通常一个行政区中能够真正承载人类生存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被划入这个行政区的地理单元，都是生命的禁区或者野生动物的乐园。

在对照阿里地区的行政轮廓位置后，认真看过为这部分内容而制的几张地图的朋友，应该已经判断出了，阿里地区北部的大部分土地，是前面被我们判定为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生存的，隶属内流区的“藏北高原”。而阿里地区的西南部，则是绝大部分归入印度河流域，极小部分归入恒河流域的外流区，这部分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阿里高原”。

### 第三节 吐蕃引入佛教对抗象雄的苯教

我们都知道吐蕃王朝的雄主“松赞干布”迎娶了唐帝国的“文成公主”。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松赞干布同时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婆罗国”（今尼泊尔境内）娶了一位公主——尺尊公主。从这两个战术举动，大家也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吐蕃王朝实际上是在同时吸收东亚、南亚两大文明的技术优势。当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成为了青藏高原最有地缘交流优势的板块时，阿里地区唯一能够与卫藏地区对抗的地缘优势也荡然无存了。很快，吐蕃王朝在与象雄王朝的地缘博弈中成为了胜利者，阿里高原也成为了吐蕃王朝的一部分。直到吐蕃王朝没落，青藏高原又重新陷入政治分裂状态时（不过民族认同、意识形态上已经统一了），阿里板块才以“古格王国”的政治标签，独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

地缘博弈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们具体可以从很多角度来阐述两大体系之间的竞争。比如中国与印度的竞争，既可以从单纯的地理角度，被看作是“东亚半岛”与“南亚半岛”的竞争；也可以被认为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教文明之间的博弈。在具体的竞争过程中，竞争的一方往往会有意无意在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出与对手不一样的选择。就像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在与阿拉伯半岛的闪族人竞争时，会特立独行的以什叶派立国一样。



在诸多层面的对抗中，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是最为激烈的。阿里王朝基于地缘位置优势，引进、消化、吸收而产生的“苯教”，是他们能够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俯视这个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如果吐蕃王朝想抢夺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也就必须做出类似伊朗人的选择。对于吐蕃人来说，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不难。毕竟他们同时拥有对接东亚、南亚两大文明的地缘优势。

虽然中央之国的历史学家喜欢无限放大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影响力，并试图以此暗示西藏地区早在 1400 多年前，就是中央之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常不好意思，我幼时通过教科书，就是得出了这样的印象）。但实际上，以地缘位置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力来说，南亚对于与之仅一山相隔的卫藏地区，显然要更具影响力。从印度方向选取一个成熟的宗教，用以对抗象雄人的苯教体系，要比向中央之国学习那套儒家体系要容易得多。

在印度诞生的诸多宗教中，佛教和印度教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宗教。在吐蕃王朝兴起的时代，印度教在与佛教、耆那教等后发宗教的竞争中，正重新获得优势，成为南亚次大陆统治者所信奉的宗教。不过，基于南亚文明在宗教问题上的包容性，这种此消彼长的交替过程并不血腥。印度教在复兴并成为主导宗教的同时，也给了佛教等宗教以自然生存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到访北印度的玄奘法师，才仍然有机会感受到佛教的存在。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到底选择哪一种宗教并不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但对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来说，这个决定却必须慎之又慎。以吐蕃王朝的角度来说，他们之所以急于引进一个全新的宗教，是希望在与近邻象雄王朝的竞争中，不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制于人。然而以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位置来说，恒河平原同样会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那些能够将文化和商业利益输送上高原的通道，也一样有可能将来自印度的政治影响力带上来（在上世纪前半叶，这种情况就发生过）。基于这个理由，选择一个与印度统治者相同的宗教，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并不明智。相反，如果选择一个在南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成熟宗教，那么吐蕃就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迅速完成自己的文明进化史。

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从走向衰亡的东罗马帝国，接过东正教的大旗这一案例中，也同样发生过（伊朗选择伊斯兰教中弱势的什叶派，也是如此）。历史证明，这类选择的确很成功。最起码我们今天提到东正教、什叶派、佛教，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俄罗斯、伊朗、西藏三个板块。

说到这里，不妨提一下很多朋友期待解读的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单从中、印两国博弈的层面来看，这个故事的确容易激发起民族主义者的自豪感（让人感觉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征服”过印度）。但结合到当时的地缘政治结构，这其实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因为作为帝国使者的王玄策，出使印度所执行的任务实际上和张骞类似，是为唐帝国在吐蕃背后的印度寻找战略盟友，以牵制这个强大

的对手（虽然这时唐、吐两国，已经貌似化干戈为玉帛了）。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帝国使者在吐蕃的帮助之下，攻击了这个本该合纵连横的对象。

尽管王玄策有充分的理由（使团被劫杀）执行这次攻击行动，并且在战术上可圈可点。但从战略层面上来说，这无疑帮助吐蕃解除了背后潜在的威胁。对于被攻灭的印度政权来说，他们只会意识到自己是败于实际主导、执行作战任务的吐蕃。试想一下，如果李广利或者后来远征西域的汉将，不是依靠帝国远征军，而是从匈奴借兵征服大宛等背汉国家的话（这和引导西域小国互相攻伐又不一样），会造成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后果。关于这次“远征”印度的得失就很容易盘算得清楚了。

回到阿里板块与卫藏板块的博弈问题上来。为对抗象雄王朝意识形态控制权所引入的佛教，最终也不负众望的成为了吐蕃王朝整合青藏高原的终极武器。当然，由于苯教作为吐蕃人信仰了数百年的土著宗教，在与佛教的碰撞中也多次在吐蕃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对抗。尽管佛教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在这种磨合中融入了非常多的苯教因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藏传佛教，从本质上来说应该算是苯、佛两教的融合体。而那些让现代都市人感到神秘不已的宗教元素，实际上大多数都来自于苯教。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佛教为体，苯教为用”。

虽然苯教和象雄王朝今天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但在我们现阶段所参考的历史时段，它们却正处于兴盛期。那么张骞和后来的汉朝使者有没有机会接触到神秘的阿里板块呢？阿里板块与我们正在解读的克什米尔板块，又是什么样的地缘关系？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十三章 青藏高原上阿里地区的特征

### 第一节 阿里高原因气候因素而潜力低

我们一直说山、水相连，既然有了玛旁雍错这个圣湖，它的边上也应该还有一座圣山与之匹配了。当然，像青藏高原这样的海拔，以及玛旁雍错紧邻冈底斯、喜马拉雅两大山脉的位置，想在目力所及范围内找一座山峰实在是太容易的一件事。只不过要想最终当选圣峰的话，总是得有些过人之处。像玛旁雍错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是个难得一见的淡水湖一样。

最终成为圣山的，是玛旁雍错西北部的一座叫作“冈仁波齐”的山峰。冈仁波齐峰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有赖于它那奇特的外形。用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形容就是“骨骼清奇”。这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外形，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天然的类金字塔状。只是藏民没见过金字塔，在他们眼里，这座山峰像一个“石磨的把手”。不管像什么，这样颇有几何感的外形，总是容易有识别度的。冈仁波齐峰的金字塔外形，也为朝圣者带来了技术上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围绕这座圣山的举动（转山）来净化自己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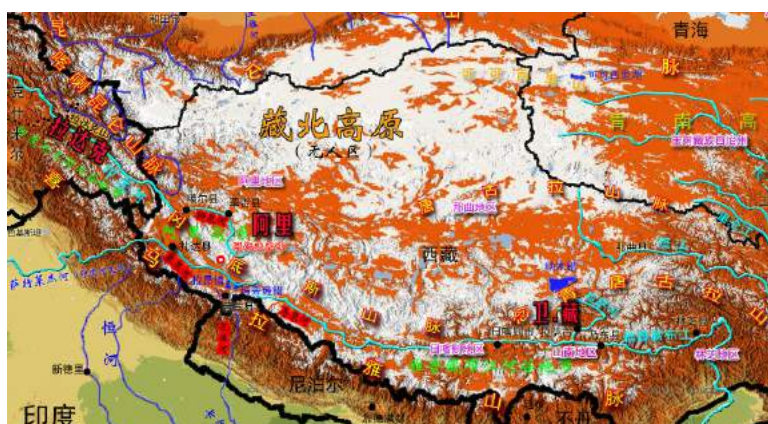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会特意去关注这些转山、转湖的路线。我们所关注的，是以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为轴心的区域，到底有什么地缘价值。相信知道玛旁雍错、冈仁波齐峰的朋友，一定也知道四条与之紧密相连的河流：狮泉河（森格藏布）、象泉河（朗钦藏布）、马泉河（当却藏布）、孔雀河（马甲藏布）。这四条河流我们并不陌生，它们正是我们之前所列出的源头指向玛旁雍错的四条河流（印度河、萨特莱杰河、卡尔纳利河、雅鲁藏布江）在阿里高原的部分。其中狮、象、孔三条河的地理边界，大致在国境线附近。马泉河谷则相当于仲巴县境的雅鲁藏布江河谷。

当我们把视线停留在包括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马泉河在内的这段东西纵深 700 公里出头的谷地时（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轴线正是它的中心线），就会发现，冈底斯山脉西段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这段低地，南北纵深明显要比日喀则、拉萨所在东段地区更宽。如果地缘潜力仅仅考量的是低地面积的话，那么整个西藏地区甚至藏区的地缘中心，应该更有机会出现在这四条动物前缀的河流边上。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地势仅仅是人口聚落所需考虑的一个因素。最起码有一个因素，要比地势问题更容易影响到人类生存，那就是气候。

海拔、纬度、季风的影响，都是影响气候的重要原因。悲剧的是，相比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阿里高原的河谷低地最多只能说是在纬度上与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至于后两个因素，却是没有半点优势的。首先来看海拔，单从阿里高原是包括雅鲁藏布江在内的四大河流的源头之地，大家也能判断出它河谷低地的海拔要高于那些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

的草本植物进行畜牧生产，才是生活在此地的土著最为现实的选择。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农牧混合的地缘板块，农业板块在人口潜力上的比较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即使不包括拉萨在内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的人口，也已经达到百万。而同时期的阿里地区，则只有不到 8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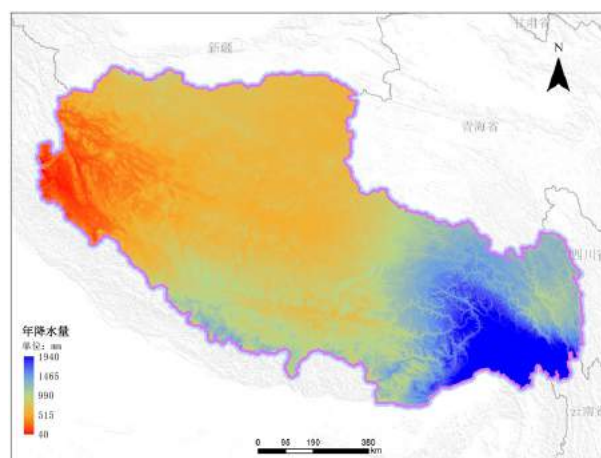
河流的中下游地区。比较雅鲁藏布江上游的仲巴县城，与中游的拉萨市，我们会发现这个海拔差距高达 1000 米（前者 4772 米，后者 3650 米）。这样的海拔差，已经足以对两地的气候造成重大影响了。

尽管阿里高原有四条河流分别通往印度洋中的阿拉伯海、孟加拉湾。但鉴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以及自身的海拔因素，印度洋的季风（特别是从雅鲁藏布江峡谷上溯而来的季风）在滋润了中游河谷之后，已经很难再为这片高原带来多少降水了。即使在那些相对下游地区，年均降雨量至多也只有 100 多毫米。高寒、少雨，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得阿里地区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

依靠那些在干旱地区顽强生存的



冈仁波齐峰



西藏降雨量图



虽然在人类的历史上，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机动性，以及兵民一体的生活方式，对人口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农耕民族造成了巨大压力。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最终的胜利者还是人口占优的一方。尤其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游牧民族已经完全没有逆袭的可能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阿里地区目前在整个藏区地缘板块结构的划分中，通常只是作为卫藏的附属部分，而不是一个能够与安多、康巴平级的板块。

## 第二节 象雄王国在阿里高原文明先发的原因

尽管阿里板块如今已经没落了，但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历史中，阿里板块却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在康巴、安多地区还处在羌系民族的覆盖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还未曾崛起的时候，凭借特殊的地缘位置，阿里板块成为了青藏高原中最先崛起的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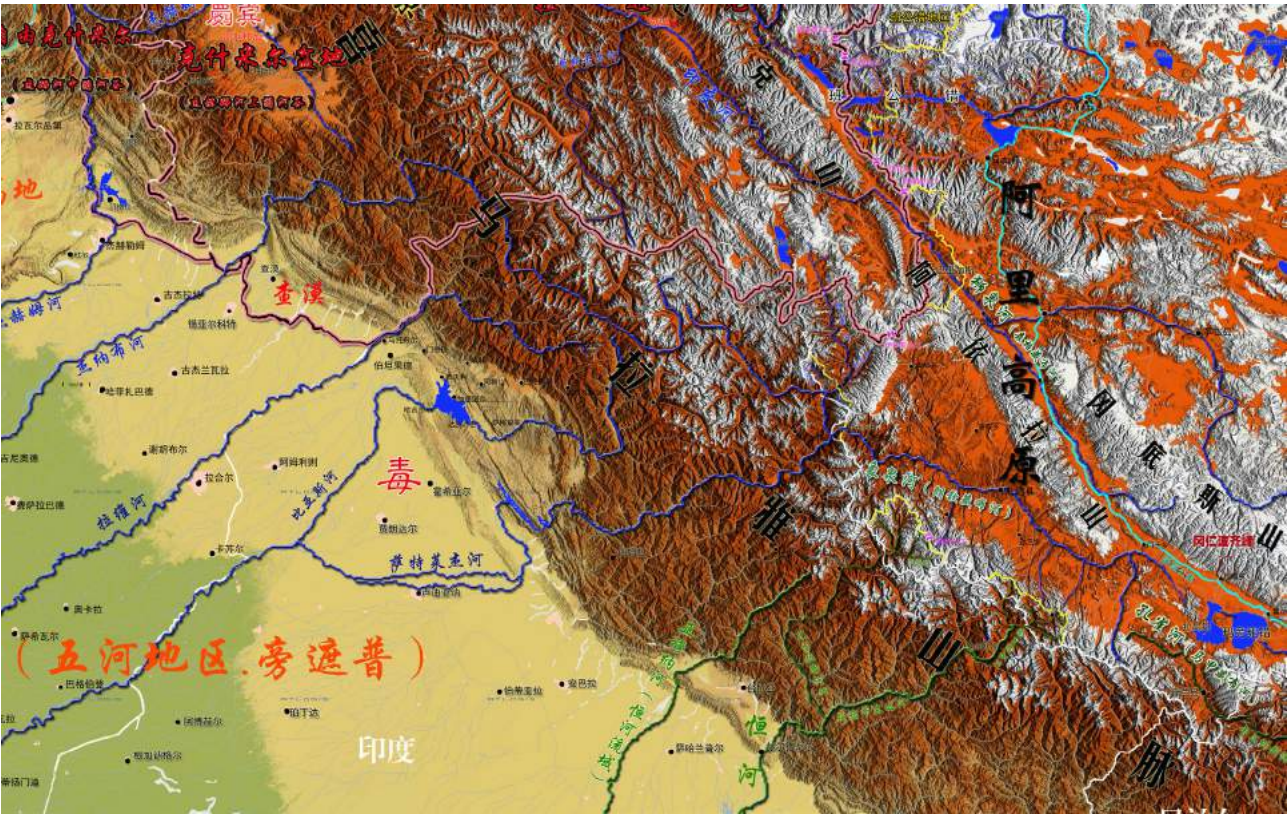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看到的藏民族，成型于吐蕃王朝。而日喀则——拉萨一线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成为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缘中心，也正是起于这个这个高原王朝。在此之前，青藏高原内部的诸板块是被不同的族群所覆盖，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能够成为吐蕃人直接对手的，是与之山水相连，立足于阿里高原的“象雄王朝”。在阿里高原的历史标签中，与象雄同级别的标签还有古格、苯教两个政治、宗教标签。很多时候，大家容易混淆象雄与古格两个王朝。简单点说，象雄王朝是一个早于吐蕃建立，并在吐蕃王朝建立初期与之竞争的王朝；而古格王朝则是强大的吐蕃王朝分裂后，由吐蕃王室后裔在象雄故地上建立一个王国。

至于苯教，则是由象雄人所信仰的，被认为是藏传佛教传入之前，覆盖今日西藏地区的土著宗教。按苯教信仰者的说法，这是一个延续了一万八千年历史，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古老宗教。对于这个年限，我们大可持怀疑态度。不过苯教的起源时间，早于现在存在于喜马拉雅山南北两麓的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同样势衰的耆那教却是可以肯定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古老的宗教，才能最先抢占阿里高原这个制高点，并由此向青藏高原扩散。关于苯教的教义究竟如何，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并且其中的很多元素都在藏传佛教中得到保留。

我们所关心的，是为什么阿里高原有机会最先拥有相对先进的意识形态，并领先条件更好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建立王朝。这一点，其实从阿里高原的地缘位置上，就可以找到答案。以地缘位置来说，阿里高原是青藏高原中最靠近中亚和印度河平原的板块。狮泉河指向的印度河干流河谷；以及在南亚次大陆汇入印度河中游的象泉河指向的萨特莱杰河，相当于连接阿里高原与中亚及南亚印度河平原的天然通道。这也意味着，在恒河流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时，青藏高原南部与包括印度河流域在内的文明领先地区之间的沟通，都是经由阿里高原中转来完成的。而在

这种中转过程中，阿里高原游牧部落所具有的机动性，也正好可以服务于商业、文化交流活动中。

文明传播的桥头堡位置（之于青藏高原），使得阿里高原能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能够先发于地理、气候条件更好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这种因地缘位置而兴起的案例，在我们以前的案例中也比比皆是。借助交通枢纽位置兴起的部族，原始属性中既有农业属性，也有游牧属性的。即使是游牧属性的王国，如果希望长期、稳定的通过控制商路而获取利益的话，也会部分选择合适的地点构筑堡垒定居，甚至因此而尝试转型农业。至于最终成功与否，就要看土地的气候、环境是否适合了。从这点来说，阿里高原并不具备完全转型的条件。虽然象雄王朝在一些定居点附近也会有一些灌溉农业存在，但总的来说，这还是一个以牧为主的国家。在象雄王朝势衰的时候，他们所放牧的牲畜也经常成为周边王国所劫掠的对象。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当南亚次大陆的文明中心随着雅利安人的扩散，而逐渐由印度河流域东移至恒河流域时。与恒河流域隔喜马拉雅山相望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对接文明中心的任务，也因此由阿里高原转向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亚洲另一个文明中心——东亚的交流中，位置靠东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也同样显现出了优势。这一点，在吐蕃王朝的兴起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当象雄人决定在阿里高原驻牧，并依靠这个板块在地缘位置上的优势，帮助自己从部落时代上升至“国家”时代时，也意味着阿里高原中的一些亚板块将会是这种改变的基础。根据“水是生命之源”这个原则，阿里高原神圣的四条河谷，势必成为象雄王国地缘中心最为有利的竞争者。

由于年降水量均不到 200 毫米，阿里高原四条相对条件最好的河谷，在气候上也属于“温带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这样的降水量意味着，我们甚至无法在这一地区看到印象中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这样的降雨量，并不代表雨水就不重要了。相反，你越能多从海洋获得一些暖湿气流，就越有机会压倒竞争对手，成为人类的选择（气流带来的不仅是降雨，还有温度）。

### 第三节 马泉河谷在阿里板块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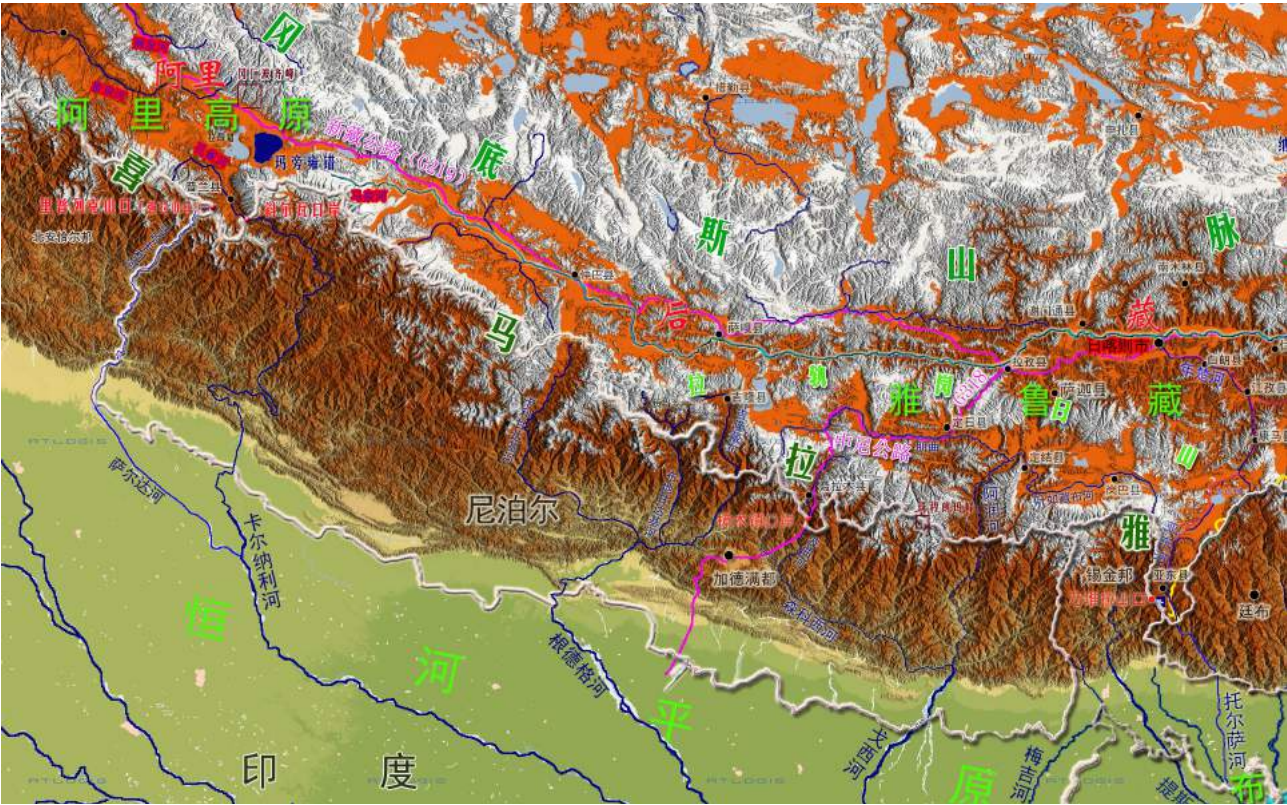
我们先来看看马泉河，目前在这条雅鲁藏布江源头地带所设立的行政区叫做“仲巴县”。如果以与印度洋季风的距离来看，仲巴县并无优势。所以这个日喀则地区最西部的县，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行政区。从位置上看，马泉河谷很明显是一个在板块划分上有双重属性的板块（既可归入阿里板块，也可视为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一部分），在地缘上也会成为东西两大势力争夺的焦点。这一属性在仲巴县的行政变迁上也得到了验证。

以马泉河谷的地理环境来看，它更应该在地缘板块划分中被归入阿里板块。事实上，无论是在象雄、古格时期，还是红色政权入主西藏之前，雅鲁藏布江的源头也的确都是被视为阿里板块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成为苯教覆盖区。然而在那些习惯于分水岭原则的现代政治家看来，板块的整体安全会更为重要。那些生活在边缘地区的族群到底是什么想法，本身的地缘属性又是否与同流域其他族群相似，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比如基于这个原则，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之上的“高山塔吉克人”，就被分别划入了中国、塔吉克斯坦，乃至阿富汗境内。仲巴县的情况也是如此，1962 年之后，原属阿里管辖的仲巴县成为了后藏日喀则地区的一部分。尽管这种看法看似提高了仲巴县的政治地位（毕竟日喀则是青藏高原中心板块的一部分）。但对于风俗、语言与其他三条河谷地区一致的当地居民来说，这种变化却需要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

其实作为阿里板块的边缘亚板块，马泉河谷被政治上占据主导地区的卫藏所吸收，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就像中央之国的核心省份，现在也已经顺着河谷将行政线划上了青藏高原一样（尤其是四川省）。单从位置来看，这样的边缘地区也很难成为所属板块的核心地区。阿里板块要想成为与卫藏地区相抗衡的板块，还必须在其他三条河谷中挖掘潜力。

既然马泉河谷在气候和位置上都不太可能成为阿里地区的核心板块，那么其他

条河谷当中，谁又能够在综合指数上占据优势呢？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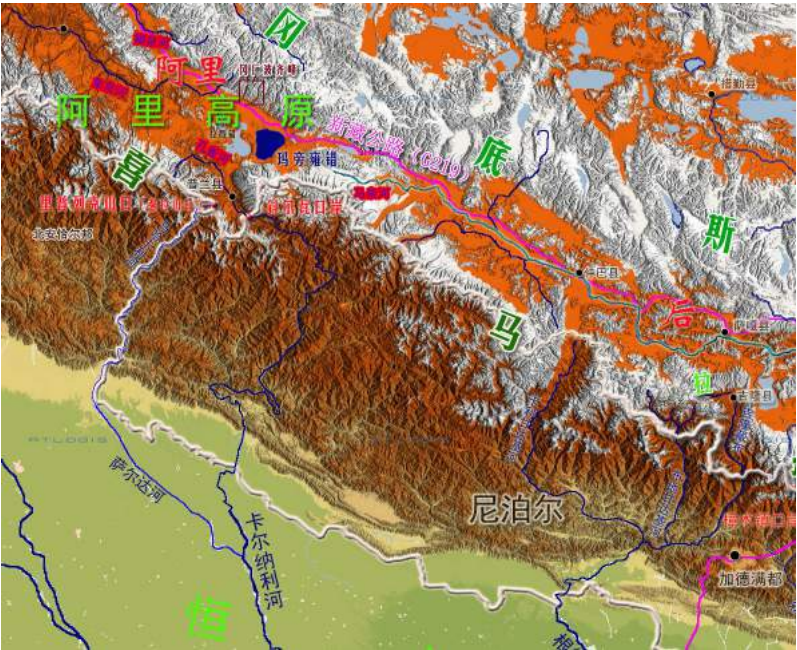
西藏政区图



第四节 孔雀河谷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

我们先来看看与马泉河紧邻的，位于其西南方位的孔雀河。如果说马泉河与印度洋季风的距离过远，是影响它地缘潜力的最大问题所在，那么孔雀河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四条河谷当中最具优势的了。从地理结构上看，藏语名“马甲藏布”的孔雀河是最有可能真正与玛旁雍错相连的河流了。不过，如果当初的地质运动在这个区域稍微作出点变化的话，最有可能成为孔雀河源头的应该是鬼湖——拉昂错。要是这样的话，拉昂错也就能成为一个淡水属性的吞吐湖，并与玛旁雍错同享“圣湖”的光环了。虽然没有与圣湖相连，是孔雀河与拉昂错共同的遗憾。但就孔雀河谷来说，来自印度洋方向的影响，才是它真正能够成为阿里高原内部重要板块的原因所在。

以诗人的视角来看，阿里高原之所以被视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的西藏”，是因为四条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河流，不甘心被封闭在高原之上成为一条内流河，而选择了绕过、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奔向了海洋。相比选择绕道的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孔雀河所指向的“卡尔纳利河”穿越喜马拉雅山的路程，算是最接近于直线的距离了。仅仅在喜马拉雅山脊线以北穿行了 100 公里出头，它就找到了一个天然缺口，进入到了喜马拉雅山南坡。在纵穿尼泊尔西部地区之后，汇入了恒河平原，成为了恒河左岸的一条支流。



雅鲁藏布江河谷地缘结构图

以此来看，孔雀河谷实际相当于喜马拉雅山脉北坡中的一个山间盆地。或者说处于喜马拉雅山脉内部，一条西北——东南走向断裂带的北部。今天建制于此的行政区叫做“普兰县”，我们也因此可以将这个狭长山间盆地叫做“普兰盆地”。孔雀河谷开口向南，地势相对较低（3700 米，与拉萨海拔相当），且直线对接南亚次大陆的地理优势，使得河谷本身成为阿里板块之中难得一见的气候湿润地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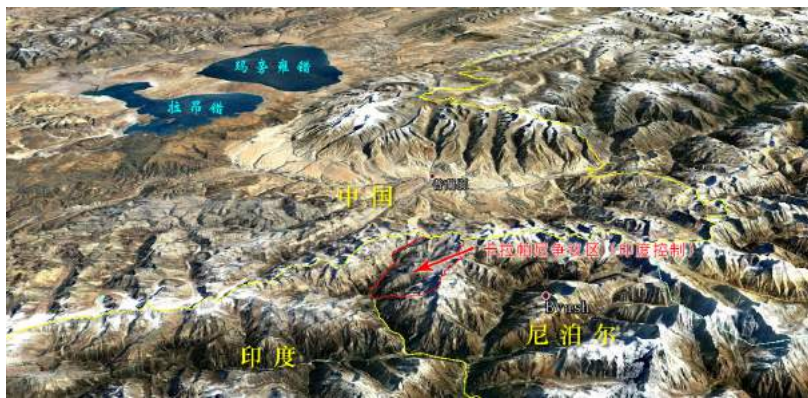
种情况，在之前我们解读过的，正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林芝地区也出现过。普兰、林芝两个行政区，也因此都得到了“小江南”的美誉（后者名气要大得多，是“西

藏小江南”；前者是“阿里小江南”）。

既然被形容为“江南”，那么孔雀河谷当中的低地，自然也就是阿里板块最具农业开发潜力的板块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普兰县所拥有的耕地数量还不及当年四川盆地“大地主”刘文彩一家所有的土地（刘家有 12000 亩土地），但那 11000 多亩耕地中所出产的粮油，已经占据了整个阿里地区总产量 60% 的份额。由此可见普兰盆地在阿里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基于普兰盆地的地缘位置以及农业潜力，这个板块无疑也成为象雄、吐蕃、古格，乃至后来西藏地方政府势在必得的边缘板块。当然，这并不代表孔雀河谷就一定会成为整个阿里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心。



普兰县农业



卡拉帕尼争议区图

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以今天的技术而言，架桥铺路已经不存在技术障碍了）。问题在于，印度想直接拥有对接普兰盆地的愿望，也使得印度、尼泊尔两国在普兰盆地西南部，出现了一块争议区。如果仔细观察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尼泊尔的西北边境，中、印、尼三国交界的这个点上，有一块向尼泊尔方向陷入的面积 75 平方公里的区域，是用虚线标注的。这块叫做“卡拉帕尼（Kalapani）”土地，正是印、尼两国最重要的领土争议地区。

对于印度来说，卡拉帕尼意味着通往玛旁雍错的朝圣通道。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更西边的点上，就一定不能翻越分水线进入孔雀河谷了。只是当你有能力控制最

基于地理结构上的特别性，普兰盆地也成为了阿里地区与恒河平原进行直接沟通的交通枢纽地区（这样的结构，非常类似于亚东谷地，整体像是西藏地区切入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一个突出部）。普兰盆地与恒河平原交流的天然通道，无疑是穿越今天尼泊尔西境的孔雀河——卡尔纳利河谷。然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印度教徒更希望拥有一条直接通往普兰盆地，并快速接近圣湖、圣山的通道。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尽管这样做需要在卡尔纳利河右岸的几条支流中转换，但对于朝圣者来说



佳入口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个突出部翻越分水线的难度最低）？实际上，回顾历史来看，印度这样做其实已经有些得寸进尺了。在古典时期，那些习惯了热带平原环境的印度君主们，本身并没有欲望和能力去控制，包括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地在内的次大陆边缘山地的。印度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山地中存在并与相关国家发生领土争议，有赖于当年英属印度的身份。

今天印度在克什米尔和藏南为两片山地的利益诉求，都是源于这种地缘背景。从这个角度说，英国人算是为印度做了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好事。只不过，被这一“好事”损害利益的，并不仅仅是巴、中两国。以受损领土面积来看，尼泊尔所受的伤害要大得多。今天中印两国之所以在克什米尔与尼泊尔之间存在所谓“中段争议区”，是因为在19世纪初，战败于英国人的尼泊尔王国，被迫将萨特莱杰河（象泉河下流）以东的大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山地割让给印度的原因（当然是“英属印度”了）。

对于英国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恒河流域的上游部分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不是廓尔喀战士英勇善战的话，相信英国人一定还会想办法依照分水岭原则，让流域上属于“恒河中游左岸集水区”的尼泊尔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这些给大英帝国留下深刻印象的山地军人，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英国陆军的建制体系。直接今天，定期从尼泊尔境内征召“廓尔喀雇佣兵”，并派之执行最为艰险的海外军事任务，仍然是英军的重要传统。基于经济原因，尼泊尔自己通常只能得到三流的廓尔喀战士了（二流的会被印度挑走）。

## 第五节 象泉河谷为象雄王国地缘中心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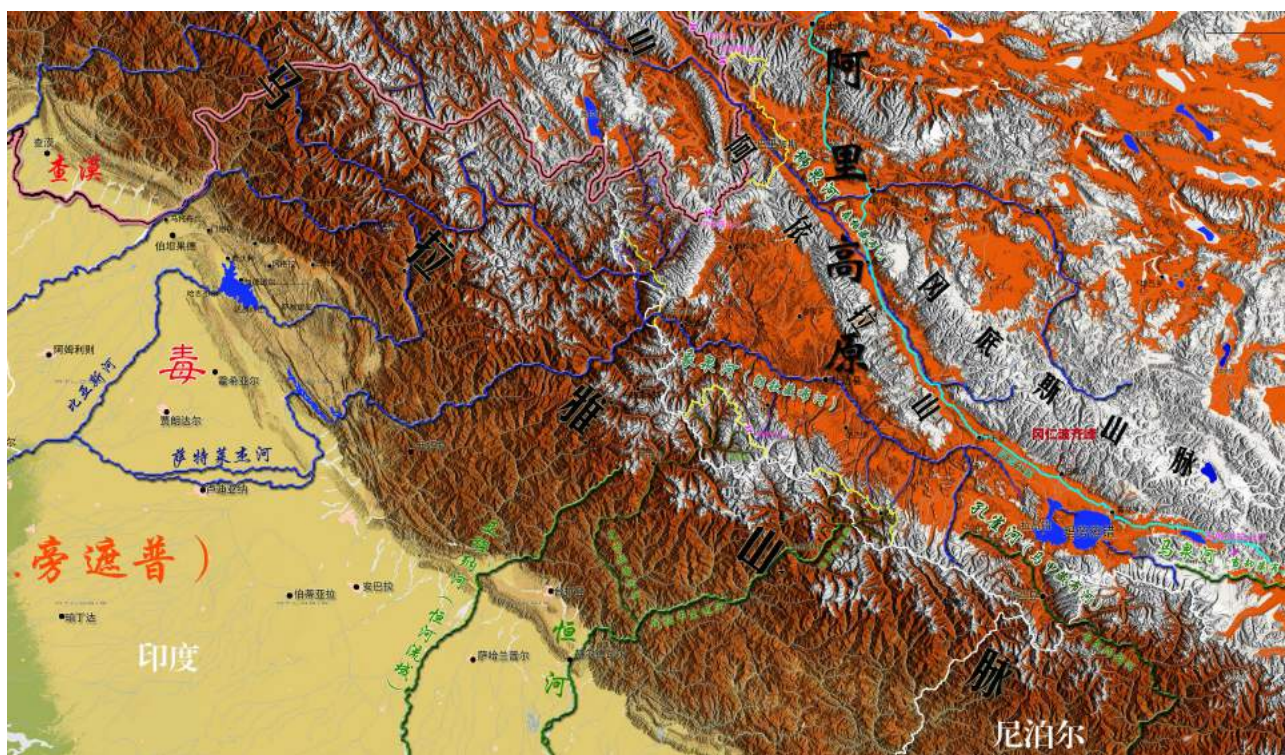
孔雀河并非唯一走捷径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南亚次大陆的河流。在它的西侧约200公里处，象泉河同样觅得路径进入印度，变身成为了五河流域中最东侧的“萨特莱杰河”。尽管印度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整体属于不受季风待见的干旱热带草原——沙漠气候区。但象泉河所对应的萨特莱杰河，已经刚能够搭到季风区的边了。这也使得印度所分得的以萨特莱杰河平原为主的这片“旁遮普”地区，在气候类型上“晋升”至半干旱的季风气候区。

尽管萨特莱杰河平原只能算碰到季风区的边（它那400、500毫米的年降水量，在印度已经算是最干旱的区域之一了），但这些水汽在顺着萨特莱杰河谷，上溯到喜马拉雅山北麓时，还是为象泉河谷带来了将近200毫米的降水量。在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只有几十毫米的阿里高原，这样的降水量已经足以让象泉河谷在植被覆盖上，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了。我们甚至可以在海拔较低的象泉河谷中，看了阿里地区难得一见的乔木。

基于今天建制于象泉河谷的行政区叫做“扎达县”。我们也可以将象泉河所流

经的这段低地，称之为“札达盆地”。鉴于二者都拥有直通季风区的通道，普兰盆地与札达盆地在降水量上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也正因为如此，在争夺“阿里小江南”这个荣誉称号的问题上，札达县同样不愿让普兰独美。

相比札达盆地，普兰盆地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纵深。象泉河在喜马拉雅山北麓所流淌的距离要远大于孔雀河，河谷低地的纵深也要宽阔得多。即使札达盆地中适合农业开发的点与普兰盆地相比并不占据明显优势，但象泉河两岸用来支撑游牧经济的植被，也要比孔雀河谷更多。当然，占据普兰盆地的部族也可以想办法向下游的卡尔纳利河谷发展。不过，在完全面向印度洋的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气候、环境将与阿里高原大相径庭。即使有部分人口顺着河谷迁移过去，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今天的尼泊尔人能够独立生存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也正验证了这个推论。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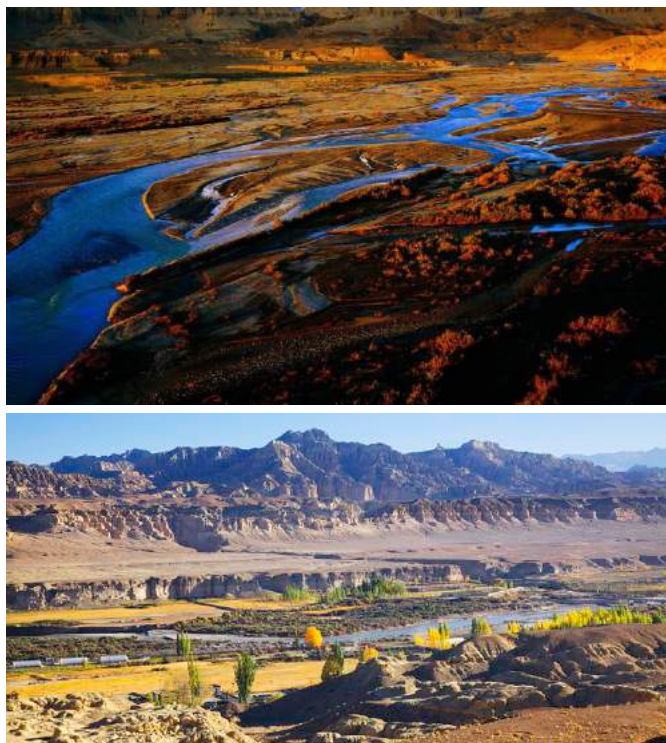
地缘位置是象泉河谷更有机会成为象雄王国地缘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一直在强调，南亚次大陆最初的文明是形成于印度河流域的。而无论雅利安人还是后来入侵印度的其他民族（从海上而来的英国人除外），都会先在印度河平原完成第一波融合之后，再向东侧的恒河流域扩张。这也意味着，对接印度河平原的象泉河谷，比对接恒河平原的孔雀河谷拥有先发优势。当气候、纵深、地缘位置这几样指标综合在一起比较时，札达盆地相比普兰盆地的优势就十分明显了。正因为如此，象雄王国和后来的古格王国时期，政治中心都是定位于象泉河谷的。直到今天，我



们仍然能够在扎达县城西面的象泉河畔看到依山而建的，规模宏大的古格王国城堡遗址（在电影《画皮2》中，曾经作为重要背景出现过。电影中的湖，则是前面解读过的“羊卓雍错”）。



古格王国城堡遗址



象泉河谷

只关注时政的朋友，注意到札达这个地名，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县级行政区所管辖的，正是中、印两国的中段边境。在国际部分我们也就这段边境作过一个大致解读。当今天的我们，以更为微观的视角来审视这段边境线时就会发现，虽然象泉河谷隶属于印度河流域，但它所对应的这段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带，绝大部分却是恒河流域上游地区的集水区（萨特莱杰河流域以东部分）。基于恒河在印度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出于地缘政治打算的英国人，还是包含了宗教诉求在内的印度人，都希望以分水岭原则为基础完整的控制恒河上游山地。

仔细观察那张《克什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我们就会发现，印度在中印边境中段所力争并占领的四个争议点当中，东部两个正是恒河上游的两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当年我们才会判断出，这两块至今仍留在中国地图中的争议点，很有可能在未来的谈判中被交换出去。像恒河源头发这样明显处在分水线以南的板块都有可能成为争议地区，那么象泉河这种出境河流就更容易引发纠纷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印边境中段地区的另两个争议点，也正是处于象泉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中。鉴于中、印边境的解读，并非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参照本节的相关附图。

## 第六节 狮泉河谷干旱和荒漠化的环境

对于生存在古典时期，曾经控制阿里高原的象雄、吐蕃、古格人来说，并不会今天这种寸土必争的烦恼。他们所关注的，只会是一个板块中真正能够直接服务于人类生存的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札达、普兰两盆地中，那几块规模不大的适合进行农业开发的土地，才是转型升级的象雄王国所真正需要关心的地方。有了这些耕地之后，札达、普兰两个盆地的经济，也就升格为“半农半牧”的经济格局了。

在吐蕃王朝开始分裂后，试图在阿里地区创立古格王国的王室后裔，曾经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封于阿里地区最重要的三个点上，史称“阿里三围”。这三围就包括有一定农业基础的札达、普兰两盆地。根据我们先前的分析，马泉河流域受环境所限，并没有什么机会补充进能大规模提升人口数量的农业技术。排除掉这个竞争者之后，阿里三围中的最后一围，应当毫无异议的花落狮泉河谷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既然我们不能指望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北上的印度洋季风，在喜马拉雅山北麓西行了一千二百多公里后，还能马泉河谷带来多少降雨。同样的，穿越整个克什米尔高原，弯了个九十度大弯才上溯至阿里高原的印度河谷，也没什么机会为狮泉河谷带来印度洋的水汽。这也使得狮泉河谷的整体环境，呈现荒漠与半荒漠的状态。



狮泉河地区残存的红柳

当然，以我们在中亚的经验来看，这类气候干旱少雨的地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聚落人群。那些高山雪水总是有机会在河流穿越的低地形成规模不等的冲积扇，并滋养出绿洲来的。在狮泉河谷，同样存在这种河水漫流而成的天然绿洲。这些绿洲中最主要的植被，并非乔木（这种海拔，乔木已经基本没机会生长了），也非草本植物，而是一种叫做“红柳”的灌木。对于游牧经济来说，绿色就代表着生机。因此狮泉河畔的这些红柳滩，也曾经为古象雄王国、古格王国的经济做出过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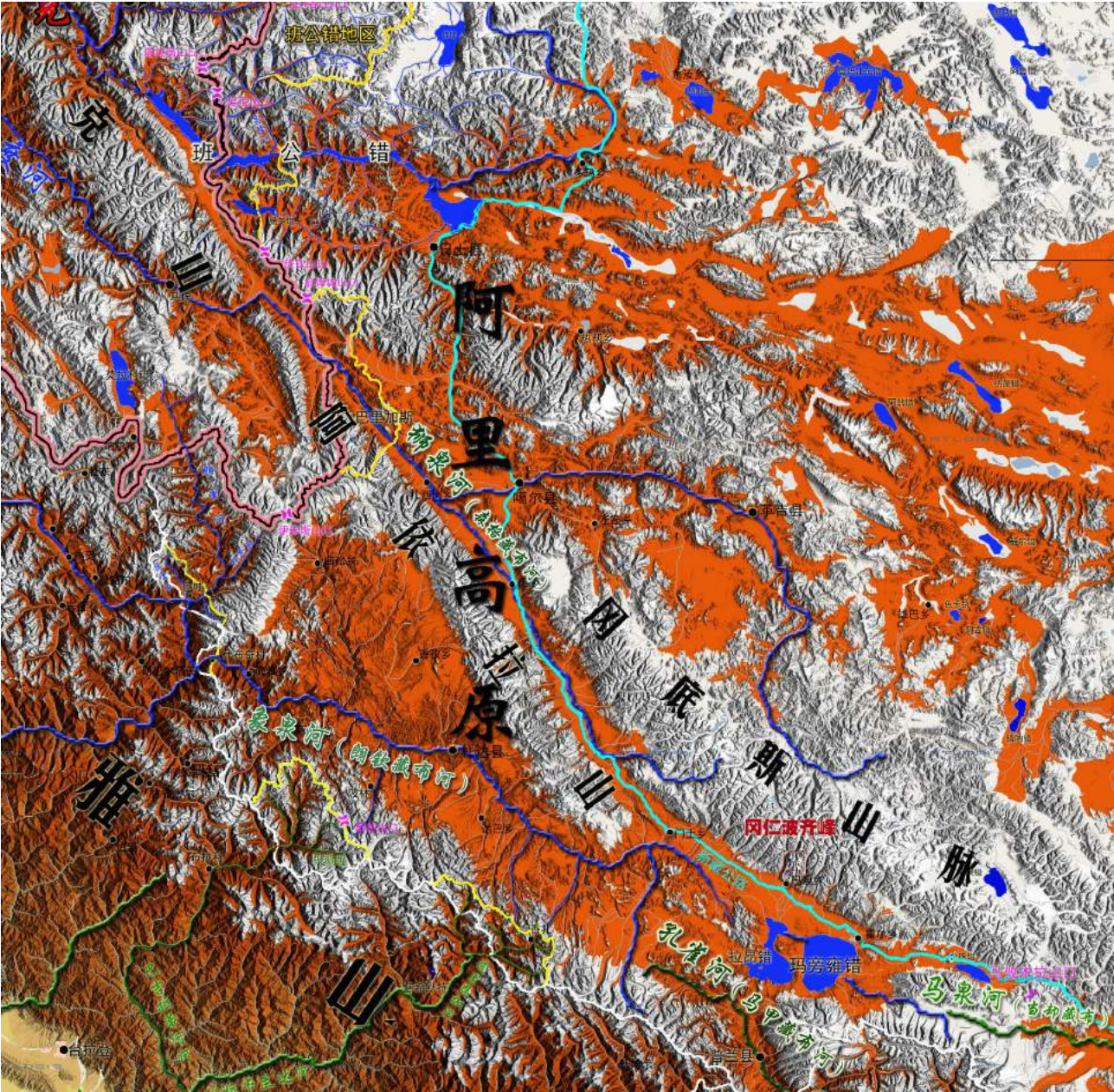
然而这类依靠高山雪水恩赐而在荒漠地带形成的特例，生态环境注定是十分脆弱的，农业开发的危险也是很大的。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今天领有狮泉河谷的噶尔县在尝试开发时就犯过巨大的生态错误。在将那些自然生长的红柳砍伐殆尽后，狮泉河谷的生态环境开始急剧恶化。风沙很



快将抢在人类完成开发之前，渗透至那些曾经被红柳覆盖的河滩低地之上。以至于狮泉河谷被贴上了“沙漠城”的标签。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狮泉河”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印度河在阿里高原拥有两条体量相近的上源：一条发源于冈底斯山脉北麓，源头指向冈仁波齐峰的北坡；另一条则位于冈底斯山脉以南，看起来最有可能与圣湖玛旁雍错建立联系。一般所指的狮泉河（藏语名“森格藏布”），指的是北边这条。今天噶尔县的县城所在地“狮泉河镇”也兴建于此；南边这条与马泉河同处冈底斯——喜马拉雅山脉谷地的，则叫做噶尔藏布。这两条河流在冈底斯山脉西端会合之后，很快便流出了国境，进入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这两段分别位于冈底斯山脉南北两侧的河谷，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狮泉河谷”。两河汇合之后所注入的那个板块，虽然今天被归入克什米尔的概念，但抛开政治原因，我们更应该将之单独标注为“拉达克”。从流域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拉达克板块内所流淌的那段印度河谷是狮泉河的下游。那么阿里三围中的最后一围，会是拉达克吗？

## 第七节 班公错地区在阿里板块的地位

关于阿里三围中的最后一围，到底是不是拉达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地缘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实际牵扯到象雄或者古格王国的范围问题。再往深了说，就是阿里高原乃至青藏高原是否能够控制拉达克的问题。从双方的地缘关系来看，这种控制力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一直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从历史和现状得到验证。

对于绝大多数关注到拉达克的人来说，拉达克的“小西藏”之名，以及与西藏相连的地理关系，已经足够证明它与西藏乃至中央之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只不过，这种浅层次认识还不足以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也将逐步接近真相。

在我们顺着狮泉河水步出国境，去探究拉达克以及克什米尔这两个热点板块之前，还需要在阿里高原之上再仔细搜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重要板块。尽管现在看起来，四条外流河的情况已经大致清楚了，但不要忘了，不一定只有外流河才能聚落人群。我们之所以认为外流河在地缘竞争中会更有机会，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能蓄积大量的淡水，并因此而避免周边土地环境恶化。那么有没有现在虽然不能外流，但本身又能蓄积大量淡水的低地呢？这种情况当然有了，最起码我们在中亚——西域已经看到很多案例了。而在阿里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板块。以其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的知名度来看，这个叫做“班公错”的地方，并不输于阿克赛钦和藏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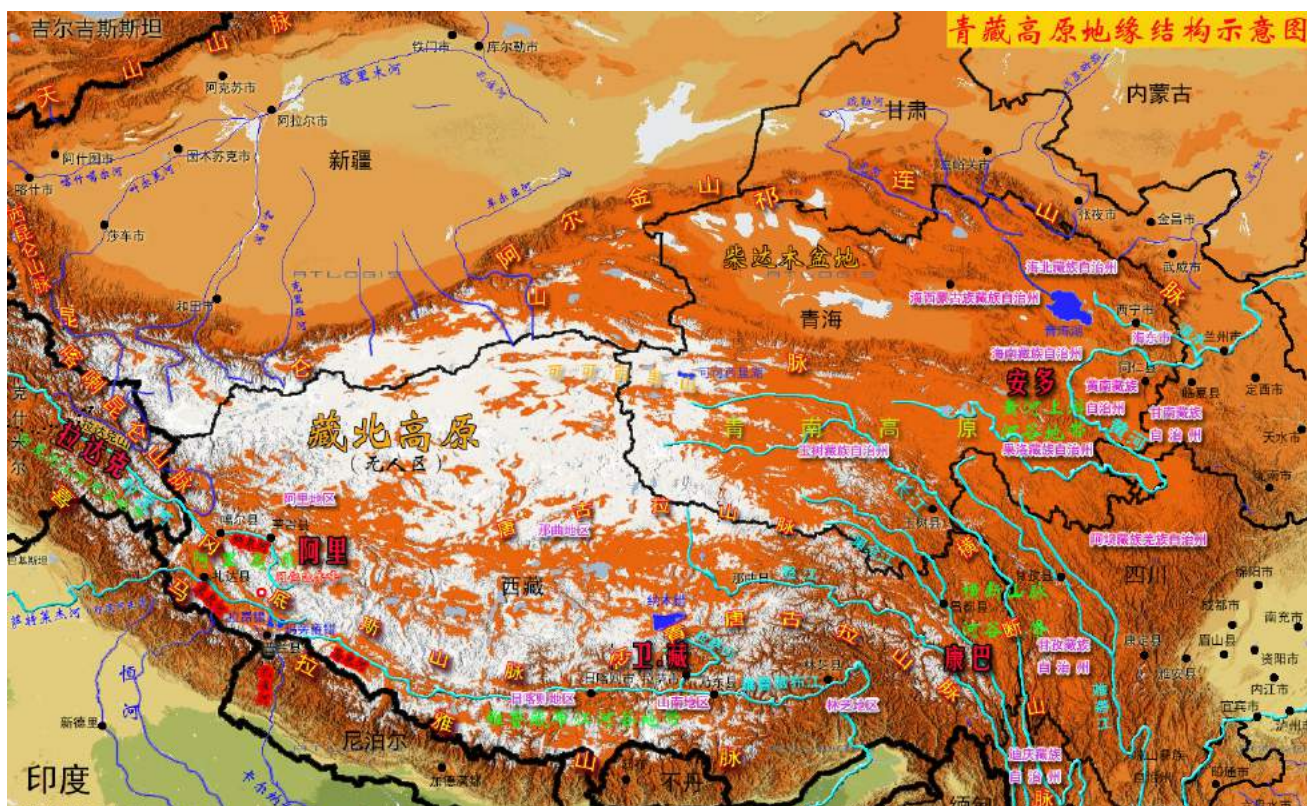
在那些显示中印边境纠纷的地图上，班公错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阿克赛钦的一部分。实际上从地缘关系来看，班公错并非阿克赛钦向南延伸的一个小尾巴，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缘板块。人类发现并定居在班公错流域的时间，要远早于在上世纪初还被当成无人区的阿克赛钦盆地。早在象雄王国时期，班公错流域的东部就已经成为了王国内部的核心板块。而在古格王国时期，由于阿里政权已经丧失了对拉达克的控制力，因此阿里三围中的最后一围，也明确指向了班公错流域的东部。

今天在西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中，班公错流域的中国部分所建制的县级行政区叫做“日土”。在关于阿里三围的传说中有三句歌谣，即：“雪山围绕的普兰、岩石围绕的扎达、湖泊围绕的日土”。“文艺青年”们在看到这三句歌谣时，眼前一定浮现出一片非常浪漫、圣洁的景象。但对于以地缘视角来审视问题的我们来说，



这三句话却明白无误的显示出了它们各自的地理特点。

孔雀河谷的狭窄，造就了普兰盆地雪山环绕的直接印象；而纵深要宽阔许多的象泉河谷，就更容易让人关注到扎达盆地，那些因整体干旱环境而缺乏植被覆盖的土地了。至于班公错流域，最为惹人关注的当然就是班公错湖了。只是当我们把视角拉高时就会发现，班公错湖并非只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湖区。它事实上是处于一个更大的地理单元——大湖盆地带的东端。要想理清班公错的地缘位置，我们必须先对它所隶属的整个盆地，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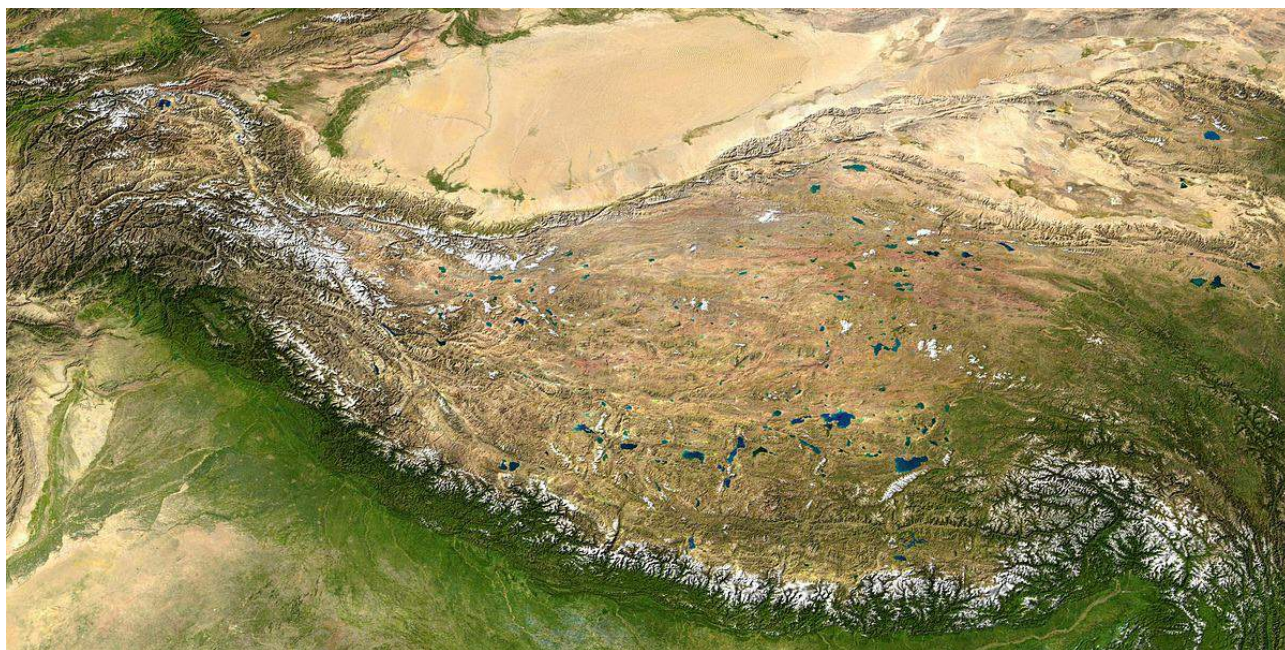
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

在解读蒙古高原时，我们曾经在阿尔泰山脉与杭爱山之间，发现过一个内流的大湖盆地区。同样的，青藏高原之上的这个大湖盆地，也是由南、北两片高地包夹而成的。不过鉴于青藏高原的整体海拔过高，我们在一般的分色地图上很难感觉到它的存在（甚至无法看清山脉的走势）。好在所附的《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中，所选择的底图能够清晰的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

从地理结构上看，所谓“大湖盆地”所指向的是藏北高原——唐古拉山脉与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一条纵贯青藏高原东西的低地带。由于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内流区，那些从两侧高地汇流而下来的淡水，最终基本上就只能在一个个低洼的盆地中蓄积出一个个湖泊了。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纳木错，就是这些大湖中的一员。



虽然整个盆地带蓄积了青藏高原最为庞大的湖泊群，但这并不代表这条低地带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内流区。我们会发现，怒江的源头正是指向这个板块的东端，而它与雅鲁藏布江的分水岭就是念青唐古拉山。如果我们把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视为高原上的“农业板块”的话，那么大湖盆地带就是一个纯粹的牧业板块了。由于念青唐古拉山的阻隔，大湖盆地带并没有机会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个直面印度洋的开口沾光。同样的，唐古拉山脉也断绝了它们从太平洋得到水汽的念想。只有源头延伸入板块东部的怒江，才有机会通过下游河谷地带，为盆地东部带上来些水汽。



青藏高原卫星图

这种环境差异，也意味着念青唐古拉山脉成为了今天西藏板块的一条地缘分割线，或者说农牧分割线。在漫长的历史中，山脉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由于可以通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个缺口享受到印度洋的水热资源，加之相对较低的海拔，而逐步进入了农业经济时代。当然，你永远不能指望与海洋之间障碍重重的这些内陆板块，能够像东亚半岛那样成为纯粹的农耕文明覆盖区。我们在高原之上所称的“农业板块”，大部分都会在自己的边缘山地，补充部分牧业经济进来。

至于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单从年均降水量来说，盆地东部倒也有 250——400 毫米左右，然而本板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海拔。平均 4500 米以上的海拔，使得整个地区的热量严重不足，甚至没有绝对的无霜期的。好在，在这种水、热条件下，虽然无法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但却还足以在这片土地上滋养出连片的草原地带。今天我们去查找板块内相关行政区的资料时，就会发现本地区在经济定位上基本都是“纯牧业县”。

在地理结构划分中，藏北高原的范围通常会包括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



脉以北至昆仑山脉之间的地带。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单独划分出的这条“大湖盆地带”，也可以算是藏北高原的一部分。由于藏北高原又名“羌塘高原”，所以这条盆地带中所生长的草原，被称之为“羌塘草原”。相信在历史上，生活在羌塘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也曾经与源自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吐蕃人进行过博弈。只不过，基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在经济、人口、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最终这一游牧板块也成为了农牧混合的藏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那曲羌塘草原

对于当年的吐蕃人来说，征服现在被“那曲地区”所覆盖的这片大湖盆地带东部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这片草原的存在可以保证吐蕃王朝的机动性，并以农牧混合的优势体向安多、康巴地区渗透。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念青唐古拉山西北部的大湖盆地带中部，有一个县也是以“安多”命名的。安多的藏语意思，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是下部、尾部的意思。从地缘层面来理解的话，也可以解读为边缘地带。对于雅鲁藏布江河谷来说，安多县所在的游牧属性的大湖盆地带，可以说是边缘地带。而当吐蕃人整合好唐古拉山脉以南地区，继续向北渗透并控制整个青藏高原

时，今天青海省境内的藏区，又成为新的“安多”了（参考东夷概念的变化）。

鉴于吐蕃人和他们的后代，没有办法从东亚农耕民族手中夺取河湟谷地作为新的农业中心，这些让低海拔族群望而生畏的新、旧安多地区，最终的地缘向心力，所能指向的就只能是高原当中最大的农业板块——雅鲁藏布江河谷了（横断山脉河谷地带农业基础虽然也不错，但太过支离破碎了）。

如果说怒江将源头部分伸入大湖盆地带的东端，并为之带来了草原生长的希望，那么板块西端的希望又在哪里呢？从位置上看，大湖盆地带的另一个最接近海洋汽团的板块，无疑就是“湖泊环绕的日土”了。这也是整个大湖盆地西段最有可能出现外流河的地点。这样看起来，班公错是否外流就成为决定整个板块命运的焦点问题了。

从外形来看，班公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盆地型湖泊，而是一个东西长约 155 公里，南北宽约 15 公里的峡谷型湖泊。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这种形态的湖泊更多的是出



现因筑坝而成的高山水库中。如果不是人工建筑的，那最大可能就是由于某一次地质运动，而形成的堰塞湖（就像羊卓雍错那样）。

班公错是不是个堰塞湖，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成果。但从它与西侧印度河流域之间那仅仅6米高的分水岭来看（和印度河的支流什约克河距离较近），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最起码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班公错湖之水可能会漫过这条分水岭注入印度河谷。这种情况在解读伊塞克湖与楚河的地理关系中，就曾经出现过。伊塞克湖在丰水季节就会漫过与西侧楚河流域那仅仅十多米的分水岭，注入楚河上游的科奇科尔河。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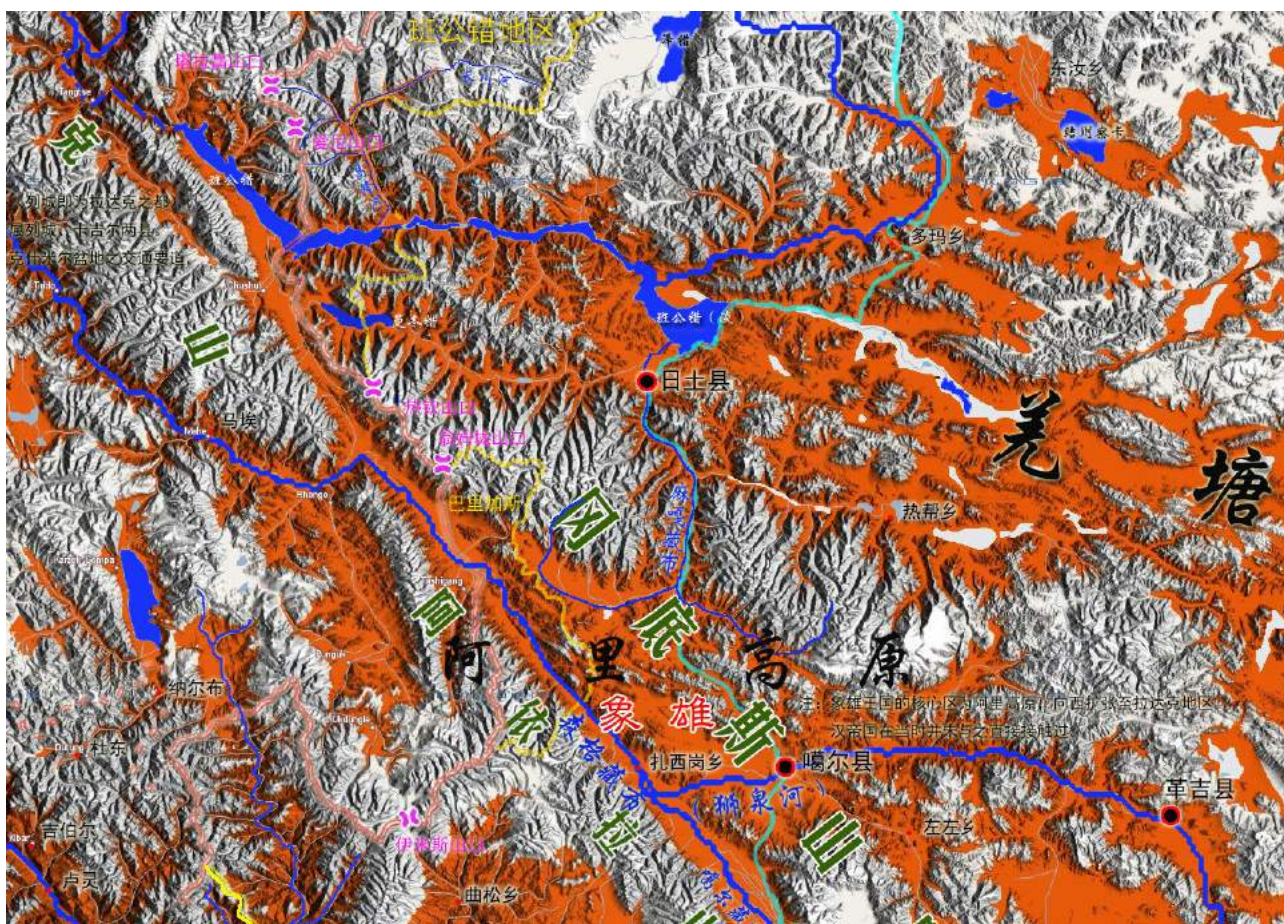
我们之所以纠结于一个湖泊是否外流，或者说是否在某一阶段可能外流，是因为这事关整个湖区的排盐问题。诚如我们之前多次分析过的那样，一个完全封闭的内流湖，不可避免的会因为矿物质的沉淀而变成咸水湖。随着盐度的增长，周边的环境也必将进一步恶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你最起码应该让自己有机会周期性的成为一个吞吐湖。中国人总结出的所谓“流水不腐”，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适用。

由于能够勉强跻身吞吐湖的行列，伊塞克湖现在算是一个能够养鱼的“微咸湖”了（现在由于水资源开发，已经不可能吞吐了）。与之相比，旅游至班公错的游客应该会感到更加的惊喜，因为你们看到的会是一个景色奇美的高山淡水湖。这似乎更加让我们坚信，班公错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曾经是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以其位置来看，将其定位为印度河的源头湖也不为过。那么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对此，我们只能说不确定。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班公错的情况更像是巴尔喀什湖的翻版。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境内的班公错湖喝到淡水，是因为国境线另一边的湖区，承担了沉淀矿物质的责任。

以国境线来划分班公错的东、西两部分，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虽然在印度地图上，班公错湖区的划分，是与其东西两部分之间那宽仅五米的河道来分割的。但在中国的地图上，国境线还要再向西推进至咸水湖部分向北的转折处（实际控制情况也是如此）。结合整个班公错争议区的轮廓，以及班公错流域的范围来看，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印度方面所力争的是：将整个西段也就是咸水部分，划入自己的领土。



### 汉西域全图

而中国方面更希望将班公错的咸水部分再依其自然结构一分为二，将东部湖区（咸水部分）及其相关流域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顺势将班公错南边的“曼冬错”顺势划入中国领土（基于同样的理由，印度也想得到半个曼冬错）。抛开中、印两国从欧洲人那里传承来的那些规则、法理，单从班公错地区的地缘归属来看，整片湖区由控制阿里高原的政权控制应该更为合理。

班公错湖区的地缘核心是在湖的东南角，一条叫做“玛嘎藏布”河流的河口三角洲地带（也就是今天日土县城“日土镇”所在的板块）。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看，



这种选择是非常合理的。无论试图在班公错湖地区聚落的人类，是以渔、牧还是农业经济为主，这种对接淡水湖的河口湿地都是最具开发潜力的。

事实上，红色政权、古格、吐蕃，乃至最早的象雄王国都不是东班公错湖地区最早的开发者。人类进入玛嘎藏布三角洲地区的时间，要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日土旅游的朋友，不仅能够看到公元前三世纪——六世纪，象雄王国时代在此所留下的岩画，还能够找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证据都足以证明，班公错湖地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板块。



班公错（一）



班公错（二）



日土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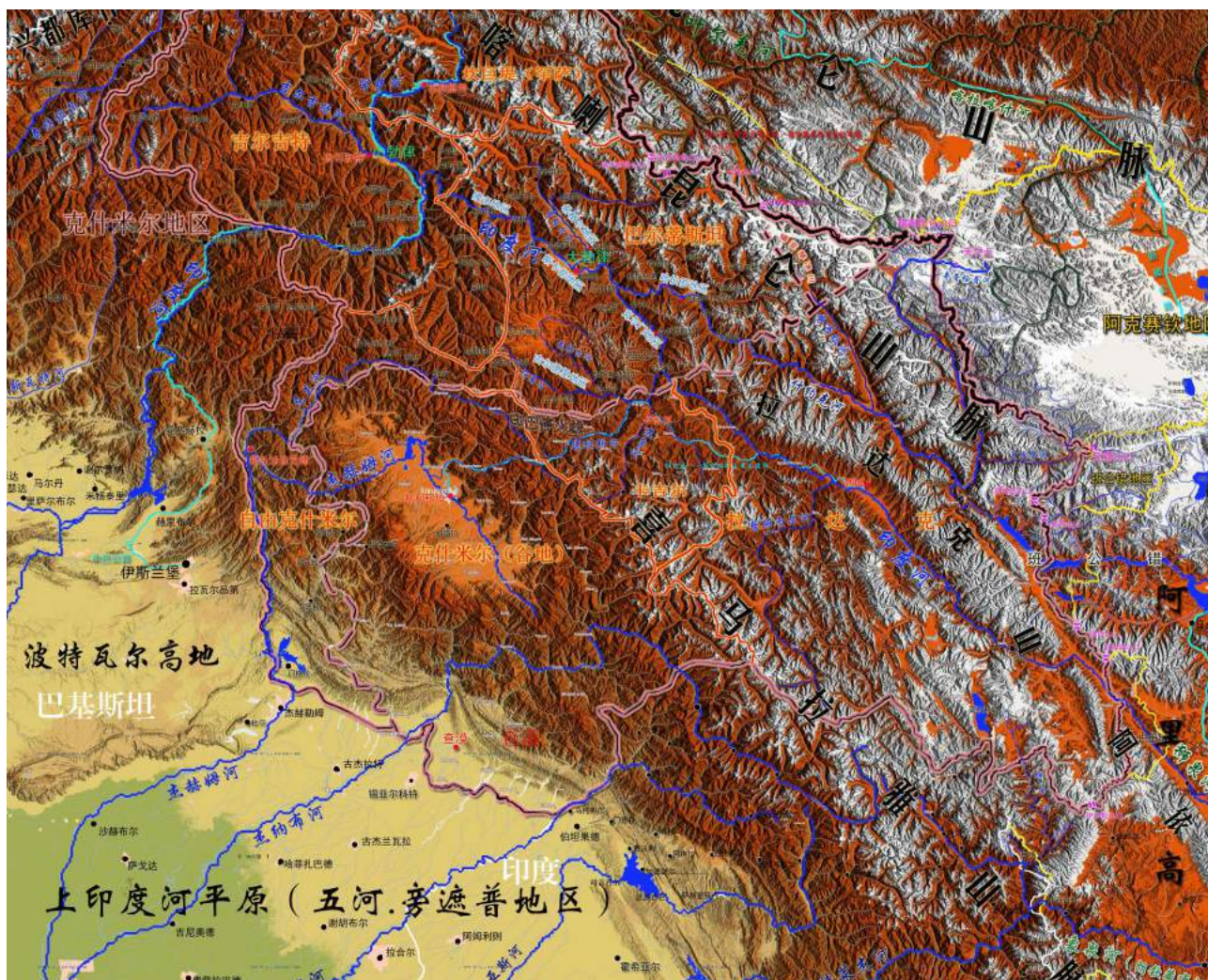
鉴于班公错湖东淡西咸的水质，人类选择在湖的东南部发展也是自然选择。然而从地缘控制力来看，这种侧重东南的发展方向，也必然影响到了对西部咸水湖地区的控制力。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竞争者，日土的统治者当然可以很自然的认为，自己是整个班公错地区的主人。但一旦强有力的竞争者从西部入侵的话，那么之前被视为边缘地区的地方，就很有可能会失去了。在今天的地图上，伊犁河谷被中、哈两国从中分开，就是基于这样的地缘背景。如果清帝国在打败准噶尔人，入主伊犁河谷之后，能够预料到俄国人在若干年后从此方向强势入侵的话，帝国的统治者在伊犁河谷筑城时，也许就会想到在河谷的入口处构筑军、政设施了。这样的话，在后来和俄国人的谈判过程中，保有整个伊犁河谷的机会将会大得多（当然，这样要求



古人有先见之明有些过分了)。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为阿里板块找到了普兰、札达、日土这三个最具农业潜力的点了（三者之中，日土的农业基础最薄弱）。尽管整个阿里地区还是属于牧业为主的板块，但这些农业板块的加入无疑极大提升了阿里政权的竞争力。特别是当象雄王国从游牧部落状态上升至半定居的王国时代时，这种农业成分的加入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仅仅把视线锁定在中国境内。阿里板块的最大竞争者，无疑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卫藏地区。然而当我们无视北京、新德里这两个外来政治力的存在，仅仅从地区博弈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象雄也好，古格也罢，这些以阿里为根基的政权所面临的竞争，并非仅仅来自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另一条从阿里高原起源并向西延伸的河流“印度河”，也同样在喜马拉雅山西北部切割出了一片高原河谷地带。而从地缘关系来看，这片被称为“拉达克”的河谷地带，与阿里高原的地缘关系要更近些。解读拉达克的地缘结构，以及它与阿里高原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缘关系，也是我们下一步的方向。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 第十四章 拉达克地区的地缘结构

### 第一节 拉达克成为独立板块的原因

拉达克既然被称之为“小西藏”，那么它与西藏地区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地理相连的问题了。因为仅仅是地理相连是不足以造就相近的族群意识、文化的，拉达克地区能够同样成为藏民族的载体，表明其与青藏高原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抑或其本身就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那么拉达克究竟是不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呢？

喜马拉雅山脉作为青藏高原在南部的地理边缘，已经是一个人所尽知的共识了。从这一点来看，拉达克应该是有资格被纳入青藏高原的范畴的。因为这条世界最高的山脉，并非完全处于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边境线上，它的西端位置实际是处在今天的印控克什米尔当中。印控克什米尔内部的两大板块：拉达克与克什米尔盆地，则分别处于喜马拉雅山的北部及东南部。

并不是说与喜马拉雅山沾边的土地，就天然属于高原族群的覆盖区。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能够接收到大量印度洋水汽的山地，就因为环境过于湿润而不是藏民族的天然领地。通过之前对高原地缘结构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高原文化的环境背景整体是非常干燥的。至多 400 多毫米的降水，以及高海拔所带来的空气、温度方向的变化，是使之形成有别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北麓更容易成为藏民族及其先人自然渗透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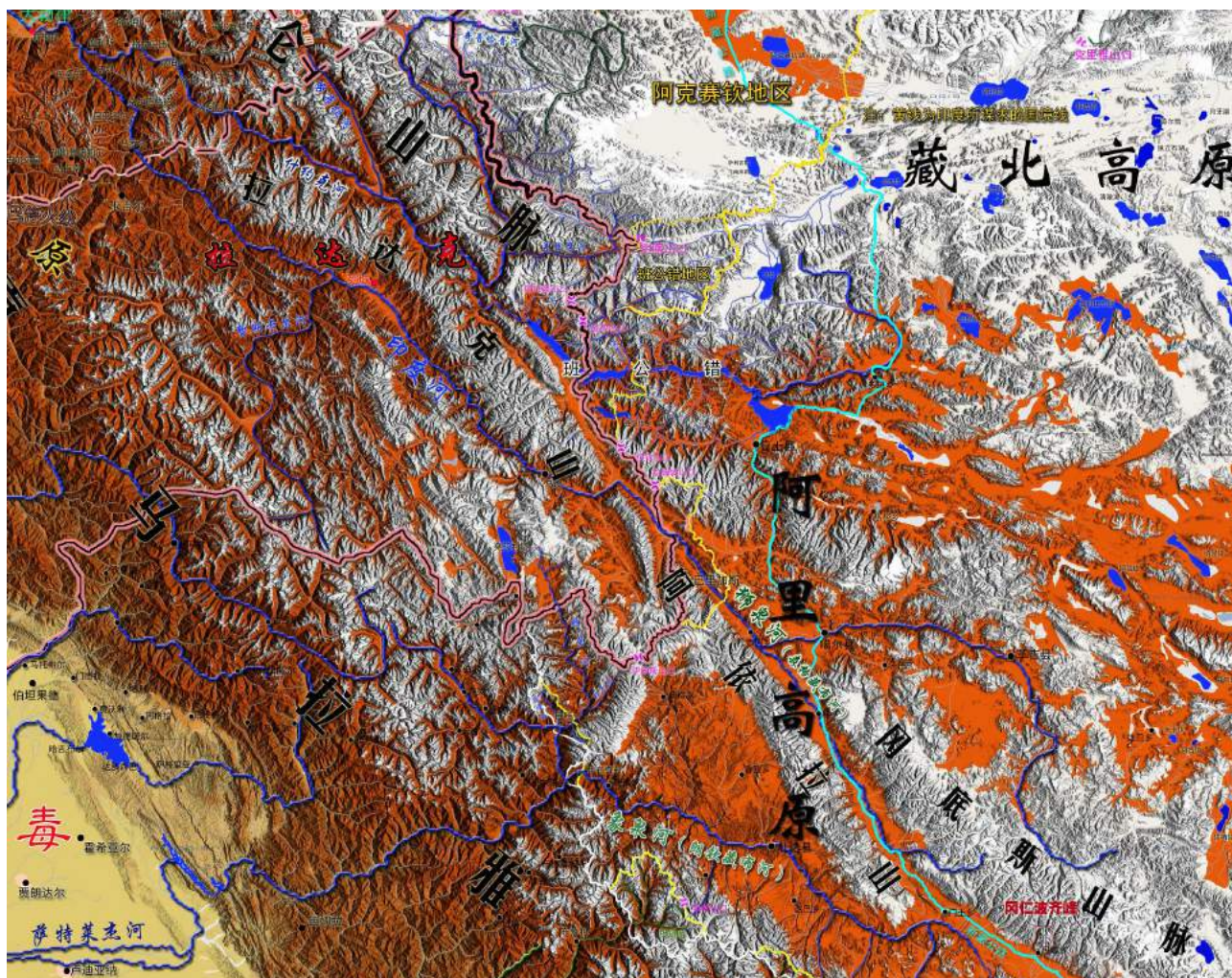
当然，仅仅依靠一条山脉的延伸，并不足以支撑在拉达克地区形成与青藏高原类似的高原环境。不过我们很容易在地图上发现，喜马拉雅山并不能算是一个出头者。在它的北面还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两大山脉平行向西延伸，并最终对接上了帕米尔高原。在青藏高原西端的山脉中，喀喇昆仑山的存在显得很特别。它并不像其他几条山脉那样纵横千里，如果不仔细辨认，我们很容易将之认为是旁边哪一条山脉的延伸。但就地理位置而言，喀喇昆仑山脉又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像一个桥梁一样，将青藏高原与帕米尔高原连接起来；同时还承担了塔里木盆地与南亚次大陆分水岭的任务。

对于我们将要解读的拉达克地区来说，喀喇昆仑山的存在同样重要。从地缘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所谓拉达克地区所指向的，就是喀喇昆仑山脉东段与喜马拉雅山脉西端之间的谷地（毕竟只有相对低地才适合人类聚落）。不过这两大山脉之间倒并非紧密相连，因为在它们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强势插入。而这条以“拉达克”命名的山地，也是拉达克地区的核心山地。

以地理结构来看，拉达克山其实可以算得上是冈底斯山脉的西部延伸。如果拉达克现在归属于中国领土的话，地理学家们估计会很有可能这样归类。果真如此的



话，也意味着中国实际占有了整个青藏高原（除了面向印度洋方向的坡地）。当然，拉达克山也有脱离冈底斯山脉的理由，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断裂带。相应的那些从两侧山地汇流而下的雪水，同样没有理由放过这条明显存在的断裂带。事实上我们对于流经这条断裂带的河流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是狮泉河下游河谷（森格藏布与噶尔藏布交汇点以西部分）。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由于狮泉河——印度河谷的存在，我们其实很难确定到底哪个点才是拉达克山与冈底斯山脉的分割点。有鉴于此，中印两国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领土争议也就不让人奇怪了。比起象泉河谷的争议点，狮泉河谷中这片约 1900 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要大得多。通常关注中印边境争端的朋友，也会很容易注意到这块叫做“巴里加斯”争议地区。巴里加斯地区的争议领土据信大部分为印度方面所控制。至于双方到底是怎么分割的，并非是我们当下所要分析的重点。如果要我从地缘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只能说这的确是一个地理分割不明显，而又容易产生纠纷的位置。对于一些愿景更为远大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不屑于关注像巴里加斯这样的争议点，就好像有人



认为钓鱼岛不是重点，拿到琉球才是最终解决方案一样。

要是拉达克能够如这些朋友所愿有一天归入中国的话，上述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了。只是那样的话，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在今天克什米尔印巴停火线的北段，可能也要协调一番了。好了，未来的事情也无法预测。我们还是为那些图谋拉达克的朋友寻找一下地缘上的证据好了。

在拉达克山强势插入喀喇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中间之后，拉达克地区内部也很自然被分为两个区域了。一个就是拉达克山北麓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谷地；另一条则是拉达克山南麓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谷地。如果以河流来为这两条谷地命名的话，那北部河谷我们可以称之为“什约克河谷”；南边这条则是“印度河谷”。两条河流最终的汇集地就是拉达克山的西端。

单从河流的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南边这条夺得印度河之名的河谷，是拉达克地区的核心河谷。什约克河的话，就只能作为印度河上游的一条支流而存在了。造成二者之间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气候环境。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河谷（拉达克部分）的降雨情况，并不会比多了一道山脉阻隔的什约克河谷好上多少。仅仅数十毫米的年均降雨量，使得整个拉达克地区的农牧业更多只能依靠高山雪水的滋养。

真正能够让拉达克地区在青藏高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独立地缘板块的原因在于它的海拔。这个海拔当然不是说那几条高大山脉的海拔了，河谷低地的海拔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简单从狮泉河——印度河的走向上，大家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拉达克境内的印度河谷，海拔肯定要比狮泉河谷更低。事实也的确如此，拉达克地区河谷海拔的最低点，约在 3600 米左右。与中国境内的阿里三围（普兰、札达、日土所在的盆地）大致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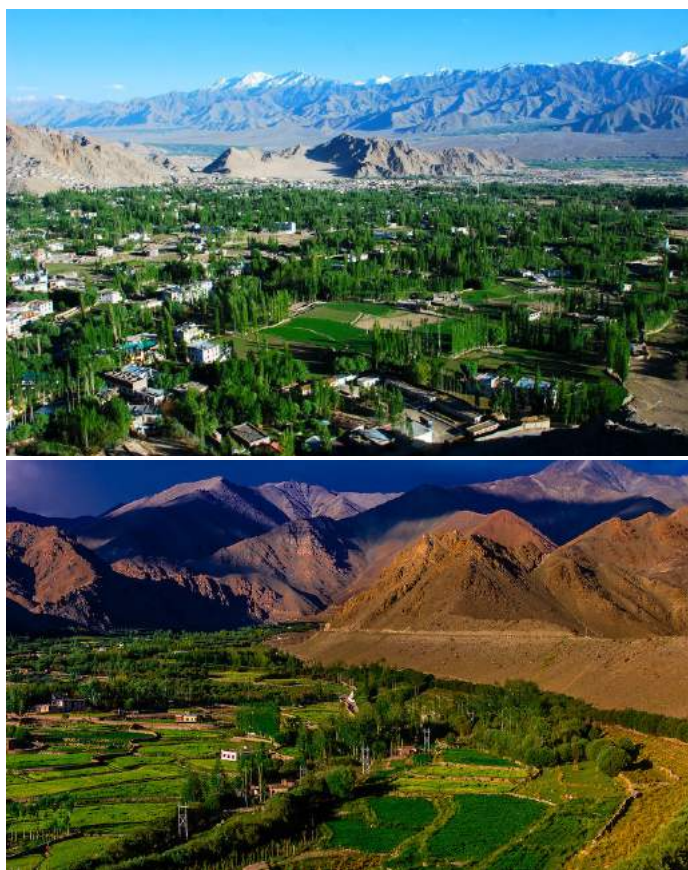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除了水以外，对植被生长影响最大的就是光热资源了。具体到农业来说，可以用“无霜期”这个概念来做参考标准。而纬度与高度则是影响无霜期的两个重要因素。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能够低至海拔三千六七百米的高度，意味着你比其他河谷更有机会成为板块的农业中心。

在阿里板块的四大流域当中，象泉河与孔雀河在板块内部已经降至了这个高度。这两条河谷也因此成为了阿里板块的地缘重心。至于马泉河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它的高度只能为象雄或者古格王国的牧业经济提供支持。并由此而成为整个王国的边缘板块。至于狮泉河谷的问题，也同样出在这。如果当年的象雄人想在狮泉河流域找到一个适合开发部分耕地并定居的点的話，今天中国境内的狮泉河谷应该会让它们感到失望的。象雄人需要顺着河谷向西走得更远，在拉达克山南麓才会找到最适合聚落人口的河谷。

对于象雄人来说，利好的消息是印度河谷（拉达克部分）的地缘潜力，远不如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这使得立足阿里的政权，有机会顺着狮泉河控制这个板块。



同时，来自雅鲁藏布江的吐蕃人，或者后来的西藏地方政府，也同样可以在控制阿里高原之后，顺着这个路径控制拉达克。



拉达克地区

在象雄王国时期，拉达克地区也的确因此而成为了王国的核心控制区。然而问题在于，拉达克地区并不能算是阿里高原的一部分，体量上也不足以成为阿里的附属板块。以低地面积来说，拉达山南北的河谷纵深其实与阿里地区处于同一数量级。即使最初的控制力量来自于阿里高原，但那些被迁徙、分封到此的族群，以及作出决定的政治家，也很容易发现拉达克地区能够作为一个独立板块，支撑他们形成能够与阿里板块相对抗的王国。

阿里、拉达克这种同级别竞争关系，也可以从今日两地区的人口数量对比中看出。拉克达山南北两条谷地的人口，与拥有四河（象泉、狮泉、孔雀、马泉河）一湖（班公错湖）的阿里地区，人口都在10万

左右。也就是说以地缘结构来看，拉达克地区与阿里地区其实是相邻的竞争者。双方对自己的邻居都没有绝对控制权。如果主导力量来自潜力超凡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人口潜力达到百万数量级），将这两个板块同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是这两个板块竞争，情况就很难说了。

这种情况在吐蕃王朝陷入分裂，阿里地区出现独立的古格王国之后就曾经出现过。最终这个神秘的王国，就是被同样由吐蕃后裔所建立的拉达克王国所灭。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卫藏地区介入之后，阿里、拉达克地区又都重新归入更高层面的政治体系了。然而，对于拉达克地区有影响力的，并非只有卫藏地区。即使在古典时期，那些来自南亚次大陆平原地带的印度雅利安人看起来软弱无力。但那些从中亚山地渗透而来的穆斯林，对拉达克地区却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压力。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拉达克地区，成为了伊斯兰属性明显的克什米尔板块的一部分。至于拉达克板块的内部结构到底如何，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与伊斯兰世界和藏传佛教地区相连的，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 第二节 拉达克具有战略通道的作用

在中央之国的控制力能够延伸到拉达克时（清朝），拉达克山南麓的这段印度河谷曾经被标注为“拉楚河”。有朋友建议我为了显示中国曾经对这片土地的控制，应该沿用这个旧名。其实名字只是一个标签罢了，用什么名称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虽然政治家们倒是很热衷于此）。不过用“拉楚河”之名的话，可以将这段印度河谷独立出来，写起来倒也不用另行标注了。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还是沿用这个名称好了。

以地理结构来说，拉楚河流域的直接竞争对手应该就是拉达克山北麓的“什约克河”流域了。在这场地缘竞争中，拉楚河谷显然占据了上风。因为顺着拉楚河上溯，能够直通阿里高原——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而沿着什约克河一路向东的话，迎接你的将是人迹罕至的阿克赛钦和藏北高原。

很显然，最初进入拉达克地区的高原民族，应该是顺着狮泉河——拉楚河而至的。如果他们沒有停下脚步的话，整个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同样高寒的帕米尔高原，都应该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在1300年前，由卫藏地区崛起的吐蕃人就曾经为我们验证过这条路线。当吐蕃人试图通过这片山地向塔里木盆地渗透时，不可避免的与已经在西域立足的唐帝国遭遇。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拉达克以西的克什米尔地区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为了阻击吐蕃人的渗透，唐帝国在西域最为强势的将领高仙芝曾经远征克什米尔，将吐蕃的势力阻断于拉达克地区。

虽然拉达克今天那些明显属于藏民族的居民，就是源自于吐蕃人的西扩，但就高原民族向西渗透这件事来说，吐蕃人却并非先行者。最起码立足阿里高原的象雄人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已经做到了。事实上，我们在帕米尔高原之上发现的那些羌系部落，也有可能是顺着这条路线从青藏高原渗透而去的（当时的中央之国，把这些不同于北亚游牧民族的黄种游牧部落，都归类为“羌”）。当然，路线也许会反方向，即那些由青藏高原北部渗透至塔里木盆地南麓的羌系部落，通过克什米尔——拉达克进入了冈底斯山脉的南部。

不管这种渗透最初是遵循什么样的方向，透过印度河的连接，青藏高原与中亚——西域之间存在一条人口迁移的战略通道，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三千多年前从伊朗高原向南亚次大陆迁徙的雅利安人，也同样有可能顺着印度河谷上溯到了拉楚河谷。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拉达克地区找到明显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部落。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些源自南俄草原的白种部落到达此地的时间甚至要早于黄种部落。

对于欧洲游牧民族的先发优势，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毕竟在分析河西走廊时，已经从地缘和技术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解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象雄也好，吐蕃也罢，他们对于拉达克地区的渗透，更像是一场种族层面的反击。同样的情况也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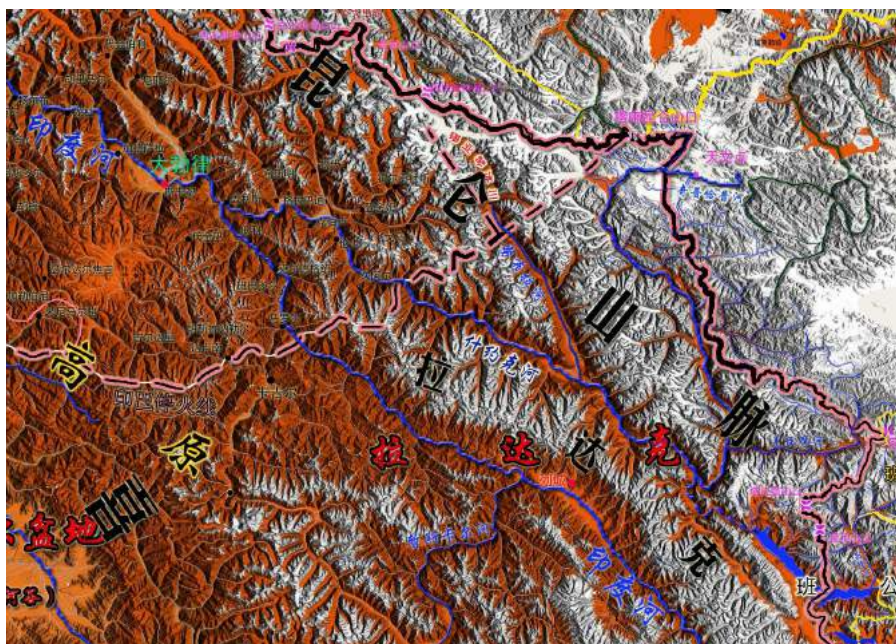


经出现在河西走廊上。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时代，匈奴以及汉帝国先后对河西走廊的征服，相当于把欧洲游牧民族延伸至黄土高原边缘的势力推向了亚洲中部。

### 第三节 拉达克的宗教与族群结构

简单对比拉达克地区，我们会发现它之于西藏地区的地缘位置以及地缘价值，与河西走廊之于黄土高原非常类似。当东亚农耕民族在通过河西走廊向干旱的西域渗透时；高原农牧民族也在试图透过拉达克向同样干旱的克什米尔向西推进。这一过程在古典时期所呈现的结果也惊人的相似。二者通过上千年的经营，都将自己的族群与文化覆盖了这两条走廊地带。

如果再进一步的话，我们甚至会发现亚洲东部这两大族群在各自西部所遇到的竞争对手最终都演化为了带有高加索人种基因，意识形态穆斯林化的农、牧民族。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将西域纳入中央之国版图的东亚农耕文明，可以在覆盖河西走廊的基础上，继续向穆斯林化的西域强势渗透；而并入了印度的拉达克地区，更多只能将继续保持原有地缘结构的希望，寄托在次大陆上的印度雅利安人身上了。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基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结构性矛盾，相信印度的政治家是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拉达克穆斯林化的。至于说印度雅利安人如果想进一步向西逆转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化的话，则是完全没有机会了。即使没有那条横亘在拉达克西部的印巴停火线，拉达克西部边缘那些明显源自西藏的部族，也都已经自然被东进的

的穆斯林所同化了。

如果我们把吐蕃后裔所覆盖的拉达克山周边地区都纳入拉达克范围的话，就会发现广义的拉达克现在在地缘上已经被一分为三了。今天以拉楚河谷为核心的包括南部喜马拉雅山北坡，以暂斯卡尔河（拉楚河左岸支流）为主要河谷的地区，是真正能算小西藏概念的“拉达克”。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拉达克地区。在印度的

行政建制中，拉达克山南北的这片藏传佛教覆盖区被建制为了“列城县”。

列城县的地缘核心位于拉楚河谷靠近暂斯卡尔河位置处的“列城”。这座人口不到 6000 人 的高原城镇也是整个拉达克地区的地缘核心。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能够在拉达克地区感受到浓郁的藏族文化气息,直接印象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列城。这座拉达克王国曾经的都城，甚至有着一座外形与布达拉宫相仿的宫殿。



列城市



列城提克西寺

观察《克什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今天被印度所控制的拉达克地区，其实并没有完整控制整个拉达克山南北的拉楚河、什约克河地区。山地的西端，以及两河交汇处一带被划归了巴基斯坦。这是否意味着，显然应该为穆斯林覆盖区巴控克什米尔境内，也有一个可以供一些朋友

YY 的“小西藏”呢？就这一点来说，答案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失望。因为这一区域虽然的确有被人称之为“小西藏”。但除了人种和语言显示他们与列城乃至西藏地区的族群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以外，这些生活在拉达克山西部河谷地带的象雄、吐蕃后裔，绝大部分已经改信伊斯兰教了。



## 第十五章 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地缘结构

### 第一节 巴尔蒂斯坦的族群和文化特点

在地缘政治版图上，印控拉达克西端的这片“穆斯林化的拉达克地区”，有着一个明显带有其宗教信仰的地缘标签——巴尔蒂斯坦。对于更喜欢汉、唐这样强势帝国历史的朋友来说，巴尔蒂斯坦其实也并不陌生。因为它还曾经有个在中国史书中留下痕迹的名称——大勃律。被很多朋友视为西域第一战将的高仙芝，在西域进行的第一次远征，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勃律”。不过这个勃律并非在我们将要解读的巴尔蒂斯坦，而是在这个“穆斯林化的拉达克”地区西侧的吉尔吉特，史称“小勃律”。

勃律的大小之分，并非参考领土面积。简单点说，原来的勃律国就是在今天的巴尔蒂斯坦地区。当吐蕃王朝征服象雄王国，打通拉达克走廊之后，勃律国就成为了这个高原王朝的下一个目标。而受到攻击的勃律人被迫西迁至今天的吉尔吉特地区。为了和原来的勃律故地有所区别，便有了大小勃律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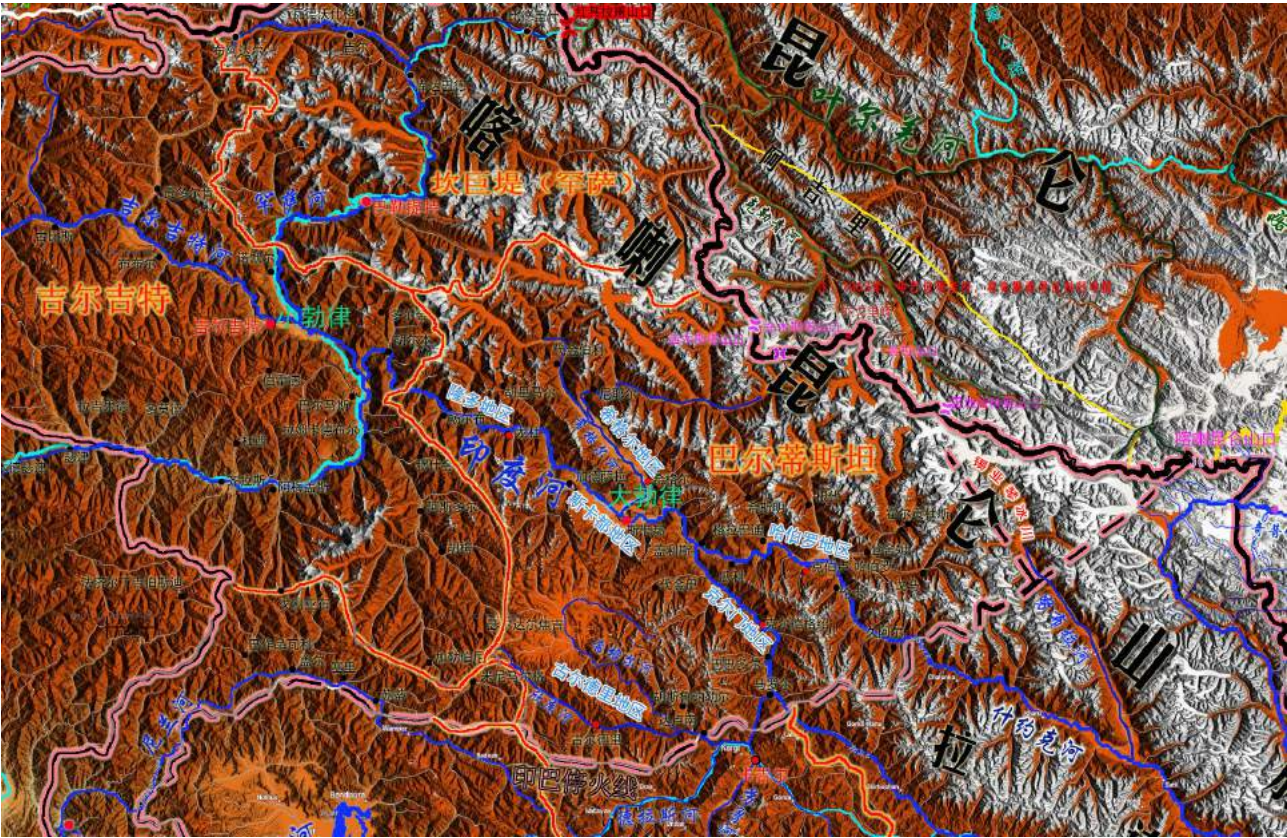
如果勃律人不是羌系部族，而是高加索人种的话，那么从种族结构来看，吐蕃人的这次扩张应该算是为今天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地区的人种结构奠定了基础。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地区的种族结构，都是反复渗透、融合的结果（参考汉族的形成）。比如我们现在在克什米尔地区看到的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部族，就有可能有雅利安人、塞人，甚至亚历山大远征军后裔的成分在里面。至于说勃律人或者说克什米尔高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最初到底源自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探讨巴尔蒂斯坦地区为什么会成为两大种族、文化的交融之地，对我们来说会更有意义。

以巴尔蒂斯坦地区的现状来看，伊斯兰文化+藏族血统是整个板块最为明显的地缘特征。当然，和所有处在大板块相交地带的地区一样，上述两个特征只是最为主要的特征罢了。高加索人种，以及藏文化的遗存（最明显的就是语言），同样会在这个板块的地缘特征中有所显现。至于说巴尔蒂斯坦人的归属感在西还是在东，就更多取决于宗教和今天的政治切割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有朋友想YY未来的中国在克什米尔地区有所作为的话，止步于种族、宗教上都与西藏地区有亲缘关系的拉达克地区会比较好。

从地理角度来看，位于拉达克山西部的巴尔蒂斯坦，可以被定义为：拉达克山西坡、喜马拉雅山（西延伸段）北坡、喀喇昆仑山南坡山地所共同围就的一片高原。拉楚河——印度河谷是它的中轴线，而那些发源于喀喇昆仑山、拉达克山、喜马拉雅山，最终汇入印度河的河流，也成为了巴尔蒂斯坦人的聚落之地。

基于农业需要，海拔低至3500米左右，又有一定纵深的河谷地带，会更有机会

成为人类的聚落之地。参考这个标准，在巴尔蒂斯坦内部可以分为六个板块，或者说六大河谷之地。历史上占据这六大河谷的部族，也经常处于互相独立状态。事实上这也是历史的常态。即使是这个地球上统一意识最强的中央之国，细算起来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在割据、分裂状态。我们将一些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看它究竟有多长时间处在统一状态，而是看它们在地理环境背景、种族结构、文化、宗教等层面的相似度。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 第二节 巴尔蒂斯坦六大河谷地带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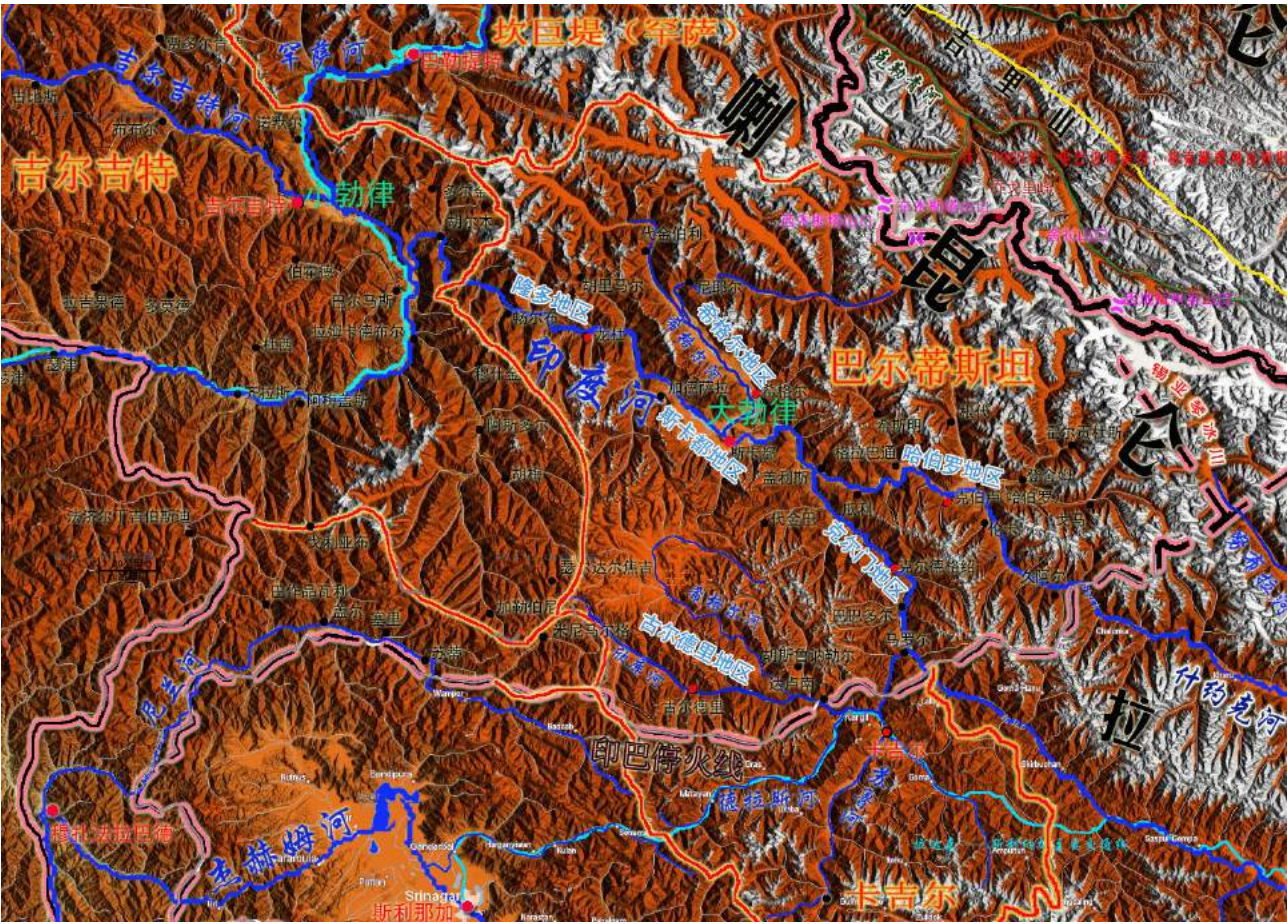
搜索“巴尔蒂斯坦”这个名词，我们可以在很多资料中看到巴尔蒂斯坦这六大河谷地带的名称，它们分别是：隆多、希格尔、斯卡都、哈伯罗、克尔门、古尔德里。至于这六个亚板块到底指向何方，却很少有人提及。事实上，这六条河谷低地并非指向六条独立的河流。其中的隆多、斯卡都、克尔门所指向的其实都是印度河谷。

为这段被分为三部分的印度河谷寻找一个地理边界，对于这部分内容来说很重要，找到它们也就相当于为巴尔蒂斯坦地区找到了东、西的尽头。按照我们前面从地理角度为巴尔蒂斯坦所划分的范围来看。巴尔蒂斯坦东部边界应当是拉达克山西端；西部领土的尽头则应该接近印度河谷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那个 90 度拐弯处。



我们可以把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河谷（干流）看成一个地理分割线。从阿里高原流出，横穿拉达克、巴尔蒂斯坦的这部分上游河谷，相当于是喀喇昆仑山与喜马拉雅山的分割线；而转为南北向注入印度平原的那段河谷，则相当于是兴都库什山与喜马拉雅山的地理分割线。从水系角度来看，将喜马拉雅山北坡、喀喇昆仑山南坡，以及拉达克山西端作为集水区的巴尔蒂斯坦，所包括的区域也可以被看做是注入这段东西向印度河的流域总和。基于此，我们在《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中可以看到，巴尔蒂斯坦的西部边界其实并没有顶到中巴公路所依附的那段南北向印度河谷。那些向西流淌汇入这段下游河谷的支流河谷，地缘上归属于吉尔吉特。

之所以花了这些时间，来解读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形成与分水岭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想向大家说明一个道理，分水岭原则并非是西方殖民者为了分割世界，而凭空创造出来的一个技术指标。在遵循自然渗透规律的古典时期，人类就已经有意无意的遵照这个原则，来划定自己的族群活动边界了。这也使得我们今天依照分水岭原则划出来的那些行政线，很大程度上会和古典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重叠的原因所在。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回到巴尔蒂斯坦六大河谷划分的问题上来。既然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有三段河谷其实就是相连的印度河谷。那么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依照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解



答这个问题，就要来看另外三大河谷地带的位置了。如果把那些汇入印度河谷的支流都视为独立河流的话，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巴尔蒂斯坦的范围内，找到四大河流。除了由拉楚河延伸出来的这条印度河谷以外，印度河右岸的什约克河、希格尔河，左岸的欣库河，都是“巴尔蒂斯坦河谷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河流也分别指向：哈伯罗、希格尔、古德里安三大板块。



斯卡都



希格尔河谷

确定了这三个板块与河流的对应位置之后，承担中轴线作用的印度河谷也就有了被分割为三部分的依据。其中最东端的克尔门地区，相当于欣库河口与什约克河口之间这段走完拉达克山南麓最后路程的印度河谷。如果我们把拉达克山南麓的这段印度河称之为拉楚河的话。巴尔蒂斯坦的这个东大门，也可以被视为拉楚河下游。

从拉楚河——什约克河相交之地向西，就进入了斯卡都所覆盖的印度河谷。这一地区的核心部分，是在希格尔河与印度河相交的三角洲地区。从地形图上也可以看出，希格尔河——印度河相交的这段河谷，可以说是巴尔蒂斯坦最为开阔的河谷地带了。鉴于它的长、宽之间的比例，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称为“希格尔河河口盆地”

了。结合它十字相交的地缘位置，希格尔河口处的“斯卡都”被认为是整个巴尔蒂斯坦的地缘政治中心也就没有异议了。

走出希格尔河河口盆地之后，巴尔蒂斯坦内最后那段印度河谷所指向的，就是“隆多”地区了。上述这些地缘标签以及位置，在《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上都有标注。相信大家也会注意到，巴尔蒂斯坦内每一个地缘板块内，都有一个与之名称一致的城镇相对应。很显然，这些城镇也就是相应亚板块的地缘中心了。



在巴尔蒂斯坦的这六大板块所指向的河谷之中，最为吸引我们注意的应该是希格尔河与什约克河。因为巴尔蒂斯坦在这两条河谷中，究竟能够向东延伸到哪里，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缘范围的问题。它们的边界在哪，直接牵扯到了今天中、印、巴三国对于克什米尔地区的分割问题。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第三节 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的分割线

什约克河谷与欣库河谷所指向的板块并不相同，其中什约克河谷的情况最为复杂，并且与中、印、巴三国的边境都有纠葛。既然我们本身在国际部分就是以中、印地缘结构比较开的头，又花了大把时间来解读那几段边界，那我们现在还是先以巴尔蒂斯坦为起点，向东延伸视线，看看这条河流能否把我们带到一些熟悉的板块。

从拉达克山以西地区开始，逆向向中国边境推进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当年划定中印边境线的英国人）的角度，来审视这条未定边境线的形成背景。对于人类来说，一条河谷所承担的基本任务无非有二：一是提供人类聚落生存的土地；二是沟通相邻板块的通道。就第一点来说，下游河谷的情况往往要好于上游地区。在东亚地区，下游地区能够拥有更大农业潜力的关键，往往是因为能够拥有面积更大的冲积平原，以及有更多的水资源可以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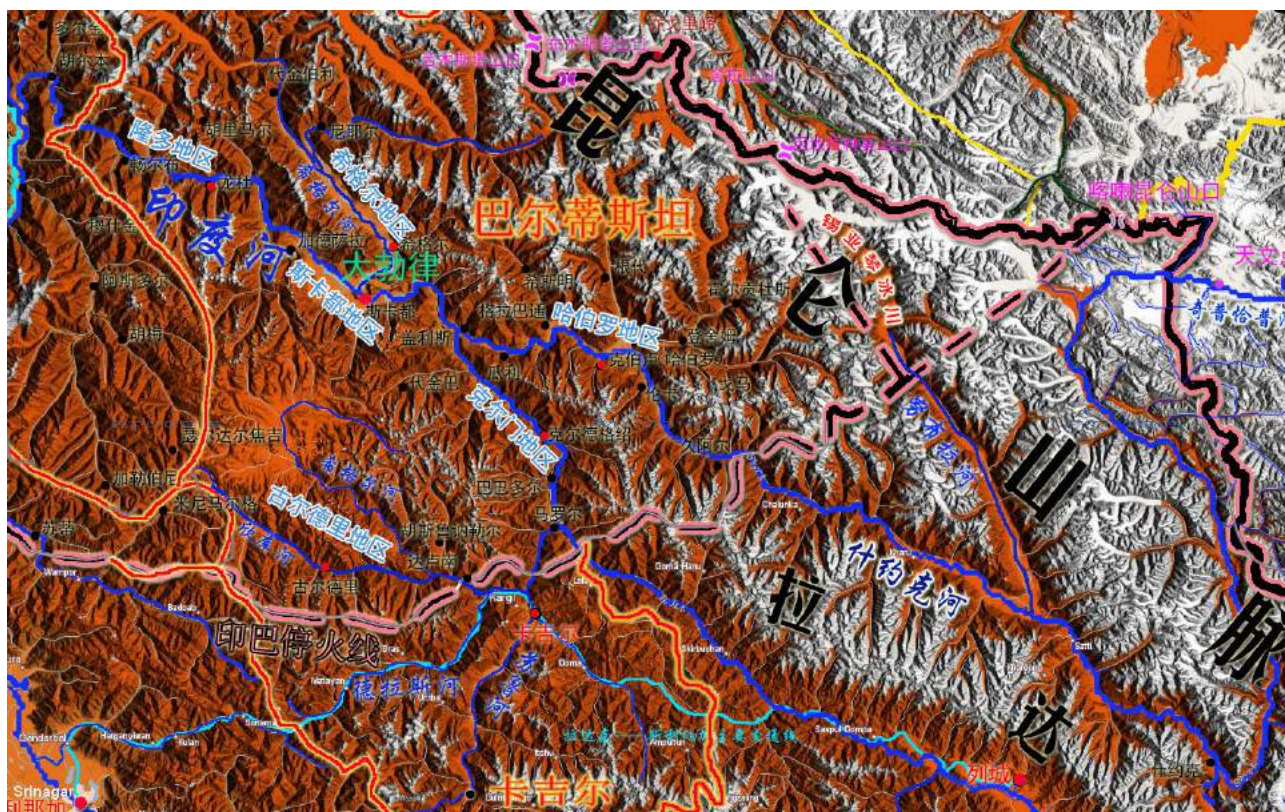
然而在这片屋脊之地，情况就有所变化了，无霜期的长短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在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才有机会获得支撑农作物（包括乔木也是如此）生长的光热资源。简单参考印度河的流向，我们不难得出基本判断：巴尔蒂斯坦适于耕种的低海拔河谷地带，要比拉达克地区更多；而拉达克地区更要比印度河源头处的阿里地区更有农业潜力。比较现在这三个板块的人口数量，我们也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巴尔蒂斯坦约 40 万，拉达克约 20 多万，阿里高原 10 万）。

回到什约克河谷问题上来，这条贴着拉达克山北麓流入巴尔蒂斯坦的河流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今天被纳入巴尔蒂斯坦范围被称之为“哈伯罗”地区的什约克下游河谷，就是什约克流域的农业中心。相应的，它也聚落了什约克河谷中绝大部分人口。在顺着什约克河谷上溯到印巴停火线、中印边境之前，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最终得到什约克下游河谷，乃至拉楚河下游河谷的，是巴尔蒂斯坦而不是拉达克呢？

如果将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看作两个单独板块的话，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会发现什约克下游河谷与相邻的斯卡都、克尔门河谷之间的交流完全没有障碍；而拉达克人要是想从列城渗透到什约克河下游，自然选择就是先到达什约克——拉楚河河口，然后再东北方向进入什约克河谷。当然，翻越拉达克山，直线插入什约克下游河谷也是一种选择。问题是这样的选择对于信使和商人来说问题不大。但就两个地缘板块的连接、融合来说，打通这样战术通道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因此，

巴尔蒂斯坦要比拉楚河谷的拉达克，更有机会得到什约克河的这段精华之地。

以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人的族源来说，上述渗透方式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或者说拉达克人就是顺着河谷通道，扩散到了巴尔蒂斯坦。以二者的地理背景来说，分裂本身也的确具有合理性，就像拉达克从阿里板块独立出来一样。问题在于，为什么今天拉达克地区与巴尔蒂斯坦会以这样一种分割方式。纯粹从地理角度看，什约克——拉楚河口也许是更好的分割点。这样的话，拉达克人就能够尽得拉楚河流域，也有机会去竞争什约克下游河谷了。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按巴尔蒂斯坦人自己的说法来看，造成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地区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拉楚河谷的一次地质灾害。这次灾害虽然没有在印度河谷中形成堰塞湖，但却阻断了河道两旁的道路，并直接导致拉楚河下游的“克尔门”及其以西地区，脱离拉达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

这次阻断河谷通道的地质事件，对于拉克达和巴尔蒂斯坦分割点的形成，应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二者之间之所以相互独立，还是取决于双方的地理位置。作为藏族西扩的最边缘地区，巴尔蒂斯坦也同时处在伊斯兰教向东扩张的最前沿。最终出现这种民族、宗教上的混合现象（如果认为藏系民族应该信仰佛教的话），也正是其地缘位置的反应。同样的情况也曾经在青藏高原的另一端出现过，在青海地区也出现过藏族部族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



以宗教的主动传播力来说，一神教体系要远强于其他宗教（这点我们在中东部分已经分析过了）。巴尔蒂斯坦伊斯兰化的时间，大约是在 15 世纪。在此之后，即使是拉达克王国、古格王国时期也面临着被伊斯兰化的风险（王室中已经出现改宗的情况了）。如果不是卫藏地区西扩的对冲效应，今天的拉达克可能也不再会是小西藏了。

今天我们要在地图上寻找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的分割线，大致就可以定位于印巴停火线上。这条停火线的形成，也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化进程绝对没有被逆转的可能了。不过对于拉达克地区来说，这条坐实了的地缘政治分割线，倒是成为了土著文化的保护线。前面我们也说了，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需要，印度人一定会帮助拉达克人坚持他们的信仰的。



汉西域全图



印度河（巴尔蒂斯坦境内）



## 第十六章 克什米尔东部通往西域的商通

### 第一节 什约克河中上游指向藏北高原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既然那些改信伊斯兰教的藏人控制了最有潜力的“什约克河下游河谷”，那么他们也很自然应该对什约克河中、上游谷地更有影响了。也就是说，如果什约克河中上游河谷的竞争者仅仅是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的话（没那些外力的介入），最终取得优势地位的，应该是巴尔蒂斯坦了。当然，以古典时期的人力和技术来说，并不会仅仅为了增加名义领土面积而争夺一片土地的控制权的。一块土地如果不能直接为族群的生存提供服务的话，是不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的。其实按说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只是以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们总是能找到每一块土地的利用价值的。所以任何在法理、历史上有依据索取的土地，都有可能成为争议地区。

在今天什约克河谷的流域范围内，我们可以找到两块非常著名的争议地区：锡亚琴冰川和阿克赛钦。以我们在国际部分的分析来看，这更像是一场基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由板块以外力量主导的分割游戏。然而当我们从更微观的层面来为什约克河谷中、上游那看起来没什么农业潜力的土地定位地缘归属时，却会发现在没有外力干涉时，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地区，也的确从不同方向对“什约克河中上游河谷”地带施加了影响力。也就是说，如果竞争仅仅发生在它们二者之间的话，分割什约克河谷的情况依然有可能会发生（只不过不一定是今天的分割线罢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会促使两大板块北望喀喇昆仑山脉西段这条高寒谷地呢？

如果喀喇昆仑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天堑，那么无论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巴尔蒂斯坦人，还是坚持佛教信仰的拉达克人，应该都不会对什约克河中上游地区太感兴趣。毕竟对于他们来说，那些有机会开垦出耕地来的低海拔河谷地带，才能够聚落更多的人口，增强国家竞争力。然而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真正的天堑，只要有需要，再险恶的环境都无法阻止人类开拓道路的决心。那么这些生活在印度河谷的部族向北穿越什约克河谷，并试图翻越喀喇昆仑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山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在吸引他们呢？

参考地图《青藏高原地缘结构图》，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从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地区直线向北，越过喀喇昆仑山的话，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板块，就是包含著名的野生动物天堂“可可西里”在内的藏北高原。以哥萨克人向西伯利亚扩张的原动力来看，藏北高原那些野生动物也许会很有吸引力。能够提供佐证的，就是可可西里那些偷猎者之所以要捕猎藏羚羊，就是因为这些高原精灵身上的绒毛能够制作一种叫做“沙图什”的披肩。这种曾经在印度有大量需要的披肩（现在主



要是西方时尚界的需要了），其唯一的加工地点，就是在拉达克之南的克什米尔盆地。

披肩加工及贸易曾经是克什米尔盆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因此而对藏北高原这块人迹罕至的高原产生兴趣，倒也说得过去。不过和西伯利亚的毛皮供应量相比，藏北高原的野生动物资源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这片能够有大量野生动物生存的土地，其生存环境其实比西伯利亚地区更为恶劣。哥萨克人之所以能够一路向东，以毛皮贸易为切入点征服西伯利亚，更多是因为那里本身就生活有以渔猎为生的部落。控制这些土著部落，才是从源头获取资源的保障。



藏羚羊



沙图什披肩

至于藏北高原的情况，当然也不能说是完全不毛之地了。南部那条大湖盆地带中，还是能够支撑一些游牧部落生存的，而在藏北高原猎取那些珍贵皮毛的，也正是高原边缘低地中所生存的那些土著（也包括安多地区的部族）。问题是这一盆地并非喀喇昆仑山所对应的这部分藏北高原。这就是说，即使觉得有必要通过控制高原部落，来获取藏北高原

的野生动物资源，其扩张目标也应该是阿里高原。因为得到了阿里高原，也就等于控制了货源。

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这个地缘政治标签出现之后，统治今天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贵族也的确向阿里高原扩张过。至于这其中的动机，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为了高原之上的那些藏羚羊，我们就不做过多推测了。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些印度人之所以要征服巴尔蒂斯坦及拉达克，并不是因为它们离藏北高原更近。真正能够让这些土著和外来征服者，从印度河谷将视线投向喀喇昆仑山以北的，是远在藏北高原以北的另一个板块——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盆地的地缘价值其实和克什米尔地区很像。一方面这个板块本身能够承载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具备一定贸易终端的价值；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处在一条更大贸易链的节点上，使之拥有了战略通道的价值。如果能够有一条穿越藏北高原，连接塔里木盆地南沿

与什约克河谷的通道，那么拉达克山之侧的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地区，都会有机会从这条商路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那些来自东亚的商品，不用走到帕米尔高原上，就有机会通过这条商路直接输入印度）。

鉴于藏北高原的恶劣环境，用我们刚才设想的这条路线完全取得经由中亚进入印度的路线是不可能的（即使能通行，一年当中的通行时间也不会长。更何况除了高寒，还要面临一个缺氧的问题）。但只要有部分商品能够从拉达克山一带过境，就有机会为这片贫瘠的土地带来额外的地缘潜力了。既然这个战略方向已经确定了，那么依照我们之前所积累的寻路经济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喀喇昆仑山东段南北两侧，找到相应河谷来对接出可行的道路了。

## 第二节 努布拉河谷和锡亚琴冰川曾为商道

我们先来看看什约克河右岸是否有源自喀喇昆仑山南坡并相对开阔的河谷，来帮助往来的商旅靠近山脉分水线。在诸多竞争者中，一条河口（汇入什约克河的点）位于拉达克山北麓中部，西北方向切割喀喇昆仑山脉南坡的河流，最为引人注目。这条叫做努布拉的河流也是什约克河最大的支流。

对于努布拉河这个标签来说，知道的人应该并不多。然而提到“锡亚琴冰川”这个名字，相信很多关注克什米尔的朋友就有深刻印象了。在国际部分我们也曾经特别关注过这条冰川。这个地理单元之所以被人所知晓，主要是因为政治和环境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争议热点。直到今天为止，印巴两国仍在为争夺锡亚琴冰川的归属权，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环境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国际部分也已经渲染过了。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这片冰雪覆盖的土地，也被世人称之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战场”。绝大部分为之付出生命的印巴军人，并不是死于战场，而是自然灾害。仅仅是在一年前（2012年4月7日）的一次雪崩中，巴基斯坦方面就有140人葬身于此（绝大部分人，甚至无法找到尸体）。

锡亚琴冰川并非完全与努布拉河谷这个标签重



叠。它实际上所指向的是河谷的上游部分。问题在于，你如果想通过这条河谷翻过喀喇昆仑山的话，上游河谷的通行情况恰恰是最重要的。很难想象，这样一段被我们视为死亡之谷的河谷，能够帮助打通拉达克地区与西域之间的通道。

如果努布拉上游地区的情况一向如此，相信在古典时期是没有人愿意尝试在此开辟道路的。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段山谷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冰川。它真正由一条正常河谷，成为一条冰雪覆盖的“冰川”的历史不过两百年时间。也就是说，在18世纪之前，努布拉河谷都是可以打通连接西域的道路的。而在此之后，由于气候变化，冰川开始向下生长，道路由此被完全封闭了。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这样看起来，在英国殖民者能够控制克什米尔时，他们便已经完全没机会打通这些古道渗透新疆了。相应的，印巴双方在用停火线初步切割克什米尔地区时，似乎也很难对锡亚琴冰川的归属作出决断。因为按照双方在南部人口聚落区所划定的停火线，结合与喀喇昆仑山口这个重要分割点的连线（为什么重要，我们后面会分析到）来看，锡亚琴冰川更应该归属于巴基斯坦方面。然而以努库拉中下游河谷归属印度这一点来看，印度人也有理由顺着河谷，上溯到喀喇昆仑山之巅。有鉴于此，



双方在划定停火线时，也的确没有明确锡亚琴冰川的归属。这也使得冰川本身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这种未定状态成为了印、巴两国走向最终和平的拦路虎。



锡亚琴冰川

从地缘控制力角度来看，印度方面在争夺冰川控制权时会显得更有优势。控制努布拉——锡亚琴谷地入口的印度人，在兵力投送、后勤补给方面明显会更有效率。相比之下，巴基斯坦要想进入这条谷地，所面临的困难就要更多了（虽然这种平均气温零下三十度的环境，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基于此，目前印度控

制了冰川两侧大部分的山口也就不足为怪了。

印巴两国今天对于锡亚琴冰川的这种争夺，更多是基于地缘战略上的一种避险需要。对于巴基斯坦方面来说，印度如果拥有了这个突出部，插入到它和中国之间的话，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地缘威胁；而对于印度来说，不能完控一条河谷的上游部分，让自己的敌人有机会俯视自己同样也是一种威胁。更何况努布拉古道之所以封闭，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在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谁又能保证有朝一日，巴基斯坦人甚至中国人，不会有机会修通一条公路，将军力快速投送到努布拉河谷呢？

说起来这件事，双方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一定要怪的话，就怪努布拉河谷长的太“斜”了。它要是朝正北或者东北方向切割喀喇昆仑山脉的话，估计也就不会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了。然而，也正是努布拉河谷的这种走向，让它所指向的方向不是藏北高原的腹地，而是结构上最“薄”的藏北高原西北角。这种走向从战略上就决定了，通过努布拉河谷翻越喀喇昆仑山脉之后，能够以较短的时间穿越近乎无人区的藏北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南沿绿洲带。至于在喀喇昆仑山脉北麓，又是哪条河流在接应北上的商旅，这条河谷通道又与中央之国有着怎么的关系，我们下节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努布拉河谷通往克勒青河谷

当旅行者还能够沿着努布拉河上溯到喀喇昆仑山分水岭之时，他们将会遇到一个叫做“因地拉科里”的山口。很快他们就将踏入另一条河谷，并顺着流水的方向



进入塔里木盆地了。对于关注过中印边境纠纷的人来说，这条在山北接应的河流应该并不陌生，它的标签就是“克勒青河谷”。

“克勒青”和“喀喇”二词是否有关系，抑或就是同一意思的两种翻译，就有待语言学家去解释了。就指向这个板块的标签来说，还有“喀喇昆仑走廊”以及“沙克思干谷地”。这些标签之所以为我们所知晓，缘于中、巴、印三方对这片土地归属的不同看法。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这条河谷在1963年之前是由巴基斯坦方面所占据，并归属于英国人所认定的“克什米尔地区”范围内。在此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将之移交给了中国，并与中方彻底解决了边境遗留问题。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另一方——印度，自然是不会认可这一点的。以至于在今天的印度地图上，我们会看到印度的边境线画在喀喇昆仑山脉以北。

在英国人当年设计的中印边境中，包括克勒青河谷、阿克赛钦河在内的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都是在印度的版图中。历史上这条线被称之为“约翰逊线”（曾经修订过一次）。从技术上看，这种明显不符合分水岭原则的划法并不符合英国人一贯的风格。这一点我们从藏南麦克马洪线的划法也能看出来。事实上，要想透过一条高寒的分水线，将控制力投放在另一侧的山地中，对于具体操作的人员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这种困境在巴基斯坦方面试图争夺锡亚琴冰川的控制权时，就有所体现。因此约翰逊当初执意要划出一条不符合地缘规律的边境线来，在英国方面也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真正让英国人感到需要在喀喇昆仑山北，获得一片缓冲带的假想敌并非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央之国，而是在中亚已经渗透到帕米尔高原的俄国人。就像俄国人不会和英国人在海上决战一样；英国人也同样非常不愿意在陆地上直面俄国人。如果不是俄国人有意从清帝国手中割取西域的控制权（如果不是左宗棠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的话，英国人并不会觉得他们会在喀喇昆仑山一线碰到俄国人。既然俄国人有一天也有可能透过控制塔里木盆地渗透到藏北高原，那么英国政治家当中也会有人觉得有必要多为自己在南亚的利益获取一些缓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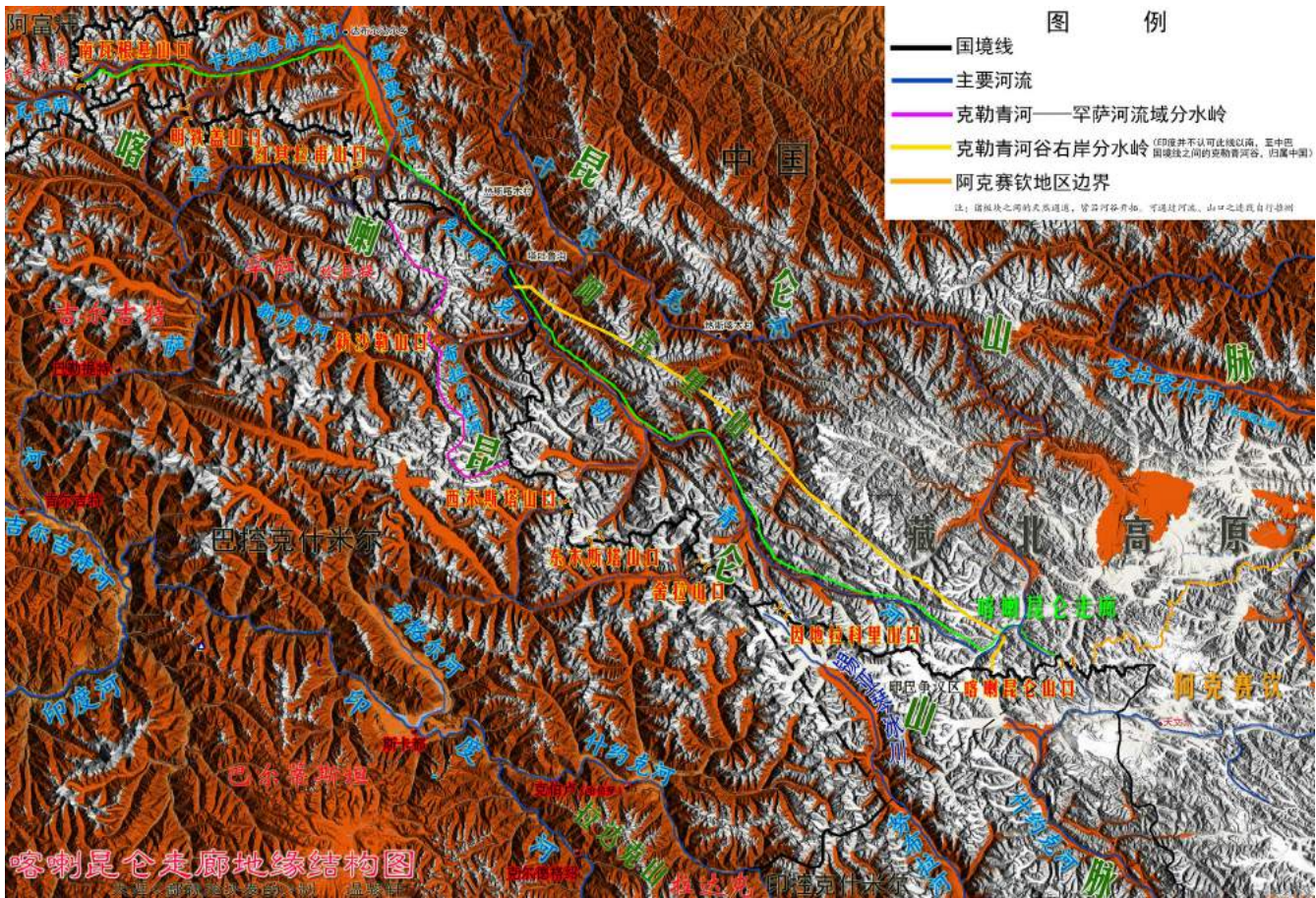
在后来的历史中，俄国人在得到半个伊犁河谷之后，止步于天山以北地区。然而英国人当时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还是为地区和平留下了很大的隐患。以至于今天的中印巴三国还在消化这个后果。从大的地缘平衡来看，通过战争、外交手段得到阿克勒青河谷、阿克赛钦地区的红色中国，看起来基本已经恢复了以喀喇昆仑山为界，与南亚地区保持平衡的局面。

不过从具体细节来说，情况还不是让人十分满意。这种不满意体现在，中国与印、巴两国的边境线、实际控制线，只是部分站到了喀喇昆仑山分水岭上。即使是以“哥俩好”方式获取的克勒青河谷，其西段也是以克勒青河河道中间线，而并非分水岭来切割的。

就克勒青河谷地区边境线的走向，大家具体可以参考《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我们所解读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关乎领土争端的问题。如果要更深层次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弄清为什么来自克什米尔方向的势力能够渗透到克勒青河谷？这条河谷又能够将我们带向何方？



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

从克什米尔方向渗透至克勒青河谷的通道问题，我们已经貌似解决了。沿什约克河上溯至努布拉河口，然后再转向西北方向，沿河谷而上跨越因地拉科里山口进入克勒青河谷，就是我们前面所设计出来的路线。对于最有机会打通这条交通线的巴尔蒂斯坦人来说，这条线路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起来有些绕远。如果最终通往塔里木盆地的道路，是顺着克勒青河而下的话，那么这条绕至克勒青河源头处，再折向西的线路，会让巴尔蒂斯坦人走不少冤枉路。

从几何层面来看，克勒青河的下游部分正处于巴尔蒂斯坦核心区的正北方。包括希格尔河在内的，众多从喀喇昆仑山南坡流下来汇入印度河的支流，应该都有机会直接将巴尔蒂斯坦人，从隆多、斯卡都等河谷地区带入克勒青河下游的。除非翻越这部分喀喇昆仑山分水岭的工作，比穿越因地拉科里山口的难度要高出许多，否则巴尔蒂斯坦地区完全可以有更短的路线，进入到克勒青河谷的。

实际上，在古典时期的商路中，这些直接连接巴尔蒂斯坦地区与克勒青河谷的





什约克河（上）与努布拉河（下）

通道的确存在过。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喀喇昆仑山主峰乔戈里峰两侧，看到西木斯塔、东木斯塔、舍拉等山口的存在。只不过，在英国人到来之前，这些山口及其附近的河谷，也像努布拉上游河谷一样，被向下渗透的冰川所覆盖了。也就是说，英国人和当时的巴尔蒂斯坦人，实际上都无法沿着这些传统线路进入到西域了。这并非意味着巴尔蒂斯坦以及拉达克地区，从此就断绝了与西域的直接联系。只不过在寻找新的线路之前，我们还需解决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克勒青河谷能够将我们带向何方？

当我们把视线沿着克勒青河顺流而下时，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当克勒青河走完自己在喀喇昆仑山中的路程，准备转向北跨越进入西域的最后一道障碍——昆

仑山脉时，一条即将在西域地缘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河——叶尔羌河，成为了克勒青河水的接收单位。作为塔里木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尔羌河能够将我们带向何方，本身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以地理结构来看，叶尔羌河谷步出藏北高原的路径正好处于昆仑山脉与西昆仑山脉的接缝处。而克勒青河谷贴着喀喇昆仑山主脉的走势，也能最大程度绕过藏北高原。

总的来说，如果想从巴尔蒂斯坦及其以西地区直接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话，克勒青——叶尔羌河通道将会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的问题在于，在那些传统连接巴尔蒂斯坦的商道被冰川所封闭之后，又将会有哪个山口和河谷能够承担连接这项战略任务？

#### 第四节 什约克河谷经阿克赛钦至南疆的困难

巴尔蒂斯坦和什约克河谷所对应的正是喀喇昆仑山主脉所在的位置。翻越这座平均海拔 5500 公尺的山脉，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所以，无论山脉之上那些山口是否能够成行，都不大可能成为主要的交通线。正常情况下翻越这类山脉最好的选择是从两端绕行，也就是说在山势将尽的时候寻找相对较低海拔的山口打通交通线。

以喀喇昆仑山脉西高东低的走势来看，整个克什米尔高原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希

望应该在西部，也就是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相接的位置。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推进方向，在解读完帕米尔高原之后，这个方向所包含红其拉甫、明铁盖等著名山口的通道，就将呈现在我们面前了。然而就近现代的地缘政治关系来说，包括拉达克在内的政治意义上的“克什米尔”地区，已经被整合成为了一个带有独立性质的地缘板块。在这种时候，从克什米尔的主脉——印度河谷源头之处开始，一路向西逐次展开会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片神秘的土地，以及它与中央之国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关系。



喀喇昆仑山脉

单从地理结构来看，巴尔蒂斯坦或者拉达克地区如果想沟通塔里木盆地的话，沿印度河谷而下，然后再沿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北上的线路，的确会更为合理。这条路线除了相对较低的海拔以外，沿途亦均匀分布有聚落的绿洲以为补给。这一点对于那些试图穿越克什米尔，沟通西域南亚的商旅来说尤为重要。

问题是，这种对于“外人”来说甚为合理的线路，对于巴尔蒂斯坦或者拉达克来说，就并不一定合理了。要知道，生存在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所谓“部落”，虽然本身也能形成大小不一的销售和消费需要。但从本质上来说，大家最大的利益所在都是从中获取物流方面的利益。简单点说，如果那些今天成为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的“藏人”有机会自己接通一条北接西域、南通印度的交通线，那为什么一定要向西克什米尔乃至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些部族交买路钱呢？即使这条线路因为道路的艰险，无法吸引到外来商旅的垂青，仅供生活在东克什米尔地区的部族自己使用的话，也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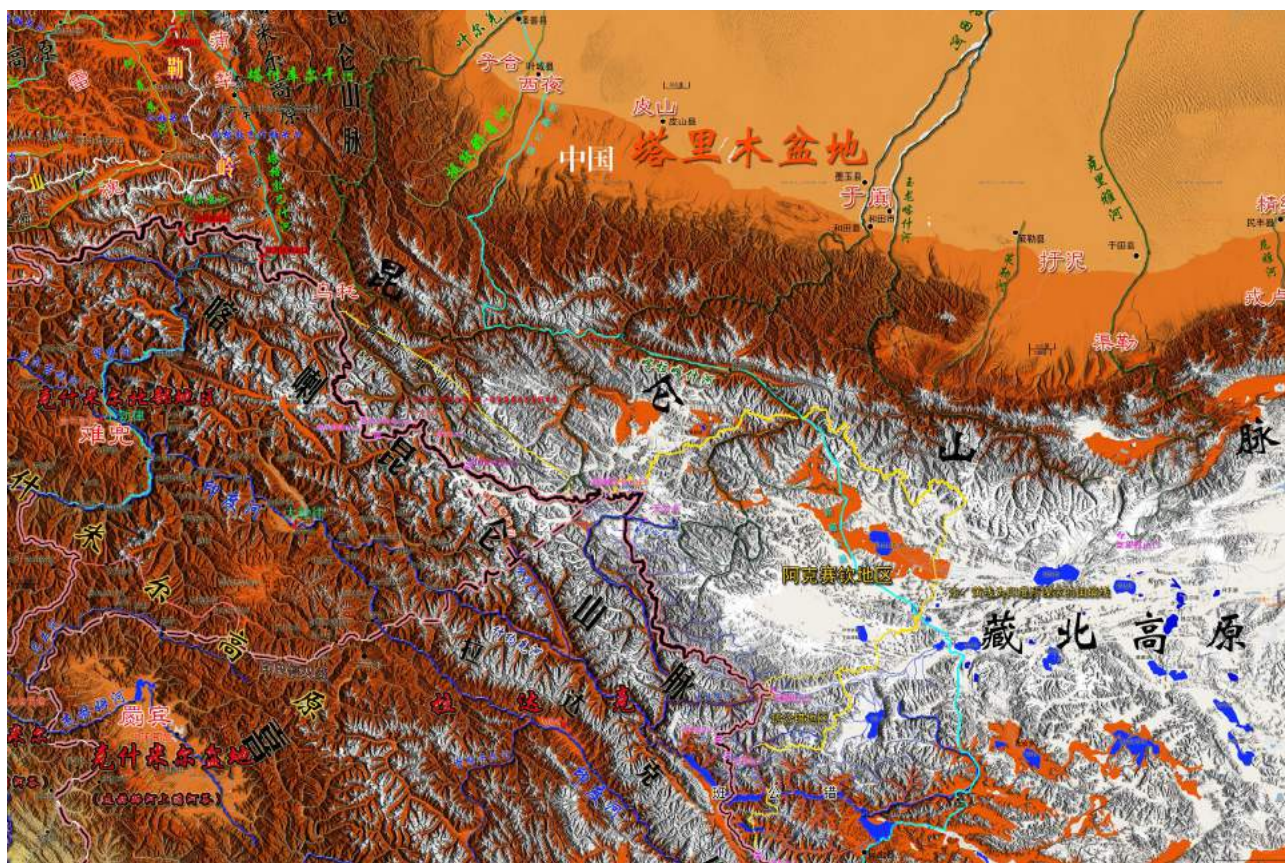
如果你不愿意借由西克什米尔地区那些被认定为丝绸之路主线的商道，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话，从喀喇昆仑山脉的另一侧尽头处绕过喀喇昆仑山脉（也就是藏北高原相接喀喇昆仑山脉东端），就成为了北上的唯一选择。可以想见的是，打通这样一条新交通线最大的风险，在于高海拔所带来的恶劣环境影响。不过如果说要应对高海拔所带来的环境困难，谁又能比那些吐蕃后裔更在行呢？（这样的线路，对于那些从低海拔地区而来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现在的问题就相对简单点，我们所需要的地理突破点应该就是喀喇昆仑山脉与阿里高原的相接处。以我们在之前内容所积累的经验来看，这种山地相接的缝隙之处，



往往也是河流汇集之处（除非干到一点水也没有）。也就是说，应该会有一条河流为我们指引方向。以什约克河与喀喇昆仑山脉的地理关系来说，这条发源于山脉东端的河流最有可能汇入的就是什约克河了。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什约克河的河源。当我们顺着什约克河谷，从下游的哈伯罗地区一路上溯，渡过中游的努布拉河口，到达另一个转而向北的河口之后，很快我们期待的山脉相接处就将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喀喇昆仑山脉东端的这条与努布拉河平行，被我们定义为什约克河上游的河流，给予我们的惊喜比想象当中要更大。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从喀喇昆仑山脉主脉分水岭流下，而且是源自喀喇昆仑山脉以北的藏北高原，然后贴着喀喇昆仑山脉北脉东行了一段路程之后，再经由两大山地的接缝处弯进了喀喇昆仑山南麓。也就是说，地质运动看起来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如何穿越喀喇昆仑山主脊的大问题。如果什约克河上游不是像努布拉河上游那样完全被冰川所覆盖，这条看起来绕了个大圈的线路，还是很有可能带着我们接近本来可以直线对接的克勒青河谷的。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什约克河这种从山脉两侧分别集水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的雅鲁藏布江河谷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高原土著们在翻越雅鲁藏布河大峡谷之后，将会一路走低的进入南亚次大陆平原地带；而沿着什约克河而上的探险者，则会悲

哀的发现,他们将面临比在克什米尔高原更为艰难的处境。因为此时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一片河源汇集之处的高原,这片高原就是藏北高原。

准确的说,什约克河上游所延伸进的这片高原,是藏北高原的西北角。再精确点的话,它所直接对接的板块,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地缘板块——阿克赛钦。对于阿克赛钦这个标签来说,但凡对国际政治稍有兴趣的朋友,应该都熟得不能再熟悉了。如果时常翻阅一些国外地图的话,我们总能在中国那雄鸡般的轮廓线的“屁股”处,发现一个近似鸡蛋状,被特别标出来的区域。这片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被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属于印度或者中印争议区的土地,就是阿克赛钦。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阿克赛钦应该是一个整体,一个中、印双方都想得到的高寒无人居住区。然而当我们沿着什约克河进入这个板块时,却发现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什约克河延伸入阿克赛钦(也可以说是中国部分)的这个源头,被中国方面标注为奇普恰普河。它所处的位置,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克赛钦”。阿克赛钦这个名字,最初所指的是位于该板块东北部的一个湖泊“阿克赛钦湖”。再扩大点的话,这个湖泊所处地的盆地就是“阿克赛钦盆地”了。

和藏北高原大部分的区域一样,阿克赛钦盆地也是一个内流区(阿克赛钦湖自然也就是咸水湖了)。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意义上的阿克赛钦,其中东部都是属于这样的内流区,板块腹地也还分布着另外几个咸水湖。以流域划分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分四周高、中间低的内流区都称之为“阿克赛钦盆地”。

既然我们指出了,阿克赛钦的中东部都是属于内流区,那是不是意味着板块的西部应该是外流区了?从奇普恰普河——什约克河——印度河的走向来看,这样的定义倒是没有问题。不过什约克河并不是唯一从阿克赛钦西部取水的河流,奇普恰普河流域东、北侧的高原,还承担着为另一条叫作“喀拉喀什河”的河流源头集水的作用。也就是说,所谓阿克赛钦板块西侧的外流区,实际上是由什约克河和喀拉喀什河的源头部分共同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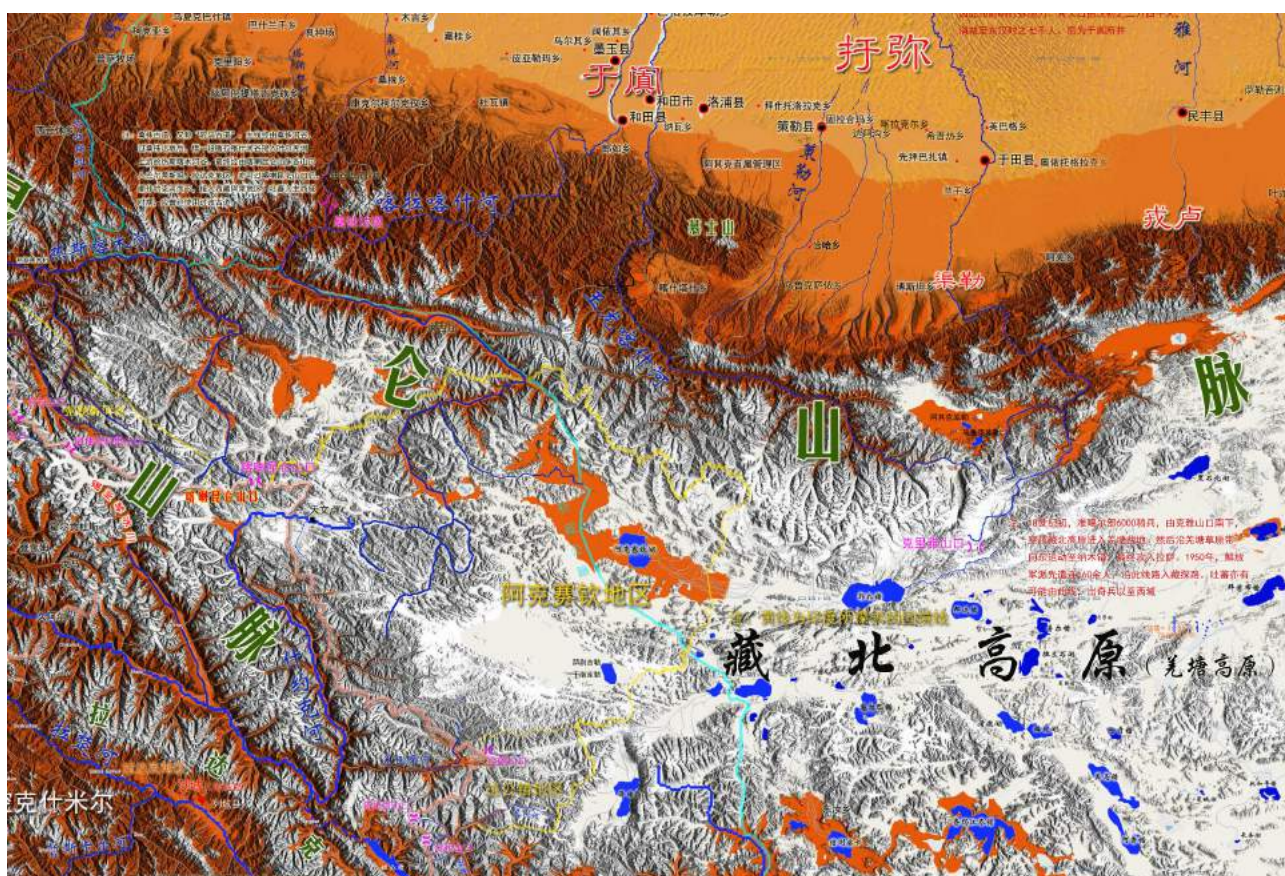
喀拉喀什河的名字,估计知道的人并不多。不过提到盛产和田玉的“和田河”,知道的人就肯定很多了(最起码“和田”二字有足够的知名度)。事实上和田河是由两条河流在沙漠腹地相汇而成的。其中西侧的一条就是喀拉喀什河,东侧的一条则是玉龙喀什河。虽然真正的羊脂白玉主要产自于玉龙喀什河,但就长度而言,喀拉喀什河更应该算是和田河的干流。

其实谁是主,谁是次只是一个名分之争了。对于溯什约克河而上的英国人来说,他们最大的发现就是有可能跨越什约克河与和田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相对高度已经很低了),然而顺着喀拉喀什河而下进入塔里木盆地。这个发现让英国人既兴奋又感到担忧。兴奋的是,这毕竟是一条能够由克什米尔地区直插塔里木盆地的新通道;担忧的是,一旦俄国人从中国手中夺取了整个西域的控制权,那么这些野蛮的斯拉夫人也同样有可能沿着这条路径出现在喀喇昆仑山北侧,对大英国帝国的克什米尔



地区造成直接威胁。

由于有了这个战略上风险评估，英国人内部开始有人主张，应该抢在俄国入主西域之前，将包括喀喇昆仑山上游在内，昆仑山主脊以南的藏北高原统统划入克什米尔的范围。以避免俄国人最终登上这片屋脊之地，对英国的利益造成巨大压力。基于这层考虑，什约克河——喀拉喀什河源头以东的“阿克赛钦盆地”也被当成缓冲区划入了克什米尔的版图（尽管占领这片无人区，看起来并没有经济上的利益）。事实上，为了帮助克什米尔获得一片完整的缓冲区，英国人后来在地图上修正过的那条“约翰逊线”，从藏北高原所切割出来的土地，要远比今天中、印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要大。它实际上还包括了克勒青河谷以北，直至昆仑山山脊的这片三角地带。在网上流传最广的那张克什米尔地图（我在国际部分也曾经用它做过底图），就画出了这条夸张的约翰逊线。



汉西域全图

就技术难度来说，地图开疆远比实际占领要容易得多。英国人虽然大笔一挥，就在中国方面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从藏北高原的西北角割取了这么大片土地。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力量去真正占领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实际上，不仅阿克赛钦盆地这样的内流区在当时没有通行的价值，即使是英国人最为担忧的什约克河——喀拉喀什河通道，真正想通行的话也是万分艰险，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在藏北高原腹地



穿行千里。纵穿藏北高原究竟有多大风险，可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红色军队先头部队进军西藏的案例中得到真实体验。在那次从于田（和田东南部）出发，以阿里为目的地的行军当中，139名先遣队员中有40多人未能走到终点。并且为了对这支小部队进行补给，还损失了数千头骆驼、驴等牲畜。



藏北高原



阿克赛钦湖

这条由塔里木盆地进藏的线路，我们在回到塔里木盆地后才会有所解读。现在把它提出来，主要是用来佐证与之平行的这条沟通塔里木盆地、克什米尔的“什约克河——喀拉喀什河通道”有多少的不靠谱。事实上，如果这条通道真的有实用价值的话，也就不用等着英国人来发现了（当然，之前也可能有人试走过，只不过没有商业价值罢了）。在英国人自认为发现新大陆后，持怀疑态度的清帝国也曾经派人溯喀拉喀什河而上，进入过阿克赛钦地区。然而对于双方来说，这片无人区主要还是停留在地图之中。直到红色中国发现，经由喀拉喀什河河谷横穿阿克赛钦湖区的线路，是他们唯一可能打通的连接塔里木盆地与阿里地区的线路（新藏公路）。

实际上，不管是让英国人杞人忧天的什约克河——喀拉喀什河通道，还是红色中国后来打通的新藏公路，都不是传统线路。也就是说，生活在巴尔蒂斯坦、拉达克、



阿里这三个“藏区”（最早到此考察的英国人，曾将它们称为第一、第二、第三西藏）的部族，如果想沟通西域的话，会有更好的路线绕过藏北高原腹地。这条线路的核心部分我们并不陌生，它就是当年由巴基斯坦方面向中国移交的“克勒青河谷”。而能够同时为这三个“西藏”对接这条谷地的山口——喀喇昆仑山口的知名度则要更高。至于这个经常见诸新闻的山口（包括驻守这个山口的“神仙湾哨卡”）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分析。

## 第五节 喀喇昆仑山口连通的地缘板块

喀喇昆仑山口今天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从大的方面说，它位于中、印、巴三国相接点（如果锡亚琴冰川归属巴方的话）；从小的方面说，它也是阿克赛钦地区与克什米尔地区相接的一个关键点。问题是，喀喇昆仑山口其实并不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特殊行政位置上而凸显出重要性的。实际情况是，它特殊的地缘位置造就了今天中、印、巴三方在这一区域的行政格局。它的存在，甚至直接影响了印、巴克什米尔地区停火线的走向。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包括锡亚琴冰川在内的喀喇昆仑山脉中段，曾经有多条商路可以贯穿其间。由于气候变化，这些主要为巴尔蒂斯坦人北上所用的通道，基本都被封闭了（不是说绝对不能通行，而是通行的风险太大，不足以承担贸易功能）。如果这时候的巴尔蒂斯坦人还想向东走出一条通往西域之路的话，就只能在行将至什约克河谷尽头时，向西从喀喇昆仑山口绕过喀喇昆仑山，进入克勒青——叶尔羌河流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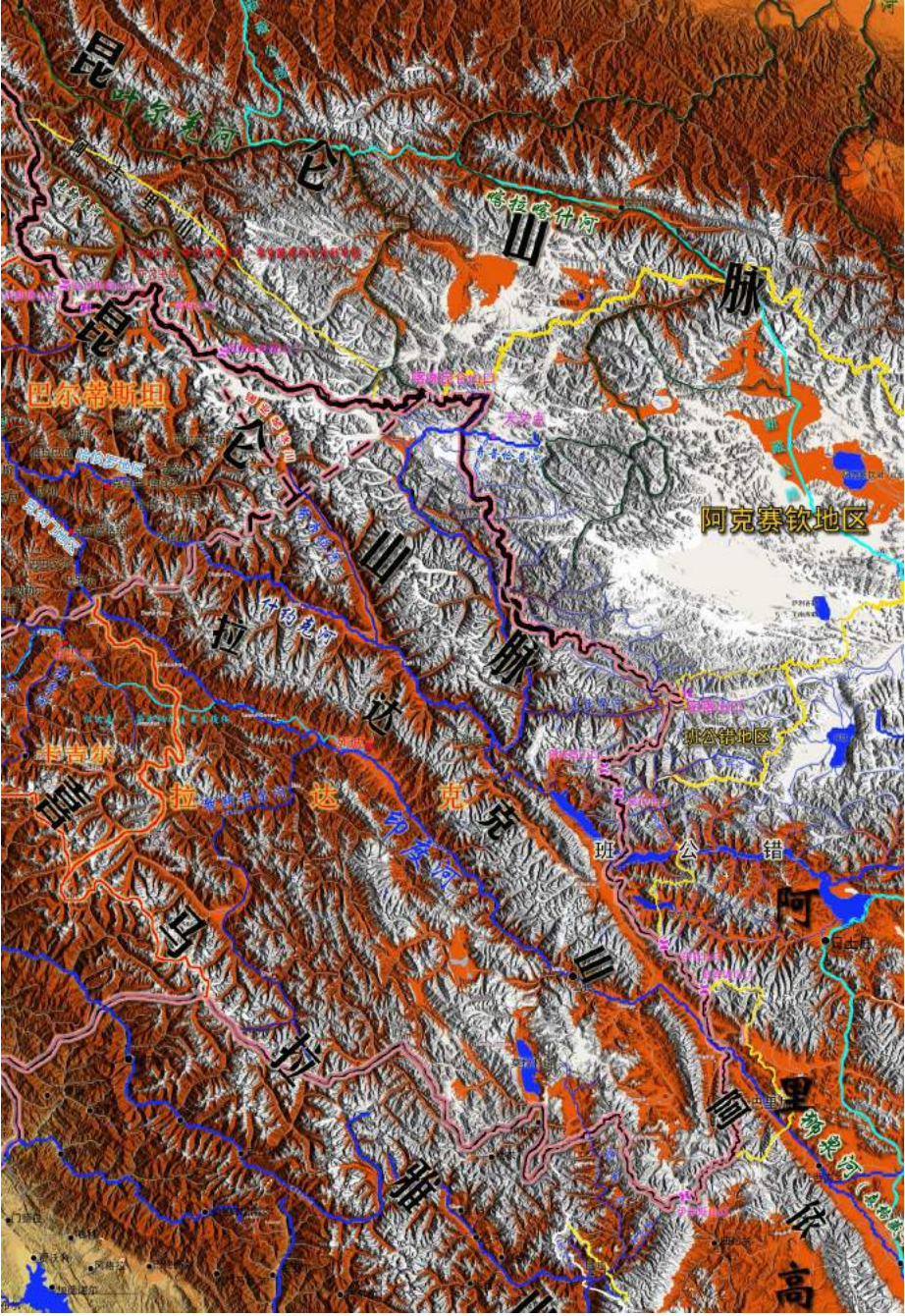
对于已经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尔蒂斯坦人来说，除了商业上的理由以外，他们还有宗教上的理由希望打通与西域之间的通道。而对于那些身处塔里木盆地南沿绿洲上的穆斯林来说，经由喀喇昆仑山口——克什米尔——兴都库什山脉前往阿拉伯半岛朝圣，也是一种选择。在大部分时候，宗教只是利益扩张的副产品。尽管一定会有笃信宗教者，仅仅出于精神上的需求就把自己置于险地（如去艰苦地区修行）。但在大部分时候，利益才是人类探险的原动力。基于此，喀喇昆仑山口所连接的也并不仅仅是两个穆斯林世界。事实上，在巴尔蒂斯坦人使用喀喇昆仑山口之前，那些持佛教信仰的拉达克商人，就已经走通喀喇昆仑山口了。

相比有些绕远的巴尔蒂斯坦人，处在喀喇昆仑山对应区域的拉达克人更有理由使用喀喇昆仑山口（列城和喀喇昆仑山口几乎处在同一经度上）。当然，在如此复杂的山地条件下，任何几何层面的计算都是不现实的。从列城出发的拉达克人，如果想到达喀喇昆仑山口的话，还是不得不选沿拉楚河上溯一段。在拉达克山西端寻觅合适的谷地，穿越或者绕过拉达克山进入什约克上游河谷。

在拉达克人绕过拉达克山北上的过程中，阿里高原三大重点板块的班公错湖会



不可避免的暴露在他们面前。实际上我们前面也说了，班公错湖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仅仅只有六米高。如果这段分水岭被挖通的话（或者说以前班公错——印度河就是相通的），那么班公错湖之水并不是直接流出成为印度河干流的“拉楚河”，而是会成为什约克河的一个源头。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拉达克山北麓了。在同样与班公错湖擦身而过后，什约克上游河谷将引领着他们站到喇喇昆仑山口脚下。

现在我们大致清楚了，围绕着拉达克山西侧的巴尔蒂斯坦和南侧的拉达克，以

鉴于拉达克人因为向北沟通的需要，可以将商路、势力自然渗透到今天的班公错西岸，今天的印度想继承这种地缘关系，并因此想获得半个班公错也就不足为奇了（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希望自己的主要交通线有一块缓冲之地保护的）。如果说拉达克人在北上什约克河上游河谷时，还要头疼从什么山口穿越拉达克山的话。来自阿里高原的商旅想要进到喀喇昆仑山口的话，障碍就要小得多了。他们可以顺狮泉河而下，在行至拉达克山东端时不进入拉楚河谷，而是略微向西北方向偏移一下行程，就进入到了拉



及东侧的阿里地区，都有通道对接“什约克上游河谷——喀喇昆仑山口”通道。这种交通格局，也使得这条三方共用通道，本身很有可能成为了一个争夺焦点。

以英国人当时的技术优势，以及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经营来看，他们会更有机会抢得什约克河——喀喇昆仑山口通道的控制权。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帝国统治者来说，他们也很难有力量有技术，像英国人那样从地缘政治角度去考察这片不毛之地的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对于这片土地的价值毫不关注。最起码那些重要商路上的节点，会引发帝国的关注。

这也就是说，清帝国的政治家们，虽然不清楚喀喇昆仑山脉一带具体的地缘结构（他们也没这个兴趣），但对于像喀喇昆仑山口这样众人皆知的战略要点，并不会轻易放手。这就好像帝国可以丢掉伊犁那些没有驻扎过军政人员的土地，但俄国人想从外交途径劝说清帝国放弃那些帝国明确控制着的据点，却也是非常困难的。喀喇昆仑山口也是这种情况，基于它在新疆与“三个西藏”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中央之国的外交家、军事家们会很容易将它作为一个防御的重要节点，并竭尽全力将它保持在中央之国的版图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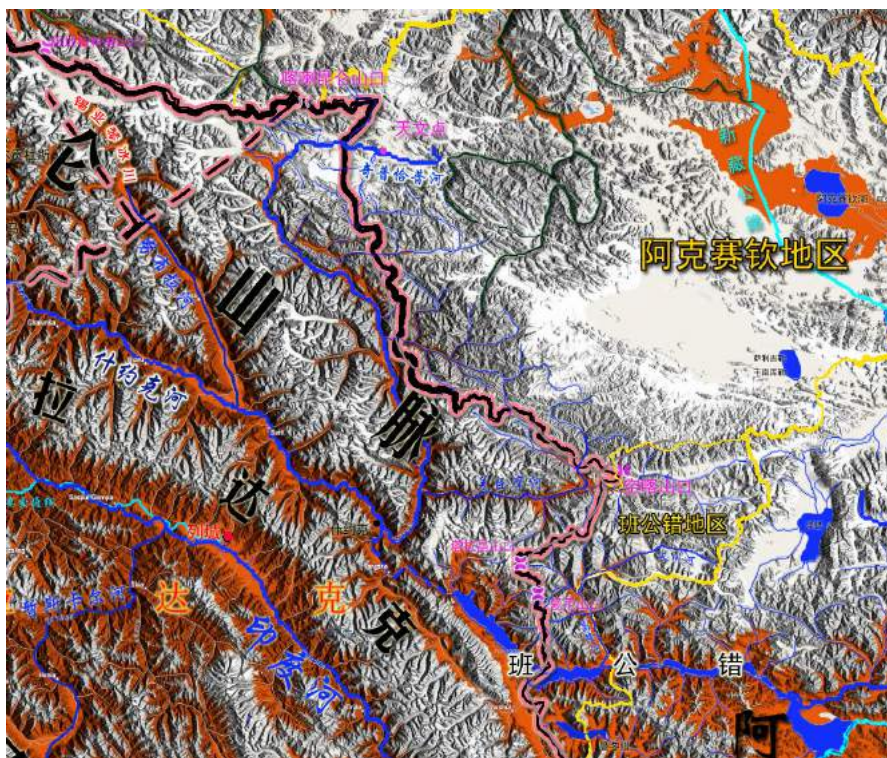
在英国人为了印度的绝对安全，希望将克什米尔的北方边境，从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分水岭时，喀喇昆仑山口成为了阻断他们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节点。基于喀喇昆仑山口，以及其西侧通道在西域与南亚、西藏之间沟通的重要性，清帝国并不会轻易放弃这片高寒之地。这种情况和乌兹别里山口，在中俄分割帕米尔高原时所起的作用类似。对于没有技术手段和意识勘测地理数据的中央之国来说，那些被记录在案的重要山口，就成为了外交谈判的争夺重点（这些点争到了，就可以以点带面的划出边境线来了）。

事实上，对于这片理论上的缓冲之地，英国人也并没有势在必得的需要，毕竟俄国人还没有真正占据塔里木盆地。如果中国人对这片土地不了解（鉴于藏北高原的环境，以及与帝国核心区的距离，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么他们自然可以单方面划出一条线来圈地。反之，为这样一片土地大动干戈，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

相比已经具有现代国家、领土意识的英国人来说，此时的中央之国对于领土的概念还处于古典思维模式。这种领土观念的最大特点，就是地随人走。也就是说，那些可以聚落、交通的土地，才会是争夺的目标。反之，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对于这点，俄国人应该感受最深。当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面追逐皮毛时，理论上应该可以领有这些土地的中国人，并不会关心他们在做什么。而当他们威胁到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时，被触及到根本利益的清帝国，终于开始在军事、外交上构筑起防线了。事实上，如果不是中央之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与东北平原以及蒙古高原有着极深的渊源，俄国人最终与中央之国的地缘平衡线，很有可能会出现在那条传统的农牧分割线——长城了。

回到喀喇昆仑山口的问题上来。如果英国人想在不惊动中国人的前提下，偷偷摸摸把克什米尔的控制线推进到昆仑山巅的话（尤其在喀喇昆仑山口以西这样做），显然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旦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些往来于喀喇昆仑山口的商旅，一定会将信息反馈给中国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既然英国人不愿意用军事手段来争夺这片不毛之地（其内部的对于是否要深入藏北高原的意见都未统一），那么按殖民时代的规则“谁先发现谁占有”的原则，就将成为英国在藏北高原能渗透多远的指导原则了。

基于英国人并不愿意为此而引发军事冲突的前提，最终印度人决定“继承”下来的藏北高原，就变成了喀喇昆仑山口以东那片内流的无人区“阿克赛钦”了。由于这片盆地区并无外流的河流，也就没有成为商道的一部分。英国人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最初发现者，并有理由得到这片土地。至于印度人，他们当然乐得继承这点了。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事实上，英国人和印度人对于藏北高原种种切割方案，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单方面作为。其战略目标就是尽量向昆仑山一线扩张缓冲区；战术指导原则则是，占据那些自认为有法理依据，而没有中方活动迹象的土地。今天的我们，会看到一条修建于 50 年代，横穿阿克赛钦湖区的新藏公路。中印之间对于阿克赛钦地区争夺，乃至整个边境线上的全面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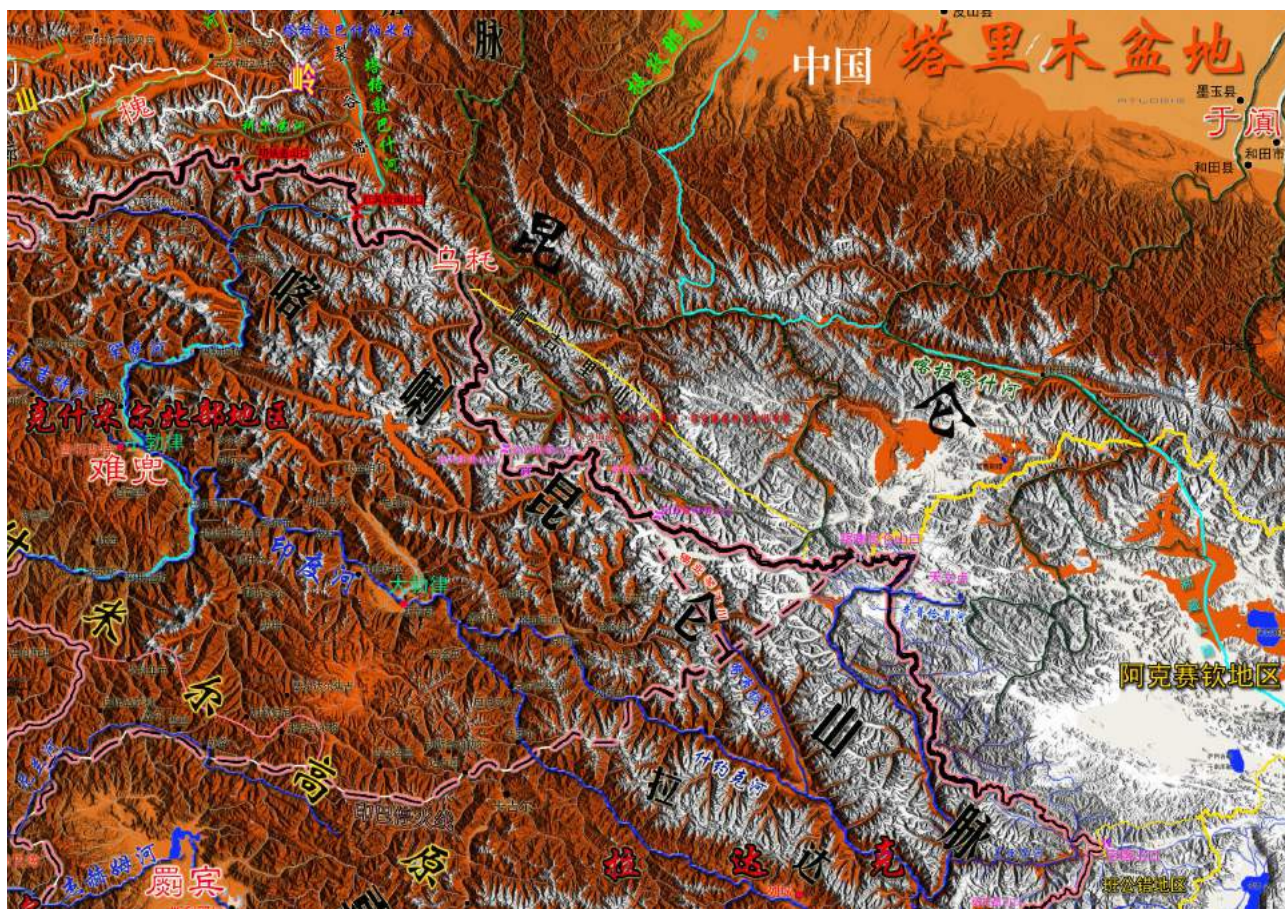
都是由于这条公路的修建而触发的。当然，即使没有修建这条公路，已经具备现代国家意识的红色中国，也没有理由让印度人在自己的西北地区，深入这样一个突出部。

发生在阿克赛钦地区的种种恩怨，相信大家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了。简单点说，各方都已经认可了阿克赛钦归属中国这个现实。然而我们在最近的新闻中，还是不断会听到，在这一地区有小规模的对抗、卡位情况发生。其实仔细从地图上观察阿克赛钦的水系结构，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了。让中、印双方不得安宁的根本



原因，还是在于什约克河流向。

这条能够同时收集喀喇昆仑山口南北两侧淡水的河流，给中、印双方同时出了一个难题。它不仅在喀喇昆仑山脉东侧拐了个大弯，更将源头部分弯向了阿克赛钦西部。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没有占据喀喇昆仑山山脊的制高点是一种遗憾；对于印度来说，一部分什约克河流域被中国占据，同样是一种威胁。如果让印度来选择的话，他们所希望的应该是将什约克河上游左岸支流，尽数划入自己领土。这块土地有多大我没有具体算过。不过在《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中，我已经将相关河流用不同颜色标示出来了。相信大家很容易就会在地图上划出这样一条理论上的地缘平衡线来了（印度方面所希望的）。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中国和印度方面今天对于边境线的争夺，已经是完全从现代地缘博弈的角度来进行了。对于古典时期的人来说，即使会对这些人迹罕至的地区感兴趣，也仅限于那些可以通行的道路。当然，道路的走向也是今天研究地缘关系的重要指标。不过从技术上看，今天新藏公路所打通的并不是一条“古道”。在工业时代，那些在古典时期几乎没有通行可能的地区，也可以成为了道路的选址。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存在了千百年的古道不重要。事实上，如果有可能，这些通行条件更好的古道总



通往喀喇昆仑山口的道路

新疆——西藏通道时，不止喀喇昆仑山口以南的地区不在中国版图内，山口以西的喀喇昆仑山北麓地区，同样不受中国控制。这条对接喀喇昆仑山口，指向塔里木盆地的河谷，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克勒青河谷。

是会成为现代公路修建的基础。红色中国之所以没有选择一条传统道路打通西域与西藏的通道，根本原因在于这条通道的控制权不在手中。

通过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传统的古道从喀喇昆仑山口——什约克上游河谷与班公错湖擦肩而过，从拉达克山东侧接入狮泉河谷，然后再进入雅鲁藏鲁江河谷的。然而想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修建一条“国道”的前提是，拉达克必须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中。而在当时，拉克达已经明确无误的被克什米尔军事征服，成为印度的一部分了。

实际上，在红色中国准备打通



## 第十七章 克勒青河谷与周边的地缘关系

### 第一节 乌秣国在塔吐鲁沟设立都城

很多人都知道克勒青河谷的控制权，是由巴基斯坦方面于 1963 年移交给中国的。通过参考《克什米尔地区地缘结构图》，相信大家依据最基本的地缘原则，也能判断出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得到这条身为叶尔羌河上游的河流了。不过，对于巴基斯坦方面为什么能够占据这条河谷这个问题，就鲜有人关注了。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张骞和他的后来者们已经在二千多年前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参考《克什米尔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我们会在克勒青下游与叶尔羌河相接之处，找到一个叫做“乌秣”的国家。解开克勒青河谷为什么曾经为巴基斯坦所控制，克勒青河谷又是如何连通塔里木盆地问题的钥匙，尽在这个不起眼的山地小国身上。

乌秣国在汉书的记载中，是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小国。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然而这样的通行条件，并不意味着乌秣国就无法与外界沟通了（否则汉帝国怎么会知道它的存在，并有详细人口数据）。事实上，这个位于克勒青河谷的小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克什米尔地区与塔里木盆地的交通枢纽。能够假道于它与西域相通的地缘板块，并不仅仅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巴尔蒂斯坦、拉达克、阿里板块。今天巴尔蒂斯坦西侧的吉尔吉特板块，也同样能够通过这条河谷连通西域。

吉尔吉特板块地的地缘结构如何，它又是怎样与克勒青河谷，及其西北侧的东帕米尔地区相通的，是我们的下一个解读方向。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乌秣国到底在在哪里的问题。基于商业的需要，这个看起来应该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山地国家也拥有一座“城”——乌秣城。这种情况倒是与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蒲犁国”很类似。基于获取商业利益的需要，蒲犁人在后来也逐渐尝试定居，并在变身为“竭盘陀国”后，在今天塔什库尔干县城的位置上建了一座城（石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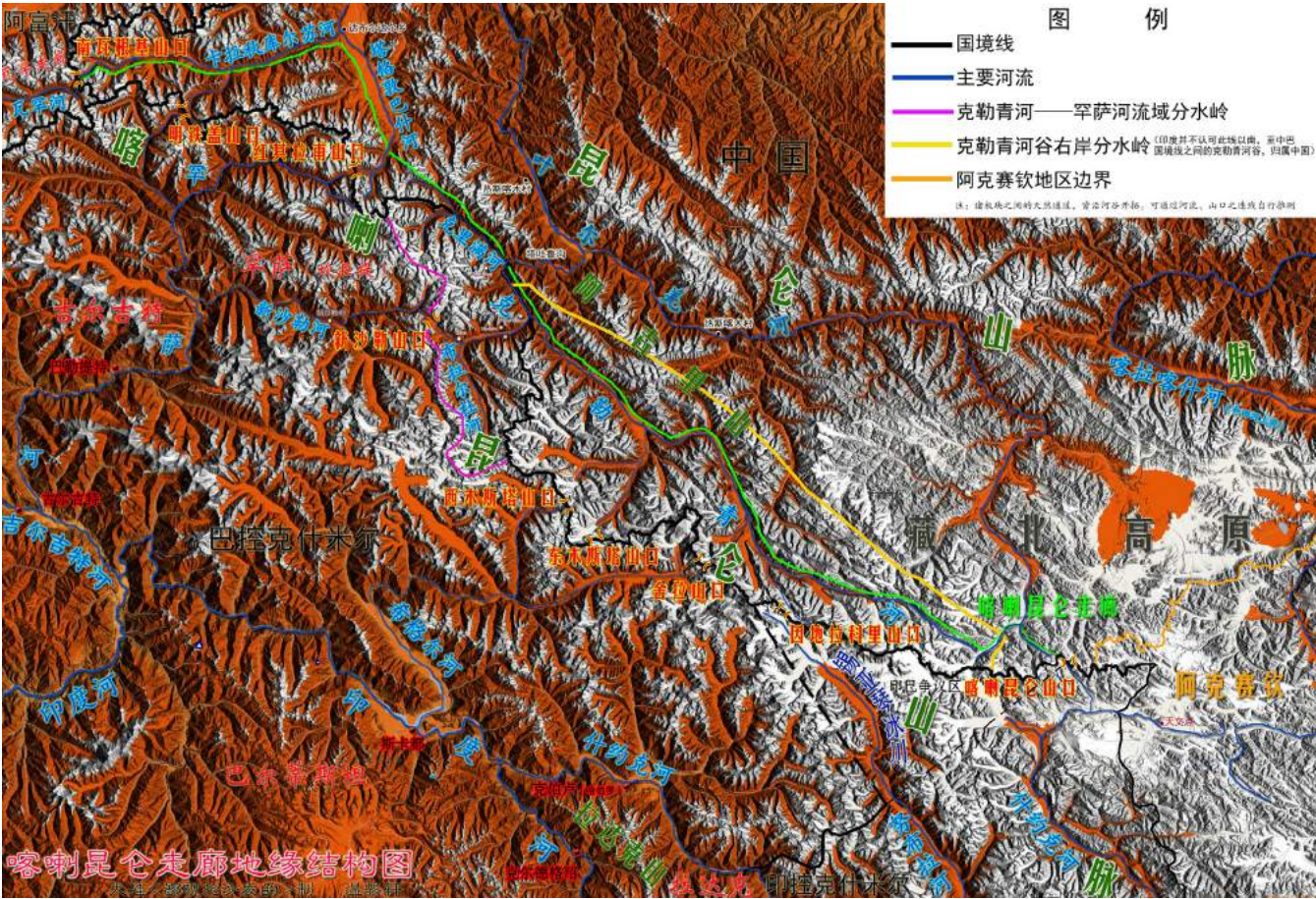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山地小国，很少会有人去考证这个国家的地缘价值究竟在哪里，它的王治“乌秣城”又到底在哪里。不过乌秣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以及以克勒青河谷的地理结构来推导的话，克勒青河下游转而向东接入叶尔羌河的这段下游河谷，应该就是乌秣国的核心区，也就是乌秣城所在地。

一般情况下，河流的下游地区总是会拥有更好的生存条件的。在这片高寒的土地上，这点更多体现在相对较低的海拔条件上。克勒青下游河谷的海拔约在 3200 米——3400 米。在分析克什米尔与西藏的那些“半农半牧”板块时，这样的海拔高度已经多次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指标。也就是说，当海拔高度降到这个位置时，



依靠高山雪水而生的河谷低地，将会有机会发展有限的农业。

总的来说，乌秣国的农业基础并不好。在乱石密布的河谷中“种田于石块间”，更多是定居带来的副业。也就是说，乌秣人最初选择在克勒青下游河谷筑城以定居，原始动力还是源于从过往商旅身上获利。这也使得包括克勒青河谷、塔什库尔干裂谷带中所出现的农业基因，非常的不稳定。以至于今天在这两个板块所看到的居民，大多还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



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

一般来说，越是偏远的地方，它的地缘结构越是容易一成不变。就像今天我们看帕米尔高原那些适于聚落的河谷，事隔二千多年后还能与近、现代当地的地缘结构对应上一样。如果大家想赶在考古专家之前（他们人力有限）找到一座西域古城的话，倒是可以试试去克勒青河谷寻找“乌秣城”的下落。这座城或者说这段河谷，当下所指向的地标叫做“塔吐鲁沟”。风景优美、民风纯朴，是外界对它的评价。而它的通道作用（尽管不是主干道），也同样没有被忽视。只不过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巴公路、新藏公路都没有沿着这条古道延伸。因此今天部署于此的边防部队，更多是在警戒那些试图从古道穿越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的极端分子。

乌秣城到底在塔吐鲁沟的哪个点上，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将乌秣国的领



地完全圈定在克勒青河谷，也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整个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叶尔羌河谷，应该都是乌秣人游牧的范围。今天在这段河谷中，也建制了一个最靠近克勒青河谷的行政村——热斯喀木村。如果你最终在这里也发掘出一些年龄在两千年以上的遗址的话，那么它们很可能就是乌秣人留下的了。



边防军在塔吐鲁沟巡逻

当然，相比之下塔吐鲁沟更容易脱颖而出，成为乌秣国王治所在地。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它在交通上的优势（真要说游牧或者农业条件，并不比叶尔羌河上游河谷更强）。这一优势并非仅仅体现在塔吐鲁沟连通了与喀喇昆仑山口之间的这条“喀

喇昆仑走廊”。依照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想成为交通枢纽，并借此战胜竞争对手的话，你最少要能同时指向两个以上的地缘板块。那么在塔吐鲁沟驻足的商旅除了溯克勒青河而上，通过那些分布在喀喇昆仑山脉东段，尚未被冰封的山口中进入那几个被吐蕃后裔渗透的板块以外，还能够有什么新的去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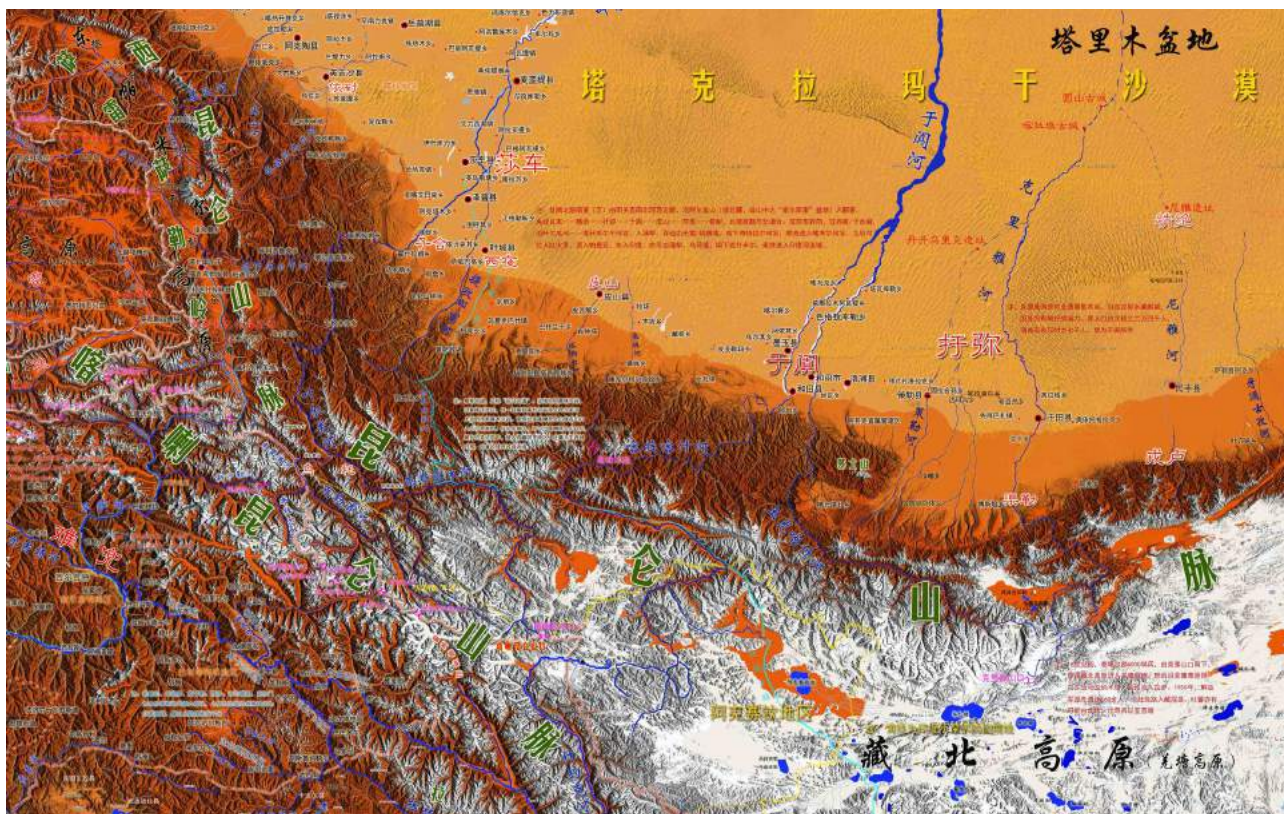
## 第二节 由克勒青河谷进入蒲犁国的通道

如果我们把乌秣国的位置，定位于克勒青河谷——叶尔羌河（干流）上游的话，就会发现从流域角度看，蒲犁国和乌秣国就像一根树干上的两个分支。前者所依附的塔什库尔干河，可以被认为是叶尔羌河的西源；而后者所指向的河谷，就是叶尔羌河的东源了。结合地形再进一步解剖叶尔羌流域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条从藏北高原——帕米尔高原接缝处穿过，流入塔里木盆地的河流，不仅依靠塔什库尔干河收集到了西昆仑山脉、萨雷阔勒岭之水；同时还依靠叶尔羌——克勒青河收集了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之水。这两大集水区在地缘上的反映，就是造就了蒲犁国、乌秣国这两个体量相近的山地国家。

既然蒲犁国和乌秣国所处的位置处于同一流域上游的两个方向，那么它们之间看起来应该不大可能发生横向的联系了。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应该是，大家各自打通一条通道，通过叶尔羌下游河谷与塔里木盆地沟通。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仔细观察地理结构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大集水区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之间同样存在横向整合的可能性。



帕米尔高原之所以被称为“万山之祖”，是因为周边几大山脉看起来都源自于此。在这种地理联系中，作为帕米尔高原东部边界的西昆仑山脉与昆仑山脉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最为明晰。而如果我们顺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山脊向帕米尔高原延伸视线的话，同样也能够在这个山结中为之找到龙脉的延续（要是看风水的话，这点很重要）。如果对东帕高原的解读还有印象的话，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条能够对接上喀喇昆仑山脉的山地，就是相对高度并不那么显眼的“萨雷阔勒岭”。



汉西域全图

当我们把昆仑山脉——西昆仑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萨雷阔勒岭连接对应起来的话，一条从帕米尔高原东部，一路向东南方向深入藏北高原的山间低地带就呼之欲出了。我们一直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任何两个板块之间因为人类需要，都有可能连通道路。问题在于，并不是有道路连接的相邻板块，就一定能够融合成为一个更高一级的地缘板块的。板块之间是否能够融合，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地理、环境，是否能够承载同一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生存。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叶尔羌河流域上游地区还是很有机会整合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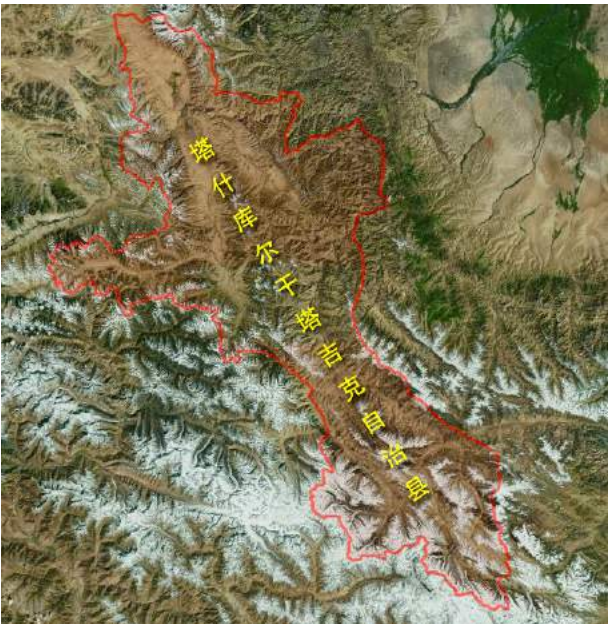
这种情况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当唐帝国再一次代表中央之国派出使者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会发现叶尔羌流域上游的这些山间谷地，都已经被整合为了一个新的国家——竭盘陀国了。竭盘陀国的地缘中心就在今天塔什库尔干县的县城所在地（石头城）。这一地缘结构也在今天这叶尔羌上游地区的行政区划中，得



到了全面体现。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中，由石头城故地所引领的蒲犁、乌秣故地，现在也同样都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组成部分。



汉西域全图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卫星图

以今天的地缘结构来看，得到整个叶尔羌上游地区的，无疑是那些源自欧洲的游牧族群后裔。然而二千多年前蒲犁、乌秣两族，却应该还是羌系部落的一部分。在黄、白种族博弈白热化的亚洲中部，这种地缘变化并不会让我们感到诧异。相比去争论那些西域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族属状况，探究他们彼此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博弈、渗透的，会更有现实意义。

基于塔什库尔干河和克勒青河的方位，寻找从乌秣国通往蒲犁国的路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塔什库尔干流域中寻找一条指向最南的河谷，同时再在克勒

青河流域中找到那条位置最西的支流。翻越两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就能打通它们之间的通道了。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找到了两条可以为旅行者指明方向的河流：塔



格敦巴什河、克里满河。

塔格敦巴什河我们并不陌生，解读塔什库尔干裂谷带时，这条贯穿裂谷带南段的河流，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帕米尔八帕中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就是因它而得名。相比这个大家略感陌生的标签，其源头所指向的“红其拉甫山口”就要出名得多了。

作为印度河流域与塔里木河流域之间的一个分水点，红其拉甫山口具体分隔的，是塔格敦巴什河与罕萨河（洪扎河）。翻越山口连通这两条河谷的，就是著名的“中巴公路”。不过这部分内容并不是当下的解读重点，现在提到红其拉甫山口这个知名坐标，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知晓，塔格敦巴什河以及“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南部地理边界，大致在哪个位置。

大家沿着中巴公路行至红其拉甫口岸后，如果不想这么快踏出国门的话，那么继续向南沿中巴边境行走的话，很快就能够看到另一条能够把我们带到乌秣国的河流——克里满河了。作为克勒青河左岸最后一条支流，克里满河也是唯一一条自西向东，从帕米尔高原方向而来，注入克勒青河的支流。这也使得克里满河能够最大限度接近塔格敦巴什河源头，并与之相连打通一条连接蒲犁——乌秣的道路。

### 第三节 中巴两国在克勒青河谷的分界线

在中、巴的地缘关系中，克里满河也承担着特殊的作用。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尽管中巴边境大体是沿着喀喇昆仑山分水岭而议定的，但在克勒青河下游有一段边境线（不包括塔吐鲁沟这段），连同西侧一条直线相连的支流，却是以河流中间线来划分国界的。也就是说，巴基斯坦方向实际上并非完全放弃他们在喀喇昆仑山分水线以北的利益。而中国方面也并非完全取得整个叶尔羌河流域。

鉴于中、巴之间长期稳定的地缘关系，以及中国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损失部分克勒青河谷地区，并不会对中国的地缘安全造成实际损失。不过相信大家都会对此有所疑惑：为什么在中、巴结成战略联盟，携手对抗印度的大背景下，会达成如此奇特的平衡线？

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类似“飞地”性质的行政区，大都和“人”的因素有关。因为各种原因，一国在理论上的地缘分割线另一侧，已经定居了部分人口才会造成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国收回部分黑瞎子岛主权这件事上就曾经发生过。鉴于俄国人已经在黑瞎子岛的东部移居了上万人口，本着中、俄友好原则进行的边境谈判，就很难去惊动这些居民了。好在岛的西部地势比较低，并没有成为聚落区，中俄双方方才能够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也都留了面子）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巴基斯坦方面之所以能够保留部分克勒青河谷的原因，也是如此。在红色中国站上这片土地之前，那些居住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就已经透过某条通道，



自然渗透到了克勒青河谷了。

基于我们之前的分析，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是不是巴尔蒂斯坦的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藏人，曾经通过诸如“木斯塔山口”这样的通道，移居于此了？然而这片被划给巴基斯坦的克勒青河谷，却并非在巴尔蒂斯坦相对应的位置上。如果中国方面认可的在克勒青河谷存在的是巴尔蒂斯坦人的话，那么克勒青河当中承担边境线职责的河道，就应该向东位移了。以今天这块准“飞地”所处的位置来看，真正居住于此的并不会是黄皮肤的巴尔蒂斯坦人，而是一些高加索人种的部族。这些定居者来自于一个我们即将推进到的板块——罕萨（坎巨提）。



汉西域全图

当我们顺着印度河谷而下，走出巴尔蒂斯坦后，即将面对的下一个板块就是勃律人曾经迁居过的小勃律地区——吉尔吉特。而在吉尔吉特的北部，关系到中巴公路走向的喀喇昆仑山地区就是罕萨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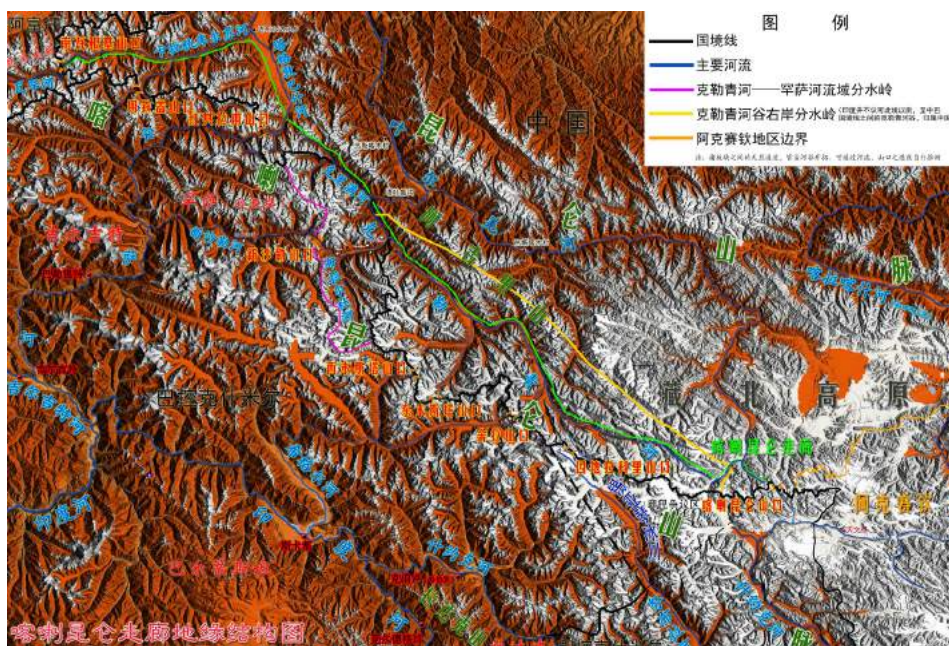
为包括克什米尔地区在内的这片复杂山地寻找一条主线推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诸板块之间并非是串连在一起的，大家相互之间也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地缘关系。当我们顺着一条线持续推进时，很容易就会发现必须从另一条线同时推进，才有可能真正搞清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已经顺着克勒青河谷向西延伸到另一个我们还未解读到的克什米尔亚板块附近时，就有必要先回到印度河谷这条主线上来。最终在厘清吉尔吉特——罕萨板块的地缘结构后，再与包括克勒青河谷、红其拉甫山口在内的孔道相接。



## 第四节 喀喇昆仑走廊的位置和价值

身处克什米尔这片世界上地缘关系最复杂的山地，大家被转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有迷路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鉴于它在现实世界中，仍然具有挑动着 28 亿人神经的潜在能力，再多花点时间了解克什米尔及其周边板块的前世今生，是非常有必要的。

按照我们刚才制定的推进路线，现在应该继续向西走出巴尔蒂斯坦了。然而事实上，巴尔蒂斯坦的地缘结构，及其与拉达克的地缘关系，还没有完全解读清楚。在什约克河谷将我们引入喀喇昆仑山北部地区之时，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个能够搅动印、巴关系的解读方向——欣库河。既然我们准备几条线并行，向西平推覆盖克什米尔及其相关板块，那么先把印、巴在克什米尔南部地缘博弈的平衡问题先行交待一下，就很有必要了（这个问题也同样牵扯到丝绸之路走向的问题）。



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

从大的地理范围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位置是在阿克赛钦与瓦罕走廊之间。这条河谷通道与纵穿喀喇昆仑山脉的诸多山口一起，造就了“喀喇昆仑走廊”沟通塔里木盆地——克什米尔的枢纽地位。

事实上，仅仅连接塔里木盆地和克什米尔高原这两个板块，并不足以凸显喀喇昆仑走廊的作用。以更高层面来看，能够让塔里木盆地、克什米尔价值得到体现的，是东亚与南亚这两个人口巨大、经济发达的贸易终端。也就是说，它们各自能够与这两个终端对接，并与之交易、转运商品，才是人类不畏艰险，穿越喀喇昆仑走廊的根本原因所在。

研究中国与克什米尔的关系，经常会遇到“喀喇昆仑走廊”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范围界定，往往又会受到今天的政治分割影响。如果从纯粹地缘角度来看，所谓喀喇昆仑走廊所指向往的，就是“一系列位于喀喇昆仑山脉北麓，并与之平行的河谷所组成的通道”。从大的地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克勒青河谷

借由追寻张骞的足迹,西域与东亚核心区之间的沟通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大半。包括丝绸之路是主要通过什么样的路径,通过西亚、欧洲的问题,也有了足够文字解读。只是这些被视作丝绸之路主线的路径,并非欧亚大陆贸易交通网的全部。克什米尔和印度在这个交通网中,同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 第十八章 查谟 - 克什米尔沟通拉达克的通道

### 第一节 拉达克经欣库河谷至克什米尔盆地

在我们向巴控克什米尔纵深渗透之前，我们需要暂时中止这个进程，去纵向了解一下克什米尔地区东部，也就是印控克什米尔是否存在一条贯穿南北的路线，将喀喇昆仑走廊与印度连接起来。从板块沟通的角度来说，就是拉达克板块是否有直线向南，不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通道问题。

很显然，这条通道是一定存在的。只要有需要，再复杂的地理环境都会被人类所征服。对于拉达克人来说，他们如果想向南发展的话，最大的地理障碍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了。整个拉达克版块在地理上可以被定位为，喜马拉雅山脉与喀喇昆仑山脉之间的区域。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拉达克人是如何穿越喀喇昆仑山的问题。现在，是时候把它和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连接起来了。

就翻越山脉这件事来说，从它的两端绕行往往是最为常见的方案。尽管这样做常常会绕远，但相比把命丢在那些冰川里，这些多花费的时间和人力还是值得的。从喜马拉雅山与拉达克地区的地理关系来看，拉达克人是极有可能绕到喜马拉雅山西端，从今天的印巴停火线一带向南打通这条交通线。

当我们把视线锁定在喜马拉雅山西端，印度河谷以南地区时，一条叫作“欣库河”的河流，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这条河流在巴尔蒂斯坦的解读中也曾经出现过，它也是巴尔蒂斯坦六大亚板块中“古尔德里”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拉达克人如果想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时，就必须看巴尔蒂斯坦人的脸色呢？情况并非如此。

欣库河流域的河谷分布结构，是一个标准的伞状结构。巴尔蒂斯坦的古尔德里地区，只是包含了流域西部地区。为古尔德里板块形成作出贡献的有两条河流，一条就是南侧的欣库河，另一条就是其北侧，在印巴停火线附近与之合流的“希格尔河”。

曾经有朋友问过，巴尔蒂斯坦在印度河右岸不是有了一条希格尔河和希格尔地区吗？南边这条是不是在图上标错了？其实一个地理标签被反复使用情况，我们应该已经见怪不怪了。以示区别的话，古尔德里地区的主要河流，可以被称之为“欣库——希格尔河”。

欣库河在接收了希格尔之水之后，很快便转而向北汇入了印度河（拉楚河段）。从技术上看，巴基斯坦方向既然已经得到了巴尔蒂斯坦，那么整个“欣库——希格尔河”流域，就应该尽数属于这个穆斯林藏族集团了。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今天的印巴停火线，正好切割了欣库河下游河谷。也就是说，如果巴尔蒂斯坦人想从欣库河口溯流而上的话，就必须穿越印度控制区。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巴尔蒂斯坦的古尔德里，没有控制欣库河流域的全部。尽管巴尔蒂斯坦人应该也很想获得整个欣库河流域。但那些还没有伊斯兰化的拉达克人，也需要流域东部那几条南北向河流，帮助他们进入到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

在拉达克人南下的过程中，有两条隶属欣库河流域叫做：德拉斯河、苏鲁河的河流，发挥了重要的通道和聚落人口的作用。拉达克人并不用真正沿印度河走到欣库河口再转而向南。他们会从列城出发，紧贴着喜马拉雅山西北麓，分段式借那些印度河左岸支流向西前行，并最终全程借助德拉斯河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的核心板块——克什米尔河谷（盆地）。

这条连接拉达克——克什米尔盆地，流域上隶属于欣库河流域；行政上归属印度的河谷地带，我们可以称之为“卡基尔走廊”。之所以这样命名，很大原因是因为欣库河流域东部地区，今天已经从拉达克中分割出来，独立成为了“卡基尔县”（也译“卡吉尔”，以列城为中心的拉达克地区，则被建制为了“列城县”）。至于说卡基尔走廊的地缘结构究竟如何？它在印巴冲突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印度为什么要对拉达克地区做行政分割？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 第二节 克什米尔盆地的地缘潜力

既然我们提出了一个带有“走廊”字样的新地缘标签，那么就很有必要先看看这条走廊的另一端究竟通往何方。很多朋友表示，克什米尔的地形实在太复杂了。在如果复杂的山地中，循着那些河谷前行实在是一件很累眼的事（为此在选择底图上，也费了不少脑筋）。不过很快大家的眼睛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在克什米尔高原上看到一大片低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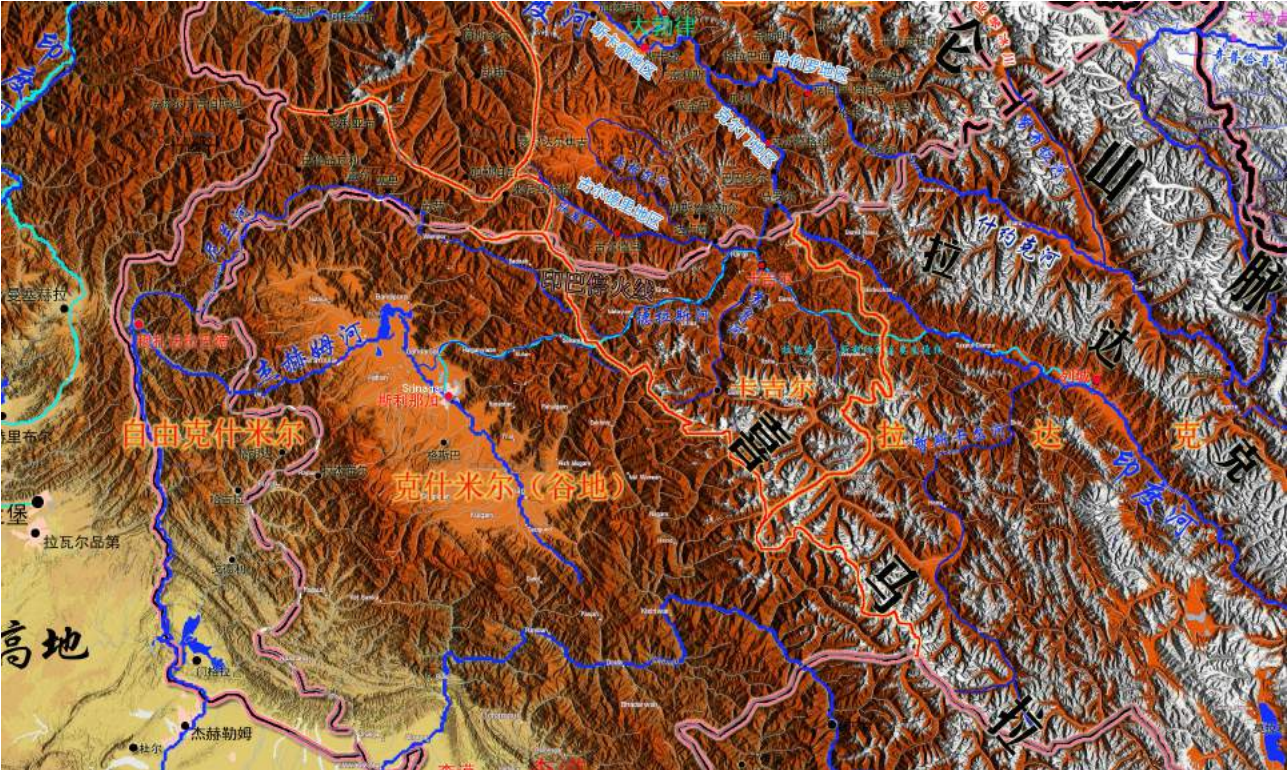
这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相对低地，一般被称之为“克什米尔谷地”，不过“谷地”的称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线性结构。事实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低地，宽高比完全符合一个标准盆地的要求。所以，将之命名为“克什米尔盆地”会更为合适。

很多地缘标签，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自己的范围。比如“中央之国”或者华夏这个标签，在不同时间就涵盖了不同范围。克什米尔这个标签也是一样，它最初所指向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解读的“克什米尔盆地”。理解这点并不困难，因为总是那些更有地缘潜力的板块，有机会将自己专属的标签扩大到周边地区。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称之为是核心区向边缘区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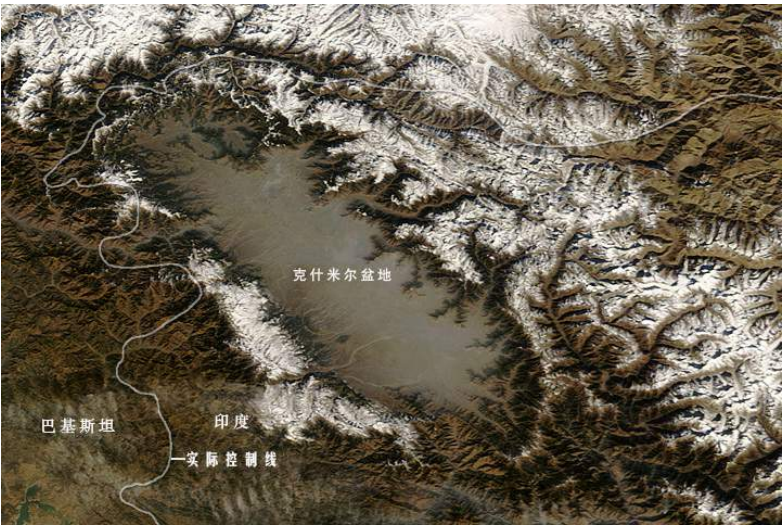
相比北部那些干旱、逼仄的高山河谷。克什米尔盆地的地理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不到 2000 米的海拔，能够使之免受高寒之苦；面向印度洋的地势，又能够为之带来充沛的雨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腹地宽广的山间盆地。印度河上游河流之一的“杰赫姆河”在汇入五河平原之前，先为这片山间盆地淤平了腹地，铺设了天然水网（所



以也可称之为“杰赫姆河上游盆地”）。这种情况，和费尔干纳盆地之于锡尔河流域的情况非常类似。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克什米尔盆地的海拔要略高些。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克什米尔盆地卫星图

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位于山间，风景秀美、气候凉爽、雨量充沛的城市，喜欢将自己比作某地的“瑞士”（最重要的是，还要有常年积雪的雪山）。比如黎巴嫩就是被称之为“中东瑞士”。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克什米尔盆地中心城市——斯利那加也都具备，也因此被旅游者称之为“南亚小瑞士”。当然，也有人想把它上升为“东方瑞士”的，不过中国人民肯定不会答应的。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克什米尔盆地和斯利那加很自然的也就成了克什米尔高原的中心板块了。

人口是衡量一个地区潜力的重要指标。从“斯利那加”的人口数量来看，我们也能意识到它比较周边板块到底有多大优势。这座面积不过 105 平方公里的城市，



目前的所居住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百万。要知道，面积远大于克什米尔盆地的拉克达与巴尔蒂斯坦，人口加起来也没有突破百万。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斯利纳加在印控克什米尔举足轻重的位置，印度驻扎在克什米尔地区的 40 万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囤积于这座城市。如果大家哪天看到新闻中印控克什米尔出现暴乱了，多半就是发生在这座城市中（如果没见到，也并不是太平了。因为冲突太多，曾经有西方媒体内部规定：克什米尔死伤 10 人以上才能做一条短新闻）。



斯利纳加市

如果不是克什米尔高原中有这么一片得天独厚的盆地，相信那些生活在南部平原的印度教徒们，也不会对征服这片山地抱有太大兴趣。也就是说，如果说有谁对克什米尔高原感兴趣的话，多半都是为了斯利那加和它所属的这个盆地而去了。

在汉帝国的使者终于可以踏上南亚的土地时，统治克什米尔盆地这片土地的国家，是由塞人所建立的“罽宾”（都城“循鲜”的位置，就在斯利那加）。这些塞人到底是怎么来的，想来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匈奴人在河西走廊推倒的那张多米诺骨牌，其连锁反应一直延续于此。当然，塞人并不是第一个出现在此的源自欧洲的部族。在此之前，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人，应该就已经驻足于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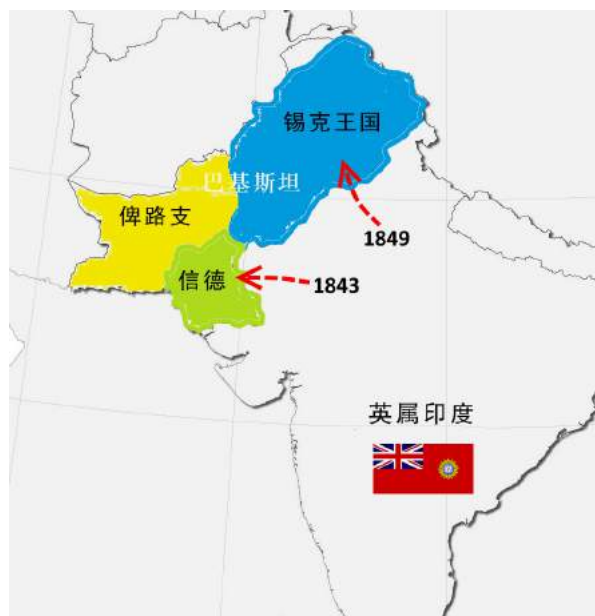
马其顿人应该算是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征服克什米尔盆地的外来力量。只不过，

事隔两千多年，除了在克什米尔的山地中，有些部族还愿意自称为亚历山大后裔以抬高身价以外，马其顿人对这片土地的地缘影响力，已经完全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了。真正造就克什米尔盆地，以及整个克什米尔高原现状的力量，是 19 世纪中叶来自于欧洲另一端的英国人，以及狐假虎威借势扩张的印度人。由二者所共同引发的这次渗透活动，甚至动摇了克什米尔盆地在整片高原的地缘中心位置。这一点体现在这个板块的标签上，就是“克什米尔”之名的前面，被加上了“查谟”的前缀（查谟——克什米尔）。

### 第三节 查谟从英国获得克什米尔统治权

从方位上看，查谟是位于克什米尔盆地正南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片山前平原。而从流域上看，查谟平原并不是杰赫姆流域的一部分。它的地理归属是另一条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坡，从克什米尔盆地东南部擦肩而过的河流——杰纳布河的山前冲积扇。

之所以现在会有“查谟——克什米尔”这个地缘标签，是因为在 19 世纪中叶，查谟地区的统治者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克什米尔盆地的所有权，并最终代表印度人登上了这片山地。关于英国人为什么会把克什米尔“让”给查谟，细说起来将会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这其中牵扯到的，更多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博弈。简单点说，就是当时上印度河平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旁遮普、五河地区，出现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强大政权——锡克王国。中国人对于印度的印象，很大程度都是源于留大胡子、包红色头巾的锡克人（所谓“红头阿三”就是源于此）。



锡克王国示意图

在英国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最难应付的就是这些身材高大、纪律严明的锡克人了，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在征服瓦解锡克王国之后，也转而征召这些锡克人前往其他殖民地做警察（就像他们征召廓尔喀雇佣兵一样）。而在征服锡克王国的过程中，位于锡克王国东北部的查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交换，查谟大公得到了克什米尔的统治权（在此之前，查谟已经被锡克王国征服）。

从地缘结构来看，所谓的“查谟平原”就是旁遮普平原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得到外力支持的查谟人应该顺势南下，从锡克人手中接手整个上印度河平原的。问



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样做显然是不明智的。很明显，英国人之所以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征服锡克王国，就是为了得到这片曾经让亚历山大垂涎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用自己的忠诚交换自己北部那片在英国人看来难以管理的山地，更能获得双赢的局面。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英军与锡克王国交战

与边缘区的基本定义来说，这些山地天然属于查谟平原的边缘区。

然而当查谟人将控制线推进到克什米尔盆地时，他们所面临的局面就算得异常复杂了。因为在伊斯兰教的强势渗透之下，此时的克什米尔盆地已经是穆斯林的天

对于在海上称霸的英国人来说，直接统治那些远离海岸线的山地无疑是一场灾难（不是说打不赢，而是打赢后站不住）。这一点，英国人在阿富汗、尼泊尔都有过惨痛的教训。所以将这些山地交给自己的代理人建立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进行间接控制，会更为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查谟的主人也成为了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的统治者（说句题外话，英格兰人花上千年时间，连自己本岛北部那片苏格兰高地都还没搞掂）。

在从英国人手中得到克什米尔盆地之前，查谟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征服了克什米尔盆地以南，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几个山地小国。将这些山地丘陵区纳入查谟领土并不算太困难。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山地小国与查谟人都是同族的印度教部落所组建的。从地缘角度来看，它们与查谟平原也都同属于杰纳布河流域。按照核心区

下了。不过，这种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动荡。因为面临过无数征服的南亚次大陆，早已习惯了人种相杂、宗教各异的格局。被谁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试图用强硬的方式改变对方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就这一点来说，包括印度教、佛教在内的那些诞生于印度的宗教都算得上是很包容了。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宽容的态度，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生存之道。

此时的查谟王国，实际上所面临的是一个二元结构。南部是以查谟平原为核心的杰纳布河流域地区；北部则是以杰赫姆河上游河谷为核心的克什米尔地区。为了将这两个地理相邻，却又地缘切割明显的板块捏合为一个国家。查谟人甚至采取了双中心的模式，即将原来查谟的都城——查谟定位为“冬都”；而小瑞士的斯利纳加自然就是查谟王族用来避暑的好去处了（夏都）。

以克什米尔盆地的地缘条件来说，它所养育的穆斯林数量，甚至还要超过查谟地区（包括那些印度教徒覆盖的山地丘陵）。加上高地对低地的天然地缘优势，新组建的“查谟——克什米尔邦”的内部结构注定是不会稳定的。一旦那些生活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有了外部的强力支援，那些来自低地的印度教徒就很难持续他们的统治了。

克什米尔人得到外力支援的时间并不算太晚。因为在他们被“卖”给查谟人一百年之后，那个卖主又迫于形势的变化，将原来的“英属印度”一分为二，隔离成了印度教的“印度”和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而身处两大板块相接之地，又身世复杂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也就注定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克什米尔盆地的穆斯林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应该和近在咫尺的巴基斯坦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印度人也自认为在法律层面上，更应该通过查谟人得到整个克什米尔地区（身为印度教徒的查谟大公，自然表态加入印度了）。

在这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博弈中，最让人感觉到无辜的就是拉达克的佛教徒了。因为无论是从地理结构还是地缘归属来看，它的政治归属都更应该与西藏捆绑在一起。不过这也就是边缘地区的命运了，与其说这种行政归属与地缘归属上的错位是地缘博弈的结果，倒不如说它本身就是地缘博弈的过程。世界也正是在这种动荡中，保持动态平衡的。至于拉达克人是怎么被划到克什米尔的问题，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而这也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卡基尔走廊”有着密切联系。

#### 第四节 查谟征服拉达克的进军路线

克什米尔地区之所以被伊斯兰教所覆盖，直接原因是因为印度最后的王朝——莫卧尔王朝，就是一个穆斯林建立的王朝。这个源自于中亚入侵者建立的王朝，虽然并没有去强力改变印度原有的宗教信仰。但受此影响，处于南亚与中亚交接处的印度河流域（包括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河平原）伊斯兰化也就不让人奇怪了。这种



渗透并非一定伴随着武力，事实上，在伊斯兰教扩张当中，那些血液里流淌着游牧基因，已经习惯用贸易来替代游牧生活获取更大利益的商人，起到了核心作用。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居无定所的行商方式，看做是游牧生活的延续（按照中国古代的分类，这种行商才是真正的“商”；坐地售货的是“贾”，合称商贾）。

既然克什米尔地区本身与印度存在密切的地缘关系，最后一个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王国又是隶属印度政治体系的“锡克王国”，那么不管中间有没有英国人介入，今天印度或者巴基斯坦，想从法理上接手以克什米尔盆地为核心的这片山地，在地缘和法理上来说，问题都不大。比较让人奇怪的是拉达克，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缘关系看，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都应该还没有把它整合进克什米尔或者印度这个概念中。

以克什米尔是英国作为利益交换卖给查谟人的（查谟人当时花了750万卢比）事情来看，拉达克地区很有可能是英国人先行征服，然后再一并出售给查谟人的。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也有动机向喜马拉雅山北麓渗透。通过《红河谷》这样的影视作品，相信很多朋友也对英国渗透西藏的历史有所了解。而当英国人决定把穆斯林覆盖的克什米尔高原，交给查谟人打理后，也就没有理由不把被克什米尔地区所分隔的拉达克，一并移交给新的“查谟——克什米尔”了。

按照上述推论来看，今天的印度人得到拉达克，完全是在捡便宜了。然而事实上，拉达克并不是英国人作为添头一并便宜印度人的，而是查谟人直接征服的。代表印度板块的查谟人，征服拉达克的时间甚至要早于从英国人手中获得克什米尔盆地的时间。以今天“查谟——克什米尔”的地理结构来看，身处上印度河平原边缘的查谟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似乎很难理解。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克什米尔盆地作为基地逐次传递控制力的话，查谟人想控制喜马拉雅山西北部的拉达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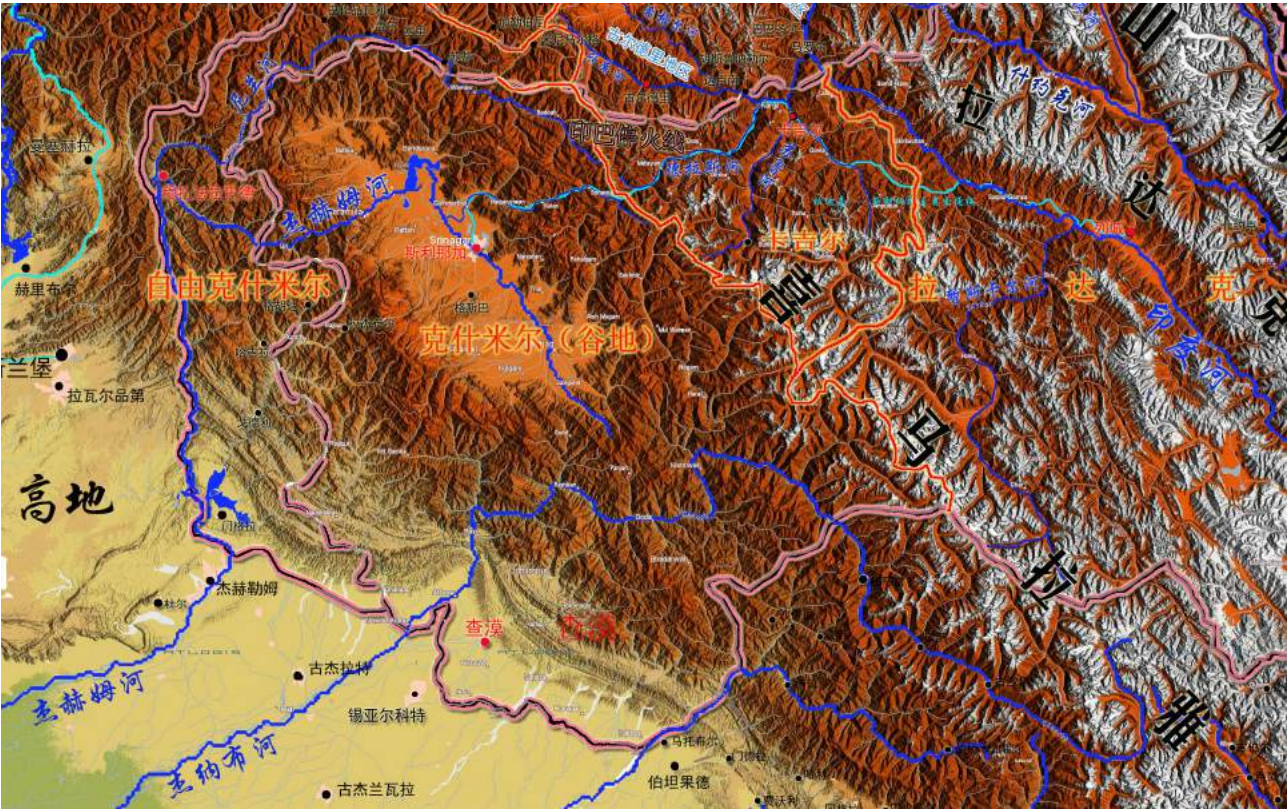
就长期控制来说也的确如此，所以当年的查谟人才会向英国人购买克什米尔盆地；而印度人在与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时，也才会紧紧抓住克什米尔盆地不放。然而就一次征服来说，只要有合适的路线，并不是说一定要逐次征服前进道路上的所有板块的。这一思路，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也曾经使用过。当他们按照正常顺序以澳大利亚为起点，一个个攻取日本所控制的那些太平洋岛屿时。让人难以承受的伤亡损失，终于逼迫他们改变思路，发明了“越岛战术”，绕过这些岛链直接攻击日本本土。

从战术角度看，美国人在控制海权的前提下，绕过外围直接攻击核心区的战术是非常正确的（前提是一定要有绝对的海上优势，否则会被抄后路的）。当日本本土陷入战火时，那些在太平洋岛屿上修筑强大防御体系的日本陆军，所面临的命运就只能是饿死了。

如果克什米尔盆地是被查谟人的对手所控制，那么无论他们通过何种路径绕到

拉达克，都是不明智的。只是此时的查漠人，正是英国人和锡克人所共同争取的目标。所以无论克什米尔盆地是处于锡克人还是英国人控制之下，都并不会从侧后方去威胁查漠人的这次远征。当然，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看，在没有搞掂克什米尔盆地的情况下，就试图吞并拉达克都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横亘在查漠与拉达克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二者之间难以逾越的融合障碍。

拉达克人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身处印度河平原的查漠人会攻击到拉楚河谷。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可循。以古典时期的地缘关系来说，你能想象一个热带地区的低地民族，冒险越过喜马拉雅山去攻击一个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部族吗？不过不要忘了，此时代表印度人的查漠人因为有英国人的支持，已经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在火器上的优势，足以抵消那<sup>1</sup>些山地民族的天然防御优势。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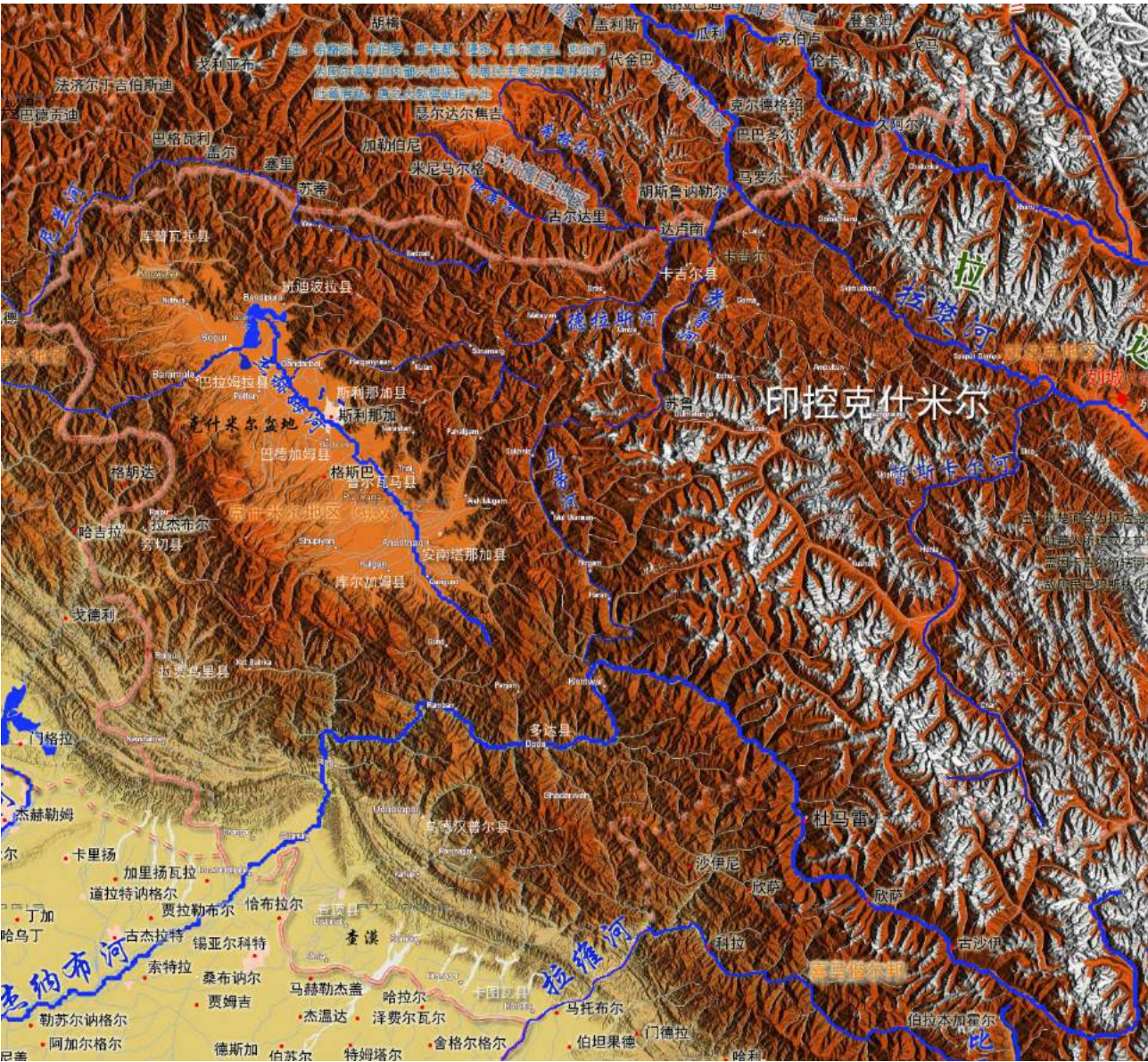
拉达克人将这次入侵称之为“森巴人入侵”，基于拉达克人的反抗，从 1834 年开始直到 1942 年，查漠人共对拉达克进行了四次军事行动，才算彻底使之臣服（在并入“查漠——克什米尔”的同时，拉达克王室也被名义上保留了）。事实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推断，如果不是 1840 年，英国人把克什米尔盆地移交给查漠人，他们实际上无法做到真正控制拉达克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搞清这些查

1 森巴是藏语对居住在印度北部查漠地区的多格拉人的称呼。



漠人或者说“森巴人”最初是怎么做到的（由于查漠大公所属的部族是“多格拉族”，这支军队也被称之为“多格拉人”）。

仅从地形角度看，在没有克什米尔盆地作为基地，喜马拉雅山脉又难以穿越的情况下，最为可行的方案应该是从查漠平原向东北方向前进，沿着克什米尔盆地东部边缘，西北方向绕至其北部，然后再东北方向挺至拉楚河谷的列城。更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条从查漠——克什米尔的 S 形路线，是一个从喜马拉雅山脉主脉西侧绕行的方案。



汉西域全图

能够支撑这条 S 形行军路线的方案，一定是天然河谷。只不过由于要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分水线，你不能指望完全由一条贯通的河谷来承担这个任务。为查漠人上溯到分水点的这条河流，是他们最为熟悉的母亲河“杰纳布河”。不过我们在那两



张关于克什米尔的地图上顺着杰纳布河上溯路线的话，就会走进死胡同了。因为通常情况下，一条河流的源头总是在整个流域海拔最高的地方。当然，如果无视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难度，驻足于杰纳布河源头的我们会在地图上发现，在山的背面，拉楚河左岸的主要支流“暂斯卡尔河”正在等着我们。这条河流的尽头，就是拉达克的地缘核心——列城。

真正在为查漠——拉达克板块打通地缘沟通之路的，是一条从克什米尔盆地东侧，由北向南注入杰纳布河的河流——马劳河（Marau River）。由东南——西北方向，沿喜马拉雅山脉平行线西流的杰纳布河，在接纳马劳河之后开始转向，流入查漠平原。

马劳河可以帮助查漠人运动到克什米尔盆地的东北部，也就是喜马拉雅山主脉的西端。接下来如果他们再想向北渗透的话，这些来自印度平原的雅利安后裔，将会在山谷中遇到一些看起来有些奇怪的部落。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看起来明显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然而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又大多数隶属于伊斯兰教体系。这种奇怪的地缘混合现象，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伊斯兰化的拉达克”——巴尔蒂斯坦人。那么，这些人是巴尔蒂斯坦人吗？

马劳河对接的这个板块，从流域上看的确与巴尔蒂斯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离开马劳河源头之后的查漠人，所能寻路前往拉楚河的河流共有两条，分别为：德拉斯河和苏鲁河。查漠人正是顺着其中的苏鲁河穿插到拉楚河谷，出现在拉达克人面前的。

德拉斯河和苏鲁河这两条河流，与其西侧另外两条曾经在我们文字中出现过的河流：欣库河、希格尔河（注意，不是印度河北岸“希格尔地区”那条希格尔河）属于同一流域。在解读巴尔蒂斯坦的地缘结构时，位于印度河的左岸希格尔——欣库河谷，曾经我们被标定为了巴尔蒂斯坦内部六大亚板块中的“古尔德里”。一般认定欣库河为这个扇形流域中的干流，所以我们可以将整个流域称之为“欣库河流域”。从这个角度看，德拉斯——苏鲁河谷所在的地区，应该很有可能是巴尔蒂斯坦的一部分了。

然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印巴停火线”从欣库河流域中穿插而过，将德拉斯河及其以东地区划分给了印度的拉达克地区。这条停火线甚至切割了数流合一后的欣库河下游河道，以至于无论哪一方，要想完全沿着一条连通的河谷，通往拉楚河的话，都必须经由对方的控制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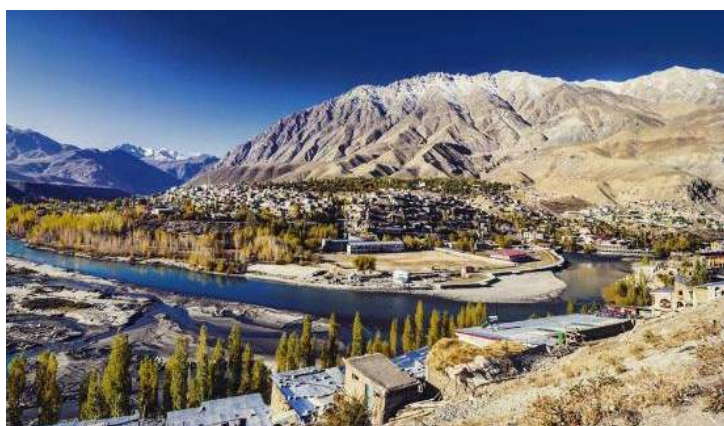
这片被拉达克人控制的“半个欣库河流域”，在今天印度的行政图上被从拉达克当中分割出来，单独建制为了“卡吉尔县”（也译“卡基尔”）。而以拉楚河谷这中心的拉达克核心区，则成为了“列城县”。当然就历史归属来看，无论卡吉尔还是列城都是拉达克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卡吉尔更应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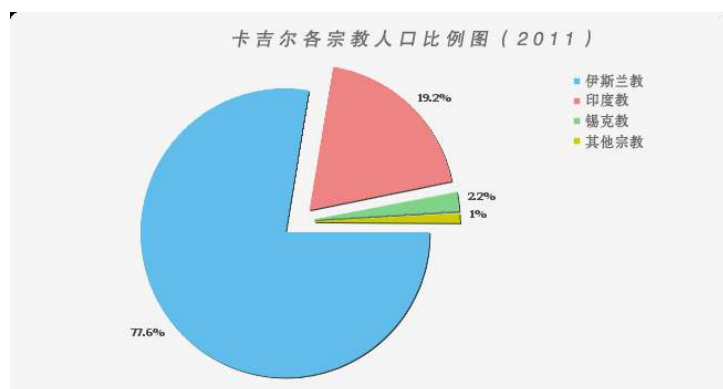
## 第五节 卡吉尔因伊斯兰化成为独立板块

卡吉尔地区被从拉达克板块分离出来，并非源于印度人的行政分割。恰恰相反，印度人之所以觉得有必要为卡吉尔地区设县，是因为这个板块已经显示出了地缘独立性。上一节我们也说了，这个板块呈现出与巴尔蒂斯坦相似的地缘特征。即人种以藏族后裔为主，而宗教则已经基本转化为伊斯兰信仰了。

鉴于与之相邻的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盆地，都已经为穆斯林所覆盖，卡吉尔出现这样的变化实属正常。事实上，生活在卡吉尔谷地中的部族、宗教结构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些。由于处在两大种族、宗教的交合之处，这些各自独立的部落，在宗教信仰上也呈现出混合性和独特性。简单点说，卡吉尔的情况有点类似于黎巴嫩，有许多种族混杂居住，并且和平共处。除了从拉楚河谷迁移而来的藏人以外，还有从巴控克什米尔、克什米尔盆地，以及印度河平原渗透而来的高加索人种属性的部落。这些在山谷中择地而居的部落，又各自有着独特的宗教仪式和文化。



卡吉尔市



卡吉尔各宗教人口比例图

对于拉达克人来说，卡吉尔地区可以算得上是殖民地。今天生活在卡吉尔地区的人口，已经和拉达克本部的人口基本持平了。由于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属性已经伊斯兰化了，所以无论印度有没有用行政方式将之分离出来，卡吉尔都应该被视作一个单独板块了。很明显，这样一个已经伊斯兰化的板块，会被巴尔蒂斯坦人以及巴控克什米尔内其他穆斯林视为天然领地。事实上，卡吉尔地区也一直是克什米尔游击队（巴控）的重点渗透目标。然而，这些穆斯林武装试图控制卡吉尔地区的理由，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块伊斯兰之地。

我们在前面的内容中，曾经给卡吉尔这个标签加了一个“走廊”的后缀。在厘清查漠人进攻

拉达克的路线之后。这条走廊对于连接拉达克与克什米尔盆地的作用，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只不过，在历史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并非是查漠人出奇兵攻击拉达克



的苏鲁河——马劳河通道。对古典时期的商旅和今天的印度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经由德拉斯河谷作为穿透卡吉尔地区的通道。因为这条河谷可以帮助他们对接入富庶的克什米尔盆地。同样的，巴尔蒂斯坦人也可以选择借由德拉斯河谷，进入拉达克或者克什米尔盆地。

基于卡吉尔走廊内的几条河谷通道，能够帮助拉达克人通往克什米尔盆地以及印度河平原，拉达克人和印度人不想失去它就可以理解了。而对于那些来自巴基斯坦军队和那些圣战者来说，即使他们认为战略上已经很难改变卡吉尔地区的政治归属，但不断袭扰这一地区，尤其是控制克什米尔盆地通往拉达克地区要道的“德拉斯河谷”，在战术上无疑能够影响印度对印控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控制力。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卡吉尔地区第一次引起世界关注，是在 1999 年 5 月——7 月。由于巴基斯坦军队和游击队的强势渗透。印巴双方在德拉斯河谷（新闻中译为“达拉斯”）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一冲突甚至被一些军事专家升级为“第四次印巴战争”（卡吉尔冲突）。

实际上，就这次战争来说，巴基斯坦方面的战术目的应该并不在夺取卡吉尔地区的控制权，因为除非印度人想失去拉达克。否则即使付出再大代价，也一定会从巴基斯坦渗透者手中，夺回了那些俯视德拉斯河谷的高地的。巴基斯坦之所以要冒着挑战印巴停火线合法性的风险渗透卡吉尔地区，主要还是为了支援巴方在锡亚琴冰川的军事行动（同一时期，巴方也在锡亚琴冰川展开了军事行动）。对于这条国



际公认的尚未停火的冰川，巴基斯坦方面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在尘埃落定之前，改变目前印度占优的局面。

在没有对克什米尔地区作出详细解读之前，相信中、印、印巴各方，在实际控制线附近的那些军事行动，在大家的脑海中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用来挑动民族情绪。而如果详细理解了这部分内容的话，相信大家再看到类似新闻中，马上就对那些军事行动的战略、战术价值有清晰的判断了。而这也正是地缘解读的意义之一。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查谟人当年在占领拉达克之后并没有止住脚步，拉达克西侧的巴尔蒂斯坦，以及东则的阿里地区都成为了它的军事目标。最终攻入阿里地区的查谟人，被从卫藏地区而来的西藏地方政府赶了回去。只不过，此时无论是西藏地方政府，还是更高一级的清政府，都无力再为拉达克出头了。看看同一时期，中央之国的东部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查谟人能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得到拉达克了（1840年——1842年，改变帝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爆发）。

拉达克并非唯一被英国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从中国的宗主权中剥离出去，并入克什米尔的地缘板块。很快，另一个与中央之国地缘关系更加紧密的板块：吉尔吉特——罕萨板块，即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 第十九章 巴基斯坦西北山地的地缘特征

### 第一节 巴控克什米尔内部的板块划分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地缘结构，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通常情况下，这一地区被从北至南分为拉达克、克什米尔盆地、查谟三大板块。只是根据现在的地缘结构，我们又把拉达克通往克什米尔盆地之间的“卡吉尔”地区独立出来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时，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存在。

以巴基斯坦今天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划分来说，这一地区是被分割为两块。一块就是印度河干流河谷流域；另一块则是独立汇入上印度河平原，最终与印度河干流在上、下印度河平原交割点汇集的“杰赫姆河流域”（巴控山地部分）。在正式沿印度河谷继续向西推进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后者的情况。因为按照地缘关系来看，如果苦心经营克什米尔盆地的查谟人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他们最应该先行解决的就是这片与之属于同一流域的山地。

巴控克什米尔南部地区所指向的“杰赫姆河”，我们在克什米尔盆地时已经熟悉过了。简单点说，印度得到了杰赫姆河上游最精华的盆地部分（杰赫姆河上游河谷的克什尔盆地）。而杰赫姆河位于克什米尔盆地西、北部山地，包括杰赫姆河上游的另一条主要源头“尼兰河”在内的集水区，则归属了巴基斯坦方面。

按照核心区与边缘区地缘关系来定位，这些同属杰赫姆上游地区的山地，应该是克什米尔盆地的天然附属板块。如果克什米尔盆地是最初的“克什米尔”的话，那么这个标签外延的第一个板块，就应该是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西、北部这片狭长山地了。

从克什米尔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情况也的确如此。当身处斯利那加的查谟大公准备将整个克什米尔高原带入印度时，最先表示反对并武装起来的的就是这片山地的穆斯林。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这些生活在克什米尔盆地西、北部的穆斯林，为自己贴上了“自由克什米尔”的标签。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看出自由克什米尔所指向的地区，也可以算是“真正”的克什米尔地区了。由于在印巴分治之前，这片山地被建制为“蓬奇省”，所以这一地区在很多文献中也被标注为“蓬齐”（现在其中部还有个蓬齐县）。

尽管在印巴分治的过程中，蓬齐地区的意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隶属杰赫姆河流域的这片山地，仅仅占据了整个巴控克什米尔地区 15% 的面积。今天巴基斯坦方面能够得到半个查谟人整合出来的“克什米尔”，还要看蓬齐北部那片占比 85% 的山地的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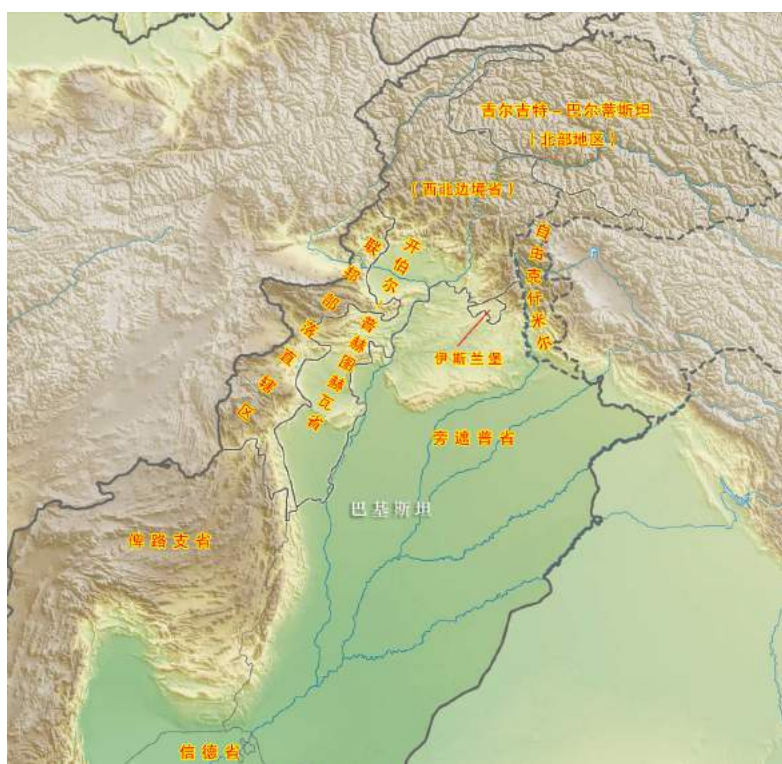
“自由克什米尔”北部这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在巴基斯坦的行政序列中的名



字也非常简单，就叫“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简称“北部地区”）。与自由克什米尔一样，这一地区现在也是属于自治地区。其实无论是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习惯了热带低地生活的他们，在控制这山地部落时都有些力不从心。如果不是有一直虎视眈眈的异教徒——印度人在侧，这些来源复杂的山地穆斯林会更愿意选择独立。

从地理结构上看，“克什米尔北部地区”所对应的印控克什米尔板块就是拉达克了。相比印、巴两国在南克什米尔地区的纠结（印度绝对不想失去克什米尔盆地，而巴基斯坦又认为这是穆斯林之地），北部地区的分割反而相对简单些。如果让拉达克人在印、巴两国之间选的话，他们自然会选择宗教态度更为宽容的印度。当然，这并不代表北部地区就没有争议了。基于沟通拉达克的原因，卡吉尔走廊也同样是印度不能割舍的板块；而如果失去锡亚琴冰川，印度也一样会觉得不安全。

印巴两国在北克什米尔的地缘分割线，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得很清楚了。从宗教角度来说，就是坚持藏传佛教信仰的拉达克藏族人归化了印度；而转而成为穆斯林的巴尔蒂斯坦藏族人，则成为了巴基斯坦人。不过巴尔蒂斯坦并非“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全部。这一板块的正式名称，通常是“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出现这种联合名称，通常意味着这一看似统一的板块内部，应该还是有明确地缘分割线的。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克什米尔”这个标签的出现，也是如此。



巴基斯坦行政区划图

巴尔蒂斯坦与吉尔吉特现在最直观的地缘区别，就是吉尔吉特人是高加索人种的穆斯林。只是由于它处在重要的战略通道上，族群来源比较复杂。与印度河平原上的“印度雅利安人”在语言、文化上有明显的区别罢了。

不过这两个地理相连的板块，被统一为一个地缘板块也并非不可以。最起码一千多年前，“勃律”之名曾经同时出现在这两片土地上。有趣的是，当时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两地的种族结构，和今天很可能是类似的。因为原来居住的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勃律”人之所以要迁居吉尔吉特，变身为“小勃律”，是由于吐蕃人入侵巴尔蒂斯坦，直接控制了勃律故地（大勃律）。如果勃律人是欧洲移民后代，而吐

蕃人又殖民巴尔蒂斯坦的话，现在这种黄、白分割的地缘结构，在当时可能就初步形成了。

虽然吐蕃人代表黄种人向克什米尔地区渗透的时间，是在中央之国的唐帝国时期，但这并不代表在此之前克什米尔的土地上，就一定是欧洲移民的天下了。按我们之前的分析，那些羌系部落很有可能已经打通了经由克什米尔地区的帕米尔——青藏高原通道。

那些历史民族的人种问题，并不是我们必须搞清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每一个板块的地理结构，以及所处的地缘位置。从这点上来看，与中央之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并非是今天中印边境纠结的那些板块，而是处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接下来我们就将把视线聚集于此，看看吉尔吉特是怎么在历史上充当中、印，今天充当中、巴连接纽带的。

## 第二节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族群结构

沿印度河谷向西走出巴尔蒂斯坦之后，印度河谷将迎来一个 90 度的大转折，开始西南方向流入印度河平原的西侧。在正式进入上印度河平原之前，印度河还将穿越一片介于克什米尔山地与平原之间的高地——波特瓦尔高原。对于这个平均海拔 5、600 米的“高原”，我们在解读兴都库什山脉与南亚次大陆的关系时，就已经出现过了。

在历史上，著名的“犍陀罗”文化就是覆盖于这片高地之上的。而它的核心之地，就是被我们命名为“犍陀罗盆地”的白沙瓦所在的盆地。印度河在这个盆地的东侧，将迎来它下山之后汇入的第一条支流——喀布尔河。喀布尔河——印度河所形成的这个 90 度交叉，造就了犍陀罗地区在中亚——南亚交通中的枢纽地位。无论那些来自西、北方向的入侵者是从克什米尔方向还是兴都库什方向而来，都将经过这片高地。当然，更多的时候经过它的是为各方带来利益的商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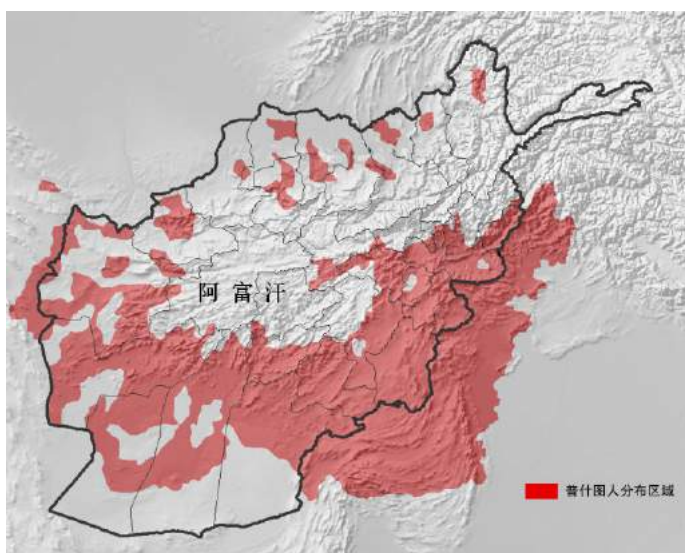
之所以现在要再提犍陀罗地区，除了为那些山地民族理清通往印度河平原的通道以外，更重要的是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克什米尔”寻找西南边界的地缘依据。尽管就地理结构而言，位于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主脉之间的这片山地，都可以被划入“克什米尔高原”的范围内。但观察克什米尔西南部的地理结构，我们还是会发现，自由克什米尔以西至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之间的这片山地，并不在克什米尔范围内。也就是说，无论是生活在“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吉尔吉特人，还是自由克什米尔的蓬齐人，都没有覆盖至此。

在巴基斯坦的行政区划当中，这片行政上处于克什米尔与阿富汗之间的山地，曾经和包括白沙瓦在内的犍陀罗盆地中部地区，打包成立了“西北边境省”。在上印度河平原的旁遮普人有“旁遮普省”；下印度河平原的信德人有“信德省”；俾



路支人有“俾路支省”的情况下，这个完全不带民族特色的行政标签，显得尤为特别。

其实“西北边境省”这个刻意淡化民族归属问题的行政标签，在巴基斯坦的出现并非孤立。在他们的北边，那些隶属“克什米尔”范围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人，也长期顶着一个“北部地区”的帽子，也同样希望把自己的部族之名，上升到省一级的行政区名当中去。幸运的是，经过不断努力，在2010年这两个地区的核心族群都获得了与旁遮普人、信德人一样的待遇。“北部地区”从此被更名为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而“西北边境省”则变身成为了“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也译“开伯尔－普什图省”）。



普什图人分布区示意图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阿国界，将普什图人分割到了两个国家。

关于普什图人与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两国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读过很

所谓“普赫图赫瓦”就是“普什图之地”的意思。很显然，这个新的省名显示出了这一地区与阿富汗之间的地缘关系。事实在英国人带领印度人侵入兴都库什山脉之前，普什图人与印度人在波特瓦尔高原，甚至部分上印度河平原的政治分割线，是以印度河干流为界的。这意味着，包括白沙瓦在内的绝大部分犍陀罗盆地，都曾经是阿富汗的领地。

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纵观历史，以犍陀罗盆地为核心的这片高地，向来都是从中亚方向而来的入侵者入主南亚次大陆的跳板。算起来，普什图人只不过是古典时期最后一个沿此路径通过的中亚民族罢了。只不过，比起之前的那些入侵者，普什图人运气不大好，遇到了那些在技术上能够完全终结游牧优势的欧洲殖民者（英国人）。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英国人在普什图人聚居的“普什图斯坦”中间，以分水岭原则为基础划了一条“杜兰线”，也就是今天的巴、

多了。之所以再次提及，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让查谟人无法控制整个克什米尔高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们如果把犍陀罗盆地和克什米尔高原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就会发现克什米尔盆地在大小、形态、位置上，几乎就是犍陀罗盆地在东部的翻版。如果今天的印度人可以通过占据克什米尔盆地，渗透并控制卡基尔、拉达克地区的话。当年的普什图人在控制犍陀罗盆地之后，将部分北部山地纳入自己的控制区也并不会很困难。



普什图人

现在我们知道，抛开幕后推手英国人不说，在 19 世纪中、后期博弈南亚次大陆西北这片山地的主角，其实是从兴都库什山脉而来，占据犍陀罗盆地的普什图人，以及从印度河平原而来，入主克什米尔盆地的查谟人。很显然，如果没有英国人的帮忙，从低地而来的查谟人、印度人，肯定无法在克什米尔高原获得这么多的领地的。对此，普什图人的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当印、巴分治，自由克什米尔地区的蓬齐人准备脱离印度教徒的控制时，最先给予其帮助并武装进入的，就是

那些其实也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做巴基斯坦人的普什图人(很多资料中,将之称为“帕坦”人)。

从目前的分析来看，这个曾经的“西北边境省”，应该是因为普什图人的控制而没有成为政治意义上的“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了。然而政治控制并不等于地缘意义上覆盖。就像印度人虽然兼并了克什米尔盆地，却无法让克什米尔盆地的地缘属性与恒河平原整合一样。今天普什图人想把整个“西北边境省”变身成为“普什图之地”时，也同样遭到了那些生活在北部山地的土著部族的反对。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地缘版图上，又将有新的标签加入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标签，这个标签与克什米尔高原的其他板块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地缘关系？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三节 达尔德人阻碍普图什人向北渗透

在喀布尔河相对应的方位，一共有三条南北向的河谷，可以帮助普什图人向克什米尔高原延伸控制力。自西向东排列的话，分别是：库纳尔河（巴境内称“奇特拉尔河”）、斯瓦特河，以及喀布尔河汇入的印度河。鉴于普什图人在兴都库什山



脉至印度河之间拥有广阔的腹地，他们在这三河流域的渗透还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对于所有从低地渗透高地的民族来说，都存在一个渐行渐难的问题。即越往高海拔地区渗透，遇到的困难就越大。而面临更为强大的入侵者，土著民族也只能越退越高。

这种现象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地缘规律了。我们在云南那些多民族混居的坝子里，以及台湾岛的民族分布中，都能看到类似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身处克什米尔高原的我们来说，最为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土著民族，阻挡了普什图人全面覆盖上述河谷地区。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随着普什图人的北上之路，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地缘标签——达尔德斯坦，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在那些以学术服务政治的西方探险家来到亚洲中、南部之时，为这些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族群划分领地，是他们所热衷的工作之一。以我们的视角来看，这种工作其实就是地缘意义上的归类行为了（虽然他们未必会用“地缘”这个概念）。

在这些归类当中，源于波斯语的“斯坦”（stan），一词是最为常用的后缀。由此也诞生了普什图斯坦、俾路支斯坦、库尔德斯坦一类的地缘标签。由于这些带“斯坦”二字的地缘板块，大多为穆斯林所覆盖，以至于今天一提到含有“斯坦”二字的国家或地区，大家脑海中所浮现的一定是伊斯兰国家或者地区。其实最初采用这



个后缀的人，并没有将之作为穆斯林之地的意思。在波斯语当中，它的本意是“族群聚集之地”。也就是说，只要是身处波斯文化可能影响到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加以这个标签为后缀。由此，也出现了所谓“印度斯坦”的地缘标签。

在古典时期的国家概念中，共同的族群归属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基础。而在二战之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这一原则也被正式认同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标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现在这些多民族混杂的国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以主体民族为基础，融合或者建立一个更高层级的民族认同；要么就必须时刻防范着，被分裂为一个个独立民族国家。



达尔德人

基于上述原则，那些并没有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俾路支人、库尔德人……都曾经或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斯坦”国家。相比这些尚在努力中的民族，普什图人还算是幸运的。英国人虽然为了英属印度的地缘安全吃掉了半个普什图斯坦，但为了防御俄国人的渗透，同时也帮助普什图人坐实了兴都库什山脉北部地区。虽然这种“置换”让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现在都有些别扭，但在英、俄的共同“努力”下，这两个民族也还都算有以自己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了（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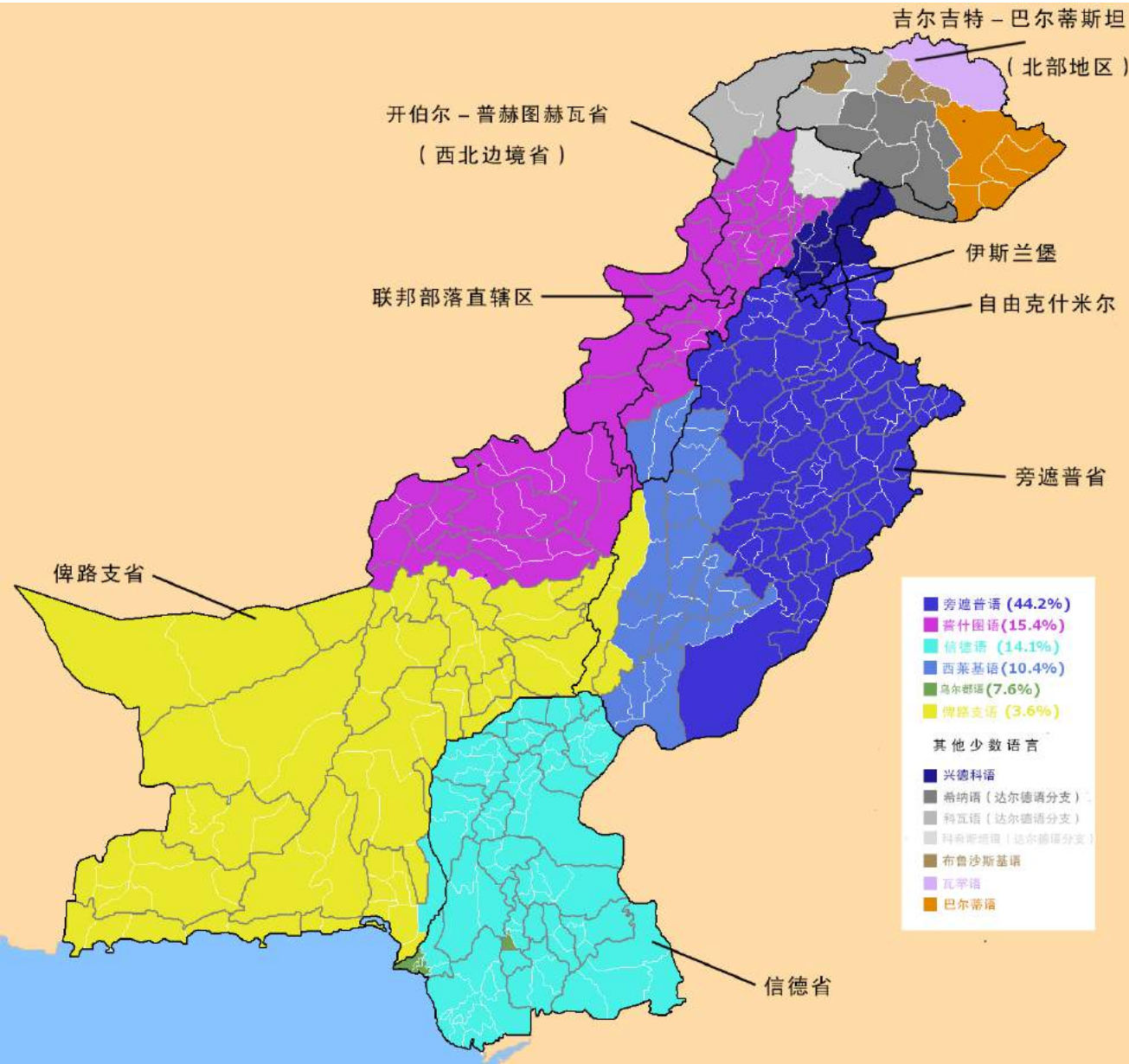
如果把“斯坦”二字，从单纯的族群聚集之地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话，那么所谓的“达尔德斯坦”之名就有些过于学术了。事实上“达尔德”一词，更多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归类。生活在克什米尔山区中被分割于各条河谷之中的部族，在历史和现实中并没有尝试建立一个，统一整个克什米尔高原的民族国家。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所操持的语言可以被归入“达尔德语”。

克什米尔地区那复杂的山地结构，是达尔德人没有成为“斯坦”国家的主要障碍。而身处几大板块沟通的交通线上，也使得达尔德人无法稳定自己的地缘结构。今天从操持达尔德语人的覆盖范围来看，吉尔吉特、克什米尔盆地，以及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奇特拉尔河、斯瓦特河上游河谷地区，都算是达尔德人的保留地。只不过，由于各自处在独立的河谷地区，这些有着共同源头的族群，今天所操持的“达尔德语”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也许有一天，真的会有人提出建立“达尔德斯坦”的主张。但现实的问题是，



这些在语言上还有些许独立性的“达尔德人”，在人种、宗教这两个重要标识上，与普什图人和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雅利安人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在有印度这个强大的“异教徒”国家在侧时，很难想象这些本身就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达尔德人，会不切实际的搞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来。这种情况就像今天的中国，很少会有人认为那些文化上认可华夏，种族上同属黄种人的“少数民族”会有从中央之国分裂出去的风险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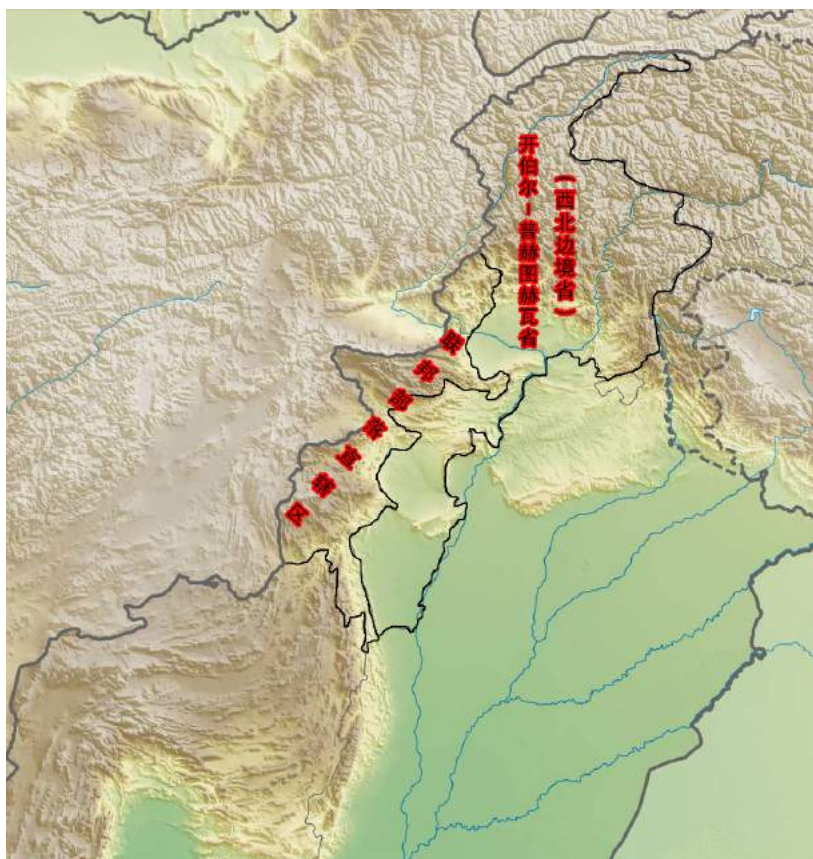


巴基斯坦语言分布图

今天居住在克什米尔盆地的那些“达尔德人”，所操持的语言被细分为“克什米尔语”。从这个角度说，“克什米尔人”的标签，也可以被视为这部分达尔德人的专属标签。至于阻碍普什图人进一步向克什米尔高原渗透的达尔德人，则分别

是生活在斯瓦特河流域上游的科希斯坦人（也译“科伊斯坦”），以及奇特拉尔河（库纳尔河的上游部分）的科瓦人。

由于面向印度洋方向，这些河谷的自然条件比那些划入“巴控克什米尔”的克什米尔高原，气候环境都要更好，人口承载量也要更大。只不过，这些河谷当中适合耕种的土地都已经被普什图人所占据，那些操持达尔德语的科希斯坦人、科瓦人，大多数只能在高海拔的河谷中从事游牧生活了。当然，这并不代表这些山地民族就没有任何话语权了。普什图人之所以直到 2010 年才获得巴基斯坦政府批准，将“西北边境省”之名变更为“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这些山地民族的反对也是一个摆在台面上的原因。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

其实这也是弱小民族的命运了，与普什图人在西北边境省上千万的人口数量相比，科瓦人、科希斯坦人加起来不到 100 万人口的数量所能持有的话语权能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这些普什图人一个名份，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有“阿富汗”这个普什图人为主的邻国存在。基于这个原因，巴基斯坦在设立“西北边境省”之时，就在它与阿富汗之间设立了一个沿边境延伸的“联邦部落直辖区”，以为缓冲。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

由于普什图人的存在，身为克什米尔高原土著的“达尔德人”，其实在巴基斯坦西北山地并没有什么地缘影响力。这一区域也因此没有被代表印度的“查谟人”所渗透。不过随着海拔的进一步升高，另一支达尔德人部族——吉尔吉特人，却开始有机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了。这个板块的地缘结构，以及与周边板块（尤其是中央之国）的地缘关系，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方向了。



## 第二十章 吉尔吉特和罕萨连接西域的通道

### 第一节 吉尔吉特经罕萨河谷进入西域

由于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现在共属于一个行政大区，所以在很多资料中，经常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混淆彼此之间地缘特点。然而经由前面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清楚这两个板块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种族上的差别了。将二者串连在一起的，就是印度河谷。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会有一条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河流。吉尔吉特人也不例外，他们所依附的核心河谷并不是印度河谷，而是一条发源于兴都库什山南坡，东南方向注入印度河的河流——“吉尔吉特河”。从方位来看，吉尔吉特河谷与它所注入的印度河几乎是呈直线对接的。只不过，在方向上是相向而行罢了。

吉尔吉特人所操持的达尔德语，又被细分为了次一级的“希纳语”（shina）。操持这种语言的部族，并非仅仅分布于吉尔吉特河谷地区。印度河在接纳了吉尔吉特河之后，并非马上开始一路向南的征程，而在先偏向东南方向弯了一个反“C”形的弯，再向南注入了犍陀罗盆地。而这段反“C”形的印度河谷及其附属流域，也是希纳语的部族的覆盖区。以流域为参照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找到吉尔吉特地区与南部其他地区之间的地缘分割线。

今天生活在吉尔吉特板块的人口，应该在百万左右（鉴于当地的部落结构，几乎没有办法统计出准确数字）。在汉朝使者踏上这片土地之时，统治吉尔吉特地区的国家叫做“难兜”。按照西域的标准来看，人口三万一，胜兵八千的难兜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了。这样一片高山河谷地带，能够承载这么多人口，应该算是很难得的了。之所以会这样，盖因为当地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从游牧生活步入了农业时代。相对较低的海拔，是吉尔吉特地区农业条件优于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地区的主要原因所在。将三板块核心城市：吉尔吉特、斯卡都、列城的海拔排列出来（分别是约1500米、2500米、3500米）。我们会发现他们与人口数量之间呈现的是反比关系。

当年被吐蕃人从巴尔蒂斯坦赶到吉尔吉特的“勃律”人，应该说是因祸得福了。最起码吉尔吉特地区看起来，能够为他们的部族承载更多的人口。当然，在勃律人到来之前，这片土地肯定也不是无主之地了。这就好像同样命运的月氏人，鸠占鹊巢了塞人之地；而塞人又把马其顿人留下的巴克特里亚变成大夏一样。只不过，不是每个民族都那么喜欢并有条件记录历史的。我们今天能够推测出月氏、塞人当年的变迁，得益于希腊、中国这两个文明地区所留下来的文字记录。

不管被勃律人牺牲掉的，是不是汉朝所记录下来的难兜国。抑或勃律人本身就



是难兜人的后代，吉尔吉特地区很早就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却是不争的事实了。而它能够被汉帝国的使者记录下来，根本原因并不在它那生活在河谷当中的数万人口，而是在于它的地缘位置，处于西域连通南亚的交通要道上。

吉尔吉特的这一交通枢纽特性，在今天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连通中同样得到了延续。连接中、巴两国的交通纽带——中巴公路。就是在穿透吉尔吉特板块后，沿着南下的印度河谷，延伸进印度河平原的。对于来自中国的旅游者来说，沿线分布的佛教遗址往往是他们最为感兴趣的地方。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每一个板块都会有它的地缘中心点，很多时候这座城的名字就是整个板块的标签所在，吉尔吉特就是这种情况。既然吉尔吉特地区有着承接西域、南亚板块的重要作用，那么它的地缘中心也必然会建在交通的节点上了。从吉尔吉特的地缘位置来看，最有可能承担这一任务的，应该是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相交的地方。然而实际情况是，吉尔吉特城的位置并不在此，而是要向西偏移一点。

成就吉尔吉特城位置的关键因素，在于另一条河流——罕萨河。我们其实很难说罕萨河是吉尔吉特河的支流，还是吉尔吉特河是罕萨河的支流。从流域面积、长度来看，两条河流都非常接近。二者在吉尔吉特城交汇之后，最终判定干流的依据，



取决于哪一条河谷在地缘上更为强势。以此标准来看，罕萨河和罕萨板块，就只能屈从于吉尔吉特了。

就方位来看，吉尔吉特河可以被定义为“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向东注入印度河的河流”；而罕萨河则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南向注入印度河的河流”。鉴于兴都库什山脉在延伸至克什米尔北部时，山势已呈强弩之末了，因此吉尔吉特流域的地形、平均海拔要相对平缓一些；反过来，罕萨河就不太乐观了，基本上它的全程都是在喀喇昆仑山脉的腹地收集淡水。只是在汇入吉尔吉特河之时，才算是走出了喀喇昆仑山。也正因为如此，从中巴边境直到吉尔吉特这段，完全依附罕萨河谷建设的中巴公路，也可以单独称之为“喀喇昆仑公路”。



吉尔吉特市



吉尔吉特河谷

从地理结构上看，吉尔吉特河流域所覆盖的区域要简单得多。它的干流相当于是沿着喀喇昆仑山南麓东行。这也使得它的河谷走向，与同样沿喀喇昆仑山脉南麓流淌的印度河谷，呈直接对接状态。然而吉尔吉特河谷比罕萨河谷更有地缘潜力，并不是因为它与印度河谷看起来更有亲缘关系。决定这一点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地形。相对更低的海拔，才是它聚落更多人口，压倒罕萨河谷的原因所在。至于身处喀喇昆仑山腹地的罕萨即使直观比对，它也不会比拉达克更有潜力。

尽管吉尔吉特河谷看起来拥有绝对优势，并因此让罕萨河和罕萨板块成为了吉尔吉特的附庸，但这并不意味着罕萨河并不重要。恰恰相反，吉尔吉特板块

之所以能够成为丝绸之路南线上的重要板块，吉尔吉特城所处的三角洲平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板块的地缘中心，都取决于罕萨河这条刚从雪山中穿出的河流。

当我们身处吉尔吉特河——罕萨河相交之处，思考下一步的前进方向时就会发现，地势相对平缓的吉尔吉特河并不能把我们带到西域。在分水岭另一侧，我们将看到的是同属印度河流域的奇拉特尔河，以及可以带我们前往中亚隶属阿姆河流域

的“瓦罕河”。反之，只要不惧翻越了喀喇昆仑山分水线，上游河源遍布喀喇昆仑山北坡（中西段）的叶尔羌河流域，理论上将会有数以十计的山口，等待着迎接我们。

对于古典时期的旅行者来说，穿行喀喇昆仑山脉最大的风险似乎是恶劣的环境。这一点，从今天喀喇昆仑公路修建和运营时所面临的危险中，也可以得到佐证。今天沿中巴公路走出喀喇昆仑山脉，行至吉尔吉特的中国人，一般都会到当地的中国烈士陵园去缅怀一下，当年为了修建这条中巴友谊路而牺牲的88名中国工程人员（并不是所有的烈士都长眠于此，牺牲者据信有数百人之多）。

喀喇昆仑公路的艰险，让人不禁感到疑惑，古典时期的人类是否真的有能力在此打通商道了。其实对于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因为喀喇昆仑山脉并非像藏北高原那样，是人类的禁区。那些深切的河谷中至今仍然生活着数万土著——罕萨人。

## 第二节 罕萨的地理环境及其族群特点

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在二战时，曾经以一个英国外交官为主角，描绘了一个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村落——香格里拉。为了找到这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旅行者们像寻找活佛转世灵童一样，比照书中的内容，在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乃至横断山脉中寻找香格里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云南省的中甸县看起来已经成功抢得了这笔无形资产。为了避免竞争者的挑战，中甸县甚至直接抢注了“香格里拉”作为自己的新县名。很显然，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最起码现在提到“香格里拉”，除了那个著名的酒店集团以外，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这个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混杂的高原之地。

不管是争夺“瑞士”还是“香格里拉”头衔的地区，都拥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环境优势。不过与那些争夺“XX 瑞士”称号的地方相比，争夺“香格里拉”称号的地区在海拔上要高出许多。河谷海拔最少得在3000米以上，才有资格参与（相比之下，入围瑞士头衔争夺战的地区，平均海拔在1000——1500米范围内）。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雪山已经不是点缀，而是实实在在的环列在周围了。按照这个标准，阿里的普兰县其实也很有机会来争一把的。可惜的是，远离核心区的普兰人，在商业敏感性上还是比中甸人差了一些。

在此引出“香格里拉”这个标签，是因为在很多旅行者看来，罕萨即使不是英国人看到过的香格里拉，其环境也足以和书中的描述对应上了。在不能去罕萨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去云南的“香格里拉县”旅游一下，也能大致感受一下罕萨的地理环境了。

“地缘板块”跟“地理单元”概念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前者包含了人的因素在里面。比如孕育了象雄、古格王国的阿里高原是一个“地缘板块”，而“藏北高原”就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单元了。罕萨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地缘板块的姿态出现在地缘政



治舞台上，也是因为罕萨河谷之中能够有人类生存。这些居住于此的族群，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罕萨人。

从语言上来看，罕萨人并不属于克什米尔的主体族群——达尔德人。由于被封闭在这片河谷当中太久，语言学家甚至无法为罕萨语进行归类。当然，从种族来看，他们的祖先无疑是来自欧洲方向的。只不过到底是哪支东迁的部族沉淀于此，目前还不能确定（鉴于马其顿人的威名，包括罕萨人在内的很多克什米尔山地部落，都更愿意攀这门亲戚）。



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



罕萨河谷

对于今天的旅游者们来说，这些困扰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对于他们来说，罕萨人的长寿才是最吸引人前去探访的地方。在这些旅行者眼中，生活在“香格里拉”中的罕萨人，生活简单、安静，与世无争。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更加增添了罕萨



河谷的神秘感。在旅行者的想象中，有了这些和平的罕萨人帮助，古典时期的商旅在穿越喀喇昆仑山时，应该会容易很多。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的确，罕萨河谷并非生命的禁区。只要选择合适的季节、向导，以及线路，那些翻越分水岭的山口，也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至于罕萨人，他们自然也可以通过商路的开辟获利，并因此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只不过，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记录历史中，罕萨人却并没有对商路的开拓起到正面作用。相反，这些长寿的人却在某一时期，成为了商路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罕萨河谷



罕萨人



罕萨河

之所以说是“某一时期”，是因为不确定罕萨人是何时决定通过“渔猎”过往商旅的方式，为自己平淡的农牧生活增加收入的。可以确定的是，罕萨人的“渔猎”方式，并不仅限于劫财。事实上，将那些俘获的商旅（主要来自于南亚）卖给南疆的巴依老爷们做奴隶，才是他们外快的主要来源。罕萨人的这种渔猎生涯直到 19 世纪末，随着英国人的到来才告终结。控制罕萨的英国人，甚至与清帝国达成协议，将那些在塔里木盆地为奴的南亚商人放归印度。英国人在决定罕萨命运时，之所以



要和清帝国交涉，是因为在他们到来之前，罕萨已经被纳入了清帝国的藩属名单中的（时称“坎巨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罕萨被中央之国武力征服或者直接控制了。大多数愿意臣服于中央之国的所谓“国家”，仅仅是把这看成一件有利可图的事。一方面，自愿成为中央帝国的保护国，可以一定程度避免自己被更强大的邻居所吞并（这样做，会损害帝国的面子）；另一方面，表达恭敬之心的所谓“朝贡”，本身也是一件很划算的生意。像清帝国对于罕萨人的要求，仅仅是三年一贡“沙金一两五钱”（为了面子好看，还得包成十五小包）。至于回赏的东西，不必说大家也应该清楚了，怎么也比这一两五钱的沙金要值钱了。

罕萨人对中央之国的臣服，并没有让他们摆脱被英国人，或者说克什米尔兼并的命运。当罕萨人和罕萨河谷成为英属印度的控制区之后，罕萨人通过那些商路向喀喇昆仑山分水岭以北延伸的势力范围，也成为了英国人进一步渗透西域的依据所在。而这些商路以及它所牵扯到的复杂地缘博弈，也正是我们解读克什米尔板块与塔里木盆地地缘关系的钥匙所在。

### 第三节 罕萨沟通西域时利用的山口

提到沟通西域与克什米尔的商路，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中巴公路所走的“红其拉甫山口”了。从技术上看，这条公路的确是连通中、巴两国的最佳线路。山口的东侧，就是塔格敦巴什河的源头。通过这条东帕米尔高原的核心河谷，前往塔里木盆地的旅者可以在不用翻越高大山口的情况下，顺利进入塔里木盆地。而在红其拉甫山口西侧流淌的河流，名字就叫“红其拉甫河”。

作为罕萨河的源头之一，沿红其拉甫河南下可以很快将我们带至吉尔吉特河谷，进而进入印度河平原。那么在古典时期，选择透过罕萨河谷进入西域的商旅，是否就都是选择红其拉甫通道的呢？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把罕萨河上游与山脉对面的叶尔羌河上游的支流，尽数在地图上描绘出来，并做一个配对工作的话（在《克什米尔地缘结构图》上，就可以做这项工作），就会发现存在通行可能的山口将会以十数计算。只不过，这些曾经通行过的山口，并不一定都会被记录下来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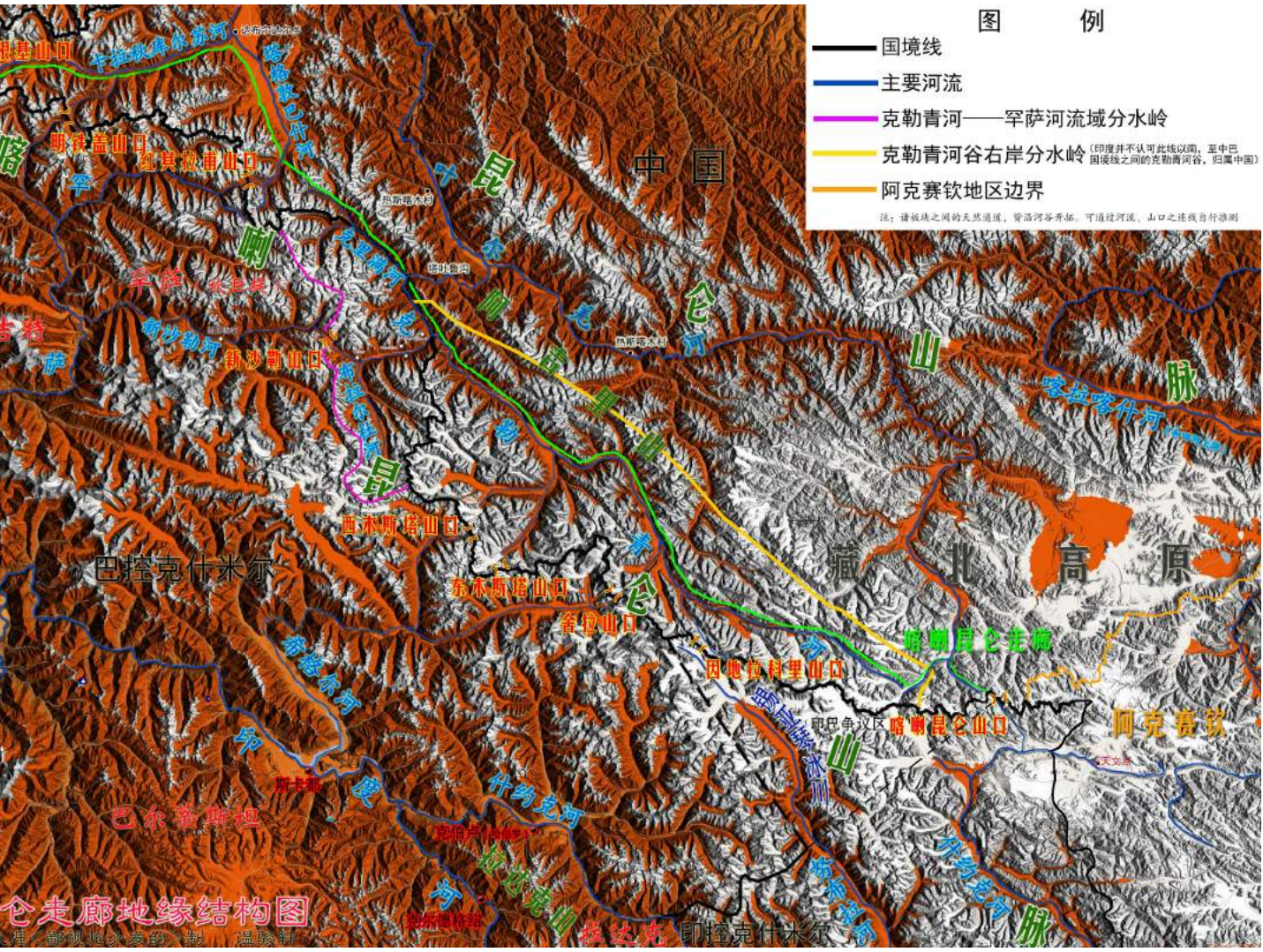
在被记录下来的山口中，最为著名的应该是红其拉甫山口西侧不远处的“明铁盖山口”（明铁盖达坂）。与红其拉甫山口一样，明铁盖山口指向的“明铁盖河”，也是罕萨河的源头之一。相对应的，在山口的另一侧接应的，也是塔格敦巴什河的另一源头：卡拉秋库尔河（卡拉苏）。

相比塔格敦巴什河那一路向南，指向中巴边境的正源，卡拉秋库尔河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的作用，要更加的重要。因为这条自西向东，直接对接瓦罕河的河流，让中国在帕米尔高原上的领土，出现了一个伸向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之间的突出部。



也就是说，这条特立独行的河流，决定了中、塔、阿、巴四方在此的行政格局。

从行政区划来看，卡拉秋库尔河的源头，就是中国和阿富汗的边界。而从流域结构上看，这段边界也可以被视为叶尔羌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最西部的分水点。这个分水点上通行条件最好的山口叫做“南瓦根基山口”。山口的西侧，就是瓦罕河的源头“瓦根基河”了。以今天中、阿战略通道来定义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把瓦罕河与卡拉秋库尔河，共同视为“瓦罕走廊”的组成部分。



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

不过抛开现在的政权分割，单从地缘背景来看，卡拉秋库尔河流域，更应该被视为另一条走廊：“喀喇昆仑走廊”的最西段。这条由卡拉秋库尔河——塔格敦巴什河——克里满河——克勒青河所连线而成的河谷走廊，共同的地理特征，就是依附于喀喇昆仑山北麓。也就是说，将南瓦根基山口——喀喇昆仑山口之间的这些河谷连成线的话，所描绘出来的这条弧线，基本就是喀喇昆仑山口的北部轮廓线了。

不管当年的徒步旅行者是穿越红其拉甫山口、明铁盖山口，还是翻越喀喇昆仑



山分水岭，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罕萨河与塔什库尔干河上游河谷之间作连线工作。做这些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喀喇昆仑山脉的海拔实在太高，这些海拔都在 4800 米左右的山口，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实在太太。冰川的发育经常使得一些原本能够季节性通行的山口，变成人类的禁区（参考锡亚琴冰川）。比如在最近几百年，曾经在中国历史中被记录下来的明铁盖山口的通行条件，就不如它西侧与之紧邻的“克里克山口”了（克里克山口所指向的“克里克河”，是明铁盖河的源头之一）。

毋庸置疑的是，不管透过上述哪个山口进入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流域，都算得上是连接南亚、西域最为快捷的通道。然而现实的环境困难，却使得这些直接连通罕萨——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的通道，变得异常的不稳定。为此，往来的商旅急需一条环境相对稳定的通道，帮助他们翻越喀喇昆仑山脉。



汉西域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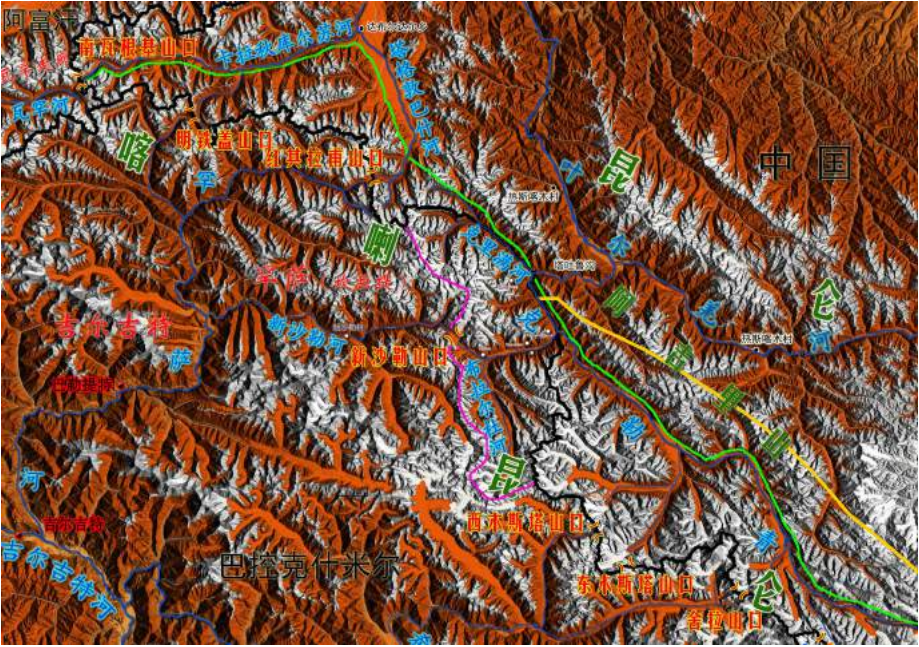
决定哪一个山口适合翻越喀喇昆仑山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只是海拔。在同一段山脉中，这些马鞍形山口的海拔通常并不会太大差别。事实上今天被用作连通中巴公路的红其拉甫山口与落选的明铁盖山口，海拔都在 4700 米。以及被认为在近几个世纪替代明铁盖山口，在相似位置接入卡拉秋库尔苏河谷的“克里克山口”（kilik pass），海拔都非常接近。



除了那些承担分水作用的山口在地质的作用下，山脉当中也可以会出现较低海拔的裂缝。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一条穿越分水岭而过的河流了（太行山脉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河流）。对于试图穿越山脉的人来说，通常情况下这也不算坏事。顺着这条河谷走，一般也是可通行的做法。除非河谷地形过于险峻，河道两旁就是崖壁（即使这种情况，也有“栈道”这种工程化的通行手段）。那么在喀喇昆仑山脉中有没有这样一条，能够带我们穿越分水岭的河流呢？

在顺着喀喇昆仑山脉山脊巡视一遍之后，本来满怀希望的我们可能要感到失望了。唯一能够同时出现在喀喇昆仑山两侧的河流，就远在山脉东端的什约克河。不管这条河流在地理结构中，应该被定义为绕过还是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它显然都不能帮到试图在山脉西端穿越的旅行者。不过大家也不要感到失望，我们刚才也说了，山口的高度并非决定穿越难度的唯一要素。在海拔接近的情况下，山口所在谷地的宽度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一个山口腹地与两侧高山的距离越远，受两侧高山环境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这种高海拔地区，这通常意味着你被冰雪封锁道路的可能性就越小。按照这个思路，在罕萨河上游河谷所对应的山口中寻找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克里克山口通行条件更好的山口——新沙勒山口（Shimshal pass）。只不过，在这个山口的另一侧，等待我们的并不是塔格敦巴什河的上游河谷，而是另一条从不同路径，流向叶尔羌河的河流——克勒青河。



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

所在谷地的存在。

每一个高海拔的山口，都有可能成为一条分割族群的地缘分割线。新沙勒山口

为罕萨地区引向新沙勒山口的这条河流，就叫作“新沙勒河”。在山口另一侧接应它的是克勒青河左岸的一条支流——布拉尔杜河（Braldu）。在纵穿喀喇昆仑山分水线的诸多山口中，新沙勒山口的宽度可以算的上是最宽的。我们甚至可以在那张《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上，清晰看到它



也不例外。以地理单元来划分的话，山口东、西两侧显然应该被分别归入克勒青河谷和罕萨河谷板块。以此为基础划分领地的话，罕萨人和顺着喀喇昆仑走廊，从帕米尔高原渗透而来的塔吉克人，也应该在此划分牧场。

在塔吉克人中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泽拉夫尚河，你是产金子的地方，你的源头在新沙勒（也译“星峡尔”）。泽拉夫尚河所指向的粟特地区，我们曾经花过很多笔墨来描述它的重要性。结合地理环境和地缘位置，这片至今仍以塔吉克人为主的土地，可以算得上是中亚最重要的地缘板块。只不过，在苏联人所设计的行政版图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它被划分给了突厥系的乌兹别克人。



汉西域全图

对于丢失了这片“产金子”的地方，塔吉克人可以说一直是耿耿于怀。不仅当年领导抗苏的阿富汗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塔吉克人)，打出了收复塔吉克圣城“撒马尔罕”的口号；而且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也固执的将它最西北部的行政区，定名为“粟特州”。尽管这个行政区，只有很小部分算是泽拉夫尚河上游。

以地理视角来看，新沙勒山口显然不可能成为泽拉夫尚河的源头了。不过从地缘角度来看，塔吉克人所流传的这首民谣，却清晰的划出了塔吉克人覆盖区的东西终点。试想一下，一个从新沙勒山口起程的塔吉克人，可以在完全没有语言、文化障碍的情况下，经过有塔吉克人游牧的：克勒青河谷、塔什库尔干裂谷带，穿越帕米尔高原、阿赖山，最终到达他们梦中的天堂——泽拉夫尚河。尽管没有掌握我们所分析的这些地缘知识，但这种直观感受已经足以让他们在脑海中，划出“塔吉克

之地”的覆盖范围了。

塔吉克人的这种分布状况，也很大程度反映在了行政区划上。今天有塔吉克人游牧的克勒青河谷、热斯喀木河谷（也就是热斯喀木村所在的叶尔羌上游河谷），都被划入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行政区内。然而你在这个塔吉克人自治之地的地图上，却永远找不到塔吉克之地的东部起点——新沙勒山口。因为今天的新沙勒山口，以及部分克勒青河谷地带，都和分水岭另一侧的新沙勒河一样，被划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 第四节 罕萨人渗透入喀喇昆仑走廊

尽管对于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说，新沙勒山口那 4735 米高的海拔，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然而对于那些习惯高原生活的人来说，这并不是问题。新沙勒山口相对较好的通行条件、较长的通行时间，甚至使之有条件成为了一条部族周期性迁移的路线。也就是说，无论是游牧于叶尔羌河上游的塔吉克人，还是现在大多已经转而从事农耕的罕萨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个喀喇昆仑山脉中最为通畅的山口，在克勒青河谷与新沙勒河谷中转场。

实际上，塔吉克人口中的“新沙勒”或者说“星峡尔”，亦有可能不仅仅指向“新沙勒山口”，而是罕萨的“新沙勒河”。对于游牧部族来说，分水岭两侧差异化的气候环境，能够错时为他们提供不同时段的牧场。如果山口的通行条件稳定的话，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然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在这场渗透与反渗透的博弈中，占得优势的应该是罕萨人。

可以肯定的是，在 19 世纪罕萨人成为中、英两国的关注对象时，他们已经成功的将影响力延伸到了叶尔羌河上游地区。当罕萨明确脱离中国的朝贡体系，转而接受英国保护时，英国人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将克勒青河谷、热斯喀木河，以及塔格敦巴什河这三条河谷，同时带入大英帝国的版图。问题是，罕萨人在上述地区的影响力，并非是通过移民来完成的（现在中国境内，并看不到罕萨人）。

真正驱动罕萨人出现在喀喇昆仑走廊的动机，很可能是他们用来创收的“渔猎”生产方式。前面我们也说了，抢劫过往商旅，并将他们转卖入塔里木盆地为奴，曾经是罕萨人的重要收入来源。问题是，罕萨河谷并非是克什米尔地区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即使不通过罕萨版块，克什米尔其他板块也都还是有机会，对接入瓦罕——喀喇昆仑走廊的。当选择从罕萨通行的商旅日渐减少时，罕萨人通过从克里克到新沙勒的这些山口，将奴隶贸易的触角伸向叶尔羌上游这片几乎无法绕过（南亚——西域之间的商路）的河谷，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了（劫掠之后，都不用走回头路，就能够直送塔里木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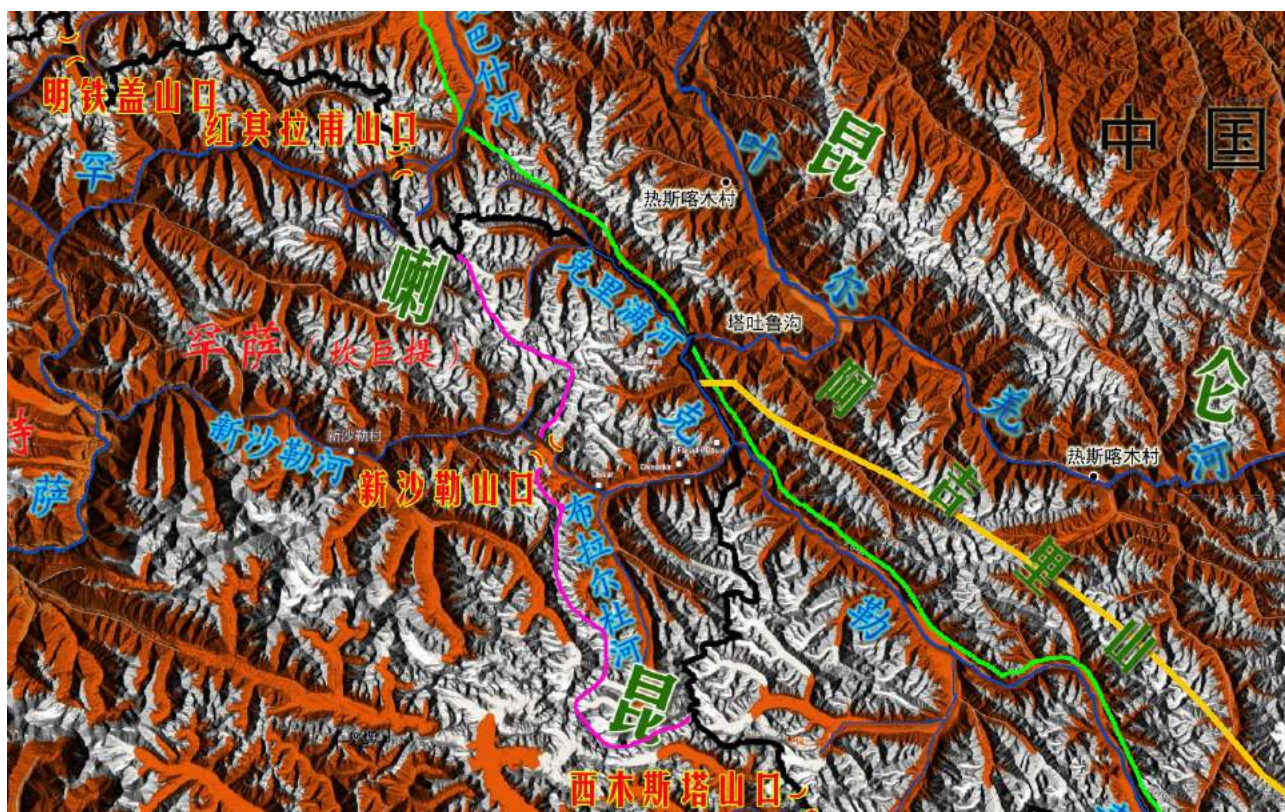
实际上，对于一个身处商路中的部族，尤其是定居的农业部族来说，选择劫掠



方式来创收并非是一个好主意，通过为商队提供补给同样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只会让商队远离自己的领地，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罕萨人选择这种短视的做法的地缘背景，应该跟喀喇昆仑山脉的气候变化有关。

在解读努布拉上游河谷变身为“锡亚琴冰川”时，我们曾经分析过，在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喀喇昆仑山脉的冰川活动明显加强，那些曾经繁忙的山口，逐一被冰雪所覆盖。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完全无法通行。只是对于那些外来的商旅来说，代价就有些太大了。

喀喇昆仑山脉环境的这次变化，不仅让巴尔蒂斯坦几乎断绝了与塔里木盆地的直接交流，也让罕萨板块变得封闭，并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而罕萨人所采取的那种抢劫商旅，竭泽而渔的做法，也就成为一种为了保证收益的选项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抢越没人来，越没人来就越抢）。



喀喇昆仑走廊地缘结构图

从地缘角度来看，罕萨人把触角延伸进喀喇昆仑走廊的做法，并不一定必然带来地缘结构上的变化。只是对于害怕俄国人入主塔里木盆地的英国人来说，他们需要各种可能的理由，将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界（或者说克什米尔的北方边界）推进到昆仑山巅。至于结果，大家也已经看到了。英国人推出的这条“约翰逊线”，即使是积弱的清帝国时期，也没有获得中央之国的政治认可。

然而罕萨人和英国人，以及在政权上延续他们权利的巴基斯坦人，在喀喇昆仑



走廊也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境线有一部分是以克勒青河和它的支流“克里满河”的中间线为依据划定的。结合我们前面说的新沙勒山口的地缘价值，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答案了。



新沙勒河谷

从位置上看，这片被划给巴基斯坦方面的克勒青河谷，正是以布拉尔杜河谷为核心的新沙勒山口所对应的部分。对于罕萨人来说，无论他们是觉得布拉尔杜河及其周边地区，农业基础不错而想移民；还是想为他们侵袭喀喇昆仑走廊布设战略基

地。从通行条件最好的新沙勒山口渗透，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目前在谷歌地图上，在布拉尔杜河谷最少能看到四个村落）。当红色中国和巴基斯坦决定本着组建联盟的精神，来谈判解决边境问题时。这些已经移居至克勒青河谷的罕萨人，就成为了巴基斯坦保留部分克勒青河谷领地的理由了（与中俄分割黑瞎子岛的情况类似）。

抛开国家框架，单从土著博弈的角度来看，一直视新沙勒为“塔吉克之地”东部起点的塔吉克人，估计会为此感到受伤。尽管在被划入巴基斯坦境内的克勒青河谷中，最少应该还有一个高山塔吉克人村落。但无论是新沙勒山口还是新沙勒河，无疑都已经坐实成为了“罕萨”的一部分了。

通过这段时间的解读，现在大家应该对喀喇昆仑走廊与克什米尔的地缘关系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了。总的来说，这条平均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山脉，翻越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周期性变化的气候，也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季节性通行的山口，在历史的某一时期被冰雪长年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克什米尔板块想一直保持南亚——西域交通枢纽的地位，就不能把打通丝绸之路（南线）交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喀喇昆仑走廊身上。如果有通行条件更加稳定的选择，即使在路程上有些绕，也一样会成为往来商旅的选择（甚至是优先选择）。那么这样的选择究竟存不存在，又指向哪里呢？



## 第二十一章 吉尔吉特与帕米尔间的联系通道

### 第一节 小冰河期影响喀喇昆仑山山口的通行

有朋友问道，喀喇昆仑山脉几千年来的地理结构应该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冰川扩张的问题呢？其实这不是地理条件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气候问题——小冰河期。一般认为，造成全球气候变冷的小冰河期，大约起于 16 世纪末，在 17 世纪达到高峰，并在 100 年前结束。

在中国的一些研究者看来，庞大的明帝国之所以会被数万女真骑兵所灭，根本原因在于小冰河期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有认为是小冰河期起自 12 世纪，并造成了北宋的灭亡。有趣的是，这两次中原王朝的覆灭，直接推手都是来自寒冷东北地区的女真人。

关于宋、明两朝的覆灭，到底多大程度与气候变冷有关，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喀喇昆仑山脉在这一阶段，冰川出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却是事实存在的。即使在全球气候趋暖，多数冰川都出现明显消融现象的今天，这两条围就克什米尔的巨大山脉，冰川的规模实际上也未见缩减。

喀喇昆仑山脉冰川的扩张，对于克什米尔高原（包括拉达克）与西域的交流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使得重新获得西域控制权的中央之国（清时期），在试图对这片土地施加影响力时缺少了必要的管道。虽然英国人透过南亚向北渗透，是中国与印、巴两国今日边界形成的主要推手。但如果那些穿行于喀喇昆仑山脉的山口繁忙如初的话，英国人将边境线推向昆仑山脉的想法，很可能都不会出现。更不用说今天还留下克勒青、阿克赛钦这些至今未令各方满意的问题了。毕竟在英国无意用武力推进的情况下，“窃取”那些中央之国关注不到的土地，能够将引发外交风险的概率压到最低。

实际上，即使没有小冰河期的影响，穿越喀喇昆仑山脉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今天我们仍然不时会在新闻当中听闻，喀喇昆仑公路的某处因灾出现道路封闭的新闻。这也迫使试图穿越克什米尔高原的旅行者，从战略层面寻找一个能够绕过喀喇昆仑山脉的通行方案。

从喀喇昆仑山脉东端的喀喇昆仑山口穿越，是选择之一。在前面我们已经解读过了，那些被分割成几个板块的藏人，或者经由他们领地前往西域、南亚的商人，可以通过这个山口很快转入克勒青河谷。然后顺流而下，或者再沿喀喇昆仑走廊北上，通过塔什库尔干裂谷带转入塔里木盆地。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只是想沿叶尔羌河谷穿出昆仑山脉进入西域的话，克勒青河谷并不一定是必经之路。北出喀喇昆仑山口的旅行者，可以直接插入叶尔羌河正源（热斯喀木河），再沿河而下向塔里木盆地







## 第二节 吉尔吉特对接瓦罕走廊的山口

尽管喀喇昆仑山口能够绕过喀喇昆仑山脉腹地那些冰封的山口，打通一条西域通往南亚的通道。但这条通道最大的问题就是海拔实在太高了。高海拔所造成的恶劣环境，不仅直接对旅行者的通行造成困难，更让他们沿途接受土著居民补给的可能性变小。因此如果一定要绕过喀喇昆仑山脉寻找一条通往西域的道路的话，东线并非是最好的选择。当我们把视线移向喀喇昆仑山脉的西线，试图在西线打通一条战略通道的话，两个已经在之前内容中出现过的地缘标签：吉尔吉特河谷、瓦罕走廊，很快便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从结构上看，如果能够从吉尔吉特河上游打通一条道路北上连通瓦罕走廊的话，就恰好可以从喀喇昆仑山脉的西端，绕过这条冰川密布的山脉。在这个方向上，兴都库什山脉那山势渐弱的东段是吉尔吉特河与瓦罕——喷赤河谷的分水岭。以我们在地形图上比较两段山脉的“厚度”的感觉来看，翻越这段兴都库什山脉的难度感应该要小得多。而在历史上，连通上述路线的山口——坦驹岭山口，也的确曾经在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中，承担着重要的连通作用。很多朋友感兴趣的大唐高仙芝远征勃律的线路也正是指向于此。

如果把瓦罕走廊看作一个独立的板块，那么这条河谷地带就相当于夹在帕米尔高原与克什米尔高原之间的缓冲地带了。二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势必都要通过这条走廊。而从河流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一个喷赤河（阿姆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对接问题。

从位置上看，这一次源自兴都库什山脉的吉尔吉特河，与喷赤河的南源——瓦罕河，显然应该是对接道路的主角。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罕萨河谷就没有直接对接瓦罕走廊。沿着罕萨河上游最西侧的那条河谷（切甫日沙河），翻越一个叫做“伊尔沙德·乌云”的山口，我们马上就能够进入瓦罕走廊的中部，并看到瓦罕河水了。问题是，对于丝绸之路来说，这个山口在距离以及通行难度上并没有什么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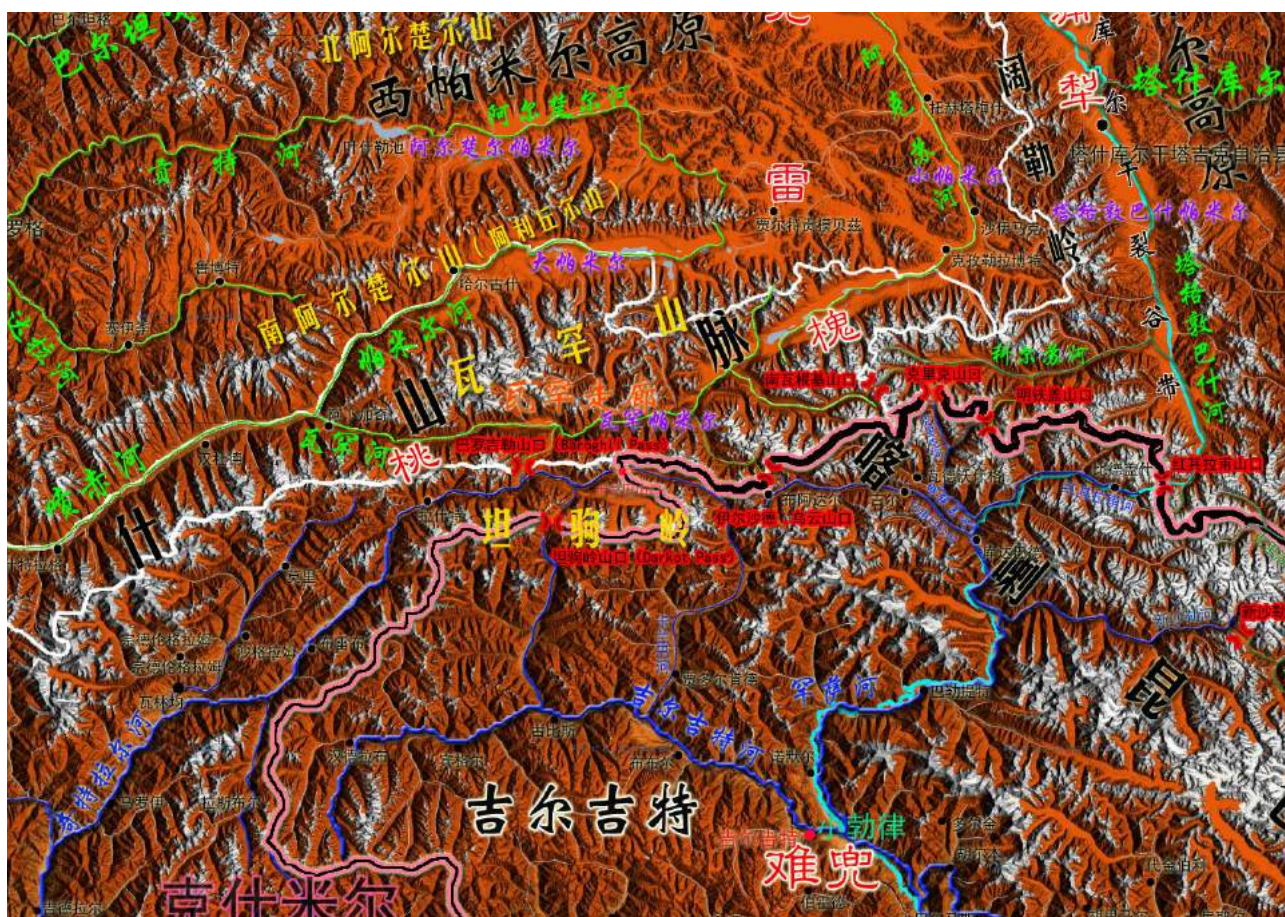
如果你已经深入瓦罕走廊那么深的话（从西域方向出发），并没有必要再绕回河谷狭窄，灾害频繁的罕萨河谷去。只消再往前走一点，就有机会觅得山口，进入地形相对平缓，人口更多的吉尔吉特河谷了。在这种情况下，伊尔沙德·乌云山口的价值更多被局限在地区交通上（所以没什么名气）。

没有在伊尔沙德·乌云山口选择翻越的商旅，在顺着瓦罕河向西前行后不久，的确很快就有机会感受到吉尔吉特河流域的召唤了。在分水岭的对面，有一条汇入吉尔吉特河的左岸支流——卡兰巴河在等待着它们。以之前红其拉甫、克里克等山口的命名原则来看，这个被推断出的山口，应该被命名为“卡兰巴山口”。事实上，这也是瓦罕河流域，唯一对接吉尔吉特河流域的机会了。因为接下来，奇特拉尔河的上游将横插进来，阻断瓦罕河与吉尔吉特河流域对接工作。



如果从瓦罕走廊而来的商旅，不试图转入卡兰巴河谷的话，他们接下来再想进入吉尔吉特河谷的话，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卡兰巴山口”，而是两个山口了（你必须连续穿越奇特拉尔河与瓦罕河、吉尔吉特河的分水岭）。从这一点来看，卡兰巴山口似乎应该是瓦罕走廊对接吉尔吉特河谷的最好选择。也是经由瓦罕走廊中转的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路了。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卡兰巴河上游的确存在一个“卡兰巴山口”，但这个山口却并非向北对接瓦罕河，而是向西对接奇特拉尔河谷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卡兰巴河没有办法直线对接瓦罕河呢？当然也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横亘在卡兰巴河源头与瓦罕河之间的山脊地形过于陡峭（看不到有明显的马鞍形山口）。在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往来于此的商旅并不愿意冒险穿越终年积雪的山脊罢了。



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高原地缘关系图

在瓦罕河谷遥望雪山叹气的旅行者，并不会失望太久，继续向西行走的他们，很快会在兴都库什山脉当中，找到一个海拔只有 3800 米的山口：巴罗吉勒山口，带他们进入奇特拉尔河谷。在经历过喀喇昆仑山脉那些平均海拔 4800 米的山口之后，穿越这种海拔的山口简直就是在休闲游。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即使是奇特拉尔河上游河谷的海拔也不会超过这个高度，也意味着往来的商旅有机会在奇特拉尔河



谷中，全程得到补给（目前建制于此的奇特拉尔县，有约 40 万人口）。

如果穿越巴罗吉勒山口进入奇特拉尔河谷的旅行者，决定顺流而下，寻找前往印度河平原的道路的话，他们实际上就不用进入吉尔吉特河谷以及我们今天所定义的“克什米尔”地区了。因为作为喀布尔河北岸支流的奇特拉尔河（阿富汗境内称“库纳尔河”），可以将他们直接带入今天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所在的“喀布尔河中游河谷”。而沿着喀布尔河向东的话，著名的开伯尔山口，以及喀布尔河下游的“犍陀罗盆地”（白沙瓦地区）就将呈现在他们的前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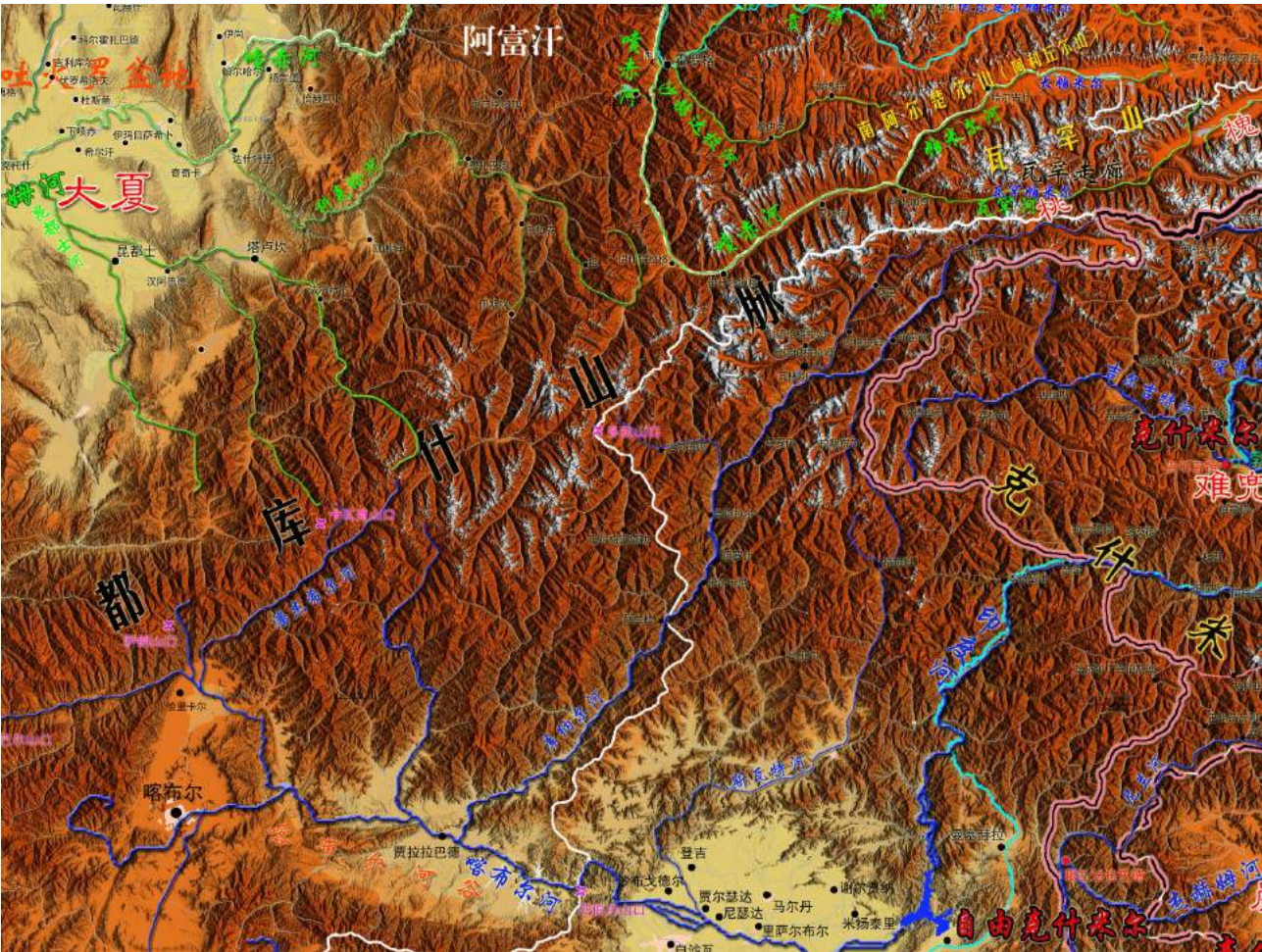
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高原地缘关系图

从地理角度看，奇特拉尔通道也应该被归入我们所定义的“克什米尔高原”板块。也就是说，这条对接帕米尔高原与喀布尔河流域通道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克什米尔板块的枢纽地位。实际上，奇特拉尔河谷还能够提供对接吐火罗盆地的可能。尽管今天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那条沿着帕米尔高原边缘，拐了个 Z 字形喷赤河谷，成为了连通帕米尔高原与吐火罗盆地的主干道。但在不受政治分割影响的古典时期，进入瓦罕走廊的商旅，很多时候却会选择顺奇特拉尔河而下，并借助奇特拉尔河右岸的一条支流，带到今天巴、阿国境线上的“多拉山口”。翻越这个山口之后，他



们马上就能进入阿姆河的另一个上游河流——科克恰河的领地。

沿奇特拉尔河而下进入喀布尔河谷，或者是由多拉山口进入吐火罗盆地，并非奇特拉尔河谷所能提供的全部选择。事实上站在巴罗吉勒山口南侧向东张望的话，罕萨河谷的西部门户——卡兰巴山口就在眼前。基于奇特拉尔河上游河谷，能够带来如此之多的选项。当年从阿富汗手中分割“普什图斯坦”以为缓冲的英国人，将多拉山口作为节点之一，将半条奇特拉尔河谷划入英属印度的领地就很好理解了（留下半条河谷的阿富汗人，称奇特拉尔河为“库纳尔河”）。



克什米尔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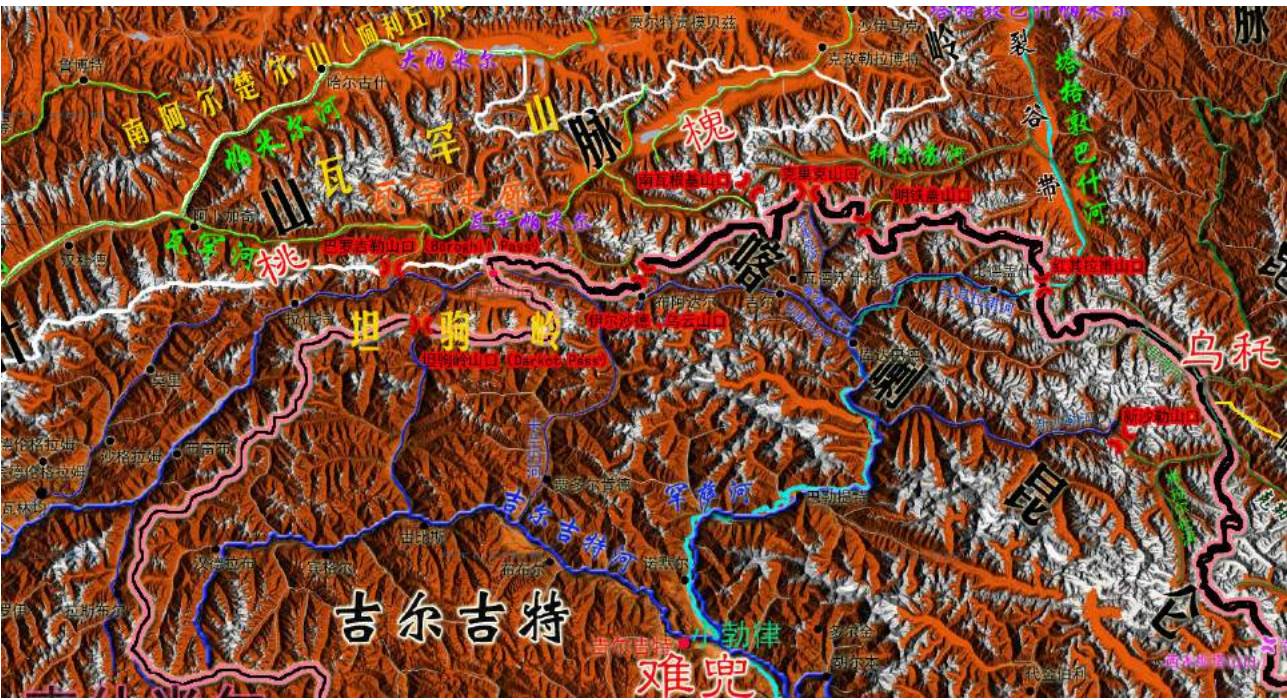
尽管奇特拉尔河谷的存在，打通了一条不用经由印度河上游（相当于巴控克什米尔 + 拉达克地区），直接插入印度河中游低地（喀布尔河）的便捷通道。但就我们现在的分析方向来说，我们更关心的是它如何对接吉尔吉特河谷的问题。对于试图从贸易中谋利的商旅来说，吉尔吉特河谷本身也颇具吸引力。在张骞凿空西域的时代，吉尔吉特河谷已经承载了人口超过三万的“难兜国”。而在唐帝国与吐蕃博弈西域时，身处于此的小勃律人更是发挥过关键作用。

对于试图走出青藏高原，向西域方向扩张的吐蕃人来说，控制吉尔吉特河谷和



巴罗吉勒山口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吐蕃人可以借助克勒青河谷，透过叶尔羌流域渗透西域，甚至横穿藏北高原腹地，插入塔里木盆地。只是这样的路线实在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了。即使吐蕃人算是最适应高原生活的部族，但沿路缺少补给的现状，以及随时而来的自然灾害，都使得他们不能把扩张西域的赌注，压在喀喇昆仑走廊和藏北高原身上。

如果要在西域和吐蕃之间，打通一条沿途都有聚落区补给的战略通道，串连拉克——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地区，呈直线状态一路向西的“印度河——吉尔吉特河谷地”，将是最好的选择。在沿途占领克什米尔高原北部地区最核心的这条中轴线之后。吐蕃人透过巴罗吉勒山口进入帕米尔高原。接下来，瓦罕走廊与塔什库尔干裂谷带，这两条由帕米尔高原最为开阔的谷地，将引领着吐蕃人穿越东、西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



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高原地缘关系图

写到这里，相信大家心中也已经对当年吐蕃西扩的路线，以及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线路有了答案了。不过在这条线路中，我们还漏了一个比巴罗吉勒山口更具知名度的地标——坦驹岭。事实上，提到那次伟大的远征，以及瓦罕走廊转入吉尔吉特的通道，坦驹岭的知名度要高得多。那么这条“岭”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答案已经隐藏在前面的内容了。我们在前面说过了，由于奇特拉尔河的介入，吉尔吉特河流域接入瓦罕走廊的主通道，势必要翻越两个山口。分割瓦罕河与奇特拉尔河的巴罗吉勒山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它南侧，隔奇特拉尔河相望的地方，应该还有一个为奇特拉尔河、吉尔吉特河流域分水岭存在。而这条分水岭，应该就是

坦驹岭的地望所在。

从字面上看，坦驹岭所指向的无疑应该是一条山岭。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即使没有文字标注，相信大家也能够在所附《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高原地缘关系图》中找到它的位置。而如果这个标签所指向的是一个山口的话，它今天的名字则叫作“达尔科特山口”（Darkot pass 也译德尔果德山口）。

坦驹岭山口之所以比巴罗吉勒山口更加出名，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海拔。人类就是这样，越是给他们造成困难的地方，就越是会让他们印象深刻。坦驹岭山口 4700 米的海拔，已经堪比喀喇昆仑山脉那些山口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坦驹岭山下的吉尔吉特河谷也处在这样的海拔线上。事实上，从坦驹岭下来之后，河谷海拔很快就会降至 3000 米以下。这意味着，在坦驹岭上饱受高寒之苦的旅行者，只要过了这个险要之地之后，就很快能在富庶的村镇中，享受到农耕生活所带来的舒适生活了（相对那些游牧之地）。



坦驹岭山口（达尔科特山口）

行文至此，克什米尔的地缘结构，以及与周边板块之间的地缘关系，算是基本解读清楚了。经由那些横亘在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之上的山口，通过瓦罕、塔什库尔干、克勒青这几条河谷走廊，大家也应该能够自行在塔里木盆地与克什米尔，乃至印度河平原之间，连线出一张交通网来了。应该说，这些交通线，都应该算是丝绸之路南线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至于说具体使用哪条线路，就要根据具体需要，以及当时的地缘政治、地理环境来决定的了。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大家在那些资料图中，所见的那么简单。希望这部分内容，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这片世界上地缘结构最为复杂的山地。

对于开通丝绸之路的汉帝国来说，今天印控克什米尔部分应该并不会受到帝国



的关注。对于那些前往南亚探路的汉朝使者来说，新沙勒山口应该是他们所能够探访到的最东点（通过这个山口，可以打通乌秣国与难兜国之间的商路）。然而我们并不确定张骞本人是否亲身踏上过克什米尔的土地。毕竟如果他从吐火罗盆地起程的话，有多种选择穿越帕米尔高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管他从哪条线路重新回到塔里木盆地，疏勒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线国家，将会是他考察的重点。而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也将随着张骞的脚步，为这次西域之行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 第二十二章 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沿岸的国家

### 第一节 疏勒国和莎车国的地理位置

沿着张骞出使月氏的路径，我们已经将从楼兰到疏勒的汉丝绸之路北线所经历的绿洲、国家过了一遍。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一路线的指向的就是塔里木盆地北沿了。而从水系的角度来看的话，喀什噶尔河——塔里木河——孔雀河三河相连的这条绿色通道，就是丝绸之路北线得以成行的基础。

现在我们需要把视线转向塔里木盆地的南沿了，去看看这一地区有哪些绿洲，可以为西域的政治板块上补充一些“国家”进来。有了在北部的经验，我们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寻找河流的踪迹了。在喀什噶尔河之南，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大河就是叶尔羌河了。这条河流我们并不陌生，之前花了那么多笔墨解读的克勒青、热斯喀木、塔什库尔干河都是它的上游源头。聚落于叶尔羌河绿洲的部族是莎车人，基于回复汉唐记忆的心理，今天在此也设立了一个“莎车县”；同样的，疏勒国所在的喀什噶尔河绿洲也建制了一个“疏勒县”。

说起来，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的位置，真称得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河一南一北为塔里木河收集帕米尔高原之水。而它们的山前平原，也同时充当着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在塔里木盆地的起始点。与这些地理结构相对应的是，是两个国家的人口潜力。在汉书的记载中，疏勒和莎车人口完全处于同一数量级（前者人口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七；后者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三）。在塔里木盆地，这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口，也足以让两国跻身二流大国的行列了。

参考前面的内容以及附图，经由疏勒溯喀什噶尔河而上，进入中亚的丝绸之路北线；以及经由莎车，溯叶尔羌河而上，最终进入南亚的丝绸之路南线，大家应该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了。基于这些路线内部其实还有多种选项、组合，将南北两线用一条单一的直线划出是有失偏颇的。相比之下，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的脉络就要清晰多了。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体量，那些试图横穿西域的商旅，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每一个山前绿洲，几乎都是他们必须停留的补给点。

将这些绿洲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围绕塔里木盆地边缘而开通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了。在这条环线“公路”中，疏勒、莎车两国并非是被封闭在南、北两线的丝绸之路路上。这样归类，只是以中央之国的视角来看待它们的交通价值罢了。将塔里木盆地看成一个封闭板块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汉帝国到来之前，种族博弈也曾经以南北对抗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环状结构中。在史书中，关于这些西域国家的种族描写并不多。相比那些定居的绿洲民族，汉朝的史官对于那些游牧民族的族属反而记录得更细致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要管理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西域国家，



相互之间能否找到的共同点，很大程度将从心理层面上决定彼此距离的远近。

对于农业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来说,那些同样以农为本,定居于绿洲上的“城国”,天然就会比那些游牧部落更具有共同语言。这一点,已经足以让帝国建立起经营西域的信心了;而当汉帝国不得不面对那些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自己迥异的游牧部落时,种族特征就成为了最为明显的甄别方法了。相比那些高加索人种的欧洲后裔,那些隶属羌系的游牧部落会让汉帝国的使者更有亲近感。那么,明显应该是从塔里木盆地之南而来的羌系部落,所扩张的北部终点究竟在哪里呢?



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

## 第二节 依耐国的游牧属性和种族特征

试图通过疏勒、莎车两国,联网南北两条丝绸之路汉朝使者,并不会在旅途之中感到寂寞。因为还可以遇到一个,游牧于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绿洲之间的小型游牧部落。这个人口不到 700 的游牧部落叫做“依耐国”。一定要为这个游牧行国找一个对应的行政区的话,那今天喀什与莎车之间的英沙吉县,就是他们的地望了。实际上,在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之间,那些不能被疏勒、莎车人所耕种,而又生长着植被的土地,都有可能留下依耐国的游牧的足迹。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这些游牧行国就像填缝一样,与那些绿洲城国互补而生。

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游牧民族一直被描绘成凶恶的入侵者形象。其实剖析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两大生产体系之间,互补共生的时段还是占了主流。一方面农耕民族对于那些干冷的草原并没有兴趣;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并不能有效利用那些耕地。破坏性的掠夺方式,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很多时候,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因为游牧民族遇到了损失很大的自然灾害(急需快速补给),或者是出于战略防御的心理,农耕民族断绝了与游牧民族的互市交易。

当然,以游牧民族的自然属性而言,他们对农耕民族的压力也还是现实存在的。

毕竟军民一体，机动能力极强的他们，产生出“渔猎”农耕民族想法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就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国家来说，这种游牧压力更多的是来自天山以北的强大的乌孙人和匈奴人。至于那些活动在自己周边，人口从数百至数千不等的游牧部落，一般并不会会有特别的威胁。比如依耐国，他们所食用的粮食，就必须从疏勒、莎车两国进口。鉴于双方的人口差异悬殊，为了交易的稳定，这些小型游牧部落往往还会选择依附于某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也比比皆是（用互市之利，来诱使游牧部落依附）。

以依耐国的体量来看，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影响西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的能力。引发我们兴趣的，是这个部落的种族属性。根据历史记载，依耐族人并非是从北方而来的欧洲游牧民族后代，而是来自于东部的羌系游牧部落。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也了解到，丝绸之路北线之上的捐毒、休循、尉头等部，是与“乌孙同俗”的高加索裔游牧部落；而东帕米尔高原的蒲犁国则属于羌系游牧部落（西帕的无雷国则是受两边影响的混合性部落）。

当我们在地图上标出这些游牧部落的分布区域之后，一条以南、北丝绸之路为核心，中分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的黄白种族分割线，似乎已经昭然若揭了。然而问题在于，分割游牧民族的这条地缘分割线，并不一定能够推断出莎车等南线绿洲国家的种族归属。因为以塔里木盆地的地缘位置来看，农业文明无疑最先是从中亚方面，而非东亚方向传入的。那些从天山北麓翻越而来的带着高加索血统的部族，更可能拥有率先开发那些绿洲的技术。

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莎车人的种族问题，但在二千多年前，游牧于喀什噶尔河以南，塔里木河边缘的是羌系部落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其中起到重要参考作用的，并非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依耐国”，而是另两个与莎车国地理关系更加紧密的国家：西夜、子合。

### 第三节 西夜和子合特殊的地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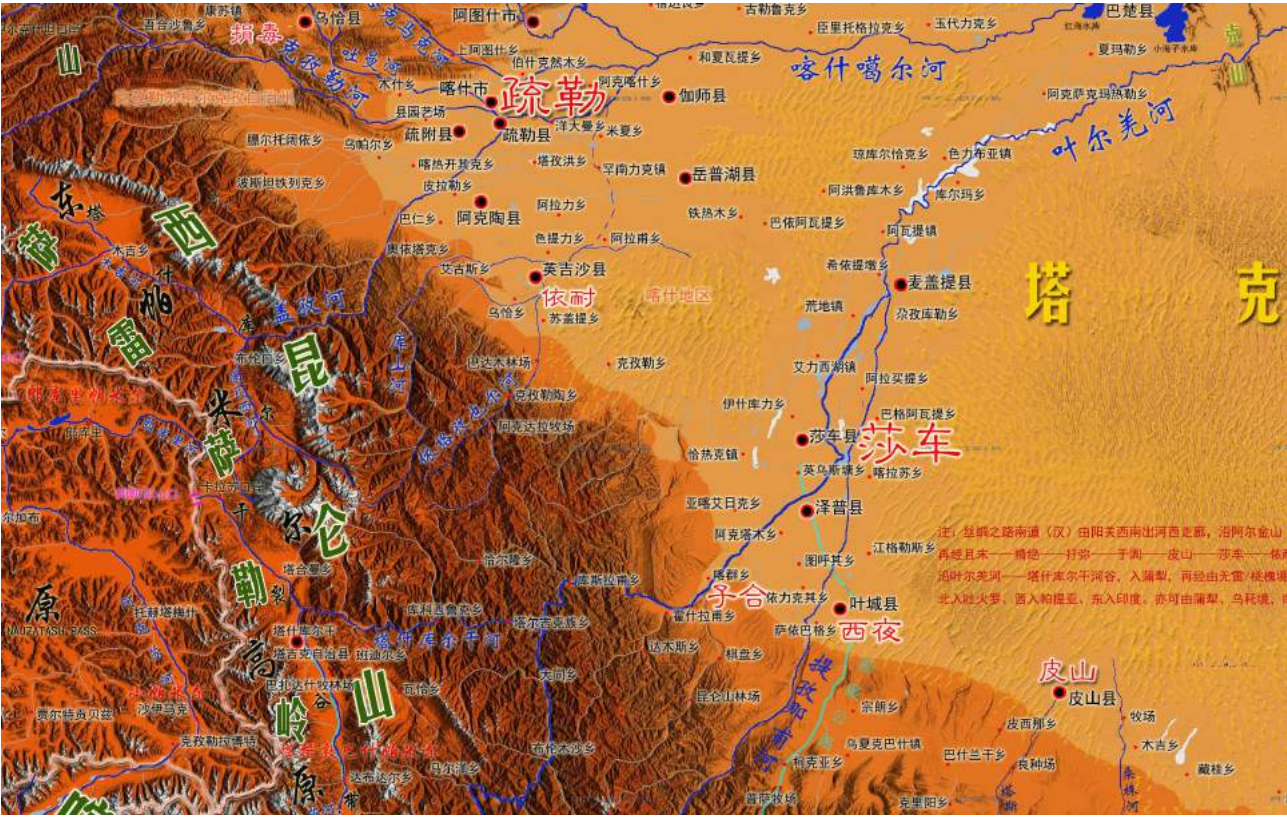
在历史记载中，西夜、子合是两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他们的特殊之处有两点：首先是史书明确记载他们属于黄种的羌系游牧部落（依耐、蒲犁等国都被形容为“种俗与子合同”，或“皆西夜类”）；其实是当时的观察者，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在后汉书中，历史记录者声称这是两个相邻的游牧国家。其中子合国的人口为四千，而西夜国则人口过万；而在汉书的记载中，只记录有西夜国。然而这个国家的“王”，却又被记录为“子合王”。

这种看起来有些混乱的记录不禁让人疑惑，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结合游牧部落的生存状态来看，这也并不难理解。实际上绝大部分游牧民族，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游牧地接近的部族，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以共同的政治标



签示人；或者在某一时期，更愿意彰显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很平常的事。不过像西夜、子合这种，给帝国使者造成甄别困难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不管他们对外是否声称是一个国家，他们应该被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族，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既然西夜和子合应该是两个部族，那么这两个部族也应该各自有相对独立的牧地了。那么二者的牧地分别指向哪里呢？其实仔细观察叶尔羌河在塔里木盆地的流向，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在中亚、西域这片干旱的土地上，一条从高山峡谷奔涌而出的河流，很难在它的下游地区接受补给。然而叶尔羌河却是一个例外，它在深入沙漠腹地之后，还在右岸接受了一条年流量达到7亿立方米的河流——提孜那甫河的补给。与叶尔羌河中上游地区主要在昆仑——西昆仑山脉西、南收集淡水不同，提孜那甫河是一条发源于昆仑山北坡，单纯收集昆仑山之水的河流。



汉西域全图

古莎车国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以“叶尔羌河——提孜那甫河三角洲平原”为核心的绿洲带上。而子合、西夜国，则是依附于绿洲以南的河谷之中的。由于两河出昆仑山的谷口之间的距离有六十、七十公里，在流出昆仑山之后并没有很快融合到一起。因此两条下游交融，中游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河流之间，也就有了各自的地缘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子合、西夜两部一开始同属一族，但在分据两条河谷发展之后，也很有可能会分裂成两个国家；反过来，即使一开始就是两个不同部族分据两条河谷，但由于地理接近，也很有可能统一为一个“国家”。

叶尔羌流域中游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地缘关系，在上游地区也同样存在。在西汉时期还分别为蒲犁、乌秣两国所领有的叶尔羌河上游河谷，在唐朝时期就统一成为了“羯盘陀国”。相比地形复杂，流域面积更大的上游地区。叶尔羌河中游的两条谷地之间统一难度要小些。一般认为，子合是在西夜的西面。因此我们也可以认定，子合对应叶尔羌河；西夜对应提孜那甫河。从河水的流量来看，叶尔羌河明显要大于后期成为自己支流的提孜那甫河。

不过这并不代表，叶尔羌河的游牧潜力要比提孜那甫河更大。因为叶尔羌河深入沙漠腹地，水流渐缓的下游冲积扇，已经被莎车人进行了农业开发。留给子合人的，是水流湍急，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河谷地区。相比之下，流量较小的提孜那甫河却可以从容的在山麓前经营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水草交融之地，然后再将部分多余的河水汇入叶尔羌河（提孜那甫河的意思就是“平缓的河”）。

不管怎么样，比起那些湮灭于历史当中的游牧部落，子合、西夜都还是幸运的。由于身处叶尔羌河中游地区，能够扼守丝绸南道出塔里木盆地大门。这些羌系部落，不仅能够额外获取商业利益，更能被中央之国的历史所记录下来。拥有这份幸运的，并不只有子合、西夜两部，当我们沿着昆仑山北麓，顺着张骞东归的脚步眺望远方时，一系列或“城”或“牧”的国家，将陆续呈现在我们眼前。

#### 第四节 皮山国的地理环境与乌垒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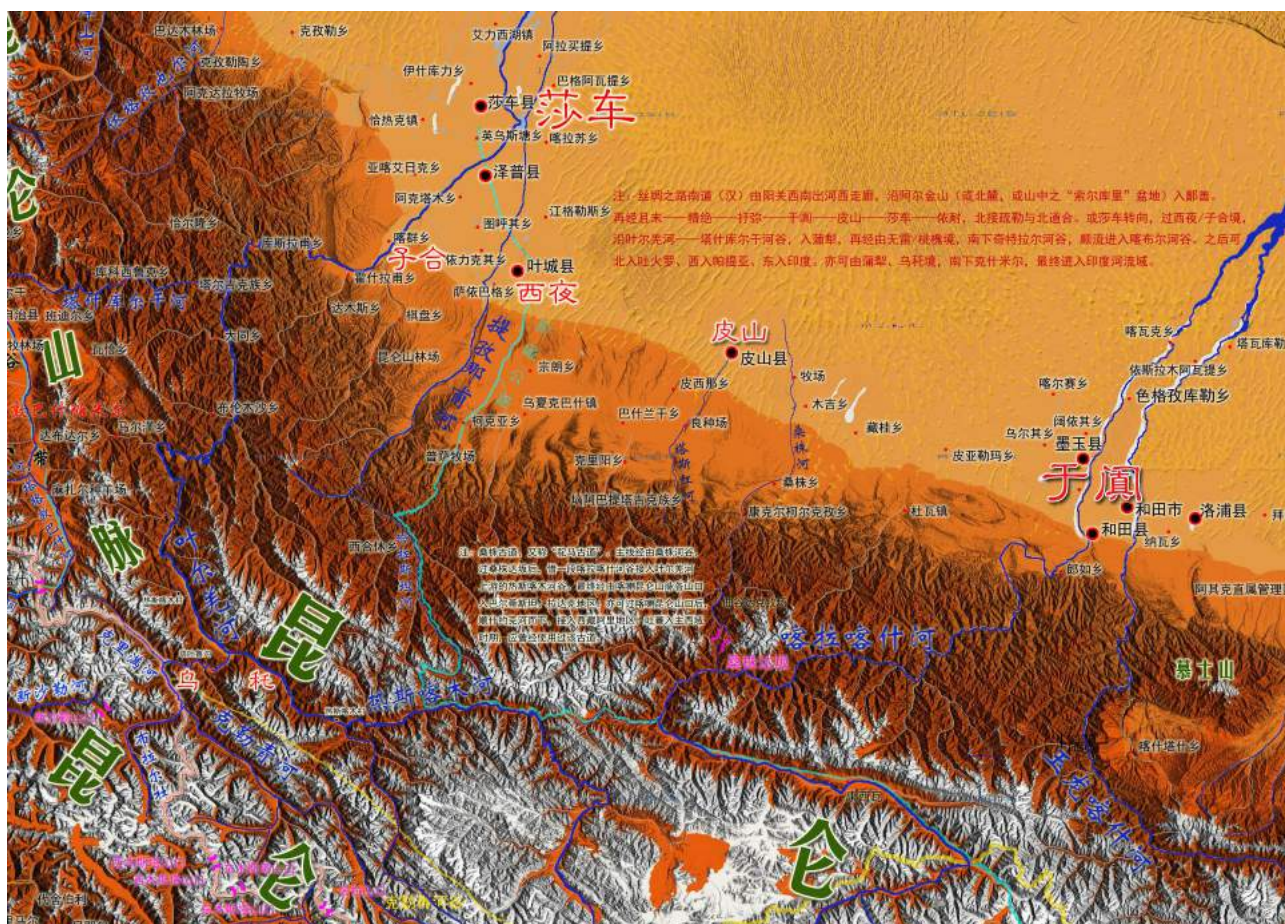
离开叶尔羌河之后，急于回国复命的张骞并不用走太远（约 80 多公里），就能够到达下一个补给点——皮山国了。今天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古国的大致位置也很容易。因为这又是一个在上世纪初，旧瓶装新酒建制的行政县（皮山县）。无论是二千多年前的皮山国，还是今天的皮山县，境内都没有拿得出手的河流经过。今天皮山县管辖区内，由西至东排列有五条稍具规模的河流，分别是：皮山河、塔斯洪河、桑株河、杜瓦河。这五条河流目前每年所能提供的地表水总量约为 7.5 亿立方米左右。相比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这些年径流量几十亿立方米的河流，皮山这五条河流所能滋养的绿洲面积，可见并不会太大。

这种由几条规模不大的河流，沿山麓东西纵横 100 公里上下，整合成一个虚线状聚落绿洲国家的情况，我们并不陌生。在塔里木盆地北部，孔雀河与阿克苏河这两条大河之间，乌垒国就曾经以相同的结构存在过。基于它的位置，这个国家的都城“轮台”，甚至成为了西域都护府的驻地。流淌在轮台故地和今天轮台县的九河河流，我们曾经打包命名为了“轮台九溪”。参照这个名字，同样也可以将皮山绿洲所涵盖的这五条小河称之为“皮山五溪”。对比淡水补给和绿洲面积的话，皮山绿洲只能说比轮台绿洲略强一点。在二千多年前，乌垒国的人口是 1200 人（不包括西域都护府直辖人口）；皮山国则是 3500 人。今天的话，生活在这两县的人口也只



是 12 万和 20 万的差别罢了。

总的来说，像乌垒和皮山这样小规模绿洲国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注定是没有办法成为主角的。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往来的旅行者缩短补给的周期。只不过，乌垒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命看起来比较好，由于位置处在丝路北线的入口处，又背靠汉帝国需要时刻提防的游牧区，成为了西域都护府的驻地。当然，对于乌垒人来说，这并不能算是一件幸事。毕竟乌垒是在李广利屠城灭国之后，才获得这个政治地位的。



汉西域全图

既然轮台绿洲有机会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地缘位置，那么皮山绿洲有没有可能，在地缘位置上发挥点特殊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让自己位置特殊一点的机会，在于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十字交叉的交通枢纽。即使不能达到这个完美状态，也要尽量成为一个“丁”字形交通网的节点。从地理结构和“皮山五溪”的水量上看，皮山绿洲想通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打通一条连接北线的交通线，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了。如果皮山人想让自己更受重视的话，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背后的青藏高原上了。

当皮山人把目光越过昆仑山脉，投向那片高寒之地时。眼前的景象应该会让



们大失所望。这片被我们划定为“藏北高原”的土地，总体上就是一片无人区。好消息就是，皮山人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像乌孙、匈奴那样强大的游牧政权从昆仑山下来袭击自己；而坏消息是，你同样也无法从这片无人区中获取额外的地缘利益了。

如果皮山绿洲一定想向南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就只能在穿透这片无人区之后，继续向南，看看藏北高原之南有没有机会出现。从今天的皮山县城向南拉一条直线，一路向南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条线所指向的，正是我们曾经花费不少笔墨解读的，能够将商旅带入拉达克、巴尔蒂斯坦、阿里高原的“喀喇昆仑山口”。假如从皮山出发的旅行者，能够寻得路径纵穿这片 300 公里的高寒之地，那么皮山的地缘地位就会提高一点了。



汉西域全图

不能将之看成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如此高寒缺氧的地方穿行，你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远远高于所能获得的商业利润。不过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这类沿途没有战略支撑的“小路”，也还是有其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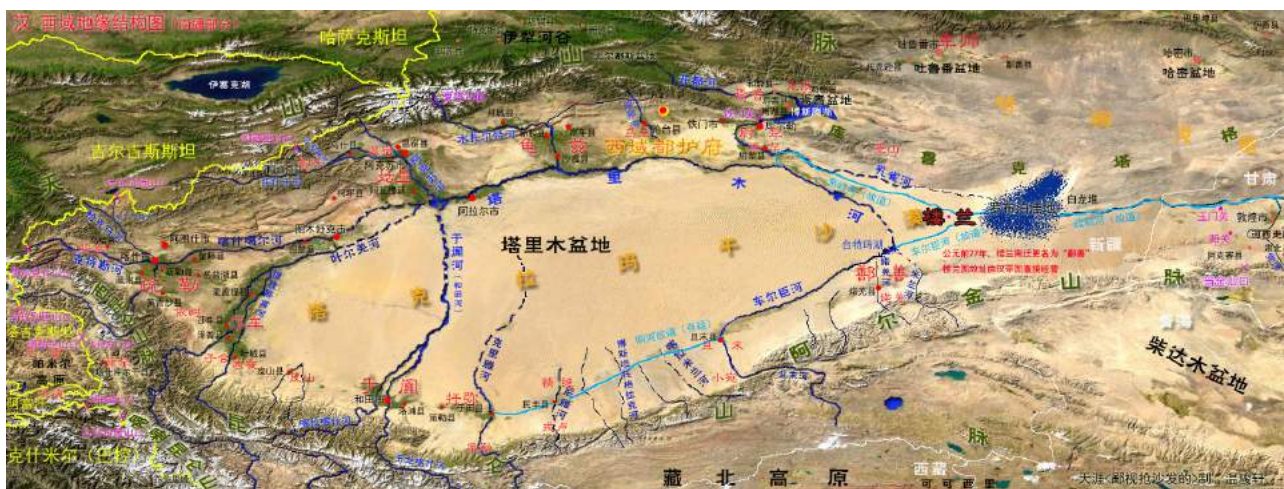
之所以现在不解读桑株道的走向，是因为桑株河所能开辟的天然道路仅仅是一

虽然穿越藏北高原，直达喀喇昆仑山口的费效比究竟是多少，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还有待商榷。但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这样一条连接皮山与喀喇昆仑山口的古道。帮助古道接近昆仑山分水岭的，是皮山五溪中的“桑株河”。而帮助旅行者翻越昆仑山脊的山口，也因此被称之为“桑株山口”。今天我们并不会详细解读桑株道的具体走向。事实上，这些穿越藏北高原腹地，进入克什米尔或者西藏的道路本身，并没有太大商业价值（所以



小段。最终它必须借助和田河上游河道之一的“喀拉喀什河”，才能够继续向南延伸。而提到喀拉喀什河以及它下游的“和田河”，于阗这个南线大国就将浮出水面了。相比拐弯抹角想升级为地缘枢纽的皮山绿洲。于阗所在的和田绿洲，却天然已经具备了南线枢纽的地位。

总的来说，丝绸之路南线的国家并没有北线强大。个中缘由相信大家也已经清楚了，毕竟相比南北都有高大山脉阻隔的昆仑山脉，天山能够给予的水资源要更多。基于这个原因，塔里木盆地北缘才会诞生出“龟兹”这样，人口八万的“超级大国”。至于南线，莎车这样一万六千人口的国家，已算是大国了。



汉西域地缘结构图（南疆部分）

不过莎车人要想统一丝绸之路南线，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方面是叶尔羌绿洲的位置太过偏西；另一方面则是在皮山之东还有一个人口与之相当的“大国”——于阗存在（人口一万九千三百人）。于阗能够成为南线大国，并不让人奇怪。我们一直说，塔里木河有四源。之前我们解读过的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已经分别对应了姑墨、疏勒、莎车三个人口两万上下的国家。作为四源当中位置最南的于阗河，自然也能在昆仑山前滋养出一片绿洲，成就一个“大国”了。

## 第二十三章 于阗河和克里雅河沿岸的国家

### 第一节 于阗国因边缘位置得以扩张势力

在我们粗解塔里木盆地时，于阗河的名字就已经出现过了，它今天的名字是“和田河”。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和田河所指向的昆仑山脉，以及产生于这条河之中的“和田玉”，都被“有机”的融入了华夏文化体系中了。当然，将于阗河作为黄河源头的说法，肯定是不足为信了。不过，这条发源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的河流，的确是有些神奇色彩的。因为它不仅在山前滋养了和田绿洲，还继续向北延伸了将近千里，穿越了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注入塔里木河。

很显然，任何试图在塔里木盆地有所作为的势力，都不会忽视这条天然连接塔里木盆南北两线的“绿色通道”的。今天的中央之国，不仅沿和田河走向铺设了贯穿大沙漠的217国道，更在和田河与塔里木河相交之处，建制了兵团城市——阿拉尔市。事实上，阿拉尔市并不止是和田河——塔里木河通道的交通枢纽，将视线移到它的北方，我们会看到阿克苏河也是在这个位置上注入塔里木河的。

阿克苏河——于阗河连通在一起，所打通的就不仅仅是纵贯塔里木盆地的交通线了。在解读阿克苏绿洲时我们发现，阿克苏河上游河谷是连通天山草原的最佳通道。也就是说，天山之上的乌孙人如果想在塔里木盆地扩充势力的话，这条绿色通道可以帮助他们渗透到塔里木盆地南线。只不过，由于更为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以及在西域步步为营的汉帝国存在，真正透过于阗河影响塔里木盆地地缘政治结构的，主要还是汉、匈两国了。

对比塔里木河源四国（姑墨、疏勒、莎车、于阗）的地缘潜力，姑墨其实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方面丝路北线的贸易量要比南线更大，身处北线枢纽点的姑墨在物流上获益的机会会更大；另一方面，姑墨也是四国之中唯一人口超过两万的国家（两万四）。然而任何优势都是比较而生的，姑墨的悲剧在于它的东侧，有一个绿洲面积更大的超级大国“龟兹”。而北部，又有仅次于匈奴的游牧大国“乌孙”。在这种情况下，姑墨能够在北线坐大的几率就很低了。

相比之下，于阗就要好命得多了。于阗河的存在，并没有让于阗国承受太大的压力，更多的是让他们多了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因为无论是在北线坐大的龟兹人，还是试图与汉帝国在西域争个高下的匈奴人，都很难通过于阗河千里奔袭于阗国。即使在军事上这样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存在，也会让这些入侵者倾向于，用间接控制（比如扶植一个亲己方的于阗王）的方法保持影响力。这就保证了于阗有机会在较少受到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在南线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于阗人的这一优势，在东汉时期终于得到了体现。在汉帝国因内乱暂时退出西



域之后，塔里木盆地国家被压制已久的战争冲动，终于得到了释放（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在这一轮兼并当中，于阗国可以说是获益最多的。不仅人口迅速膨胀到了八万之巨，更一度向两翼扩张，控制了从疏勒到精绝的塔里木盆地西南绿洲带（共计十三国）。总的来说，于阗国有机会在南线称霸一时，是因为于阗河的水量够大。不仅让它的绿洲能够压倒像皮山这样的小国，更能够打通一条直通北线的交通线。而于阗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水量穿透沙漠，则主要是因为它的集水区够大。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于阗河在上游有两源，即西侧的喀拉喀什河和东侧的玉龙喀什河。两河在昆仑山前的距离非常接近（当年的于阗国和现在的和田市，都是建制于两河之间的绿洲上）。

单从对下游地区的贡献来看，两条河流应该是不分伯仲的。它们每年都能分别为下游地区各输送 20 多亿立方米的融雪。正是在这种合力作用下，于阗河才能够在沙漠腹地打通一条生命走廊来。当然，如果从文化角度来看，玉龙喀什河的贡献应该更大些。因为收集昆仑山北坡之水的它，是和田玉（籽料）的主产区。正因为如此，玉龙喀什河才又被称之为“白玉河”。至于喀拉喀什河，则是以墨玉为主了（所以也称墨玉河或乌玉河）。

## 第二节 于阗与西藏及南亚交流的通道

尽管喀拉喀什河所出产的羊脂白玉数量较少，但它在提升和田绿洲地缘价值这件事上，所作出的贡献却要大得多。因为这条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北坡，穿透藏北高原西北部以及昆仑山脉的河流，能够帮助于阗人打通一条通往南方之路。那么这条南部交通线究竟能够为于阗国带来什么呢？很显然，从于阗及其周边国家直线向南的话，之前花了大把时间解析的克什米尔地区，以及西藏的阿里地区将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尽管一些历史研究者以及徒步旅行者，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在此寻找新的丝绸之路线路，但通过我们之前的分析，大家也应该明白了，这些所谓的“道路”并无法稳定的承担贸易功能，将它们归为丝绸之路的支线并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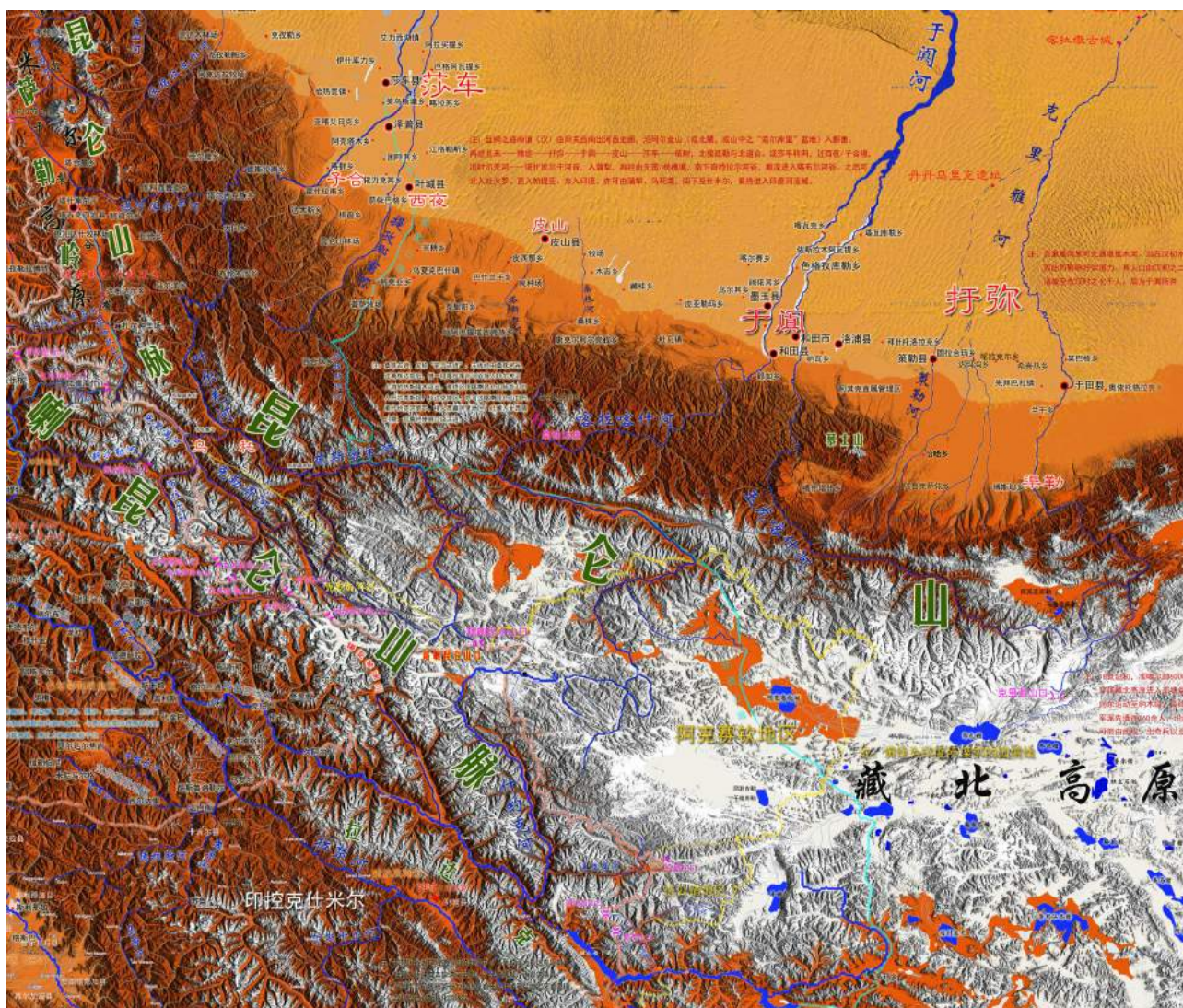
虽然开通这些道路并没有太大商业价值，但并不表示它们在历史上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对于那些虔诚的宗教传播者来说，这些通行之中的困难，会被视为修行中所必须承受的考验。事实上，在塔里木盆地与南亚、西藏的交流史中，很多被历史记录下来的通行案例，都带有宗教色彩。相比于商业往来，这些宗教、文化上的传播事件，对当地族群的影响力要深远得多（比如玄奘法师）。

在有关于阗人的历史记录中，有一种说法是他们源于阿育王时代的北印度（呾叉始罗国）。虽然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从考古发现来说，作为西域著名的佛国，于阗人所信奉的佛教，无疑带有浓厚的印度原生佛教色彩。如果于阗人或者来自印度的僧侣出于宗教传播上的需要，频繁穿行于几乎没有战略补给点的藏北高原，我



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如果从河谷的走向来看，喀拉喀什河算是叶尔羌河以东最接近喀喇昆仑山脉的河流了。它的源头直指今天中、印双国争夺的阿克赛钦西部。理论上，从于阗所处的和田绿洲，一路向南穿越昆仑山脉、阿克赛钦等地区，就能够无限接近喀喇昆仑山口以及其西侧的克勒青河谷了。至于旅行者接下来，是选择哪个山口进入包括拉达克在内的克什米尔地区，就要看此行的目的和诸道路的通行条件了。



汉西域全图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穿行，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其实是很难预先计划的，因为自然灾害可能会随时阻断向导为你设想的道路。在寒冷的冬季，穿越那些冰封的山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到了洪水时段，河水又会蓄满那些狭窄的河谷。即使避开了这些危险的季节，各种地质灾害依然会随时让你不得不改变前进的方向（比如今天如果我们去喀拉喀什河谷中考察，就可能经常会碰到从两侧山地掉下的落石）。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指南针（保证你没有走回头路）和足够的补给、畜力，让



你有时间在高山峡谷之中做选择题。

有鉴于此，尽管喀拉喀什河谷貌似是穿越昆仑山脉的最佳选择，并也一度成为了新藏公路的选项，但它并没有成为最终的选择（上世纪 90 年代，在昆仑山北坡修筑了水库，就更没这种可能了）。我们无法准确判断，2000 多年前的于阗人，通过喀拉喀什河谷获得了多少利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于阗人想稳定保有一条通往南方之路的话（而不是受制于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莎车”），仅仅困守于阗河流域是不够的。

向西吞并皮山这个绿洲小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近代，皮山绿洲所控制的桑株河谷，曾经一度成为了深入昆仑山脉的主通道。对于阗人来说，利好的消息是经由皮山国穿越桑株山口（达坂）的旅行者，最终会发现在山口北侧迎接他们的河谷，是能够把于阗人带上来的喀拉喀什河。从这个角度说，皮山绿洲与和田绿洲之间的地缘关系，要比它与叶尔羌绿洲的关系更为密切（尽管距离上，皮山与莎车更近一点）。

在东汉时期国力达到顶峰的于阗也的确吞并了皮山，于阗人甚至一度吞并了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莎车（之间莎车也曾经攻占过于阗）。这也意味着于阗国似乎控制了所有穿越昆仑——西昆仑山脉，进入克什米尔地区的入口。然而如果于阗人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西侧了。因为在和田绿洲的东侧，同样有一个在人口潜力与交通位置上，能够威胁到于阗的绿洲——克里雅绿洲。

### 第三节 克里雅绿洲的扞弥国衰落的原因

依照绿洲的命名原则，克里雅绿洲所指向的自然就是“克里雅河”了。在今天行政版图中，克里雅绿洲所指向的行政区，就是今天隶属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在二千多年前，汉帝国的使者在此发现的国家叫作“扞弥”（也称“拘弥”）。在汉书的记载中，这个绿洲国家的人口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两万四千人。而被我们视作南线国家主力的于阗国，人口也不到两万（一万九千三百人）。

依人口数量倒推绿洲面积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克里雅绿洲的面积应该超过和田绿洲（最起码是同一级别）。然而今天的于田绿洲，在体量上却完全无法与和田绿洲竞争。整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位于和田绿洲上的和田市（于田县受和田地区所辖）。事实上，于田之于和田的这种从属关系，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定型了。

事实上，在中央之国记录下来的西域历史中，扞弥国一直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在史书当中的。为了帮助这个后来被于阗吞并的国家复国，东汉帝国甚至发动了两场战争。对比扞弥——于阗两国在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唯一能够解释这点的，就是扞弥国因为某种原因迅速衰弱了。

这种衰弱并不应该是因为战争而起的，因为即使扞弥国因为外力而灭国，但只要这片土地还在，很快就会以其为基础出现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并重新出现在地缘

政治舞台上的。这就好像中央之国在古典时期一直会周期性出现王朝更迭，但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板块，中央之国在东亚一家独大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没有被削弱过一样。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克里雅绿洲在西域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没落。唯一能够解释这点的，就是整个绿洲的地理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

在环境恶劣的塔里木盆地，完全依赖高山雪水补给的绿洲，因河流改道一类的原因影响到“国家”命运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内容中，神秘消失的楼兰古国就是典型案例。相比身处罗布泊西岸，完全依靠千里之外补水的楼兰，与集水山地位置接近的克里雅绿洲要幸运得多。最起码我们现在，依旧能够在此看到绿洲的存在。也就是说，克里雅绿洲是萎缩而不是消亡了。



汉西域全图

在张骞回程路过扞弥国时，这个绿洲应该正处于它的鼎盛时期。只不过很快，准备经营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汉帝国，就将亲眼见证这个绿洲的衰败了。在后汉书中，以“拘弥”之名被记录下来的克里雅绿洲，人口锐减至了七千余人。而在于阗两灭其国之后，再次复立的拘弥国就只剩下一千人了。那么，扞弥国的衰弱是否是因为克里雅河的改道，或者水量变小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所谓的“克里雅绿洲”并非仅仅指向今天的克里雅河冲积扇。而扞弥国的地望，也并不能简单对应在今天的于田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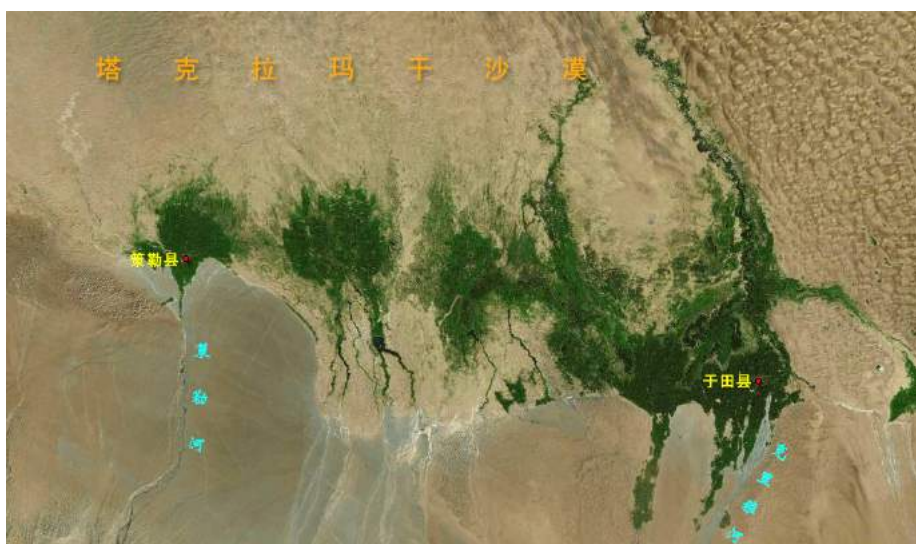
应该已经有朋友注意到了，在和田和于田的中间，还建制有一个行政区——策勒县。在谷歌地图上，这个县级行政区看起来就像是在沙漠之中崛起的一座城市。



你只有把地图放大到可以看见乡镇级别行政区的程度，才勉强可以看见一条叫做“策勒河”的河流纵穿策勒县城。当然，要是再实地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起码在洪水季节，策勒的土地上会出现八到九条河流的痕迹。

总的来说，策勒绿洲是一个没有大河支撑的绿洲。能够常年保证下游有水的河流，只有策勒河和它东侧的奴尔河。所有的河流全年加在一起，所能提供的地表水资源也不到6亿立方米。并不是说这种数量级的水资源保有量的绿洲就不能进入地缘政治舞台了，在之前的内容中也出现过轮台、皮山绿洲这样的案例。只是参照对那两块绿洲的定义，策勒绿洲的这几条河流在级别上定位为溪流会比较合适。

讨论策勒绿洲的这几条地表水到底是应该被定位为河流还是溪流，以及它们应该被统称为“策勒八溪”还是“策勒九溪”，并没有什么意义。将它们呈现出来的目的，是让大家明白这块绿洲是多么的脆弱。如果你有机会从空中俯视策勒绿洲的话，一定会担心它随时有可能被沙漠所吞噬。事实上，策勒绿洲也的确是中国沙漠化风险最高的地区，仅策勒县城就曾经被迫搬迁过三次。



策勒绿洲和克里雅绿洲卫星图

虽然策勒的情况那么不尽如人意，但比起塔里木盆地腹地那些几无人烟的沙漠地带，总还是有机会从昆仑山北坡得到些雨雪资源的，因此这块绿洲应该并不会消失。而鉴于它的位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能够从往来东西的物流通道中，得到一些额外的补给。既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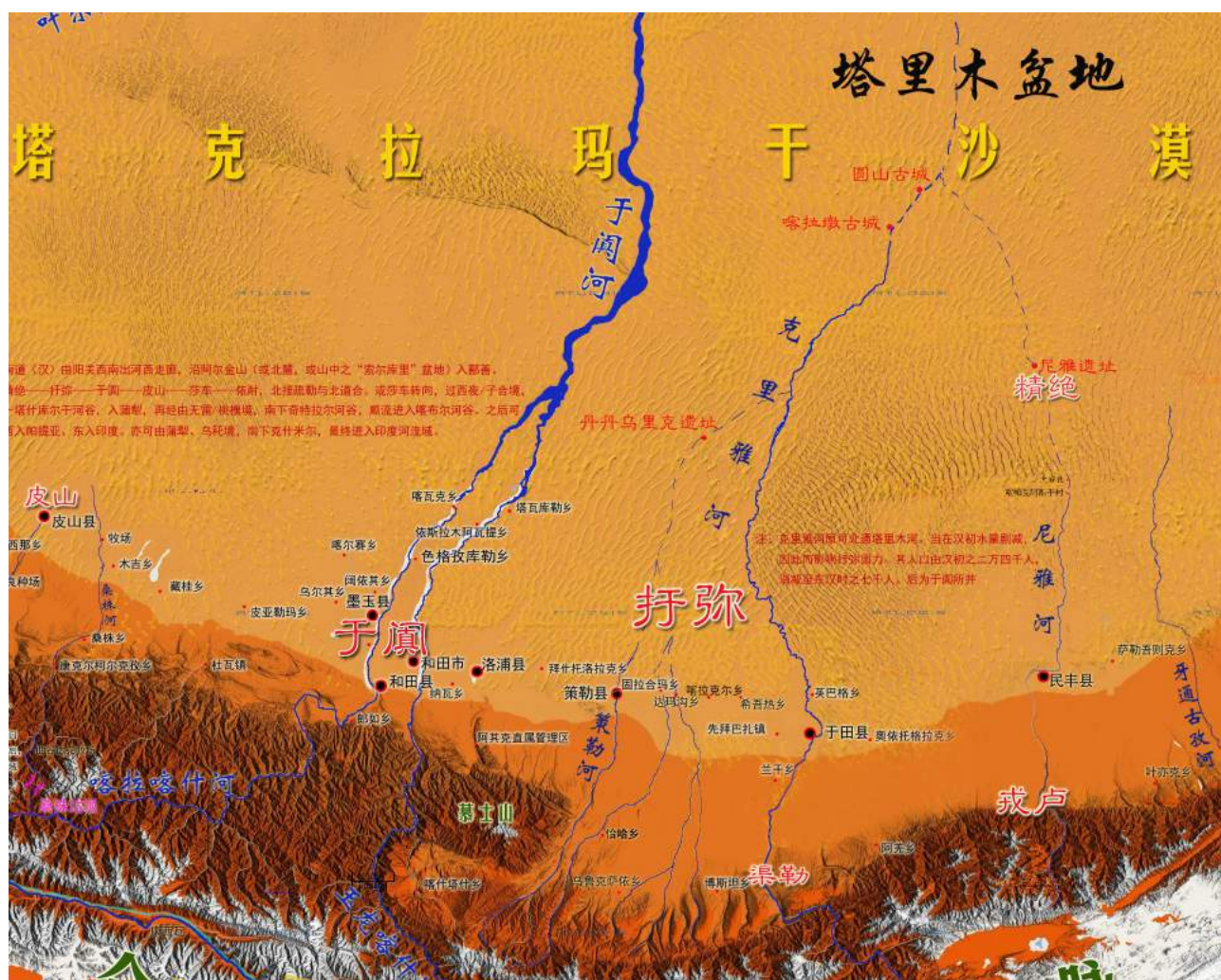
绿洲体量相当的皮山、轮台两县，在两千多年前都曾经支撑过一个人口过千的绿洲小国，那么今天谋得同样行政级别的策勒绿洲，在当时被汉帝国的使者们甄别出了什么国家呢？其实这个国家在我们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它就是——扞弥国。

这也就是说，弥弥国所指向的绿洲，并非仅仅是今天于田所在的克里雅河两岸，而是包括从策勒河西到克里雅河东，东西纵横约110公里的区域。然而这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的扞弥国曾经一度拥有压倒于阗国的人口。要知道，今天的皮山绿洲东西连线也有100公里。真正决定一片绿洲人口潜力的，还是在于它的地表水资源。

今天的克里雅河年平均径流量并不比策勒河多多少（也就7亿多立方米），它能够比策勒绿洲上的那些河流更多出现在地图上，只是因为它的水量集中汇入了一



条河。然而时光仅仅倒退 100 年，克里雅河的水量也比今天多出 2 倍以上，河流的长度也要多出 100 多公里。这意味着，今天包括策勒河、克里雅河在内的河流，最起码在近现代出现了萎缩状况。尽管很多人将西域河水量减少的矛头指向人类的过度开发，但这种说法并无法解释，二千多年前的扞弥国和克里雅绿洲为什么迅速衰弱了（而同时期其他绿洲，并没有出现那么显著的变化）。唯一可能合理的解释，就是克里雅河及其附近河流的集水区，在自然条件上出现了些许变化。



汉西域全图

假如策勒河——克里雅河一带的河流，在二千年前的流量要远大于今天，那么按照它们今天的走向，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些河流在昆仑山北麓冲积成了一片，东西纵深超过百公里的连片冲积扇形绿洲（而不是像皮山绿洲那样呈点状分布）。基于克里雅河在这些河流中的比较优势，我们依然应该将整个水系标注为“克里雅”。也就是说，当年张骞曾经路过的扞弥国，所指向的将是包含策勒、于田两县的绿洲。而克里雅绿洲范围，也应该扩张至整个策勒境内的河流。

这样一个绿洲，在流域面积上已经完全可以媲美和田绿洲的体量了。我们不能



确定的是，二千多年前的克里雅河在水量上是否能够超过于阗河。不过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表明，二者完全可以被视为同级别的竞争对手。因为那时的克里雅河也曾经像于阗河一样，向北接入塔里木河。如果克里雅河的水量远大于今天，又能够得到策勒境内河流的支援，那么西汉时期的克里雅河流得比今天远，是符合逻辑的。克里雅河应该是完全独立注入塔里木河的，它最终注入塔里木河的位置，是在阿克苏、渭干河绿洲之间（所以扞弥国才会“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

考证克里雅河下游故道走向应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毕竟这一地区已经是黄沙漫漫了。即使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克里雅河下游，也经常会小范围改变自己的河道。事实上，当年扞弥国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并不在克里雅河两岸，而是在今天的策勒境内（有诸如达玛沟等大批遗址）。考虑到水量越大的河流越有可能变化无常，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通常情况下，在没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要求地质学家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沙漠腹地考察那些曾经的河道。不过，如果这些河道能够帮助定位那些留有丰富文物的遗址，就另当别论了。只是我个人而言，希望对这种因果关系感兴趣的，不要包含那“盗墓”这个古老行业的从业者。



克里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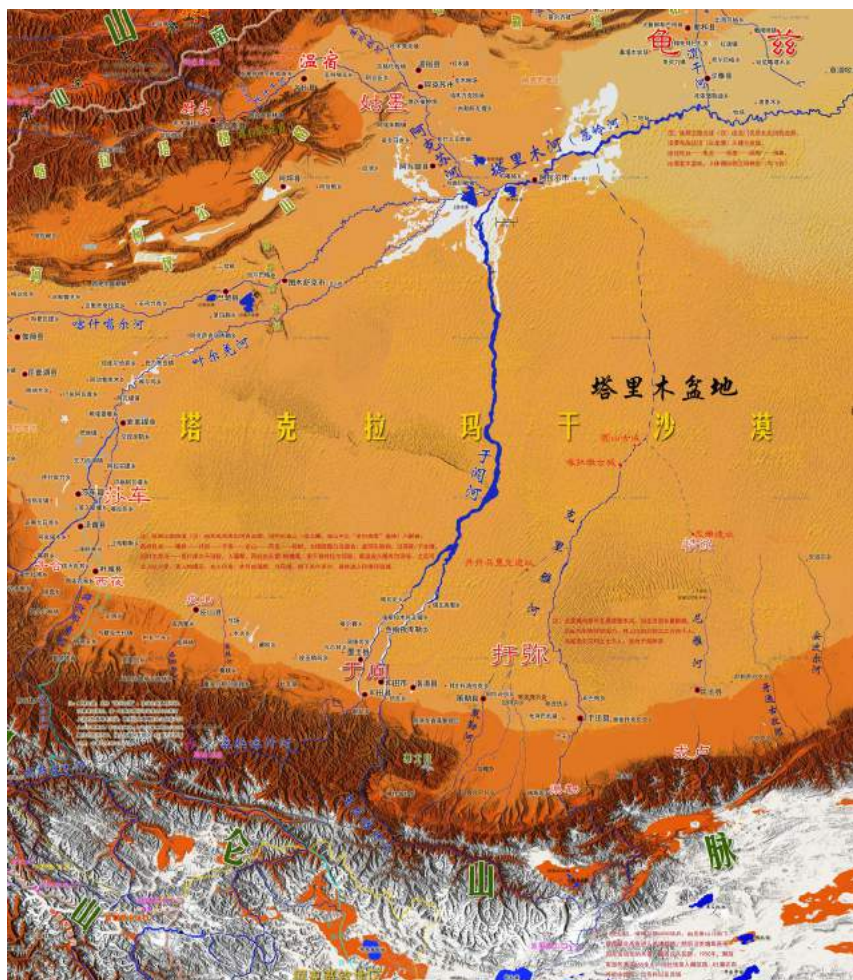
圆沙古城遗址

绝大多数时候，盗墓者会比考古工作者更早出现在要那些古代遗迹上（基于两个职业的出现时间，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考古工作者在这方面的无奈）。不过克里雅河下游的圆沙古城是个例外，遵循上述因果关系的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今天仍可识别的克里雅河尾闾三角洲地带，发现了沙漠遗址。而它的位置已经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将近 300 公里，几乎就是今天塔里木河水系的中点。

如果没有了解克里雅河以及克里雅绿洲的前世今生，相信大家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会有这么一座城（不光是军事意义上的据点，还是一个有居民居住和灌溉农业的定居点）。而当我们知晓了扞弥国曾经的规模，以及克里雅河曾经对接塔里木河的经历之后，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了。对于试图从沟通北线中获取

额外地缘利益的扞弥人来说，在如此漫长的交通线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有自给能力的战略补给点，维护起来将会轻松得多。

圆沙古城的发现，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收获，那就是其中所发现的人类 DNA 显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欧洲。这似乎也能够为我们解开扞弥国甚至整个南线绿洲国家，在两千年前的种族问题。事实上，圆沙古城的发现也能够帮助我们佐证扞弥国的衰弱时间。因为这个兴盛于两千年前的古城内，没有发现任何汉帝国的影子。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西域前夜，这个曾经拥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古城就已经被扞弥人放弃。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克里雅水系的流量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明显变化，以至于在汉帝国开始经营西域后不久，便无法支撑其南线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了。



汉西域全图

水。相比之下，喀喇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集水区就要深入昆仑山脉腹地更深了，其中喀喇喀什河甚至把源头都甩向了喀喇昆仑山脉。

如果这段冰川资源丰富的山体北坡（或者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年平均气温出现了些许变化，那么克里雅绿洲受到的影响，就可能远大于和田绿洲了。顺着这个思路再往下推论，那条存疑的塔里木河“南河”的存在与消亡，也很可能与昆仑山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包括策勒等河流在内的克里雅河水系锐减了呢？可以肯定的是，这应该是自然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人类过度开发的原因。从集水区的角度来说，从喀喇喀什河到克里雅河一带的昆仑山体，是昆仑山脉中淡水保有量最大的部分。整个昆仑山脉中承担蓄水功能的冰川，有 75% 集中于此。相比于阆河水系，克里雅河水系的集水区在区位上有些单一（包括策勒等河流）。除了克里雅河以外，其他现在和原本汇入克里雅河的河流，都是从昆仑山脉北坡集



坡融雪量的变化有着一定联系。当塔里木盆地南沿诸河流量都比现在有明显提升的话，它们在低地漫流并开拓新河道的可能性也要大于今天。如果这些河道在某一时期连成一线，并将南线所收集到的淡水自行向东送入罗布泊洼地，并非没有可能。克里雅水系与塔里木水系的变迁问题，还有待专业人士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就克里雅这条河流所能承载的地缘信息来说，它的故事仍然还没有结束。

#### 第四节 克里雅绿洲经克里雅山口入藏

穿昆仑山而过的克里雅河，并没有像喀拉喀什河那样将源头指向喀喇昆仑山北麓。其实从方位上看，克里雅河即使再向南延伸，也已经与喀喇昆仑山无关了。如果从克里雅河在山南的源头拉一条直线向南穿越藏北高原的话，它所能碰到的下一个高大山脉应该是冈底斯山脉了。而顺着这条直线再往下划的话，圣湖玛旁雍错就将出现在连线的另一端。

克里雅河及其南部地区的地理结构，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果一定要选择克里雅河谷进入青藏高原的话，那么最终目的地只能是阿里高原及其所属的西藏地区。假如你的目标是克什米尔和其南部的印度河平原的话，就没有必要在高寒缺氧的藏北高原多耗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了（选择桑株道的话，在藏北高原的路程要少一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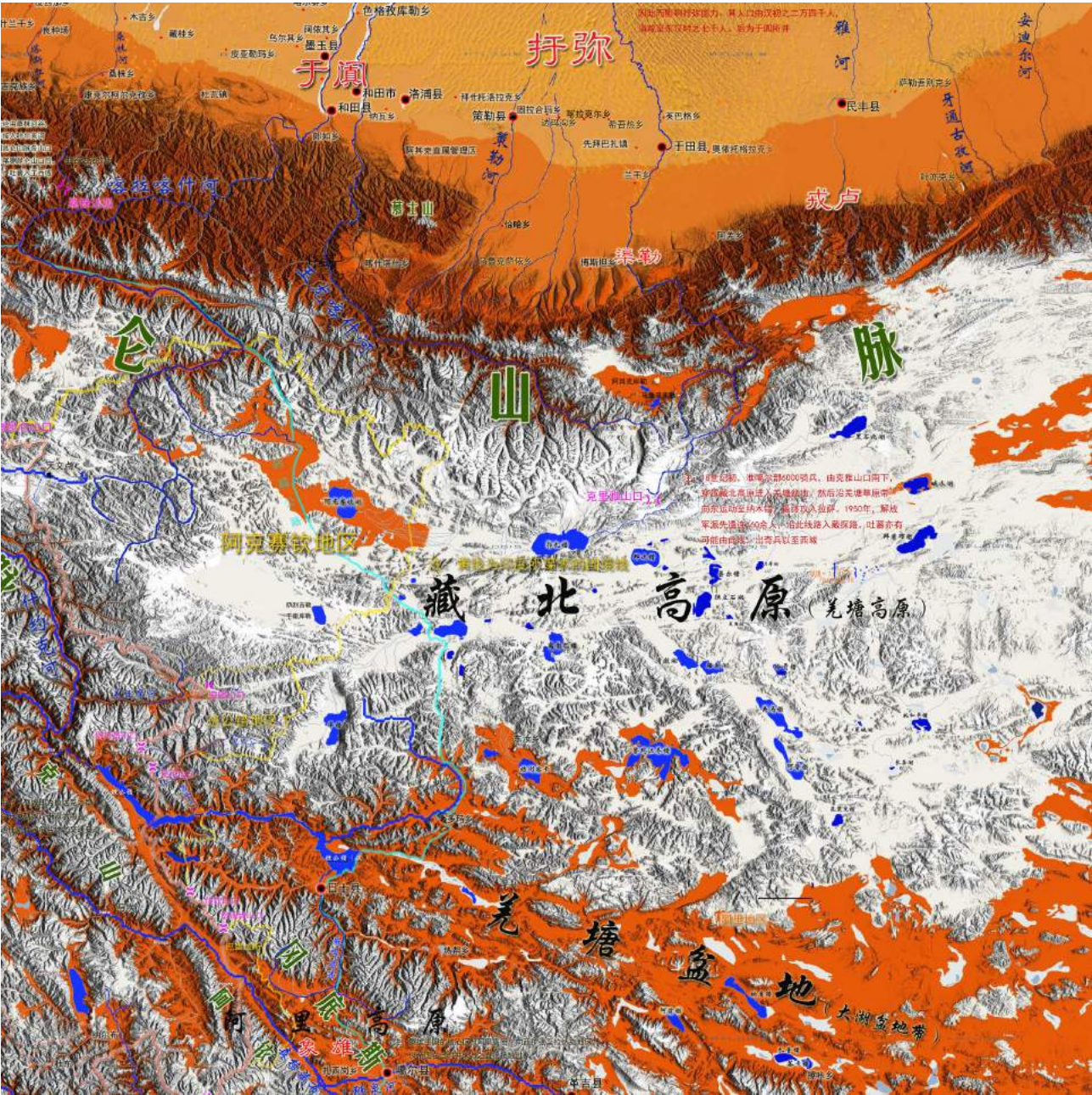
任何在行政地图上所划出的直线穿越方案，都只是理论上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下一个补给点的位置，才是路线的决定性因素。从阿里板块的地缘结构来看，其位置最贴近藏北高原的，有农业基础的人类聚落区，就是位于藏北高原之南，大湖盆地带（羌塘盆地）西端的“班公错”湖区了。建制于班公错东南部的行政区，就是阿里三围中的“日土县”了。从行政角度看，从于田出发准备进入卫藏地区的旅行者，将要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进入日土。然后在稍作休整之后穿越或者绕过冈底斯山脉进入狮泉河谷，最终在玛旁雍错之东接入雅鲁藏布江河谷。

总的来说，这条线路与我们理论上连接克里雅河源——玛旁雍错的那条直线相比，是向西绕了一条折线。问题在于，虽然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它们之间的直线。但克里雅河与班公错湖之间的连线，显然要比这条直线穿越藏北高原的理想线路，更容易让人摆脱藏北高原的恶梦。在克里雅河与班公错湖间的连线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应该是克里雅河源之南的“克里雅山口”了。山口南面所指向的是藏北高原那些由一个个盐湖所组成的内流区。具体的说，翻越克里雅山口之后的我们会向西南方向从两个盐湖：邦达错和郭达错之间穿过，然后再寻路切入班公错湖东。

就这条线路来说，翻越山口已经不是最大的障碍了。因为有了藏北高原这个底座，那些在高原上凸起的山地，相对高度反而并不算太高了。身处其中的话，我们甚至



很难准确定位，包括克里雅山口在内的诸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藏北高原之旅会变得更轻松。因为比起这些可以用脚克服的障碍，高原反应和变化无常的天气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更何况沿途根本没有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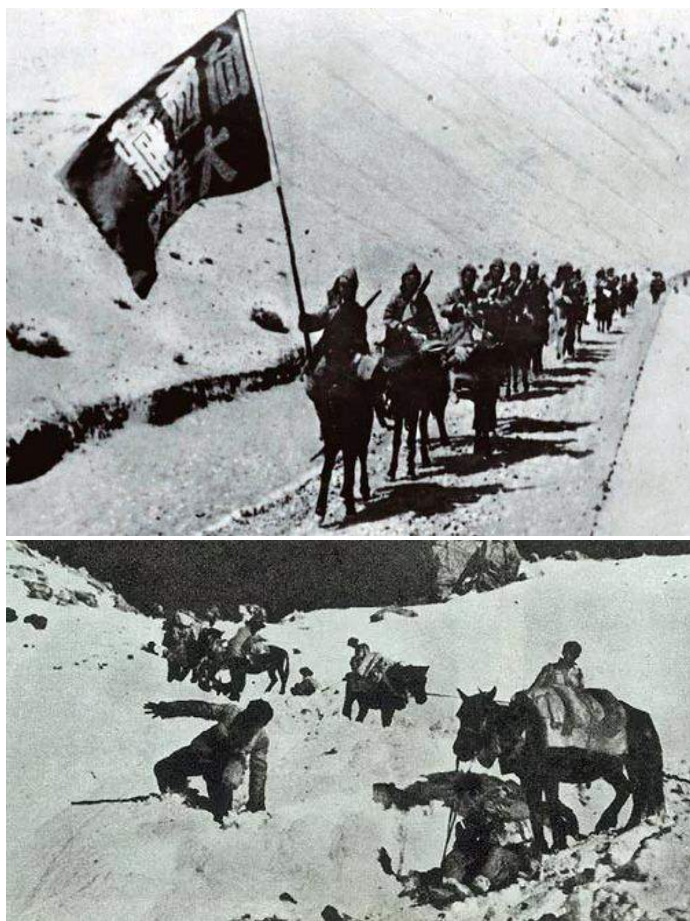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由于包括阿里、卫藏在内的西藏地区，在二千多年前并没有与中央之国发生地缘联系，所以从南疆直通阿里的克里雅古道并没有进入汉帝国的视线。不过在中央之国第二帝国时代，崛起的吐蕃人应该就很有机会通过克里雅山口向驻守南疆的唐军发动奇袭了。鉴于双方对高原适应性上的差异，唐军却基本不可能透过藏北高原威胁到吐蕃。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即使是最适应高原的土著，也不可能在藏北



高原经营一条战略通道。这些古道至多能起到的，只是支撑一两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在近现代，克里雅山口曾经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只不过，这两次军事行动却都是由低地向高地的逆袭。最近的那次，就是 1950 年代表红色中国最先踏上西藏土地的那支“进藏英雄先遣连”。然而带着探路目的的他们，在翻越克里雅山口之后，并没有向西南方向直切到班公错湖区，而是偏东南方面进入了羌塘盆地的西段腹地（今改则县境内，其驻地今名“先遣乡”）。问题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片游牧之地并无法真正成为前进基地。因此在其后不久，西进日土地区以及阿里高原那几条圣洁的河谷，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好在此时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已经签署）。



进藏英雄先遣连

相比那支主要由低地农民所组成的红色先遣部队，准噶尔人在 18 世纪初透过克里雅山口，向卫藏地区发起的那一次攻击就要顺利得多了。蒙古人的这一次攻击，事实上也没有遵循我们前面所规划的“合理”路线，先行抢占日土（班公错）这个桥头堡。而是像先遣连一样，直插羌塘盆地腹地。不过，进入草原地带的他们并没有向西移动至班公错湖区。准噶尔人选择的是转而向东移动，在对手还未反应过来时，6000 骑兵便出现在了纳木错湖畔。

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有资本这样做。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北的“大湖盆地”整体上是西藏的游牧区。尤其是纳木错东北可以从横断山脉接收印度洋水汽的那曲一带，更是羌塘草原的精华所在。

相比从班公错湖起，一步步沿狮泉河——雅鲁雅布江，一步步向拉萨攻击前进。拥有强大机动能力，对草原环境更有控制力的准噶尔人，显然更愿意快速通过大湖盆地，以羌塘草原为前进基地。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够就地获取补给，更能马上切入近在咫尺的拉萨河谷（反过来，当年吐蕃的游牧骑兵也可遵循相同路线进入塔里木盆地）。

事实上，当年对藏北高原以南地缘结构几乎一无所知的红色军队，之所以会错误的选择先切入羌塘草原腹地（而不是进入班公错湖区）就是受了准噶尔人的误导。

问题在于，他们在从南疆土著那里得知蒙古人曾经的进藏路线之时，却忘记了自己并不具备游牧民族那种对恶劣环境、草原地带的适应性。在后来的探路过程中，阿里高原终于成为了一切穿越藏北高原路线的终点。在经过多次试错，付出极大代价后，今天这条通过叶尔羌河右岸支流——提孜那甫河（上游哈拉斯坦河谷）进入藏北高原，并最终透过阿克赛钦地区进入阿里高原的“新藏公路”得以修筑成功。



克里雅古道

不过，在未来的日子里，克里雅山口还是有可能真正成为连通南疆与西藏的地缘枢纽。因为在中国 2008 年调整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研究建设和田—狮泉河—日喀则线”被明确列入了远期计划当中。结合这条铁路将向西对接喀什——乌鲁木齐这条北线铁路线的情况来看，克里雅山口将很有可能成为铁路进藏的选择（如果在皮山的桑株山口就进藏了，那和田市就会被无视了，这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是很难被接受的）。当然，如果综合考虑到向边境地区战略投送这个问题的话，在和田以西进藏，采取与新藏公路接近的路线，沿着与喀喇昆仑山平行的线路接入阿里高原，也许会更为合理。至于说最终的

新藏铁路会采取什么样的进藏路线，还要有待相关部门的综合考量了。基于南疆——西藏之间的交通问题对今天中央之国的西部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在汉帝国并没有能力渗透于此的情况下，我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这片屋脊之地上。而现在，是时候回到昆仑山北麓，去继续我们的张骞回家之路了。

在张骞循南线回国复命的时候，克里雅绿洲的扞弥国肯定是他的必经之地。然而扞弥国却并非是克里雅河流域唯一的“国家”。在它的南部，山地平原交接之处，还有一个人口两千一百多的小国——渠勒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鲜见，那些占据了大块绿洲的国家，并不一定就能控制上游地区那些地势更高的土地。比较不能确定的是，渠勒国到底已经成为了一个农业国家，还是一个像西夜、子合那样，生存于绿洲外围的游牧国家（尤其是那些有通行价值的河谷）。从这个国家有一座城“鞬都城”的情况来看，渠勒人最起码在汉使前来考察之时，已经部分适应了定居生活。不过有一点倒是能够确定，那就是靠近昆仑山脉生活的渠勒国，并不处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上。在扞弥之后，下一个能够从丝绸之路直接获益的国家，将是一个非常神秘而又特殊的国家——精绝。



## 第二十四章 尼雅河流域沿岸的西域国家

### 第一节 戎卢国和精绝国分据尼雅河上下游

在西域诸国中，精绝国的神秘度应该算是仅次于楼兰了。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神秘，并非是因为它们完全被历史所湮没。恰恰相反，它们之所以引发世人的关注，是缘于两国都有相对完整的遗迹留存到现在。楼兰、精绝两国之所以能够为我们留下大量遗迹，完全是因为它们很早就被沙漠所覆盖。而那些一直以绿洲形态存续到现在的土地，在人类的反复利用下，能够保留下来的信息就要少得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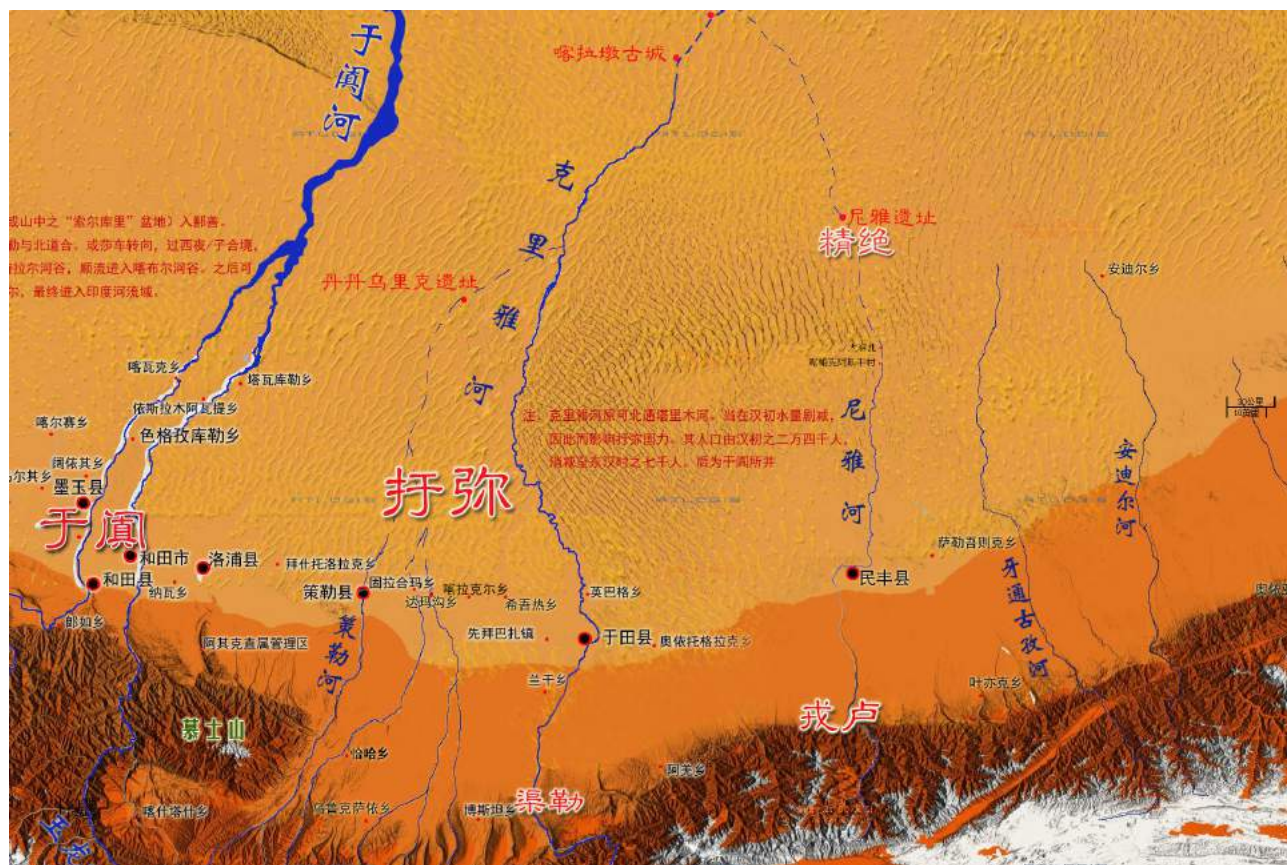
在水就是生命的西域，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要对应一条以上的河流，尤其是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定居国家。精绝国也不例外，它所对应的这条河流，今天被称之为“尼雅河”。而精绝遗址也因此被称之为“尼雅遗址”。在这片遗址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那个带有谶纬意味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了。今天在尼雅河流域所建制的行政区叫做“民丰县”。从汉字的本意来看，这个 1945 年建制，取意“人民丰盈”的行政区，无疑是讨了一个好彩头。不过当时没能像皮山、轮台等县那样复制西域古国名，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要是那样的话，现在应该对发展旅游业会更为有利。

未能用“精绝”二字为县名的理由，也许是因为那个“绝”字，毕竟这个字在汉语中的寓意不太好（尤其还跟“精”字连用）。当然，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叫什么标签都不重要了。我们知道民丰、尼雅、精绝这些标签，所指向的是同一地缘板块就行了。不过，一定要从地缘角度严格区分这几个标签的范围的话，它们所指向的板块位置还是有所区别的。简单点说，今天民丰所经营的绿洲，并不是精绝国所经营的绿洲。也不仅仅是尼雅河绿洲。

今天的民丰绿洲，与塔里木盆地中大部分绿洲的位置一样，处于“山前平原”之上。而精绝人所经营的绿洲，却是在尼雅河的尾闾三角洲地带。如果不去探究它与河流之间的关系，单纯在地图上定位的话。估计很难会有人相信，在如此深入沙漠的地方，曾经拥有一片繁荣的绿洲（不过谷歌、百度上搜索“尼雅遗址”的话，会给出一个错误的定位）。

在东亚，河流末端的三角洲地带往往是拥有最高农耕潜力的肥美之地。遇到更大河流或者海洋阻力的河流在流速减慢之时，总是能够用上游带下来的泥土冲积出一片水网纵横的扇形平原来。然而对于临近沙漠地带的河流来说，这种情况却不多见。鉴于沙漠地带强大的渗透性，大多数河流只是默默无闻的湮没于黄沙之中。只是凡事都有例外，在之前的章节中，河西走廊位于额尔济纳河末端的“居延海”绿洲；以及阿姆河下游三角洲的花刺子模，就是典型案例。271

对于一条穿行于沙漠中的河流来说，如果想在沙漠之中滋养出一片三角洲形态的绿洲来，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河流的这个归宿或者中继点，多少得比周边低一点。不管你的形态是一个深盆，还是一个浅的不能再浅的碟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水流慢下来，并开始横向发展出天然绿洲来；第二个条件是，必须得有渗透性较差的黄土层做底。这样的话，水既不容易渗透掉，也有了植被生长所必需的土壤。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有较大的水量，以帮助你在被炙热的阳光蒸发干净之前，找到合适的归宿点打造终极三角洲平原了。



汉西域全图

这三个条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水量了。水量够大的话，即使下游条件再差，河流也能年复一年的把上游的黄土搬运进沙漠，自然铺就在河道上。直到它找到一个相对低地作为最终的归宿。比如曾经跨越整个塔里木盆地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它当年的这次成功穿越，就造就了楼兰这个与精绝齐名的神秘古国。

相比在终端造湖，并在临湖河口处打造三角洲平原的阿姆河、塔里木河，今天年均径流量不到三亿立方米，在塔里木盆地诸河中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位的尼雅河，对结果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它当年应该只是在沙漠深处找到了一片相对低地，并最终运土、漫流成为了一小片东西纵深不算太宽的，植被丰茂的沼泽之地。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精绝人选择了在深入沙漠腹地的尾间



绿洲生存，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位于山前平原处在下游中段的民丰绿洲呢？要知道，从打通东西商道和规避沙漠影响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绿洲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要小于精绝人的选择。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与外界沟通，并借此而谋求发展的机会，生存下来（直白一点就是“活下去”），永远才是人类的第一需求。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在一些闭塞的深山、原始森林中，找到与世隔绝，自给自足而生的村落。即使是在塔里木盆地被认为已经成为生命禁区的罗布泊地区，在上世纪初还有些许多的时候，也还存在一些基本与世隔绝的“罗布人”。

如果让当年迁移到尼雅河流域的那些精绝国先人来选择生存之地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整个流域中，水、土状况最好的地方作为栖息地。至于这个地理单元是否更有利于与外界沟通，并不会是最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尼雅河末端天然形成的这片沼泽之地，将会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它的四周都被黄沙所包围，但更上游一点的地方，条件也不会好到哪去（黄沙会少点）。



尼雅遗址

在自然选择的情况下，像利用尼雅河末端天然绿洲作为最初聚落区的情况，在塔里木盆地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情况。包括克里雅河断流之后，在沙漠腹地的最终归宿地也都发现有了不少遗址。如果有一天，有人以卫星遥感地图为依据，沿着塔里木盆地中某条河流的故道前行，在更深的沙漠之处找到年代更为久远的人类遗址，大家也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惊讶。塔里木盆地的这种选择，与我们在东亚的经验正好相反。在洪水泛滥的东亚上古时期，靠近山地的相对高地，总是更容易先聚落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族的。当然，这也并不表示在塔里木盆地这些山地、平原交汇之处，就没有被人类自然选择的价值了。只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拥有更为复杂气候环境的地区（可以孕育生长于

不同季节的草场）会更容易成为游牧部落的选择。

在汉帝国的版图上，尼雅河在这个位置上也孕育出了一个“国家”——戎卢。

这个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小国，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并不重要。与克里雅河的渠勒一样，只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擦肩而过的游牧小国罢了（或半农半牧）。比较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戎”字的使用。在华夏文明的“华夷五方”结构中，那些被归入西戎范畴的族群，通常都与源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在族源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让这个西域小国打上“戎”的标记，说明戎卢人在汉帝国使者的眼中，应该最起码具有相似的种族特征了。

这也验证了我们之前曾经作出过的推论，那就是丝绸之路南线的绿洲，最先是被那些从欧洲——中亚方向而来的高加索人种后裔所开发。而从黄土高原渗透而来的被标贴上羌、戎等标签的黄种游牧部落，则占据了昆仑山一线的山地草场。由于两大体系在种族、文化、生产方式之间的明显差异，所以在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地区，并没有自然融合成为一个国家或者部落联盟。

## 第二节 精绝国因尼雅河下游水量变少而消失

既然在汉帝国扩张至西域之时，尼雅河流域的聚落区分布于河流的两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的民丰绿洲呢？而精绝国最终又是怎么消失掉的呢？

让塔里木盆地绿洲带渐渐向山前靠近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扩张至此的华夏文明。这个在亚洲东部已经经营了二千多年农业的古老文明，为西域带去了新的农业技术，开发了更大规模的人工绿洲。在张骞到来之时，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土著们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择水而生。即选择一块水流平缓，面积较大的天然绿洲，然后挖掘简易的沟渠，引水以灌溉有限的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河流末端的三角洲也就成为了人类栖息地的优先选择。而大多数地缘板块的绿洲，也因此呈线性排列状（沿河分布）。

当汉帝国开拓至此之后，塔里木盆地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在山前平原筑坝拦水，让河水横向漫流（与此同时，挖通更为复杂的引水灌溉系统），以形成更大面积的灌溉区，成为了帝国输出给西域土著的先进技术。当然，帝国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因为有着无私奉献的白求恩精神，而是因为经营西域的需要。

在中国传统的“耕战”模式中，如果一片土地不能够在粮食上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它将很难避免被中央之国所抛弃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块土地是否能够屯田以养兵，成为了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以汉帝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来看，西域这种择水而生的自然状态，显然浪费了大量的水土资源。而这也正是帝国入主西域所需要的空间。

尽管汉帝国的到来严重影响了西域绿洲原本的生存状态，但对于西域那些绿洲城国来说，并不算是坏事。因为这些从东方输入的农业人口并不是在跟他们争抢原有的蛋糕，而是在把蛋糕做大。正因为如此，帝国在西域的屯垦工作并没有遇到阻力。



相反，在看到新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之后，还有不少国家主动邀请汉军前去屯垦。

在河流下游地区拦河筑坝，并非是中央之国用以扩张西域绿洲形态的唯一手段。这些从大禹时代就已经开始熟练掌握治水技术的“汉人”，甚至可以直接从河流出山的谷口引水，直接将水引向待开发的土地。如果让那些绿色环保组织穿越回两千年前，他们一定会痛斥“汉人”这种破坏原有生态平衡的做法，然而这种改变对挖掘塔里木盆地人口潜力上的贡献是巨大的。统计之后我们会发现，塔里木盆地诸国的人口在西汉时期总计也不过 20 万出头。而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800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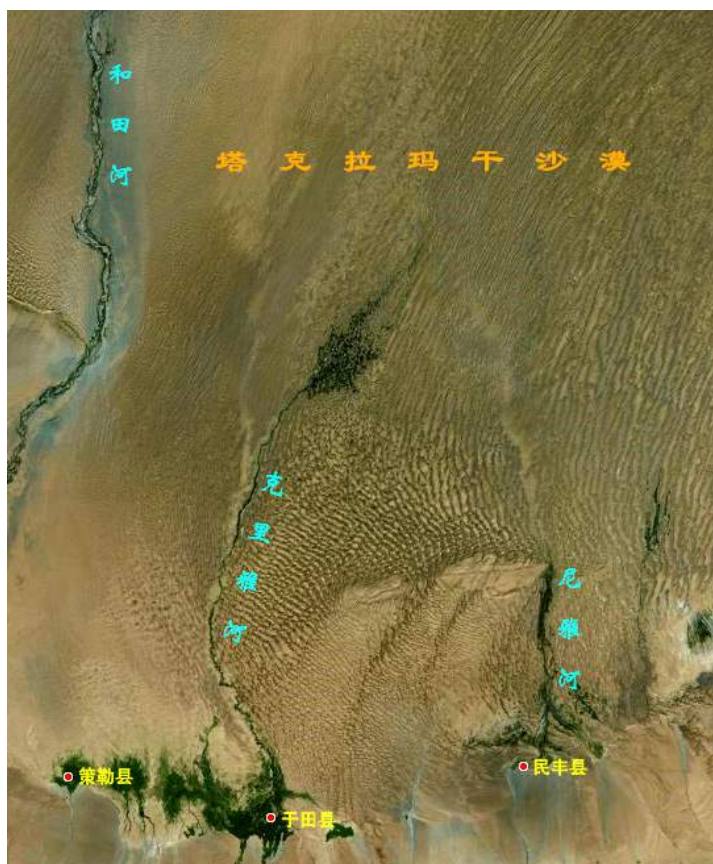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都是在公元三世纪前后。也就是说，在唐帝国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曾经繁荣的精绝、楼兰两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如果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两个“国家”在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新技术的引进对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规模来说，是在把蛋糕做大，但每有一种改变之后总是会有所牺牲的。随着塔里木盆地山前绿洲的做大，能够输送给下游三角洲平原的水量很自然就会减少了。鉴于当时的人力、物力所限，中上游地区的引水工程并不会马上让下游地区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山前绿洲用水量的持续增加（同时也存在气候变化，引起河流水量减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可能性），像精绝这种生存于沙漠腹地的国家，就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绿洲了。

受此影响的并不只有尼雅河下游的精绝国，依附于塔里木河——孔雀河末端三角洲的楼兰绿洲，也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事实上，这两片绿洲被放弃的时间大约

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楼兰人已经迁至南线，变身为“鄯善”，精绝则成为鄯善的属地）。



尼雅河和克里雅河卫星图

从维护中央之国利益的角度来看，绿洲前移并横向扩张并不是件坏事。这不仅能够让西域驻军拥有更多的粮食储备，更能拉近绿洲之间的距离，让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变得更加便捷。只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从战略层面上看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就人类尤其是农耕民族的本性来说，说服自己远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去迁移到另一片土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像今天很多边远地区的地方政府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劝说那些难舍故土的深山村落整体迁移到水、土资源更加丰富的平原地带时，依然会遇到重重阻力一样（尽管那些山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精绝、楼兰两块绿洲被完全放弃，其实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在两处遗址所遗留下来的大量文字中，至今为生态保护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是这些文字中有对于用水、保护植被的严格规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可以被看成是拒绝改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楼兰绿洲之所以坚持到最后，其实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位置相当于塔里木盆地的东大门（楼兰人倒是识时务的南迁了）。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线，如果想在塔里木盆地东部连通，这个中继点能否保有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至于精绝人，他们之所以固执的坚持到最后（而不是迁移到今天民丰绿洲所在的位置），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除非这片绿洲有着其他吸引他们的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吸引精绝人留在沙漠深处呢？

在卫星能够从空中俯视大地之前，人们很难矗立在黄沙中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如果我们在卫星地图上，仔细观察那些尚未完全被沙漠所掩盖的河道痕迹时，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观察克里雅河、精绝河所显现出来的故道痕迹的话，就会发现这两条河流在沙漠腹地很有可能交汇过。也就是说，尼雅河应该曾经向西北方向注入过克里雅河。如果扞弥人曾经透过克里雅河打通过一条连通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的通道的话，那么精绝人也同样能够透过连通克里雅河下



游，获得额外的区位优势。

克里雅河通道的存在，无疑会坚定扞弥、精绝两族在沙漠腹地坚守的决心。即使克里雅河后来不再直通塔里木河，尼雅河水也不再交汇克里雅河，这条向北的通道也不会马上断绝（圆沙古城之南的喀拉墩、马坚里克都发现有汉代——南北朝时代还在通行的城堡）。已经习惯了从北向通道中获益的精绝、扞弥人，会想办法调整方向，开辟新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从尼雅河尾间绿洲——克里雅河尾间绿洲——于阗河下游的新通道，就会成为纵穿塔里木盆地的新选择。



汉西域全图

绝人并不会就此完全消失，他们只是在迁移后没能再以精绝之名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罢了。至于精绝人到底融入了后来哪一支民族，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

在汉帝国打通丝绸之路之后，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因为区位所带来的收益，已经成倍增加了的背景下，即使精绝、扞弥人所维护的这条通道只能作为一条支线或者备选方案存在，所能得到的收益也足以吸引一个人口数千的小国留在沙漠腹地了（前提是要有水）。当然，在这三条河流当中穿越，必定是要经过完全没有水源补给的沙漠的。但即使你沿昆仑山麓在丝绸之路南线通行，同样的也必须备足水源去应对绿洲之间的那些沙漠的。

不管精绝人有多少大的决心坚守他们在沙漠腹地的故土，但在河流水量减少，绿洲整体向山前平原退缩的大背景下，精绝绿洲的消失已经不可逆转了。当然，精

## 第二十五章 车尔臣河流域沿岸的西域国家

### 第一节 张骞途经昆仑山北麓小型河流地带

离开尼雅河之后，在将近三百公里的行程里，张骞并不会遇到新的“国家”。不过这并不表示，他这一段的行程就没有淡水补给了。事实上，在他碰到下一个被开发的天然绿洲之前，还有牙通古孜河、安迪尔河、莫勒且河、喀拉米兰河等从昆仑山北坡流出的小型河流。即使这些小型河流暂时没有被进行农业开发，但它们的存在对于丝绸之路南线的开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帝国开通西域之后，上述河流（也包括其他丝路上的河流）都有可能兴建一些城堡，以帮助往来商旅进行补给。比如尼雅河东侧的安迪尔河下游三角洲地带，就发现有始建于汉代的安迪尔古城遗址。如果最初的商路不得不依靠，那些天然存在于下游三角洲地区的聚落区进行补给的话，那么为了迁就它们，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就很有可能出现一条连接诸河流下游三角洲的商路。如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可以循着各条河流所指示的方向，在沙漠深处寻找到一系列的汉代古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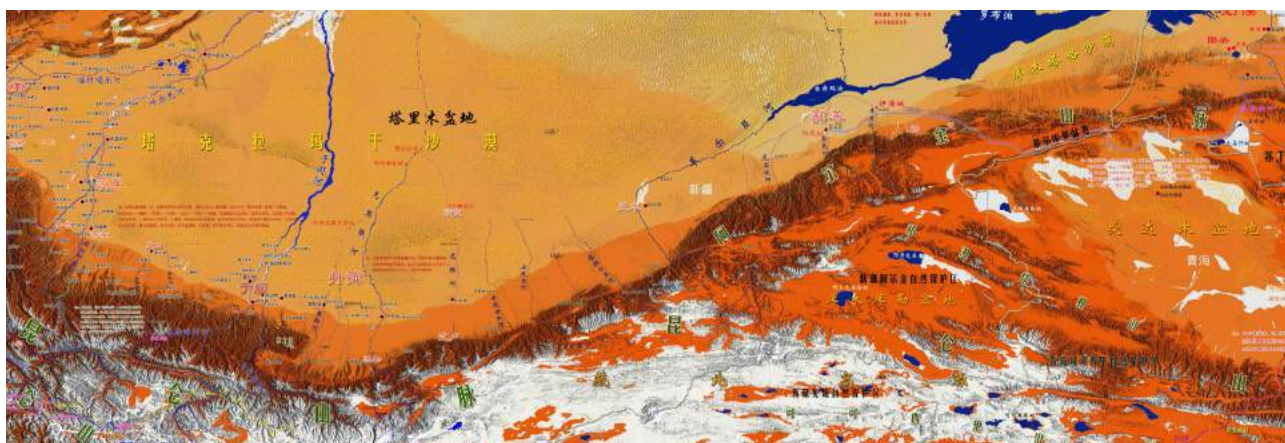
上述河流的下游地区暂时没有进行农业开发，并不代表在汉帝国开拓至此之前，就没有人类的足迹踏足于此了。可以肯定的是，在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开始定居生活之前，这些河流所滋养的天然植被会先被游牧部落所利用。只不过由于气候和环境原因，这些游牧部落会倾向于以河流的中上游地区为活动中心。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在莫勒且河、喀拉米兰河等河流所依附的山谷中，发现诸如岩画一类的人类活动痕迹。

对于已经下定决心为帝国铺就一条西行之路的张骞来说，那些在昆仑山麓逐水草而居的小型游牧部落，并不是他考察的重点。真正能够吸引他注意，并认定为是潜在盟友的，是那些被认为在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上与华夏文明接近的绿洲国家。从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离开尼雅河继续沿塔里木盆地南沿东行的张骞，很快就要步出昆仑山脉辐射区了。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马上就能看到昆仑山脉的尽头了，因为从帕米尔高原东南角开始，一直为塔里木盆地围边的昆仑山脉，很快决定脱离西域板块，将自己的剩余部分延伸进青藏高原了。

昆仑山脉在青藏高原腹地延伸的部分，基本与它作为青藏高原西北边缘的部分长度相等。因此也有将这部分昆仑山称之为“东昆仑山”，之前与我们一路相伴的西半部，称之为“西昆仑山”的。不过，西昆仑山脉这个标签，我们已经给了帕米尔高原东沿的那段山体（也有人认为，西昆仑山脉也是昆仑山脉的一部分），所以在后面的内容中，上述两部分昆仑山脉被称之为“昆仑山脉西段”和“昆仑山脉东段”会更为合适。



既然昆仑山脉准备向青藏高原腹地延伸,而塔里木盆地又还没有封口,那么在东、西两段昆仑山脉之东,应该还会有一条与之相接,更像昆仑山脉西段自然延伸的山体存在。这段山脉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曾经出现过,它就是——阿尔金山。从位置上看,阿尔金山是位于昆仑山脉与祁连山脉之间的一段山体。步入阿尔金山北麓,也意味着张骞将要再一次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了。鉴于张骞曾经在河西走廊那长达十年的不愉快经历,这位汉朝使者对于是否要再一次回到河西走廊,其实是充满疑虑的。此时的张骞,需要有熟悉的土著来告诉他是否有办法绕过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回到那片黄土覆盖的高原。



汉西域全图

能够为张骞指明方向的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下一片绿洲之上,毕竟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绿洲本身肯定会成为往来旅行者的休憩之地。如果张骞是在靠近河西走廊的绿洲中得到新路径的消息,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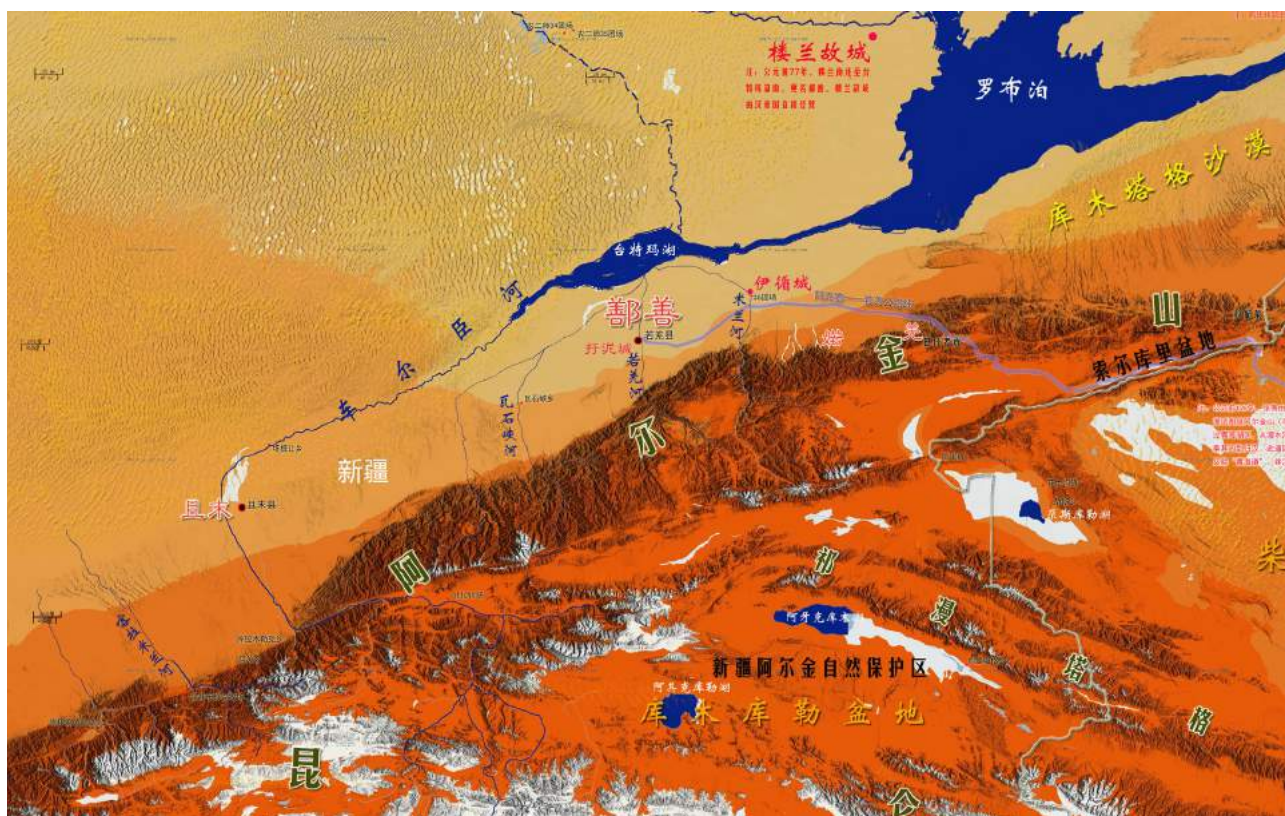
不管张骞是否能够从下一个绿洲得到如何绕过匈奴的消息,他都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了。依靠我们之前的经验,寻找新绿洲的希望仍然是落在那些河流身上。事实上,从克里雅河出发之后,我们已经不太指望大型绿洲的出现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昆仑山脉 75% 的冰川,集中于喀拉喀什河与克里雅河之间的山体中。然而事无绝对,很快一条年流量达到 8 亿立方米的中型河流,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而这条叫作车尔臣河的河流(及其支流),在西汉时期曾经滋养过超过一万五千人口的国家。

## 第二节 且末和鄯善位处车尔臣河下游

从流量上看,车尔臣河应该是玉龙喀什河以东最大的一条河流了。一条河流的水量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的集水区面积,这一规律在车尔臣河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以地理结构来看,车尔臣河上游部分河谷,相当于就是阿尔金山脉与昆仑山脉的地

理分割线。其最上游部分甚至穿越昆仑山主脉，向青藏高原深处延伸。

解答了车尔臣河之水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车尔臣河之水到哪里去的问题了。从流经的路线来看，车尔臣河可以说是整个塔里木河南线河流中最为特别的河流了。特立独行的流向，甚至使得车尔臣河下游出现了两个国家：且末和鄯善。车尔臣河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离开昆仑山——阿尔金山之后，并没有像其他河流那样，径直流向沙漠腹地。而是在山前平原穿行向南约 100 公里后，转而向东流向了罗布泊方向。对于东行的张骞来说，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大利好了。最起码他在塔里木盆地最后的行程，不必再担心淡水补给的问题。



汉西域全图

我们前面也说了，车尔臣河下游建制有两个国家。以车尔臣河的形态来说，最有可能先出现在张骞面前的，应该是河流拐角的那个位置（因为河流会减速，有利于形成天然绿洲）。在今天的行政区划中，“且末县”正是建制于此。而与皮山、轮台等标签一样，这个名字在两千多年前也曾经出现过。在历史记录中，且末是一个人口一千六百一十人的农业小国。相比其他同等体量的国家，记录者对且末国的描述，算是相对丰富的了。他们甚至特别注明了，这个绿洲小国能够出产葡萄等瓜果。鉴于且末国是汉使西入南道最先看到的农业国家，这些在中央之国闻所未闻的农产品，自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尽管且末国的产出，让帝国来客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与车尔臣河的流量相比，



这个绿洲小国的人口实在是有点少。前面我们也说了，整个车尔臣河流域的人口超过了一万五千人。且末国的袖珍体量，意味着承载人口的重担落在了且末以东至罗布泊一带有绿洲身上了。

控制且末至罗布泊一带水资源的国家，就是曾经以楼兰为名的“鄯善国”。楼兰曾经是我们西入塔里木盆地所解读的第一个国家。公元前77年，迫于汉帝国与匈奴的双重压力，本来活动中心在塔里木河——孔雀河三角洲的楼兰国，迁至了车尔臣河流域（同时改名为“鄯善”）。事实上，说楼兰迁至车尔臣河流域，也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在汉帝国到来之时，楼兰人并非是一个农业国家，而是一个纵横罗布泊以西，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游牧部落。除了孔雀河下游以外，车尔臣河流域本来也应该是楼兰人游牧范围。楼兰人的迁移，更多应该被定义为活动中心的迁移。或者说，汉帝国为了断绝楼兰与匈奴的联系，迫使其放弃了孔雀河一带的牧场。

鄯善最早记录人口数量为一万四千一百。这样的人口数量，在塔里木盆地的农、牧国家中，应该算是大国了。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楼兰、鄯善变身前后的人口数量有没有出现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逐水草而居的楼兰人因为被迫放弃了北部草场，而影响到了部族生存的话，这支游牧属性的部落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事实上，变身为“鄯善”之后的楼兰人，所能保有的草场的确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决定迁移的同时，楼兰人也向汉帝国提出了一个请求——屯田积谷。即汉帝国派人至车尔臣河流域屯垦，以帮助新的鄯善国立国。这种请求对于汉帝国来说，其实是个双赢的合作方式。一方面，以游牧为主的楼兰人，必须仰仗汉帝国的技术输出方能保持自己的国力；另一方面，汉帝国也可以因此而加强对塔里木盆地东大门的控制。

基于上述原因，楼兰人算是在汉帝国到来之后变化最大的部族了。不仅国家的位置迁移了，就连生产生活习惯也逐渐汉化。在东汉时期，鄯善已经大致由游牧经济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国家了（包括服装都已经汉化了）。除了汉帝国的影响以外，塔里木河流域的环境变化，也应该是促使楼兰人转变生产一个重要原因。毕竟在后来，在自然力和上游开发的双重影响下，塔里木盆地水系能够向罗布泊洼地输送的水资源日渐减少，如果不转而采取农耕这种更能有效利用水土资源的生产方式，鄯善国是很难保有原来的人口规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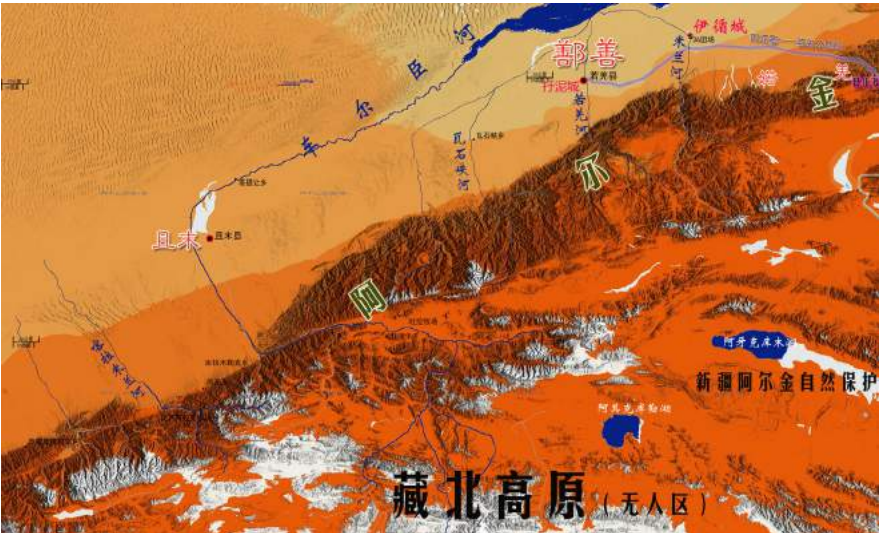
不管楼兰人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但在张骞从丝绸之路南线回程的时候，他们还是匈奴控制下的一支游牧部落。这意味着张骞在进入车尔臣河流域时，就算是进入到了匈奴的势力范围。由于匈奴人直接整合的目标，是那些与之同属游牧体系的“引弓之民”（农业国家，主要是以收税等形式间接控制）。张骞如果想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最好是在进入到且末境内时，就开始转而寻找新的路径回到汉帝国的西北边境板块——陇西。

第三节 张骞可选择从若羌切入青海道

以板块关系来看，如果张骞想避开罗布泊——河西走廊地区，从其他地方回到陇西的话，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从青藏高原北部，也就是今天的青海境内穿行。在这片高原的东北角，有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湟水河谷以为接应，帮助张骞渡过黄河，回到汉帝国的领地。

横穿青海，连接陇西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道路，被称之为“青海道”。在北宋时期，由于崛起于西套平原的西夏王国控制了河西走廊，青海道甚至成为了宋王朝沟通西域的主干线。当然我们知道，青海道其实并不好走，湟水河谷以西都属于干旱的高原游牧区。汉、匈相争的时代，青海地区的控制者是那些被归类为“羌”的游牧部落。

尽管华夏文明与羌系游牧部落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但从本质上来说，已经步入先进农业时代的华夏民族在黄土高原的壮大，实际上是在挤压那些仍在坚持原始农牧生活的羌系部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并不能指望越过昆仑山——阿尔金山之后，能够受到热情的礼遇。然而相比在匈奴之地的风险，这种尝试还是值得的。



汉罗布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现在的问题在于，张骞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切入青海地区。如果他决定在且末一带转向的话，那么那条在阿尔金山、昆仑山脉的夹缝中流出，并有源头横穿昆仑山主脉的车尔臣河上游河谷，应该可以成为不错的选择。实际上，车尔臣河也并非是唯一登上青藏高原的选择。位于车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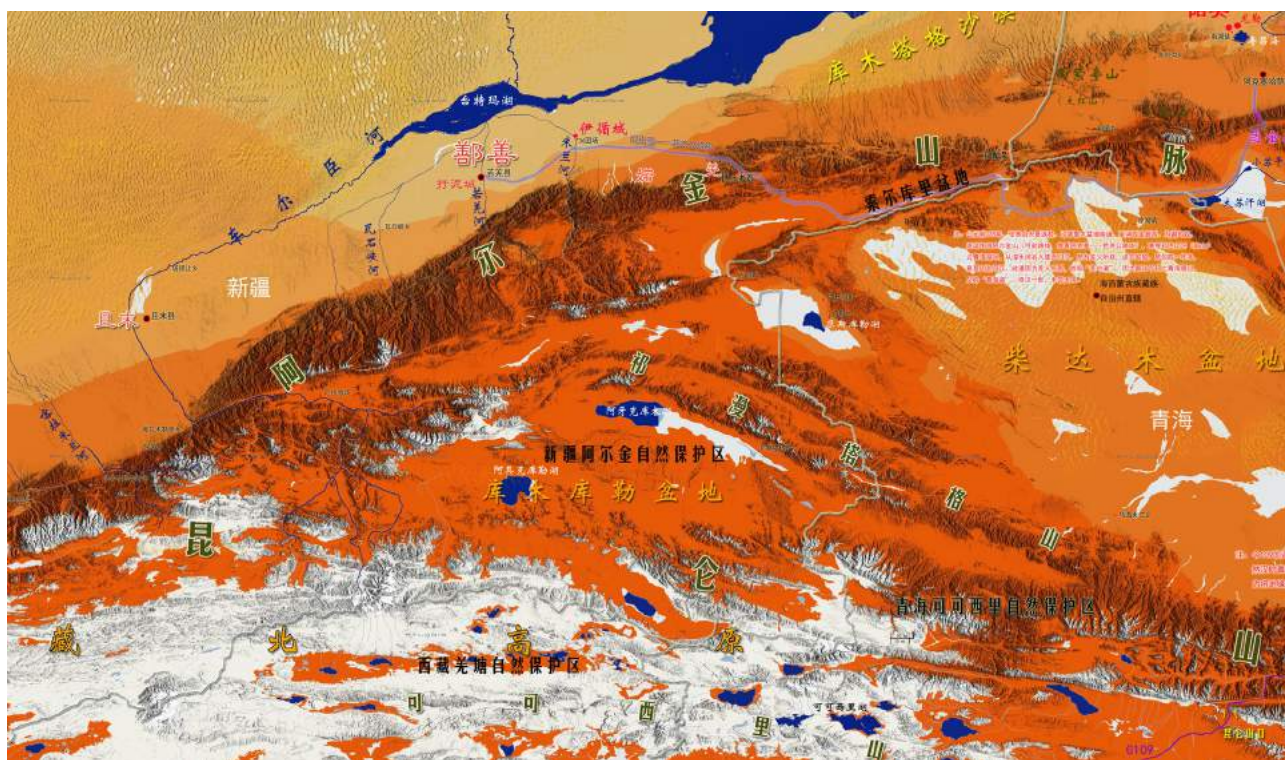
臣河西侧的喀拉米兰河，其上游河谷也向昆仑山脉的南面有所延伸。上述两条河谷，看起来似乎都有机会带张骞穿越昆仑山脉，进入到青藏高原北部。

如果张骞准备从喀拉米兰河或者车尔臣河上游河谷，穿越昆仑山脉的话，能够为他充当向导的应该并不会是且末人，而是游牧于昆仑山北麓这两条河谷一带的小宛人。在历史记录中，小宛国是一个人口刚过一千，和戎卢、渠勒等昆仑山麓国家一样，是并不处于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游牧小国。鉴于这一地区整体的干旱环境，这些应该属于羌系的游牧部落，与他们在黄土高原的远亲们一样，主要是以牧羊为生（当然还会有马了）。



无论小宛人是否对张骞友好，张骞都没有可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借道青海回程的道路。因为即使是小宛人，也不会去尝试从喀拉米兰河或者车尔臣河谷穿出，去它们南面的高原寻找放牧的机会。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昆仑山背面这片最低海拔超过四千米土地，尽管被划入了新疆的行政范围，但它在地理上仍然属于藏北高原的一部分。

提到“藏北高原”四个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无人区”了。的确，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渲染这个板块的恐怖之处。当然，这片高寒无人区也并不是生命的禁区。依靠那些顽强生长在高寒地区的植被，那些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哺乳动物，如：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还是能够生存的。只不过，对于游牧部落来说，为了那点稀疏的牧草，去穿越大片荒漠化（且气候恶劣、氧气稀薄）的土地，实在说不上是什么好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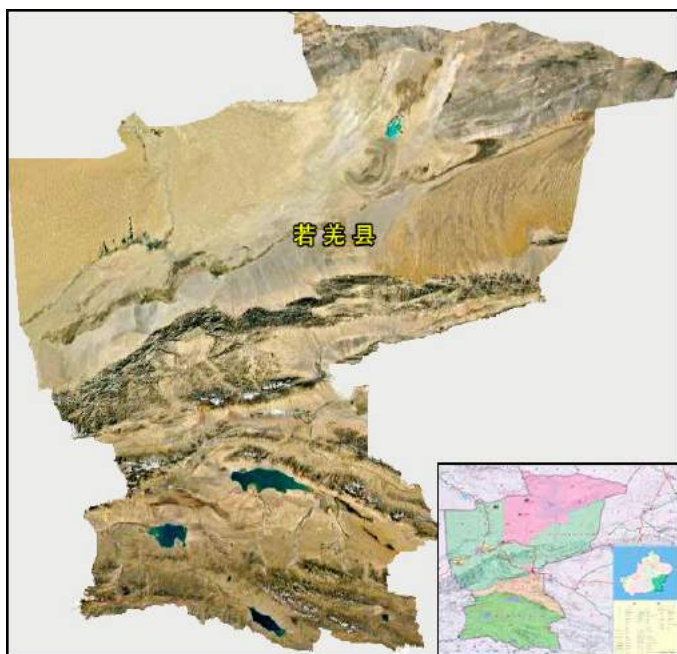
汉西域全图

由于行政分割的原因，整个藏北高原今天被划分为了三个自然保护区，即：面积最大的，西藏所辖的“羌塘自然保护区”；归入青海境内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以及阿尔金山以南，柴达木盆地以西，为新疆领有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如果张骞真的准备从小宛过境的话，那么他一头扎进的将是今天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的腹地。要是那样的话，他活着见到黄土高原的机会，绝不会大于走河西走廊（就算被匈奴人抓住，也不会杀他）。

对于人类来说，穿行像青藏高原这种高海拔地区，最大的困难总是由海拔所引

起的。过高的海拔不仅会直接让人产生高原反应，更会引发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更别它因为不适人类生存，而无法战略补给的问题了）。因此张骞如果想活着回家的话，在进入车尔臣河下游之前，就转进那片被打上“阿尔金（自然保护区）”标签的藏北高原，是非常不可取的（也不会有人建议他这么做）。

准备绕道青藏高原回家的张骞，在放弃横穿藏北高原的想法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过境且末之后，沿着车尔臣河继续东行，在今天若羌县一带，寻机切入到昆仑山北麓。此时的他应该打听到明确的信息：在绕过藏北高原最北部，由阿尔金山和昆仑山脉包夹而成的那片山地之后，他将有机会切入青藏高原最大的低地区——柴达木盆地。而这个海拔骤降到 2600——3000 米的盆地，将是它绕过河西走廊的希望所在。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东出且末境内的张骞，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行政区——若羌县了。



若羌县卫星图

虽然在塔里木盆地诸行政区中，若羌县不算出名，不过这个行政区却保有中国县级行政区中的一项纪录，那就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将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很多省级行政区还要大上一倍（且末排第二）。若羌县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面积，主要得益于两块：一块就是它向东将整个罗布泊洼地都包括进去了；另一块则是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阿尔金山以南，塔里木盆地以西的“阿尔金（自然保护区）”地区，基本也在若羌境内。与如此巨大面积不成正比的是，这个县级行政区的人口仅仅为三万。如果按

按照整个塔里木盆地人口与二千多年前的比例倒推的话，若羌绿洲的人口也就只是在千人了。

两千多年前，生活在若羌境内的人口当年不止这个数了。如果抛开山地部分不看，若羌县今日的行政区，与当年楼兰——鄯善国所在地是完全吻合的。而不管这个国家到底叫哪个名字，它的人口也肯定是过万的。至于说为什么人口潜力会下降得如此厉害，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有了答案。塔里木河——孔雀河断流，罗布泊之水消失的今天，我们很难指望这一地区在人口上，还能有很大的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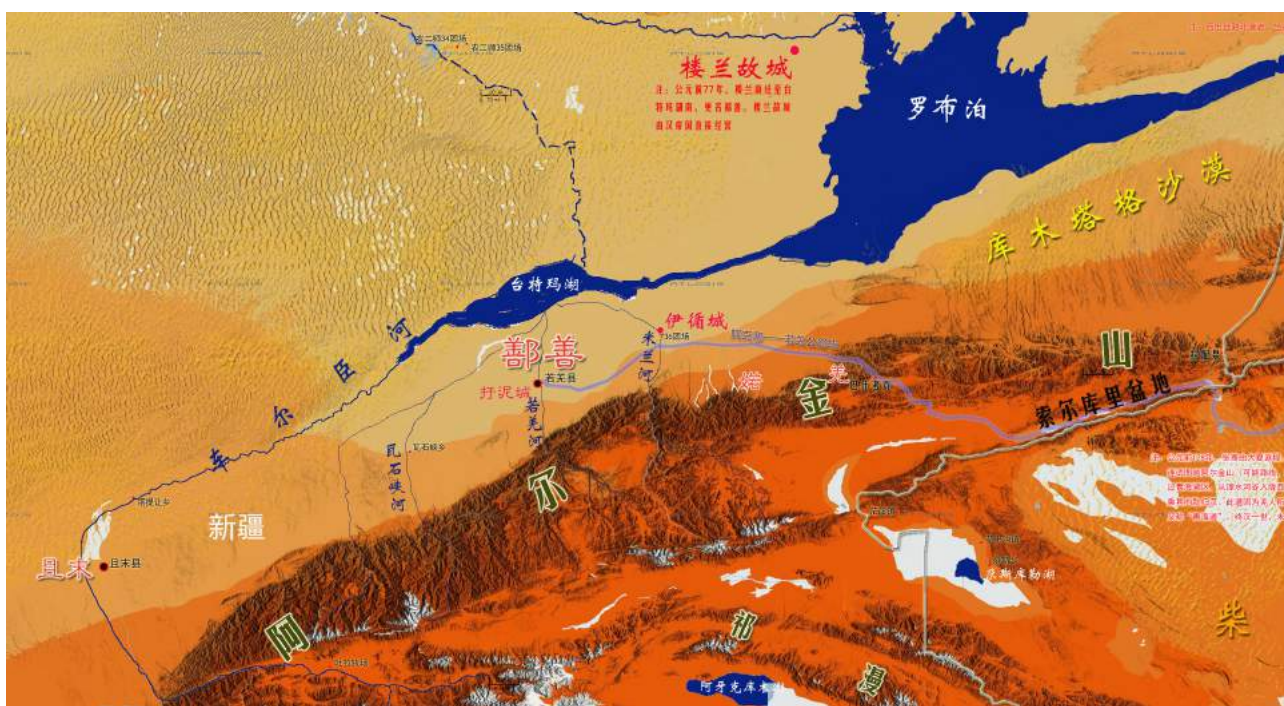
然而就行政区的设置来说，一个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既然此地是楼兰、鄯善故地，那么为什么没有用它们作为新的行政区名呢？如果说楼兰之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



经弃用了，那么鄯善呢？事实上，鄯善的确也成为了一个县名。只不过它的位置并不在塔里木盆地的东部，而是在吐鲁番盆地之中。

曾经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鄯善，重建到了吐鲁番盆地东部，是让很多人感到疑惑的一个问题。与西域很多行政区一样，鄯善也是在新疆建省之后，由即将覆灭的清帝国所设立的（1902年设）。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位移，是因为根据当时学者们的考证，鄯善国在公元五世纪亡国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向北迁至了吐鲁番盆地（还有一部分向西迁至且末）。

在中国传统的地缘观念中，“人”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标签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单元，更多的是在代表一个族群。正因为如此，在中原政权被北方游牧民族消灭而被迫南迁之后，政府在管理那些整体南迁的居民时，还会依照他们的原有的行政归属重置行政区。而这些迁移的地名，有些就流传到了现在。



汉西域全图

鄯善国在吐鲁番地区的存在，主要是通过那些以国为姓的鄯善人所体现出来的。在中国的姓氏当中，鄯、善两姓都是存量极少的姓氏，而他们的族源很大程度都可以追溯至北迁的“鄯善”族人（亦应有部分转书为“单”姓）。只不过，今天的我们已经几乎很难在鄯善县境内找到鄯善后人了。既然“鄯善”之名已经随着人口的迁移，被异地重建了。那么今天车尔臣河下游再想“复古”的话，就只能寄希望于若羌境内的其他西汉古国了。幸好，在车尔臣河之南，汉帝国在阿尔金山一线还发现了一个看起来与华夏文明亲缘关系更近的游牧小国——婼羌。

我们现在所说的“若羌”，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婼羌”，只是因为婼字使用频

率实在太低，所以变身为“若羌”了。不过从“若”字这个“女”字旁，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部落的母系氏族渊源。而这种母系印记，在先秦羌系诸部与华夏文明的融合过程中比比皆是（比如姬、姜姓氏的来源）。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在汉帝国眼睛中，婼羌国是一个在体貌特征上与华夏民族无异的游牧部落。今天若羌县境的3万人口主要生存于三块绿洲之上：若羌绿洲、米兰绿洲，以及靠近且末的瓦石峡绿洲。这三片绿洲所指向的河流，则分别叫做若羌河、米兰河和瓦石峡河。然而这几块体量狭小的绿洲，在两千年前却并非是婼羌人的牧地，而是鄯善人建城、农耕之地。

从流域上看，上述三河都是车尔臣河的右岸支流，源头也都指向阿尔金山北坡。不过，它们也可以不被认定为是车尔臣河流域，而与车尔臣河一起被纳入“台特玛湖”的范畴。台特玛湖在当日解读楼兰与塔里木流域的关系时，曾经出现过。这是一个位于罗布泊洼地之西的狭长洼地带。车尔臣河及塔里木盆地南部其他河流，在有余水汇入罗布泊之前，一定会先经过这条洼地。

而当它们没有能力去润泽那片大耳朵形状的洼地时，台特玛湖就会成为南线诸河的最终归宿。当楼兰人准备南迁建国时，他们实际上相当于把自己核心游牧地迁至了台特玛湖。当然，更名之后的鄯善国也不会浪费罗布泊沿岸所生成的牧草的（南北两线水量充沛时，两湖是连成一片的）。

在张骞穿行于塔里木盆地时，台特玛湖——罗布泊周边并没有自然形成农业文明。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两片水域（或者一片）受上游影响太大。毕竟它们相当于，整个塔里木盆地河流的最终归宿。上游河流越多，在沙漠中穿行的距离越远，水域面积变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尤其在洼地本身深度很浅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在湖畔“逐水草而生”的安全性，要远大于开发耕地。

可以肯定的是，若羌县境内的农业绿洲开发是始于汉帝国的介入。所开发的方式，也都是在河流汇入台特玛湖洼地之前，拦河筑坝以兴建人工绿洲的方式。这其中，由帝国屯垦直接开发的绿洲是米兰绿洲，因屯垦驻军而兴建的城堡名曰“伊循”（今“米兰古城”所在地）。至于鄯善人自己的政治中心，则选定在了米兰河西侧的若羌河畔，其王城为“扞泥”城。

岁月轮回二千年后，在中央之国再一次经略西域之时，若羌、米兰河之侧的地缘格局，与汉帝国时期的格局令人惊讶的出现了重合。今天若羌县的县城所在地，正是在若羌河畔；而负责在米兰河畔开发耕地的，则是隶属农二师的三十六团。

相比因地缘位置重要而得到汉帝国青睐的鄯善国，婼羌国的地位就要显得龙套多了。帝国使者们甚至搞不太清楚，这支羌人部落的游牧区域到底有多大。他们应该仅仅是根据在阿尔金山一带遇到的一支羌人部落，就草草记录下了一个一千五百人的数字。而至于阿尔金山以东，直至青海湖地区到底有多少支应该被归入“婼羌”的部落，没有人能说得清。



历史本来给了汉帝国一个了解这些高原羌人部落的机会。前面我们也说了，为了绕开匈奴人的控制区，张骞已经打听到，可以通过羌人所控制的这片高原回到汉帝国的控制区。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张骞其实并没有踏上这条“青海道”，就成为匈奴人的俘虏了。不过这次比较幸运，已经非常熟悉环境的他，仅仅被扣押一年之后就逃出生天。

如果张骞是在台特玛湖以南，就循着米兰河谷上溯到柴达木盆地西南角的话，那将他交给匈奴人的，就应该是游牧至车尔臣河流域的楼兰人，或者在阿尔金山一带发现他的羌人了。要是这样的话，被张骞寄予厚望的“青海道”，就很有可能是循着柴达木盆地南沿穿越整个盆地，并最终对接青海湖区。然而真相果真如此吗？

#### 第四节 由当金山口进入南山的路线

今天穿越柴达木盆地的315国道，是从盆地腹地横穿而过的。基于现在的技术，以及对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的需要，这种穿越方式自然是可行的。然而对于古典时期的旅行者来说，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沿盆地南北两边的山地前行。因为只有在这些山地的庇护下，才有机会在旅行途中得到淡水的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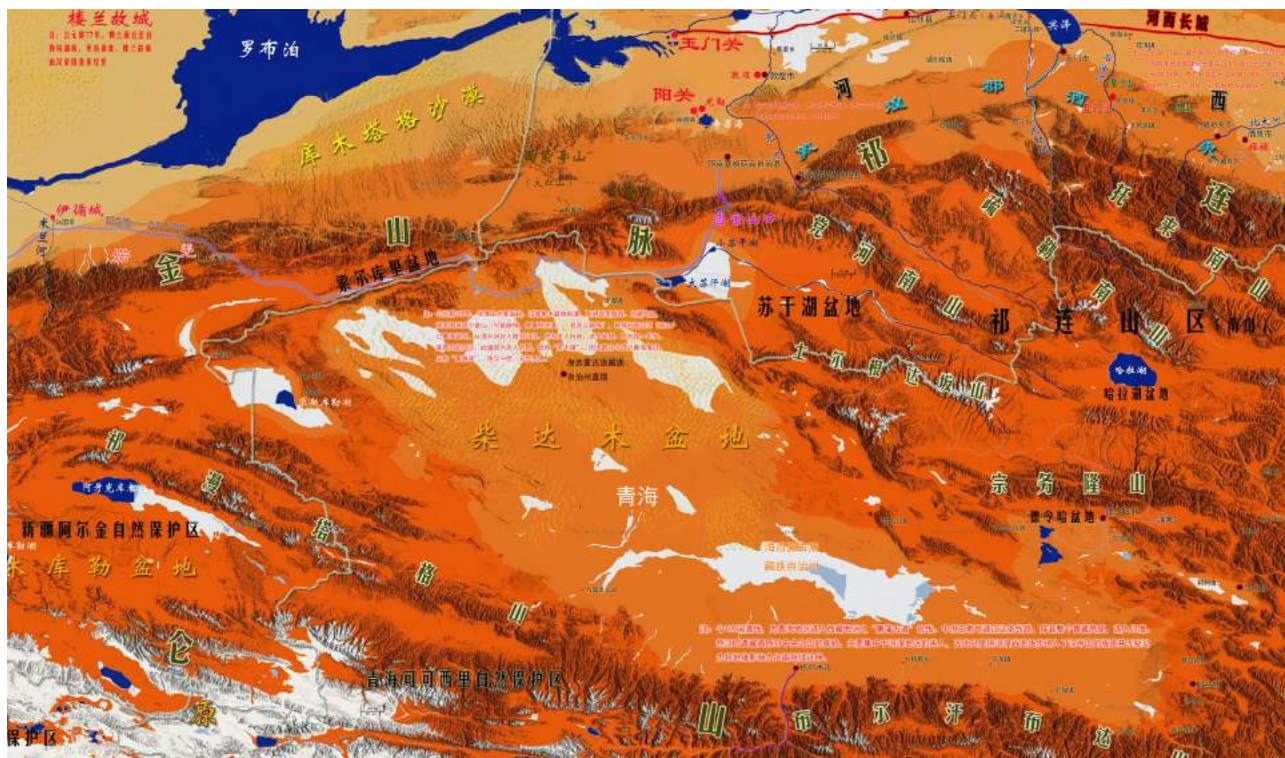
比起已经让我们感到环境恶劣的塔里木盆地来说，柴达木盆地的生存条件还要差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柴达木盆地周边的山脉并没有为它注入多少淡水。正因为如此，柴达木盆地内部非但没有形成像塔里木河那样，横贯整个盆地的大河，同时也没有在盆地边缘形成可供农业开发的绿洲。事实上，在这片盐碱化、荒漠化严重的土地上，那些注入盆地内部的河流，甚至也无法在山前形成连续的荒漠化草原带。也就是说，不管是当年的羌人，还是现在青海境内游牧的蒙古、藏族牧民，都不会把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柴达木盆地身上。

对于已经在游牧之地生存了十多年的张骞来说，并不会恐惧在草原地带的旅程（前提是不要碰到匈奴人）。但如果这是一片连游牧民族都不太容易生存的土地，就没有理由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了。既然从柴达木盆地内边缘穿越的困难太大，那么又有什么相对可取的路线，帮助张骞尽快横穿青海地区呢？看起来，我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柴达木盆地以北地区了（南部是藏北无人区）。当我们把视线从柴达木盆地向北移动时，会发现一系列东西向延伸的山地，比如党河南山、疏勒南山等。而这些山地实际上又都是祁连山脉在青藏高原上的支脉。也就是柴达木盆地与祁连山主脉之间的这片高原，我们可以概括为祁连山地区。

以柴达木盆地与祁连山地区的地理关系来看，它本来很有机会从祁连山地区得到大量淡水补给的。然而正是由于祁连山区内部是由数条东西向的山脉所组成的，因此大部分由祁连山集水区流出的主要河流，并没有向南注入柴达木盆地，而是沿东、西两个方向，注入了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河西走廊的几条大河：党河、疏勒河、

额济纳河；以及最终通过黄河流入黄土高原的湟水、大通河等，都是从这些东西向的谷地获取到大量祁连山之水的。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向南内流入青藏高原的祁连山之水，也并没有都汇入柴达木盆地北部。在更靠近太平洋季风的东部山地，面积比柴达木盆地更小的青海湖等湖盆，同样也从祁连山区受益不少。

在张骞的记录中，祁连山地区被称之为“南山”，这个带有定位性质的名称，所参照的自然河西走廊了。如果试图避开河西走廊的张骞能够顺利进入南山地区的话，那些与山脉平行的东西向河谷，就有可能成为他东行的天然通道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张骞到底准备从哪里穿越山脉，进入南山地区呢？如果张骞想找到一条河谷能够直接将他带入南山腹地，那么发源于南山地区的党河，应该是最先进入他视野的。然而在匈奴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党河——疏勒河下游的情况下，这样做的风险实在有点大。因此张骞最有可能在离开车尔臣河流域，尚未进入河西走廊之前，转而进入南山地区。



汉西域全图

以今天的交通线来看，在车尔臣河与党河之间的“当金山口”的山口，应当是最有可能帮助张骞进入南山地区的。通常情况下，当金山口也会被认为是阿尔金山脉与祁连山脉的分割点。不过从地理角度看，当金山口本身更像是一条山脉中的断裂谷地。将之认定为是两大山脉的分割点，很大程度是因为今天连通河西走廊西端与唐古拉山口（酒泉——格尔木）的215国道，是从当金山口穿越而过的。

不管当金山口究竟有没有资格充当两大山脉的地理分割点，但真正的分割点其



实也就在这左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拿现在人气最旺的当金山口作一个带有地缘色彩的分割点，也无伤大雅。总的来说，位于塔里木盆地与柴达木盆地之间的这段山体，都已经不太“厚”了，选择一个海拔较低的山口穿越起来，并不算太难。对于张骞和试图还原历史的我们来说，更应该关心的是在穿越当金山口之后，张骞能不能有机会获得帮助。

从地形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当金山口以东的 215 国道，实际上是在穿越了一个规模较小的断陷盆地之后，再进入柴达木盆地腹地的。很多时候，这个盆地也会被视为柴达木盆地的一部分。不过结合它的地缘定位来看，我们更应该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一个介于南山地区与柴达木盆地之间的缓冲板块。鉴于盆地最低处有大、小两个以“苏干湖”为名的湖泊，我们也可以将整个盆地区命名为“苏干湖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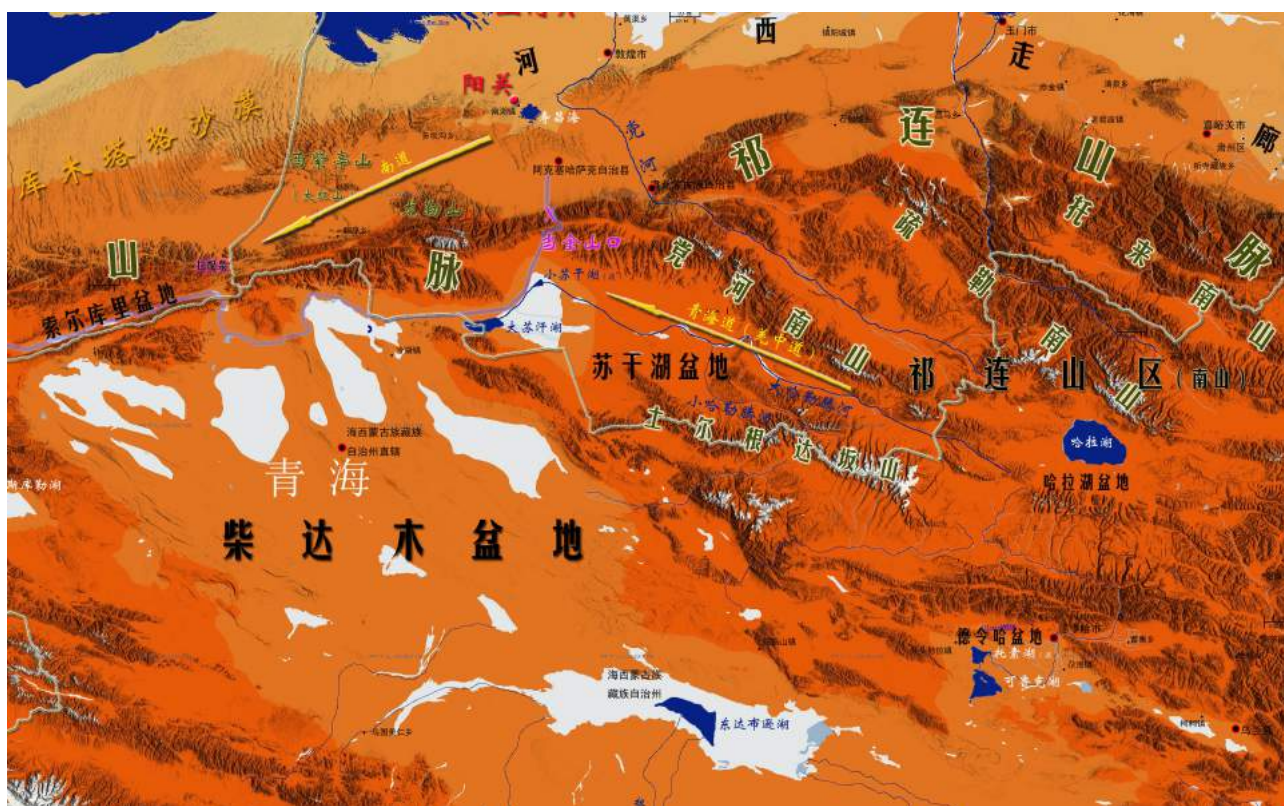
最起码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荒漠化，要归罪于苏干湖盆地的存在。那些本来能够从南山地区（也包括阿尔金山南坡）向南流入柴达木盆地的淡水，在这个盆地的西侧就已经基本被渗透、蒸发干了。淡水属性的小苏干湖和它南部咸水属性的大苏干湖（又是一个中继湖与终端湖，淡咸分属的案例）成为本区域地表水的最终归宿。其实以苏干湖流域今天那不到五亿立方的地表水资源，即使进入柴达木盆地腹地，应该也起不了太大作用。现在留在这个规模较小的盆地中，倒还有机会形成一片以小苏干湖为中心的草原带（花海子）。更为重要的是，为苏干湖提供淡水的，主要是发源于盆地东侧祁连山区的大小哈勒腾河。这就为试图穿越南山地区的旅行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穿越当金山口之后，经过小苏干湖——哈勒腾河，横穿整个苏干湖盆地，向东插入南山腹地。

小苏干湖——哈勒腾河谷并非是唯一能够把张骞带入南山腹地的低地带。如果进在穿越山口之后，不以小苏干湖为目的，转而向北穿越党河南山的话，还可以切入党河上游河谷。向西注入河西走廊西部的党河与向东注入黄河的大通河，是渗入南山中心最深的两条河流。这一东一西两条河流，河源之间的距离不过 130 公里左右。处于两河之间的，是仅次于青海湖面积的青海地区第二大湖泊——哈拉湖。虽然像青海湖、哈拉湖这样咸水湖本身并不能为人类、牲畜所直接利用，但汇入这些湖盆的河流本身，还是足以在这些海拔三千多米的“低地”中，形成可供利用的草场的。

包括祁连山区在内的高大山脉中，人类生存的希望总在那些海拔较低的河谷、低地中的。对于游牧者来说，以党河上游河谷——哈拉湖区——大通河上游河谷为中心的这些山间低地带，都有可能成为一条生命之路。当然，如果仅仅以穿越的角度看，从哈勒腾河一路向东，看起来会更有效率些。当哈勒腾河谷不再为旅行者提供天然通道时，哈拉湖流域同样会为他们承接下一段旅程。不过如果是寻找草场的游牧者，他们还可以选择向东南方向进入下一个定位模糊，介于南山与柴达木之间

的盆地区。今天建制于这个盆地的城市，是青海海西蒙古族自治区首府——德令哈市的所在地。有鉴于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盆地命名为“德令哈盆地”。

与苏干湖盆地的情况相似的是，德令哈盆地也有一淡一咸南北两个湖。北边的淡水湖（也有点微咸）叫做可鲁克湖，南边的则叫做托克素湖。相比更加深入大陆腹地的苏干湖盆地，德令哈盆地的环境要好得多。更靠近太平洋的祁连山地为之补充了更多的淡水。今天的我们，甚至能够在可鲁克湖东部看见大片被开垦的农田。不过，在古典时期，德令哈北部那些水土条件更好土地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片不可多得的草原地带。



汉·罗布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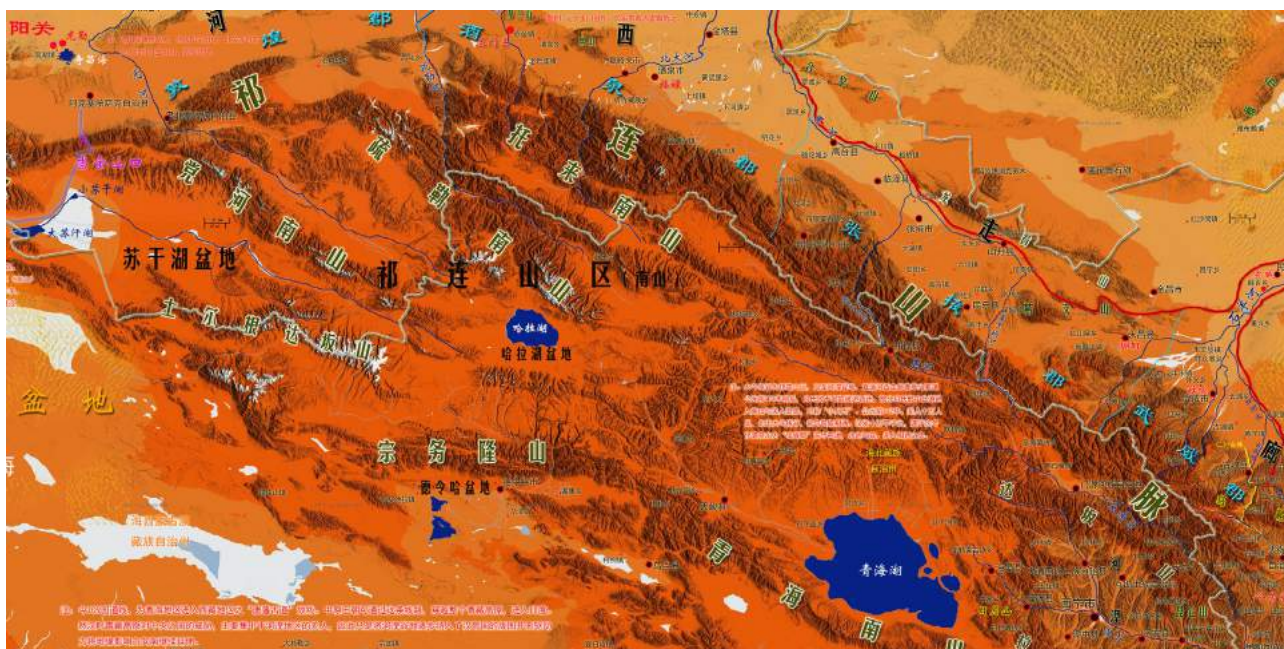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如果柴达木盆地的范围中不包括像苏干湖、德令哈盆地这样的边缘盆地的话，那么这个盆地本身对于古人来说，用处真的不是很大了。而苏干湖盆地则是这一切选择的起点板块。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今天苏干湖盆地的行政归属看出。在今天甘肃省哑铃型轮廓线的西北角，有一个叫做“阿克塞”的行政县。这个横跨祁连山脉的县级行政区，不仅包括祁连山北麓的山前平原，更基本囊括了整个苏干湖盆地（包括它东、北部的集水山地）。而这个身处“肃北蒙古族自治州”，东、南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相接的县，却是一个哈萨克族自治县。

这些源自北疆地区的哈萨克人，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因新疆地区复杂的政治、民族关系，而被迫向东迁移的（大约四批，三万人）。在没有可能迁入相对富



庶的河西走廊的情况下，向青海地区渗透成为了唯一的方向（向塔里木盆地腹地更没有游牧之地了）。当然，在原有蒙、藏部族的阻击之下，哈萨克人并没有可能深入南山地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两大板块相接的边缘地区艰难求生。在红色中国建立后，带着逃难性质游牧于此的哈萨克人，大部分得以回到了北疆地区，而留下定居的就组建了“阿克塞哈萨克人自治县”。

哈萨克人的迁移至苏干湖盆地的这段历史，实际上也反向验证了，历史上南山地区的羌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西出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的战略方向。同时，也用实例证明了苏干湖盆地是青海道西端的起止板块。至于说在苏干湖之东，游牧部落和商旅到底会选择哪些低地草原向东穿行，就很难说了。只能说，如果他们只是希望借由南山地区转入河西走廊的话，那么靠北的路线更有可能成为选择。这样的话，在经行一段大通河谷之后，通过大斗拔谷就能向北进入河西的张掖地区了；而如果想接入的是河湟地区，那么在柴达木盆地北部这些边缘盆地中穿行，再经青海湖区中继也是一种选择。



汉西域全图

应该说，已经熟悉了游牧生活的张骞（被匈奴扣了十几年，不适应也适应了），在南山的山地草原中穿行并不会不适应。然而鉴于整个南山地区的海拔过高，中央之国是注定不会把建立农耕区的希望寄托于此的。即使在今天，从柴达木盆地到祁连山一线，除少数的聚集点进行了农业开发以外，大多数地区的自然、地缘结构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

一个被游牧民族所覆盖的区域，也并不是说不能因为交通而获得额外的地缘利益（虽然由定居民族经营的通道会更稳定）。事实上，在河西走廊受阻，青海道一

度成为承接西域与黄土高原的中转站时，控制这条通道的也是游牧民族（比如吐谷浑）。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包括南山在内的青海地区，在交通上的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承接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黄土高原之间的中转任务。以他们的机动性以及对环境适应力，向南经由柴达木盆地东沿，穿越唐古拉山口（格尔木市南）进入西藏地区的唐蕃古道；以及东南借河湟谷地，接入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进而入川的通道，也同样被有效的利用起来。

如果一定要扩大丝绸之路的概念，这张连通五大板块的交通网，也可以都被视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在这张游牧民族织就的交通网上，除了能够发现来自中央之国的痕迹以外，也同样有机会看到，从丝绸之路另一端输入的商品（比如有朋友问到的“都兰古墓”，就有类似发现）。

好了，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张骞进入这片羌人之地以后的选择了。由于当时他所能利用的这条横穿祁连山地的通道，是从羌人领地当中穿越，所以这段被视作丝绸之路支路的祁连山通道，也因此被称之为“羌中道”。基于这个原因，亦有研究者判断，张骞是被南山的羌人俘获，并送交给匈奴人的。不过，既然张骞在切入苏干湖盆地之前，就已经接近河西走廊的边缘了，他在塔里木盆地就直接被匈奴骑兵所捕获的可能性会更大。毕竟从战略角度看，存在羌人由此西入塔里木盆地，甚至威胁河西走廊的可能性。派驻专人巡查当金山口一带，也是很自然的事。

以地缘位置来看，当金山口北部的祁连山山前平原，相当于南山——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三大板块相接之地。在匈奴人进入河西走廊之前，往来于这个枢纽点的应该是楼兰、月氏（包括之前的乌孙），以及南山的羌人部落了。不过在张骞回到帝国之后，用不了太久，在此布防的就是来自中央之国的汉军了。至于中央之国是如何在此对接丝绸之路的，我们下节再解读。

## 第五节 玉门关和阳关分别承担的使命

提到河西走廊对接西域的地标，大家脑海中一定会闪过下面几个地标：敦煌、玉门关、阳关、嘉峪关这些名字。而除了嘉峪关以外，前面三个地标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在汉帝国的建制中，敦煌郡是河西四郡中位置最西的行政区。往前推的话，这个包含疏勒河——党河流域的板块，还曾经是乌孙故地。在联手月氏共同对抗匈奴的希望破灭之后，汉武帝曾经想“召”乌孙人回河西故地，帮助帝国镇守西大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此时已经得到伊犁河谷，并可以向中亚方向大展拳脚的乌孙人，自然是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的。不过这样也好，汉帝国可以仔细考虑移民实边，自己经营河西走廊的问题了。

玉门关和阳关都是在河西走廊纳入郡县体系后，作为帝国直属地的西大门而修建的。对于很多从唐诗中知晓这两个著名关口的人来说，心中多半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什么汉、唐帝国需要有两个西大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了下玉门关和阳关的位置。尽管对现在发现的玉门关、阳关遗址，是否就是西汉始建的位置，还有些许怀疑的声，但大致位置总是不至于出现太大偏差的。

关口总是建立在交通要道之上的，比如那些穿越山脉，连接重要板块的谷地，就经常会被军事家们用来构筑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只是自河西走廊始的西域之路，大部分的路程当中都是在荒漠化的低地中行走。而要想顺利走完这段丝绸之路，能够为旅行者补给淡水、指明方向的河流，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要点。仔细观察附图，我们可以看到，玉门关和阳关都是在水源地附近。其中玉门关所依附的是一路向西，直通罗布泊的疏勒河；而阳关则是在，向北穿敦煌而过，与疏勒河交汇的党河附近。与水源相近的好处自不必说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这两条河流能够为玉门关与阳关带来什么样的区位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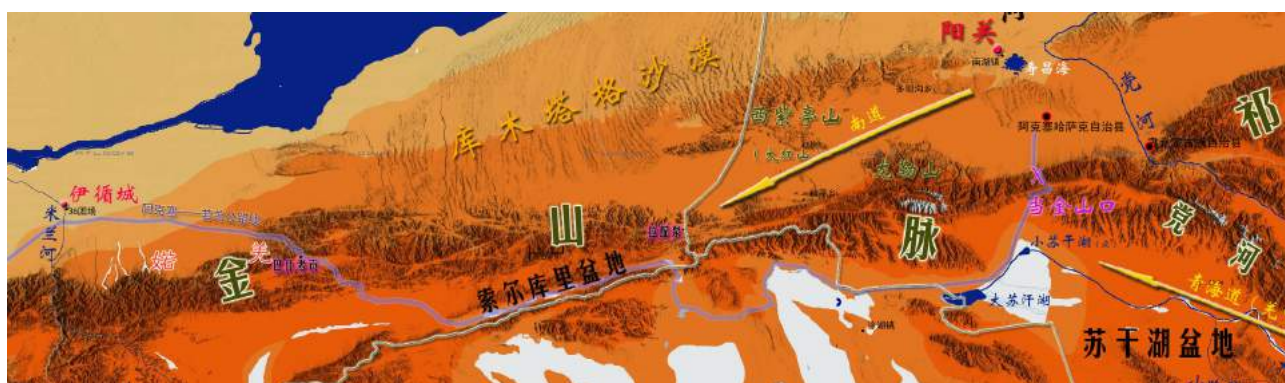
汉罗布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记得在当日解读楼兰时，曾经说过玉门关的用处。很明显，通过楼兰的最佳路线，是顺疏勒河而下，然后沿罗布泊边缘西行，切入罗布泊西侧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三角洲。最初的时候，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很有可能是在楼兰分道的。毕竟那时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可以很方便的将商旅们，分别从楼兰带往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阳关的兴建时间可能就要略晚于玉门关了。

汉帝国之所以要在玉门关之南再建阳关，倒不是因为楼兰和罗布泊消失而必须改道（那时还没有这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汉帝国需要一条稳定的，较少受到匈奴干扰的南线，以保证丝绸之路畅通。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条南线要想稳定的话，最好是沿祁连山北麓直接过渡到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在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一直受到匈奴战略威胁时，在即将步出河西走廊之时就分道向南，相比把楼兰打造

为一个掌控南北两道的枢纽点，战略上要安全得多。

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敦煌南面的阳关得以兴建。阳关的具体位置并不在党河河畔，它直接所连接的水源地，是党河西侧的一个天然蓄水洼地——寿昌海。这个连通党河的洼地，在当时也滋养出了一片绿洲。汉帝国因此得以将阳关所在板块，屯垦成一块有自给能力的战略补给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用来驻军以控交通的城堡。帝国在寿昌海绿洲所建制的行政区叫做“龙勒县”，它的名字来源于一座绿洲之南的山——龙勒山。所谓龙勒山如果要泛指的话，就是今天的阿尔金山了。如果要再具体点的话，那就是阳关西南方向，阿尔金山脉上的一处向北凸起的山地了。



汉罗布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从阳关所在的寿昌海向南插入龙勒山北，接下来的路程看起来无疑是贴着阿尔金山脉北麓一路向西，然后进入车尔臣河下游了。为了安置南迁并更名“鄯善”的楼兰人，也为了让旅行者尽快有一片绿洲补给（当然还要为帝国屯兵积粮了）。在兴建阳关的同时，车尔臣河——台特玛湖之南，已经开发了若羌河、米兰河等绿洲。看起来，丝绸之路南线就这样和阳关对接起来了。而阳关的战略作用也就此明了了。不过当我们把视线越过龙勒山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我们在之前曾经解读过的重要板块——苏干湖盆地。

出现在龙勒山侧的不仅仅是苏干湖盆地，还有从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之间穿越而过“当金山口”。从位置上看，当金山口基本就处在寿昌海绿洲的南偏东方向，与阳关的直线距离仅仅 50 公里。在我们知晓了当金山口和苏干湖盆地是一条横穿青海境内的“羌中道”的起止点时，阳关的另一个战略作用到底是什么就不再是谜了。

很明显，即使丝绸之路南北两路是在楼兰故地分线，阳关和龙勒县的存在对于防止青海境内的游牧部落（当时是羌人）侵扰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当丝绸之路南线确定从阳关开始向南之后，阳关在交通网上的位置就更加显得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阳关即使称不上是河西走廊的南大门，最起码也算得上是敦煌郡的南大门了。

基于中央之国与羌人之间的恩怨，阳关被附加上战略防御羌人侵扰的作用，并



没有什么让人奇怪的。不过终汉一代，来自青藏高原的羌人游牧部落并没有对西域造成什么威胁。然而到了唐代，来自青藏高原的威胁终于成为现实了。尽管从雅鲁藏布江崛起的吐蕃人，攻击西域的主要路线还是通过克什米尔——喀喇昆仑走廊进行的，但攻灭吐谷浑，占据整个青海地区的吐蕃人无疑不会放过更加富庶的河西走廊。当这支高原农牧政权开始攻击河西走廊时，当金山口——阳关这条攻击路线，相信是很难置身于事外的。

既然汉帝国并没有去开拓青海道，在西域的经营实际也没有受到那些高原羌人的干扰（人口少是主要原因），那么我们还是应该把解读的重点，放在阳关——鄯善国的这条丝绸之路南线通道上来。粗略测量一下距离的话，我们会知道阳关与伊循城之间的直线距离约在五、六百公里。而在此之间，无论两千年前还是现在都没有绿洲居间补给，也看不到明显的河流痕迹为旅行者补给淡水。那么当年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商旅是如何走完这段路程的呢？是不是就是沿阿尔金山北麓西行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下一节，我们将揭晓问题的答案。

## 第六节 从阳关经阿尔金山至鄯善的路线

从阳关到鄯善，最显见的路线应该就是沿着阿尔金山北麓前行了。这样一条路线，也同样可以成为张骞靠近当金山口，进入南山的选择。问题是，就现在的环境来看，单薄的阿尔金山并没有为它的北麓提供多少淡水，用以湿润土地。早在两百多万年前，阿尔金山与罗布泊洼地之间，就实际上是为一片沙漠所覆盖了。

这条叫做“库姆（木）塔格”的狭长沙漠地带，可以视作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延伸。需要注意的是，在吐鲁番盆地东南部，今天的鄯善县一带，也有一片相同名称的沙漠。没有证据证明，是那些鄯善后裔在迁移的同时，把这个名字带到了吐鲁番盆地。不过从地缘角度来看，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巧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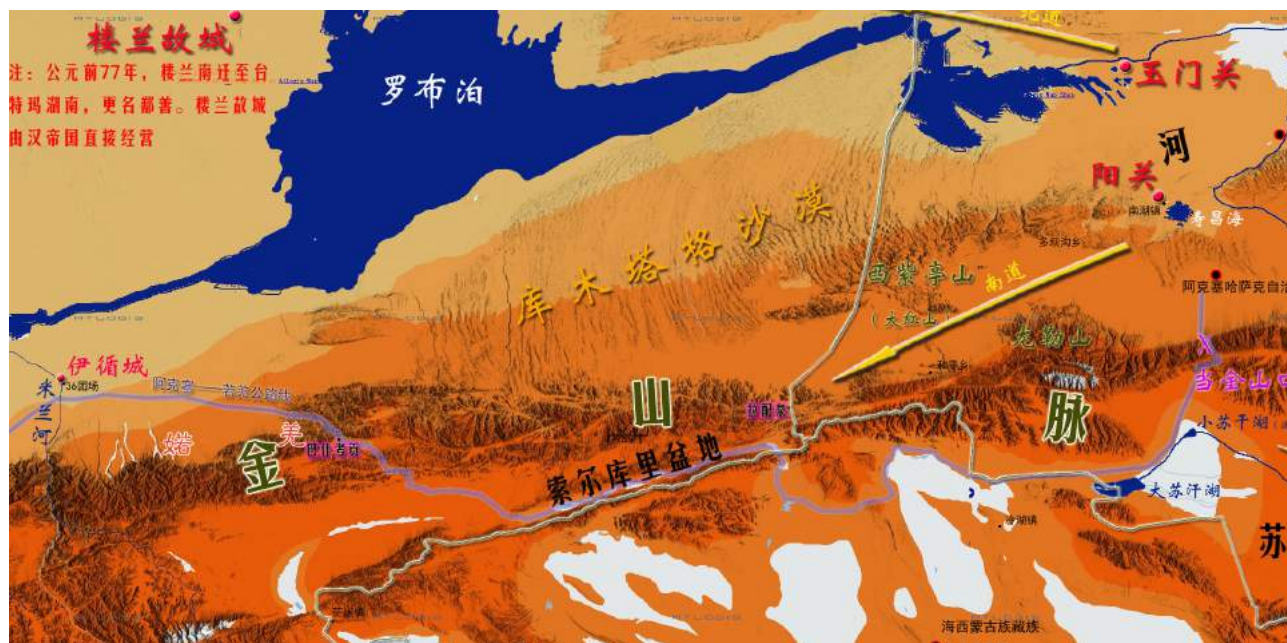
在塔里木盆地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沙漠本身并不足以阻挡人们前行的脚步。关键在于其中要有高山之水补给，而这恰恰又是阿尔金山的弱项。与被沙漠吞噬的风险相比，阿尔金山腹地反而成为了最好的通行选择。一方面可以免受沙漠恶劣气候的侵扰；另一方面山地之中也更容易找到水源。

如果山地本身成为了通行的选择（而不是阿尔金山北麓的山前低地），那么从阳关南下的旅行者，理论上可以选择直接从当金山口切入到山脉之南。然后在苏干湖盆地、塔里木盆地的西边缘，贴着阿尔金山，向米兰河上游靠近，并最终北向切入到鄯善人当年游牧的地区。不过通常情况下，旅行者并不会选择这么快的进入山地之中。因为在苏干湖盆地相对应的这段阿尔金山北麓，环境还并没有那么糟糕。

让这段山前低地免受沙漠直接覆盖命运的，是一段海拔两千多米，东西纵横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山地带。这段山体的存在，有效阻隔了库木塔格沙漠的南侵。山体

向南的突出部名叫“大红山”（汉称“西紫亭山”）。从地理位置上看，大红山与阿尔金山北麓的那个突出部——龙勒山遥相呼应，收紧了这条山前通道的宽度。相信即使你不是军事专家，也应该能够看得出，大红山和龙勒山这两个制高点，有条件建成河西走廊板块最西端的军事要塞。

事实也的确如此，汉、唐两朝也的确在大红山、龙勒山一带部署了军事据点。今天甘肃与新疆的行政分割线，也正是从大红山之西滑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今天甘肃省的西部边界，的确与河西走廊——南疆地区的地缘分割线是吻合的。不过对于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来说，大红山及其所属山体，并不能一直帮助他们阻挡沙漠。如果不想进入沙漠地区的话，他们很快就必须选择向南进入阿尔金山腹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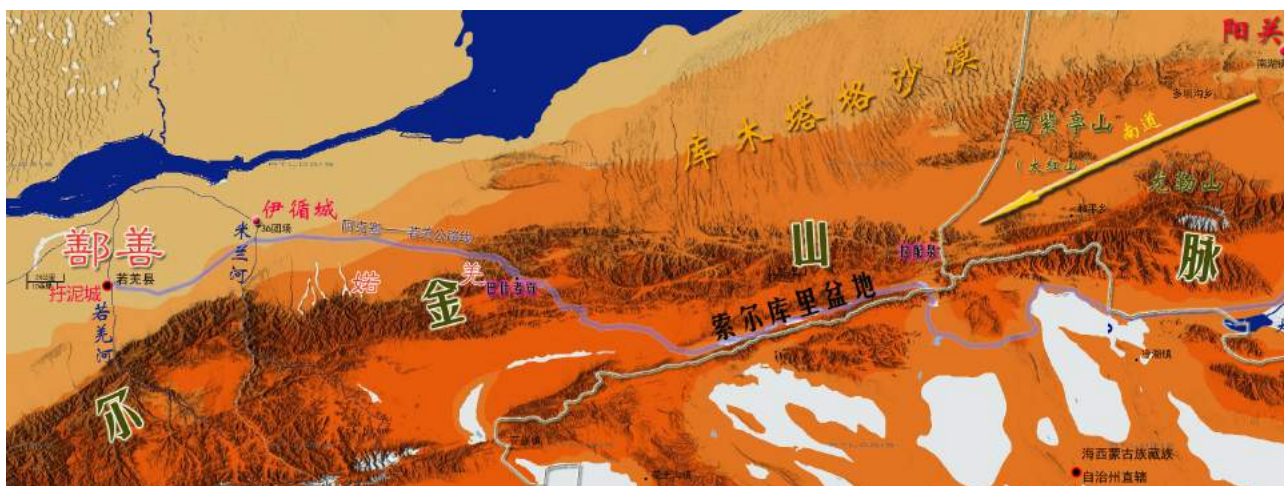
汉·罗布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在今天的行政地图上，寻找丝绸之路切入阿尔金山腹地的这个点也并不困难。因为这个点和甘肃、新疆、青海三省（自治区）相接的这个点是吻合的。当然，在行政地图上我们并不能看出为什么要这样分割。但如果在地形图上看这些行政分割线，揭开谜底的钥匙就露出来了。这个三地交汇的点，所处的位置正是在阿尔金山之上。而它的西边则是一个东西横穿阿尔金山东部腹地的盆地。事实上，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条叫做“索尔库里”盆地是一条标准的谷地形态。只不过阿尔金山的集水能力太弱了。这条谷地之中并没有形成一条东西向的河流。

沿着甘、新边界，切入索尔库里盆地的是一条古道，这条古道也是今天隶属新疆的若羌县，直接连通甘肃境内阿克塞县省道的选择（如果不想经过青海境，再经由当金山口北入阳关的话）。与山口最为接近的地区，今天叫做拉配泉（隶属若羌）。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道路穿行的山口，称之为“拉配泉山口”。



从拉配泉进入索尔库里盆地之后，阿尔金山腹地的这条低地带能够帮助旅行者一直抵达米兰河上游。顺米兰河而下，就是汉军为协防若羌而屯垦的米兰绿洲了。当然，鉴于米兰河上游所处的阿尔金山山体已经有些复杂了。旅行者们并不一定非要在抵达米兰河谷后，再北入塔里木盆地。今天的 315 国道，就在米兰河之东选择了两个山口穿出阿尔金山（苏吾什杰和巴什考供）。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比起周边那些高大山脉，穿越单薄的阿尔金山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汉·罗布泊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不管选择哪个山口进入塔里木盆地，索尔库里盆地的存在最起码都能够帮助丝路之上的旅行者，绕过库木塔格沙漠。我们实在无法确定的是，张骞在上述四个山口（苏吾什杰、巴什考供、拉配泉、当金山口），抑或是其他未知山口中，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帮助他转入到阿尔金山之南的。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最终还是落到了匈奴人手中，并且在滞留一年多之后，终于脱离苦海回到了长安。

张骞的这次旅行，前后耗时共计 13 年（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126 年）。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被匈奴人所扣押。然而这些被扣押的日子，也并非一无所获。相反，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张骞才有机会为汉武帝带去更多关于匈奴的信息。在张骞返回之后，汉帝国经过五年的充分准备，连续发动了两次河西之战，并最终将河西走廊纳入了帝国的领土，完成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

尽管张骞最后的回归，让汉帝国完成了对匈奴的致命一击。但长达 13 年的等待也未免太长了。汉武帝也不可能把反击匈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大月氏人身上。如果在遥远的西方能够有这样一个战略盟友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汉帝国反击匈奴的主战场仍然是在北方。在张骞出使大月氏五年之后，已经不对此抱有希望的汉武帝终于决定在中央之国所熟悉的正面战场，拉开反击匈奴的序幕了。而我们接下来的视线，也将从黄土高原之西，转回到黄土高原之北。去看看在张骞出人意料的回来之前，汉匈之间对抗关系，呈现出了怎样一种变化。

## 第二十六章 汉帝国策划马邑之围设伏匈奴

### 第一节 汉军诱使匈奴人进入包围圈

在汉匈乃至整个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中，山西高原北部的大同盆地，以及鄂尔多斯高原之北的河套地区，始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大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会在河套地区更具优势，而大同盆地则是中原政权不容有失的前方基地了。如果有一天，中原政权能够完全控制河套地区，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形势将对中原政权更为有利；反之，要是游牧民族入主大同盆地的话，这片黄土之地所蕴含的农业潜力，势必成为其进一步南下，甚至入主中原的本钱（比如鲜卑）。

以上述标准来看，汉武帝继位时所面临的形势还算不错了。一方面整个大同盆地还处在汉朝之中；另一方面，在河套平原的东部，帝国还顽强的控制着一个突出部——云中郡。然而这种看起来还说得过去的局面，却是 60 多年来用十几个宗室之女加上无数的财帛、屈辱，和匈奴人换来的。从匈奴的角度来看，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此时的部落首领们还完全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既然那些财富的拥有者愿意周期性的为之补给，那又何必一定要去自己经营那些土地呢。

更何况，匈奴人也并没有把获取额外收入的希望，建立在汉帝国委曲求全的态度上。只要他们愿意，汉帝国视为抗匈前线的那些边郡，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匈奴人渔猎的猎场。匈奴对汉帝国的优势，始自公元前 200 年的白登之围。这场战役不仅让汉帝国陷入了长达一甲子的蛰伏期，同时也让大同盆地成为了帝国的伤心地。如果汉帝国想要扭转局面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控制大同盆地，让匈奴不敢再视之如无人之境。

汉武帝预备拉开反击序幕的第一场战役，战场并非预设在高祖刘邦的伤心地：今天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今名马铺山），而是大同盆地的另一个地缘中心——位于盆地西南角的马邑。与大同一带相比，今名朔州的马邑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它几乎处在一个向西开口的矩形盆地腹地（朔州盆地）。从战术上看，一旦匈奴人进入了这个盆地，那么汉军形成战略包围的机会就很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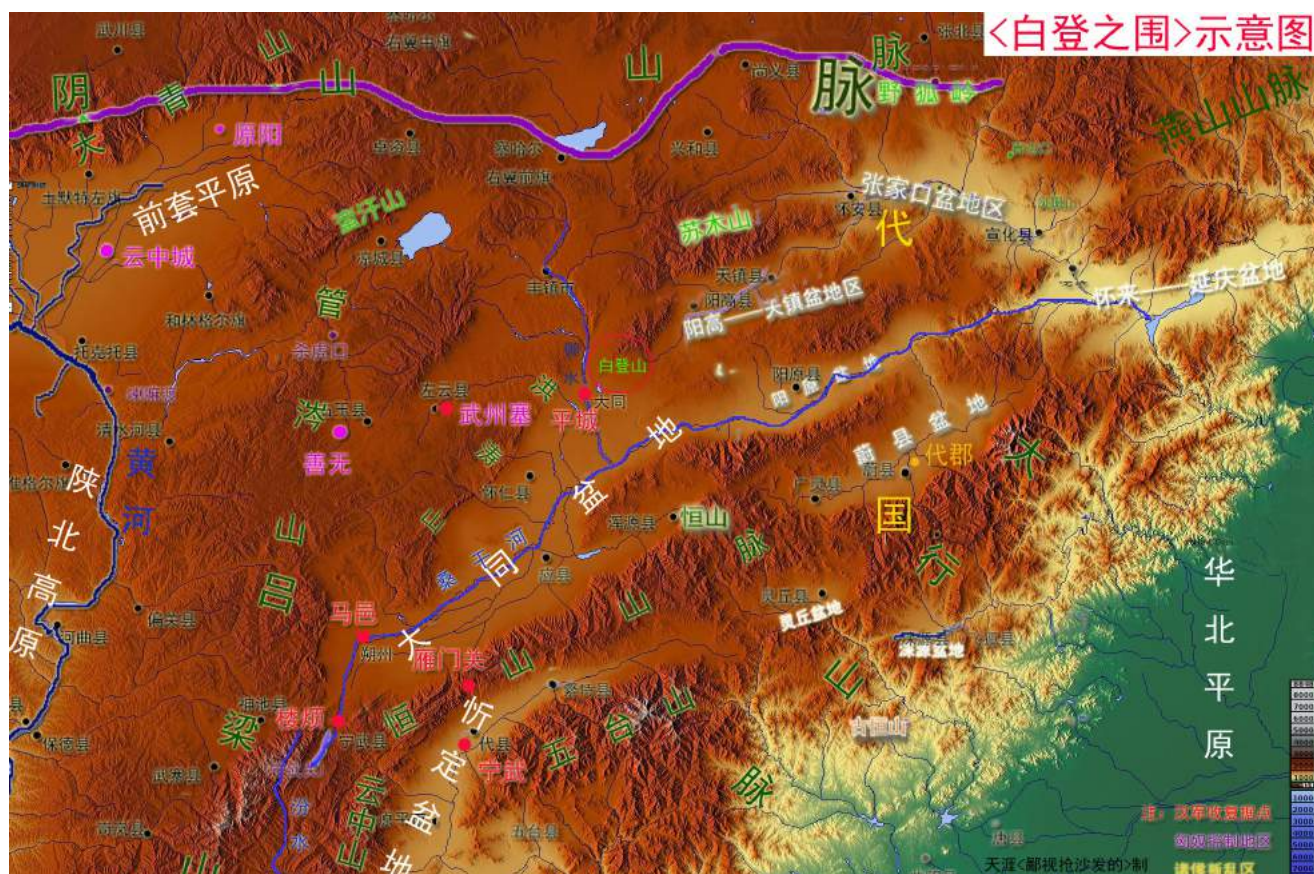
当然，试图在这个边长约 30 公里左右的盆地打造一个包围圈，所动用的兵力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东面的盆地开口处，将有一道南北长约 20 公里的防线没有山地可依。至于其他三面，所使用的兵力相对就要少得多了。能够通行的谷地数量毕竟有限，对于防守方来说，据险以自守总是更容易些的。

据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次反击，汉武帝调动了超过三十万的兵力，埋伏于朔州盆地周边的山谷之中。以战役的规模来看，帝国并不认为这场战役能够在很短时间内结束。不过逼迫对手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进行阵地战、拉锯战，正是农耕民族的



优势。纵然在包围圈形成之后，这三十万的兵力不够，汉军也有雄厚的资本将兵力、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前线。相反，游牧民族则更擅长于在开阔的草原上打运动战，即便一时不能取胜也可凭借机动优势从容的撤退（所以中原政权很少有全歼对手的案例）。

现在看起来，将匈奴人引入朔州盆地，并围而歼之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以马邑之围雪耻白登之围，也有足够的象征意义。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人会不会进来，为什么要进来？对于汉武帝来说，这其实倒也不是个问题。毕竟在之前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汉朝都扮演着一些委曲求全的角色。仅仅是在马邑之围的前一年，帝国还送了一位宗室之女前往匈奴和亲。这一切都使得匈奴人断然想象不到，他们的对手能够动用数十万的兵力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包围圈。



白登之围示意图

纵然汉帝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匈奴人会对他们即将发起的反击掉以轻心，但具体到战术层面，还是需要一点点小计谋来请君入瓮的。对于能够总结出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华夏族来说，马邑之围当中所使用的谋术并不算惊艳。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马邑城中的富豪，以汉奸（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了）的身份去告知匈奴人，自己可以里应外合，让匈奴人顺利进城劫掠。为了把戏做足，汉朝方面甚至故意杀死了一名死囚，并悬其首于城门之上（同时告知匈奴人“马邑长吏已死，

可急来”），以让前来刺探虚实的匈奴使者，相信马邑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劫掠永远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渔猎方式。作为曾经被韩王信看中并试图以之为都的马邑城，也有足够的人口和财富吸引匈奴人入侵。因此在汉朝方面的精心策划之下，匈奴人开始集结兵力，准备突破长城防线，快速杀向马邑城。

为了完成这次看起来毫无难度的劫掠，匈奴人集结了超过十万的骑兵。更为重要的是，这支游牧大军的统帅，正是匈奴当时的最高领袖——军臣单于。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根据匈奴左、中、右三大板块的结构，为他们在汉朝的边郡划定了势力范围。根据这个划分，大同盆地正是处于匈奴单于的猎场（事实上，也正是匈奴单于亲自带队）。也就是说，如果马邑之围的计划能够成功的话，汉帝国不仅能够围歼掉数以万计的匈奴骑兵，更有可能直接斩首匈奴单于。

以汉军的计划来说，他们并不打算等匈奴人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而是在匈奴主力骑兵进入朔州盆地之后，即断其后路。至于那些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的匈奴辎重部队，则另外部署了一支从代郡方向出击的，总数三万人的部队解决（飞将军李广也在其中）。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汉军并不准备正面和匈奴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准备在断绝匈奴给养的情况下，将这些不可一世的游牧骑兵困死（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马邑城，以及整个朔州盆地都已经坚壁清野了）。

从计划来看，一切细节都显得十分完美。这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围歼匈奴主力的机会。因为无论胜负与否，再想把匈奴人引入汉军在汉地预设的包围圈，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就计划的前半部分来说，可以说进行得非常成功。顺利突破阴山南麓一线的长城，并没有让亲率十万骑兵南下的匈奴单于感到困惑。基于匈奴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暂时并没有机会修复最初由赵国，后来由秦帝国所整合的阴山一线的长城防线。真正为马邑地区提供直接保护的，是构筑于大同盆地之北，今山西左云县境内的一条防线——武州塞。至于匈奴人有没有突破武州塞防线，又有没有进入汉军预设的包围圈，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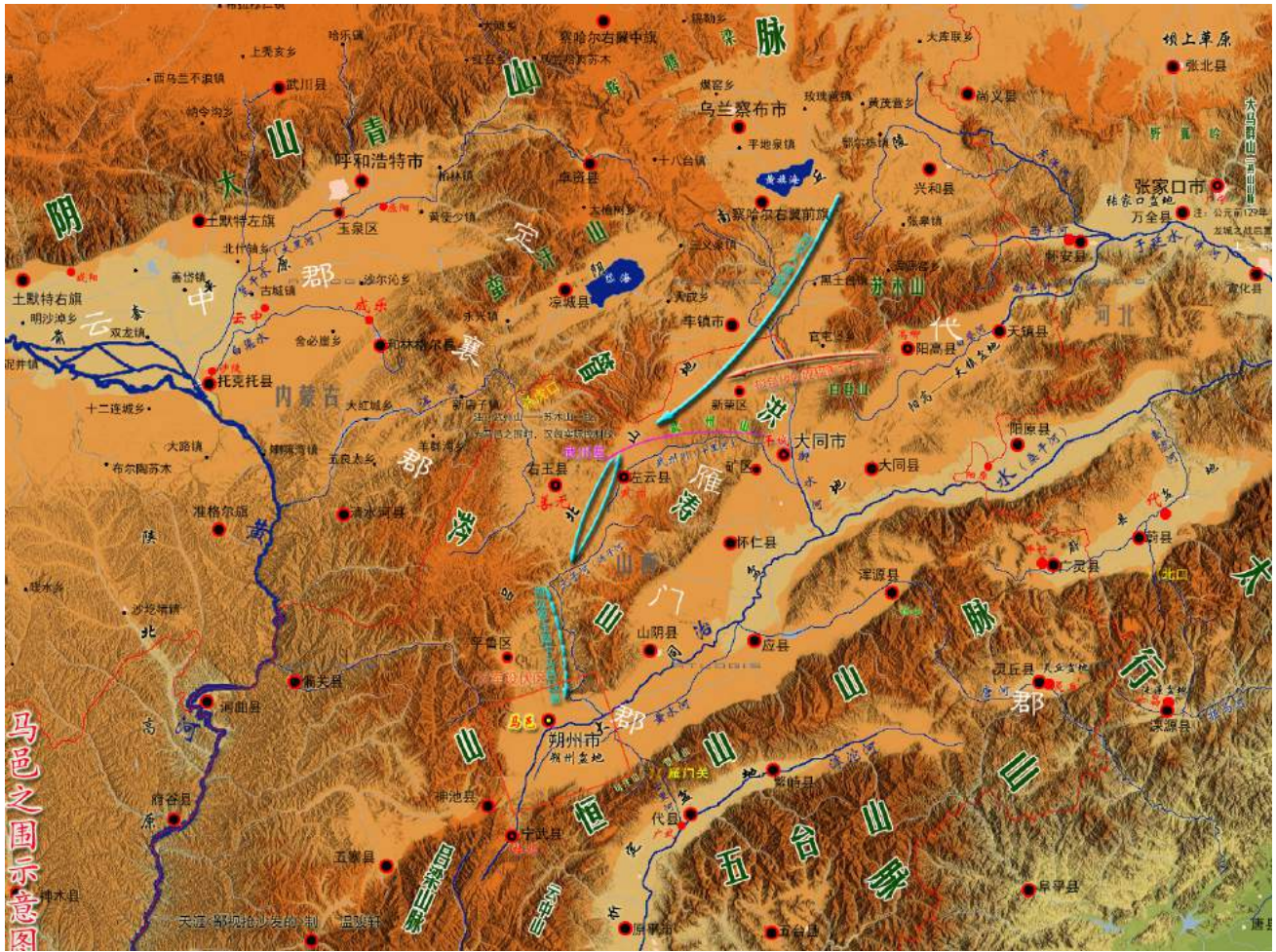
## 第二节 匈奴骑兵经武州塞南下马邑

“武州塞”之名在解读“白登之围”时已经出现过了。“武州”这个标签如果代指的是行政区的话，那它所对应的就是今天隶属山西省大同市的“左云县”（武州县）；如果它指的是一条军事防线的话，那就是一条位于今天左云县城之北，东起管涔山，西至洪涛山的防线了。上述地名，最早在战国部分解读赵北三郡时应该有已经出现过了。不过离开这个板块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它们的地缘价值。

管涔山和洪涛山可以被看作是吕梁山脉的北部延伸，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片山



地称之为“吕北山地”。由于地势的原因，两山之间并没有汇集出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河，以及由此而形成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山地腹地所收集的雨水大部分都向东、南方向外流入大同盆地，去支援桑干河了。对于吕北山地来说，没有形成大片适宜耕种的冲积平原，固然一种遗憾，但这种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的边缘性，对于游牧经济来说，却又是极好的。一方面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并不会觉得两山之间，那些丘陵起伏是障碍（对于灌溉农业来说，问题就很大了）；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降水又足以形成连片适宜放牧的草场。



马邑之图示意图

事实上，在赵武灵王代表中央之国向北扩张之前，这一地区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而即便是在赵、秦、汉等政权将吕北山地纳入中央之国范畴，并与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立“雁门郡”之后，畜牧经济依然是本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为了移民实边，也为了在华夏文化的肌体中补充进“胡服骑射”基因（以对抗游牧民族），那些模仿游牧民族的放牧行为，甚至会得到鼓励。

既然吕北山区是那么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又有多条河谷穿透东侧的洪涛山来连接大同盆地，那么在不能将匈奴人彻底阻挡在阴山一带之时，就很有必要在两山之

间的丘陵地带，打造一条可以依托的防线了，这条防线就是武州塞（这条防线，最初也是由秦将蒙恬所打造）。

为武州塞提供依托的是一条源自洪涛山，向西延伸的山地——武州山（武周山）；以及位于武州山南麓的一条源自管涔山，向东穿越洪涛山，在今大同市南汇入大同市的母亲河“御水河”的河流——武州川（今名“十里河”）。不过武州山并没有像武州川那样向东延伸到管涔山。为了弥补这个地形上的缺口，汉帝国在武州川上游之北，匈奴南下当道之处构筑了武州城，并以此为基础建制了“武州县”。

从地缘位置上看，这样一条山水防线首先能够防护的，就是大同盆地的重镇，也就是诱发了白登之围的“平城”（大同）了。有了武州塞的保护，最起码由北南下的匈奴骑兵就无法借助武州川水而下，攻掠平城了。当然，匈奴人也可以从吕北山地最北部的丰镇盆地（今丰镇县所在板块），沿御水河直接南下攻击平城，不过这就不是武州塞的防御方向了。

真正被武州塞正面保护起来的重要板块，是马邑所在的朔州盆地。如果匈奴人想穿透吕北山地直接攻入马邑的话，就必须穿越这道连接管涔——洪涛两山的防线。虽然从河套平原经管涔山中的杀虎口，过善无城（今右玉县城）而下；或者在攻取平城之后，沿桑干河南下，都可以绕过武州塞。但这两条路线需要先攻取云中、善无、平城这三个军事重镇，对于急于去马邑捡便宜的匈奴人来说，显然不会去考虑。

### 第三节 汉军计划泄露使匈奴重返草原

尽管在汉帝国的版图上，武州塞以北直至阴山长城一线都应该属于雁门郡的行政区。但实际情况是，帝国在此并没有实际控制武州塞以北（也谈不上恢复秦赵打造的阴山长城防线了）。而掌握军事优势的匈奴人，也并没有视武州塞为不可逾越的天堑。事实上，静止的城防工事从来都不能将入侵者堵在外面。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骑兵并不会受制于中央之国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参考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在汉匈战争形势出现逆转之前，整个汉匈相接之处的防线都像一个筛子一样，经常性的被匈奴人穿透，入境劫掠。

为了诱敌深入，汉朝方面应该也有意识的让武州塞防线出现了漏洞。或者说，让驻军在面对十万匈奴大军时表现出畏敌情绪，龟缩于城堡要塞不敢出战（在自视强大的匈奴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然而在这个完美计划背后，有一点却让志在必得的汉武帝始料未及。那就是生活于武州塞南的百姓却并不想当炮灰（人口本身，也是游牧民族的重要战利品），他们在匈奴人穿越武州塞之前就闻风而逃了。

武州塞距离马邑约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除了一小段十里河上游河谷之外，这段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匈奴人可以沿着一叫做“源子河”的桑干河支流南下，



进入朔州盆地。以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他们迫切的心情来看，这点路程完全可能在一日之内完成。而当匈奴主力进入朔州盆地之后，他们的辎重部队应该还在武州塞北（这些后勤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去拉战利品了，主要交通工具为牛车或马车；而车的移动速度比骑兵要慢）。

在汉军的计划中，一旦匈奴人进入朔州盆地，那些埋伏于周边山谷的汉军中的一支就将立即封堵住源子河谷的谷口，以切断匈奴人的归路。配合其他方向的伏兵，十万匈奴骑兵和他们的单于所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重重包围，坚壁清野的朔州盆地了。至于那些被封堵在武州塞北的辎重人员，则会有从代郡方向出高柳城（当时代郡所控的最北部，今山西省阳高县）的三万大军来解决。

在这个计划中，武州塞以南直至源子河谷口的地区并不会在坚壁清野的范畴中（为免打草惊蛇，他们应该像往常一样不知所措的面对突然来袭击的匈奴人）。然而一场动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要想一点消息都不让当地百姓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帝国部署在武州塞一带的驻军，可以有办法在计划实施之前禁止人员出关，以免走漏消息，但却无法阻止为了保命的百姓自行躲藏起来。

我们并无法推断武州百姓是在什么时间点，得到大战将临的消息的。能够确定的是，快速通过武州塞，并已向南移动百里的匈奴大军，除了沿途看见野放的牲畜之外，竟然没有捕获一名居民。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很自然引发了匈奴人的疑虑。为此，他们并没有继续向南完成那剩下的百里路程，而是迅速回头攻击了武州塞中汉军所驻守的要塞。

即便有充足的防备，武州塞中所屯驻的汉军也很难面对十万匈奴骑兵攻击，更何况此时他们的防御重心应该是还在武州塞北，紧随主力骑兵南下的匈奴辎重部队。一旦匈奴主力在马邑被合围的消息传来，这些辎重就将成为守军和三万汉军的合围对象了。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回击的匈奴人攻取一个城防要塞，完全没有任何压力。而匈奴单于迫切想知道的真相，也很快随着俘虏的招供而大白于天下了。在惊诧之余，匈奴人自然不会再上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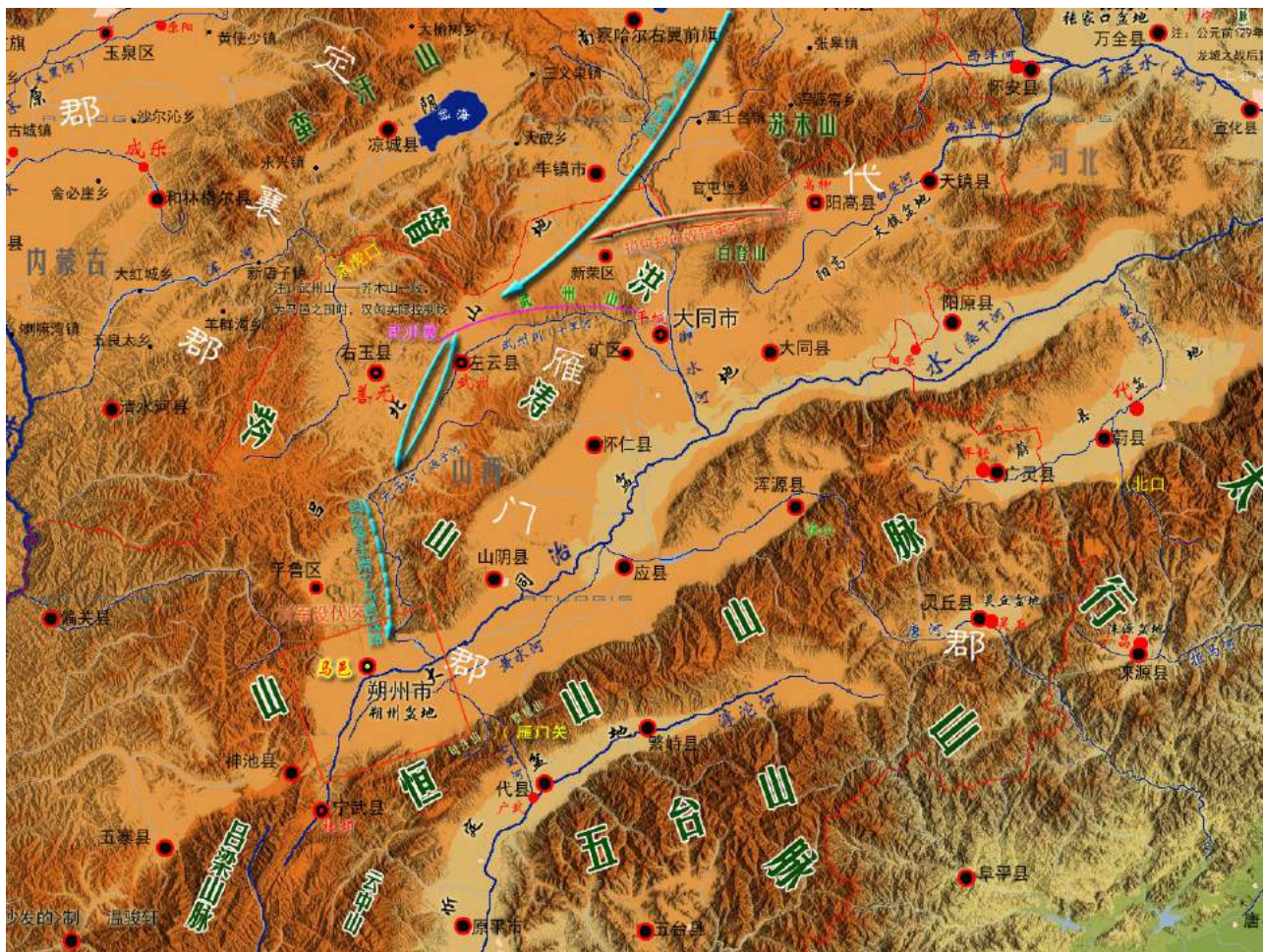
在得知匈奴兵退的消息之后，汉武帝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将伏击战变成了一场追击战。问题是，即使汉军的先头部队（骑兵）与匈奴人拥有同样的移动速度，追上匈奴人的机会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追至武州塞防线，自忖没有可能接战的汉军便停住了脚步。汉武帝所精心部署的开锣大戏也就此终止。

当然，汉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一试锋芒。最起码从高柳（阳高——天镇盆地）向西出击，准备攻击匈奴辎重的三万汉军，有机会与返程的匈奴主力接战。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并拖住匈奴人的话，已追至（包括正准备向北运动的）武州塞的汉军主力势必会跟进。这样的话，一场原本应该发生在朔州盆地的汉匈之战，就会变成武州塞北的一场混战了。虽然即使汉军获胜，也只会是一场击溃战，但也足以振奋汉军乃至整个帝国的士气了。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临机应变的胆略和勇气的，更何况这三万汉军的对手转瞬之间便变成了十万匈奴主力。最终在犹豫之后，这些本来可以改变历史的汉军，还是放弃了与匈奴接战的打算。而日后无数次与重大战功擦肩而过的李广，也正是统率这三万汉军的将领之一。

对于匈奴人来说，马邑之围就是汉军所实施的一个阴谋。如果汉军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再无建树，相信一定会有研究者将汉匈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那个向匈奴单于告密的“汉奸”。在现实环境中，一些热衷于讨论国际时事的朋友也同样会不由自主陷入阴谋论的怪圈。而那些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谋术，也成为了阴谋论的论据。



马邑之围示意图

实际上，这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人类的博弈当中，各种谋术的运用总是在微观历史中不断出现。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就会发现，推动历史前进的并非是某个人物或者一次阴谋的成功实施（或者失败）。战术层面的谋术，并无可能直接改变战略上的大势。就像汉匈战争一样，如果马邑之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那么自然可以算是为这次“帝国反击战”开了一个好头；但即使无功而返，我们也很快



可以看到，蓄积国力长达一甲子之年的汉帝国，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间，将匈奴人逼入死角的。

## 第二十七章 汉帝国对匈奴发起龙城之战

### 第一节 游牧民族周期性劫掠农业区的根源

有一句我们从小就熟知的成语叫做“打草惊蛇”。就这句成语的本意来说，其实是说故意去惊动对手，以迫使对方暴露出自己的行踪（为三十六计中之谋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句本来颇为正面的成语，往往被反用做无意中惊扰了对手，使得自己原本谋划好的计划无法实施。以“打草惊蛇”今日常用之意，来形容马邑之围的后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这次未能完成的战役，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最起码匈奴人会受到很大的震慑，在对手的地盘上不会那么嚣张了。

然而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两个国家之间利益争夺，而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生存方式上的结构性矛盾。换句话说，即使马邑之围汉军大获成功，全歼了匈奴十万骑兵以及单于本人，也无法阻止那些游牧部落在农业区打草谷的欲望。匈奴人很快就会推选（争斗）出一个新的单于来，以率领他们继续南下侵扰帝国治下的农业区。

关于游牧民族是否能够完全独立成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而这也牵扯到他们为什么总是对农业区那么感兴趣的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牲畜能够为游牧民族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条件。比如肉、奶可以食用；毛皮可以做衣服、帐篷；粪便可以做燃料。也就是说，即使不依靠与其他不同文明属性的民族交换，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然而游牧民族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农业民族的争斗，数千年来就不曾停息过来看，他们对农业区物资、人口的渴望，似乎又在证明，游牧体系必须依靠外部补给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

实际上，游牧民族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经济体，与他们不断的通过正常、非正常手段从外部接受补给之间并不矛盾。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草原和游牧经济，人类也不会灭亡。只不过比起农耕来，游牧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要差得多。一方面，游牧经济本身的生产效率，或者说对土地的利用率非常低；另一方面，牲畜作为游牧民族的基本经济来源，同时承担着供给食物与储存食物的功能。一旦遇到极端自然灾害的话，所受到的打击要比那些有条件、能力储存更多食物的农耕民族要大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如果想要在面临灾害打击时迅速恢复元气的话，劫掠相邻的农业区几乎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比起可以算出收益（一个畜群正常情况下，一年能扩大多少规模是固定的）的游牧经济，劫掠所产生的收益总是存在不确定性。而当发现这种渔猎行为能够帮助自己提升生活品质时，游牧民族就不会总是在受灾时才想到向他们的邻居家伸手了。

游牧经济为了更好保持自己的运行需要从农业区进行补给，并不能解释一个现



象：那就是纵观中国历史，强大的游牧帝国似乎总是伴生于强大的中原王朝而生。比如匈奴与之秦汉；突厥与之隋唐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案例。这其中并非没有关联，因为以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的需求。一般几户有血缘关系的牧民就可以组成一个基本的游牧团体，然后共同经营一片草场和决定迁移的路线（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相互之间还能够独立完成放牧牲畜的工作）。



草原（一）



草原（二）

这也使得游牧部落内部与彼此之间，呈现一种非常“原始”的民主气氛。即使是被单于、可汗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之后，那些首领们也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命令，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部落和每一户牧民身上。除非大家面临共同的敌人，或者有需要合力去争取的利益。当与草原接壤的那些农业区本身并没有置于一个强大政权的保

护之下时，一个单独的游牧部落，或者区域性的部落联盟，就有可能完成他们的补给任务了；而当这些游牧部落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并且用长城保护起来的中原政权时，总是会有人挺身而出用武力或者语言，说服大家团结起来。因为只有这样，草原上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突破中原政权的防线，从农业区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物资和人口。

之所以要分析这些，是因为虽然我们只会重点分析几场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汉匈之战，但整个汉匈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三百年。如果不从更高层面来理解这场博弈的本质所在，这些即将呈现的战争，就只是会让大家的热血再沸腾一下罢了。

## 第二节 匈奴在春季和秋季南侵的区别

回到后马邑之围时代的解读上来。为西汉时期的汉匈战争来划分阶段的话，白登之围——马邑之围之间的时段可以划分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汉帝国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而自马邑之围后，汉匈之战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帝国反击”阶段了。由于受到了惊吓，匈奴人在马邑之围后三年多的时间中，并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入侵。然而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即使匈奴人不再认为汉帝国是可以随时鱼肉的对象，他们在经受灾害时也还是强烈渴望从农业区补血止损的。

对于匈奴人的大多数入侵行为，我们大致可以按季节分为两类情况。一种是在秋季的主动进攻；另一种则是发生在春季的被动进攻。所谓主动进攻，是指匈奴人并非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对农业区所发起的入侵行为。之所以选择在秋季，是因为这时期是草原上的牲畜，尤其是马增满膘的重要季节。

自春季牧草返青起，直至秋季牧草成熟结籽期，牲畜的体重基本都处在增长期。比起春秋两个过渡季来说，蒙古高原南部的夏季一般能在二到三个月。牲畜一年当中增长的体重，看起来大部分也生长于此阶段。然而对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来说，秋季能否上膘其实会更为关键。与诺尔盖这样平均海拔 3500 米左右，又不缺水的草甸草原相比。海拔 100——1500 米左右的蒙古高原，夏季要炎热得多（诺尔盖地区所谓“夏季”最高气温也不超过 24 度，基本可以被认定为无夏）。高温天气带来的最大问题有二：一是气温本身就会让牲畜很不适应；另一方面虽然牧草繁盛，但蚊蝇也多。牲畜由于受之影响，不能很好的休息，在盛夏期（7 月），一般很难增重，甚至会掉膘。因此，秋季能否贴膘，成为了牲畜能否过冬的关键。如果这个季节不能抓紧时间上膘的话，即使牲畜能够熬过寒冬，春天也没有足够的营养供给胎儿。

秋季虽然短暂（最多两个月），但初秋牧草繁盛，气候转凉，各方面条件都处于上佳状态；再往后牧草进入成熟期，营养都转入草籽。虽然牧草本身营养价值大减，但草籽本身却成为了牲畜一年当中最好的天然营养品。以马为例，六月一般只能上到半膘，9 月转凉之后的这一两个月中，会上膘 2——3 成，真正达到“秋高马肥”的地步。再往后入冬，牧草资源就明显不足了，牲畜就只能以自己的脂肪储备，来弥补食物的缺失了（为了应对冬天，游牧民族也会把最好的草场留作冬牧场）。正因为秋季是牲畜，尤其是食量较大、上膘期较长的“马”的满膘的季节（羊由于体型较小，条件好的话，7 月底 8 月初就有可能部分满膘）。所以这一时节是游牧民族机动力、战力最强的时节。加上此时农业区正处在收获季节，此时要是不南下



打草谷，匈奴人估计都觉得对不起自己了。

同时秋季也是草原上最有生机的时期。由于夏季集中了一年当中的大部分降水，即使是那些荒漠化的土地，在秋季也有几率呈现出生机；特别是在河流、湖泊周边，那些经由夏季洪水浸润过的土地，牧草的生长会格外茂盛。秋季不仅为草原带来了生机，也为游牧部落的聚集提供了物资基础。这意味着在一个面积较小的区域能够提供足够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口聚集的牧草。



夏季的草原



秋季的草原

今天蒙古草原上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就是这种秋季聚集传统的延续。只不过，现在的游牧大会已经纯粹成为比赛、娱乐的庆典了。对于喜欢在游牧之余，以渔猎补给肉食的游牧民族来说（畜肉并不是主要食物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奶制品来向牧民提供热量的），一年一度的秋季集会，也是他们合力南下劫掠农业区的最佳时机。而此时的农业区也正好进入了收获的季节，那些本来被农耕民族储存过冬的物资，也同样可以成为游牧部落度过寒冬、提升生活品质的储备。

正因为如此，秋高马肥之时也是汉帝国以及后世其他中原政权最为担心的时间段。当匈奴人在马邑差点落入汉军圈套后，匈奴人也同时意识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季不再只是匈奴人的盛宴了。然而问题是，即使匈奴人忌

惮汉军突然显露出来的实力，一时不敢在秋高马肥时南下，但他们在经历过残酷的冬季之后，仍然有可能出于生存的需要，在自己最为羸弱时向汉帝国发起进攻。

如果说秋季是游牧民族最为喜欢的季节，那么冬季就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时节了。只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秋季之后，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长达五个月之久的冬季（十一月至次年的三月）了。在秋季会尽量让牲畜增膘，以及在向阳的山谷（或者高山上的逆温层）寻找可供牲畜食用的牧草，成为了他们熬过寒冬的主要方法。假使牲畜的死亡率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在进入春季之后，畜群将随

着牧草的生长而迅速恢复；假使遇到极端自然灾害，那么“被动进攻”农业区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了。



冬季的草原

之所以说是“被动进攻”，是因为冬春交际之季，也是游牧民族体力、畜力最弱的时期。不是遇到了生存问题，他们也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攻击农业区（这一时期，他们本应集中人力快速将畜群移动至那些刚刚长出牧草的草场的）。公元前 129 年 2 月（农历），也就是在马邑之围三年半之后，汉帝国的边郡——上谷郡，就遭遇了这样一场“计划”外的进攻。而三年多来一直为马邑之围未能成功耿耿于怀的汉武帝也反应迅速。一场针对匈奴的主动攻击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 第三节 汉军在春季对匈奴进行反击

与匈奴经常在秋季对汉帝国边郡发起攻击有所不同，汉帝国反击匈奴之战往往选择在春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上节也说了，此时匈奴的人力、畜力都处于最弱的时期，这个时候前去攻击匈奴，可以算得上是乘虚而入了。当然，气候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汉军所倚仗的马匹也同样不可能在冬季吃到优良的牧草，以保持体力。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像游牧民族那样靠天吃饭的话，汉军此时也并没有比较优势来主动出击匈奴。

然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却并非完全靠天吃饭。与匈奴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不同，对汉地的战马来说，可以依靠由粮食作物所调配而成的“精饲料”来常年保持体力。当然，这样做的花费也是巨大的。仅从饲料成本来看，一匹战马所耗费的粮食就会



是单兵的四、五倍。而在长途奔袭中，为了保证机动性，往往一名骑兵需要配备不止一匹战马。这样算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与储备，中央之国是很难有足够的本钱对游牧民族展开反击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帝国才会在六十多年后，才有足够的力量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汉帝国甚至会专门种植供战马食用的大麦）。

事实上，发生在公元前129年春季的这场反击战，并非是汉军第一次对匈奴发起春季攻势。尽管在之前的60多年中，汉帝国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但也并非在军事上一味处于防御状态。只不过，那时的进攻更应该被视为防守的手段，或者说以攻代守，战略上并没有指望把匈奴人赶回老家去。偶尔发起的反击，一般是在匈奴发起秋季攻势之后，次年的春季主动出击一下，以显示自己在汉匈对抗中也有一定的主动权。真正在匈奴发起攻击之后迅速反应，向对手纵深攻击前进的，这算是第一次了。

从宏观角度看，这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帝国已经决心掌握汉匈之战的节奏了（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微观一点看，也可以理解为汉武帝在马邑之围失败后，急于寻找匈奴主力决战。不过单从技术上看，这种迅速反应也有它的道理。前面我们也说了，秋高马肥才是匈奴南下的最佳时机，如果他们在初春就急于入寇帝国边郡的话，十有八九表明此时的匈奴正因为气候原因，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损失。如果汉帝国此时正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没有理由放过这个“帮助”匈奴雪上加霜的机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帝国并无可能集结太多的军队。所能调动的就只有那些常驻边郡的常备军了。从战役部署上看，出击的汉军共分为四路，每路一万骑兵。由东至西分别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四郡出击，各自为战，寻找匈奴人接战。结合地理结构来看，这相当于从燕山西南角的宣化盆地到河套东部的前套平原一线，对阴山一线的匈奴力量发起全面反击。

在一些军事爱好者看来，汉军这种分兵出击的方式，无异于“找死”。在他们看来，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尤其是在地理、环境情况复杂的区域）。问题是，此时的汉军并无法明确匈奴主力在哪，也无法短时间集结足够的兵力进行排兵布阵，然后下战书与匈奴决战（这还得对方愿意）。他们所能判断出来的信息，就是那些分散在山谷之中越冬的匈奴部落，此时正遇到了大困难。如果此时出击的话，他们分别所要面对的匈奴人，无论从数量还是战力来看，都不大可能有优势。

实际上对于汉军来说，判断匈奴主力的位置，永远是一个难以做到的问题。因为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并非像农耕民族那样，定居于一片土地上。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前根据匈奴各部的大致游牧区域进行分划战区，然后数路出击，这也成为了汉匈之战中汉军所最常使用的战术。而战役的目的（尤其是在帝国无法立足草原地区的情况下）也并非攻城略地，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几乎成为了记功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要考虑己方的损失）。

只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对于像李广这样守土有功，能够威慑对手不

敢轻易南侵的将领来看，就未必有足够的斩获来加官进爵了。说到汉匈战争，除了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幸运儿之外，悲情英雄的代表——李广也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人物。

#### 第四节 卫青攻入匈奴龙城

通常情况下，发生在公元前 129 年春的这场战役会称之为“龙城之战”。然而，真正发生在匈奴信仰中心——龙城的这场战斗，只是整个战役的一小部分，也是唯一取得胜绩的战斗。我们之前也说了，这是一场四路出击，各自为战的战役，除了卫青之外的另外三路都没有获胜。其中一路未遇匈奴部，无功而返；另两路则折损大半兵力之后，落败而归。

不过，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看，率军从雁门出击的李广却写下了神奇的一笔。在兵败、负伤被匈奴俘获之后，李广成功从押送他的匈奴骑兵手中逃脱，并且在摆脱数百追兵之后回到了汉朝领土。尽管李广这次的超人之举实际上也为汉军立威，并间接为汉朝边郡的安全贡献了力量（“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然而这场战役的主角，注定是直捣龙城的卫青。那么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到底在哪，这场战役对于汉匈战争地缘结构的影响究竟又在哪里？

拜唐诗所赐，“龙城”之名的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那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唐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于与汉朝在北方面临同样局面，又都有力量进行反击的唐朝来说，汉匈之战的很多事迹自然会借来抒发情感。不过就这两句唐诗来说，却有一个千古疑案，那就是“龙城飞将”到底指的是谁。

单就一个“飞将”来说，很自然的大家就会想到被匈奴明确畏之为“飞将军”的李广了；然而若以“龙城”来论，那诗句所指向的最有可能的就是曾经直捣龙城的卫青了。揣度唐人的心理，李广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使匈奴数年不敢来犯，但卫青的功绩在于主动进攻，并视对手腹地如无人之境，应当更能为时人所崇拜。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龙城飞将”并非单指一人，而是龙城、飞将，指向的是卫青、李广两人。如此将、帅，攻、守结合，胡人自然不敢轻言南下了。

好了，言归正传，毕竟这不是一个文学考据的帖子。其实从地缘角度考据，最大的谜题并不在于谁是匈奴最惧怕的汉将，而是卫青所破之龙城究竟在哪。作为匈奴人祭祀天神的场所，历史有明确记载的龙城，是在漠北色楞格河盆地，今天杭爱山麓的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今蒙古“哈拉和林”）。然而经过测距我们会发现，漠北龙城与卫青出发的上谷郡之间直线距离约有 1200 公里。很难想象，一支带有被动反击性质的军队，能够在匈奴腹地横穿 1200 公里（中间大部分还是大漠戈壁），直取对手的核心之地，然后在斩杀七百人后再全身而退。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卫青所攻击之龙城并不是在漠北，而是在漠南。鉴于匈奴自视对汉朝拥有强大优势，并且也实际占据了阴山以南的云中、雁门、代郡等边郡



的部分地区。因此为了方便这些在漠南游牧的部落每年五月祭拜天神，在阴山乃至燕山西北麓设置一个新的祭祀中心也是很有必要的。

很多朋友一定希望我在地图上明确标出这个南“龙城”的所在。不过对于一个由游牧民族所立（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堆帐篷，再加一堆石头了），后来很快又因为汉帝国反击，而弃之不用的圣地，我们并没有办法为之准确定位。然而，结合卫青的出击方向来看，大体的方位还是可以推理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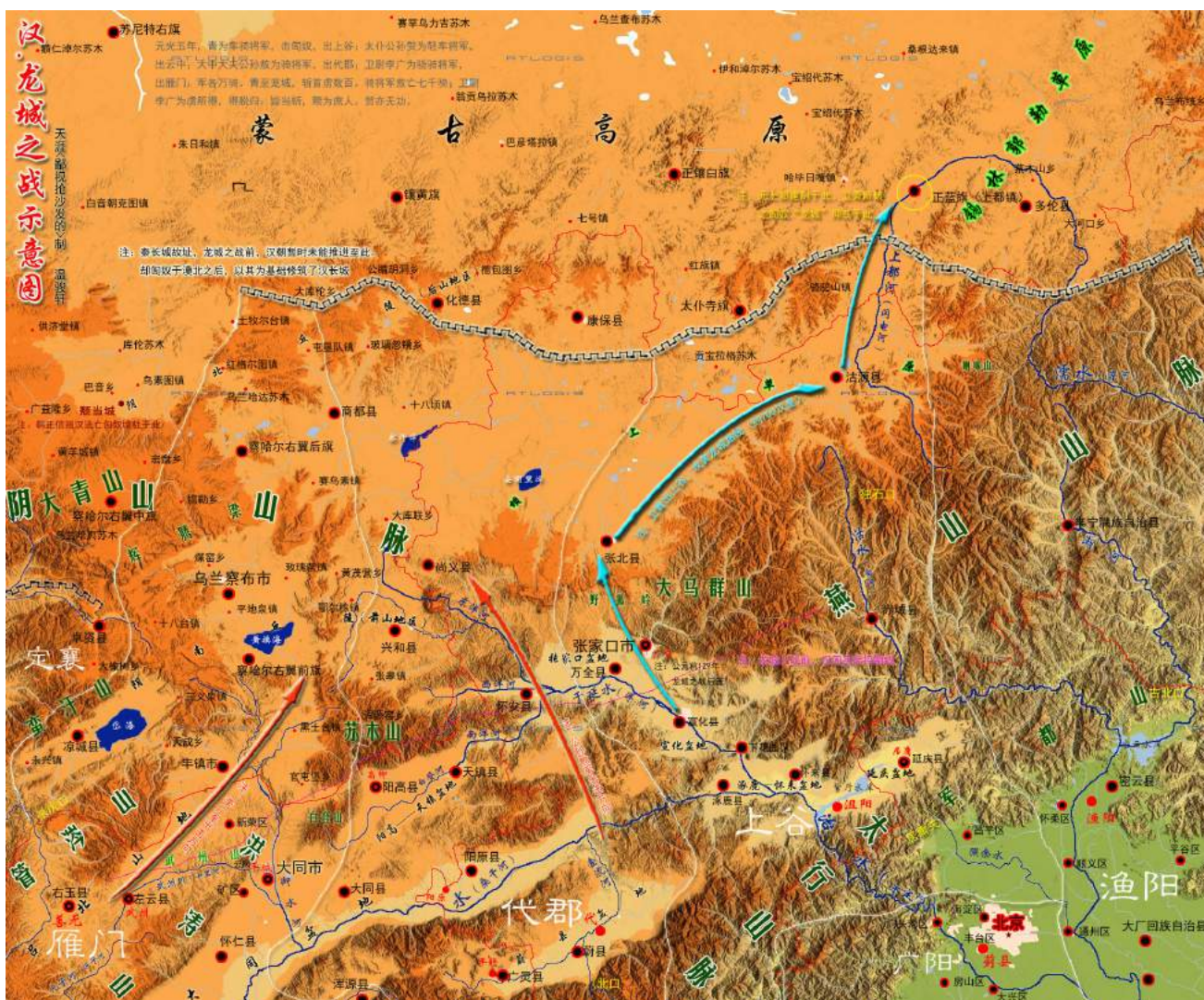
汉·龙城之战示意图

所谓“上谷郡”，从地理结构上看，其主体就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相接处，由西至东一系列盆地的集合体，再加上华北平原西北角的一小块区域（今北京昌平地区），用以在地缘上紧密与华北平原的关系。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这条盆地带应该自河北的万全县起，向东包括张家口、宣化、涿鹿、怀来、延庆等地阴山——燕山一线的边郡结构，在战国后期就已由燕、赵两国定型了。我们之前也曾经花过不少笔墨来解读，所以印象模糊的朋友可以按目录回看相关内容。以上谷郡的地缘



位置来看，卫青和后来北出上谷的汉军，北上攻击匈奴的话，他们最有可能出击的位置，是由今天张家口市的位置向北翻越燕山余脉——野狐岭，然后进入今天河北省张北县境内。

今天从张北县境，沿燕山山麓向东北延伸至丰宁满族自治县北的这条草原地带，被称之为“坝上草原”。由于能够直接承接燕山之水，即使在中央之国大部分地区整体自然环境远不如古典时期的今天，这条燕山西麓草原带也仍然显现出一片宜人景象。从地理环境和位置上看，坝上草原无疑应该是内蒙古草原的一部分，也自然应该是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然而由于整个山西高原、张家口盆地之北，都处于阴山——燕山相接地带，两山的山势在此都已走弱。因此自战国起，中央之国都努力将防线延伸，借助两山在内蒙古高原延伸的一些丘陵，构筑长城防御体系（大致就是今天河北张家口地区向北与内蒙的交界线了）。



汉·龙城之战示意图

尽管在赵、秦时期，坝上草原已经被纳入了长城的保护范围，然而由于匈奴一



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并没有机会真正控制这块上谷郡的北部领地。事实上，在龙城之战前，即使是张家口盆地一带，帝国也无法建立真正的统治（上谷郡当时的控制线应止于宣化盆地）。就像吕北山地腹地的武州山，阳高——天镇盆地北部的苏木山，成为了雁门、代郡的北部控制线一样。

以卫青的出击范围来看，出上谷后进入坝上草原，沿燕山山麓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应该是他此行的方向所在。而阴山东部的阴南、阴北丘陵（大致对应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当地称前山、后山地区），则属于雁门与代郡的搜索区域。至于由云中郡出击的那一万兵马，自然是以河套地区为攻击方向了。

既然卫青的攻击方向是燕山的山前草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龙城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坝上草原呢？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有，但从匈奴人的角度来说，将如此重要的圣地放在对手的长城防线以南，并不是件稳妥的事（虽然汉帝国暂时无法控制长城防线）。也就是说，卫青沿燕山山麓，再向东北方向渗透一些，找到漠南龙城的可能性会更大。



元上都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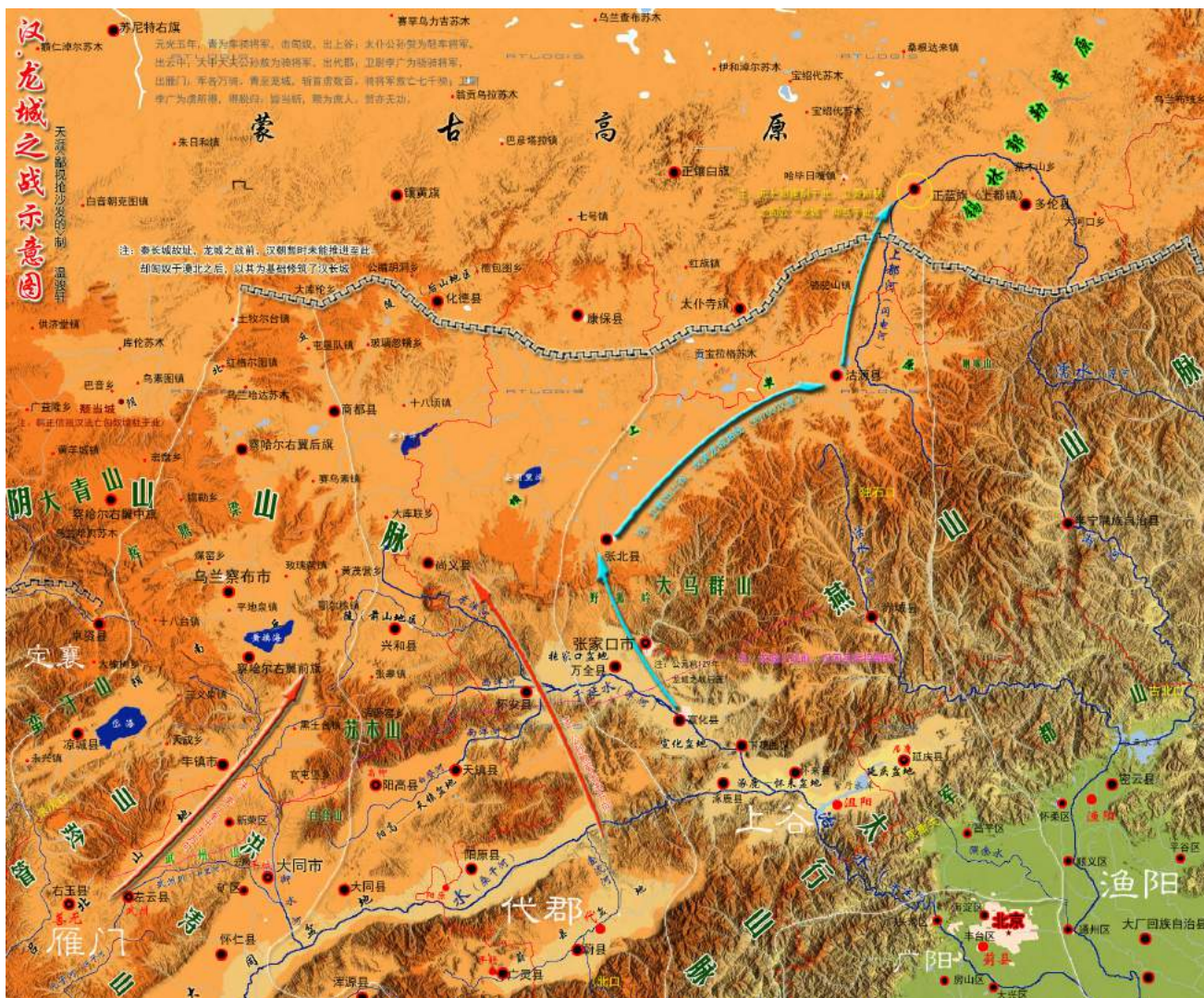
向东北方向步出河北境内的话，行政上我们将跨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行政范围。而同样燕山直至大兴安岭（南段）西麓的这条草原带，则可以称之为“锡林郭勒草原”。无论从历史情况，还是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这条草原地带是稳定处于游牧民族势力范围的。而有了足够“厚”的燕山主脉庇护的中原王朝，也并没有试图在此建立长城防线。尽管卫青所破之龙城，已经很难有遗迹尚存了。不过地缘研究的优势就在于，它所参考的是一些相对不变的恒量。也就是说，鉴于中央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地缘博弈，实际上是一场起自战国后期，长达二千多年的轮回。在地理、环境没有大变化的

的情况下，既然那些由中央之国确定下来的地缘要点能够延续下来。那么草原游牧体系在做出相关选择时，也同样有可能变化不大。也就是说，当年匈奴人在燕山山麓所选定的祭天圣地，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有可能被后世的游牧民族所看中。

按照这个思路在锡林郭勒草原寻找的话，我们很快能够在这个草原地带的南部，



找到一个草原之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这个曾经为蒙古人所看中的草原枢纽所在，与漠北匈奴龙城所在，在地理结构上颇为相似，即都处于山麓丘陵盆地之中的草原地带。外有山地护佑，内有大河流过，如果草原上有人来看风水的话，相信一定会认为这种地形、环境会是风水宝地。



汉·龙城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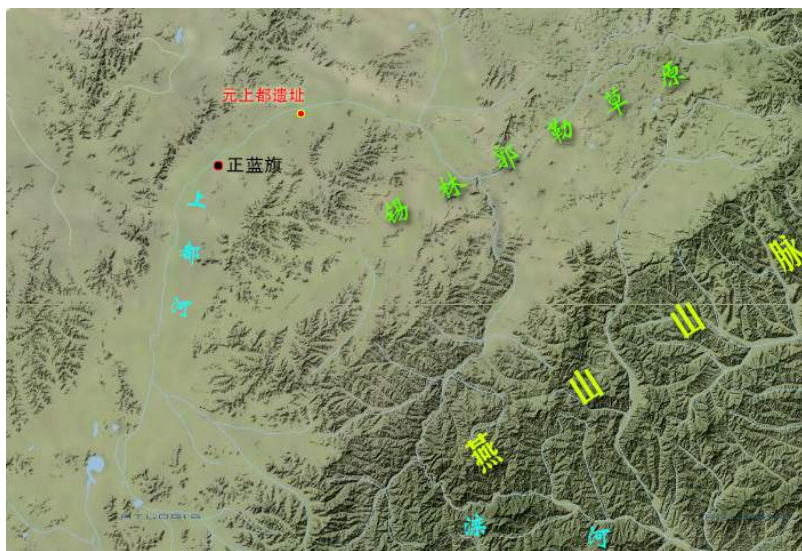
以匈奴内部三大板块的划分来看，锡林郭勒草原属于匈奴左翼，也就是一般作为单于继承人的“左贤王”势力范围。这一区域在匈奴坐大之前，是属于东胡部的游牧区。而作为东胡后裔的蒙古部落，也正是兴于左贤王故地。如果蒙古人在南下之时，是按照与匈奴左翼部族相同的地缘逻辑来定位自己在漠南政治中心的话，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当然，目前并没有考古证据指向后来的元上都，就是卫青所破匈奴“龙城”之所在。不过却有研究者认为有史料记载，卫青从上谷郡出击，出上谷后约700里可见龙城。虽然我个人并没有找到史料出处，无法确定这个距离是否被记载下来。但今天如果



从宣化出发，经张家口市——张北县，沿 207 国道直至上都镇的话，我们会发现交通距离为 290 公里，折合汉里的话，恰好约为 700 里。

综上所述，卫青所破之龙城，应该是匈奴左翼部族在漠南的祭祀所在。由于匈奴地域实在太广，内部各板块都有自己的祭祀中心也很正常。后来河西之战当中，霍去病也曾经将“休屠祭天金人”收为战利品。鉴于左贤王部在匈奴体系中的继承人地位，以及提振士气的需要，将卫青所破之匈奴左翼之祭祀中心，概称为“龙城”并无不可。



元上都遗址示意图

单从双方的损失来看，汉军这次动用四万骑兵所发起的春季攻势，应该算是赔本买卖了。虽然卫青部攻入龙城，斩获了七百人，但仅仅北出雁门的公孙敖部，就损失了 7000 人（更别说还有李广部的损失和被俘了）。尽管此时的汉帝国家大业大，能够承受数倍于匈奴的人员损失，但这个费效比也是难以承受的。如果用这个损失来衡量日后以斩获为唯

一目的漠北诸战（因为不可能据地），那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都算得上是完败了。也正因为如此，卫青的这次突袭才会被大书特书（甚至因此而封关内侯）。

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次反击还是有很大收获的。因为在此之前，尽管雁门、代郡、上谷诸郡都把行政边界划到了秦人所连接的燕赵长城一线。但实际上，这些边郡的北部地区都已经算是匈奴内地了。通过这次反击战，汉帝国的实际控制线终于向北推进了。根据历史记载，最起码卫青此役经略的上谷一线，将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了张家口市一带（公元前 129 年，在此设广宁县）。龙城之战算是帝国将星卫青初试锋芒之役，不过无论汉武帝和匈奴单于都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一系列更加激烈的汉匈之战，也即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

如果说马邑之围拉开了汉帝国战略反击的序幕，那么龙城之战就相当于一把钥匙，直接在双方漫长的边境线上，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自此役之后的十年间，汉匈之战在军事上进入了惨烈的拉锯阶段，每一年都会有战事发生（此阶段终于公元前 119 年的河西之战）。只不过，与马邑之战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匈奴不再总是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汉帝国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的将匈奴逼入死角。

## 第五节 卫青出雁门郡反击再次入侵的匈奴

当汉帝国明确摆出反击架势之时，作为一直以来掌控战争节奏的匈奴一方来说，自然是不会甘心让汉军占得上风的。更何况，此时匈奴人的损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龙城之战的次年，也就是公元前 128 年，匈奴方面又一次借秋高马肥之机，向汉帝国发起了全面进攻。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攻击的主力，应该是匈奴左贤王部。因为遭受攻击的方向，是当年由燕国所初立的辽西、渔阳、上谷三郡。也就是说，汉帝国在燕山一线的防线，是匈奴这次进攻的方向。在我们最初为匈奴内部划分的“猎场”中，整个燕地边郡都是匈奴左翼的劫掠目标。基于龙城之战当中，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很有可能是匈奴左翼部落在漠南祭祀中心的原因，左贤王诸部次年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内，发起全面报复性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年 11 月，曾经对渔阳发起过试探性攻击）。

关于帝国在燕山一线这几个边郡是如何划分的问题，不太清楚的朋友可以回看战国部分。在燕国部分，我们曾经对“燕北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的地缘结构做过详细的解读。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汉帝国的反击序列中，为什么除了可以与原赵北三郡（云中、雁门、代郡）配合的上谷郡以外，其他燕北边郡所对应的防区基本没有成为汉军反击的方向。即使遭受到攻击，也只是原地防守，一般并不会主动出击（为配合西部战场，李广、张骞在公元前 121 年，从右北平方向出击过一次）。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仔细观察一下，帝国在燕山一线的对手究竟是什么人了。从大的板块划分来看，整个燕山防线所对应的自然是匈奴左贤王部了。然而具体到渔阳及其以东地区的防御对象来看，却在地缘结构上迥异于匈奴本部。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每一个边郡和长城的设立、修筑，都可以说是为了防止“胡人”南下。不过燕国最初所防御的对象，却并非是为患秦、汉边境，崛起自蒙古高原腹地的匈奴人，而是游牧于大兴安岭——辽河流域一线的东胡部。

不过，当秦人为中央之国混乱的战国时代划上休止符时，北方的匈奴人也战胜了东胡等部，成为了北方草原的主人。匈奴左翼所领有的大兴安岭——燕山西侧草原地带，实际上就是从东胡部手中夺取的。尽管匈奴人最终战胜了东胡部，但他们却并没有彻底消灭（或者说融合）这些草原上的竞争者。遁入大兴安岭北部森林地带，暂时退而转为渔猎部落的鲜卑人；以及被压缩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事游牧、渔猎生活的乌桓人就是东胡部的遗存。

匈奴人之所以没能完全整合掉东胡部落，并非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在我们解读草原游牧部落时，一直会提到一个“干草原”的概念。作为欧亚大陆腹地典型草原，干草原地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因为一般干草原地区的年平均降水，是在 250——450 毫米之间。这



样的半干旱气候，可以生长那些耐旱的草本植物和灌木，但却无法支撑乔木的生长。只有在干草原的边缘地区，那些更靠近海洋，能够相对充分接受海洋水汽润泽的地区，才会出现大片森林。而在干草原地区与森林之间，就会出现一种过渡性的植被覆盖区——森林草原地带。



干草原地带



森林草原地带（一）

就是我们刚才所定义的“森林草原”地带。在蒙古高原的西北边缘，被很多朋友牵肠挂肚、耿耿于怀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山地——平原，草原——森林相接的地理环境，使得不仅居于这种森林草原其间的部族，同时显现游牧、渔猎两种特征，还有机会再夹杂出农耕区来。

总的来说，像匈奴这种典型游牧体系并不适应那种被森林包围的感觉。对于习惯了大草原地带的他们来说，那些与草原相杂的森林将会极大的影响他们的机动性，以及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对于这些与燕地边郡相接的森林草原地带，匈奴

作为草原的边缘，森林草原地带的生产方式虽然主体上还是可以被归入游牧体系，但由于森林的存在，渔猎则会成为森林草原部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补充。一旦草原被对手所侵占，这些森林草原部落甚至会很快退入山林，转而成为纯粹的渔猎部落（反之，如果有合适的时机，他们又会回到草原，典型代表就是鲜卑）。而在干草原地带，“纯粹”的游牧部落虽然也会经常渔猎，但只是作为一种游牧之余的补充罢了。

虽然相比干草原地带，森林草原地带的体量并不占优势，然而能够兼具游牧、渔猎两种生活方式的优点，还是让人不能小觑这些过渡地区的潜力。比如乌桓人，虽然他们和其他东胡部落，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干草原地带不敌匈奴人。但一旦退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匈奴人就很难与之决战了。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被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包夹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是典型的草原——森林过渡地带，也就是

人宁愿留给乌桓人来经营（前提是乌桓人的确臣服了）。

当匈奴人决定从辽河流域入手（西拉木伦河为辽河上游），从东北地区攻击汉帝国时，乌桓人肯定会被征调给予配合的。然而无论是汉帝国还是乌桓人都清楚，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在匈奴帝国地缘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因此，如果没有匈奴人的直接介入，乌桓人本身并不太会主动为患汉帝国。而即将发起战略反击的汉帝国也不会把大兴安岭以南、以东地区作为主攻方向（双方在渔阳以东地区的攻防，都只能算战术级别的了）。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汉帝国在公元前 128 年所发起的反击，仍然是在汉匈战争的正面战场：雁门——代郡一线。



### 森林草原地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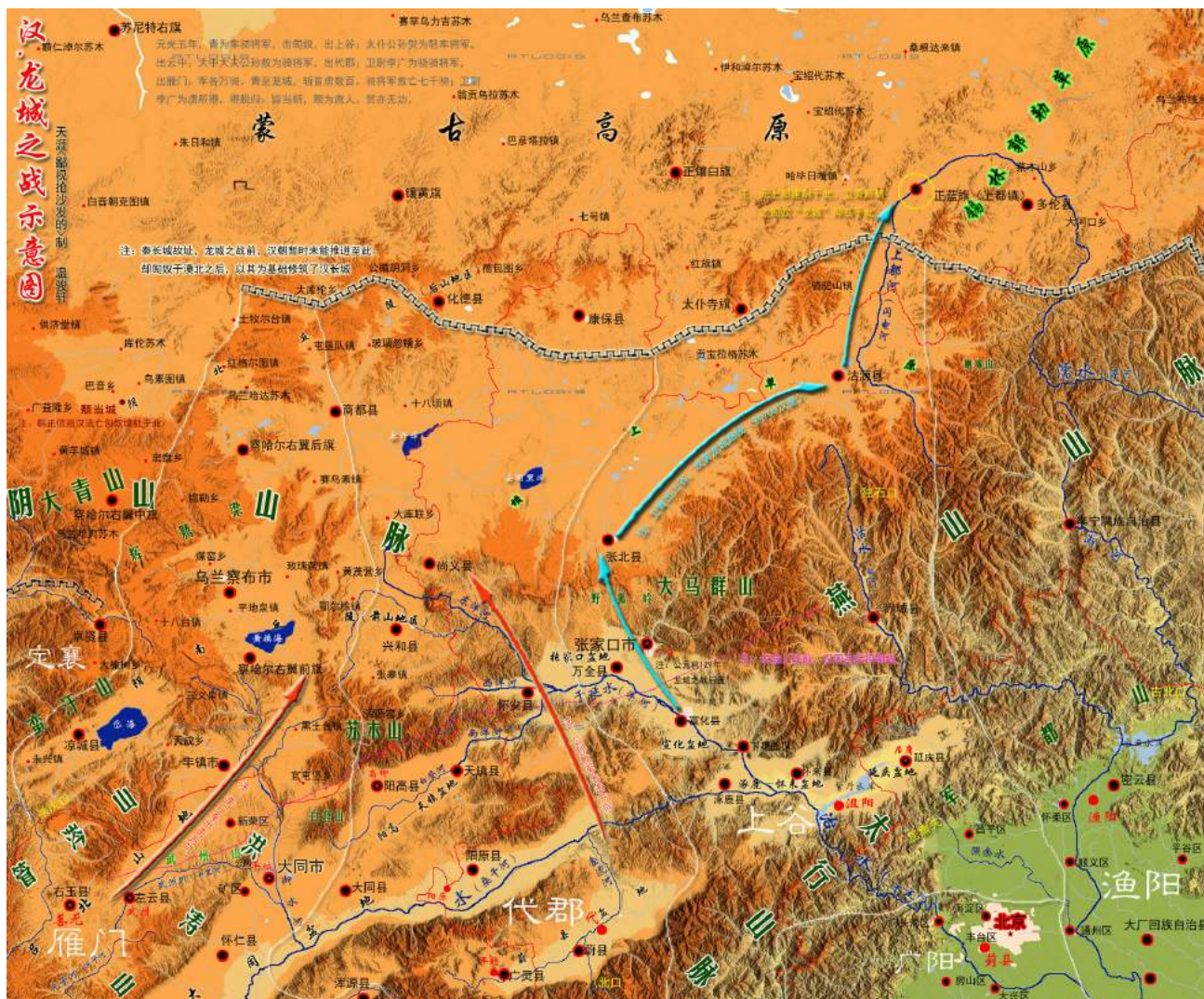
很快，在龙城之战中初试锋芒的卫青被调至雁门。这一次，他所率领的反击部队也伴随汉武帝对其能力的认可，相应增加至了三万。配合卫青发起攻击的，是另一路由代郡北上的汉军（李息部）。之所以将卫青所率领的主力放在雁门出击，是因为在匈奴的这一波秋季攻势中，雁门郡也与燕山防线一样，受到了冲击。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次反击也是为了弥补去年的遗憾。因为在上一年春，除了攻袭龙城的卫青部顺势收复了张家口一带以外，北出代郡、雁门的两支部队，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很自然，他们也没有可能帮助帝国把控制线从武州山——苏木山一线，推进到阴山北麓的秦长城一线了。从结果上看，卫青所组织的这次秋季反击战，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战果的，匈奴方面的直接损失为两千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战役，汉帝国在雁门、代郡方面的控制线也开始像在上谷方向一样向北推进了。

经由卫青在公元前 129、128 年所主导的两次战役，汉帝国在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相接的这一地区，实际控制线究竟推进到何种程度，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在这一过渡地区存在着两条地缘分割线。一条是西起辉腾梁（属阴山东），东至大



马群山（属燕山西）的分水线。今属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山前地区”的阴南丘陵，及其以东的张家口盆地，都是属于这条分水线之南。推进到这条分水线的话，汉帝国这几个边郡的安全也就有了基本保证了。然而如果要更好的保护雁门、代郡、上谷的安全，汉军还必须继续向北推进。



汉·龙城之战示意图

前面我们也说了，在张家口盆地以北，沿燕山山麓的草原地带被称之为坝上草原。所谓“坝”的本意，指的就是台地。这片台地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蒙古高原南部，由阴山——燕山山脉余脉单独圈出的一个类盆地区。因为两山除了在我们刚才所划定的分水线一带有破碎山地对接以外，还在其北约 80 公里处连成了一条弧状的丘陵线，完美的将这片台地包围了起来。这片台地目前大部分划归为河北境内，在两千多年前，整个台地无疑都是为连片的草原所覆盖，我们完全可以用“坝上草原”的标签覆盖这一板块。在秦帝国的版图上，他们已经把长城推进到了坝上草原的北部，将这个燕山——阴山相接处的草原跳板纳入了中央之国的范畴。今天河北与内蒙古

在这一地区的分界线，也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一点。

要想控制坝上草原，重修秦长城就是必需的了。以卫青的这次出击来说，暂时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因此公元前 128 年秋季反击之后，汉帝国的控制线应该是稳定在了辉腾梁——野狐岭一线（今天这两条山地之上仍然能看到秦汉长城的遗址）。虽然还不能说能够依托坝上草原北部的秦长城故址，完控坝上草原，但山西高原北部的战略安全已经有了保障。换句话说，匈奴再想像以前那样，如入无人之境般深入马邑、平城所处的大同盆地，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当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基本安全有了保障后，接下来汉匈战争的重心就要向西转移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也即将在卫青的率领下，在河套平原的战场上展开。



## 第二十八章 汉帝国在河套展开河南之战

### 第一节 匈奴控制阴山南麓的河套地区

如果说秋高马肥之时的南下，对于匈奴人来说是一场节日，那么初春时的袭扰，则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了。在公元前 128 年秋，被卫青（李息）出雁门、代郡反击得手之后。匈奴人肯定希望在下一个秋季扳回面子。就像他们这一年在辽西、渔阳、上谷、雁门一线发起的全面攻势，可以视作是在雪上一年的龙城之耻一样。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刚刚又跨越一个冬天，匈奴人又迫不及待的从燕山西段渔阳、上谷两郡入侵了。

在汉帝国决心发起战略反击后（马邑之围起），战略准备充分的汉军对匈奴人发起的任何一次进攻，都会及时作出反应，更何况这次匈奴人所发起的又是一次无奈的春季攻势。之前我们也说了，在这个马瘦毛长的时节侵扰帝国边郡，意味着匈奴人的这一个冬天又遭受了重大损失。

尽管匈奴人的每一次进攻都会给边境造成损失，但总的来说，匈奴人的这种侵扰所图谋的只是财帛子女，并没有领土上的企图。当然，在阴山以南那些农牧皆宜的土地，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了。从帝国行政区划来看，这些地区包括上谷郡的西部，雁门、代郡的北部，以及云中郡及其以西地区。通过之前的两次反击，雁门及其以东部分，汉帝国已经基本推进到了阴山分水岭。因此在匈奴人发起这次春季攻势之后，汉武帝并没有让他所倚重的卫青在原地发起反击。这一次，卫青的攻击重点，将是云中以东的河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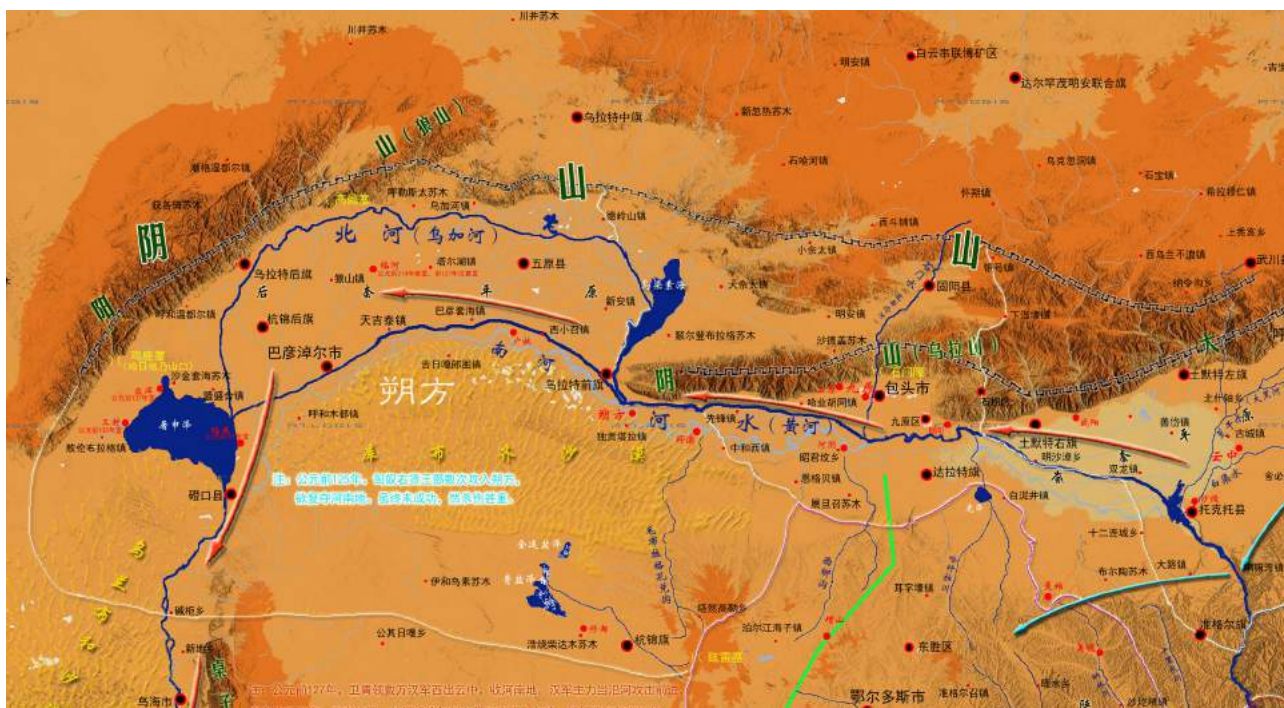
在之前的文字中，我们已经对河套地区的地缘结构做过一些解读了。这片能够得阴山庇护，河水润泽的土地，对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黄土高原的农耕民族都有着重要意义，将之定位为汉匈战争中的天王山并不为过。如果匈奴人退出了河套地区，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漠南最为肥美的草原；而如果汉帝国能够将匈奴人赶出河套地区，那么不仅汉军的马匹供应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更能够移民以实边，在这片草原牧地上拓展灌溉农业。正因为如此，在山西高原以北地区基本完成战略反击目标后，公元前 127 年春，一场发生在黄河两岸的大战也拉开了序幕。

这场依旧由卫青所指挥的战役，史称“河南之战”。这里所说的“河南”，当然不是指黄河下游的“河南省”了，而是指曾经为匈奴所苦心经营的“河南地”。“河南地”这个标签，在之前解读河套之时，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地理、地缘结构再做一次详解。

从字面上看，所谓“河南地”自然指向的是黄河以南地区。以今天的黄河流向来看，这一地区似乎指向的是鄂尔多斯高原。然而今天黄河在阴山脚下的流向，却

是经过3上千年灌溉农业开发的结果。二千多年前，黄河干流的位置在包头以西地区，要靠近阴山山脉得多。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条昔日的黄河干流。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黄河在后套地区形成了一个河流纵横的矩形水网。除了今天被视作黄河干流的最南边的河道以外，紧贴阴山山脉的那段河道也依然存在。这段黄河早期的河道，现在被称之为“乌加河”。而乌加河及其以南，被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包夹而成的这片平原，就是“后套平原”了。也就是说，所谓“河南地”，除了鄂尔多斯高原以外，也包括后套地区。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事实上，匈奴在阴山南麓的领地，也并非只有地理意义上的“河南地”。因为乌加河以东直至包头东部的这块山、河之间的土地，也是匈奴人的牧场，并且还是核心之地。说到这里，我们要再复习一下阴山山脉的地理结构了。今天山西与河北在张家口一线的行政分割线，可以视作是阴山山脉的东境。也就是说，上谷郡所对应的包括野狐岭在内的山地，都是属于燕山山脉的延伸。而雁门、代郡所对应的那段杂乱无章的丘陵：分水线以北的“阴北丘陵”，以及分水线以南的“阴南丘陵”，则是阴山山脉的东部余脉。

这些丘陵地带，对游牧民族来说毫无障碍。尤其是在秋季，丘陵地带的植被往往更能收获营养价值更高的草籽（所以一般会作为秋季牧场使用）。因此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农牧交错之地，既能帮助他们的马匹堆积越冬所需的脂肪，又能够让他们最为快速、方便的进入汉地劫掠。有了这诸多好处，相信大家也已经清楚，



为什么紧邻阴山东部丘陵地带的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总是那么高频率成为匈奴犯边的对象了吧。当我们的视线从这片丘陵移开，继续向西探究的话，阴山山脉的山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不过整个阴山主脉并非是呈东西贯通状，而是被分成了三段。最先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是西南——东北走向，与吕梁山脉北部延伸的管涔山呈现夹角对接的大青山。

在今天的地图上，大青山脉的西南端所指向的是包头市的东部（九原区、东河区）。在这一区域，黄河与山体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而在匈奴占据此地时，水量更大的黄河水会更靠近大青山。也就是说，在河套地区的中部，天然形成了一个山水相接的地理分割点，将河套地区分为了东部的“前套平原”与西部的“后套平原”。

## 第二节 汉朝与清朝在河套面临的形势对比

对于可以从陕北高原北部（上郡），以及山西高原北部（雁门）两个方向出击的汉帝国来说，他们在卧薪尝胆的这六十多年间，在河套地区也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曾经被赵、秦两代建制为“云中郡”的管涔山分水岭以西，大青山分水岭以南的前套地区，稳定的成为了帝国的领土。而这也成为了卫青一战收复河南之地的基础。

由于暂时不能恢复秦帝国时期在河套地区的控制力，所以为了缓解云中地区的压力，也为了让自己的防线增加纵深。汉帝国将故云中郡的东部，也就是管涔山及其山前（西麓）地区，分割出了“定襄郡”（也包括对应的大青山地区）。也就是说，定襄、云中两郡都是为了应对来自“河南地”的威胁而设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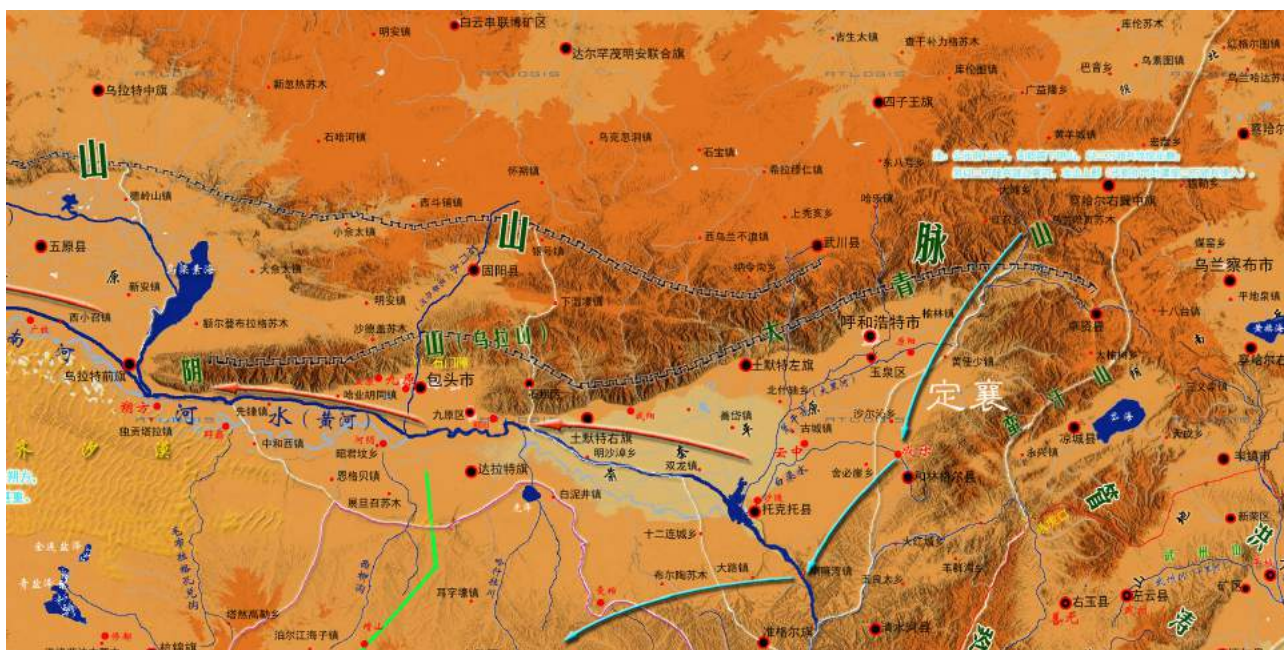
今天领有大部分前套地区的行政区，就是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了。基于前套地区的地缘位置，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这个板块都是中央之国深入河套地区的跳板。说起来，在清帝国又一次按照相同的路径，将河套地区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时（击败准噶尔部后），在今天呼和浩特土地上所兴建的两座城市之名：归化城、绥远城要通俗易懂得多（当然指的是接受汉字教育的人）。只不过，在它确定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时，再用这个带有征服意味的“汉名”，似乎就不太合适了。因此带有游牧气息的“呼和浩特”，成为了归绥城的新标签。

相比呼和浩特来说，“包头”之名看起来更像一个有汉字意思的名称。不过，这却也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带有游牧色彩的名称（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虽然这座城市的崛起，直接得益于19世纪后期开始走西口的山西人。但就当时的农、牧分割线来看，包头所辖地区依然应该被认定为游牧区。这也就是说，历史仿佛一个轮回，尽管清帝国对游牧民族的政治控制力，达到了古典时期的顶峰。但具体到地缘分割层面，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帝国中央集权与边缘地区自治的分割线，与河南之战前汉匈两国在此的分界线仍然非常接近。

当然，相比针锋相对的汉匈战争时期，清帝国统治下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

要显得“和谐”得多。尽管帝国也知道，直接进驻前套平原对于制约游牧民族在漠南的势力有多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把游牧部落完全挤出前套平原（只要不坐大，蒙古人仍然是被满洲人视为可以信赖的盟友的）。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在前套平原的西部，看到土默特左旗、右旗这样的县级行政区。至于东部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一带及其以东部分，则早在清中期就已经成为移民实边的屯垦之地了。

相比满洲人需要在河套地区所面临的相对复杂局面（如何权衡汉、蒙关系），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战略任务就要简单得多了。将匈奴人完全赶出河套地区，是他们此时唯一的战略目标。只不过在后来随着汉匈奴战争进入第三阶段，汉帝国也同样开始面临着与清帝国同样的局面了。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最终和清帝国一样，面临管理难题的是东汉帝国。经过三个甲子（公元前 133 年马邑之围——公元 48 年南匈奴内附）的博弈，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戈壁大漠为缓冲，分裂而成了南、北匈奴。而选择内附汉帝国的南匈奴，则被重新安置在了河套地区。从政治上看，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中央之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却意味着游牧民族能够兵不血刃的重建漠南王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强大的汉帝国开始走向衰弱时，这些曾经的战利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相信不用看历史，大家也能感觉到了。

当然，如果内附的匈奴人仅仅是被安置在河南地，甚至整个河套地区，最终当他们重新成为农耕政权对手时，中央之国所面临的局面至多不过是回到汉初阶段。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东汉末年直至三国时期，那些被进一步分而治之的匈奴人，已经被“安置”入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这些已经完全熟悉中央之国的游牧



部落，最终直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剧的统一王朝“晋”的直接终结者。自此，中央之国陷入了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五胡乱华。

匈奴内附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最深远影响，在于让游牧民族逐渐熟悉了农耕文明体系，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游牧民族不再满足于对中央之国边境的袭扰（或者商业往来），而是萌生了入主中原的想法。自此，中央之国的王朝系谱上也开始出现不少异族血统的王朝了。

尽管今天的我们能够有足够跨度的历史来回顾、总结汉匈之战的种种得失，但当时身处其中的人，却没有可能想得那么远了。对于汉武帝来说，他现在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将匈奴逐出河套地区，恢复秦帝国在阴山的控制线。基于这个想法，后套平原将会是卫青此次攻击的重心所在。至于降水少，又无黄河水润泽的鄂尔多斯高原，并不能为匈奴人的牲畜提供多少牧草。在失去了河套平原之后，匈奴人并无可能单靠鄂尔多斯高原立足的。也就是说，只要取得了后套平原的控制权，整个河南地也就相当于成为了汉帝国的领土了。

### 第三节 卫青在河套地区的攻击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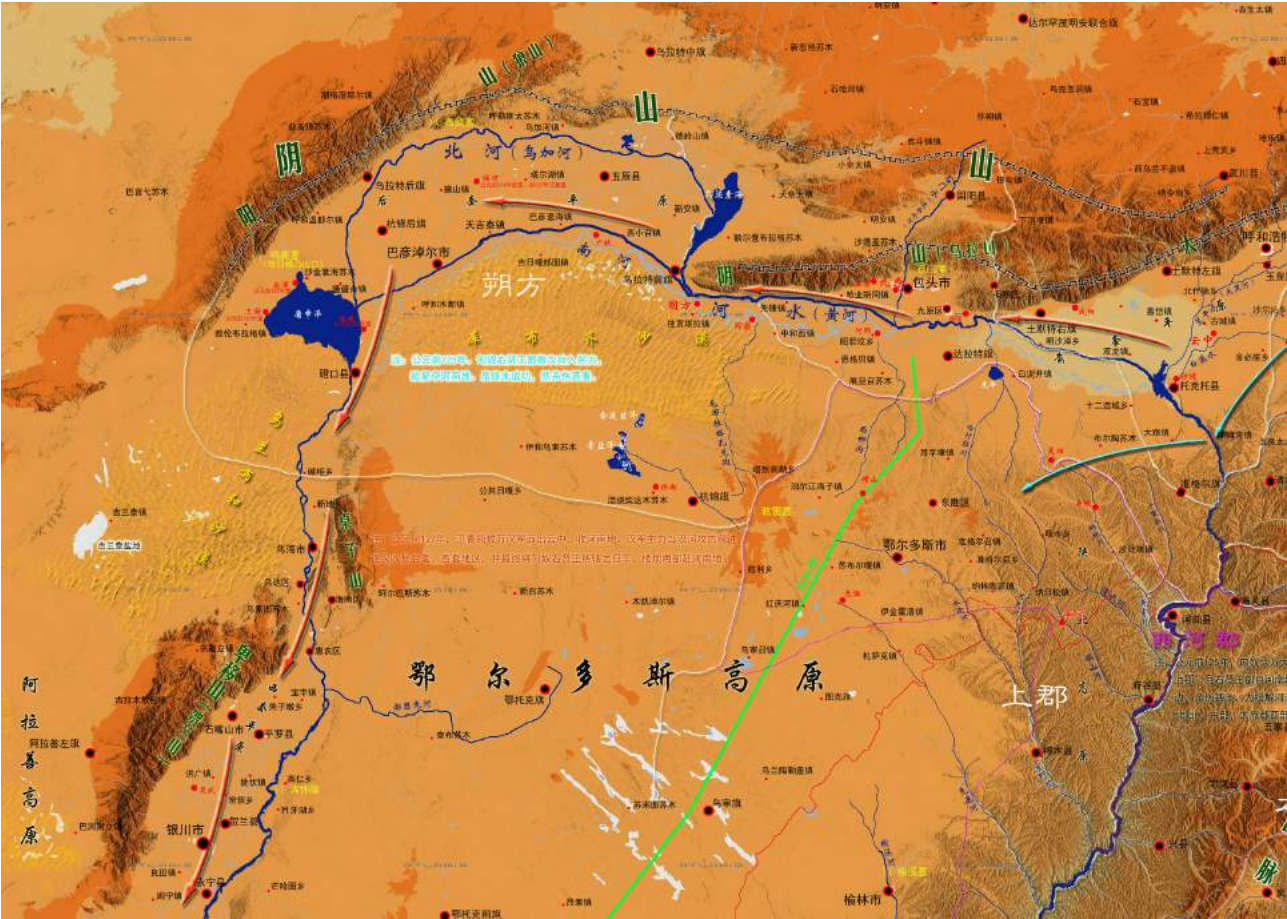
如果说大青山是前套平原的守护者的话，那么后套平原的守护者就有两段了：一段是西部与乌加河平行而生的“狼山”（又名阳山）；另一段，看起来更像是大青山的东南支脉——乌拉山。乌拉山其实就是狭义的“阴山”了，一直到清初都被视为黄河干流的“乌加河”在沿着狼山南麓东行至乌拉山北时，又开始转向，在经过一片洼地“乌梁素海”之后，切入到乌拉山西南角。然后再转而东行，直至在大青山西南角，再一次与阴山山脉亲密接触。也就是说，在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三段山体的合力作用下，今天包头所处的这块后套平原，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由乌拉山、大青山、黄河三线包夹而成了三角地带。而这个位于乌拉山与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也成为了整个河套平原的核心地带。

这样一个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又得山河之便的板块，自然会受到匈奴人的青睐。早在秦、匈博弈阶段，匈奴人就曾经将漠南王庭（单于庭）布设于此，并兴建了一座“城”——头曼城（由匈奴头曼单于所建）。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汉匈交战之时，包头地区仍然是匈奴漠南王庭的选择。但在公元前127年，卫青发起河南之战前，狼山——乌拉山以南的区域，应该都是匈奴人的游牧之地。直接游牧于此的，是匈奴的楼烦、白羊两部。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了后套平原的地理结构，以及它在“河南地”之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卫青所率领的三万骑兵，在这次春季攻势中的出击路线也就很明确了。这些西出云中的汉军，首先攻击的自然就是乌拉山山前地区，也就是今天包头所在的后套平原东部的这个夹角。在河南之战结束之后，这一匈奴在漠南的核心之地，连同黄河

南岸的部分鄂尔多斯高原，建制成为了汉帝国的“五原郡”。当乌拉山前的战斗结束之后，卫青很快就将进入后套平原的核心区域了（今为巴彦淖尔市所辖）。

需要说明的是，狼山脚下的乌加河并非是黄河在后套平原唯一的河道。今天更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主河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地理现象了，一般来说，河流最初都会随着山势而流，并随之弯曲河道。只不过，当山前平原淤平到一定程度，河曲两端之间就会“裁弯取直”，冲刷出一条接近直线的河道来。两河之间的这片平原，就被称之为“河套”了。后套平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河套地形了，所谓“河套”最初所指向的，也应该是它。为了区别黄河在后套的两条河道，乌加河被古人称之为“北河”；而今天的黄河主河道，则被称之为“南河”。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虽然征服了后套平原，汉军已经能够开始着手恢复秦军在狼山——阴山一线修筑的长城了，但就征服河南地这一战略目标来说，卫青的征程还未结束。因为匈奴人如果要从蒙古高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的话，并不一定要从北部跨越阴山山脉南下。位于河套地区以西，河西走廊以北的阿拉善高原，同样也是匈奴的领地。如果汉军想防止匈奴人从阿拉善高原进出鄂尔多斯高原，并最终从阴山防线的南部攻击河套地区的话，他们就必须保证鄂尔多斯高原以西的黄河，处于汉军的控制之下。有鉴



于此，攻击至乌加河西部的汉军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而是随着黄河河道向南拐了个弯，溯黄河而上，以陇西高原为最终目标继续他们的清剿行动。

从后套平原至陇西高原有上千里的距离，即使沿河道南下的卫青部能够肃清黄河两岸的匈奴部落，但要想以黄河为防线，完整据有整个河南地也是非常困难的。好在黄河在这个“几”字弯当中，并不仅仅形成了前套、后套两处水草丰美的河曲之地。在贺兰山的庇护之下，西套平原成为了东套平原（前套+后套，也就是狭义的河套平原）与陇西高原的战略中继。如果贺兰山和西套平原在汉帝国控制下的话，那么汉军所重点需要防御的，就是狼山与贺兰山之间那不到两百里距离的缺口了。在移民实边三个河套平原后，完成这样的战略任务并不困难。

关于移民实边对河套平原进行农业开发这件事，汉帝国并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秦帝国在之前已经做过很好的示范了。当年被开发后的河套地区，甚至被用来媲美关中平原，史称“新秦中”。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内乱，实边之民尽返内地的话，此时的河套地区也不至于重新成为游牧之地了。



西汉河套四郡地缘结构图（公元前126年）

因此，当卫青沿黄河西进、南下，如圈地般的将河套纳入帝国版图后，帝国的行政人员马上跟进，将收复的“河南地”分割为了三块。除了乌拉山前平原建制为五原郡以外，狼山之前，黄河南、北两河之间的后套之地，也同样连同一块鄂尔多斯高原，建制为了“朔方郡”（两郡合建为一个更高一级的行政区“朔方刺史部”）。至于位置偏南的西套平原，则和秦国的建制一样，为了分担河套地区的防守压力，而成为了横跨陇山的“北地郡”的一部分。

当汉帝国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凭借充分的准备，一步步恢复秦帝国的西北防线时，匈奴人却正在蒙受自汉朝开国以来最大的损失。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春季与汉军被动接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对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畜群来说，这不仅是个青黄相接，急于补充营养的季节，更是养育后代的关键时期（羊、马都在冬、春产仔）。如果此时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战事，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存所造成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河套平原

卫青部突入后套平原之时，正是青草返青的季节。之前分散于山谷中过冬的匈奴诸部，此时也都开始迅速向河套平原转场。由于此时牧草尚少，各部落需要大范围的移动，为牲畜寻找食物。而之前匈奴人在此时节冒险侵入汉地的举动，也明确的告知汉军，此时的他们比之正常时节的春季，要更加的虚弱。此时很多朋友的脑海

海中可能已经浮现出，卫青所率三万铁骑驰骋在后套平原，追杀散牧于此的匈奴牧民的场景。应该说，以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来说，汉军是很难在草原上全歼其有生力量的。一旦情形不对，这些马上民族并不会以逃散为耻。因此在整个河南之战中，卫青部对匈奴人的斩获并不算太多，斩、俘合计为 5400 人。然而这次战役，所俘获的牛羊却达百万余头。以游牧经济来看，这些牲畜足以成为数万人的生计所在。也就是说，游牧于河南地的匈奴部落虽然大部逃脱（包括带走机动性强的马群），但为他们供给食物的牛、羊却尽数落入了汉军手中。

从战略视角来看待战争，重创对手的生产能力从来都是釜底抽薪之策。因此我们才说河南之战，是匈奴自汉朝开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战略损失。当然，匈奴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止损。因为这些俘获的牲畜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源。汉军并不会将它们弃之不管，或者赶回自己的核心区（因为帝国决定将河南地纳为核心地区了）。也就是说，这些牲畜很快会被新移民接手，并仍然放牧于河套地区。

如果匈奴人在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后，重新回到河南地，并击败汉军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将不仅是那些失去畜群的部落。汉帝国为开发河套平原所调入的大批资源（包括人力），也将成为匈奴人所收取的利息。那么新的大战，又将发生在什



么时候呢？

#### 第四节 匈奴攻入上郡的战略意图

在河南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126年）夏、秋之际，匈奴人先后从阴山丘陵一带，又一次入侵了代郡、雁门两郡。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匈奴人在这一年的攻势，更像是在示威，仍然是抢了就走的套路。因为从地缘结构上看，真正能让匈奴人牵肠挂肚的，还是河套地区。匈奴人针对河套地区的总攻，发起于公元前125年。与上一年相同，已经明显感觉到战略压力的匈奴人，未能等到秋高马肥之时，而是在初夏（五月）就开始南下。参与这一次“光复”行动的部族，并不仅仅限于河南地的故主——右贤王。匈奴单于本部也祭出主力，并率先发动了攻势。

单于本部所攻击的方向，除了一直饱受压力的代郡以外，甚至包括定襄和上郡这个相对较少遭受匈奴直接入侵板块。以地理板块来对应的话，定襄所对应的核心地区是管涔山一带，上郡所对应的区域则是陕北高原北部，两板块隔黄河相望。问题是，在中央之国边境线推进到阴山一线后，上郡已经不再是边境了。匈奴人应该是在攻入定襄之后，沿管涔山西麓向西南方向迅速切入。一方面以三万骑兵，攻掠定襄所辖城邑（定襄郡治“成乐”应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同样以三万骑兵，在黄河拐弯处渡过黄河，进入上郡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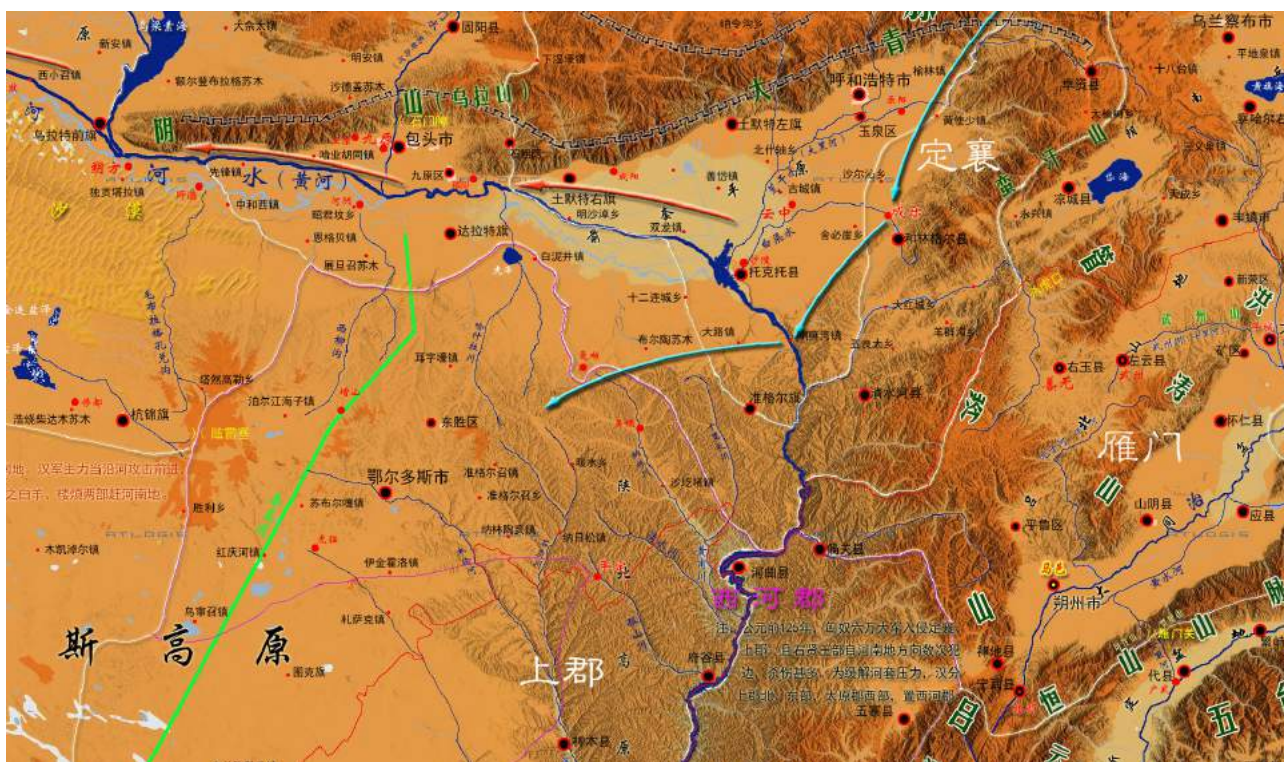
自古就有“九曲黄河”之说，一般情况下，由于迎面受阻，河曲的地方水流速度总是会减慢的。这也使得河曲地带往往能够成为重要渡口的所在。对接定襄与上郡的这个河曲，正是黄河那个著名“几”字弯的东北角。由于现在这一地区名叫“喇嘛湾”，因此从此渡河的渡口也可称之为“喇嘛渡”。这个标签显然不会出现在汉朝的历史记录中。不过，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当年汉军和匈奴人所使用的渡口具体叫什么名字，但它在东汉末年的名字——“君子津”则要比“喇嘛度”要雅得多。

关于“君子津”名称的来历，大家自可以百度一下。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并非这个渡口的具体位置（由于河道变化，渡口的位置在不同时期，会有小范围变化的），也并非它在汉武帝时期叫什么。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渡过黄河的，才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由于地形的原因，匈奴人在喇嘛湾真正需要渡河的距离并不算宽，也就在一里左右。加上水流速度较慢，匈奴人的渡河难度并不大。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今天我们在黄河边上仍然能够看到，那就是充气之后的“皮筏”。用整张羊皮囫圇褪下，脱毛、清洗、晾晒后，扎口充气。然后再把一只只皮胎顺次固定在木制框架下，一件黄河上独有的渡河工具就制成了。皮筏的使用，不仅符合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对于机动性要极高的游牧骑兵来说，也不会增加负担（还能用来储水）。只不过，匈奴人当时用来做皮筏的材料，并不仅限于羊皮，也可能会有牛皮、马皮（匈奴人“乘

马革渡河”有明确历史记载）。

解决了匈奴人进攻上郡的路线和渡河的技术问题后，接下来我们的疑问将是，为什么匈奴人要选择这样不同寻常的攻击路线？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以劫掠为目的，并没有必要如此深入。这样做很明显是带有战略目的。首先定襄郡设立的初衷，并非是用来正面防御匈奴人的。居于雁门——云中之间，承接山西高原北部及前套平原两大板块，并以为缓冲，是定襄郡的地缘任务。



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羊皮筏子

至于上郡，作为黄土高原最接近河套平原的突出部，其所属的陕北高原所承接的则是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尤其是要为帝国固守前套平原。有了上郡的存在，使得前套平原不像后套平原那样像一个半岛状的突出部（与核心区的连接），而是能够从东、南两线直接得到战略支撑。如果定襄和上郡面临战事的话，不仅意味着这两个边郡本身无法支援河套地区的汉军，更意味着包括云中、五原、朔方三郡在内的河套地区，被完全隔离



在了帝国核心区外。也就是说，匈奴动用六万骑兵中心开花式的插入管涔山——陕北高原，并且另用三万骑兵在代郡吸引雁门、代郡驻军的注意力，最终之意是还是为了重夺河南地。

作为此役的主攻者，汉帝国对于匈奴右贤王部在河南地的入侵（匈奴人肯定认为是回归了），用的是“侵扰”。也就是说，除了像以往匈奴人南下那样损失人口、财帛以外，右贤王部重夺河南地的企图并没有获得成功。当然，基于河南地对于匈奴右翼的重要性，公元前125年的这场夏、秋战役中，右贤王部对于后套平原的攻势是非常猛烈的，频率也很高。几波攻击下来，汉帝国所新设立的朔方郡也损失惨重。

前面我们也曾提到，据守长城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只有拥有主动攻击游牧民族的能力，才能够让他们远离长城，不敢轻言南下。因此在经历匈奴单于本部、右贤王部对河套地区的这次围攻战后，一场仍旧由卫青领衔的，将战火烧至蒙古草原的春季攻势——漠南之战也很快拉开了序幕。

匈奴人对河南地的这次反扑，除了让汉帝国决心将战场推进到长城以北，与匈奴在草原腹地决战也外，也促使汉武帝进一步优化了河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自然是移民实边了。因此，在河南之战后，朔方、五原两郡又增添了不少“县”。不过即使没有匈奴人的这次大规模反扑，移民增县也是会按部就班的做下去的。

## 第五节 汉帝国建制西河郡的原因

河南之战对于河套地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西河郡的设立了。“西河郡”之名，可能有的朋友还有印象。在战国阶段，当魏国最为强盛的时期，他们曾经将秦、魏边境推进至了关中腹地（至北洛河一线）。由于山西、陕西交界的这段南北向黄河又被单独称之为“西河”，因此魏国在关中的这个突出部被命名为“西河郡”。不过，在汉帝国新建制的西河郡，却并不是在关中地区，而是分上郡的北、东部，以及太原郡的西部，合并设立了。

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个新郡包括陕北高原的北部、东部，以及吕梁山区分水岭以西部分，而“西河”就是西河郡的中轴线。从基本的地缘原则上看，这样跨越黄河来建制一个行政区，似乎不太合乎常理。不过考虑到汉帝国在河南地所面临的形势，就可以理解了。

上郡作为黄土高原在河套的突出部，地缘上所承接的就是前套平原与关中平原。除了要应对匈奴人从北方前套方向的攻击以外，它的整个西侧也都暴露在“河南地”攻击面上。事实上，匈奴人对于上郡的西部，也就是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相接的土地，也非常有兴趣。因为在整个河套之内，除了得山水之利的那几个以“套”为名的平原以外，最好的草原就是与黄土高原相接的这片土地了。如果说鄂尔多斯

高原西、北侧主要是荒漠化草原的话，那么它的东、南部就是干草原，甚至森林草原了。

基于地理环境，以及地缘位置的原因，如果匈奴人入主河南地，甚至进占前套平原的话，上郡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秦帝国应对这种压力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在陕北高原北部、中部修筑两道长城以为缓冲；二是沿陕北高原——陇东高原之间的分水岭“子午岭”修筑秦直道。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在秦朝部分，我们曾经对秦直道的修筑原理，以及在黄土高原的位置做过详细解读。一般来说，修筑地面道路的话，循河谷前行是最常见的办法。然而这样做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要不断过河。因为每一条河流的两侧都会有许多支流汇入。而秦直道在黄土高原的选址是在山脊，避开了所有的河流。这样的话，一旦北方有事，关中的机动部队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插入到鄂尔多斯高原了。



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之后(位置在今陕西定边县南),秦直道开始向东北方向转向,以前套、后套平原相接之处为终点,继续延伸。其修筑的基本原则也并没有变化,仍然是避开那些黄河支流。很多时候,秦直道被形容为两千多年前的战略高速公路。事实上,它也的确当得起这个称号。问题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维持这样一条高速公路的难度实在太大了。最大的问题在于,秦直道在绕过了河流的同时,也绕过了能够承载人口、建设城邑的河谷平原。也就是说,维护、补给这条战略公路的代价过大了(现在的话,这些问题就不大了)。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当秦直道失去了它的价值时,关中平原在协防陕北高原的问题上,就大打折扣了。实际如果不考虑黄河的地理分割,从山西高原一侧支援陕北高原的距离要近得多。没有直接记录证明,帝国在建制辖区怪异的西河郡时,是直接受匈奴入侵上郡事件的影响。但匈奴人这次

入侵对上郡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匈奴三万骑兵快速渡过黄河机动至陕北高原的做法,应该会对汉武帝所触动。这种触动在于,如果技术准备充分(以战备标准,准备充足的渡河工具),在陕北高原北部遭受攻击时,从山西高原(恒山山脉以南的太原郡)调配兵力的效率,可以高于通过秦直道由关中直接调军北上。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不做这样一个行政调整,上郡有事时也可以要求太原郡直接支援的。不过地缘之所以为地缘,就是因为加入了人的因素。面对来如风,去如闪电的游牧骑兵,在同一郡治下的资源调配速度,肯定要高于通过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来协调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河郡的设立,相当于把河套地区对关中地区的战略压力,向山西高原腹地分流了一部分。

这一地缘平衡原则,也运用在了西套平原的归属问题上。如果从地理结构上看,西套平原更应该与陇山——六盘山以西的陇西高原建制在一起。而在陇西高原需要面对河西、河湟压力时,西套平原成为了陇东高原的支撑对象(与之合建了北地郡)。

## 第二十九章 河套汉四郡出塞的通道

### 第一节 云中郡经白道出塞外地区

好了，面对匈奴人对河套地区的持续压力，汉帝国在效率和方向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在匈奴人入侵定襄、上郡，以及河南地的当年，上述行政调整就完成了。毫无疑问的是，为下一场反击战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因为在度过这一年的冬天之后（公元前 125 年）。帝国又一次选择了在春季，向匈奴发起反击。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场反击是帝国第一次准备在长城以北与匈奴决战（龙城之战算是一次战术上的偷袭），因此也被后人称之为“漠南之战”。单从漠南之战的名字来看，战场似乎应该是在大漠戈壁以南，阴山以北的区域里。如果从地缘角度看，汉军扫荡的区域就是阴山长城以北，直至今天中、蒙交界处一带的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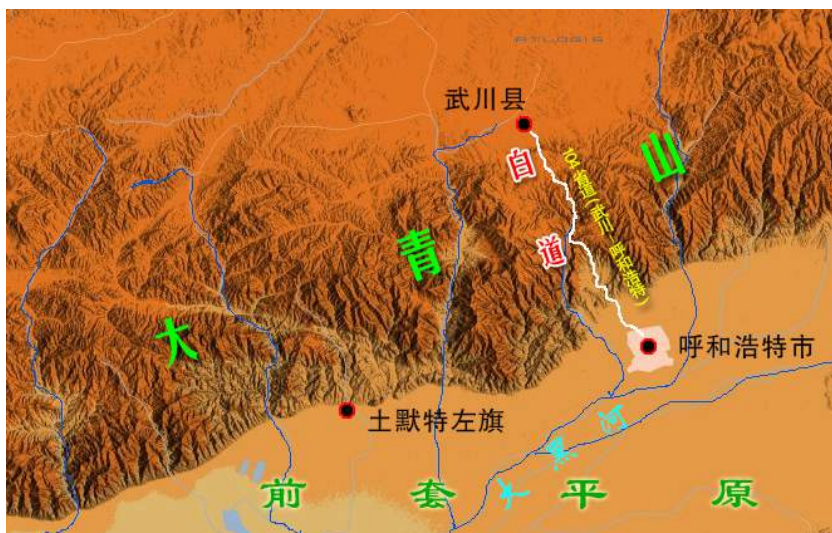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跨越阴山长城的几个重要通道，做一个解读了。我们一直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一定要走的话，一条山脉当中能够提供的选择会有很多，尤其像阴山这种不算太高，中间还有诸多断裂的山脉。不过我们也常说，道路是需要维护的。这种维护并不是说一定需要有固定的“养路工”去保养。一直有人使用，就是一种维护。因为这样的话，那些肆意生长的草木，就不会有机会封闭道路了。

从板块角度来看，朔方、五原、云中三板块，自己都应该有通过阴山山脉北部的主通道。最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云中郡的北出通道。基本上每一个板块，尤其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地区，都会有一条核心河流。云中所处的前套平原也不例外，它的核心河流在汉代时被称之为“荒干水”，今天也被称之为大黑河。整个从阴山之上通过前套平原南流入黄河的河流，都可以被归入大黑河水系。只是在下游平原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纵深，以及人类开发的原因，河道的走向已经十分乱了，并没有在万流归一之后注入黄河。

不过不要紧，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那些在山地中的上游河谷，是怎么帮助大家跨越大青山地。大多数的河流都会在山脉两侧分流而下，并在其间自然凸显分水岭。不过由于地质运动的原因，也会有一些河流通过天然谷地贯通南北。而这些跨越分水岭的河谷，看起来也更有机会成为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就这一点来说，大青山一线最起码提供了五个选择。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西至东，前套平原最起码有五条河流是穿越大青山而过的。这些河谷在历史上，也的确有被人穿行的历史。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谷地能否贯通南北，并非是选择主通道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由于水流和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原因（比如洪水、泥石流），一些穿山而过的河谷，通行难度反而会更大。反倒是一些集水较少的谷地，容易受到青睐。前套





白道位置图

道”<sup>1</sup>。

在军事家的眼中，每一个道口都会是建设军事要塞的好地方。在秦汉之际，扼守白道南口的要塞，就是狭义的“云中塞”了（广义的话，这段大青山长城防线，都可以称之为云中塞）。也就是说，如果汉军自云中方向出击的话，云中塞与白道将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卫青在漠南之战中的主力，却并不是自云中塞出击漠南的。那么汉军当时还有什么选择，又是怎么选择的呢？

## 第二节 定襄郡经大黑河源头河谷出塞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通道”都不是唯一的，只是那些使用较多，有官方维护的道路罢了。对于防御阴山防线的汉军来说，他们永远不可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的（否则也不需要长城了），每一条从阴山切出的河谷理论上都需要构筑有军事设施，以防备机动性极强的匈奴人南侵。

当然，对于防御一方来说，如果要北出长城的话，大抵还是有迹可循的。或者说，他们用不着走那些平时少有人维护的小路。在解读完可以用“云中塞”命名的云中郡主通道“白道”后，我们也有必要关注一下定襄郡的汉军如果要出兵匈奴的话，最有可能走哪条通道了。

北出定襄郡的通道，仍然跟大黑河上游河谷有关。其实大黑河的正源也正是在定襄郡内，地理位置则在前套平原的东北角（今属卓资县境）。以河谷来对应路径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山地夹角找到两条都以大黑河命名的源流。一条向东北方向

---

<sup>1</sup> 白道地处藏龙卧虎的大青山上，历来是军事关隘，是兵家必争之地。北魏时期，为了控制这个交通要冲，于天兴初年设立武川镇。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大黑河源头河流示意图

进入阴北丘陵的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另一条向东的源头则进入阴南丘陵的今“卓资县”境内（两条河道，在图上都有标示出来）。

今天这两条通道，大体上已经被内蒙古境内的 305 省道，以及 110 国道所用。而汉帝国除了为之修筑长城，以为庇护以外，还分别在两源相交处，以及南道处，为定襄郡设制了武皋、武要两县。至于公元前 125 年，匈奴攻击定襄、上郡到底是走的哪条河谷，就不好确定了。如果匈奴人当时的活动范围已经被限定在了阴山北麓的话，那么他们从北大黑河谷袭入的可能性较大；而如果匈奴人仍然可以在阴

南丘陵活动的话，那么也可以选择由南道侵入。

公元前 124 年，卫青出阴山反攻匈奴右贤王部得手后的次年，为了彻底扫荡活动于阴北丘陵的匈奴人，汉军也曾经以十万兵力循上述路径北出定襄。这一次战役，其实也可以归入漠南之战的范畴，就像匈奴人在前一年对河套地区的反攻，也同样应该被视为河南之战的延续一样。

卫青二出阴山（出定襄）总的来说并没有取胜，并且还在微观历史层面触发了一件影响汉匈奴战争走向的事件。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后面自会分析到。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大获成功的首出阴山之役上。虽然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解读云中、定襄一线的北出通道，但汉军在漠南之战中，并没有自云中、定襄两郡出兵。想要知晓卫青的选择，我们还要把视线西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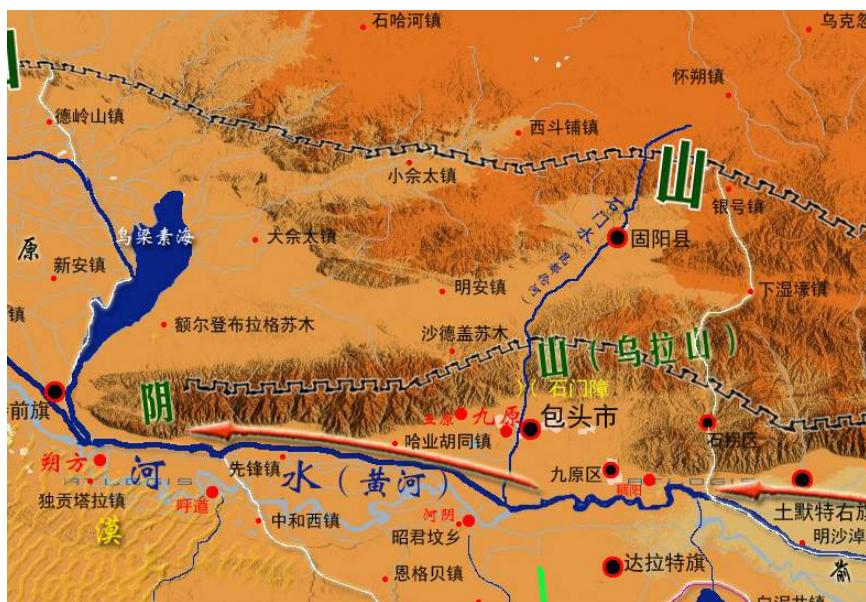


### 第三节 五原郡经朔阳道出塞外地区

下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位于河套之中，乌拉山左近的“五原郡”。如果我们把乌拉山看作是大青山的西部支脉，把乌拉山以北的山地视为狼山东部延伸的话，就会发现五原郡所辖的这片区域，正处于两山相错之处。这种山北——山中——山南上下排列的地理格局，加上阴山——黄河得天独厚的山水环境，无疑对游牧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所畜养的牲畜并不需要太大范围的移动，就能够在不同季节都享受到优质的牧场。

现在的问题是，游牧民族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通道在阴山山脉北麓与包头地区转进的呢？以道路的选定原则来看，如果有一条南北纵穿狼山、乌拉山山地的河谷存在，那将是最完美的选择了。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在穿越一条山脉时经常不得不在分水岭两侧选择两河源头接近的河谷切换。在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那种极限之地，连接两条河谷之间的山口往往会是整个行程中最为凶险的地方。

好在阴山山脉的海拔还不至于对人身产生伤害，穿越这些山谷之地的最高处海拔也不过1600米左右。更加幸运的是，有一条发源于狼山东部山地南麓，穿越乌拉山汇入河套地区的河流存在。这条河流的下流在穿越了今天的包头市之后，最终汇入了黄河。它的名字叫做“昆都仑河”。昆都仑河在汉朝的时候，被称之为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石门水”。在乌拉山南麓所兴建的护卫这条河谷通道南口的防御工程，则叫做“石门障”。事实上，石门障及阴山（乌拉山）长城，并非是五原郡所拥有的唯一防线。在石门水的源头之处，也就是狼山东部山地的山脊上，自狼山一线向东修筑的长城，也一路延伸过来了。就像两山在此交错一样，两条长城也在此交错，以防止匈奴人中间开花，切入到狼山与乌拉山之间。

由于昆都仑河谷的重要地缘作用，有很多人文学历史研究者会很自然的将它视为乌拉山与大青山的分割线。不过当我们有机会从空中俯视这片山地时，就会发现乌拉山与大青山并不是正面对接，而是在包头东北方向交错相接的。一定要以一条河

流作为乌拉山或者说狭义“阴山”的东部顶点，昆都仑河向东约 40 公里的一条季节性河流“五当沟”（流经今包头市石拐区）会更为准确。当然，一段山体叫什么名字，本身并不会影响它所在地区的地缘结构。在此指出，只是希望这里所做的地缘认定，不要与大家通过其他渠道所了解的信息相冲突罢了。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包头昆都仑河

虜城）等等。

顺便说一下，大家都所熟知的四大美女中的“王昭君”，就是由秭阳道出塞的。王昭君的出现，固然可以加深大家对秭阳道的印象，也进一步验证了此道的重要性。

石门障和石门水在汉匈博弈的过程中，曾经多次见诸于史料。由于这条道路的南部终点，是汉朝建制在五原郡最东部的大青山与黄河之间的“秭阳”县，因此此道也被称之为“秭阳道”<sup>1</sup>。在后来汉帝国经营河套地区的过程中，自石门障起，沿秭阳道一路向北，直至狼山东部山地北麓，陆续修筑了一系列与匈奴相关的城堡，如光禄城、支就城、受降城（宿

<sup>1</sup> 秭阳道北部出口处在北魏时期曾设置怀朔镇，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咽喉，又是屏藩北魏都城盛乐和金陵、平城的战略要地，在北魏与柔然的冲突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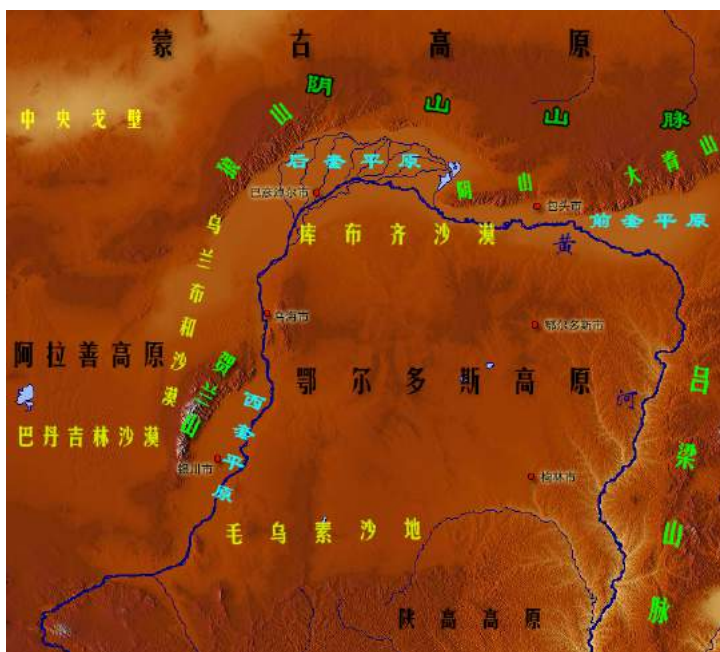
然而在卫青决心发起漠南之战时，却没有选择从此出塞。至于他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解读。

#### 第四节 朔方郡经鸡鹿塞和高阙塞出塞

卫青主力最后出击的地点是在朔方郡。这片由南、北两条河道圈就的河套之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算得上是中央之国能够向西北方向扩张的终极板块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荒漠化严重，难以支撑农业生产。尤其是后套平原的正南方，隔南河相望的那片高原之地，在有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之前，就是一片沙漠之地了。这片体量与后套平原相仿的沙漠，就是“库布齐沙漠”。

库布齐沙漠无疑是鄂尔多斯高原中最古老的沙漠。尽管很多历史研究者把河套乃至内蒙高原的沙化，简单归罪于人类的过度开发。但事实是，在自然力面前，人类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例，人类的开发可能会过度消耗掉些表层植被，但却没有力量把砾石研磨成沙子。

与河套地区隔祁连山相邻的，是我们在河西部分曾经提到过的阿拉善高原。这片高原的大部分土地，也是为沙漠所覆盖。在盛行西、北风的亚洲腹地，阿拉善、蒙古大漠上的沙并非不会被吹到鄂尔多斯高原。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鄂尔多斯高原的沙还是自产的，也就是就地起沙。



鄂尔多斯高原位置图

的地质学名称还是“鄂尔多斯盆地”。在它漫长的湖盆岁月里，那些被黄河从上游地区带下来的“沙”，也随着水的作用力向湖盆边缘堆积（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海边的

关于这一点，地质学家应该会有更权威和专业化的解读。简单点说，就是整个河套地区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是一个大盆地。黄河，以及今天陕北、陇东高原上那些最终东、南向汇入黄河的河流，在最初的时候，是反方向流入“鄂尔多斯盆地”的。直到有一天，因为地质运动和泥沙沉淀的原因，鄂尔多斯地区抬升成今日的样子。而黄河在突破山地阻隔东流入海后，鄂尔多斯高原作为这个大盆地的底，也变成了陆地。

其实今天，整个河套地区的

沙滩)。今天我们看到鄂尔多斯高原真正沙化的地区主要有两块，一块是与后套平原相邻的，位于西北角的库布齐沙漠；另一块而是与黄土高原相接，并向陇东、陕北高原强力渗透的“毛乌素沙地”。

总的来说，鄂尔多斯高原的气候环境是呈东向西逐渐变差。在接近陕北高原的地区，还能够生长出典型的干草原来。但向西伸入高原腹地后，随着地表河流的减少，最多也就只有沙草相间的荒漠化草原了。到了库布齐沙漠这个位置，就已经完全沙漠化了。反过来，在湖盆的另一边，即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相交的这一区域，在环境上就要纠结得多了。因为湖盆边缘堆沙的原因，这一地区薄薄的土层下面储存着大量的年代久远的沙。一旦表层水土流失严重的话，就会翻出来成为流沙。



毛乌素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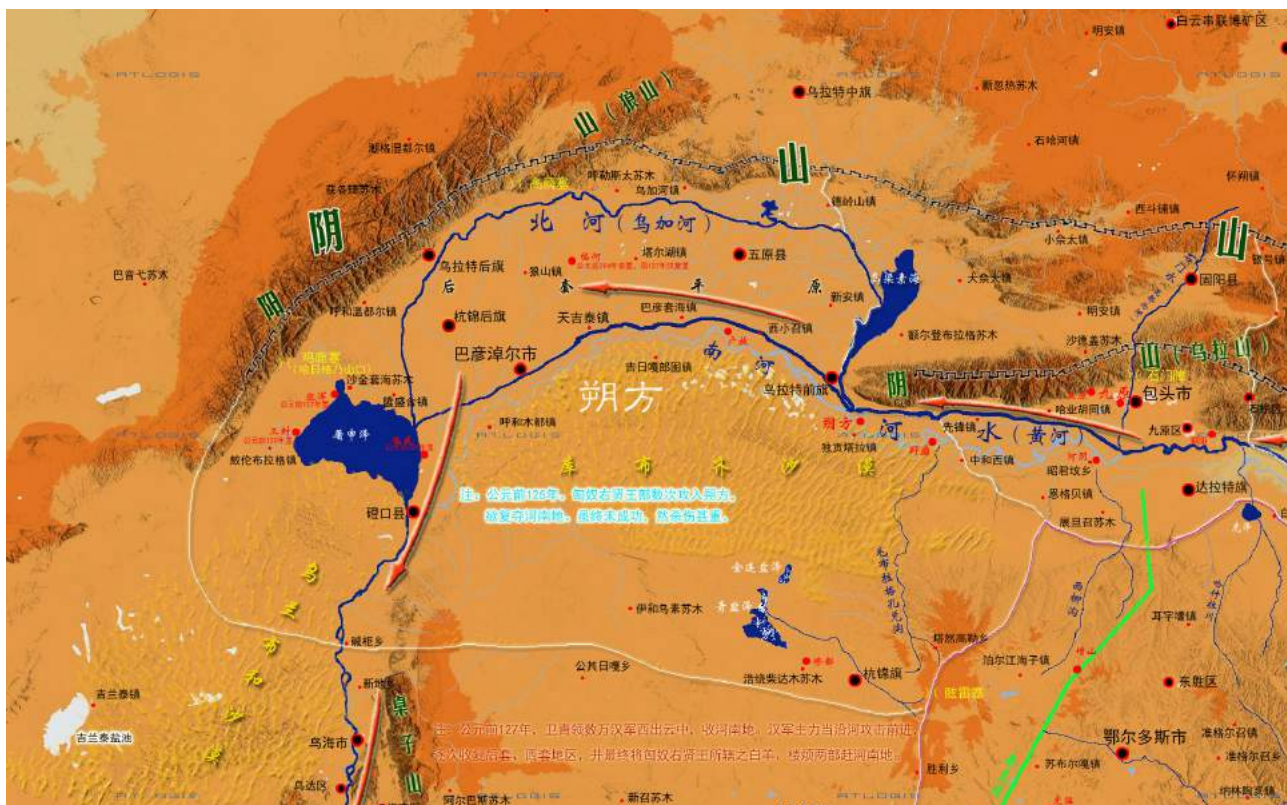
选择了。

如果匈奴人选择了绕过狼山的攻击路线，那么黄河之水就将成为汉帝国建立新防线的地理依托了。对于汉军来说，看起来最有可能成为匈奴人突破方向的西侧，有一片叫作“屠申泽”的大泽帮助他们缩短了防御面。在今天的地图上，除了零星的水面以外，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古泽了。这片水域实际上是因为黄河主河道向北弯曲而形成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后套平原的东部的对应位置上，在那里沉积下来的黄河水，今天被叫作“乌梁素海”。

在汉帝国开始经营河套地区时，今天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流沙肯定没有现在多了。今天这片叫做“毛乌素”的土地，已经升级为“沙地”了。之所以还没有给它个沙漠的名分，是因为这些流沙覆盖的区域还有挽救的可能。现在在这片土地上的治沙力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好了，我们现在了解了后套平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孤独的突出部了。不过库布齐沙漠的存在，对汉帝国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好处。最起码匈奴人不大可能绕到后套平原对岸，渡过南河后袭扰朔方郡了。匈奴人如果进入后套平原，要是不想强行突破狼山上的长城防线的话，那么从狼山的西侧绕过，然后折向东北方向会是一种



有了屠申泽的存在，汉军在西侧的防线压力，就主要集中至屠申泽与狼山之间这个不足二十公里的缺口上了。为了封堵住这个缺口，汉帝国在收复河南地的当年，就优先在屠申泽的西北角建制了一个城：“羸浑”。防线的另一端则是狼山南麓台地上的“鸡鹿塞”。从鸡鹿塞至屠申泽一线，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河道相连。汉军当年在此建立的防线，应该也会依托天然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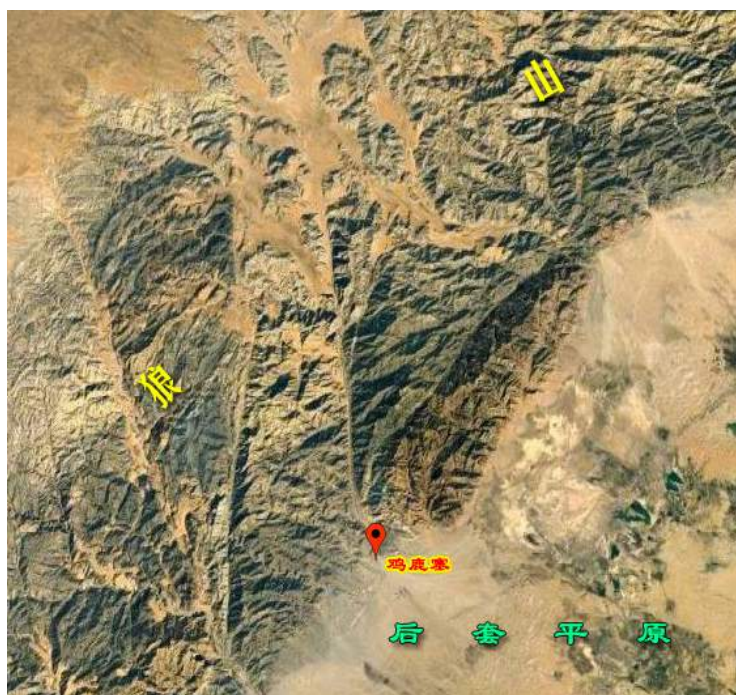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不过鸡鹿塞的主要作用，并不只是充当西南低地防线的西部终点。事实上，它还是整个河套平原最西端的出塞点。我们前面也说了，对于身处攻击位置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进攻河套地区的线路并不是唯一或者固定的（狼山上能够通行的谷地，最起码就有九条）。但对于防御方来说，就会选择一些固定线路作为出塞路线了。而鸡鹿塞之北的“哈隆格乃峡谷”，就是这样一条被选中的山谷。

“鸡鹿塞”之名，曾经多次出现在史书当中。比较容易让大家留下印象的一次，是“呼韩邪单于”出塞的那一次。在前往长安明确表示愿意归附汉帝国后（公元51年），这位后来娶了王昭君的南匈奴单于，在帝国骑兵的护送之下，由五原方向进入后套平原，然后向西到达帝国河套防线的最西端，最终经鸡鹿塞出塞。

鸡鹿塞的地缘价值，通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然而卫青由朔方出塞时，并没有选择从此出塞。而是在后套平原中部，选择了另一个名气更大的关塞——高阙塞出塞。



鸡鹿塞位置图

天后套平原的核心城市“巴彦淖尔”市的正北方，可以看到狼山在这个位置上开始由西南——东北走向转向正东。而这个转向看起来也不太顺，山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带，因此也很自然成为了汉军重点防御的地区，以及出塞的选择之一。

高阙塞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在史书中曾经被记录为赵长城的西部起点。只是由于一些研究者不太相信赵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狼山脚下，所以对高阙的位置会有疑问罢了。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因为从字面上看，所谓“高阙”本意就是“高山上的缺口”，用它来泛指一个明显的山口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赵国的“高阙”是如何定义的，最起码在汉朝时候，“高阙”之名已经固定给了狼山之上的这个缺口了。在地形图上找到它的大致位置也不难，我们在今天



## 第三十章 汉帝国对匈奴发起漠南之战

### 第一节 卫青以右贤王驻地为目标

解读完了朔方郡的两个主要出关塞之后，大家对整个河套平原的出塞路径也算有所了解。接下来的疑问在于，卫青为什么要选择从朔方郡出塞，又为何要选择高阙塞？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了解卫青此行的攻击目标到底是哪里。了解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也就会对所谓“漠南之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这一战的关键战役，实际上并非发生在地缘意义上的漠南。

与以往的反击一样，汉军这次又是几路出击。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了，因为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并不会据城以自守。汉军的每次攻击，基本都是以斩获为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路出击的军队，都有些各自为战的意思。在后来汉帝国占据上风之后，汉军甚至会出动数万军马，入匈奴境数千里，以寻机消耗对手的有生力量。只不过，匈奴人行踪不定，这种耗资巨大的搜索行动，有时甚至会颗粒无收。

就这一次漠南之战来说，配合卫青主力出高阙作战的，是从燕山一线出右北平作战的数万军马。从战术上来看，这两支相隔千里的部队之间实际上并无可能有什么配合。这样做的目的，更多是希望在卫青主力攻击右贤王部时，让处在左翼的左贤王部也紧张一下。以从战略上对匈奴全线施加压力。

相比牵制匈奴左翼的东线部队来说，卫青所率领的西线部队，其目标就要明确得多了。那就是扫荡匈奴右翼在河套以北地区的势力。换句话说，就是把右贤王部赶出阴北草原地带，以彻底缓解河套地区的压力。然而具体到战术应用，卫青部却并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又一次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战术，直接定位、攻击右贤王部的王庭所在。

我们并不怀疑卫青有这样做的魄力和能力。因为在五年前的龙城之战中，卫青正是凭借这样的战术一战成名的。说起来，以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来说，政治、宗教中心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相对固定的聚集地了。鉴于汉匈之战已经持续了那么多年，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少来自对方阵营的成员；因此卫青在出击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以定位龙城、右贤王王庭，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应该说，匈奴人对于卫青这种突击战术也是有所防备的。毕竟在龙城之战中，卫青部虽然斩获不多，但汉军不同以往的长途奔袭能力，势必会让匈奴人重新认识对手（此役的战略意义，相当于抗战中的平型关之战）。因此，为了防备卫青突袭自己的王庭，正在试图收复河南地的匈奴右贤王，并没有把王庭设在与长城相接的阴北草原地带，而是放在了蒙古戈壁的腹地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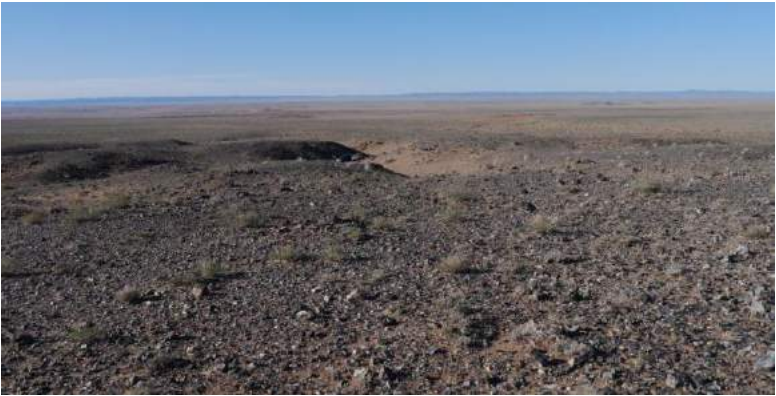
对于“戈壁”的概念，我们之前也曾经解释过了。它与沙漠最大的区别在于，

后者已经完全沙化了，而前者的地面则主要为砾石所覆盖。当然，戈壁当中往往也会有已经风化成粗沙的流沙相间，所以很多时候，“大漠——戈壁”二词会连在一起使用。

今天主要位于蒙古中南部的这片戈壁，并不是戈壁的全部。这片横亘亚洲中部的荒漠地带，最西可达准噶尔、吐鲁番——哈顺盆地，最东直至大兴安岭西南；南部以河西走廊——河套为限，北部则与杭爱山南相接。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是一个被天山、阿尔泰山、杭爱山、大兴安岭、阴山等山脉合围而成的大盆地。一般将这整片戈壁地带统称为“大戈壁”。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戈壁覆盖的盆地区称之为“大戈壁盆地”



蒙古戈壁地缘结构图



戈壁

整个东北亚的地缘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看过上述文字，大家可能心里会有疑问，难道远在蒙古、新疆的戈壁与黄土高原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吗？事实的确如此。在风力的作用下，覆盖于大戈壁盆腹地的表层土壤，被吹向了东、南方，并最终沉淀于秦岭以北、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上。

覆盖大戈壁盆地腹地的砾石，是日复一日在洪水的作用下，从周边山脉上冲击而下，平铺到盆地腹地中的。水流的这种冲击力，我们并不陌生。东亚半岛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板块之一，正是拜那些大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所赐。很显然，除了碎石以外，本来还应该会有大量的土壤被洪水从山上带下来，并最终覆盖于大戈壁之上的。然而与被东南季风覆盖的东亚半岛不同的是，大戈壁盆地处于亚洲腹地。与海洋较远的距离，以及山脉的阻隔，都使得干燥且强力的西、北风成为了这一区域的主导力量。在这些风力的作用下，整个大戈壁地带内部，以及与之东南相邻的黄土高原地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貌，并最终对整个



也就是说，黄土高原之上那厚达 50——80 米（最厚处甚至达 180 米）的黄土层，有相当部分是由今天那些戈壁地带输送过来的。这些沉积在高原之上的黄土，不仅成就了最初的华夏农业文明，还随着河流（特别是黄河）的作用，进一步向第三阶梯输送，并最终让华北平原也成为了黄土地带。



黄土高原



戈壁地区卫星图

搬运对象。只不过比之黄土，“沙”的质量要更重，大部分在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就受阻于祁连山、阴山等山脉而沉积了下来。

将时空拉前至人类文明之前来解读大戈壁地带、黄土高原的前世今生，除了让大家对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基础有更深刻的了解之处，还在于帮助大家了解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今天黄土地带的边缘，会有沙化的风险。身处华北平原北部的北

作为占据文明高度的东亚农业区，完全有理由鄙视那些在农业文明眼中几乎一无是处的戈壁地带。不过通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对这些看起来，仅能够被游牧这种边缘经济所利用的荒漠会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干燥的西北风也并不仅仅将黄土吹向了黄土高原。那些在风、水的作用下，被细化为“沙”的碎石，也成为了西北风的

京人民，还会不时的拜西北风所赐，受到沙尘暴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地图上仔细观察整个大戈壁地带，就会发现它的西、北部板块，主要都是以戈壁形态存在的（中间当然因为地形原因，也会滞留一些沙了），比如准噶尔盆地（准噶尔戈壁）、吐哈盆地（哈顺戈壁），阿尔泰山脉东南部（外阿尔泰戈壁），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东戈壁（蒙古戈壁）。而整个大戈壁盆地中最大的沙漠地带，却存在于南部边缘的阿拉善高原。

## 第二节 汉军穿越戈壁进军右贤王部驻地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卫青的这次战术行动上来。通过前面的解读，我们对卫青北上所面临的地理环境有个大致概念了。那就是在离开阴山北部的草原地带之后，汉军所面对的并非黄沙漫漫的沙漠地带，而是有植被相间的戈壁地带（这些砾石能够固定部分土壤）。尽管由于降水和蒸发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蒙古戈壁的腹地几乎看不到地表河流的痕迹，但由于处于盆地区的腹地，在能够躲避阳光蒸发的地表之下，还是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的。

尤其是戈壁东部更接近季风区和高大山脉的地区，地下水甚至会大批冒出来，在戈壁之中星星点点的形成一些小型湖泊（大部分还都矿化得不太严重，可以饮用）。比如蒙古戈壁东部的蒙古“东戈壁省”，就拥有大约 200 多个这样由地下泉水补给的湖泊。只不过，这些湖泊的体量都很小，你甚至在最大比例的谷歌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们的痕迹。对于那些游牧于蒙古高原的部落来说，他们自有足够的经验来标定这些泉水湖，并在戈壁中找到质量不高的小块草场进行补给。不过对于那些试图穿越戈壁的汉军来说，如果没有可靠的向导来帮助的话，戈壁之旅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汉军如果要穿越蒙古戈壁的东部，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一地区的地势过于平坦。除了没有河流提供天然道路之外，也没有山地提供定位的参考。相比之下，卫青这次准备进入的戈壁西部，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因为在跨越今天的中、蒙边境之后，将有一条呈西北——东南方向延伸的山地带，为卫青的突袭行动提供路线参考。这些山地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视作是阿尔泰山脉在东部的终极延伸。只不过，由于阿尔泰山脉的东部（东经 99 度以东）山势已经趋缓，并呈断块状，它们周边的低地实际上已经被侵蚀、风化成戈壁地貌了，因此这段山体也被单独称之为“戈壁阿尔泰山”。

至于卫青准备实施斩首行动的匈奴右贤王，也正将王庭暂设于戈壁阿尔泰山的东南部。根据史书记载，卫青出高阙后的攻击距离是 6、700 里（汉里）。以此推断，大约以高阙为圆点，画一个半径约 250 公里的圆的话，右贤王的驻地大致就在这个圆的边上。实际上这个范围还可以再缩小，因为匈奴右翼的活动范围是在河套的西北部。也就是说，我们只需在这个圈的西北边缘搜索，就能够找到这场大战的决胜



点了。当我们以上述原则来定位卫青此战的攻击目标后，应该会让一些热衷“外战”的朋友感到兴奋。因为这个攻击圈的西北边缘，已经完全处于今天的蒙古境内了。然而当大家看到这条待选攻击曲线所处的行政区是蒙古国的“南戈壁省”后，估计心里又会为卫青捏一把汗了。

其实即使不看“南戈壁省”之名，大家也应该意识到卫青此次需要在戈壁中作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卫青“漠南之战”的决战地点并不在漠南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一战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把匈奴右贤王的势力彻底赶出漠南。并且除了突袭右贤王王庭的战斗之外，卫青所统十余万军马中的大部分也一定會在狼山北部一线的草原上扫荡（卫青所部三万出高阙，其余汉军应为自朔方多路出击），所以此役称之为“漠南之战”倒也还准确。



蒙古国南戈壁省

在我们所划定的 250 公里攻击曲线上，最为明显的地理特征，是一些海拔约在 1200——1400 米的零星山地。当我们的视线沿着这些山地一路向西北方向延伸后，就会发现，这些山地实际上是阿尔泰山脉的最东部延伸。也如前面所说的，算是戈壁阿尔泰山的东南部。将王庭设置于戈壁，而不是阴山北麓水草更为丰美的草原地带，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前面我们也说了，由于卫青之前曾经突袭过匈奴左翼的龙城，并且现在汉帝国明显在匈奴的每一次进攻后，都会发起大规模反攻。匈奴右贤王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是断不敢离汉地太近了。

卫青的龙城突袭战，在战术上给匈奴人最大的印象，应该是汉军也具备了在草原上的机动能力。在解读那次战役时，我们已经发现了卫青实际上是沿着燕山西北麓前行的。在穿越了直到今天还一派草原景象的“坝上草原”后，在锡林郭勒草原的最南端，完成了他的首战。然而能够在连续的草原地带长途奔袭，并不代表汉军就能够进入荒凉的蒙古大漠。最起码匈奴右贤王在将王庭设置于戈壁之中时，他是绝对不相信汉军敢于进入戈壁地带的。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大多生活于温暖湿润的季风区的人来说，最大的疑问应该就是，匈奴人有没有能力在戈壁之中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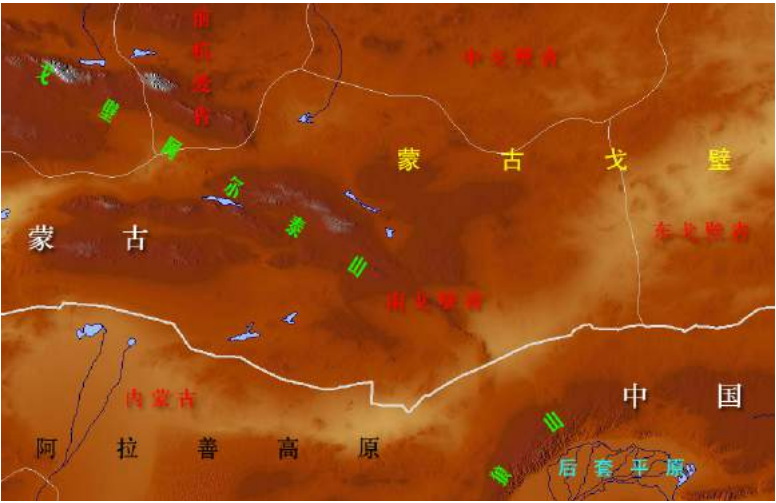
解答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百度蒙古南戈壁省的数据。公开数据表明，这个建制于戈壁上的省份，除了拥有 4.7 万的人口之外，还有约 150 万头牲畜。尽

管这个人口数量可能还不及中央之国核心区一个乡镇的人口。但最起码表明，这片戈壁本身并不像藏北无人区那样，是人类生存的禁区。

人类能够在戈壁中游牧（而不只是穿行），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原则。一方面戈壁本身并非没有植被生长，只是这些植被无论从面积和质量上来说，都难堪大用（蒙古戈壁中的很多植被甚至在7月就已经进入枯草期了）。为了帮助牲畜获得食物，生活在戈壁中的部落转场的次数和距离，要数倍于干草原地带的部落；另一方面，在荒漠中生存最重要的是淡水。



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蒙古南戈壁省位置图

只要有固定的淡水来源，生存就成为可能。在生存条件更为恶劣的阿拉伯地区，荒漠中的每一眼水井几乎都会成为一个小型部落的聚落区（只是植被覆盖状况就更差了，很多时候只能养骆驼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尽管蒙古戈壁几乎看不到什么地表河流，但受益于太平洋季风，地下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即使不掘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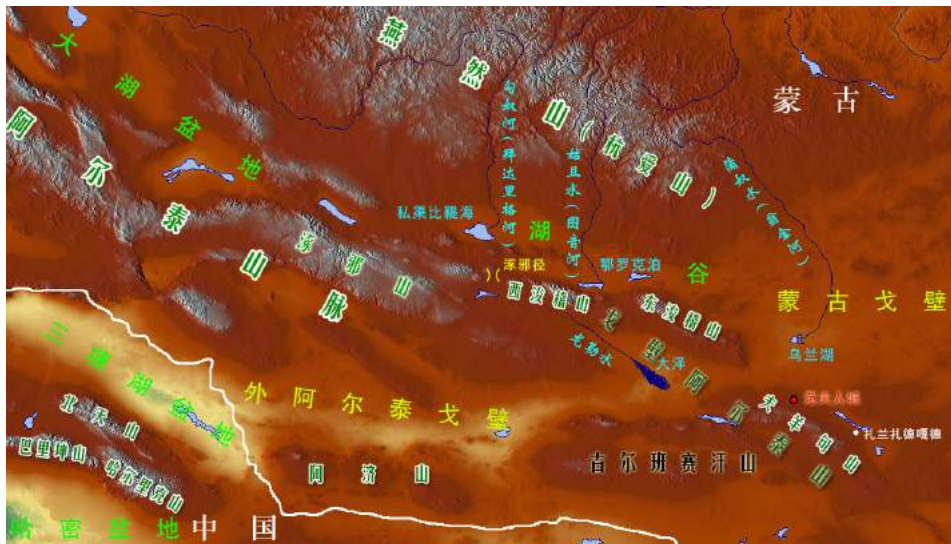


很多地方也会有泉水冒出。

### 第三节 卫青成功突袭匈奴右贤王部

从地缘结构上看，匈奴右翼的核心区之前被定位于阿尔泰山——杭爱山包夹而成的大湖盆地区。很自然的，延伸至戈壁地区的“戈壁阿尔泰山”就成为了匈奴右翼南下漠南草原，渗透河套地区的中继点了。即使匈奴右贤王部这次不驻牧于此，戈壁阿尔泰山也是匈奴右翼本部南下漠南的必经之路。在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戈壁阿尔泰山也成为了汉匈博弈的焦点地区，曾经多次在这片山地中进行了数万乃至十数万骑兵参与的大战。

这其中也包括几次汉军全军覆没的重大战役。如公元前 103 年秋，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郡击匈奴（接应匈奴反叛的左大都尉），被匈奴左贤王部八万骑围歼，赵破奴被俘（十年后逃回汉朝）；公元前 99 年，李陵以五千步兵出战匈奴单于本部，在射杀上万匈奴骑兵后被俘。李陵的浞稽山之战，是太史公写得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也是我们了解戈壁阿尔泰山地理结构，以及地缘价值的最佳案例（后面也会详细解读）。在惜字如金的史书中，这也是不多见的。不过在了解太史公、《史记》、李陵三者之间的关系后，相信也就不难理解了。



戈壁阿尔泰山地理结构图

那条西与阿尔泰山主脉相连，北与杭爱山相望，包夹出一条“湖谷”（内有六条河流及湖泊）的山地，就是在汉史中多次出现，并爆发大战的“浞稽山”。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地图上，浞稽山有时也会被标示为阿尔泰山主脉的最东端，而不是戈壁阿尔泰山的一部分。

与浞稽山相比，它南部的那片山地，带上“戈壁”的前缀就没有任何异议了。

这些历史细节，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百度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解构戈壁阿尔泰山的结构，并由此延伸出汉帝国北击匈奴的主通道来。从地理结构上看，已经呈现断块状的戈壁阿尔泰山，大体可以被分为南北两块。北部

这片山地在今天蒙古的旅游地图上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整片山地及其附属地区被建制成为了“戈壁——古尔班赛汗”国家公园，而山名就叫“古尔班赛汗山”。在旅游者看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你能够在不大的范围内，同时看到常年冰雪覆盖的河谷、听之有声的沙漠、能够为牲畜和野生动物提供食物的草场，以及人类及远古动物留下的遗迹。



蒙古国古尔班赛汗国家公园

古尔班赛汗山的东部，在汉书中被称之为“夫羊句山”。今天南戈壁省的省会“扎兰扎德嘎德”，就身处夫羊句山东部的低地中。而在山地的东麓，还有一个曾经出现在汉匈之战中的城邑——范夫人城。范夫人城应该是汉军突入塞外最北部的据点了。它的实际作用，应该是预警而非防御。之所以会以“夫人”命名，是因为筑城的

汉将在身死之后，其夫人率众继续据守此城。基于夫羊句山在汉匈之战中的地缘位置，汉军曾经试图在此建立据点的说法还是可信的（据守烽燧边塞的将领，是可以带家属的）。鉴于此城过于突入匈奴境内，相信它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被放弃了。关于范夫人城是何时所建，史书并没有记载。不过最起码在漠北之战前，汉军是不可能有能力在此筑城的。卫青袭击匈奴右贤王部的地点，也不是在古尔班赛汗山的核心山地，而是它南部更加靠近今天中蒙边境的延伸山地之间（今南戈壁省瑙木贡县境内）。

右贤王部驻扎的地点并没有紧邻山地。由于山地所收集的淡水会通过渗透性强的沙石地面之下，输送到山间低地中，并寻找适当的点冒出来。所以在戈壁之中，山地之侧的低地往往会更容易受到青睐（比如南戈壁省会的选址）。正常情况下，作为一支随时准备作战的军队来说，山地应该算是最好的依托的。只不过，一方面这些延伸到戈壁之中的山地本身，其实已经没什么植被覆盖了，因此它们本身对游牧民族的吸引力倒不大（没有山地牧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预料到汉军能够突袭进戈壁地区，匈奴人也并没有意识到需要依托山地构筑预警、防御体系。

最有可能成为匈奴右贤王部驻扎的这片低地，今天被叫作“巴音布拉格”。实际上，我们在从外蒙到内蒙的草原上，看到很多叫这个名字的地点。所谓“巴音布拉格”



的本意，就是“富饶之泉”或者“泉水汇集”的意思。在茫茫戈壁中，如果一个地区曾经被称之为“巴音布拉格”，那么它就肯定不会被游牧部落所错过的。同样不会错过这片土地的，还有汉帝国。

在后来的历史中，曾经作为匈奴右贤王部出击漠南的跳板的“巴音布拉格”，也成为了帝国北御匈奴的前哨。汉帝国以其为基础构筑了著名的“受降城”（公元前104年），并随后以其为基点，在漠南草原与戈壁交界线上延伸了一道今天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草原长城——汉外长城。而这条将阴北草原完全纳入帝国版图的长城，最终也成为了匈奴人南下漠南的恶梦。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多少防御力，而在建立了一条延伸至戈壁边缘的，以烽燧为基础的预警体系。这也使得匈奴人“打草谷”成功的概率被大大降低了（所以后来他们每次南下除了劫掠之外都要进行破坏）。



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关于受降城和汉外长城的故事，等到解读完河西、漠北之战后，会有更为详细的解读。今天将之引出，是希望帮助大家从地缘的角度来理解卫青这次对匈奴右贤王王庭的突袭，所隐藏的战略意义。单从战术角度来看，卫青的这次突袭，以及在整个阴北草原地带的扫荡行动也是极为成功的。这一次，匈奴右翼共损失了1.5万

人及数以百万计的牲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匈奴右贤王本人带着数百骑向北突围成功了。汉军在追击数百里，在其进入夫羊句山区之后，停止了追击。再后来，地形更为复杂的夫羊句山也成为了匈奴人防御汉军（出朔方）北上的第一道防线。公元前90年，汉将李广利北击匈奴的最后一役，第一战就是与匈奴人在夫羊句山接战。

公元前124年，卫青出塞北击匈奴右贤王部的这一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若以将匈奴人挤出漠南之地这一战略任务来看，这一战只能算是第一阶段。因为整个阴山草原，除了在西段为匈奴右贤王部经营以外，还有单于本部经营的东段地区。所以很快，漠南之战的第二阶段，以匈奴单于本部为攻击目标的战役，在次年又拉开了序幕。

#### 第四节 汉军在阴北草原与匈奴交战

跟以往以样，在卫青攻击匈奴右贤王王庭的当年，匈奴方面就紧接着在秋季派遣万骑发起了一波攻击。只不过匈奴右贤王部暂时是无力组织攻击了，为之展开报复的是单于本部，而攻击的目标，则是代郡。即使单于方面没有任何举动，在将匈奴右翼逐出漠南之后，汉军也会把下一个目标锁定于匈奴单于本部所经营的这一区域的。在进入“国家”形态之后，匈奴人对于草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各部划定了放牧的区域。总的来说，前套——山西高原北部，以阴山山脉为轴线的草原地带，都是属于单于本部所经略的方向。相应的，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四郡，也成为了匈奴本部的“猎场”。

汉军为次年的春季攻势所准备的兵力仍然超过了十万，出塞的方向则是居中的定襄郡。与上一次的直捣王庭不同，这一次出击在情报工作上稍显不足，并没有事先探知到匈奴主力的方向。从汉军的角度来说，其实是非常渴望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能够与匈奴主力在漠南草原决战的。毕竟组织一次战役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无法实际控制这片草原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斩获的话，就算是赔本买卖了。

以最后的结果来看，汉军在初春（二月）的这次攻击并不算成功，歼敌为三千人。很显然，帝国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因此在这次扫荡之后，这些集结而来的汉军并没有立即返回各自的驻地，而是撤回到了云中、定襄、雁门三郡休整。一个多月后（五月），这些军队又从三郡出发，重返阴北草原，开始他们的猎杀行动了。

相比前一次，汉军这一次本来是十分有机会进行期待中的决战的，因为匈奴主力的确出现在了汉军的攻击线上。匈奴主力的这次出现，应该是为了准备对冲汉军的这次春季攻势的损失（发起新一场的秋季甚至夏季攻势）。为此，匈奴单于不仅亲率主力南下，还集结了左贤王的部队前来配合。匈奴方面应该没有想到，汉军会如此之快的复出阴北草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卫青方面得到匈奴主力南下的情报，所以希望在匈奴发动攻击之前，寻其主力决战。然而在草原上寻机野战，总





了帝国对漠南之战第二阶段胜负的评判。需要提一下的是，与赵信一起领兵的另一位将领苏建（只身逃了回来）。不过，把苏建引出来，并不是为了对比赵信的选择，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苏武”，成为了汉匈战争中，外交战场上的标志性人物。

苏武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抛开人文历史所感兴趣的“气节”话题不说，苏武牧羊的故事所透露出的信息，就是匈奴帝国的北方边界已经明确抵达了贝加尔湖。不过相比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关心汉匈战争的朋友，应该会更期待看到另一位将星——霍去病的现状。当卫青代表帝国组织河南、漠南两大战役之时，霍去病又在哪儿呢？



## 第三十一章 霍去病第一次远征河西走廊

### 第一节 霍去病的作战特点与张骞的回归

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汉武帝来说，漠南之战的最大收获并不是斩获了一万多匈奴人，也不是逼迫匈奴退回了漠北，而是霍去病的横空出世。很快，汉匈战争的主控权，就将从卫青手上暂时移交到这位时年十八岁的少年将军手上了。

很显然，汉武帝非常看好这位少年将军，他甚至亲下诏书将霍去病派至卫青军中。而卫青也给了霍去病一个特权，那就是让他亲自挑选军中最为强壮善战的战士。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皇帝和大将军都没有看错人，霍去病与他挑选的八百骑兵在两出定襄的战事中，发挥了惊人的战力。一共斩首、俘虏了二千零二十八人（汉朝对军功计算要求极严，数字是很可信的）。要知道，卫青所部超过十万汉军，在两战中的斩获总数也不过两万级。霍去病以仅占全军数量不到百分之一的骑兵，却获得了全军的十之一斩获，绝对足以震惊汉、匈两军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霍去病的这一次成功也验证了一个军事定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以单兵素质来看，霍去病在全军中遴选出来的这八百骑，绝对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特种兵”了，拥有以一当十的战力也属正常。然而就一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来说，最重要的却是领导者的作风。相信看过《亮剑》的朋友，对剧中李云龙总结的一段话都会有印象：“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无论这支部队换了多少茬人，它的灵魂仍在。”

一位将领亲手调教出来的部队在交给其他人带之后，到底能够多大程度继承之前的风格，其实是存在变数的。如果继任者是前任亲自挑选，或者本部队竞争出来的，风格延续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不过，最起码霍去病在世的时候，其强烈的个人风格还是能够影响到他所率领的汉军的。

与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原则，重视后勤的一般将领不同，霍去病在战术运用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轻骑”。他所率领的部队并不会去考虑后勤问题，而是“取食于敌”。这种战法，实际和项羽的“破釜沉舟”之策如出一辙。相当于把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战胜对手之后，才能获得补给。也就是说，对于霍去病所率领的部队来说，要么战败身死，要么立功。像汉军中经常出现的因为迷路错失战机，无功而返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那样回不到驻地，就得饿死了）。

以匈奴人的特点来说，即使霍去病的部队没有搜索到畜群，仅仅依靠在对战中斩获对方的战士，他的部队也能够从敌人身上获得补给。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自己就得适应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本身并不成为问题。汉帝国的为了反

击匈奴所做的那些战略准备，给霍去病提供了成功的基础。最起码他有足够的基数来选择最好、最能适应草原生活的战士和最好的马。

事实上，霍去病所率领的战士中，本身就有很多的降汉匈奴人成份，没有比匈奴人更加熟悉匈奴人的了。这些匈奴人不仅能够帮助霍去病的部队更快适应快速、机动的草原生活，也能让他更容易发现对手的踪迹。在后来的战争生涯中，“以匈制匈”也成为了霍去病成功的一大法宝。正是有了这些准备，霍去病在跟随卫青大军出征时，并没有按部就班的随之扫荡草原，而是在发现敌踪后，脱离大部队，咬住对手，孤军追击了数百里，并大胜而归。如果在上一阶段，卫青攻击右贤王庭时，霍去病前往参战的话，也许右贤王就没有那么好命逃出生天了。



霍去病雕像

我们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即决定大势的是那些战略层面的因素。然而在微观历史中，如果把合适的人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他的出世是有可能加快历史进程的。霍去病的出现，毫无疑问的让汉武帝看到了加速结束对匈战争进程的希望。正是因为霍去病在漠南之战第二阶段的出色表现，汉武帝除了封赏其为“冠军侯”以外，更是将他的领军数量增加至了万骑。也就是说，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在汉军中已经不再是被当作一支特种部队的将领来使用了，而是成长为了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将军。

公元前 122 年 6 月，也就是霍去病横空出世的第二年后，匈奴人又一次南下对汉朝边境进行袭扰。而这次的目标则是上谷郡。鉴于在两个阶段的漠南之战中，匈奴右翼和单于本部都受到了重大打击，执行这次侵扰任务的应该是左贤王部。然而

此时的汉帝国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抢了就走的犯边之举，已经没有太大兴趣针锋相对了。在匈奴单于听取赵信意见，放弃漠南草原的经营之后，汉帝国的边郡压力暂时被减弱了。这种时候，一直没有成为汉匈博弈主战场的“河西走廊”开始进入帝国的战争计划之中。

让汉武帝决心出击匈奴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张骞回来了（公元前 126 年）。他所带回来的关于匈奴、西域的详细情报，也让汉帝国 13 年前所模糊定立“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有机会成为现实。当阴山正面战场之敌从漠南战略撤退后，一场完全属于霍去病的“河西之战”，也被载入了史册。



没有记录表明，张骞在滞留匈奴十几载的时间中，是否跟随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到过匈奴全境。不过，他是在河西走廊被俘的，又曾经被送往匈奴单于处。因此最起码对匈奴右翼的地理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了（尤其是他会有意识的记忆和打听）。这些有关匈奴人的情报在张骞跟随卫青出征漠南时，发挥了重要价值（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正因为如此，公元前123年，也就是在霍去病因功封为“冠军侯”的同时，张骞也同样获得了一个与足以表明他功绩的爵位——博望侯。

很显然，在霍去病受命代表汉帝国出征河西走廊时，张骞会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然而这位少年将军却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这样的帮助。对于不遵循常规战法的霍去病来说，他甚至不愿意军中设立协助自己的副将一职。更不要说，把一个爵位与自己相当的人放在身边了。

当然，不用张骞并不代表霍去病自负。前面我们也说了，霍去病所挑选的战士中，本身就有很多匈奴人的成分。也就是说，他的军队完全有能力和情报以游牧民族的方式纵横草原。公元前121年四月，在霍去病成为汉军中最耀眼将星的第三年，一支一万人的骑兵部队在霍去病的带领下从陇西起程，跨越黄河向河西走廊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史称“第一次河西之战”。

## 第二节 汉军经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

霍去病渡过黄河的地点就在今天的兰州一带，当时算是汉帝国在陇西所控制的最西端了。换句话说，渡过黄河之后，就算是匈奴的势力范围了。记得在前面解读“羊皮筏子”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分享在兰州乘羊皮筏子旅游的经历。其中说到当地船家以霍去病军乘筏渡河为噱头，招揽生意。不过，二千多年前的汉军，很有可能是架设浮桥渡河的。毕竟早在春秋之季，浮桥技术就已经运用到了战争中。在一场准备充分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中，预先架桥的可能性会更大。

不管霍去病最终是用什么方式的渡过黄河的，兰州境内那宽二、三百米，且流速缓慢的黄河水，都不会成为汉军西征的障碍。而在越过黄河之后，汉军并没有很快遇到匈奴人，在沿黄河北岸向西运动百里之后，进入了庄浪河谷（时称“氈水”）。

在解读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时，我们曾经解读过这条发源于祁连山脉东北角，向南注入黄河的河流。这条河谷也可以被视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在这一地区的分割线。对于日后穿行于丝绸之路的商旅来说，庄浪河谷也是他们通向河西走廊的重要路径。不过霍去病的骑兵并不需要全程贴着庄浪河谷，上溯至祁连山上。在北行350里后，汉军将会遇到一条从祁连山脉向东延伸出来的山岭——乌鞘岭。

乌鞘岭不仅是黄河流域与河西走廊内流河流域的分水岭，也一直被视为河西走廊的东部起点。为了控制这条山河交叉的战略要点，在河西之战大获全胜之后，汉帝国很快就在庄浪河上游，乌鞘岭南构筑了“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北），并使



汉·河西之战出塞路线示意图

之成为了河西长城的起点。翻越乌鞘岭的路径，我们在张骞出使西域部分已经解读过了，基本就是连接古浪——天祝两县的G30公路的走向。尽管游牧属性的匈奴人一般并不会在交通要道上构筑关口以自守，但已经进入匈奴控制区的汉军，毫无疑问会在乌鞘岭一带

遇到匈奴人的阻击。

最先成为霍去病部攻击对象的，是一个叫作“速濮”的部落。很显然，作为汉军此次出征的首战，这个匈奴部落遭受了重大损失。在研究过霍去病在漠南之战的表现之后，我们很容易把这位少年得志的将领理解为一个意气风发，单凭过人胆识和武力建功的先锋型将领。但事实上，霍去病的才能远不止于此。河西之战的进程，让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的了解他驾控战争的能力。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获知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总兵力，但以区区一万兵力孤军深入无疑是非常大的冒险。要知道，卫青在发动漠南之战时所运用的兵力就超过了十万。他此行的目的也并非仅仅像上一次那样，只是为了斩获，而是试图一战为汉帝国获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有鉴于此，如果霍去病希望能够横穿东西纵深长达两千里的河西走廊，并全身而退的话，仅仅依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

### 第三节 霍去病进攻石羊河的休屠王部

在击败乌鞘岭一带的匈奴部落后，汉军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匈奴休屠王部的核心领地——石羊河流域了（时称狐奴水）。然而，之前我们也说了，仅仅依靠一万兵力的话，即使汉军的战力再强，也很难全身而退。好在匈奴人并非铁板一块，就游牧体系来说，它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部落拼合而成的。每一个所谓的“王”，都有自己的直属部落。而在整个组织架构中，级别更高的“王”，还会对其他部落有管理权。具体到石羊河流域的地缘结构来说，就是休屠王是总领这一区域的最高首领。而散布于整个石羊河流域的部落，则是由他们自己的部族首领各自经营自己的牧场（这些最底层的部落，大多都是属于被匈奴人征服的，无直接血缘



关系的部落）。

这种松散的管理结构，也对霍去病分化对手提供了极大帮助。在取得首战胜利后，霍去病并没有随之攻击他所遇到的每一个部落。快速找到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核心部落，也就是休屠、浑邪王本部，进行斩首行动，才是霍去病此行的战术目标。如果得手的话，基本上也算完成征服整个河西走廊了。为了能够快速接近休屠王本部，汉军不仅完全放弃俘获的辎重、俘虏，还通过这些被释放的匈奴人向周边部落传达了信息。即只要慑服于汉军，不主动攻击汉军者，汉军也决不会主动攻击。



汉西域全图

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休屠王本部此时具体驻牧于石羊河流域的哪个点上，但作为河西走廊东段的核心部落，休屠王势必有不少部落环列周围，以为之提供缓冲。如果汉军攻击前进的话，等到汉军接近到战力最强的休屠王本部时，也很可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然而休屠王应该完全没有预料到霍去病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很快让自己领地的边缘部落放弃了抵抗。仅仅不到六天工夫，霍去病就完成了第一次河西之战。

如果霍去病出身在更加信奉丛林法则的草原上，他这种政治 + 军事的战术，也许会帮助他有机会建立一个草原帝国。因为在一千多年之后，成吉思汗正是运用类似的战术帮助他们迅速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只不过，蒙古人的做法要更为血腥。在他们的攻击范围内，几乎只有主动投降和屠城两种选择。

霍去病有没有建立草原帝国的潜质，只是一个题外话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如此假设也只是根据他的性格做出的一点判断。不管怎么说，上述战术在休屠王领地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共计有五个部落（史称“五小国”）慑服于汉军军威，让霍去病快速过境。而措手不及的休屠王本部则损失惨重，不仅连自己的“祭天金人”都成为了霍去病的战利品，更差一点让前来探访的单于之子成为汉军的俘虏。

在霍去病横扫石羊河流域后，除了那五个表示愿意作壁上观的部落以外，休屠王本部在遭受重击以后，应该有两个方向可以逃往避难：一条就是直线向北，穿越大漠戈壁，退入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的大湖盆地区（也就是匈奴右翼核心区）；另一条则是向西败退，最终进入浑邪王部的领地。从地缘结构上看，选择后一条路线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不过霍去病倒并不会太关心休屠王逃往何方，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并非斩获，或者仅仅针对休屠王部。他所希望的，是凭借强大的战力和机动性迅速穿越整条河西走廊，并直接攻击休屠、浑邪两部的核心部落。也就是说，不管暂时失去反击能力的休屠王部逃往何方，霍去病接下来的目标都是继续向西。

#### 第四节 休屠王和浑邪王领地的分割线

整个河西走廊的地缘结构，我们在解读张骞出使西域路线时就已经解读过了。以水系来划分的话，可以将之分为三大流域，即：东部的石羊河流域、中部的黑水（额济纳河）流域，以及西端的疏勒河流域。当石羊河流域的战事结束之后，浑邪王所控制的黑水流域，马上就将成为汉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了。

以地缘结构来看，河西走廊可以被定义为“祁连山脉山前低地”。霍去病的攻击线路也和日后成行的丝绸之路一样，相当于沿着祁连山麓向西延伸。实际上，如果没有祁连山之水浸润的话，这片土地也会和它北部的阿拉善高原一样，成为一片大漠戈壁之地。那样的话，河西走廊即使还会因为位置的原因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但基本上也就没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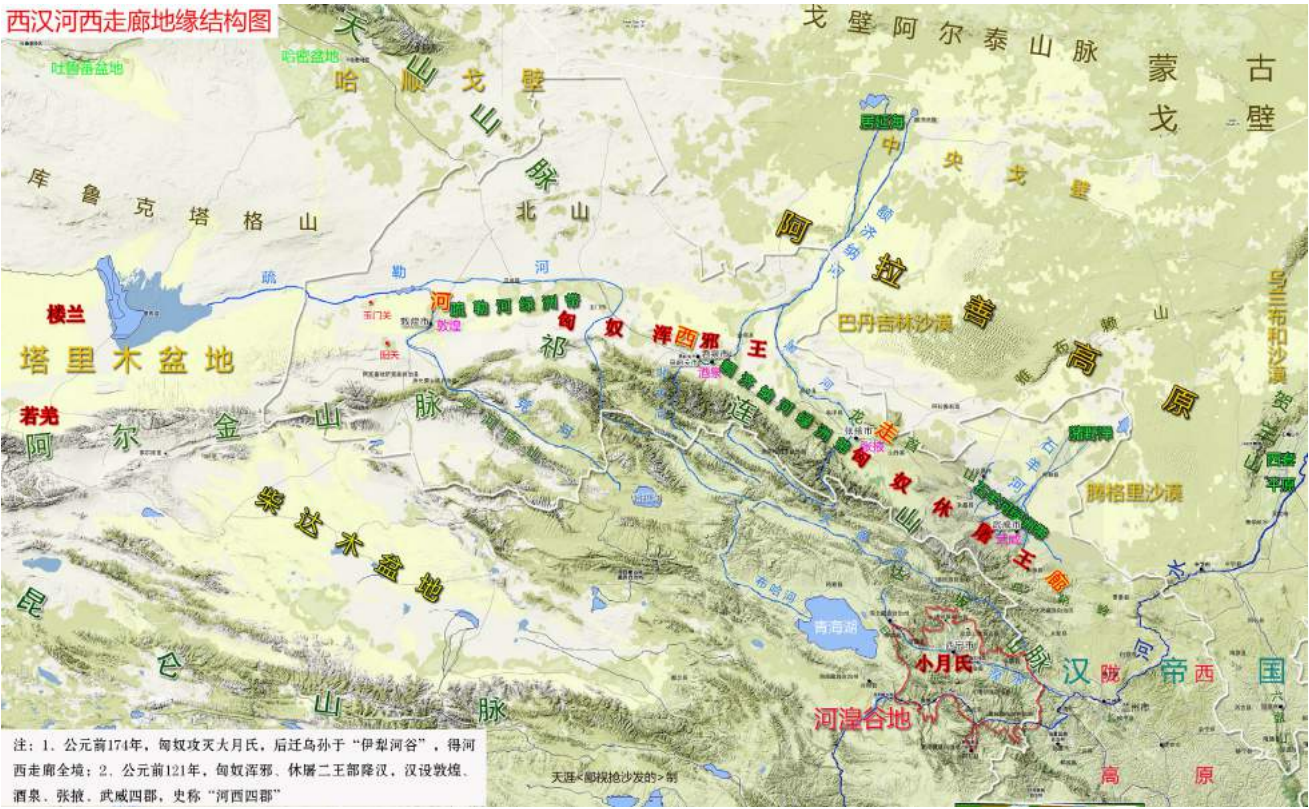
即使河西走廊因为有祁连山水而成为了农业区，但由于走廊地带的另一侧没有高大山脉以为屏障，这片土地还是随时会受到来自阿拉善高原的风沙影响。不过，也不能完全说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就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了。最起码在石羊河与黑水流域之间，有一条东西长 300 公里的狭长山地带，能够多少为之阻挡风沙侵蚀。

这条东高西低的山地带，中、东段被称之为“龙首山”。西段海拔更低一些的这段山体，被单独称之为“合黎山”。在龙首山的东部，还有一段与之走向相左，相当于横切河西走廊的山体——燕支山。“燕支”二字其实是音译自匈奴语了，在历史记载中，它还有焉脂山、燕脂山、胭脂山等不同名字的译名。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更愿意为之选取“胭脂”之名。因为这段山体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盖因为匈奴人在失去河西走廊后，曾哀叹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将山与女子之颜联系在一起，用“胭脂”二字转译看起来会更为贴切（或胭脂即源于此山）。

作为河西走廊通道中唯一横断走廊的山体，燕支山是很适合作为一条地缘分割线的。事实上，它也正是黑水（黑河）与狐奴水（石羊河）流域的分水岭。然而事实上，燕支山并没有成为休屠、浑邪两部的分界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段山体的位置过于偏东，如果以之划分两部领地的话，休屠王部就明显吃亏了。作为与浑邪王同级的匈奴王，这样做并不会被接受。



西汉河西走廊地缘结构图

如果要公平起见的话，休屠王的领地就必须包含一部分黑水流域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合黎山南的黑水河干流最终成为了两部的分界线。这也意味着燕支山以西，龙首——合黎两山与祁连山脉之间包夹的这段走廊，基本成为了休屠王的领地（两部的分割点，大致在今甘肃高台县西）。在霍去病为汉帝国夺取河西走廊后，合黎——龙首山南的这段休屠王故地，被建制为了“张掖郡”（公元前 111 年）。所谓张掖之意，就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的意思。

霍去病在攻入河西走廊之后，对休屠王诸部又打又拉的分化政策，使得休屠王完全没有机会据燕支山建立一道迟滞汉军进攻的防线。很快，汉军就快速转进至黑

河之侧，准备攻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浑邪王部了。

## 第五节 皋兰山地理位置的推测分析

没有能够在乌鞘岭、燕支山有效阻击霍去病部，应该说是匈奴人最大的失策。因为不管你采用何种战法，当道的山地都会是防御者最好的依托。在汉匈之战中，除了善于依托山体修筑长城的汉军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匈奴人利用山地阻击汉军的案例。正是吸取了休屠王部的教训（也要感谢他为自己争取了时间），浑邪王部主力并没有依托黑水河建立防线阻击汉军，而是在自己境内寻找到了的一处同样矗立于河西走廊之中的山体为后盾，布设了与汉军决战的战场。

最终成为第一次河西之战决战战场的这座山，史称“皋兰山”。此战之后，霍去病也带着汉军回撤到了陇西。只不过这座关系到第一次河西之战终点的山，其名应该是从匈奴人口中获知的，后来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名称记录在案。以至于仅仅在东汉时期，历史记录者就已经搞不太清楚它的方位了。

如果你现在去找“皋兰山”的话，那所指向的地标将会是兰州，位置也在黄河南岸。很显然，在霍去病主动发起攻击，并最终获胜的情况下，战火是无论如何不会烧至汉地的。其实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了，金瓶梅的作者一时“疏忽”，没写清西门庆的籍贯，纵然是个虚拟人物，也没什么好名声，今日也会有几个城市在争夺。像“皋兰”这样被载入史册的无主地标，要是没人去用，倒是不正常了。

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所谓“皋”即有水边之地的意思，也有高地的意思。将之理解为水边山地，倒也合理。事实上，尽管对皋兰所指向的地点，一直以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它所指向的应该是一片山地，却是没有异议的。至于其名是否源自于匈奴语的音译，倒在其次了。霍去病自燕支山起的攻击里程，在汉武帝的诏书中被记录为“千有余里”。这意味着汉军向西的交通距离，至少应该在416公里。当我们以燕支山为起点，沿两点之间交通距离最短的“连霍公路”，向西一路延伸视线的话，在416公里这个点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片海拔约在1800米，呈南北对峙的山地（如以312国道计，则为44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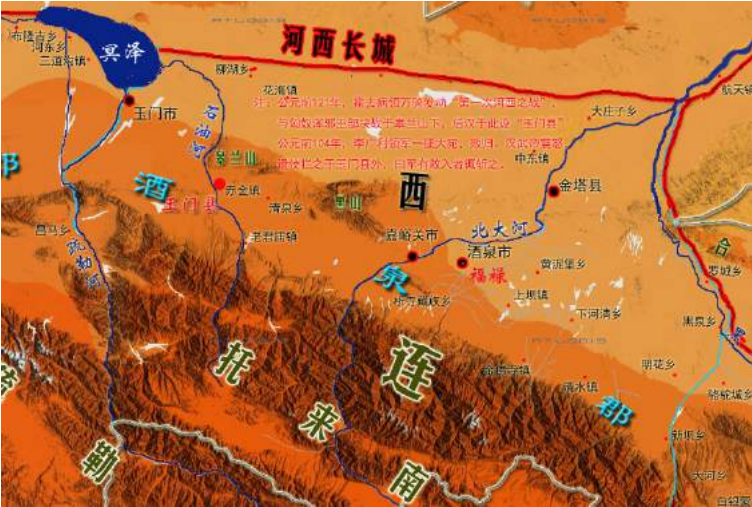
所谓山水相依，这片有可能就是第一次河西之战决战战场的山地，也被一条独自流向戈壁深处的河流——石油河串联了起来。在河西走廊当中，比起疏勒河、石羊河、黑水河这些流域面颇广的大河来说，介于疏勒河、黑水河流域之间的石油河并不起眼。它的名字甚至有些太过于“洋气”了，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之与汉代烽火联系起来。

事实上，石油河周边也的确是储藏有石油，这一地区甚至成就了红色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将之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并不为过。不过早在古典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石油河的河面上有“石脂”飘浮，并将之命名为“石脂水”或者“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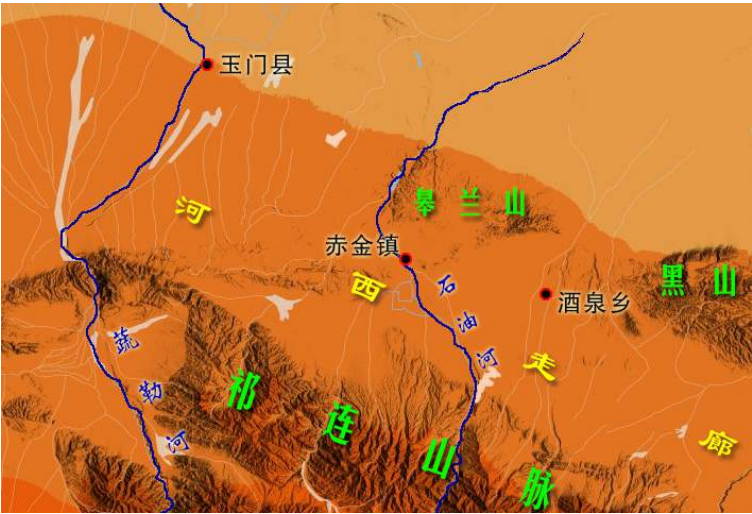


油河”了。没有记录表明，这些自然浮出的石油在汉匈之战中曾经发挥过作用。在史书缺乏准确定位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指望匈奴人能够为后人留下什么证据，来证明皋兰山的所在。

事实上，以距离定位出来地理位置，并不一定就是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毕竟地缘的概念中，要加进“人”的因素。如果通过测距、地势所得分析出来的地点，正是处于一片人迹罕至的沙漠，抑或中间有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结论显然就是靠不住的。



汉西域全图



赤金镇位置图

与两山相夹的天然谷道交汇处，应该是最具战略价值的。对于汉军来说，如果尚没有把握完全控制疏勒河流域的话，控制了这个要点，最起码可保黑水、石羊河两大流域的安全。

然而在今天的行政版图上，我们无法在这个点上找到一个县、市级行政区的

尽管史书并没有明确记录下“皋兰”的地标所在，但从军事角度来说，战争的发生地总还是有迹可循的。对于驻防的一方来说，一般情况下，那些易于防守，并且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地点，总是更容易成为他们迎战的选择。不过，既然匈奴人所选择的战场应该是易守难攻，且身处交通要道上的点，那么后来进占河西走廊的汉帝国，也是没有理由无视这个曾经让汉军苦战之地的。也就是说，如果皋兰山一带曾经成为汉匈决战的战场的话，那么汉帝国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关口时，肯定会在此设立军事据点的。

上述方法，我们在解读汉受降城与漠南之战中右贤王王庭所在地时，也曾经实践过（龙城之战也是一例）。单纯从军事和交通角度看，这片山水相依之地中，南北流向的石油河

驻地，只能看到一个名字颇有些富贵气的镇——赤金镇。赤金镇的上一级行政区，是今天归属酒泉管理的“玉门市”，之前我们说到的，石油河畔的油田即为“玉门油田”了。今天玉门县的县城所在地，是在距离赤金镇约五十公里的疏勒河（昌马河段）东岸。然而在 2100 年前，汉帝国第一次代表中央之国在此建制名为“玉门”的行政区时，它的治所正是在我们通过地缘结构所推断出的战略要点——赤金镇上。

对于崇尚玉文化的中央之国来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玉石之路，一条能够将和田玉带回长安的通道。因此，“玉门”这个标签，也最终成为了中央之国核心区（建制了郡县的区域）在西部的极点。尽管我们现在所认定的汉玉门关故址在疏勒河下游，但在汉帝国刚刚统治西域，尚未完全让西域诸国（尤其是北道诸国）臣服时，被汉帝国视为门户的正是建制了“玉门县”的赤金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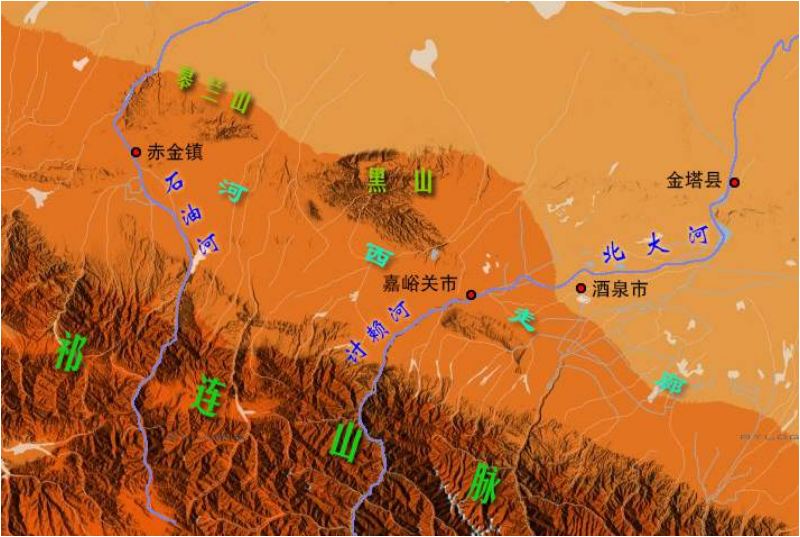
皋兰之战示意图

公元前 104 年，一征大宛的李广利在失败之后，汉武帝十分震怒，命其不得入“玉门”，滞留敦煌以待后援。这里所指向的玉门，也就是汉代的玉门县。很显然，结合汉玉门县的地理结构，最初的玉门关也正构筑于此。

实际上，由于匈奴的侵扰，以及对北道诸国的影响，汉帝国最初所能稳定打通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出阳关的南道。不过在李广利二征大宛并取得胜利后，北道诸国因此而慑服。尽管汉匈之间后来仍然在塔里木盆地展开博弈，但汗血马之战却在战略上，让西域之国战略选择的天平自此倒向了汉帝国一方。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将疏勒河流域置于保护之下，并扼守北道入口的后世所普遍认可的玉门关，才得以兴建（或者说得玉门之名）。



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玉门”这个地缘标签，究竟是什么时候从石油河畔西移到疏勒河下游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汉帝国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势力扩张，是有一个渐次向西的过程的。后来管理疏勒河流域的敦煌郡，也是在酒泉郡设立十年之后（公元前 111 年），再根据帝国的扩张进展而分设出来的。既然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经营十年之后，才开始将疏勒河流域作为重点经营的对象，那么我们其实也就不能指望，霍去病在孤军深入的第一次河西之战时，就能够攻击至这片乌孙故地了。



嘉峪关市位置示意图



嘉峪关讨赖河

相对的山体包夹出一条通关谷地。这两处四段断块相连山体，仿佛一张“弓”扣在祁连山前。

从东穿越这张“弓”的那个紧要山峡，其实比相隔约九十公里的“玉门”要更

实际上，汉帝国没有在一开始，就将地缘上明显具有独立性的疏勒河流域独立设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乌孙”。公元前 119 年，在河西走廊归汉两年之后，张骞带着新的使命第二次出使了西域（公元前 115 年回到长安，次年去世）。而他此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劝说已经在地缘价值上取代月氏的“乌孙”，回到疏勒河流域以为帝国外蕃。只不过，已经得到更好草原的乌孙人，自然是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的。

需要说明的是，石油河畔的“玉门”并非是出黑水流域往西，所遇到的第一个两侧有山可依的交通要点。如果我们把视角再稍微拉高点，就会发现横亘于河西走廊中西段的山体并非只限于赤金镇南北。在今天酒泉市的西侧，也有一处同样南北

加知名。因为差不多 1500 年后，又一次代表中央之国进占河西走廊的明帝国，将这个南北宽约 15 公里的峡谷地带，定位为了明长城的西部起点。这个西大门就是今天的闻名中外的“嘉峪关”。与赤金镇所在峡谷一样，嘉峪关所处的两山包夹之处也有一条河流通过。只不过这条叫做“讨赖河”的河流是穿谷而过，看起来更容易成为一条天然通道（石油河是横切而过）。

讨赖河的名字，相信绝大部分人没有听过。它在经由嘉峪关向西流经酒泉之北后，开始被叫作了“北大河”。在汉朝的时候，北大河被称之为“呼蚕水”。作为黑河流域西部最大的支流，它除了流经嘉峪关这样的交通要点之外，也孕育了河西四郡中的“酒泉郡”。而从流域的角度来看，嘉峪关相当于是庇护黑河流域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也许会有人觉得，明朝实在太过内敛了。即使不能够控制敦煌故地的疏勒河流域（一开始有控制，后来放弃了），也应该为酒泉留下足够的缓冲地，将汉长城的西点定位于汉玉门县故地。至于再往西延伸 90 公里的防线，

对于明帝国的安全有没有战略影响，并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其实嘉峪关一带，同样也发现了汉长城的遗存。亦有人据此认为，汉玉门关最初曾经设置于此，后西移到了赤金镇一带并建制了“玉门县”（后进一步移至疏勒河下游）。只能说，一扩一收，汉、明两朝的帝国属性尽显于此。

## 第六节 汉军在皋兰之战中击败浑邪王部

好了，让我们把思路拉回到霍去病的“皋兰之战”上来。尽管没有直接记录表明皋兰之战的发生地，但一系列间接证据已经足以让我们接近事实的真相了。也就是汉代玉门县所依附的这片山地，应该就是皋兰之战的战场。从燕支山向西快速推进了千里的霍去病，也正是在这个浑邪王领地的中点与浑邪王主力短兵相接。

从决战的结果来看，霍去病仍然是最后的胜者。在皋兰之战中，汉军俘虏了浑邪王子及其所属的相国、都尉等一批贵族，斩杀了折兰、卢侯两王（部落首领）。只是从过程来看，这场战斗赢得也并不轻松。在纵横河西两千余里后，鏖战于皋兰山下的汉军其实也有点强弩之末了。最终能够带着战利品回到陇西的汉军，约占出征时的三成。也就是说，第一次河西之战在斩俘匈奴八千九百人的同时，汉军也损失了七千人。

若从人员的消耗比来看，霍去病此役并不算大胜。然而在己方未有重要将领损失（也没得损失，因为只有霍去病一将）的情况下，孤军深入的霍去病俘获、斩杀、慑服了一大批匈奴贵族。这样的战果，足以让汉、匈两方为之震动了。也正是在此战之后，汉武帝除了加封霍去病二千二百户的封邑以外，更进一步放开手脚让霍去病去施展他的军事才能。而第一次河西之战的战果，却显然不能让这位少年得志的将军满意。在回到黄河南岸迅速补充兵力之后，很快又一场针对休屠、浑邪两部的



夏季攻势，再次拉开了序幕。

尽管霍去病取得了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胜利，并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次河西之战了，但作为最熟悉河西走廊情况的张骞，却一直没有机会出现在西线战场上。不过，他向汉武帝提供的关于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详细信息（应该还会绘有地图），肯定对霍去病的西征有着莫大的帮助。那么，正当西线战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张骞又在哪里呢？

其实此时的张骞也没有闲着，他正在帝国的东部忙着针对匈奴左贤王部开辟东线战场呢。公元前 121 年五月，在霍去病再渡黄河攻入河西走廊的同时，张骞率领的一万汉骑也从右北平郡出发，北出燕山向匈奴人发起了进攻。应该说，两个战场如此之远，在战术上并无配合之说。不过从战略上看，东线战场的开辟，对匈奴人整体兵力的调动还是有牵制作用的。事实上，在霍去病和休屠、浑邪二部苦战河西后，匈奴人就侵扰了雁门、代郡。不管匈奴人此举是为了度过春荒，还是明确的报复之举，强大的汉帝国都有必要在东线再开辟一个战场了。

与博望侯一同出征，或者说为其部前锋的是终身抱憾，未能封侯的李广。其实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当看到这个悲剧英雄的名字时，相信大家的心头都会一紧。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这种感觉。带领四千骑兵出征的李广，很快就遇上了匈奴主力部队。在己方损失了二千人的情况下，斩杀了对手三千余人。应该说，这样的战果虽然不至于受到大封赏，但也不会受罚了。

然而本该为李广后应的张骞，却没有在匈奴人撤退之前赶到。在信息不发达的古典时期，未能按期抵达预定目标，应该是很常见的错误了。尽管汉军对“失期”的惩罚很重（斩首），但亦同时定有以钱赎罪的救济性规定。所以张骞在此战之后的结局，就是被贬为庶人了。在“法制”已经成为热门词汇的今天，这看起来似乎很没有法制精神。不过结合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种救济条款的设置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汉帝国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可用之人了。

大多数“失期”的原因是迷失了道路，看起来最熟悉匈奴情况的张骞也同样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以其经历来说，匈奴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才是他最熟悉的板块。现在让张骞在东线领军，显然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霍去病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河西战场上无功而返，甚至失败的话，相信一定会有人质疑他为什么不与张骞合作并取河西。

## 第三十二章 霍去病第二次远征河西走廊

### 第一节 霍去病没有从阿拉善和居延海进军

说起来，特立独行的霍去病在性格和战术上，实在是有太多不符合兵法的地方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和他的部队无论从风格还是战术上都更像匈奴（或者说比匈奴人还匈奴人）。加上汉军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及可供选择战士的庞大基数，“亮剑”式的打法能够大获成功。而如果在霍去病的军事生涯中遭受哪怕一次失败，这些看起来不符合常规的做法，都会成为旁人攻击他的口实。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霍去病从来没有让人有机会质疑他的战术。因为在他短暂的军事生涯中（六年），并没有遭受哪怕一次失败。不用说，在汉军东线战场不利的情况下，第二次河西之战的结果，一定又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胜利。我们无法获知，匈奴人是否对汉军在春季攻势之后，紧接着就展开夏季攻势一事感到惊讶。不过这在汉匈之战中，已经有过先例了。三年前漠南之战的第二阶段中，卫青所率的十余万汉军就曾经分别在三月、五月两出定襄，攻击阴北草原上的匈奴人。如果匈奴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话，他们应该会有所预防的了。

以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来说，乌鞘岭无疑是阻击汉军的第一道防线。不管匈奴人有没有预感到汉军会很快发起夏季攻势，对手开辟西线战场的事实，都会逼迫他们提高警惕了。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人如果不将侦察半径延伸至黄河北岸了，就太没军事常识了。

鉴于汉军的春季攻势是西出陇西郡，从兰州一带渡河，沿庄浪河谷北上，再从乌鞘岭的西端，穿越山岭进入石羊河流域的。上述线路所经之地，将会是匈奴人的预警方向。而乌鞘岭本身，也一定是匈奴人布防的重心。说起来这件事也挺讽刺的，一直长于野战的匈奴人，现在却不得不依托山体来防御了；而一直精于依山防御的汉军，却拥有了能够在草原上纵横的实力。让习惯于野战的匈奴人，依托山地构筑防御工事本来就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

不过在山谷通道上，根据预警集结重兵却是可以做到的。然而霍去病和他的部队却并没有遵循上一次的攻击路线，从陇西郡出发，而是转换了方向，从北地郡出征，攻入了河西走廊。选择新的攻击路线，显然是为了让这次攻击行动跟上一次一样，显得出其不意。只不过，由于历史的记录过于简略，让后人在了解第二次河西之战在攻击线路时，产生了很大的误会，客观上也将霍去病由一个不世出的出色将领，推向了军神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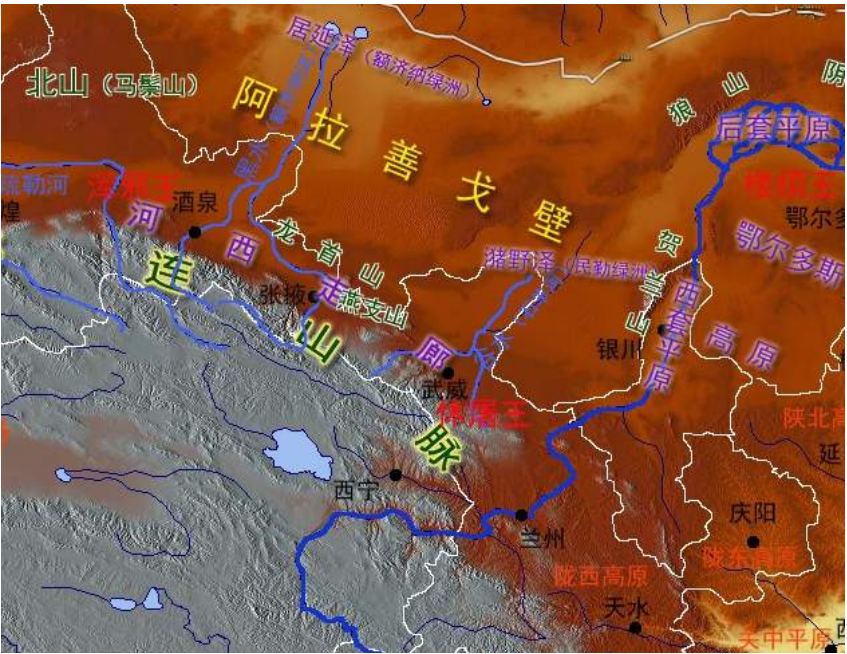
在霍去病二出河西之役中，有两个关键的地缘标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军的出征线路，一个是“北地郡”，一个是“居延”。北地郡的范围，在之前的内容中已



经解读过了。这个最初由秦帝国设立的郡，地理范围横跨陇山——六盘山，不仅包括陇东高原，亦包含陇西高原的北部（南部为陇西郡）。在将西套平原纳入中央之国的范围之后，这个板块也被纳入了北地郡的行政区内。

至于“居延”这个地缘标签，知名度就更高了。源出酒泉（北大河）、张掖（黑河）两地，向北延伸入阿拉善高原腹地的“弱水”，最终在阿拉善高原的北部，即今天临近中蒙国境线的地方汇集而成了东、西两片湖沼之地。这就是“居延海”（或者居延泽）。

居延海是河西走廊对接蒙古高原的枢纽板块，在后来汉军北击匈奴的战役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果霍去病在渡过黄河之后，选择的是横插至居延海，然后沿弱水攻击南下至祁连山麓，并最终向东横扫浑邪、休屠王部的话，最有可能作为攻击起点的，就是贺兰山的北部了。鉴于贺兰山和西套平原，在漠南之战后都纳入了北地郡的范畴。这样一条攻击路线，看起来已经满足了“北地”、“居延”两个关键词的要求。并且这样为第二次河西之战所规划出来的，交通距离超过 1500 公里的“C”形攻击线路（居延海——额济纳——酒泉——兰州），看起来也能够将浑邪、休屠王部所经营的重心之地基本带到。



蒙古高原右翼地缘结构图

食于敌的霍去病部来说，这样的地缘环境并不能令人满意。

以霍去病的战术来说，他其实更喜欢在草原地带正面攻击对手，尤其是看起来人数更多，物资更丰富的匈奴主力。因为一旦攻击得手的话，不仅能够迅速瓦解对手的心理防线，还能够让自己的部队得到最大的补给。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拥有强于对手的战力。不过这也正是霍去病的优势所在，此时马太效应已经在

然而当我们了解到，贺兰山与弱水——居延海之间这片土地的性质时，汉军能否依照上述路线横扫河西，就很值得怀疑了。要知道，两者之间相隔的阿拉善高原是一片沙漠戈壁之地。尽管连接居延海与贺兰山北的直线，在沙漠地带（巴丹吉林沙漠）北沿的戈壁地带，今天我们也能够在里面找到呈点状分布的几个蒙古牧民的聚落点（也就几百户人家），但对于习惯不带后勤，取

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即使没有皇帝的直接支持，这位少年将军的身边，也能够聚集汉军当中最为强悍的战士了（甚至包括慑服于他的匈奴人）。

既然霍去病的战术有些类似于在滚雪球，即不断的通过战斗补给自己，然后再用获得的资源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去。那么从一开始就让自己面临如此长距离的荒漠之旅，就显得太过冒险了。即使能够准确找到戈壁地带的水源，我们也很难相信在穿越这将近 600 公里的戈壁地带之后，霍去病和他紧急补充的上万骑兵（这意味着即使想要，也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还能够在居延海一带快速攻击匈奴人得手，并势如破竹的横扫整个河西走廊。那么霍去病究竟是从哪里开始他第二次河西之旅的呢？

## 第二节 霍去病从陇西进入河西走廊

如果霍去病不是从北地郡的最北端（也就是贺兰山北）千里跃进居延泽的话，那么汉军此次出发的地点应该仍然是在陇西高原，也就是北地郡的南端。记得在解读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线时，我们就曾经标出过两个日后成为丝绸之路的线路。除了经兰州渡河，通过庄浪河谷对接河西走廊这条线路以外，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从今天的甘肃省靖远市一带渡河。

穿靖远而过，向北注入黄河的这条河流，叫做“祖厉河”。在秦帝国最初划定的行政区中，祖厉河流域（除最上游的定西以外）及其以东至陇山的区域，是被划入了北地郡。也就是说，整个陇西高原大体从中分割，南北分置陇西、北地两郡。

从战略方向上来说，包含陇东高原、西套平原，以及半个陇西高原的北地郡，战略防御面应该是很大的。不仅要应对河套地区的压力，还要兼顾河西走廊。因此在汉帝国进占河西走廊后的第七年（公元前 114 年），帝国决定将北半部陇西高原（西境直至乌鞘岭）拆分出来，单独设置了“安定郡”。不过，在霍去病第二次出征河西走廊之时，霍去病渡河之地还是属于北地郡的辖区。

汉军渡过黄河之后，就进入了今天的甘肃省景泰县境内。后来汉帝国在此建制的行政区名曰“媼围”（城址在今景泰县城东约 12 公里处的“麦窝古城”）。而在霍去病第二次领军到达此处之时，也就相当于离开帝国的直接控制区了。然而这也不代表，霍去病马上就接触到了匈奴人。毕竟匈奴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并不会像定居的汉人那样根据地理结构，在可供通行的每个点上构筑预警、防御工事。以祁连山北的环境来说，整体上总是愈靠近山麓，生存条件更好。因此匈奴部落会更多游牧于乌鞘岭的西段。

单从防御角度来说，汉军上一次的攻击也会让匈奴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乌鞘岭的西部。而霍去病之所以没有再次选择同一路线出征，战术上也是想出其不意。无论从海拔还是气候来说，从乌鞘岭东跨越这条分水岭的难度，都要低于从庄浪河谷



直插乌鞘岭西。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靖远——景泰——武威的线路，也成为了丝绸之路沟通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主线之一。

为了给予匈奴人致命一击，完成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设想，汉帝国这次并没有让霍去病再孤军深入，而是加派了另外一名汉将——公孙敖（合骑侯）独领一军，与之配合。然而在渡过黄河之后，两支汉军并没有遵循相同的路线合击匈奴。双方很快就分道扬镳，沿着不同的路线翻越乌鞘岭。



汉·河西之战出塞路线示意图

参考汉匈之战的其他战役来看，汉军选择分道进击的战术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尤其是在诸领军将领爵位相近的情况下。除却匈奴人行踪不定，需要加大搜索面的原因以外，方便计算各自的军功应该也是原因之一。最起码以霍去病的性格而言，是绝不会愿意有人在他身边掣肘他的行动的（或者说抢他的功劳）。总的来说，

从景泰（媼围）向西的线路，环境都不算好。由于远离祁连山麓，靠近腾格里沙漠，缺水是影响人类生存和通行的最大障碍。拜太平洋季风所赐，从“媼围”出发的汉军还是能够找到两条水量不大的河道帮助他们接近乌鞘岭。为霍去病指路的这条河道，其下游部分今天被称之为“大沙沟”，而其上游部分事实上已经只剩下干河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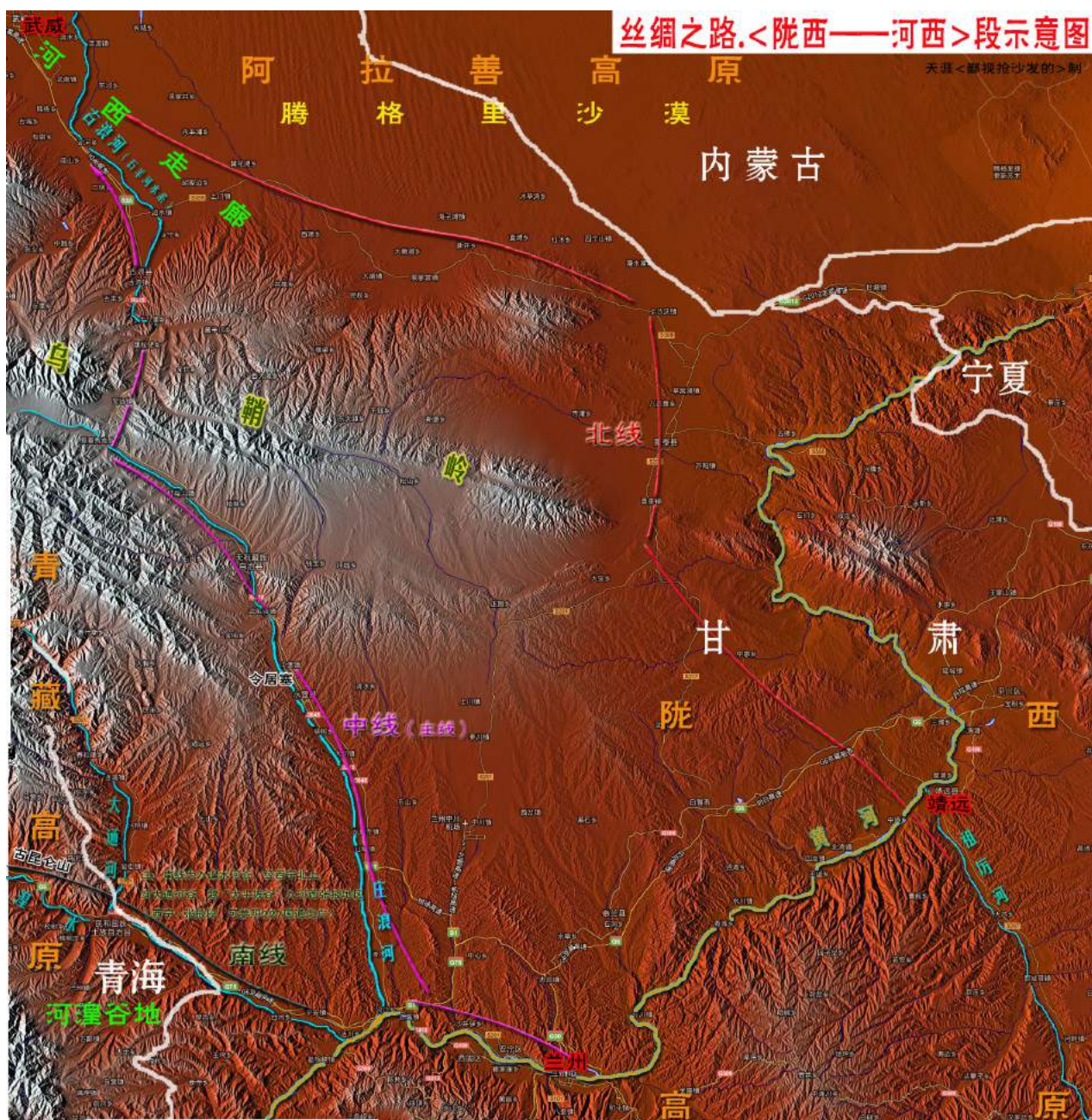
沿着大沙沟向西偏北方向前行 90 汉里，就到达了所谓的“居延”。在后来的岁月里，汉帝国在此建制了“居延置”，以打通北地郡通往武威的驿路。从居延置翻越乌鞘岭分水线后，迎接汉军的将是石羊河最东端的一条支游——大靖河。今天由于灌溉农业的原因，大靖河已经在大靖镇一带断流了。不过在霍去病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大靖河却是与对接庄浪河谷的“古浪河”合流之后，向北汇入石羊河干流的（下游河道今称之为“红水河”）。

现在，我们应该大致清楚霍去病在第二次河西之战中的攻击路线了。如果我们把媼围、居延置这两个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再与乌鞘岭北，大靖河畔的“大靖镇”、石羊河流域的地缘中心“武威”连线的话，就会发现这条沿途有水为伴的道路，几乎是呈一条直线走向。加上地处乌鞘岭东段，山势已逐渐走低，选择这条线路的霍去病，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切入到休屠王的腹地了。

很有可能的是，霍去病在第一次河西之战中，就已经考察好了这条攻击线路。



即使当时没有来得及细想，他也能够从俘获的匈奴人那里得到准确的情况和向导。而另一支与其分路进击的汉军（公孙敖）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应该是从乌鞘岭东端绕至北麓，然后再向西插入石羊河流域。



丝绸之路陇西——河西段示意图

从道路的平整度来说，公孙敖所选择的这个方向看起来应该很不错，亦有一条发源于乌鞘岭东的小河（南流在媪围与大沙沟合流），帮助他到达乌鞘岭脚下。之后无论他是沿今天的 308 省道穿越乌鞘岭，还是再向东一点沿山麓北行，道路都足够宽阔。然而这条道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风水”。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乌鞘岭在此的集水功能已是最弱，几乎不会再在地表水帮助汉军指路，并提供淡水



补给了（今天这一地区，主要是靠井水和黄河水提灌来开展农业）；另一方面，由于与腾格里沙漠接近，风沙随时有可能对在乌鞘岭东麓或者东北麓行进中的汉军进行袭击。

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加上军中缺乏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霍去病部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了），这次本来被派来与霍去病并肩作战的汉军，最终却在乌鞘岭东迷失了方向。不仅未能与霍去病部在河西走廊会合，亦没有碰上匈奴人。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部又一次成为了孤军，去完成属于他的“第二次河西之战”。

### 第三节 霍去病横扫河西走廊的匈奴人

为了完成对河西匈奴的致命一击，帝国为此次出征所准备的骑兵要数倍于上一次（数万）。然而在公孙敖部未能与霍去病部会合后，真正投入战斗的汉军数量也随之减半。当然，就绝对数量来看，霍去病此次所率领的骑兵最起码还是成倍增加了的。

汉军在翻越乌鞘岭之后的征战路线，并没有太大悬念。和上次一样，沿河西走廊向西一路平推，扫荡石羊河、弱水流域的山前平原。这两地，也是休屠、浑邪两部的核心牧地。至于休屠、居延二泽，以及疏勒河流域，以地缘结构而言，并不是河西之战的重点。

肯定会有朋友，为霍去病未能真的穿越阿拉善戈壁进击居延泽而感到遗憾，毕竟如果他真的是遵循上述路线取胜的话，第二次河西之战看起来会更具有“史诗”性。然而从地缘角度看，两次河西之战的两次出征路线，也正是后来丝绸之路自陇西高原切入进入河西走廊的南北两线。汉帝国及后来扩张至此的中原王朝，也无一例外的沿此两线布设了据点。至于一直以来存疑的贺兰山——居延泽攻击线路，却并没有成为丝绸之路的选择。

当然，也许以后会有新的考古证据，证明霍去病真的循此路线完成了一次史诗般的攻击。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考据某一次战役的线路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通过这些鲜活的案例，又更加详细了解了一个板块的地缘结构。

对于此时身处长安的汉武帝来说，此时还没有心思去思考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他现在所关心的，应该是第二次河西之战的战果，而霍去病也绝对没有让他失望。这次战役，汉军一共斩、俘匈奴人达到三万零二百人之巨，其中仅匈奴王子以上的贵族就有 59 人（甚至包括单于阏氏）。单以结果来看，夏季攻势的战果无疑是远超春季攻势的，而汉军的损失却缩减至三成。然而正是由于第一次河西之战打下的良好基础，霍去病二征河西之旅才能更加顺利。

霍去病最终之所以从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将领，迅速成长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甚至压倒卫青的将、帅合一的人才，根本原因在于他并非一个只有勇力，只

懂得强攻的武夫。善于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瓦解敌方阵营，是他成功的关键。

说起来，这也正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英雄——老将李广所欠缺的。尽管李广的武力也让匈奴人慑服，并畏之为飞将军，但他却并未善加利用这一点。李广曾经在风水相士的引导下，总结自己至今未能封侯的原因是：杀降（为陇西太守时，曾杀降羌人八百）。如果不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未能像霍去病那样恩威并施的对待对手，也的确是李广抱憾终身的原因所在。

在第一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掌控对手心理的能力就已显现无疑了。如果不是放过那些愿意表示中立态度的部落，而是一畏强攻对手，相信霍去病那一万骑兵的战力再强，也不可能得胜而归的。这种恩威并施的做法，明显对匈奴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影响。在第二次河西之战中，仅仅被史书记载下来望风而降的匈奴人，就超过了二千五百人。这些主动投降的匈奴人，甚至在战时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己方的战力，帮助汉军再一次扫荡河西走廊。

#### 第四节 霍去病接受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投降

公元前121年的两次河西之战，共计让浑邪、休屠两部损失了将近四万人，这几乎占了河西匈奴人口的半数。这样的损失比例，足以让一支军队或者部落失去战力了。很显然，即使汉军不在秋季发起第三次河西之战，也势必会在次年的春季，再一次由霍去病完成他在河西的收官之战。

不过匈奴人并没有让汉军有机会组织一场新的战役，因为在这样的损失面前，匈奴帝国的统治者首先就沉不住气了。单于无法容忍休屠、浑邪两部遭受这样的损失。更为致命的是，这意味着河西走廊很快就要易主成为汉帝国的领地了。由此而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汉军接下来将会在西域与匈奴人展开争夺了。有鉴于此，单于试图将浑邪、休屠两王“召诛之”，以重组在河西的力量。

如果没有霍去病此前对匈奴人部落的“胡萝卜政策”，感觉到生命危险的浑邪、休屠两王，此时能做的很可能就是逃亡了。不过有了之前的示范作用，向汉军乞降，接受汉帝国的庇护成为了更为可行的方案。

这样的结果，虽然是一个意外惊喜，但从大势上来说，汉军完全征服河西走廊，也已是旦夕之间的事了。事实上，此时的汉军已经在黄河北岸开始构筑城防工事，为下一次战役做准备了。然而在获知两部匈奴来降的消息之后，汉军其实也并不十分确定，匈奴人是真心投降还是想借机袭击帝国的边境。毕竟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归降事件，而这个时节又是“秋高马肥”，匈奴南下侵扰的好时节（正值8月）。为此，汉武帝命令霍去病亲率大军渡河以“迎接”来降的浑邪、休屠两部。

事实证明，这一准备并非多余之举。因为对于匈奴人来说，也同样有理由担心自己投降之后的安全问题。当这些惴惴不安的匈奴人即将进入汉军防线的时候，意



外发生了。一方面休屠王本人开始动摇，另一方面浑邪王的部众当中也有人开始逃亡。面对这样的变故，两手准备的汉军及时对逃亡者发动了攻击，在斩杀八千人之后，彻底断绝了余下四万多匈奴人回头的想法（休屠王本人也为浑邪王所杀）。

霍去病的两次河西之战，以及接下来河西匈奴的归降事件，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中央之国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件地缘上的大事件。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意味着核心区向河西走廊扩张的开始；而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不仅使得渗透西域，断匈奴右臂成为了可能，更直接缓解了陇西高原以及“河南地”的地缘压力。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帝国的西北边境几乎不再可能遭受匈奴人大规模的入侵了。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一方面下令缩减了西北边境（北地郡以西）半数的兵力，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向河套、河西地区的移民工作，以完全坐实这两片匈奴故地。而经过漠南、河西之战后的匈奴人，此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他们在漠南的据点。龟缩回漠北，以大漠戈壁（瀚海）为屏障与汉帝国展开拉锯战，成为了匈奴帝国的战略选择。只是已经完全占据上风的汉帝国，真的会被瀚海所阻隔吗？

## 第三十三章 卫青在漠北之战击败匈奴

### 第一节 卫青与霍去病分兵远征漠北

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汉帝国取得的胜利已经是空前的了。以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来说，真能隔大漠戈壁而治的话，也绝对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汉朝来说）。然而此时匈奴所谓的回到漠北，却并非是完全放弃漠南草原，以及对汉朝边郡的侵扰。他们只不过是不再将王庭置于漠南，而是以漠北为根据地罢了（之前在漠南损失了太多贵族）。在河西之战的第二年秋季，匈奴便又如往常一样南下，劫掠了右北平、定襄两郡。

在一场拉锯战中，决定最后胜利的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强的攻击力，而在于你的防守能力。如果匈奴人能够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能力，仍然对汉朝边郡周期性侵扰，而汉军却无法穿越戈壁攻击漠北的话，帝国的北方压力就依然存在。一旦汉帝国内部有变，导致防御力下降，胜利的天平就将重新倒向游牧民族。我们一直在说，在古典时期，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其实就是指的这种防御上的天然优势。

当然，让农耕文化出身的汉军久居漠北固然是不现实的。帝国亦无法像屯垦河南、河西那样，最终消化掉漠北草原。但在强大的经济支撑下，跨越戈壁攻击漠北的匈奴，却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公元前119年，已经将匈奴主力逐往漠北的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攻击漠北。汉武帝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原因很简单：既然匈奴人认为汉军不能横穿沙漠作战，那么我们现在出征，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出其不意”是兵法中常用的谋略。虽然调动数十万军队长途奔袭，匈奴方面不可能不得到预警。但匈奴方面并不相信，汉军在横穿沙漠之后还有余力作战。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送俘虏上门罢了。正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预判，在面对汉军出击的时候，匈奴方面所做的应对，就是将主力、辎重尽数囤于漠北，以逸待劳的等着羊入虎口。

汉军决定的出征时间是在公元前119年5月。这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在之前的战役中，除了巩固战果的二次攻击会选择在夏季以外，汉军一般总是选择在游牧民族最虚弱的春季发起攻势的。不过实际上，这仍然是一次春季攻势。因为身处高纬度地带漠北地区，此时正处在春季（漠北的春季很短，也就一个多月）。

从规模上看，计划中的漠北之战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直接投入战斗的骑兵达到了十万之数（马匹十四万）。为之转运粮草、延伸补给线的步兵达到了数十万。这些出征的汉军，大致被平分为东、西两路，一路由卫青辖制；另一路，则



由刚刚在河西立下奇功的霍去病所统领。

看起来，霍去病此时在汉军中的地位已经能够和卫青平起平坐了。而实际上，此时霍去病的地位甚至已经高过卫青了。鉴于之前那奇迹般的战果，汉武帝对霍去病战力的信任，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在这次攻击中，霍去病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直接攻击单于本部，对匈奴帝国实施斩首行动。为了完成这致命一击，霍去病得到了优先挑选军队的权利。也就是说，从质量上看，霍去病部集中了汉军的精锐。

让霍去病挑选、统率最精锐的汉军，也是霍去病自出道以来一直享有的特权了。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挑选范围和统军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以霍去病此时的威望来说，那些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将士，也自然会愿意聚集到他的麾下，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马太效应了。

在汉武帝最初所拟定的作战方案中，霍去病原本是负责西路战事的。因为有了漠南之战的基础，汉军已经对远至夫羊句山的线路了然于胸了。此时的汉军，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当日的右贤王王庭所在位置（也就是后来的受降城），初步建立据点，并将补给线延伸过去了。也就是说，如果循此路线出击的话，霍去病能够更快速的攻至单于所处的色楞格河流域（南部）。至于卫青，他所负责的方向则是东路，也就是左贤王部的势力范围。

正当汉军准备依计划出征时，一件意外打乱了汉军的部署。根据匈奴俘虏的口供（应该是匈奴侦骑），此时的单于并不在本部，而是在东部左贤王的领地。对于一心想斩首单于的汉武帝和霍去病来说，调整计划也就在所难免了。于是霍、卫两军的攻击方向，也随之对调了。

从战术上来看，这东、西两路汉军属于完全独立作战的方面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卫青所率领的西路军，以及霍去病所统领的东路军，应该在分别跨越杭爱山、肯特山之后，会师于两山相对的南部缺口处，也就是匈奴单于本部的牧地。至于最终能否见到这个理想当中的会师场面，就要看卫、霍二人的努力了。

## 第二节 卫青由阴北草原和湖谷进军漠北

我们先来看看卫青部的战役进程。西路汉军的出击地点是大青山之东的“定襄郡”，出征之后的汉军主力一开始应该是沿阴北草原向西推进，先行扫荡匈奴在这一地区的残余势力。在汉帝国尚未能在戈壁与阴北草原相接地带修筑外长城的时候，谁也不能保证这片缓冲之地没有可能再一次成为匈奴向南渗透的跳板。鉴于此次出征漠北需要建立贯穿阴北草原的补给线，让自己的侧后方处于安全状态是十分有必要的。

很显然，汉军在阴北草原的扫荡工作并没有遇到障碍。因为得到消息的匈奴人已经在那位降将赵信的建议下，将决战的战场预设于漠北了。对于卫青来说，这也

不算意外。毕竟匈奴决心以大漠戈壁为屏障阻滞汉军，已经是“阳谋”了。然而这种战略层面的阳谋，并不表明两军战术层面就不存在阴谋了。很快，卫青就会发现之前所得到的情报，很可能是匈奴人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因为在北行塞外千里之后他将发现，自己的正面之敌才真的是单于所率领的匈奴主力。

如果是在写小说，那我在行文中将用很肯定的语气来表明单于前往匈奴左翼的消息，是匈奴方面的阴谋。现在的话，我只能说这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毕竟现在匈奴方面最害怕的将领，无疑是完全无视对手存在，在草原上比匈奴人还如鱼得水的霍去病。在卫青实际统领的是次一级兵团的情况下，以田忌赛马之策来增加己方的胜算并不需要熟读兵法的人才能想到（道理很浅显了）。

卫青穿越戈壁的线路，并不会是一条新路。汉军没有理由放弃他们之前在漠南之战中，追击匈奴右贤王时所循的线路。只不过，这一次卫青并不会止步于夫羊句山，而是必须继续北上，最终翻越“燕然山”（杭爱山）进入到色楞格河流域。

以匈奴方面的战略设想来说，理论上他们应该在色楞格河流域以逸待劳的等待汉军送上门来的。不过通过之前的几场战役，匈奴人意识到汉、匈两军的战力对比，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此时的汉军已经完全具备在草原上与之对抗的能力，而草原也不再只属于这些住毡房的人了。从技术上看，将汉军放入草原腹地再与之决战，也不是最佳的时机。这意味着，汉军有机会在得到充足的水、草补给后，再与匈奴决战。

在汉人的兵法当中，攻击一支渡河部队的最佳时机，是在“半渡”的时候。即一部分敌军刚刚上岸，尚未布好阵型，而另一部分敌军还正在渡河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未能半渡击敌的宋襄公，还成为了千古笑料（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他是先秦战争中最后的“贵族”）。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蒙古戈壁并不是一条河，而是南北纵深千里的荒漠地带。比起河流来说，戈壁能够给匈奴人更大的战场选择余地。他们并不需要等部分汉军踏上漠北草原之后再“半渡”击之，而是可以陈兵于戈壁地带的北部，等待已经被荒漠气候折磨多日的汉军撞到枪口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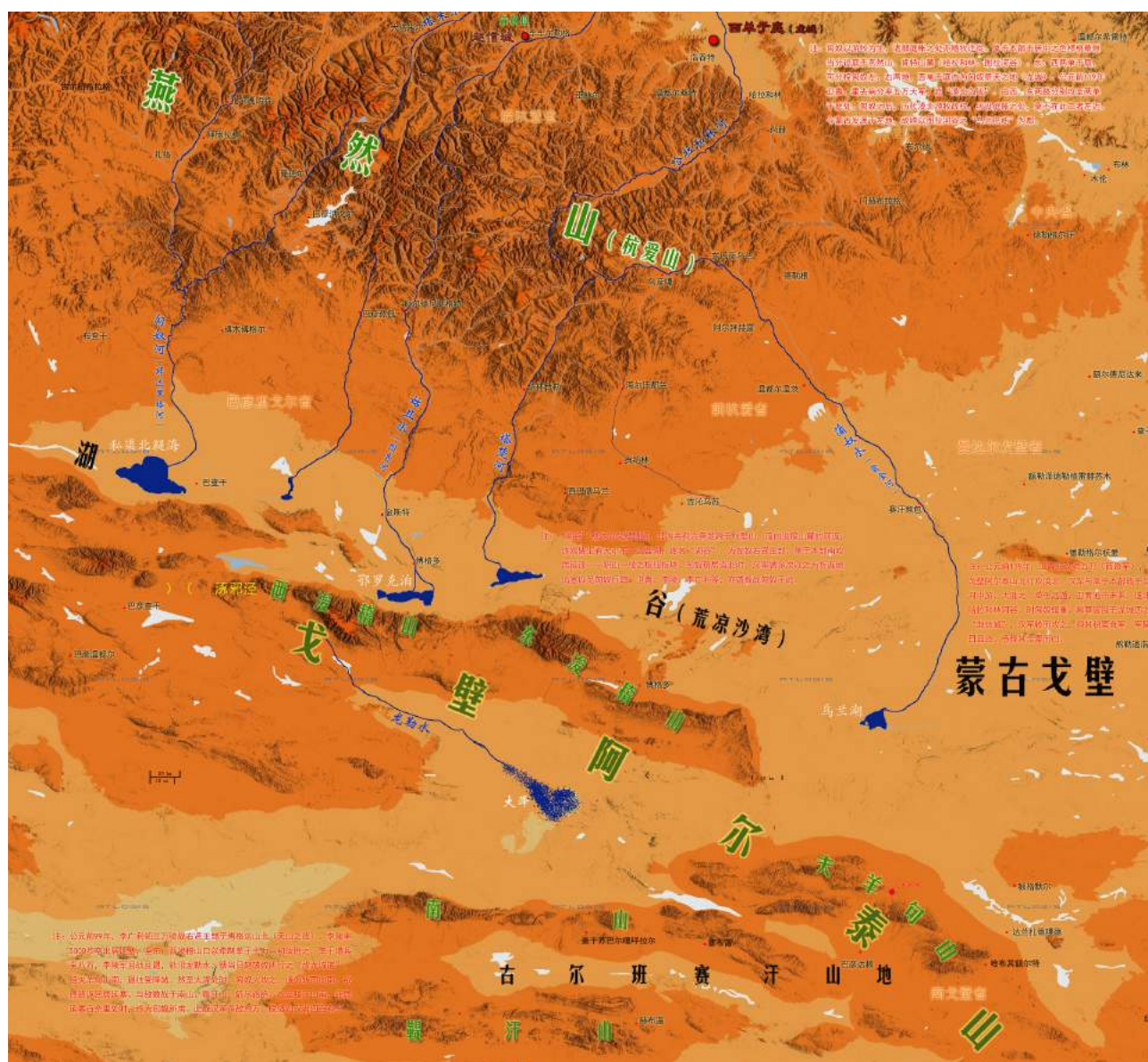
之所以要做上述分析，是因为这关系到西线战场决战地的定位。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在西线哪里才是草原与戈壁相接的地方。从地理结构上看，戈壁阿尔泰山应该有机会成为一道分割线的。然而这片阿尔泰山脉在东部的延伸山地，本身在海拔和体量上都有些不足，山体之间那些宽阔的断裂带，也让戈壁环境有了更多的渗透空间。

真正有机会将戈壁环境拒之门外的，是戈壁阿尔泰山北部的“杭爱山”，在汉帝国征战匈奴的记录中，这条与阿尔泰山脉（包括戈壁阿尔泰山）平行的山地，被称之为燕然山。记得在最初解读蒙古高原地缘结构的时候，我们曾经对杭爱山与阿尔泰山脉之间的地带（唐努乌拉山以南），做了一个地理上的标记——大湖盆地。由于深入内陆，与季风接触面小的原因，这条西北——东南向的低带内中心，并没



有形成一条贯穿其间的大河。从南北两侧山地流下的河流，最终只是在两山间的凹陷地带形成了一个颇有些体量的大湖。而整个大湖盆地（包括两侧对应的山坡地带），则是匈奴右翼的核心区。

由于杭爱山主脉比阿尔泰山脉主脉向东南方面延伸得稍长一些，而阿尔泰山脉对应的也延伸出了余脉“戈壁阿尔泰山脉”，因此戈壁阿尔泰山脉与杭爱山之间的低地带，算是大湖盆地的东部延伸。然而由于地理结构和环境原因，这一地区也可以被单独被命名为一个地理单元。就像戈壁阿尔泰山既可以被视为阿尔泰山的余脉，又因为综合环境因素可以被单列出来一样。



# 汉西域全图

戈壁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的这一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湖谷”。湖谷地区与大湖盆地之间的地理差异，可以通过水系结构体现出来。在大湖盆地区，阿尔泰

山与杭爱山都为低地区的大湖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在东部的湖谷地带，由于戈壁阿尔泰山在集水上的不给力，整个区域的集水工作几乎都是由杭爱山东、南麓来完成的。那些从杭爱山上流下来的淡水，总计在湖谷内形成了六条主要河流，每一条河流在谷内的低点又都对应形成了一个体量不大的湖泊。

从这种单面供水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整个湖谷地带的环境应该是越往南部越呈现荒漠地貌；而越靠近杭爱山，植被的覆盖情况就要越好。以“漠北”这个地缘标签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湖谷这个位置上，杭爱山就是一条地缘分割线。如果汉军踏入了杭爱山腹地，也就相当于踏上了漠北草原的土地。很显然，无论从单纯军事防御，还是御敌于漠北草原之外的角度考虑，匈奴主力都会陈兵于杭爱山南，等待与汉军的交锋。这意味着，“湖谷”将成为西路汉军与匈奴单于本部交锋的战场。

事实上，汉军即将面对的，并不仅仅是来自色楞格河流域的单于本部。以湖谷的地缘位置来说，正好是处于匈奴右翼与本部交汇的枢纽位置。而即使只是出于集结重兵以御汉军的角度，匈奴人也不会让右贤王领地内的部落置身事外的。当然，在经受河南、漠南、河西之战的连续打击之后，匈奴右翼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了。

既然湖谷将要成为汉匈漠北之战的决战战场，那么我们也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地理结构了。之前我们也说了，整个湖谷整体虽然呈戈壁地貌，但杭爱山还是为之提供了六条河流。很明显，整个湖谷中最有生机的地方，应该就是这几条河流和它们的终端湖之侧了。而无论是匈奴人还是汉军，要想穿越这一望无际的荒凉地带，都势必会选择沿这几条河谷前行。也就是说，汉匈两军交锋的战场应该就在这六条河谷当中。那么哪一条河谷，最有可能成为双方遭遇之地呢？

说起来，“湖谷”这个名字，总是不由自主的让人联想到湖光山色，深谷幽兰的美景。然而我们前面也说了，这里其实是被大片平坦的戈壁所覆盖。在近代西方探险的记录中，他们更愿意形象的将之称为“荒凉沙湾”。不管这一地理单元用什么标签，那几条河流无疑都是人类在此生存、交通的希望所在。要想知道卫青会选择哪条河流，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下，与杭爱山相对应的这段戈壁阿尔泰山的位置和结构了。因为北上时，将会有几个路口帮助他们进入这片湖泊与戈壁共存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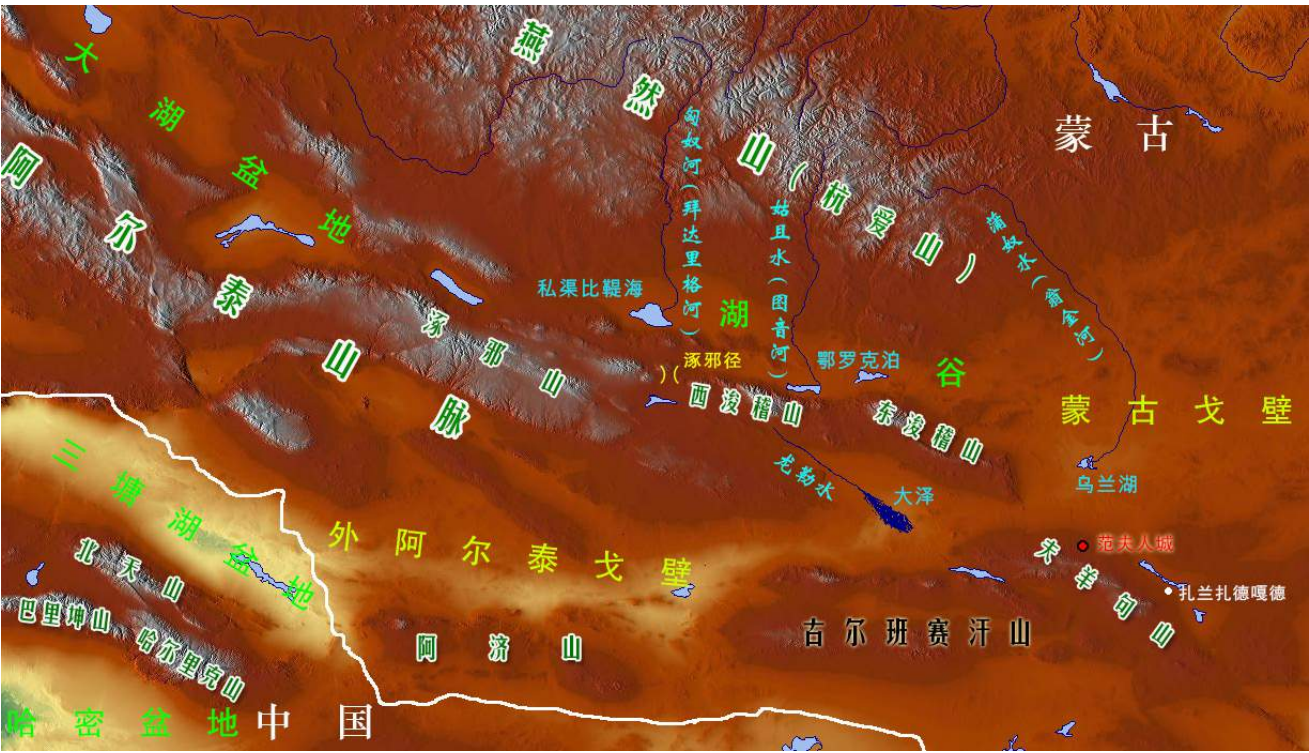
在向北穿越古尔班赛汗山之后，卫青所率领的西路汉军，将到达戈壁阿尔泰山最北部的山体。从高度和与阿尔泰山主脉的地理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段东西向的山体，是戈壁阿尔泰山的主脉。而这段山体在汉匈战争中相当有名，它就是“浚稽山”。“湖谷”大致就是浚稽山与燕然山（杭爱山）之间的这片低地了。就地理结构来看，戈壁阿尔泰山的断块状结构在浚稽山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所谓“浚稽山”又可以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即：东浚稽山与西浚稽山。

依照一般的地缘规律来看，两山之间的峡谷总是很容易成就天然道路的。浚稽山也不例外，在后来的汉匈战争中，东、西浚稽山之间曾经多次为汉军所穿行。如果山口之北恰好能对接一条自杭爱山麓南下的河流的话，那么这条河谷无疑将会有



很重要的军事、交通价值了。北出浚稽山中的汉军，很快就能在他们的西侧看到一片芦苇丛生的湖沼之地。在清帝国又一次代表中央之国站上这片土地时，这个终端湖被标注为“鄂罗克泊”，为之蓄水的河流而则被称之为“推河”。推河现在的译名是“图音河”，在汉史中，它的名字是“姑且水”。

仅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姑且水成为此时单于主力阻击卫青部的选择，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二十九年之后，汉武帝派他的另一个外戚——李广利领军远征漠北时。当时的匈奴君长单于就曾经同样将人口、辎重撤至色楞格河流域，以主力陈于燕然山南，姑且水畔等待与汉军决战。然而姑且水并非唯一能够纵穿湖谷，抵达浚稽山麓的河流。最起码还有两条河流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具有独特的交通价值。以浚稽山为参照物定位的话，姑且水就相当于对接浚稽山中部山口的河流，那么在浚稽山的两侧如果有河流对接的话，理论上也应该有机会成就天然道路的。



戈壁阿尔泰山地理结构图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汉军沿浚稽山麓继续向西，行至浚稽山与阿尔泰山主脉之间时，他们将会看到湖谷当中最大的一个湖泊——邦察干湖（清称“察汉泊”）。这个湖泊在西汉并没有出现在战争史中，但在东汉时期，却以“私渠比鞬海”之名出现在灭北匈奴之战中。与之相对应的河流，则是发源于杭爱山中部的“拜达里格河”（汉称“匈奴河”）。

与浚稽山东、西相对的这段阿尔泰山脉东部山体，在汉匈战争中被称之为“涿邪山”，两山之间的山口则被叫作“涿邪径”。也就是说，如果卫青部是从涿邪径

进入湖谷的话，他们将沿着匈奴河水北上至燕然山“最厚”的中部，然后再寻路进入色楞格河流域。

尽管匈奴河后来也曾经多次出现在汉匈战场上，但以卫青部此次出征的目标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如此深入湖谷腹地，沿姑且水北上，更合乎他最终与霍去病部会师于色楞格河流域的目标。不过，姑且水就一定是卫青最好的选择吗？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沿夫羊句山北上的汉军，并不需要进入浚稽山区，就有机会在他们的北方找到一条能够把他们带到燕然山东的河流。而这条叫作翁金河的河流，才是最有可能成为卫青与匈奴单于决战的战场。

以地理结构来看，翁金河相当于发源于杭爱山东，向东弯一个弧线之后，流向浚稽山东。不过，毕竟离蒙古戈壁太近了，翁金河水并没有真的流到浚稽山麓，而是在离之还有数十公里处，蓄成了一个终端湖——乌兰湖。在后来的许多草原帝国中，翁金河都是一条进入色楞格河流域的快速通道。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作为湖谷最东侧的一条地表河流，翁金河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形如“瀚海”的蒙古中央戈壁了。想借山、水之势通行的话，翁金河——古尔班赛汗山一线，将是绕开戈壁腹地的首选。

不过翁金河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水量并不是很稳定。在秋冬枯水季节时，并没有足够的水量流到乌兰湖。这其实也是很多荒漠河流的普遍状态了，尤其像翁金河这样正对戈壁，又在戈壁地带穿行距离最长的河流（相比湖谷中其他河流）。然而对于卫青部来说，他们在穿越夫羊句山之后，却可以很快转进到乌兰湖，并随后沿翁金河上溯到杭爱山东。因为汉军这次所选择的季节，正是河水暴涨的五月。

沿翁金河北上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绕开杭爱山，直接切入到杭爱山北麓，进入色楞格河流域。接下来，汉军亦不用继续北上深入色楞格河流域中下游（甚至到贝加尔湖）。因为无论是在匈奴时代，还是后来的其他草原帝国，作为蒙古草原腹地的“色楞格河流域”，其地缘中心都是在流域的南端，即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伸向肯特山与杭爱山南端的这条河流，是色楞格河流域的中心干流——鄂尔浑河。

### 第三节 匈奴在漠北政治中心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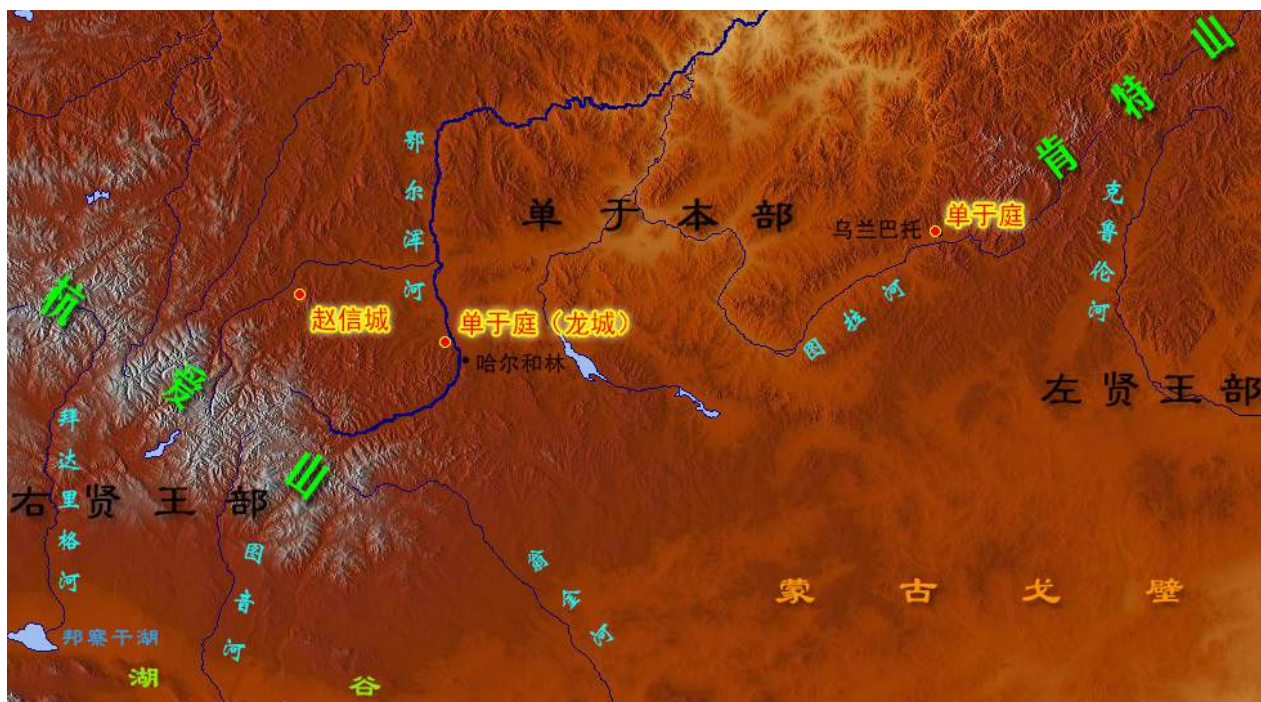
与绝大多数河流一样，鄂尔浑河的上游同样又如伞状一样，向东、西两侧开枝散叶。其西部源头指向的就是杭爱山东北麓，东部源头则指向肯特山的西南麓。也就是说，整个蒙古高原的地缘中心地带，实际上就是由三个地理单元：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北麓）、肯特山（西南麓）所组合而成的。

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鄂尔浑河上游，作为地缘中心并不难理解。一则这一区域正是蒙古高原的地理中心，易于向四周辐射；另一方面鄂尔浑河流域之南，就是蒙古戈壁。即使漠南草原为敌对势力所占，将政治中心设于此也有足够的天然屏障保护；最后一个原则就是纬度了。在水资源不再成为瓶颈，海拔又相近的时候，纬



度越低，年平均气温就越高，牲畜所能食用鲜草的时间也就越长。仅仅是出于资源分配的原因，匈奴人也会把单于驻牧的区域，放置在色楞格河流域最南端，而把苏武这种接受惩罚的敌国使者，送到色楞格河的终端湖——贝加尔湖之畔去放羊了。

不过具体到统领整个草原的雄主，到底是选择依附肯特山还是杭爱山，倒一直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如果看近现代的地缘结构，肯特山及由此发源的鄂尔浑河上游河流——图拉河（土拉河）无疑是成为了最终选择。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是在肯特山脚下，图拉河北岸。然而建立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蒙古人，却曾经把帝国的政治中心放在了杭爱山麓的鄂尔浑河（主源）河谷中。这座曾经统领欧亚草原的都城，叫作“哈拉和林”（今称哈尔和林）。



匈奴单于庭位置图

由于匈奴人所属的时代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通过后来那些草原国家的地缘选择来定位匈奴人的踪迹，一直是我们在运用的方法。以地缘理论来说，只要一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发生质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族群，在同一地区总是会作出类似选择的。尤其是这一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并没有出现断层的时候。

蒙古帝国和今天蒙古国的选择（哈拉和林、乌兰巴托）可以成为我们定位匈奴单于庭的两个选择。让历史研究者举棋不定的是，这两个点（也包括其周边地区）到底哪个是匈奴帝国真正的政治中心。其实倒不必纠结于此，因为以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而言，他们本来就不会固定居住于一点。既然两个点的地理环境相似，将肯特山麓与杭爱山麓同时作为匈奴单于本部的牧地，并根据情况需要变化单于庭的位置，也无不可。

实际上，汉军在准备漠北之战时，所接收到的错乱信息也指向了这一情况。依最初的情报，或者惯例来说，五月之时的匈奴单于应该停留于杭爱山东南麓的鄂尔浑河谷了。而通过俘虏所得到的信息，却是单于已经转向肯特山麓了。当然，前面我们也说了，其实单于主力仍然留在杭爱山一线，等待迎战汉军。



漠北草原（蒙古国）



鄂尔浑河



图拉河

由于地理环境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蒙古高原游牧政权选择政治中心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地缘因素。我们很容易发现，鄂尔浑河上游河谷直接对接的是高原右翼的大湖盆地；而图拉河谷则与肯特山东的高原左翼地区相邻。也就是说，如果匈奴人此时觉得有必要多关注一下左翼，那么单于就有可能在图拉河谷停留的时间长些；反之，要是右翼成为了重点（或者出现了变数），那么鄂尔浑河谷就更容易成为单于庭的所在。参考《汉·漠北之战攻击路线图（卫青部）》我们会发现，如果卫青部借由翁金河绕到杭爱山北麓的话，他们很快就能转进到鄂尔浑河谷，并攻击单于本部的牧地了。即使单于本人此时



已在肯特山麓，此行也足以对匈奴人造成重大打击。假使霍去病部此时亦翻越肯特山攻入图拉河的话，双方就将形成东西合围之势，扫荡整个鄂尔浑河流域上游。

上述会师鄂尔浑河上游流域的方案，应该也就是漠北之战两路出击战术的既定方向。从匈奴人那里得到的假情报，只是让汉军将东、西两路军的攻击方向对调了一下罢了。问题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已经沦为二等兵团的卫青部，却阴差阳错的碰上了单于主力。集合了中、右两区精兵的匈奴主力，布阵于翁金河畔并不用花太长时间。他们甚至可以等到汉军开始由夫羊句山出发，向翁金河谷进发时再行集结。

至于预设的战场，应该不会太靠近杭爱山麓。毕竟以逸待劳的将汉军堵在戈壁边缘，是最有利于匈奴方面的。基于这点，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汉、匈两军交战的战场，是在今天蒙古国南戈壁省与中戈壁省接壤处一带的翁金河畔。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很快找到上述两个行政区的位置，并在两省西部接壤处，观察到翁金河谷的痕迹。以翁金河的轨迹来看，就是东南方向流向戈壁深处的翁金河即将西南转向浚稽山东的时候。也就是说，汉军在沿翁金河谷刚刚转向，准备向杭爱山方向进发时遭遇了匈奴主力。

#### 第四节 汉军与匈奴决战于翁金河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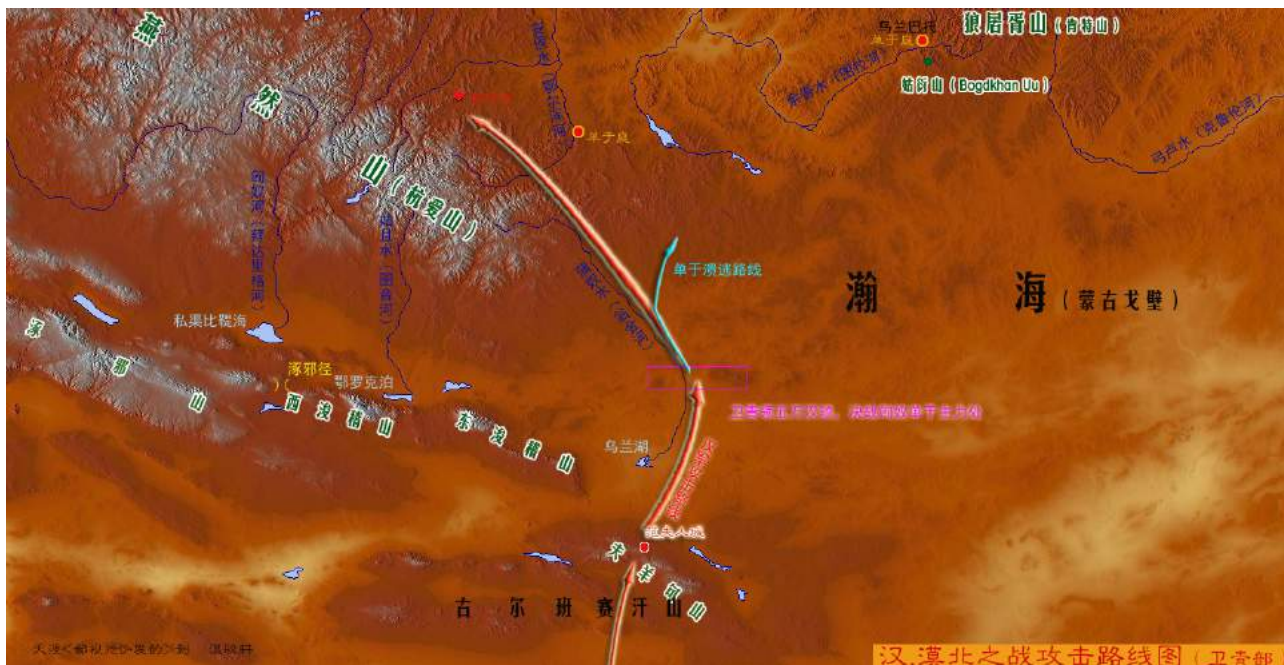
应该说，就战术而言，匈奴诱敌深入，将战场预设于戈壁北部的想法是没有错误的。他们所没预料到的，就是汉军拥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和补给能力。前面我们也说了，卫青与霍去病所率的两路大军都各自有五万精骑，而为这些一线部队转运补给的，又是数倍于他们的步兵。战略准备充分，加上步步为营的延伸补给线，使得匈奴主力所等到的并非是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

让匈奴人选择的话，他们宁愿迎击卫青。毕竟霍去病那种无视后路，直取对方中枢的战法，着实让人胆寒。然而遵循传统战法的卫青部，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即使在草原上，汉军依旧有办法发挥他们在防御技术上的优势。从技术上看，这就是“车”的使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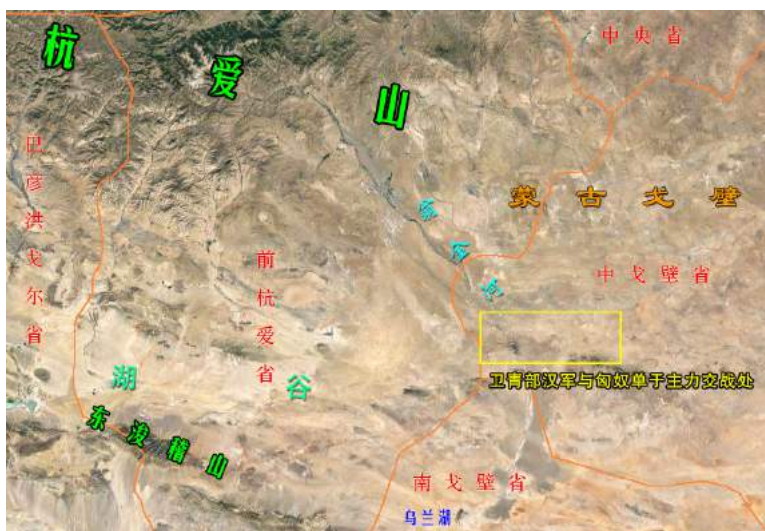
战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前，曾经是中央之国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能够集结多少辆战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参数。不过，在中央之国决定向游牧民族学习骑射技术后，战车就基本不再被当成一项攻击性武器使用了。然而这并不代表“车”会被彻底边缘化，它只是会以另一种方法，帮助使用者取得最终的胜利罢了。

对于试图远距离攻击漠北草原的汉军来说，无疑会带有大量载有粮草、军械等辎重的战车，这些战车被称之为“武刚车”。尽管我们刚才也说了，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技术已经终结了攻击性战车时代，但这些载重工具却是汉军在旷野中对抗游牧骑兵的依托。具体到卫青此次所使用的战术，就是将这些“武刚车”环列于军营外围，

以这些车辆所携带的弓、弩等远程性武器，在匈奴人进入自己的有效射程之内后，抢先进行第一轮攻击（由于借助了机械力的原因，最起码汉弩在射程上会超过匈奴人）。即使有匈奴骑兵能够突破汉军的箭雨冲至阵前，这圈由战车环列而成的防御工事，也能够帮助汉军在短兵相接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汉·漠北之战攻击路线（卫青部）



卫青部汉军与匈奴交战处

的方法，能够让汉军有效的抵御匈奴骑兵的攻击，但你永远不可能只靠防御来取得最终的胜利。如果汉军没有主动进攻的能力，那么即使匈奴人知难而退，不发起攻击。对于匈奴人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反观汉朝方面，却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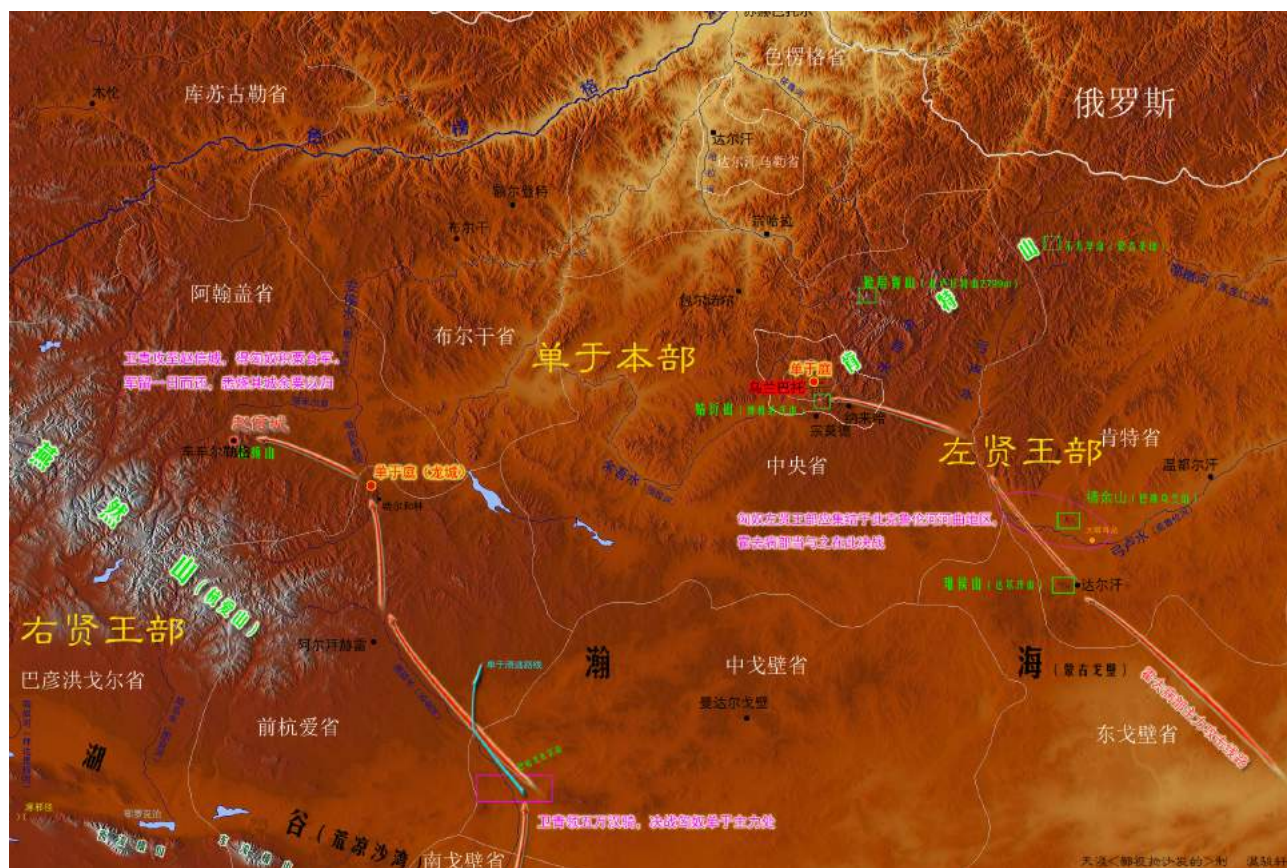
对于已经在草原之上屡屡战胜对手的汉军来说，他们当然不会只把希望寄托在

卫青在漠北之战中所运用的这一“以静制动”的战术，后来也成为了汉军远征匈奴时的标准战法。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携带足够的补给，以支撑到匈奴人主动放弃攻击行动。很显然，列阵于翁金河畔的匈奴人，已经看出了汉军此次远征的准备相当充分。他们并没有信心突破汉军的军阵。然而任何战术都会有它的不足之处。即使步步为营



防御上了。此时的汉军无论在马匹还是骑兵的数量上，都已经能够和游牧骑兵决战于草原了。在布阵之后，卫青派出了最精锐的五千骑兵正面迎击匈奴主力，而匈奴方面亦派出万骑迎战。

单从先锋部队的数量来说，汉军并不占优。不过有了强大军阵作后盾的汉军，并不会真的指望这五千骑兵能够在与匈奴人的对决中取胜。他们的作用，更多应该是在接战之后，将匈奴人引入军阵的有效射程内。然而荒漠地带所特有的恶劣气候，却并没有让汉军有机会诱敌深入。出击的汉军，碰上了一场骤然而起的沙尘暴。



汉·漠北之战示意图

虽然匈奴人自恃更适应戈壁地带的恶劣环境，但沙尘暴也并不会特别帮到他们。双方准备迎敌的骑兵完全无法看到对手，更别说准备接战了。于匈奴方面来说，他们此时所想的，应该是等沙尘暴过后再行进攻。不过这一突发状况却被汉军所利用，借着沙尘暴的掩护，卫青将剩余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向匈奴主力的左右两翼包抄了过去。等到匈奴人能够看清对手时，汉军已经初步对匈奴人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在没有山为依托的野战当中，并非所有的包围圈或者半包围圈，都能让进攻者占得先机。如果你的兵力、战力不够的话，这种做法只能让对手更容易突破你的阵线。不过这一次卫青的优势十分明显，以至于匈奴单于在双方接战之前，就慑于汉军人数与质量，提前带着数百轻骑卫队沿翁金河向西北方向出逃了。

匈奴最高领导人的出逃，实际已经意味着匈奴人没有了胜机。只不过凭借游牧骑兵的个人能力，以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后来的混战当中，汉匈双方的人员损失大体相当。最终的统计结果是，西路军在整个漠北之战中，共斩获了一万九千多人。从数字来看，这显然还不能算是给予对手以致命打击。其实这也是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骑兵决战中的无奈了。在对手拥有强大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并且不会有死战到底的想法），胜利往往只是代表你击溃了对手（而不是全歼对手）。也正因为如此，斩首（俘虏）的数量才成为了衡量战果的硬指标。

由于汉军在与匈奴主力决战时的损失相当，在以斩获论英雄的汉帝国，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为西路军整体带来战功。能够让卫青有机会大胜而归的机会，就是提升此役的质量。说得简单点，就是俘获匈奴单于。在第一次河西之战中，人员损失大体与对手相当的霍去病部，就是凭借斩首、俘获大量匈奴贵族的战果证明了自己。

## 第五节 汉军在漠北烧毁赵信城后撤军

事实证明，匈奴单于临阵逃脱的做法是正确的，最起码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在混战中得知单于已经逃遁的汉军，尽管连夜派出轻骑兵追击（卫青主力紧随其后），却还是在追出二百里之后，失去了匈奴单于的踪迹。

逼迫汉军放弃“斩首行动”的直接原因，就是目标并没有一直沿翁金河一路向西，而是在西逃一段路程之后，转向东北方向穿越戈壁地带，向图拉河方向逃窜。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图拉河（汉称“余吾水”）也是单于本部的核心之地，或者说单于设庭帐之所。而实际情况是，单于应该也没有在图拉河谷停留。因为那样的话，他很快就会遇上匈奴人最不想碰到的霍去病了。

不管单于最终逃往何方，继续追击他已经没有什么胜算了。对于熟悉地形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自然能够找到路径穿越戈壁，进入色楞格河流域。而对于初来乍到的汉军来说，这样的做法就有些太过冒险了。当然，追击与否也与领军将领的性格有关。如果换作是霍去病，单于也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里并不是说卫青的想法不对，而是说在机会面前，每一种选择都会有它的机会成本。对错的判定，往往只能凭借结果来做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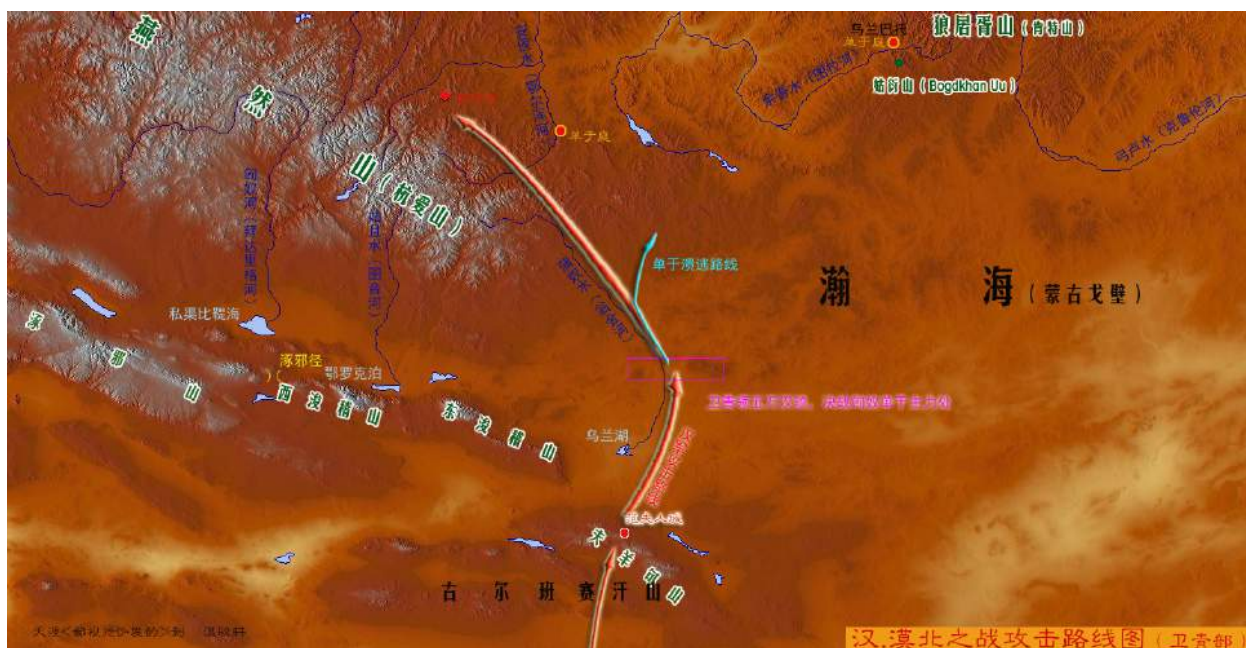
在“斩首”单于的想法已经不大可能实现时，卫青所率领的西路军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引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了。单于设王庭所在的鄂尔浑河谷，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好的攻击目标。问题是，匈奴人的主力已经在此战中四散溃逃，而辎重也被坚壁清野起来了。也就是说，汉军即使进入到鄂尔浑河谷的话，也不可能有太大收获了。

当汉军很难再寻找到匈奴主力决战时，俘获匈奴人的辎重成为了现实的目标。正常情况下，游牧为生的匈奴人并没有集中储备粮草的习惯，这也使得他们抵抗灾



害的能力要远逊于农耕民族。不过此次为单于制定战略计划的那位降将“赵信”，却帮助匈奴人完成了一次物资储备工作。很显然，这位原来的匈奴“小王”（部落首领），曾经的汉将，又是现在单于最信任的助手，已然将农耕民族的防御理念也带入了漠北。他甚至在单于庭之西的一条山谷中，筑了一座城来储备匈奴人所收集来的粮草。

赵信依山而筑的这座城，史称“赵信城”，所依之山则被称之为“寘颜山”。以地理结构而言，赵信城的位置离单于庭所在的鄂尔浑河上游河谷之间的距离，约在130公里左右。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主要是因为它的位置更加深入杭爱山腹地（今蒙古“车车尔勒格”一带）。当你所做的准备是以防御为目的地时，总是越往腹地收缩，就越会感觉安全。



汉·漠北之战攻击路线图（卫青部）

当汉军明显逆转形势成为攻击方后，匈奴人也曾经为是否要向对手学习，筑城以自守展开了争论（结果还是放弃了）。不过从赵信此次尝试的结果来看，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汉军在从翁金河谷向北，转入到鄂尔浑河谷之后，虽然并没有在单于之前驻牧的地方得到太大收获，却也就此获知了赵信城的位置所在，接下来他们只需沿杭爱山北麓向西移动300里（汉里），就可以得到匈奴人所储备的粮草了。

并没有记录表明，汉军在攻取赵信城时迎来了一场新的战斗。事实上，让没有筑城以自守传统的匈奴人在匆忙中筑起一座城，在质量上本身就不是一件很靠谱的事。更为致命的原因，是匈奴人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守城，在前方主力已经溃逃的情况下，赵信城的守军很可能在汉军主力到达之前，就已经作鸟兽散了。

赵信城也成为了卫青所率领的西路汉军在此战的终点。从战略上来看，进入到

杭爱山分水线之北，也算完成了攻入漠北草原的战略意图。然而在就地取食，休整一天之后，卫青并没有继续向漠北草原纵深继续扫荡，而是在烧毁了剩余的粮草后就班师回朝了。

鉴于这次出击，是汉军第一次穿越戈壁地带站上漠北草原的土地上，卫青不愿意在敌境停留太久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此时汉军的补给线已经长达千里，如果以大湖盆地为基地的匈奴右翼部落组织力量包抄的话，汉军所面临的风险就很大了。事实上，由于单于的不知所踪（很可能还有与之协同作战的右贤王），此时匈奴右翼地位仅次于右贤王的“右谷蠡王”已经自立为单于了。

如果这位新单于希望以战立威的话，并不会让人意外。不过后来这位自行上位者并没有机会这样做，一方面汉军很快就回师了；另一方面单于本人很快又找到了自己的部众（新单于只能自去封号了）。在无法再与对手决战，又深入敌境的时候，选择见好就收，并不算错。然而这种保守做法，也让卫青在后来的汉军体系中被边缘化了。因为与之同时出击的霍去病，却凭借他特有的不要命打法，取得了空前的战果。

## 第六节 李广在漠北之战的悲剧结局

漠北之战之后，从贝加尔湖到瀚海的广袤土地上，最耀眼的将星就是刚刚 20 岁出头的霍去病了。然而有人得意，就会有人失意。失去了军权（甚至大部分追随者都转投入霍去病门下了）的卫青，虽然成为了这位冠军侯的反衬，却不是最失意的。

3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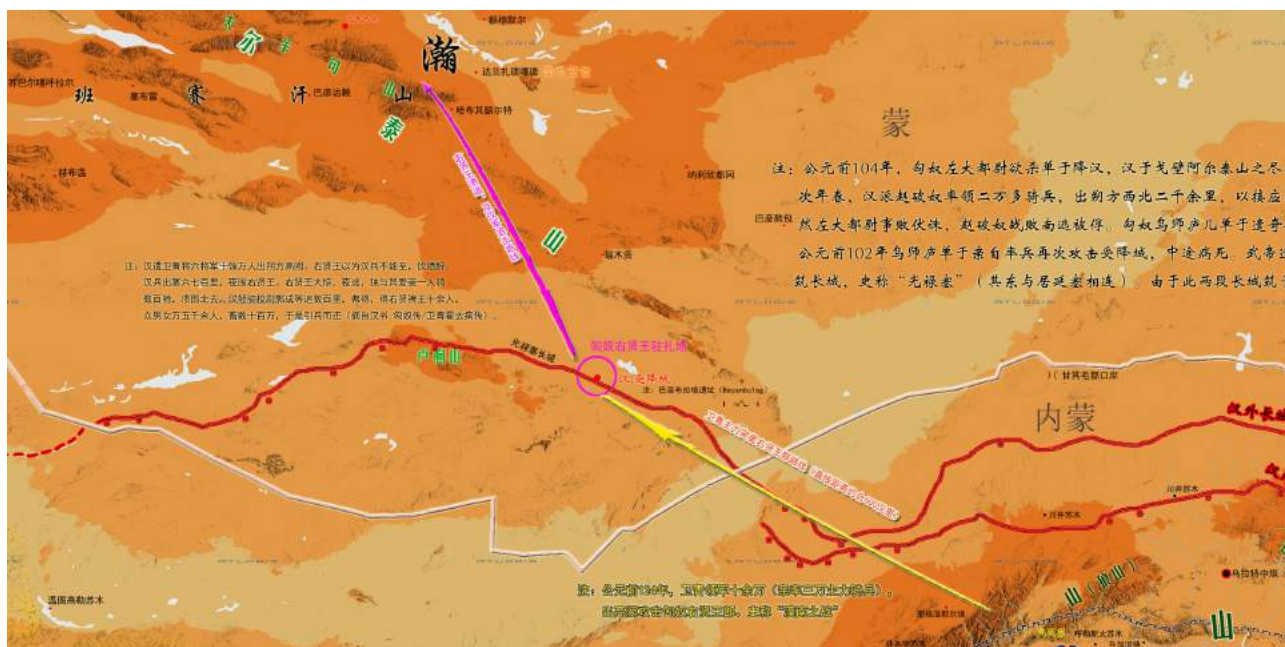
因为汉军中的另一位将星——李广，在此战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霍去病相比，李广在年龄、战果、仕途，甚至运气方面，完全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在帝国决定发起规模空前的漠北之战时，李广已经年过六十了。实际上，这也是他能抓住的最后的机会了。至于到底是什么机会，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封侯”。

在那些能力不能与自己相比，名气也没自己大的人都凭借“好运气”，获得足以封侯的斩获时，李广试图证明自己的心情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当然，这个年龄段的将领是完全不会被年少气盛的少年将军霍去病所看中的，所以李广建功立业的希望，只能在卫青的西路军。

当李广向汉武帝提出，充当西路军的先锋（前将军）时，坏运气又一次影响了他。对于笃信运势的古人来说，此时的霍去病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名福将。至于李广，没有人认为好运真的降临在他的头上。因此汉武帝表面答应了李广的要求，暗中却嘱咐卫青，不可让他真的去冲锋陷阵。为此，当西路军主力开始沿戈壁阿尔泰山向漠北草原进发时，身为“前将军”的李广，却被安排从戈壁的腹地出发（东道），西北方向与卫青部会合。



这种安排在战术上并没有太大意义。虽然戈壁腹地也可能有匈奴游牧部落存在，但即使匈奴人不向漠北草原方向坚壁清野，这些戈壁部落的人口也是很少的。在茫茫戈壁中找到他们，并歼灭他们的机会更小。所以这种安排，显而易见是希望将李广排除在主力部队之外，使之后于主力部队与匈奴人接战。换句话说，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卫青，都没有把李广和他的部队视作获胜的筹码。



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对于这种安排，李广自然是非常不满的。在抗争无果后，他甚至没有向统帅卫青告辞就出发了。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是心中有怨气；另一方面，也是想争取时间，抢在卫青部之前遇到匈奴主力。

从西路军的整体攻击路线来看，李广部跨越今天中蒙边境，进入戈壁腹地的位置，应该是今天蒙古南戈壁省境内的古尔班赛汗山之东。在没有山地、河流、遗址的戈壁腹地，准确还原出李广的出征路线是有些困难的。好在今天中蒙两国在此区域的通商线，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参考。在高阙塞北的中蒙边境上，中蒙两国开通了公路相接的“甘其毛都口岸”，并有公路向西北连接夫勾羊山之东的“达兰扎德嘎德”（南戈壁省省会）。相信在西路军的计划中，李广大体也是应该沿此线路前行，并最终与主力会师于范夫人城这个点上的。

然而李广最终并没有按照计划与卫青部会合，更没有如他心中所想的那样，抢先接战匈奴，原因是他“失道”了。说起来，被安排这样一条绕远，并且身处戈壁腹地、缺草少水的“东道”（并且汉军没有走过），如果能正确抵达倒是奇迹了。无法穿越戈壁的李广，应该是不得不沿阴北草原边缘向西移动，试图回归到主力的出击路线上。以至于卫青率部班师回朝时，才在阴北草原的边缘碰到李广和他所率

领的部队。

按照汉朝的律法，没有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就是死罪了。不过，我们之前也说过，为了给将领人补救的机会，此罪是能够以钱赎之的。而在下一次战役中，这些将领也会得到机会将功折罪（如河西之战中失道获罪的公孙敖，此次就被卫青点名带在身边了）。然而未能把握住最后机会的李广，已经知道了，无论是老天还是皇帝都不会再给他领军的机会了。于是这位让无数人感叹他时运不济的飞将军，选择了自行了断，以避免受到侮辱。

一定程度上说，李广以如此悲壮的方式了结自己，是汉武帝和卫青未能给他机会造成的。如果李广此次能做先锋的话，为了证明自己，他应该会有上佳表现的。即使没有霍去病的运气，最底限度也能死在战场上了。虽然历史和皇帝陛下并没有给李广这种机会，但在多年之后，一心希望替李氏家族正名的李陵，倒终于为自己争取来了与匈奴主力对决的机会。只不过，这次李家正名之战，最终却以更为悲壮的结果收场。

其实作为汉军历史中最为著名的军事家族，李家也并非无人在漠北之战中获益。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跟随霍去病出征的李敢（李广幼子，李陵叔父），就在东线战场上维护了家族的荣誉，斩首甚多，并夺左贤王鼓旗，战后亦受封关内侯。然而认为父亲是因卫青之故而自杀身亡的他，后来同样未能善终。在试图为父报仇，击伤卫青后不久（卫青大度，未计较），李敢被他的上司——霍去病借狩猎之机射杀了。

上述这些情节，如果放在影视剧里，应当是很好的素材了。当然，依现在那些狗血编剧的做法，是一定要再虚拟出一个游走于几个男人中，能决定历史的女主角的（还得是投资人亲点的演员出演）。好在这些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能够吸引大家留在这的还是那些接“地”气的东西。



## 第三十四章 霍去病在漠北之战击败匈奴

### 第一节 狼居胥山和姑衍山的地理位置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视线转向东线，从地缘角度来解读东路军的行动了。这一次我们把顺序倒过来，先了解一下霍去病此行的攻击目标到底是哪里。事实上，这应该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在后来的历史中，比肩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山”，几乎成为了后世中原王朝将领们与游牧民族作战中的最高追求了。

很显然，霍去病所“封”的狼居胥山，应该就在匈奴地缘中心附近，并且与东路军的决战战场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从大的方位来看，能够符合要求的就只有地理、地缘位置与杭爱山相对应的“肯特山”了。问题在于，所谓的肯特山并不是单纯的指向一座山峰，而是一条东北与外兴安岭相连的山脉，一条西南——东北向分割蒙古高原中、东部的分水岭。霍去病到底在哪里祭天的，不仅关乎匈奴地缘中心位置的问题，亦关乎战场定位的问题。

依照我们在前面的定位，肯特山脉西南麓的图拉河谷，也就是今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带，应该就是匈奴单于设庭的选项之一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杭爱山东南麓的鄂尔浑河上游河谷。由于蒙古帝国在此河谷所立之都叫做“哈拉和林”（今称“哈尔和林”），这支鄂尔浑河正源，后来也被命名为“哈拉和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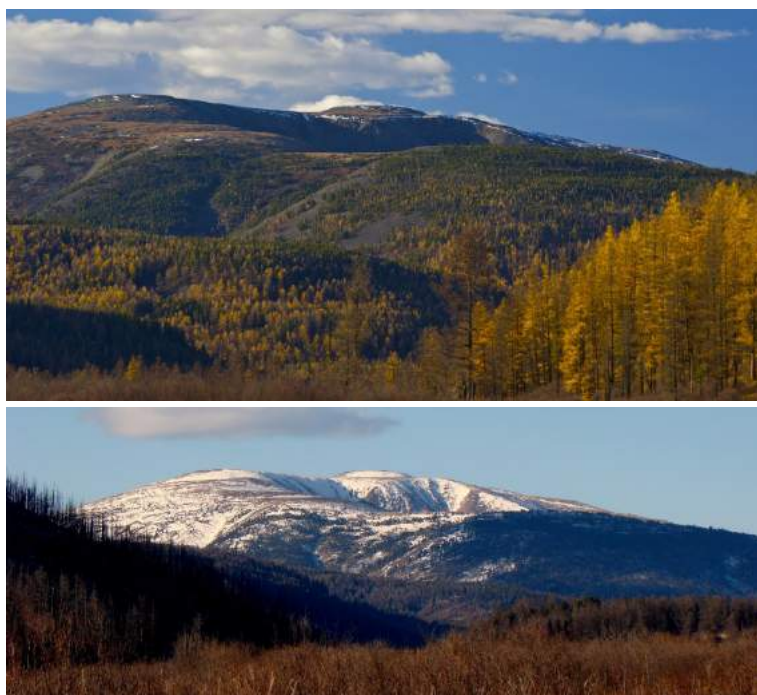
在哈拉和林河谷与图拉河谷中转换庭帐所在，也是单于需要兼顾左、右两翼的结果。鉴于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性，根据季节的不同，选择具有地缘价值的草原进行二到四次的转换，也是历代游牧政权的标准做法。以汉军最初的判断来说，春季的单于庭本来应该设于哈拉和林河谷的，而这里也是匈奴人最重要的祭天场所（五月祭天），也就是所谓的“龙城”。然而错误情报，却将霍去病引向了肯特山下的图拉河谷。这也使得负责左翼安全的匈奴左贤王部，成为了漠北之战中最倒霉的人。

虽然与东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匈奴左贤王的部众，但因为霍去病此战的目标是匈奴单于，如果不最终站上单于本部的牧场，并在匈奴圣山上祭天的话，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也就是说，要寻找“狼居胥山”的所在，并不应当在肯特山脉分水线之东，而应该是在分水线之西。指出这点，是因为在定位狼居胥山的研究中，大多数文字都只是模糊的将“狼居胥山”与“肯特山”划等号。而在很多时候，蒙古人心中最神圣的“圣山”——不儿罕山，又几乎可以替换“肯特山”这个地标。因此也认为不儿罕山也就成为了霍去病的封禅之地了。

今天去蒙古旅游的人们，几乎不可能亲自登临不儿罕山，去凭吊想象中霍去病的祭天场景。因为作为蒙古圣山，不儿罕山已经成为禁地了。然而如果你只是想去狼居胥山思古的话，还是有机会做到的。因为蒙古人的圣山并不是匈奴人的圣山，

也不是霍去病选择的祭天之所。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儿罕山位于肯特山分水线的东侧，准确的说，是在肯特山东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鄂嫩河（黑龙江源头，蒙古人称斡难河）与克鲁伦河的源头之间。由于蒙古部落（乞颜部）发源于高原东部，其后再向中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克烈部），西部的大湖盆地区（乃蛮部）扩张。因此蒙古人会选择自己祖地大河所指向的最高山峰“不儿罕山”，作为部落的圣山。



不儿罕山（蒙古圣山）

由于蒙古人生活的区域与当年东胡最初占据的区域重叠，因此在中国历史中，蒙古部落也被认定为是东胡后裔。先且不论二者之间是否真的有直接的血缘继承关系，但从地缘规律来看，东胡人曾经将不儿罕山作为自己圣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崛起于色楞格河南部，向东征服了东胡的匈奴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地缘中心东移，也没有理由把圣山的位置移到肯特山的东北部。当然，由于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广泛，他们所认定的圣山也会有多处。比如今天的杭爱山（于都斤山）

也会受到祭祀。我们所讨论的，主要是第一圣山，或者说部族最初的起源地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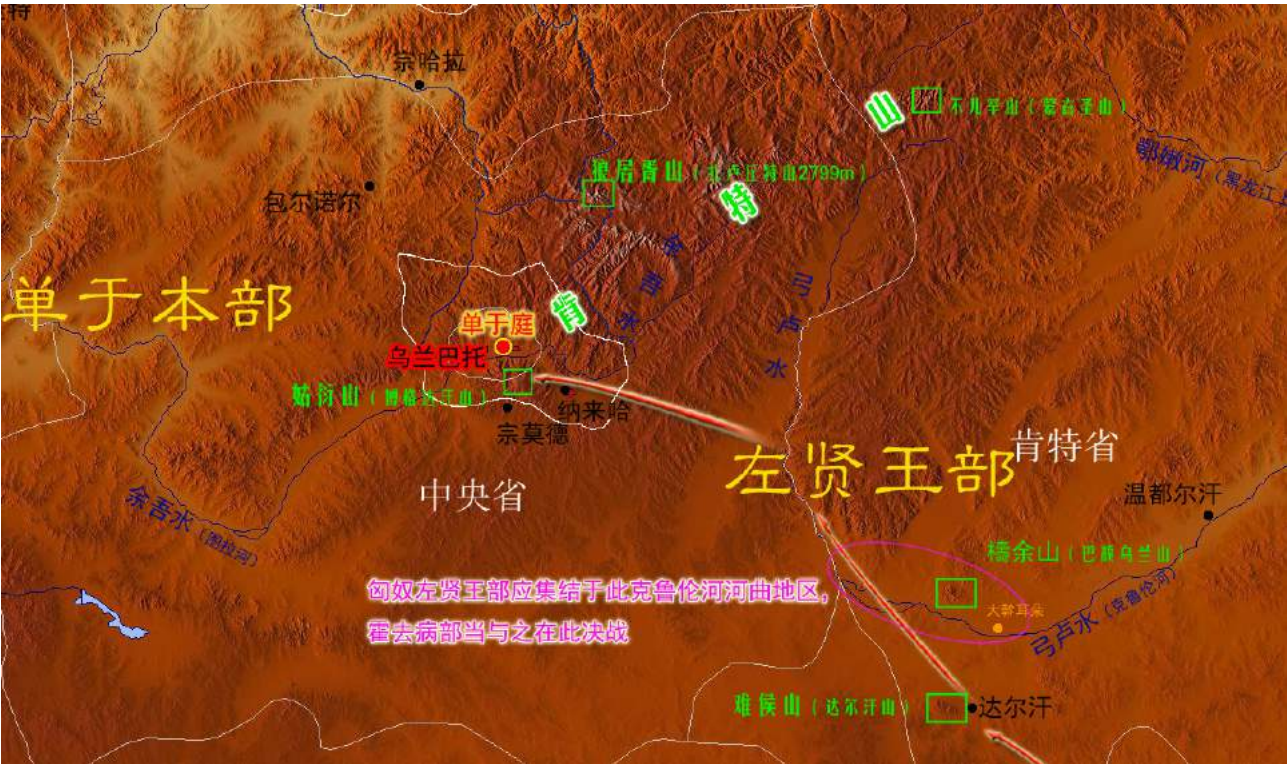
另外，要想成为圣山的话，一般还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足够高；二是能够成为母亲河的源头所在。这两个条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当一座山峰拥有一览众山小的高度时，它就会拥有更好的集水条件，并成为附近大河的重要源流所在。也就是说，如果匈奴人的地缘中心是在乌兰巴托一带的图拉河谷的话，那么图拉河源头最初指向的那座最高山，就很有可能是匈奴人心目中的圣山了。

之所以要花费笔墨定位匈奴圣山，是因为在对手的圣山进行祭祀，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如果霍去病已经攻至匈奴部落的地缘中心，并且旁边就有匈奴圣山存在的话（这几乎是一定的）。无论是为了帝国，还是个人的荣誉，他一定会选择这座山峰作为祭天场所的。事实上，单从“祭天”的角度来说，祭祀者一般也会选择一条山脉中最高的那座山峰，以最大限度的接近上天（比如泰山祭祀的就是最高峰“玉皇顶”）。

好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乌兰巴托附近有没有一座山峰能够源出图拉河，并



且高度在肯特山诸峰中突显出来（最低限度要比周边山高）。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作为整个肯特山脉中的最高点，海拔 2799 米的“扎卢丘特山”，就在乌兰巴托东北直线距离约 80 公里处（交通距离约 130 公里）。从其东坡所流汇集而出的雨水，最终也正是注入了图拉河。结合地缘位置，以及霍去病的攻击方向来看，二千多年前匈奴人的狼居胥山，就是今天的扎卢丘特山了。



汉·漠北之战示意图



扎卢丘特山和不儿罕山位置图

它是克鲁伦河、鄂嫩河两条高原东部河流的连接点。同样的理由，如果扎卢丘特山

如果说从不儿罕山上对望的是大兴安岭，俯瞰的是东胡故地的话，那么从扎卢丘特山上西望的就是杭爱山，面对的则是整个色楞格河流域了。除了被汉帝国称之为“余吾水”的图拉河之外，扎卢丘特山之水，也流入了鄂尔浑河左岸的另外两条支流：哈拉河、依鲁河。今天的蒙古人之所以将不儿罕山视为圣山，很大程度是因为



能够将色楞格河流域东部的河流都串联起来的话，那么加上它的高度，以及与图拉河谷之间的距离，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用来宣泄中国人“到此一游”心结的好去处。

当我们定位清楚狼居胥山的位置后，还有一个被霍去病同时祭祀，名气却没有那么大的山也浮出了水面，它就是“姑衍山”。在中央之国的文化中，“封”字总是和“禅”字相连，被称之为“封禅”。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在做一件事，不过它们其实是两件事，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天、地了。简单点说，“封”所指的是祭天，禅指的是祭地。天、地总是要被一起祭祀的。说起来祭天的地方好像总是更为知名一些，就好像大家都会知道北京有皇家祭天的，那个圆形的“天坛”，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个方形的“地坛”一样（合天圆地方之说）。



博格达汗山位置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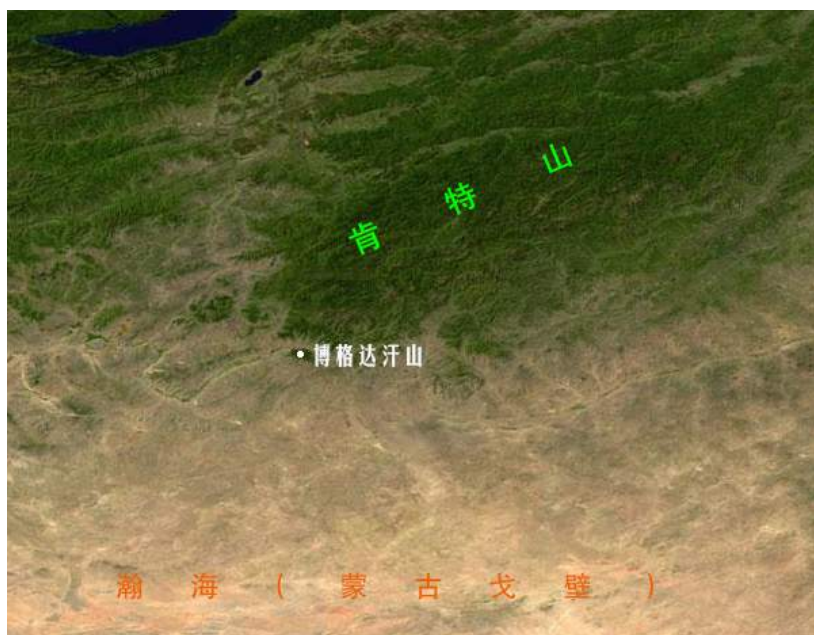


狼居胥山（匈奴人圣山）

次于不儿罕山的圣山。

定位姑衍山对于解读霍去病此战的目的地，也有很重要的帮助。因为在同一地区祭祀天地的地方，并不会太远。与祭天要选择最高的山峰不同，祭地的地方并不需要太高。山脉之前的丘陵即可，为的是更加接地气。环顾图拉河谷的周边，无论从风水还是地缘角度看，最有可能成为霍去病祭地场所的，就是乌兰巴托之南与之隔河相对的博格达汗山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博格达汗山本身就是一个环境分割点。往山的北边看，自图拉河谷而起的漠北草原，以及依附于肯特山的大片树林，会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土地。而当你再把目光转向南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就是茫茫戈壁了。这种青黄相接的景象，无疑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增添博格达汗山的神秘感。在今天蒙古人的心目中，博格达汗山也是地位仅





博格达汗山位置图（二）



博格达汗山

在二千多年前，博格达汗山北连草原，南接戈壁的存在，势必也会吸引攻击至此的汉军的注意。如果霍去病想选择一个既“接地气”，又符合祭地要求的山丘，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今天的我们可以将《汉·漠北之战示意图》中所标示出来的这些地标印在脑海中，将思绪接回到两千年前。想象一下春风得意的霍去病在汉军及归降匈奴人的簇下，登上肯特山脉的最高峰“狼居胥山”祭天，然后再南行至姑衍山祭地，将匈奴人视为天然屏障的大漠戈壁尽收眼底时的心情。

“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是汉武帝在此役之后赐封霍去病的诏书中，对这一地缘大事件所做的记录。说到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瀚海”二字了。由于贝加尔湖在蒙古高原太具

有象征意义了，所以很多人希望霍去病攻击至此，因此瀚海也就被很多人联想为“贝加尔湖”了。但事实上，瀚海所指的是蒙古戈壁。结合我们刚才所做的地缘定位，大家应该也应该清楚了。单从地缘角度看，汉军也没有必要攻击至贝加尔湖的（并且肯特山也不与贝加尔湖相连）。

当霍去病攻击至图拉河谷，并在狼居胥山、姑衍山上举行封禅大典时，漠北之战也相当于画上句号了。当然，让卫青和霍去病在肯特山与杭爱山之间的草原上会师，也许会更具有象征意义。要是卫青不是过于谨慎，在完成了对赵信城的扫荡之后就马上撤军的话，霍去病应当是很愿意在他的舅舅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战果的。不过即使没有完成这样的会师，东、西两路汉军同时攻入单于所设庭的两大河谷（哈拉和林河、图拉河），也足以让匈奴人元气大伤，并视为奇耻大辱了。

### 第三节 霍去病没有从呼伦贝尔草原进军漠北

卫青的攻击线路，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解读清楚了。现在，在标定了霍去病部的攻击终点是在图拉河谷而不是贝加尔湖后，我们需要了解东路军是怎么攻击至此的。事实上与西路军一样，东路军在单于庭的所在地，应该也没有遇到太多敌人，他们的决战地点就是在色楞格河流域之外。

阴差阳错的成为霍去病部攻击对象的，是匈奴左贤王部。当匈奴单于本部集结于燕然山麓，准备与右贤王部的精兵一起阻击卫青时，整个匈奴中东部的安全就全部由左翼部落负责了。那么此时匈奴左翼主力集结在哪一区域，又是在哪与汉军展开决战的呢？在蒙古高原东部河流中，位置最靠南，纬度最低的克鲁伦河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河流的下游，就是有中国最美草原之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战胜东胡，迫使其余部退入大兴安岭之后，负责管理左翼草原的左贤王很有可能会定期驻牧呼伦贝尔一带。一方面让牲畜享受这里丰美的草场，另一方面也防止东胡部落死灰复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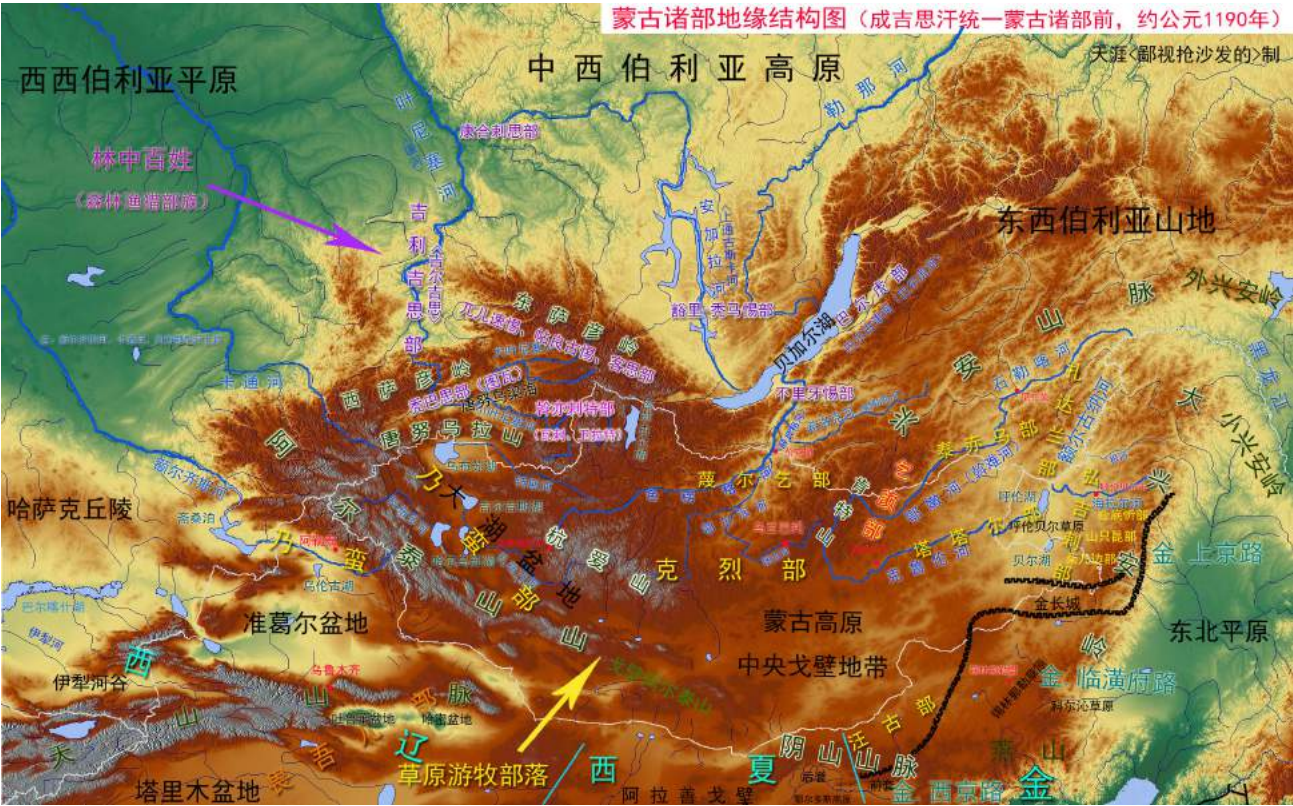
呼伦贝尔草原

假如在漠北之战伊始，霍去病的目标是左贤王部，而左贤王部主力又身处呼伦贝尔的话，那么汉军的攻击线路就应该是出定襄之后，沿燕山——大兴安岭西麓东北方向攻击前进，然后再从呼伦——贝尔湖转向，溯克鲁伦河而上，一路向西扫荡至肯特山麓的图拉河谷。然而，事实上汉军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攻击线路。一方面这条反“C”型的攻击线路路程长达3000公里，难度过大；另一方面，这样折向攻击的话，汉军在大兴安岭与燕山相接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有可能先受到乌桓部阻击了。而作为东胡后裔的乌桓人，并非汉军此战中的目标。

当然，对于霍去病来说，他是绝对不会担心在碰到匈奴主力之前，先要清理一下乌桓人时会有什么问题的。以他在河西之战所树立的口碑来看，估计在汉军到达之时，乌桓人就会抢先一步示好，表明自己在此战中愿作壁上观，礼送汉军前往漠北。真正决定东路军攻击线路的，还是霍去病此战的目标。汉帝国交给霍去病的目标十



分明确，那就是单于本人。为了让他完成这个不世之功，汉武帝甚至根据错误的情报，对调了两支汉军的攻击方向。而匈奴方面不管是不是有意在迷惑对手，在汉军大兵压境之时，即使在这个季节左贤王本应驻牧于呼伦贝尔草原，也绝对会屯兵于肯特山下的。



蒙古诸部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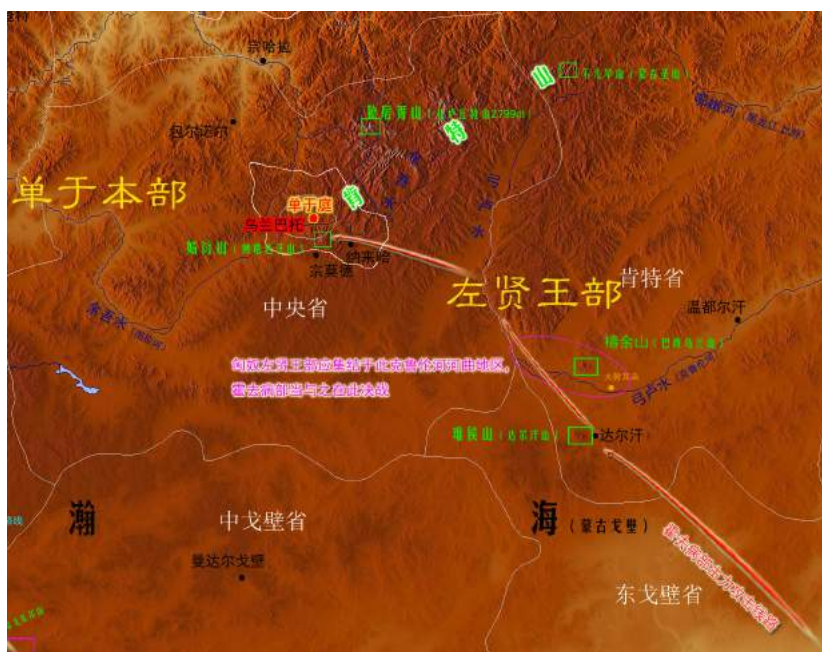
尽管克鲁伦河下游的草原应该更为肥美，但在匈奴左翼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克鲁伦河上游的地位肯定要高于下游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呼伦贝尔地区过于边缘，在蒙古高原游牧体系中，更像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在后来蒙古部落内部整合过程中，游牧于此的弘吉剌部就是一个中立的角色。这个远离地缘政治中心的部落并不是以勇士和战力强悍出名，而是以多美女和智者闻名于草原。凭借这一优势，以及超然的地缘位置，弘吉剌部也成为了事实上的中立部落。每一个蒙古部落的男子都以能娶到弘吉剌部的美女为荣（成吉思汗的父亲，就是在前往弘吉剌部为他提亲之时，在克鲁伦河畔被宿敌塔塔尔人毒死的）。

#### 第四节 匈奴左贤王部驻牧地的位置

如果盘踞在蒙古大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不想成为政治的旁观者的话，那么靠近肯特山的上游河谷就是最为重要的地缘板块了。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黄金家族

所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也就是鄂嫩河、克鲁伦河、图拉河三河的上游河谷，也就是所谓的“三河源”地区。

由于蒙古部落崛起于东部，成吉思汗及其所属的蒙古乞颜部在崛起之前又游牧于鄂嫩河上游，因此这条位置偏北，下游甚至为俄国人所占据的河流在蒙古帝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地位得以提升。然而对于崛起于色楞格河流域南部的匈奴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必要特别重视鄂嫩河。上游河谷与图拉河谷相邻，下游又直接对接大兴安岭中部的克鲁伦河谷，才是匈奴左翼的经营重心。换句话说，如果左贤王既希望保持对东胡余部的威慑（这是他的重要任务），又不希望自己远离草原政治中心的话，他最可能做的就是根据季节、形势的不同，在克鲁伦河上、下游之间转换自己的王庭所在。



汉·漠北之战示意图

好了，现在我们该明白了，当霍去病部以肯特山西南角的图拉河谷为目标攻击前进时，匈奴左翼部落的主力，也正集中于肯特山东南部的“克鲁伦河上游河谷”一带准备随时迎战汉军。而除非霍去病部准备横穿戈壁腹地，直接插入到姑衍山北，否则东路汉军势必会在克鲁伦河上游河谷先与左贤王部接战，然后才能完成封狼居胥山的壮举。在克鲁伦河所流经的地区中，温

都尔汗应该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了。从不尔罕山南流下的雨水，一开始并没有向东流向大兴安岭，而是一路向南穿透肯特山东部山地，前行了差不多 250 公里后，再转而向东流向了温都尔汗。

不过温都尔汗应该并不是霍去病部与左贤王部决战的地方，因为之于图拉河谷这个目的地来说，它的位置有些过于偏东了。另外，最有可能设立左贤王部王庭的地点，也要更靠近肯特山区。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游牧民族选择常驻政治中心所需要考量的地理因素，与喜欢筑城以自守的农耕民族并没有区别。紧邻高大山脉，有河流穿过，并且丘陵环绕的小盆地是他们的首选。

从山形水势来看，克鲁伦河南出肯特山区，开始向东转向的这个河曲地带，应该是克鲁伦河上游的枢纽点。如果左贤王部希望选择一个既靠近图拉河谷，又处山地、





克鲁伦河

草原、戈壁接合的点设立王庭的话，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个克鲁伦河上游河曲地区，也的确因此而成为高原东部，甚至整个高原的地缘政治中心。在铁木真击败中、东部的克烈、乃蛮部统一高原之后，他就是在这个点上建立了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大斡耳朵，并开始以“成吉思汗”自称的（公元 1206

年）。不过，后来随着蒙古帝国版图的扩大，以及稳定中西部的需要，再因为眷恋故土，将政治中心放在克鲁伦河流域就有些保守了。公元 1235 年，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将帝国的政治中心迁往了杭爱山麓的哈拉和林。在此之前，统治草原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族都曾经设庭、驻城于哈拉和林河畔，以完成他们对蒙古高原的统治。

鉴于匈奴帝国能够为我们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参考后世诸游牧国家在蒙古高原的地缘布局，对我们了解当年匈奴帝国的结构非常重要。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地理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古典时期的族群在地缘选择上很少会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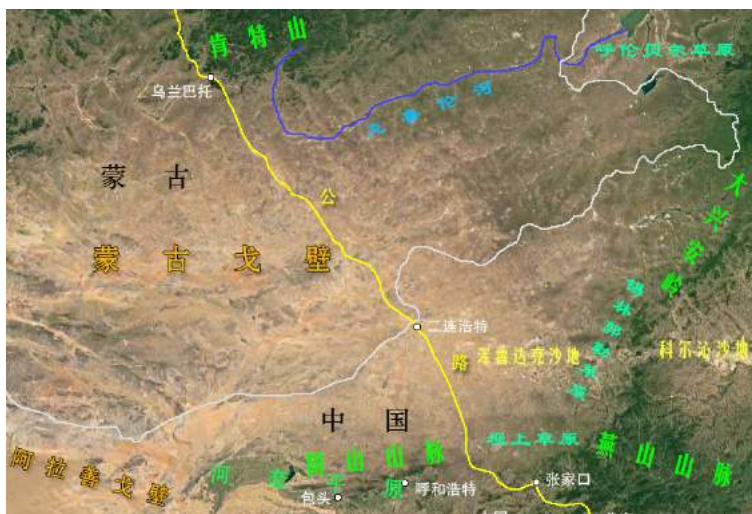
## 第五节 霍去病出代郡沿坝上草原进军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对霍去病穿越戈壁，进入漠北草原之后的攻击线路有所了解。现在是时候回到起点，去看看东路汉军是从何处离开漠南草原的。根据汉帝国最初的设定，东路军主力的集结点是在代郡。也就是说，霍去病和他的部队应该先向北进入“坝上草原”的西部，然后再寻路穿越戈壁进入漠北。

今天如果我们沿此线路进入坝上草原的话，接下来可以西北向切入 208 国道，经由二连浩特出境。而连接二连浩特——乌兰巴托的，是一条近乎直线的公路线。如果当年霍去病是沿此线路出击的话，理论上无疑是最为便捷的。问题在于，作为和平时期双方都有意经营的商路或者驿路，经营者自然有能力沿途布设补给点。但对于第一次深入蒙古戈壁的霍去病部来说，横穿戈壁腹地的方案却是有些过于冒险。就这一点来说，李广刚刚在西路军那里已经得到了深刻教训。

比较稳妥的方案，是在进入坝上草原之后向东北方向移动，先行扫荡有可能渗透至此的匈奴人。在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后，再折向西北方向，以克鲁伦河上游河谷

为目标攻击前进。这种看似绕了一点远的方案，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机会借助植被覆盖率更高的草原地带，攻入克鲁伦河谷。



中蒙边境地区示意图



燕·三都五郡示意图

以右北平郡的位置，以及境内河谷通道的流向来看，帮助华北汉军进入锡林郭勒草原的，应该是今天天津人民的母亲河“滦水”（汉称“濡水”）。在经由滦水及其上游河流“伊逊河”谷之后。这支汉军最终与霍去病会师于滦河正源的闪电河畔。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定位的话，大致就是由蓟县出发，经由承德、隆化、围场，西北方向穿越燕山山脉，进入燕山西麓的多伦县境内。

当我们在地图上沿霍去病、路博德两路的行军路线画出两军的相会点时，会突

我们知道，两种地貌相接总是会有缓冲地带的。就像撒哈拉沙漠与非洲中部草原之间，有一条半荒漠的“萨赫勒”地带一样。蒙古戈壁东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越靠近大兴安岭，植被覆盖状况就越好。整个地区自西向东呈现：荒漠——半荒漠草原——荒漠草原渐变的地貌特点。霍去病部越晚转向，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小。至于草原地带可能会集结更多的敌人，倒完全不会让他感到担心。这甚至是霍去病所希望见到的，毕竟取食于敌是他一贯的打法。对手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汉军所获取的补给会更多。那么霍去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转向向克鲁伦河进发的呢？

在离开坝上草原，进入锡林郭勒草原后，霍去病从河套地区所带出的汉军主力，很快将会与另一支从华北平原北上的汉军会和。这支汉军的出发地是管辖燕山东部的右北平郡，领军的则是十年之后扬名于南越之地的“伏波将军”路博德。



然发现，这个点正是之前卫青首战扬名的匈奴左翼祭天的“龙城”所在地（多伦之西的正蓝旗）。这个地点，也就是后来元朝承接草原地带与农耕区的“上都”所在位置。

在汉帝国已经能够将战火烧向漠北之时，卫青曾经建功立业之地，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汉军在燕山北麓的据点了。在汉书和史记的记载中，两军会师的地点被记录为“兴城”。能够在燕山之麓就安排与主力会师，对于路博德来说是相当幸运的。尤其是对比独自穿越戈壁，并迷失道路的李广部来说。

实际上，对于霍去病来说，并不会太在意又给他补给了多少人员。帝国安排他沿燕山北麓东行至此的原因，是因为东路军将由此出发，正式开始向漠北进发。而作为一直据守燕山一线，防备匈奴左翼的汉军，他们参与的价值在于情报的收集、路线的先期考察，以及向导的寻找工作上。

## 第六节 霍去病从达里冈爱进入漠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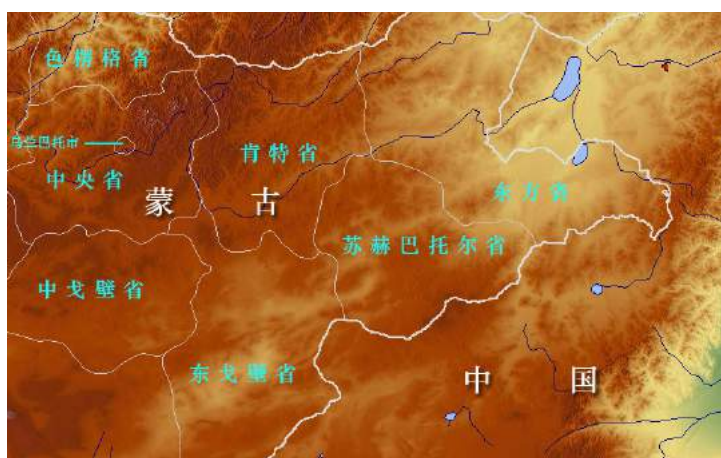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今天中蒙边境的对面，也就蒙古境内的地缘结构了。因为这关系到汉军如何在环境与距离之间找到一个条平衡线，以帮助他们最快速、安全的到达克鲁伦河谷的问题。在蒙古的行政区划中，有好几个以戈壁为后缀的省份。位置最靠东南，与锡林郭勒相连的为“东戈壁省”。而在这个以戈壁地貌为主的省份东部，则是一个能看到连片干草原的省份“苏赫巴托尔省”。

一直以来，中国的版图轮廓都被形容为一只雄鸡。在这只“雄鸡”的脖子上有一个明显“n”形突起，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今天中国通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交通线，就是从这个突起的西南角——二连浩特出境，在横穿蒙古境内的东戈壁省后，直线接入图拉河谷的。不过，很多关注过民国乃至清朝地图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内、外蒙的交界线上也有一个n形突起，但这个突起的位置却比今日这个更偏东北方向一些，面积也要大上二倍有余。

这片原来属于内蒙，后在外蒙独立之后，被划入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境内的草原，被称之为“达里冈爱”。在清朝的时候，达里冈爱牧场也曾经是最大的皇家牧场。曾经有不少朋友希望我能够系统详解一下中蒙边境的那些恩怨。只是按现在的主线，这种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了。当然，如果我们正在参照的历史恰好会涉及到这些“争议”板块，自然也没有理由刻意回避了。达里冈爱牧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清帝国在内外蒙交界之处设立一个皇家牧场，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因为定都燕山之南的满洲人，一般更倾向于把皇家牧场选定在离都城更近的燕山北麓。将行政力直接延伸到这样一个靠近戈壁的地区，更多应该是出于地缘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达里冈爱牧场是由锡林郭勒草原，通往克鲁伦河流域的跳板。

这一点从蒙古帝国的驿道建设中也可以看出。蒙古帝国时期，在连接中央之国



蒙古行政区划图（东部）



达里冈爱位置图



清代达里冈爱牧场位置图

核心区与漠北草原的三条驿道中，由元上都通往克鲁伦河谷、图拉河谷，并最终哈拉和林为终点的驿道，被称之为“木邻道”。而达里冈爱牧场就是这条驿路上的重要一环。也是漠北蒙古部落从高原东部通往漠南的最后一站。在明帝国将蒙古人逐出中原，并北伐蒙古高原之时，达里冈爱地区就曾经数次成为明军北攻漠北的跳板。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还在他第一次领军北伐时，在达里冈爱地区成功逼降了北元太尉“乃尔不花”，俘敌数万。也正是在这次胜利以后，朱棣在明军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为后来君临天下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清楚了，霍去病所率领的东部军应该是在燕山西麓、滦河上游的“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县），与来自右北平郡的路博德部会和，然后在后者的引领下，西北方向经达里冈爱地区，沿今天蒙古苏赫巴托尔省西境，向克鲁伦河上游攻击前进。由于这条攻击线身处草原地带的边缘，比起穿越戈壁腹地来，汉军所面临的难度要低一些。

当汉军沿着蒙古戈壁与东部草原的边缘，攻击前进至克鲁伦河之南的丘陵地带时，按照今天蒙古国的行政区划来说，他们已经进入以温都尔汗为首府的肯特省境内。对于霍去病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踏上了漠北草原的土地。接下来，这支强悍的汉军将要做的就是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尽量多的消耗匈奴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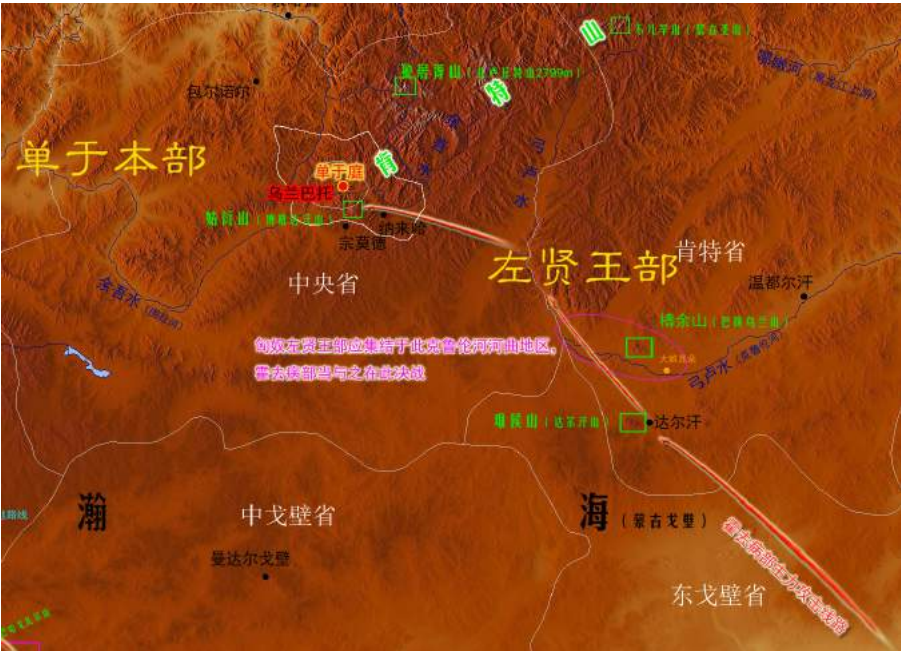


有生力量。

第七节 汉军与左贤王部决战于樗余山

霍去病部并非是在渡过克鲁伦河（弓卢水）之后，再与匈奴左翼部队接战的。汉军在步入克鲁伦河之南的丘陵地带时，就已经进入了匈奴人的攻击范围。若以今日的行政区划来看，大致就是在由苏赫巴托尔省境内，北入肯特省境内就与匈奴人接战了。

汉军在弓卢水之南大致应该是先东北向前行，然后再转向西北方向北上攻击前进的。最终让汉军止步，并准确渡河攻击匈奴左翼主力的，是一座叫做“难侯”的山丘。难侯山之所以被史书记录下来，并非是因为它本身的地形特别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位置正处在克鲁伦河河曲之南，比周边的丘陵相对又高些，容易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地理特征罢了。



汉·漠北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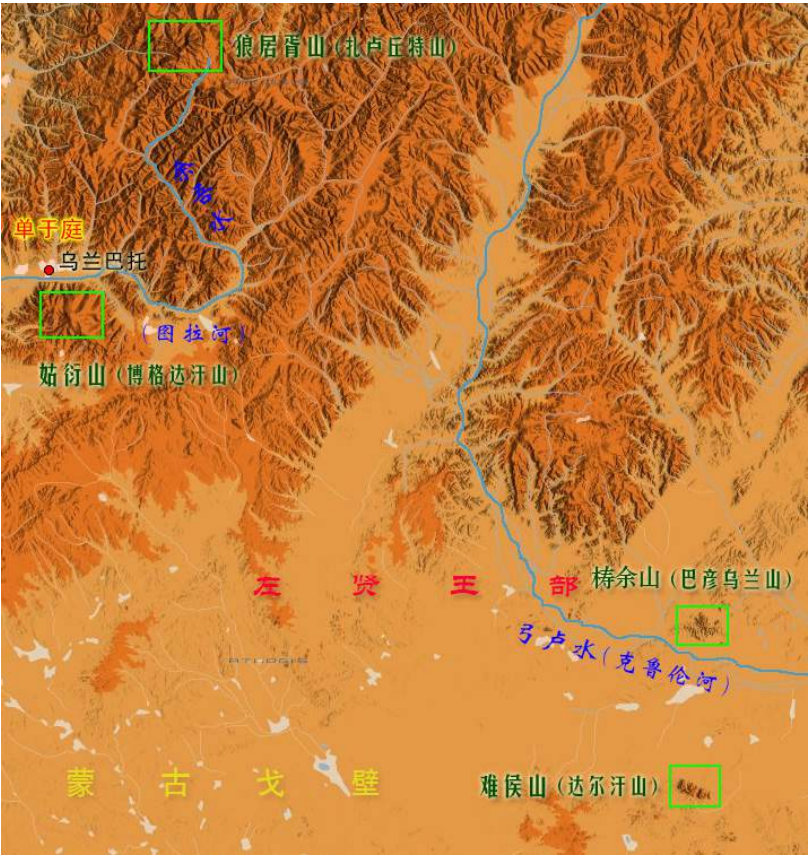
今天身处难侯山下的城市名叫“达尔汗”，这座山也被称之为“达尔汗山”。需要注意的是，在乌兰巴托西北部，靠近蒙俄边境处还有一个城市规模仅次于乌兰巴托的城市“达尔汗”。至于它们为什么取了一样的名字，就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了。我们此时应该关注的，是肯特省的这个达尔汗，拥有什么

什么样特殊的地缘位置。无论是攻击至达尔汗山的汉军，还是往来于戈壁两端的匈奴人，在北行至达尔汗山下时，都会面临两个选择：或者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行，进入图拉河谷；或向北渡河，进入到克鲁伦河北部。就东路汉军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后者。因为攻击至此的霍去病，已经能够从俘虏口中获知，匈奴单于并不在图拉河谷，而是阴错阳差的成为了西部军的正面之敌。对于他来说，此时最现实的目标就是向北攻击左贤王部的主力，最终凭借斩获来弥补未能斩首匈奴单于的遗憾。

汉军渡过克鲁伦河后，与匈奴左翼决战的战场中心被称之为“樗余山”。与姑衍山、

难侯山一样，这座山也只是肯特山南的一个海拔 6、700 米的小丘陵。在成吉思汗设帐于克鲁伦河之北时，它被称之为“朵栾盘陀山”。而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沿用它清朝的名称“巴彦乌兰山”。

柁余山和弓卢水之间的草原，也就是蒙古高原左翼的地缘中心了。这样一个位置，既能让匈奴左贤王保持与图拉河谷密切的地缘关系，又容易控制整条克鲁伦河谷。当然，匈奴左翼的主力囤积于此，也对单于本部所辖的图拉河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不渡河解决掉左翼主力的话，即使单于本人在图拉河谷，霍去病部直接去斩首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霍去病漠北征战之地示意图

匈奴部落被汉武帝安置于河南地，帮助帝国防御南侵的匈奴人。这些以“属国”名义存在的匈奴部落，史称“五属国”。

很显然，这些匈奴人归降汉帝国的直接原因，是慑服于霍去病本人。即使霍去病本人不要求，他们当中希望为新主建功、获得封赏之人，也会志愿从军，并甘为先锋部队的（汉军中的精锐基本也是自愿归于霍去病魔下的）。这些成建制加入的匈奴人，对于西路军的贡献最起码有两个：一是熟悉地理环境的他们，能带领汉军更快速安全的攻击至漠北（没有匈奴人帮助的李广就迷路了）；二是可以现身说法，从政治上瓦解阻击汉军的匈奴部落。

将 难 侯 山 —— 柁 余 山 —— 姑 衍 山 —— 狼 居 胥 山 连接起来，就是霍去病部在漠北草原的攻击线路了。在这场战争中，东路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斩俘了包括匈奴左贤王部、单于本部（留守）人口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匈奴贵族共计八十三人。而东路军的人员损失仅仅是二成。能够取得数倍于西路军的战果，与霍去病恩威并施的战法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此次出征中，霍去病除了选取了汉军中最为精良敢战的战士之外，部队中还包含了大批在河西之战中归降的匈奴人。

在那场战争中，归降的数万



历史并没有为我们记录下来，到底有多少匈奴人是望风而降成为汉军俘虏的。参照河西之战，这个数量肯定不会低于直接被汉军斩杀的匈奴人。不过这个数量比已经不重要了。在东、西两路汉军的攻击之下，匈奴损失了将近十万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战士），以及数以十万计的牲畜却是肯定的了。对于人口本来就有限，恢复能力又不足的匈奴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

尽管此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汉帝国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个代价更多体现在经济上，仅仅是马匹的损失，就需要汉帝国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了。根据战后的统计，在这次漠北之战中，出塞的十四万匹战马中，最终能够回到帝国土地上的不满三万之数。也就是说，有超过十万的战马损失在了戈壁和漠北的土地上。至于这次战争所消耗的粮草物资，更不是一个小数了。

正因为如此，漠北之战后汉、匈双方出现了一段超过十年的相持阶段。双方都需要休养生息，此时的戈壁真正成为了汉匈两国的屏障。当然，相比匈奴人，汉帝国的恢复能力要强得多。真正让汉帝国不再北上漠北的直接原因，是霍去病的英年早逝。公元前117年，也就是漠北之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这位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少年将军因病去世，时年仅仅24岁。

## 第八节 汉帝国在漠北之战后的举措

汉军之所以能够在十年战争（龙城——漠北）中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力上的储备。不过河西、漠北之战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也与霍去病那种不循兵法的战法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霍去病的出现加快了战争进程，使得战争的天平更快的倒向了汉帝国一边。失去了霍去病的汉帝国，固然还是非常有信心使匈奴人不敢在漠南设立王庭，但说到再一次进击漠北，却还是缺乏些底气的。

实际上，漠北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战果，与匈奴人的判断失误也有关。如果他们能够正确判断汉军的攻击力与补给能力，就会不集结主力，试图在漠北草原与戈壁相接之地与汉军决战了。从战术上来说，远涉对方腹地的一方，最希望见到的就是马上遇到对方主力，并与之决战。而如果匈奴人放弃与对手决战的想法，凭借自己的大纵深与汉军周旋的话，汉军即使不被拖垮（此时的匈奴人可以乘机发起攻击），也会主动放弃攻击撤退了。

现在，匈奴人已经完全相信汉军有在漠北与之决战的实力了，如果汉军再集结类似规模的兵力出击漠北的话，很有可能会无功而返。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加上匈奴人暂时也不再主动南下了。汉帝国也暂时将匈奴问题放在了一边，利用北方边境难得的安宁期，着手解决其他方向的问题了。

在汉武帝着手战略反击匈奴时，身处中央之国东南、南方的“二越”，也就是闽越、南越两国，虽然名义上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保持着独立状态。在匈奴

人不再为祸中原时，汉武帝也得以腾出手来解决这两个遗留问题。具体的过程，我们在之前南越部分也已经提前解读过了。简单点说，就是在公元前 112 年——公元前 111 年，帝国得以将领土真正扩张到南海之滨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解决掉“二越”只能算是恢复了秦帝国所扩张出的中央之国版图。真正让汉武帝感到不安的，还是那个在北方暂时蛰伏的匈奴帝国。很显然，富庶的农业区对这些游牧者永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旦他们的力量得以恢复，汉朝的边郡势必会再一次的受到攻击。

汉帝国攻灭闽越、南越两国时候，距离漠北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这个时间间隔，意味着新一代的匈奴战士得以长成，而他们的畜群也同样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在南线战事结束之后，帝国此时所需要考虑的，是再一次主动出击漠北，还是坐等匈奴人又一次南下。

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公元前 111 年派两路汉军，分别从五原、令居两个方向出塞（前者一万五千骑，后者万余骑），向北穿越戈壁阿尔泰山进入湖谷，以探知匈奴人是否还老老实实的待在漠北草原休养生息。最终的结果是，匈奴人的确还没有南下的企图，出击的汉军在未与匈奴接战的情况下，回到了漠南。

尽管收集到的情报证明了匈奴人暂时还没有南下的企图，但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上的滋味也并不好受。问题是，基于我们之前所分析的理由，汉武帝和他的将领们也没有勇气再发动一次漠北之战。有鉴于此，汉武帝试图将匈奴主力引至漠南与之决战。

再一次以“马邑之围”的方式引蛇出洞，显然并不现实。已经完全处于守势的匈奴人是绝不会再为点小利，就轻易冒险南下了。因此这一次，汉武帝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集结了十八万的骑兵（几乎是汉军全部主力了），由汉武帝亲自领军集结于朔方；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至漠北，告知匈奴单于：要么南下与汉军决战；要么向汉帝国称臣，彻底结束这场战争。不要只是躲在这寒冷凄苦，缺水少草的漠北。

对于汉帝国的这种挑衅，匈奴人当然是十分愤怒的。然而这种愤怒却也不至于让他们敢于南下与汉军决战。因此匈奴人的应对策略是，一方面在漠北草原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派出使者示好，试图以和亲的方式将汉匈关系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当然，此时匈奴人所希望的“和亲”，已经和汉初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以这种方式来保持与汉帝国的平等关系。

对于匈奴人提出的和亲要求，汉武帝并没有答应。也就是说，正处于强势期的汉帝国，并不希望就此与匈奴罢兵。然而问题是，大漠戈壁成为了一道现实的屏障，如果匈奴人一直不肯南下的话，汉军再一次远征漠北的难度也实在太大了。正因为如此，在汉武帝朔方阅兵之后数年，汉匈两国除了不断互派使节，以试探对方虚实以外，军事上面并没有太大动作。

这一阶段的外交战并没有什么特别收获。反而对于双方，尤其是汉朝使者来说，



却无疑于一场灾难。由于自认为没有得到汉朝的尊重，匈奴方面扣留了每一批出使匈奴的汉使。而出于对等原则，汉朝方面也扣留了相同数量的匈奴使者。当然，这些使者本身并不会有性命之忧。不过由于双方生存环境的差异，那些被扣留在长安的使者，在生活上其实算是在度假了。至于汉使的待遇，看看苏武（公元前 100 年被扣）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 第三十五章 汉帝国扶植乌桓和攻灭朝鲜

### 第一节 汉帝国征服西南夷的目的

暂时无法再一次与匈奴主力决战，并不代表汉帝国就此马放南山了。借北方压力的减小，除了两越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外，云贵高原的“西南夷”，也通过两次战役（公元前 111 年 / 前 109 年）得以纳入帝国版图。需要说明的是，云贵高原的“夜郎”等国，对帝国的边境安全其实并没有什么威胁。经营这片土地，在经济上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没有太大收益。帝国之所以对这片土地感兴趣，很大程度却还是源于万里之外的匈奴。

我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解读张骞出使西域对汉匈地缘关系的战略意义。这次凿空西域之举，无论对于汉帝国还是整个中央之国西北版图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张骞带回来的诸多地缘信息中，有一条就是他在吐火罗盆地的大夏，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加上收集到的关于南亚次大陆的信息，使得张骞相信在帝国的西南，有一条始自四川盆地，经由云贵高原，穿越南亚次大陆，并最终抵达中亚的战略通道。

如果帝国此时已经相信，联合天山南北诸国能够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那么能够拥有一条完全不受匈奴人影响的连通“西域”的战略通道，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鉴于秦帝国在云贵高原已经试探性的扩张过了，汉帝国在攻灭南越的同时，顺势将云贵高原纳入版图的理由也就更加的充分了。

事实上，早在张骞回到长安后不久（公元前 122 年），汉武帝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完成打通西南通道的梦想了。他甚至同时派出四路使者，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传说中富庶的“身毒”。虽然这些尝试最终都受阻于西南那些土著（“夜郎自大”407 的典故就源于这些探路之举），但因此而收集来的情报，却为后来的征服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要是张骞不在公元前 114 年去世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在汉帝国征服西南之后，马上请命亲自打通这条“南方丝绸之路”的。当然，就最终的结果来看，不管张骞有没有机会亲身开通这条新路，汉帝国终究会发现，这条理论上沟连西域的战略通道，圈子实在绕得有些太大了。换句话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固然有可能为帝国带来额外的商业利益，但于北方汉、匈之战的进程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要想压缩匈奴人的外交空间，汉帝国还是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匈奴人可以够得着的那些板块中。很显然，将西域那些绿洲国家，包括乌孙这样的游牧国家纳入帝国的势力范围，将是帝国下一步的经略重心。这一战略，被称之为“断匈奴右臂”。



然而从地缘结构上看，西域并非是唯一有可能成为汉、匈外交争夺的方向。在匈奴的东面、帝国的东北，还有三个位于大兴安岭以东的板块有可能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以部落（国家）名来标示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地缘板块标定为：乌桓、扶余、朝鲜。

## 第二节 汉帝国扶持乌桓以制衡匈奴

与西北战略相对应的话，我们也可以将汉帝国在东北方向的外交、军事行动，定位为“断匈奴左臂”。在针对这三个板块的动作中，乌桓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作为东胡遗族，被压缩于大兴安岭南部的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匈奴人的附庸，并成为帝国东北防线的现实威胁了。

不过作为被匈奴征服的边缘部族，乌桓人很显然只是一个“胁从犯”。漠北之战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摆脱匈奴人的控制。在汉帝国的扶植之下，这支原本在森林当中被迫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胡部落，开始放心游牧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草原地带，也就是西拉木伦河——辽河流域（今天的科尔沁草原）。

乌桓人借漠北之战得以扩张的森林草原地带，相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边缘。实际上，这些地区也正是当年燕国所征服的东胡故地。如果东胡人还像当年那样强大的话，汉武帝当然不会放心让他们重回故土的。但现在扶植他们，相当于为帝国的燕山防线设立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区。而为了管理这些乌桓人，帝国也设置了“护乌桓校尉”的军事机构。

从地缘结构上看，乌桓人被纳入汉朝的势力范围，匈奴方面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左贤王部了。因为这相当于切割了匈奴左翼部落南下攻掠的草原通道。而乌桓人之所以敢于在此时摆脱匈奴人的直接控制，除了汉帝国的强势以外，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匈奴左翼势力，在漠北之战中损失惨重。

由于霍去病部这次直接攻击了匈奴左翼在漠北的王庭，东路军的斩获中应当有相当部分是隶属于左贤王本部的。换句话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最后受到直接攻击的匈奴左翼，反而是损失最严重的。匈奴左翼在漠北之战中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到了匈奴内部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之后的岁月里，匈奴右翼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开始取代左翼贵族在匈奴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了。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地缘影响，就是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向西方倾斜，西域开始成为汉、匈两国的争夺重点。

由于乌桓人逐渐脱离了匈奴人的控制，之前经常受到匈奴左贤王部所侵扰的燕山防线，也基本不再成为匈奴人的攻击目标了。而之前由匈奴单于本部所负责攻击的云中、代郡、雁门等中部边郡，则成为了左贤王部南下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谷、渔阳、右北平等以燕山为依托，护卫华北平原的边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中，如何将第三方势力的实力维持在可控状态中，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简单点说，作为第三方势力存在的乌桓，如果你不给他足够的

空间，他的实力就不足以帮你缓冲匈奴；而如果放任其坐大的话，又有可能尾大不掉，威胁到自身安全。至于汉帝国有没有办法掌控乌桓，“断匈奴左臂”之举又有哪些具体行动，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尽管名义上选择了接受汉朝的节制，但乌桓也并没有马上选择与匈奴为敌。通常情况下，居于这种地缘位置上的“国家”，会选择左右逢源，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直至东汉初期，匈奴方面都还试图按惯例，向乌桓人征收兽皮、布匹以为税贡。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了。由于匈奴人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乌桓人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保持这种表面的臣服关系了。牧地的扩张所带来的人口增长，让乌桓人不仅敢于对匈奴人说不，更在公元前 78 年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那就是挖掘匈奴单于的墓地。

这座被挖掘的单于墓地，很可能就是当年在白登围困刘邦的冒顿单于。由于东胡实际上就是亡于这位单于之手，乌桓人在坐大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报复了。如果仅仅是断了税贡，匈奴人可能还能忍。毕竟现在已经有大把边缘部落，不再像当初那样顺服匈奴了。但挖坟掘墓这件事，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来说，都是犯了大忌的。乌桓人这样做，无异于向匈奴宣战。因此在事件发生后，匈奴方面调集了左翼两万骑兵南下征讨乌桓。

当匈奴、乌桓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时，作为第三方的汉帝国此时的态度就非常微妙了。如果将匈奴视为最大对手的话，帝国就应当出兵帮助乌桓人，以避免匈奴的势力借机逼近燕山。然而坐大之后的乌桓人，也并不让汉帝国省心。游牧民族的本性，使得他们在开罪匈奴的同时，同样也曾数次袭扰汉朝边郡。假使借匈奴之手教训一下这些尾大不掉的乌桓人，倒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帮还是不帮，看起来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战机稍纵即逝，时间已经不容许帝国中央再做过多考虑了。因此在匈奴南下的同时，帝国还是派出了两万骑兵出辽东，暂时以匈奴为攻击目标向乌桓境内进发。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汉军领军的将领（赵充国）被授权见机行事。说穿了，就是准备坐山观虎斗，以收渔翁之利，

409

最重要的是不要空手而回。对于汉军来说，最好的局面应该是匈奴与乌桓斗得两败俱伤之时，出面收拾残局，一举削弱两个对手。只是匈奴人并没有给汉军选择机会，他们在听闻汉军出征之后，便识时务的退了回去。如果汉军不想徒费钱粮的话，就只能对乌桓人下手了。

在与匈奴接战中已经遭受损失的乌桓人，并不是汉军的对手。这场战役让乌桓人损失了三“王”以及六千多人口。当然，对于汉军来说，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准备上，都没有想过要攻灭乌桓。这次带有惩戒性质的攻击，更多的是让乌桓人明白自己的位置。

汉、匈、乌三方的这场三国杀游戏，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曾多次上演。以汉帝国



的实力，以及乌桓的地缘位置，汉军如果想攻灭乌桓是完全做得到的。不过由于匈奴人的存在，将乌桓人的实力控制在可控规模内，成为了汉帝国“断匈奴左臂”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也就是说，只要匈奴人的威胁一天还存在，中央之国就不会想到去消灭乌桓人。而如果匈奴帝国不复存在，草原再一次分裂成各自为战的部落状态，乌桓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

乌桓人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是在三国时期。此时的匈奴人（北匈奴）已经放弃漠北草原，向西干草原迁徙。失去了这个最大对手，诸如乌桓、南匈奴这些为中央之国拱卫边疆的部落，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统治北方的曹魏在击破乌桓之后，将其部落整建制的内迁（也包括南匈奴）。一方面根绝边患，另一方面增强己方的实力。

游牧民族内迁之后对中央之国历史的影响，是很久以后的话题了。今天我们梳理乌桓的历史，是为了清楚汉匈东线战场的变化。除了乌桓以外，大兴安岭以东还有两支潜在的力量，有可能影响到帝国东北边境的安全。这两支地缘力量就是东北平原以及朝鲜半岛。在汉朝的记录中，他们被称之为“夫余”和“朝鲜”。

### 第三节 汉帝国攻灭卫满朝鲜

在中央之国开始结束战国之乱时，东北渔猎民族中的一部分，开始在松花江——嫩江流域南部进入国家状态，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所记载的“扶余国”。对于渔猎民族来说，农、牧两种生产方式都是增强自身实力，提升生产力的重要补充。然而，基于纬度的原因，这些渔猎出身的部落国家，如果不能南下进驻辽河流域的话，那么在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上始终是不会有大的提升的。

早在国际部分，辽河平原的地缘价值我们就做过详细分析了。在后来的历史中，东北渔猎民族也曾经多次趁中央之国以及游牧政权的衰弱，渗透这片土地，甚至以之为跳板入主中原。但在汉匈博弈期间，他们暂时还没有这种机会。

真正有机会挑战帝国在辽河平原存在的，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威胁。由于纬度的关系，朝鲜半岛要比东北地区更容易进入农业时代。在中国历史的记录中，早在商、周相交时期，朝鲜半岛就成为了商族（箕子朝鲜）退出中原之后的选择。当中央之国的历史推进到西汉时，朝鲜也由箕子朝鲜时代更迭到了“卫满朝鲜”时代。

这段历史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也曾经解读过。对于我们来说，统治朝鲜半岛的政权是哪个，又与中央之国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起码在西汉时期，朝鲜半岛已经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板块，对辽河平原形成了威胁。当汉帝国还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与匈奴的战事时，朝鲜自然可以作为藩属，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了。而当匈奴人收缩于漠北，不再对帝国边境构成致命威胁时，朝鲜“进阶”成帝国的“汉四郡”也就在所难免了。

汉军攻灭朝鲜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09年。在此前后，闽越、南越、西南夷

等边缘板块都相继被纳入了帝国版图。我们当然可以在史官记录的历史中，找到这些夷狄的种种不是，以证明帝国这些战争的发起是多么的无奈。但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存亡都决定于汉匈之战的进程。一旦帝国能够腾出手来，这些边缘板块被纳入中央帝国的集权体系，都只在旦夕之间。

对于汉帝国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匈奴。只要匈奴人还能够完整的统治漠北草原，帝国的北方边境在战略上就不会有真正安全可言。当然，如果你能够有办法把他们彻底屏蔽于漠北，不再进入漠南草原的话，汉帝国也会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基于这一战略需求，乌桓人在锡林郭勒草原一线获得了生存空间，成为阻挡匈奴左翼南下的缓冲。

问题是，让汉帝国倍感压力的，并不只是燕山一线。之前同时承受匈奴单于本部，以及右翼压迫的阴山一线，才是最让汉武帝头疼的地方。那么，是不是也要在此引入一股第三方势力，以为帝国的防火墙呢？纵观历史，这的确也是一个办法，后来历代中原王朝也多采取此法分化游牧势力。而除了乌桓以外，汉武帝在西线也曾经试图劝说乌孙人回到河西走廊承担类似角色。那么在阴北草原，帝国有没有机会也这样做呢？



## 第三十六章 汉帝国修筑受降城和外长城

### 第一节 匈奴因经济恶化而产生内乱

尽管将阴北草原交给一个与匈奴敌对的游牧部落打理，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也符合中央之国一贯秉承的“以夷制夷”原则。但现在的问题是，暂时并没有合适的羁縻对象，来帮助汉帝国完成这一战略。

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生活于阴山南北的游牧部落还不是匈奴人。在先秦的史书中，他们被称之为白羊、楼烦等部。不过，早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匈奴的势力就已经南下整合这些漠南的游牧部落了。虽然匈奴人还保留了这些部落之名，甚至有可能还保留他们之前的贵族体系（攻灭东胡之后，也设有“东胡王”），但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之后，这些部落无疑已经成为完完全全的匈奴人了。换句话说，汉帝国已经不可能在阴山南北找到游牧土著，来帮助他们防御匈奴人了。

既然匈奴之外，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那么能够挖掘潜力的就只有匈奴内部了。作为一个游牧部落集合体，匈奴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大漠戈壁本身成为了一道地缘分割线。一旦匈奴内部因为政治、经济原因陷入分裂，帝国自然便有机会吸引到反叛者入驻漠南草原。并因为地理分割，以及与汉帝国的地缘距离，自然与漠北匈奴分割为对立的两部分。

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也的确如我们从地缘结构中所推导出那样，分裂成为了南、北匈奴，而为了对抗自己的同门兄弟，南匈奴也的确成为了依附汉帝国的反叛者。不过，正式开启南、北匈奴时代，要等到东汉建立了，匈奴衰弱到这个程度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汉武帝时代，一切都还在试错之中。

机会最先出现在漠北之战后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5年。在此之前，汉、匈两国之间算是度过了一段和平期。在这段时间里，也并非完全没有战事。除了汉帝国曾经派出两支部队（公元前111年），前行至湖谷寻找匈奴人踪迹以外，匈奴人也曾经在公元前107年秋，试探性的侵扰过河套地区。不过，这些试探之举都未能改变汉、匈两国隔戈壁而治的地缘格局。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内部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的话，这种僵局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先有大事件发生的，是匈奴方面。导火索便是匈奴乌维单于去世（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05年在位），匈奴方面的政治体系面临重新洗牌了。政权交替并不总意味着会有内乱发生，但如果政权交替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不稳定的时期，就很有可能成为内乱的导火索了。

十年战争对匈奴帝国的伤害，除了生存空间被压缩，损失大量精壮人口外，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无法在遭受大的灾难之后，从善于储备的农耕区获得补充了。

而在气候更为恶劣的漠北，长达十几年时间中，不出现极端气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匈奴完成政权交替的第二年冬天（公元前104年冬），漠北就遭遇了一场大雪灾。也就是说，在漠北之战后实行战略收缩的匈奴人，在经济上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匈奴政权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在微观历史中体现于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刚刚上位的新单于，由于年仅15岁，时称“儿单于”；另一位则是匈奴左翼的一位重要军事将领，史称“左大都尉”。简单点说，这位儿单于的作为符合了中央之国史书中，对于末代君主的诸多描述：喜怒无常，动辄杀人，以至国中不安。而这位左大都尉就被描述为一个不堪忍受其统治的反叛者。其实这些表面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所渲染的那些“昏君”的作为，在很多“明君”身上也同样存在。他们之所以被钉上耻辱柱，更多只是生不逢时或者政治上的失误罢了。

匈奴人这次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刚才所分析过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经济的恶化。那些各自经营一片草原的游牧部落之所以愿意集合在一面大旗之下，是因为这面大旗能够帮助大家合力争取更大的利益。基于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基本上算是靠天吃饭，游牧体系在经济上，本身并没有多少内部潜力可挖。人为的增加管理层级，只会增加基层部落的负担。如果大家发现一个游牧帝国现在只具有内部管理功能，而不能帮助大家额外获得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帝国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作为后世的旁观者，我们总是有更宽的视角来解读一些历史事件的背景。不过对于时刻警惕北方威胁的汉武帝来说，他此时为之一震的，是匈奴内部终于出现分裂的迹象了。这实际上也是汉武帝也一直期待的局面。在此之前，他甚至借吊唁匈奴单于之名，分别向单于本部及匈奴左翼同时派出两批使者，以探查有没有分化对手的机会。相信这位“左大都尉”，就是从中看到机会的。为了迎接他，帝国决定在戈壁阿尔泰山的南端，也就是我们之前定位的漠南之战攻击右贤王处，兴建了一处城堡——受降城，以接应这位“弃暗投明”匈奴贵族。

## 第二节 汉军接应匈奴左大都尉时遭围攻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在匈奴右翼南下阴北草原的跳板地区，兴建一座城堡并不仅仅是迎接一位反叛者那么简单。更深的含义在于，如果汉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延伸至此的话，那么匈奴右翼南下攻击阴山的路线也就被切断了。事实上，汉帝国开始修筑受降城的时间，应该比得到左大都尉叛逃的消息还要早几个月（都在公元前104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受降城并不仅仅是一座“受降城”。当然，你永远不可能只靠一个军事据点，来阻断对手的进攻。更有可能的战略设想，应该是将左大都尉所带来的叛逃者（也包括以后的叛逃部落），安置于阴北草原（并设立属国），以为受降城的支撑。



类似的战略设想，也体现在了对于河西匈奴的安置上。这些属国最终也是安置在帝国前沿军事据点与腹地之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最大限制的监控这些依附者，毕竟要是让他们自由与匈奴帝国沟通信息、无缝对接的话，谁也不能保证他们有一天，会不会重新成为帝国的威胁。

如果仅仅是率部叛逃，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然而为了在叛逃之后获得更多的封赏，叛逃者决心在暗杀儿单于之后，再率部南下。对于汉帝国方面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了。不过，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反叛者基本没有可能悄悄的向南移动，进入汉军的势力范围了。为此，在收到左大都尉准备叛逃的消息后（公元前103年春），汉武帝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骑兵部队，北出刚刚筑就的受降城，进至湖谷南面的浚稽山，以随时接应刺杀匈奴单于成功的左大都尉部。

然而再完美的计划，在执行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汉军这次所遇到的状况，并不是那位反叛者“良心”发现中止了计划，而是他行事不周，被他的暗杀对象发现了。其结果就是，不仅左大都尉本人被诛，汉军的接应计划也被匈奴方面获知了。汉军此次的接应计划，是在预设左大都尉斩首成功，匈奴群龙无首的背景下设定的。由于并非是一次攻击行动，汉军在后援和补给方面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当匈奴方面集结主力围剿这支孤军时，这支两万人的汉军部队，所面临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围剿汉军，匈奴方面集结了超过八万的骑兵。在最初的遭遇战中，汉军还是体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斩杀了数千匈奴人。然而在没有准备后援的情况下，沿来路向南穿越夫羊句山退至受降城，成为他们顶住对手第一波进攻后的唯一选择。

当汉军从有备而来的接应者，变身成为匈奴主力的袭击对象时，他们能够逃出生天的机会就很小了。很显然，匈奴方面并不会只从正面攻击汉军。熟悉地形的他们，一定在发起攻击之前，从侧面插入至夫羊句山的峡谷通道处，以阻断汉军的退路。最终，向南撤退的汉军被围困在了夫羊句山的南端，距离受降城约四百里处。在戈壁环境当中，最为重要的补给物资就是“淡水”了。不幸的是，匆忙后撤的汉军并没有时间为自己选择一处有泉水的地方据守。更为不幸的是，率领这支汉军的指挥官，是曾经在河西之战中跟随霍去病建功的浞野侯赵破奴，并在外出寻找淡水时被匈奴方面所俘获。

我们时常说，在草原作战中，基于地形特点和对手的机动性，汉军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难全歼对手。今天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准备围歼汉军的匈奴人。如果集中兵力强行突围的话，汉军虽然会遭受很大伤亡，但一定还会有相当部分的骑兵回到漠南。要知道，在后来战况更为惨烈的浚稽山之战中，完全由步兵组成的李陵部，尚有四百士兵逃回了居延塞（总兵力五千）。然而汉军严格的赏罚制度，在此时却起到了反作用。损失主将的后果，将由赵破奴手下的那些校、吏所承担。如果回到汉军，他们所面临的将是斩首之刑。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孤军深入的汉军最后全数投降了匈奴。

这次损失，是汉军自战略反击以来，所承受的最大损失。相信事情的结果，也对汉武帝本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一个曾经令汉军奋勇杀敌的赏罚制度，此时却成为了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为此，当十年之后，赵破奴携子逃回汉朝时，汉武帝并没有惩罚他，而是重新委以重任。

汉军的军功赏罚制度的利弊，并非是我们重点讨论的方向。我们所关心的，还是这次失败战役所导致的汉、匈地缘结构上的变化。在尽没汉军两万精骑之后，匈奴方面的欣喜之情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乘势南下，这位新任单于估计都会觉得对不起自己。要知道，刚刚过去的冬天，匈奴方面遭受了巨大损失。面对已经出现分裂迹象的草原帝国，新接任的单于也需要向他的臣民证明，帝国还是能够帮助大家获得额外补给的。



戈壁阿尔泰山地缘结构图

当围歼汉军的匈奴主力迅速南下时，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汉军刚刚筑就的“受降城”了。而拔除这个横亘在南下道路上的眼中钉，也就成为了匈奴主力接下来的任务。不过，围攻一个设施完备的军事据点，并非是草原轻骑兵的特长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孤悬塞外的据点，汉军很显然已经为之准备了充足的军资、给养(并且选址的地方不会缺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想在短时间内攻破受降城，是很难做到的。



事实上，汉帝国也并没有指望一个受降城就能阻挡住匈奴，这个军事据点的价值更多在于预警。如果能够迟滞匈奴人南下的速度，当然就更好了。有鉴于此，匈奴人也并不愿意在受降城下纠缠过久，以给汉朝方面集结主力出击的时间。快速南下，劫掠那些农业区才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在围攻受降城受阻之后，匈奴主力很快便暂时放弃了拔除这颗钉子的想法，而是快速南下劫掠汉朝的边郡。

匈奴人这次南下，到底给汉朝边郡造成了多大损失，并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对于双方来说，这并不是重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降城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围绕这个突出部，汉、匈两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并对汉匈战争的走向造成了深远影响。

### 第三节 受降城对匈奴南下的影响

尽管受降城只是一个深入戈壁的据点，并不具有直接的攻击力，也无法阻挡匈奴人南下。但在自己视为屏障的戈壁深处，让对手在自己的南下线路上有这样一个飞地，始终会让匈奴人如鲠在喉。这意味着，匈奴人每次从戈壁阿尔泰山一带南下时，汉军都有可能得到充足的预警时间（驻守受降城的汉军，会以此为据点，派出斥候向四周侦听匈奴动静的）。

受此影响的，并不仅仅只有试图南下攻击河套地区的匈奴右翼部落。前面也有朋友问了，通过漠北之战，我们已经清楚了匈奴左、右两翼南下漠南草原的主要路径，那么匈奴单于本部又如何南下的呢？是否从戈壁腹地横穿而过？对此我们只能说，的确有可能从中线穿越。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蒙古戈壁因为地势的原因，内部其实是有很多泉眼的。尽管总体水草状况不佳，但还也能养活一定数量的游牧人口。只要熟知这些水草的位置，对于一支机动部队来说，快速穿越并非做不到。

当然，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单于分别在杭爱山、肯特山设庭，其本部大部分时候应该也同样会沿戈壁左、右两侧南下。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南下攻击的是雁门、代郡的话，那么单于本部很可能就会与左贤王部一起，切入锡林郭勒草原；而如果此次南下的目标，是云中、定襄的话，那么沿戈壁阿尔泰山，会同右贤王部一起南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虽然作为匈奴核心的单于本部貌似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在漠北之战后，浚稽山——夫羊句山——受降城路线，却几乎成为了其南下的专属总线。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在乌桓选择脱离匈奴实际控制后，匈奴势力范围开始整体西移。在基本放弃对燕山防线的攻击之后，之前由本部所负责的云中——代郡一线，转由左贤王部负责了；至于右贤王部曾经苦心经营的“河南地”及对应的阴北草原，则成为了单于本部的攻击区。也就是说，受汉帝国营造“受降城”直接影响的，并非原先一直循此路线南下的右翼部落，而是单于本部了。

有鉴于此，在赵破奴兵败，匈奴主力再次大举入寇的第二年（公元前102年），那位“儿单于”就迫不及待的又一次组织力量，准备南下拔除这颗眼中钉。然而悲剧的是，在行军的路上，这位上位仅仅三年多的单于便病死了。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单于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大位更迭所透露的地缘信息，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在儿单于身后，继承单于之位的，是他的叔父“右贤王”（句黎湖单于）。也就是说，匈奴左贤王一直作为单于第一候选人的政治规则，在这个时候被明确打破了。

当匈奴帝国的重心开始整体向西倾斜时，左翼被边缘化的趋势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角度说，右贤王开始“越位”参与角逐最高权力，也是大势所趋。从战术上看，这也许又是汉帝国通过外交手段，施展纵横之术的契机。然而从战略上看，我们却会发现，在经历过左大都尉叛乱、赵破奴全军覆没，这一系列事件后，汉、匈之战的形势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了。

一方面汉军在十年战争中所展示出的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从心理层面上打破了；另一方面，内乱也让匈奴人帝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再困守于漠北，这个游牧帝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新的单于想坐稳位置的话，他们就必须带着部族南下攻略汉地，收割物资、人口。因此在公元前102年秋，匈奴完成权力交接后，阴山一线的云中、定襄、五原、朔方诸郡，再一次拉响了警报。

在匈奴发起的这一波秋季攻势中，负责攻击阴山一线中、左部落还是收获颇丰的（除抢夺物资以外，还杀掠了数千人）。面对急于复仇的匈奴人，驻守这些边郡的将领均未能取得胜利。当然，对于这一切，汉帝国也并非没有准备，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匈奴人已经不甘于困守漠北了。只不过，为了彻底防卫阴山防线的安全，汉武帝此时正在谋划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件：修筑外长城。

#### 第四节 汉帝国在阴北草原修筑外长城

长时间以来，汉帝国所倚仗的防御核心就是从秦帝国那里所继承的“秦长城”。在河南、漠南之战后，这些依山而建的长城防御体系也得到了全面修复，变身成为了“汉长城”。无论从选址，还是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来看，这些最早由赵、燕两国修筑的长城，无疑都是最合理的选择（所以秦人也并没有另起炉灶）。这条长城既可以凭借山势增强防御力，又相当于拉出了一条农、牧分割线，将有机会成为农耕之地的土地纳入了防线内侧。

然而这样一条防线也有它的弱点，那就是将漠南草原变成了“塞外之地”，放手交给了游牧民族。如果没有合适的第三方游牧部落缓冲匈奴人的话，这片横亘于阴山——燕山之北的草原，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匈奴人南下的跳板。理论上，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修筑新的长城防线，将漠南草原也变成“内地”。这样的话，



刚刚走出戈壁的匈奴人,在没有得到充足水草补给的时候,就会遇到汉军的强力抵抗。即使他们能够突破这道防线,内长城防线也能够得到充足的预警时间了(而且突至内长城的匈奴人,还会被外长城的守军抄后路)。

从技术上看,这种想法无疑是十分疯狂的。因为为了节约资源、增强防御力,城防体系总是会依山伴水而建。对于特别善于筑城以自守的农耕民族来说,这几乎是一条金科玉律。在草原地带修筑如此漫长的长城防线,先且不论成本如何,单就防线本身的防御力来看,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然而,汉外长城终究还是修筑了。事实上,受降城的修建本身就是修筑这样一条新防线的开始。即使匈奴人不视其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帝国也不会把防御匈奴入侵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点上的。公元前102年初,也就是儿单于病亡,匈奴人又一次大举南下的那一年,汉帝国开始了这项为阴山防线上“双保险”的伟大工程。



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之所以说是为阴山防线而建,是因为在有乌桓人协防的情况下,在锡林郭勒草原一线修筑长城的意义暂时不大。另外燕山山脉本身的自然防御力也要更强。匈奴人即使在这个方向侵扰,也很难深入到华北平原。相反,阴山一线的防御力就要薄弱得多了。恒山山脉——陕北高原——陇东高原以北地区,都曾经被匈奴深入甚至驻足。

由于负责修筑汉外长城的官员是光禄勋(官号)徐自为,因此这条新防线也被称之为“光禄塞”(非“光禄城”)。从地缘位置上看,光禄塞所保护的,就是在匈奴河南地基础上建立的“朔方”、“五原”两郡。其西起于受降城西的“卢朐山”,东与云中之北的阴山长城相接;西境则向南与居延塞长城、河西长城相接。为了增加防御的层次,帝国甚至在阴山(乌拉山)——狼山之北,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在阴山山脉的北部边缘;另一道则更加接近今天的中蒙边境,并直接与今天蒙古国境内的受降城相连。

仅仅是一个受降城，就已经让匈奴人（尤其是单于本部）非常难受了。现在，汉帝国又准备修筑如此变态的防御工事，彻底阻绝单于本部渗透漠南的可能性。对此，匈奴人自然是无法容忍的。为此，在光禄塞开始修筑的当年，也就是匈奴人大举入寇汉境的公元 102 年秋，刚刚劫掠完汉朝边郡的匈奴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很快带着战利品回到草原之上。而是尽可能的在回撤的同时，破坏汉帝国刚刚修筑的外长城防线。



汉长城遗址



阴北草原长城遗址

很显然，在匈奴人的这次秋季攻势展开时，光禄塞并未完全修筑好，也未能有效阻挡匈奴人的南下。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匈奴人只要有机会再次南下突破防线，都一定不会忘记对它进行一番破坏。然而，我们并不用怀疑光禄塞及汉帝国全新修筑的其他“外长城”（河西长城），在汉匈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至于它在技术上到底是如何做到有效防御匈奴，又是否真的能让匈奴人无法接近农耕区，我们后面再分析。

有朋友说了，在过往的历史中为什么很少见到汉外长城的资料。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横亘于草原上的长城，维护起来的难度的确有点高。在阴北草原没有办法变成农耕之地的情况下，后世王朝更倾向于在秦长城的基础上翻新出自己的

长城体系。在没有持续使用的情况下，即使后世在草原上见到那些风化严重的汉代长城踪迹，也很难将之与“长城”这样的带有连续性的防御体系联系在一起。

感谢技术的进步，今天的我们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遥感技术，一窥汉外长城的全貌了。如果对照《汉·漠南之战示意图》中所标定的汉外长城位置，你甚至能够在





英国探险家发现的古长城（蒙古国境内）



成吉思汗边墙（金长城遗址）



金长城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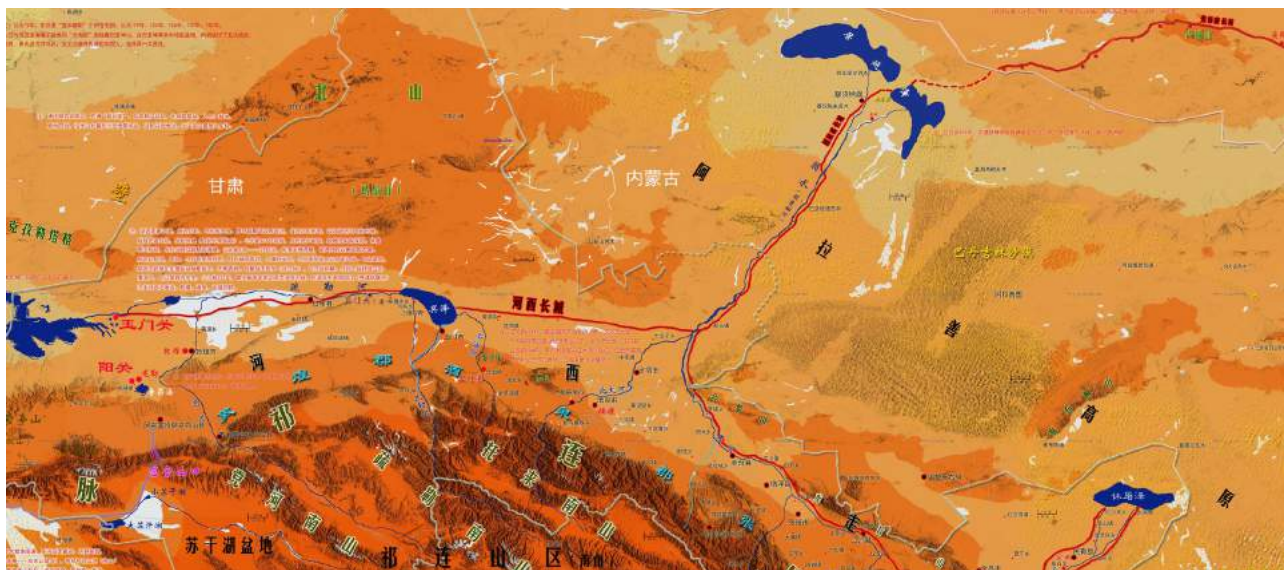
谷歌地图（卫星图）上，自行找到它们的痕迹（包括每一个屯兵的戍堡位置）。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惊讶的发现，原来史书所记载下来的“光禄塞”竟然如此的壮观，以至于完全让匈奴人无法染指阴北草原地带。

并不能说在汉代以后，就没有王朝试图在草原上修筑过长城。在不被视为中华正朔的金朝，以及同为马上民族的女真人，甚至修筑了比汉外长城规模更为庞大的草原长城。它的东境甚至一直抵达大兴安岭的西麓。曾经有朋友问道，即使匈奴与突厥，其强盛期貌似都对应了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那么最为强大的草原帝国——蒙古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又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原的压力呢？

如果我們去看下女真人在草原上修筑的长城体系，应该就能感受到蒙古人的祖先们所承受的压力了。尽管金朝实际上只统治有半个中央之国，但边缘民族的身份却能够帮助他们给予草原更大的压力，尤其是与其祖地隔大兴安岭相望的，为蒙古人崛起之地的蒙古高原东部（金长城就是具体的体现）。事实上，成吉思汗的祖父俺巴孩汗就是死在金人手中。当然，这些历史并非我们今天的解读方向。现阶段提到金长城，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对于一个以农为本的中原王朝来说，能够在草原之地修筑长城体系，是需要多么大的魄力。从这一点来说，光禄塞的修筑不仅算是空前，也可以说是绝后了。

相比无山、水可依的技术障碍，远离农业区才是汉外长城未能延续下来的

首要原因。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外长城”，如果指的是秦长城以外由汉帝国在那些游牧之地修筑的长城的话，那它就不仅应该包括阴山北麓向西延伸至今天蒙古境内的这道长城体系（光禄塞），还应该包括庇护河西走廊的“河西长城”了。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河西走廊看到明朝修筑的长城，并将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的西部起点，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片原来的游牧之地，水土气候能够适应大规模农业生产。也正是因为有了农业人口的支撑，河西走廊这个西北突出部才能够成为华夏核心区的一部分。



汉西域全图

## 第五节 外长城防御匈奴的技术手段和效果

在草原之上修筑长城，技术上的难度就是无险可依。为此，无论是后来被民间称之为“成吉思汗边墙”（蒙古后裔自然希望将之与自己英雄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金长城，还是二千多年前的汉长城，基本上都是就地取材，以夯土的形式修筑而成。为了增强防御力，大都会会在草原长城之外，再挖掘一条壕沟。单从建筑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是十分经济的。那些从壕沟中挖掘出来的泥土，正好可以成为兴建边墙的建筑材料。今天，我们在一些平原地区兴建公园时也能看到类似做法。一挖一堆，湖光山色便都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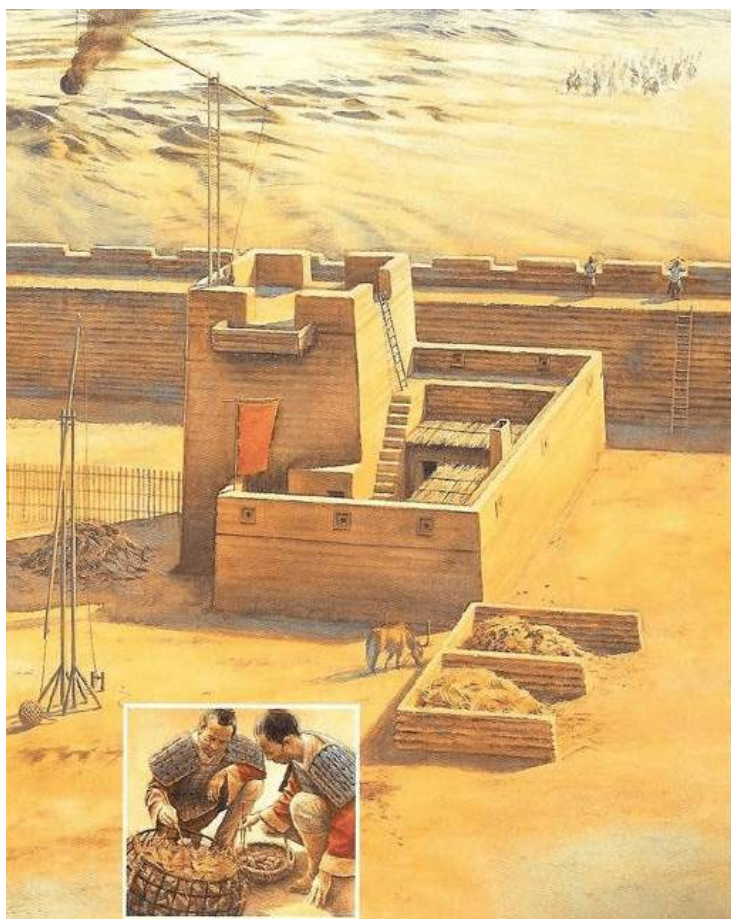
当然，尽管能够依靠壕沟与边墙之间的高度差，巧妙的增强了草原长城的防御力，但在延绵千里的草原之上，这样一条长城能否能有效阻挡游牧民族的进攻，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修筑复线，也就是不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一道边墙上。事实上，即使不在草原上，这种复线、网络化的防御理念也贯穿于其他不同时期的长城中。也就是说，长城从来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一道连续的墙，一道能够



将游牧民族完全抵挡在外面的墙。

真正让匈奴人感到头疼的，是遍布于长城沿线的戍堡、烽火台（烽燧）。通过烽火这种通信形式，游牧民族前来侵袭的消息甚至规模，能够很快就传至后方，并使得农业区有充足的预警时间。如果长城与农业区的距离非常接近的话，匈奴人和后世的其他游牧民族当然有机会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能力，抢在农业区做出有效反应之前，就攻击得手。而将长城体系修建在草原之上，并增加复线，无疑让汉帝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坚壁清野，并集结军力反击了。

总的来说，汉帝国兴建外长城之举，对于防御匈奴入侵是非常成功的。当这一套防御体系运转成熟之后，匈奴人能够攻击农业区得手的次数就很少了。这也使得匈奴人的经济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在漠北之战过去一甲子后（公元前 57 年），匈奴内部出现了五单于争位的情况。



汉长城

上决心再次南下（尽没赵破奴军后），通过扩张来维系帝国向心力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焦点并不仅仅在天山南北。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向南重夺河西走廊，切断汉帝国与西域这条狭长的战略通道，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真能做到的话，不仅能够将西域作为自己的后院，更能对汉帝国的西部防线造成巨大压力。

当然，让匈奴帝国彻底走向衰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打造成功光禄塞长城体系，以及让乌桓人游离出匈奴帝国的控制，成为汉、匈之间的缓冲“国”。这两条防线建立的价值，在于有效的保护了汉帝国的核心区，使得匈奴人无法在阴山——燕山一线获得利益。然而对于一个横跨蒙古草原的游牧帝国来说，他们的利益所指，并不仅仅是中央之国核心区。在东部经济被迫大幅压缩的情况下，西域成为了他们获取额外利益的空间所在。也就是说，如果汉帝国想彻底瓦解匈奴帝国的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也必须得到有效推进。

推进“断匈奴右臂”战略的话，西域无疑将成为汉、匈两国争夺的焦点。然而在匈奴人战略

对于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匈奴方面当然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如此，在重新分配战区之后，河西走廊成为了匈奴右贤王主力的重点攻击方向。然而清楚这一点的，并不仅仅是匈奴人，汉帝国也同样明白据守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除了加紧移民实边，将草原变成为农田这样的战略动作以外，一条保护河西走廊的“外长城”——居延塞，也与光禄塞同时开始兴建了（公元前 102 年）。也就是说，当匈奴右贤王部开始南下攻击河西走廊时，他们将在相同的纬度上，遇到和单于本部一样的麻烦。至于汉匈在河西走廊乃至西域一线，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三十七章 汉帝国在西域和河西走廊的行动

### 第一节 汉帝国和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

基于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霍去病两战河西之后，汉帝国就开始将长城从河西岸向西域方向延伸了。如果把首尾相连的城墙作为长城的基本特征，那么河西长城的西部终点应该在罗布泊与玉门关一带。而如果把间隔存在的烽燧也视为长城一部分的话，那么汉长城的最西点，就可以延伸至托什干河谷（尉头国）境内的别迭里山口了。汉帝国到底是什么时候修筑完河西——西域长城体系的，并不十分确定。不过长城从来都不可能带来绝对的安全，如果帝国想和匈奴在西线一决高下的话，主动出击是必需的。

从漠北之战起，至匈奴儿单于上位止（公元前119年——前104年），汉匈之间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安宁期。汉朝方面利用这个空当期，解决了除匈奴之外的所有边缘板块。而匈奴方面其实也没有闲着，西域成为了他们与汉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主战场。也正是因为自己所经略之地成为了匈奴帝国的主要扩张空间，右贤王的势力才得以在之后成为草原最高权力的有力争夺者。

尽管汉帝国开辟丝绸之路为西域国家带来了新的利益，但鉴于匈奴人长期以来军事威胁，西域国家在政治上还是更倾向于听从匈奴人的号令。如果汉帝国不适时的展示一下军事实力，仅仅依靠胡萝卜的话，是并不能让他们真心臣服的。

发生在西域土地上的第一场战事，始于公元前108年，由赵破奴领军发起的楼兰、车师之战。由于地缘位置正处于汉、匈两国势力交汇之处，楼兰、姑师（战后改名车师）两国所处的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三洲、吐鲁番盆地，也成为了汉、匈两国长期争夺的天王山。也可以说，谁能够真正掌握这两个板块，谁就能够取得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不过这次战争的胜利，却还不足以让西域诸国倒向汉帝国，因为接下来匈奴人也要发力了。

当匈奴人完成最高权力更迭，并重新划分战区时，汉匈战争也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夫羊句山俘获四年前大破楼兰、姑师的赵破奴，就是试图重振雄风的匈奴人给汉帝国的一个下马威。以地缘结构来说，汉、匈两国的西线战场，应该分布于从博格达山（吐鲁番盆地北）到乌峭岭（河西走廊东）之间的区域内。然而此时的汉武帝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那就是远征大宛（公元前104年）。

关于李广利远征大宛缘由、过程，我们在解读张骞出使路线时，已经作过详细解读了。从结果上看，这当然是一次成功的带有战略性的军事行动。此后，西域诸国即使还是迫于压力不得不与匈奴联系，但外交的天平却已经开始倒向既有胡萝卜，又有大棒的汉帝国了。不过，这次远征始终是一次极其冒险的旅程，汉帝国也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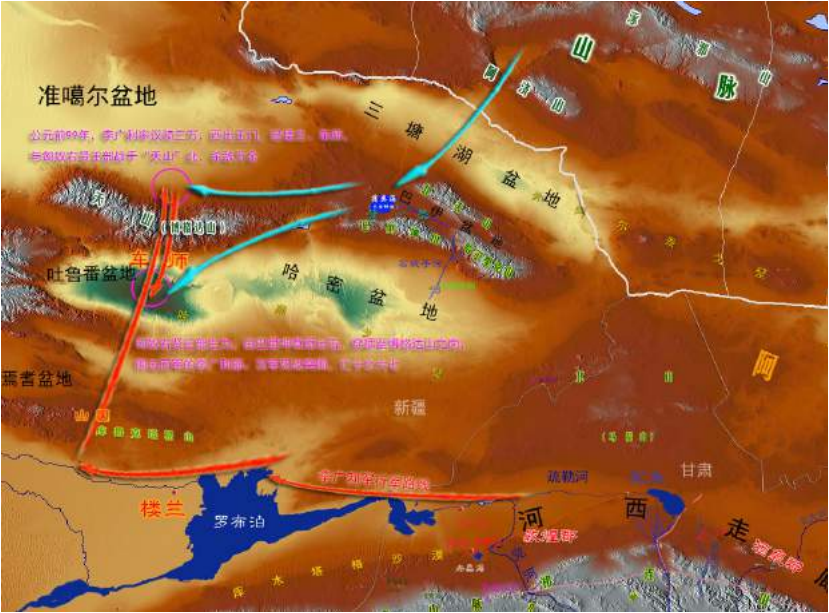
了远征漠北的人力、物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在第二次大宛之战（公元前 102 年）中征服大宛。

不管大宛之战对汉帝国经营西域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就汉、匈战争而言，双方战场的西部起点，却始终应该定位于博格达山之南的吐鲁番盆地。以国家来定位的话，就是车师了。为了争夺这个西域门户的控制权，汉帝国前后最起码进行了五次战争。而公元前 99 年的“天山之战”，则正式拉开了汉匈西线战场的序幕。

## 第二节 李广利在天山之战遭匈奴伏击

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山”，一般说的是从吐火罗盆地至河西走廊的“天山山脉”，但当年匈奴人口中所称的“天山”，所指代的则是博格达山。从地缘结构来看，博格达山不仅是广义南、北疆的一个地理分割点，也是一条农牧分割线。由于此时匈奴人已经开始重新进入战争状态，并通过尽没赵破奴军重拾信心，因此车师也成为了匈奴人势在必得的跳板。

可以肯定的是，匈奴人对于重夺车师控制权是相当重视的，集结于吐鲁番——哈密盆地之北的，不仅是右贤王部主力，也包括右贤王本人。以农耕民族的特点和博格达山南北的环境而言，汉军比较务实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控制博格达山之南的吐鲁番绿洲，然后隔博格达山与匈奴人划分势力范围。然而大宛之战的胜利，让汉武帝再一次强化了与匈奴决战草原的信心。正因为如此，远征大宛胜利归来的李广利，其出征的方向并非“天山”之南，而是“天山”之北。也就是说，汉军希望能够挟大宛之战的余威，一战而解决匈奴对车师的潜在威胁。



汉·天山 / 浞稽山之战示意图

在这场战役中，车师的态度并不重要。基本上，处在这样的地缘位置，他们只能根据战争的结果来选择自己的外交策略。从最初的战果来看，车师人应该已经决定倒向汉朝一方了。因为率领三万骑兵攻击至博格山北的李广利，在这场草原决战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斩获上万。然而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穿越博格达山准备回师河西走廊的



汉军，遭遇到了匈奴主力的截击。

伏击汉军的匈奴右贤王主力，应该来自于哈密盆地之北的“巴伊盆地”。关于这个盆地，以及与之相关的巴里坤山、巴里坤草原，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简单点说，这片草原才是匈奴右翼在天山北麓的基地所在。如果汉军真想与匈奴人在西域决战于草原的话，就应该将攻击的目标定位于巴里坤山之北，而非博格达山之北。只不过，这样一个攻击方向，最大的问题就是哈密盆地在当时并无绿洲国家存在。汉军沿此线攻击的话，将更长时间的暴露于戈壁之中。

当李广利与匈奴人战于博格达山之北，并初战告捷时，匈奴真正的主力应该已经从巴里坤草原向南越巴里坤山，穿插到了博格达山之南，等待截击回军的李广利。这场伏击战的结果就是，被匈奴人包围的汉军，在损失了将近七成的兵力之后，才得以突围回到河西走廊。换句话说，汉军先发制人所发动的这场“天山之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可以想见，在汉军铩羽而归之后，车师肯定又成为匈奴人的附庸了。至于险些全军覆没的李广利，自然也是灰头土脸了。然而此时的汉武帝，所焦虑的却并非西线战场的失利，因为与此同时在另一片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才更加让汉、匈双方为之震动。

### 第三节 李陵请求出塞征战的考虑

以国家和军队的组织性来说，农耕政权比之游牧民族来说，显然要高出几个层级。每一场由汉帝国主动发起的战役，也都会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像漠北之战的六万骑兵身后是数以十万计为之转运粮草的步卒一样。这一次，为了准备天山之战，汉武帝准备将为李广利提供后援的任务，交给另一名李姓将领——李陵。

这已经不是李陵第一次为那位皇亲国戚做支援了。在李广利西征大宛之时，李陵就曾经承担过类似的任务。作为汉军中最为悲情的将领李广之后，李陵本人自然是很不满意这样的安排的。因为以汉军的军功爵制来说，如果想获得封赏，就必须在前线有足够的斩获。至于后勤工作，基本只是做好了无过（或小功），做差了有罪。

事实上为了重振家族雄风，在李广利远征大宛之前，李陵本人已经带领五千从荆楚遴选来的勇士，在河西走廊练兵以等待战机。在此期间，不仅这支部队的战术配合、战力已经整合到了相当强的程度。李陵本人亦北出居延，率八百骑深入匈奴境内二千余里，以考察匈奴境内的地形情况。

有鉴于此，当汉武帝又一次命令李陵为他的大舅子押送輜重时，绝望的李陵只能冒着极大政治风险向上请命叩头，希望亲率自己所训练的五千精兵，面向匈奴单于本部开辟第二战场。这样的话，不仅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亦能够分担主力汉军正面的压力。对于李陵的这种抗命行为，汉武帝自然是有些恼怒的。不过这并不代

表他不认为李陵是个人才。然而就其个人来说，更愿意将汉军主力的指挥权，交给那些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外戚手中。而卫青、霍去病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这种用人之道。

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如果李陵能够取代李广利得到帝国的全力支持，并非没有可能成为霍去病第二，并再次成功发起一场漠北之战。不过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再做假设，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实的结果就是，汉武帝答应了李陵的请求，但同时也表示没有马匹提供给李陵。

汉军之所以能够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逆转形势，除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以外，通过实施马政以获取和匈奴对等的机动优势，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因素。然而和其他军用物资一样，马匹本身也是消耗品。尤其像远征漠北、大宛这样的军事行动，其消耗就更大了。由于在天山之战前二年（公元101年）刚刚结束了大宛之战，加上李广利本身的管理原因，帝国此时已经没有太多战马储备了。为李广利部三万骑兵所提供的马匹，已经是汉军能够征调的全部机动力量了。

为了帮助李陵开辟第二战场，从承担正面攻击任务的李广利部抽调战马，并不现实。而汉武帝显然也不相信在表明无马可调之后，李陵还会继续请命出塞，攻击单于本部。谁都能想象到，如果没有机动能力的话，深入漠北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然而一直蓄势待发的李陵却并没有就此收回请求，而是进一步表明，即使是只有步兵也愿意北出大漠，攻击单于庭。

事已至此，汉武帝已经没有理由再阻拦这支计划外的偏师了。另外，就以往的经验来说，在主力战场之外，再开辟第二甚至第三战场，以牵制匈奴其他方面的力量，也是常态。当然，鉴于这个计划实在太过疯狂，汉武帝在感慨李陵之勇的同时，也并不愿意白白将自己的五千精兵送入虎口。另一支由原来的伏波将军“路博德”所率领的汉军，受命成为了李陵军的后援（此时因获罪被贬为“强弩校尉”，在居延泽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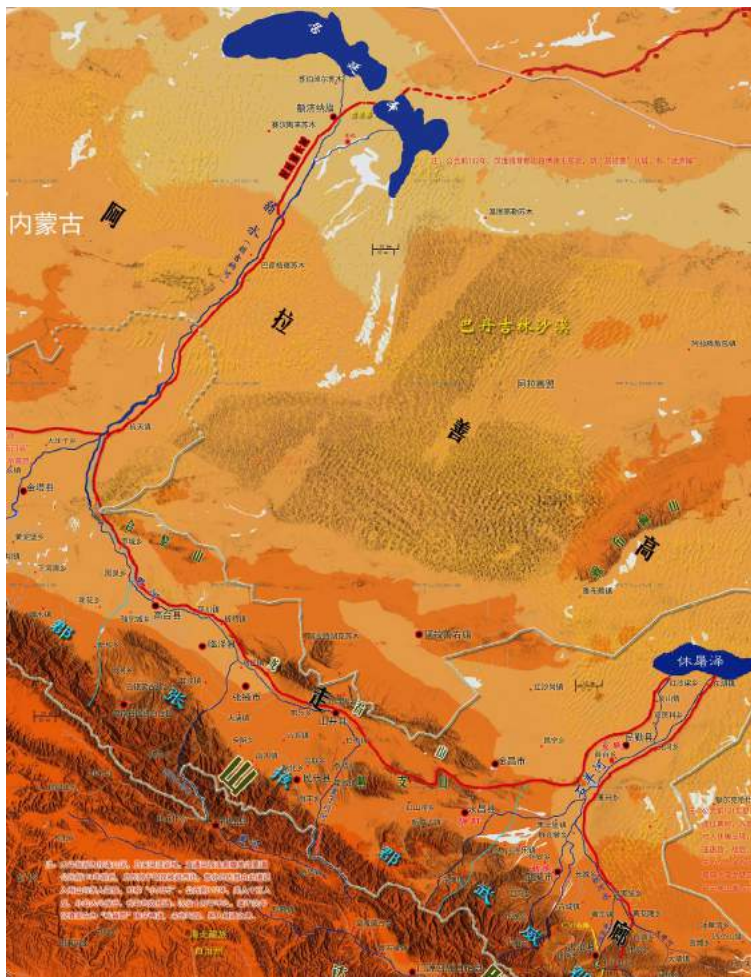
然而曾经受封伏波将军的路博德，同样不愿意做别人的后援。而他上书反对此项计划的理由是：此时正值匈奴秋高马肥之际，希望能等到来年春，再与李陵各率五千骑兵分两路出击东、西浚稽山。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大获全胜。

从战术的角度看，路博德的计划应该说并无不妥之处。春季向来才是汉军主动发起攻击的窗口期。如果等到来年的话，结束天山之战的汉军主力，应该也有足够的马匹配给李陵、路博德两路军（二人所率领的为河西驻军）。另外就汉军之前的出战记录来看，每次出征也都是以万骑为基数。在一千多年后，契丹人曾经用“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来形容女真骑兵的战力。这一说法也印证了一个概念，即如果训练有素的话，一支人数上万的骑兵部队，是有可能纵横草原的（霍去病一征河西，也不过万骑）。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终是按照汉武帝的计划，还是路博德的计划实施，李陵



的这次出征都将全身而退，并取得不错的战果。只是之前已经被李陵说动的汉武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一次因为将领的反对，而改变计划了（不管这个计划是否更为合理）。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李陵畏战，而鼓动路博德上书。汉武帝有此怀疑其实也不为过，毕竟李陵的计划太过疯狂。即使霍去病再生，想来也不敢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腹地。如果在一时冲动后反悔，也属人之常情。



汉西域全图

使其成为了帝国西北的第一道防线。

如果说受降城及以其为原点延伸的光禄塞长城，是汉帝国保护朔方（河南地）的前沿阵地的话，那么居延塞就是河西四郡防御漠北匈奴南下的桥头堡了。通过之前的解读我们得知，黑水（额济纳河）与石羊河，是祁连山麓延伸入阿拉善戈壁的两条生命线，并在它们的终端形成了居延、休屠两泽。理论上，如果匈奴人试图从漠北草原南下河西走廊的话，就必须借助这两条河流。不过，石羊河的长度显然远不如黑水，居延泽的面积也比休屠泽大得多。最终能成为双方博弈焦点的，只有今天中蒙边境之南的“居延泽”。

居延塞以及黑水之于河西走廊地缘安全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它是河西走

不管李陵此时是否真的觉得路博德的计划更为稳妥，他和他的五千步兵在公元前99年秋出征漠北之事，已是不可更改的了。当然，后面我们会分析到，李陵敢于以五千步卒出征，也并非一时冲动。他的确也为这次战役做足了准备，并且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现在，我们需要先从战略角度来解读一下李陵计划中的出击路线了。在历史记录中，李陵出征的起点，就是著名的“居延塞”。所谓居延塞，顾名思义就是建于“居延泽”旁的长城。在阴北草原边缘的光禄塞修筑的同时（公元前102年），被降级屯军于居延的路博德，也受命修筑了居延塞。最终将大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居延塞和光禄塞连接起来，

廊最接近匈奴腹地的绿洲带。当我们沿黑水河向祁连山方向溯源的话，就会在张掖市的西南部，找到通往“南山”（祁连山区）地区的孔道——大斗拔谷。

我们知道，除了当年通过大斗拔谷逃入南山地区的小部分月氏人外，覆盖祁连山及整个青海地区的部族，是与华夏民族地缘关系密切的“羌人”。然而正是由于这层看起来应该更为亲近的关系，却让羌人更愿意与游牧草原的匈奴人结为战略盟友（张骞被羌人交给匈奴人，就是明证）。

#### 第四节 汉帝国对羌人领地发动攻击

对历史略有了解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能随口说出某些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首领的名字（最起码应该知道成吉思汗吧），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在记忆中找到某个强大“羌”人部落首领的名字。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羌人整体上也可以被归类于游牧民族，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他们与匈奴人的经济结构却有显著区别。

无论在黄土高原还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原始草原的形态都不是以那种我们印象中的，如“瀚海”般一望无际的形态存在的。复杂的地形，将整个羌人覆盖区分割成为了诸多小型地缘板块。因为地形的原因，每一条河谷的上、下游地区都拥有足够大的落差。而海拔差异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气候、环境的多样化。如果一个部落占据一条河谷的话，它既可以在中、上游地区游牧牲畜，又可以在海拔较低的下游冲积平原尝试原始农业。

在游牧经济之余，补充进对土地利用率更高的种植经济，使得羌人的自给能力，以及抗灾害能力（有余粮）都要强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也使得他们劫掠农耕区的动力（压力）要远低于匈奴人。实际上，如果占据一条河谷就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的话，羌人甚至会缺乏彼此之间形成部落联盟的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各自为政的分散地缘格局，让精于合纵连横、以夷制夷之策的中央之国，得以一步步的蚕食羌人的领地。

相比游牧经济，种植业对技术的要求要高出许多。我们并不能指望一个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部落，像东亚核心区的农民那样精耕细作。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在春天把种子播撒于水、热资源适于作物生长的土地上。等于秋天移牧于此时，再进行收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一定会有人发现，如果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种植业上，通过对水、土的适当改良，就能够获得成倍的收益，并因此而养活更多的人口。事实上，华夏民族最初也正是沿着这一轨迹，逐渐变身成为纯粹的农耕民族的。

当脱胎于原始西羌的华夏农耕民族开始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后，他们对那些羌人领地的威胁，要远大于匈奴人所占据的北方草原。因为掌握更先进农业技术的中央之国，并无法让北亚地区变得更热一些。但对那些水、热资源都符合要求的羌人



之地（如河湟谷地）进行水利改造，以变成中央之国的新移民区，却是华夏农耕民族的强项。

通过前面的分析大家应该明白了，如果汉帝国决心渗透羌人控制区中的下游河谷地区的话，会对羌人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多大影响了。在汉、匈十五年的休战期中，包括朝鲜、闽越、南越、西南夷、氐人、楼兰、姑师……等在内的所有边缘民族，无一例外的都因为各种理由，成为了帝国的征伐对象。至于本身就与华夏民族地缘关系紧密的羌人，自然也不能幸免。公元前 112 年 11 月，帝国集结了十万兵力向西攻击羌人在祁连山南的领地，并获得了胜利。

羌人受到攻击的直接理由，是因为他们在前一个月集结了十万人众北上攻击了河西走廊。而汉帝国认为羌人北上的原因，是想打通与匈奴相连的黑水通道。就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羌人也有希望匈奴人回到河西走廊的动机。不过他们选择的时机并不太好。如果他们再等十年，并事先与匈奴相约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好。不过，以汉帝国在这一阶段对边缘部族的密集军事行动来看，即使羌人没有想着先发制人，也几乎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汉军的攻击对象。

之所以说羌人晚十年再北上的话，机会可能会更好，是因为在公元前 102 年，在前一年尽没赵破奴军的匈奴人，终于开始了全面反击。在这一年秋，除了南下攻击受降城以及朔方、五原两郡的匈奴单于本部，因单于半道病亡（儿单于）未完成自己战区的攻击任务以外。匈奴左、右两翼都分别在自己的攻击方向，侵入了汉朝的边郡。在这次攻击中，左贤王部所劫掠的是重新分配给他的云中、定襄两郡，而右贤王部的攻击目标，就是正在修筑的居延塞以及整个黑水流域（张掖、酒泉两郡）。

匈奴右贤王部在这次攻击中，到底攻入居延塞及黑水流域多深，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最终匈奴人却并没有从河西走廊带走他们劫掠的人口、物资，因为这些损失被随后出击的汉军尽数夺了回来。尽管汉军对匈奴多有胜绩，但能够在匈奴得手之后，马上反制成功的案例却并不多见。右贤王部这次只能说是运气不好，因为此时的汉武帝正将最精锐的汉军集结于河西走廊（仅步卒就有十八万），以支撑驻军于玉门关外的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

考虑到这层因素，即使羌人在公元前 102 年与匈奴相约攻击河西走廊，下场也应该不会太好。当然，这本身也不是我们分析的重心了。通过上述分析，进一步明晰居延塞的地缘价值，才是目的所在。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居延塞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居延塞与光禄塞一起在后来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将试图南下的匈奴人有效阻挡在了戈壁腹地。

然而对于准备主动出击的李陵来说，路博德所修筑的居延塞却完全帮不到他了。孤军深入敌境的五千汉军，只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那么离开居延塞保护的李陵，接下来又将怎么走，又是在哪里与匈奴接战的，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三十八章 李陵与匈奴进行浚稽山之战

### 第一节 李陵到达浚稽山后的行动计划

从居延塞向北出击，李陵部就进入茫茫戈壁中了。要是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这支五千人的汉军，很快就“出国”了。能够为李陵指示方向的，就是在之前战役中多次出现的“戈壁阿尔泰山”。再具体点的话，就是受降城、夫羊句山所处的“古尔班赛汗山区”。不过与漠南、漠北之战中卫青部的出击路线不同，北出居延的汉军，并不用经过夫羊句山。最先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山地，是古尔班赛汗山西段的“鞑汗山”。在纵穿古尔班赛汗之后，汉军就可以抵达此行的终点——浚稽山了。

按照之前李陵夸下的海口，他此行的终点将是杭爱山东麓的单于庭。如果要执行这个计划的话，那么汉军最终还必须借助一条河流穿越“湖谷”，然后再进入漠北草原。从出击方位上看，李陵计划中穿越湖谷的路径，是从东、西浚稽山之间而过，再沿着姑且水（图音河）北上接入杭爱山区，然后再沿山麓向东移动，最终攻入哈拉和林河谷的单于庭。

然而李陵实际上并没有受命执行此项计划，原因在于汉武帝为他规划了新的路线。汉武帝准许的计划是，李陵率部先北行至浚稽山南，然后再根据情况变化选择新的行动。那里有一条发源于浚稽山南坡，东南流向夫羊句山方向的河流：龙勒水。如果匈奴单于本部真的想在秋高马肥之时向南攻击河套地区的话，那么姑且水——龙勒水，就将是他们南攻受降城及光禄塞的必经之路（枯水季的话，蒲奴水的水量、流程会减少很多）。

据历史记载，李陵部最终到达浚稽山南，共用了三十日时间。这个速度显然是有些缓慢的。今天我们来测距的话，直线交通距离约为六、七百里（汉里）。与当年卫青出塞，攻击右贤王部王庭（受降城）的距离相当。如果让骑兵突击的话，至多也就二三日就能抵达。这个速度显然是十分的慢了。不过考虑到汉军此次是步兵出击，而且是带有大批辎重的重步兵。他们每日的行军里程，最多只能保持在30——60里之间（三十里为“一舍”，每行一舍便停下休息），我们就不能对汉军的行军效率要求太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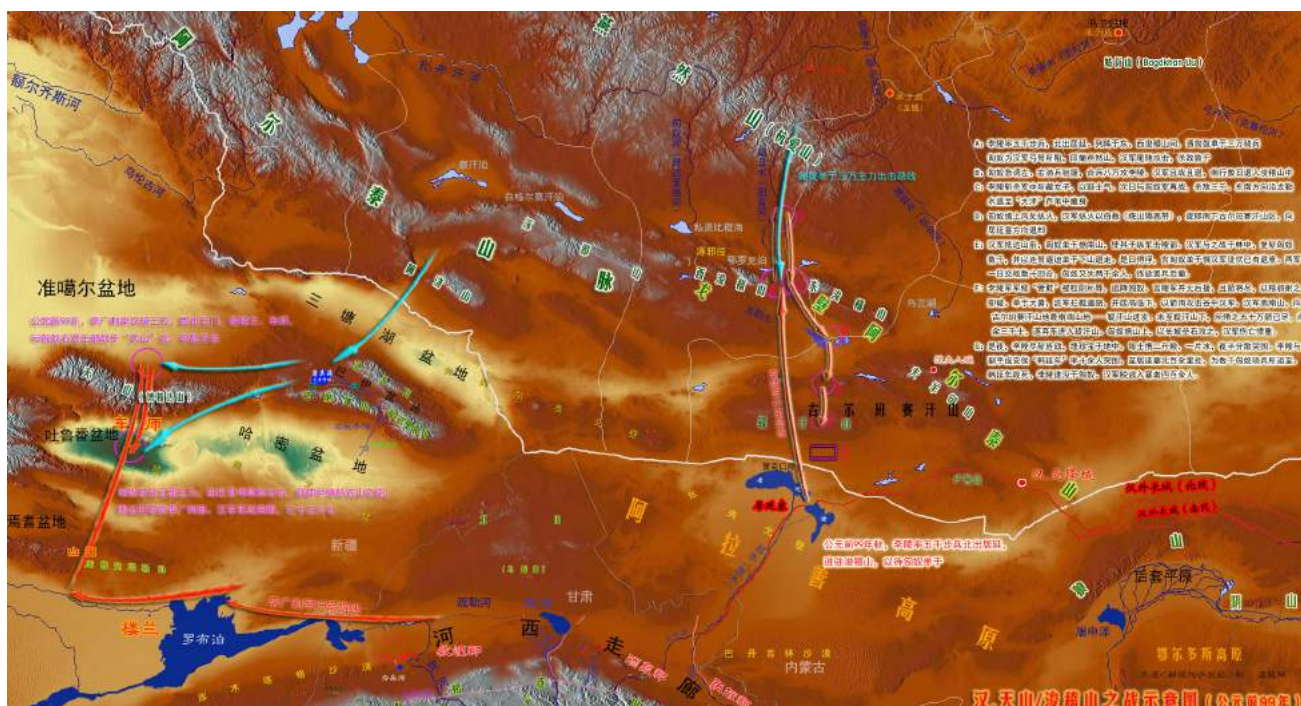
对于一支由步兵所组成的战斗部队来说，保持阵型和充沛的体力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机会在面对骑兵冲击时生存下来。当然，汉武帝无马调配给李陵部，也并不代表这支军队就一匹马都没有了。最起码军事主官和担任侦察任务“斥候”是有马可用的。如果没有侦骑在前面布设预警圈，李陵的步兵战力再强，也很难在行军当中战胜前来突袭的匈奴人。

实际上李陵部到达浚稽山麓的时间，可能并没有用到三十天时间。因为在汉武



帝的计划中，汉军在到达目标区域后，应该在龙勒水一带往来寻找匈奴人的踪迹，并与之决战。也就是说，三十天应该只是汉军出居延后遭遇到匈奴人的时间。如果是汉军比匈奴人提早到达龙勒水的话，将意味着他们会有更多一些的准备时间。

到底是匈奴人先行南下浚稽山迎击汉军，还是汉军抢先一步驻防龙勒水，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最终我们看到的結果就是，李陵部终于在出击三十天后，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大战。实际上，在龙勒水迎战匈奴主力，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计划之一。因为你并无法预知，匈奴人会不会此时南下，又会不会一定从东、西浚稽山之间南下。



汉·天山/浚稽山之战示意图

在汉武帝的计划中，驻龙勒水之后的李陵部，根据情况的变化能够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时髦点将之称为 A、B 计划。A 计划就是，如果在此遭遇到了匈奴人，那么就与之决战，并在战后原路返回；B 计划则是在没有碰到匈奴人之后，出龙勒水向东，沿夫羊句山南麓南下受降城休整。设计这样回程路线的意义在于，如果匈奴单于本部最终是沿蒲奴水穿夫羊句山（峡谷）南下，或者说是在汉军回程之后沿姑且水——龙勒水东南攻击光禄塞的话（因为光禄塞和后套地区才是单于本部的战区），那么李陵这支生力军就可以在受降城帮助守军抵御匈奴人的进攻了。

B 计划的线路，也是当年赵破奴北上接应左大都尉所走的旧路。可惜的是，赵破奴和他的两万汉军，最终在夫羊句山一带就被匈奴所围歼迫降了，并没有机会回到受降城。赵破奴军全军覆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作为一支轻兵突击的接应部队，他并没有预料到会受到匈奴主力的突袭（计划中，匈奴人此

时应该已经阵脚大乱了)。至于李陵部这次看来极为冒险的出征，在技术上却是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也已经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做出了预案。当然，计划似乎永远和现实中的行动存在误差。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陵的失败呢？

## 第二节 李陵军与匈奴骑兵发生激战

李陵遭遇匈奴主力的地点是在东、西浚稽山之间。从这个卡位来看，应该是汉军先一步到达指定地点。至于匈奴人，很难说他们是专门为了这支汉军南下的。毕竟秋高马肥之时，本身就是南下劫掠的好时机。让李陵感到兴奋的是，即将与之接战的正是单于本人所率领的三万骑兵。

选择这样的线路出击，李陵本身也就做好了与单于本部正面交锋的心理准备。在他最初的计划中，甚至包括直捣哈拉和林河谷的单于庭。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所期盼的，因为没有哪项功绩能够比得上斩首单于了。然而对于所有当时和后世旁观此项军事行动的人来说，最大的疑问是，孤军深入的李陵到底有没有取胜的把握。

如果没有任何筹码的话，李陵这样做就是在送死了。很显然，没有人会愿意白白送死。李陵敢于深入浚稽山迎击单于本部的底气在于三点：一是这五千人都是精选出来的壮士，在一起磨合已有数年；二是李陵之前已经深入匈奴境内二千里，对于沿路的地形、水源、草场算得上是了然于胸了。他甚至在这次出兵之后，沿途画出了山川地形，派人传至长安交给汉武帝，以示自己成竹在胸；最后一点是，虽然这五千汉军并没有多少战马，但却拥有足够多的輜重补给，以及承载这些军资的车辆（包括相应的畜力）。这些物资也成为了汉军有信心力克匈奴骑兵的本钱。

所谓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拿破仑曾经在日记中记录过这样一段话：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马木留克骑兵是当时伊斯兰世界，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单兵战力最强的骑兵（马木留克即为奴隶之意）。很多朋友知晓他们，应该是在游戏当中。这些奴隶骑兵最辉煌的战果，就是成功的阻击了蒙古骑兵，避免了阿拉伯世界的沦陷。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百度一下。今天提到这段故事，是因为在长期与骑、射技术俱佳的游牧民族博弈的过程中，汉军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相当有效的，不依赖骑兵的战术、阵法。只要运用得当，他们完全有机会抵挡数倍之敌的进攻，并让对方因难以承受的损失而后撤。

汉军这一“以步制骑”战术的发明者，可以认为是卫青。在漠北之战中，卫青将运载物资的“武刚车”（作战时会包裹皮革，捆绑长矛，以增强防御力）环列为营的做法，就让单于放弃了攻击的想法。当然，那场战役最终能够取胜，也有赖于骑兵的配合。否则即使单于认为无法攻破汉军防线，也自可以率部退入漠北草原，



运用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消耗汉军。

实际上，比较霍去病和卫青，以及李陵的战术，我们会发现，霍去病征战的核心思想在于“比匈奴人还匈奴人”。换句话说，他就是把自己当成匈奴人，完全用游牧民族那种骑兵攻击、取食于敌的战法，对匈奴人进行压迫式打法；而卫青的战法则要保守得多，或者说更加遵循农耕文明长期以来所总结出来的“兵法”行事。

尽管霍去病那种“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做法（包括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确有其积极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战略层面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所生存的地缘环境毕竟有着质的区别，如果不能结合自己的优势，寻找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战法的话，并无可能长期对游牧民族保持骑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李陵以五千步军迎战匈奴数万骑兵的战例，其战略、战术价值就要高于霍去病那几场荡气回肠的战役。

由于在漠北之战中，卫青部有足够的骑兵可用，所以“以步制骑”的战术并没有在卫青手上发扬光大。不过在浚稽山之战中，李陵军却将这一战术发挥到了极致。问题是，在自己熟悉的戈壁、草原上，面对这样一支完全由步兵所组成，人数仅五千的军队，单于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三万铁骑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在发现汉军之后，匈奴人并没有丝毫犹豫，很快便开始冲阵。

然而最初冲阵的匈奴骑兵，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冲到李陵所布的“车阵”之前。因为在长达数年的训练当中，这支由荆楚之士所组成的部队，最重要的训练内容就是射箭。这当然与李陵自己善于骑射，以及李氏家族的门风有关了。不过，真正让汉军在远程武器上占据优势的，还是在于他们的武器装备。之前我们在漠北之战也说了，汉弩在射程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即使单纯比较弓箭的射程，这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汉军用弓所射出的箭，也要远于匈奴人在骑——射状态中所射出的箭。

在李陵军的武刚车阵中，战士并非尽数藏于营内，而是将承担攻击任务的布置于车阵之外，然后再在他们的前面布设一圈相互依托的盾牌手、长矛手，以应对少数冲出箭雨的匈奴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进一步扩大了攻击范围，并且为自己布设了两层防御圈。一旦外围防线失守，还可迅速退入防御力更强的武刚车阵中，建立第二道防线。

可以肯定的是，李陵打造的这一阵法，在后面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匈奴人也始终无法冲阵成功。不过在最初的这波进攻中，那些手持盾牌、长矛的披重步兵却没有机会发挥作用。因为在汉军千弩齐射下，匈奴人很快就后撤了。

匈奴人与其说是被打跑的，不如说是被吓跑的。一方面漠北之战（公元前119年）后的这二十年当中，汉匈之间在前十四年基本没有发生战争；而在公元前104年围歼赵破奴两万骑的战役中，轻骑突进的汉军，也并没有机会让匈奴人尝到箭阵的机会。换句话说，这些前来冲阵的匈奴骑兵并没有经验预感到，自己会在如此远的距离就遭遇到汉军的攻击（其中有些人，应该在漠北之战都还没出生）。更为致命的是，

他们遇到的应该是这一阶段汉军中战力最强的一支军队。严格的纪律性（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以及对射程、速度（包括射速与对手的行进速度）的精准判断，都无疑加大了匈奴人的伤亡。

### 第三节 李陵因匈奴增兵而退军浚稽山

当匈奴人受惊后开始沿来路向燕然山方向后撤时，李陵并没有固守浚稽山，而是开始追击。用步兵追击骑兵，其实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如果匈奴骑兵要跑的话，李陵是无论如何追不上的。汉军的所谓“追击”，更应该被看作是李陵准备执行自己最初的计划——涉单于庭。也就是说，初战告捷的李陵，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深入单于庭所在的哈拉和林河谷。这样的话，即使沿途不再有斩获，仅凭此举就足以名扬汉廷了。

当然，匈奴人是断然不会让李陵部如此顺利的就深入自己的腹地的。受惊退入燕然山麓的匈奴人，在稳住阵脚之后又多次向沿姑且水北行的李陵部发动了攻击。然而武刚车阵的最大好处，就在于这个防御力极强的步兵阵法，本身就建立于车轮之上的。在侦骑得到匈奴人反扑的消息之后，便可以很快布阵成功，而武器甚至部分士兵，也是置于车上，并不会额外消耗体力。换句话说，汉军将农耕民族在防御技术上的优势，通过训练有素的武刚车阵复制到了草原之上。李陵敢于深入匈奴腹地的底气，也正在于他的这支军队，已经磨合成了一个匈奴人难以近身的移动堡垒。

在对李陵军的反复进攻中，匈奴人又损失了数千骑兵，而汉军的损失却很少（即使在后来有多场恶战，退到古尔班赛汗山区后，汉军依然还有三千多兵力）。这种你打不到他，他却能打到你的局面，足以让单于抓狂了。虽然如果你不进攻，就不会有损失，但面对这样一支人数仅为数千的军队，相信拥有绝对人数、地缘优势的单于，是绝难做出战略后撤的决定的（这样做的话就太没面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阻止李陵步步为营，逼近燕然山的办法，就只能是继续增兵，在攻击中消耗汉军了。

尽管李陵所率领的汉军让匈奴人难以近身，但这支军队也有显尔易见的缺陷，那就是行动缓慢。尤其是在进入战备状态后，汉军向北移动的速度会更慢。这也给了单于方面集结更多兵力的时间。在继续冲击汉军军阵，以迟滞其前进速度的同时，匈奴方面紧急向左、右两翼征调了数万骑兵，使得李陵军正面之敌达到了八万之巨。

后来曾经放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将陈汤，曾经对鼎盛时期的汉军战力做出过“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相对匈奴人）的论述。汉军之所以能够拥有压倒性战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更好的装备，以及更好的配合训练。即使在后来匈奴人从汉军方面学习了战术技术，在西汉末年，匈奴人仍然只能“三而当一”。

按照陈汤的计算，拥有汉军中最强步战能力的李陵部，“以一当六”的对战匈



奴三万骑兵，其实并未处于劣势。然而，当匈奴方面骤然增兵至八万时，李陵部再想压倒对手，就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李陵部汉军的战力再强、士气再盛，他们所携带的军资、补给毕竟是有限的。这和今天战斗机的出击半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攻击距离一定是在考虑回程油料的基础上来设定的。

对于孤军深入敌境的汉军来说，左右他们攻击距离、时间的主要因素，并非粮食甚至淡水，而是能够有效阻击匈奴骑兵的“箭”。以当下战斗的密集程度来计算，汉军很有可能在撤至长城之前，箭就消耗殆尽了。因此，在感觉到匈奴兵力大增的情况下，李陵做出了后撤的决定。在且战且退的状态下，南行数日的汉军退入了浚稽山中。很快，拥有机动优势的匈奴人也如影随形的跟了过来。

退入浚稽山的李陵做了两件事情。一件跟战术有关，即将受伤的士兵分为三类，受三处（及以上）伤的可以躺在车上休息；受两处伤的负责驾车；而受一处伤的，则执兵器继续作战。所谓轻伤不下火线，做出这种安排本身并不需要太多军事才能。能够引发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受伤士兵所受的都是箭伤。一般来说，在面对骑兵攻击时，一个训练有素的弓手至多也只能放出三箭，至于弩手的速度就更慢了。当然，汉军可能已经能够将弩手分为二排甚至三排，以增加射击的效率了。

不管怎么说，应该还是有部分逃脱第一波攻击的匈奴骑兵，能够冲至他们的射程范围内，并射出自己的箭（但杀伤力已经不大了）。不过即使这些匈奴人能够再逃脱第二波箭雨，也基本上不会对汉军的防线造成大的冲击了。也就是说，匈奴人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能够找到克制汉军的方法，只凭借数量优势继续进行集团冲锋。

另一个需要引发我们注意的是，“两创者将车”的命令。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判断，那就是汉军虽然没有战马提供机动性，但却还是有足够的畜力来装载物资的。也就是说，并不能单纯的把李陵的五千汉军想象成训练中的魏武卒那样，一个人要携带所有的武器、盔甲、粮食（三日食用），半日急行军百里。如果说吴起训练魏武卒的标准相当于现在的特种兵选拔的话，那么浚稽山之战所透露的则是汉军步战体系的技术细节。

李陵在退入浚稽山之后做的另一件事情，就跟技术细节无关，而是事关士气了。由于面对强敌连续作战，且处于撤退状态，汉军的士气受到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李陵鼓舞士气的方法，却让很多后世阅读这段历史的朋友有些疑惑。因为李陵认为士气受影响的真正原因，是军中藏有女人。并且他还真的在车中找到了这些女人，并斩之。

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让士兵专注战事的理由，军中不让夹带女子都是可以理解的。让人疑惑之处在于，这些女子是如何藏身不被发现的。而实际情况是，与士兵朝夕相处的李陵并不会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否则怎么会那么快把士气和藏匿女子一事联系起来）。身处边地经年，让这五千军人完全禁欲本身就是一件影响士气的事情。让他们与那些发配边关的罪犯家属结合（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

也是一种管理手段了。同样的，在汉军需要鼓舞士气时，以军法为理由，拿她们出来祭旗也是一种管理手段。

当然，这些女子的真实身份，以及上层军官是否真的不知她们中有人随军出征了，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展开讨论的。汉军是否能够全身而退，也不是这些女子所能决定的。从结果来看，汉军为接下来的战斗，所做的这两项准备工作还是收到成效的。

#### 第四节 李陵军撤至龙勒水下游的大泽

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匈奴人在付出三千人的伤亡后，依旧未能攻破汉军的防线。尽管斩获这些匈奴人的首级，并换取军功，曾经是李陵这次出征的目的所在，但此时这些数字对他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他需要利用下一波攻击前的空窗期继续带领汉军南撤（一场胜利能够换取更多的时间）。然而对于南撤的方向，李陵此时心中却应该有些犹豫了。

从浚稽山的位置来看，汉军可以有两个方向的选择来后撤：一是径直向南原路返回居延塞；二是依据汉武帝拟定的 B 计划路线，沿夫羊句山东南方向退入受降城。后一条路线，由于是汉、匈连接单于庭（龙城）与河套地区的主线，因此也被史家称之为“故龙城道”。



戈壁阿尔泰山地缘结构图

应的还有一个山口“涿邪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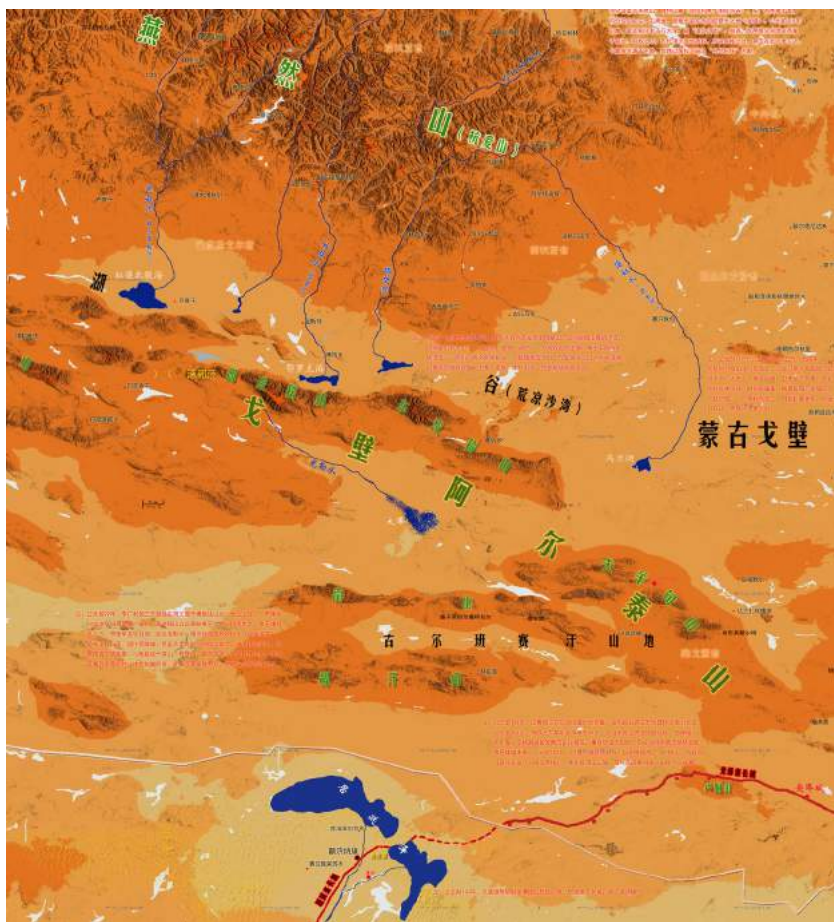
“涿邪”这个地缘标签，在卫青的漠北之战时曾经提到过。如果说浚稽山是戈壁阿尔泰山最西端的山体的话，那么涿邪山就是阿尔泰山主脉最东端的山体了。二者之间的山口，就是“涿邪径”。在历史中，汉军（特别是东汉时期）曾经多次试

就交通距离看，原路返回居延塞用时会更短。然而向这个方向后撤的最大问题在于，李陵无法得到驻军接应。根据汉武帝的命令，原本应该接应李陵的路博德军，此时也已离塞。至于他们的去处，汉书记载是“涿邪山”。涿邪山也是一个在汉匈战争史上经常出现的地理标签，与之相对



图出涿邪径与匈奴人决战。它所对应的，就是“湖谷”中最西端的一条河谷通道——拜达里格河（匈奴河）。

然而这个记载很可能是一个笔误，因为汉武帝让路博德出击，包括制定 B 计划让李陵部转向受降城的原因，都是在预判匈奴单于本部会攻击河套地区的基础上。他甚至调动河套驻军（公孙敖）由西河郡出发，与路博德军相会，以备匈奴。结合二者的地缘位置，两军相会的地点应该是以受降城为中心的外长城沿线。如果要以一座山为定位的话，那就是受降城西，被认为是“光禄塞”西部起点的卢朐山（而不是涿邪山）。



汉西域全图

通常情况下它最终是会在终点留下一个终端湖，或者一处沼泽地的。以龙勒水集水区（浚稽山）而言，它能够在戈壁中留下的最后痕迹，就只能是一片水草交融的沼泽地了。

最终，李陵部花了四、五天的时间，行军到了龙勒水的终点，并暂时在大泽中密布的芦苇丛中休整。然而这一选择却也为汉军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记得在漠北之战中，曾经有朋友问，匈奴人有没有可能用火来攻击武刚车。从技术上看，这样做的困难性很大。毕竟武刚车本身并不算是易燃物，即使有少数匈奴人能够冲破汉军

也就是说，在李陵率军出征后，居延塞驻军主力也开始沿长城，向东北的受降城方向移动。同时，河套驻军也沿光禄塞外围向受降城方向扫荡。加上北出居延的李陵部，帝国相当于在秋高马肥，匈奴单于最有可能出击之季，在长城防线之外又布设了一道阻击线。在汉军出塞主力都向受降城方向集结的时候，李陵也试图向受降城靠拢就可以理解了。问题是，这一计划在行至龙勒水的终点——大泽时，不得不再一次改动。所谓“大泽”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式名称。如果一条河流不能归流入海的话，

箭阵、点燃火箭并射出，也无法引燃大火（赤壁之战吴军是准备了足够的易燃物来放火的）。不过，这一技术障碍在大泽一战中，就不存在了。因为匈奴人只要有一支火箭射到已经进入枯草期的芦苇中，就足以引发大火了。更何况拥有机动优势的匈奴人，一定会选择上风口来放火。

面对匈奴人的大火，汉军的技术应对就是在自己的营前也主动放火，烧出一片隔离带来，这其实也是今天应对大火的标准程序了。只是这样做，至多只能保证汉军不变成烤鸭，要想摆脱数万匈奴骑兵的追击，李陵还必须继续后撤。

## 第五节 李陵军抵御匈奴攻击并穿越南山

当李陵决定继续后撤时，他又必须再一次面临选择了。因为匈奴人同样知道，庇护河套地区的受降城是汉军防御的重心。选择在西北方向（因为肯定是西、北风）放火的他们，此时应该已将主力集结于东南方向，封堵住了汉军进入夫羊句山南麓的入口。

一个合格的军事将领，总是会为自己准备备选方案的。沿龙勒水东南，进驻大泽的李陵也是如此。进驻大泽本身，就是为了给自己有考虑的时间，参照《汉·天山/浚稽山之战示意图》我们会发现，大泽不仅处于浚稽山口通往受降城的必经之路上，其位置也正处于居延者的正北方。也就是说，无论李陵后来选择何种路线突围，运动至大泽的四、五天时间，都不会被浪费掉。

李陵最终选择原路返回居延，以及汉军最终选择从大泽向南突围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匈奴主力集结于东南。因为以他们的行军速度，无论往哪个方向后撤，都无法摆脱匈奴人的追击。影响决策的主因在于，李陵更熟悉这条线路。人在面对困境选择方向时，总是会选择自己所熟悉的道路。最起码这样走的话，李陵不会步赵破奴的后尘，因为找水而被俘（在出击过程中，李陵甚至画出详细地图，传书汉武帝）。

当李陵率部离开大泽，向古尔班赛汗山地进发时，单于方面也同样开始了兵力调动。拥有机动优势的匈奴人，抢先一步占据南退道路上的制高点。疲惫不堪的汉军，又将迎来一场新的战斗。古尔班赛汗山主体大致是由三部分所组成：最东侧与阿尔泰山脉走势一致（西北——东南走向）的是“夫羊句山”，而夫羊句山的西侧，则是两条东西走向，平行与之相接的山体。为了堵截汉军，匈奴人最先占据的是北部这段山体。在汉书的记载中，这段山体被称之为“南山”。与“大泽”之名一样，这应该也只是一个按照形态、方位进行的简单命名。不过，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可以用此标签来代指这段山体。

占据南山的单于，这一次派出了自己的儿子亲自领军攻击。不过，这一次汉军的防御方法，较之前又有所不同。因为南山之前的树林，为汉军提供了很好的藏身之处。当匈奴人因为树林的羁绊，不再拥有机动优势时，李陵军就可以用精确射击，



甚至短兵相接的方式来解决对手了。当然，如果汉军依然在旷野布阵的话，匈奴人应该也还是占不到便宜。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减少用箭量。要知道，经过连日来的高密度战斗，汉军所携带的箭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对于这支汉军来说，匈奴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机动能力。当匈奴人不再拥有机动能力时，李陵和他所带领的这些荆楚壮士，其实并不畏惧与之近身相搏。最终不再面临箭雨的匈奴骑兵，在树林中的损失依旧大得让人难以承受。当他们向南山方向撤退时，身后留下的是数千尸体。

击退敌人进攻的汉军，并没有坐等对手的第二波进攻，而是尾随后撤的匈奴人出击。当然，没有马匹的他们想追上匈奴骑兵是不可能了，扩大战果的方式，仍然是汉军制胜的法宝——弩。这些远距离攻击武器，甚至直接射向了在南山上观战的单于本人，并逼迫他撤至山后。

战事进行至此，匈奴人实际上已经被逼至崩溃的边缘了。一场无论在数量还是环境的熟悉度上，都应该占据绝对优势的战役，到现在为止，却已经让匈奴人付出了阵亡万人的代价。而汉军此时却还能够保持阵型，看不到溃散的迹象。更让单于感到不安的是，此时距离汉朝边境已经越来越近了。本身在士气上已经陷入低谷的匈奴人，身后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汉军主力的身影。

匈奴单于此时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从正常的战术安排来看，没有人能够理解李陵为什么要带领五千步兵深入戈壁草原之中。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支战力超强的军团本身就是一个诱饵。他们深入浚稽山的目的，就是引诱准备东南方向侵扰河套地区的单于本部南下至居延塞一带，然后以主力伏击之。一方面现实的损失已经让人难以承受了；另一方面又害怕李陵有后援。此时作为匈奴最高统帅的单于本人，实际上已经心生退意。让自己的儿子亲自领军进行攻击，就是在做最后的努力。而李陵也通过此战被俘匈奴人之口，获知了单于的这一决定。

事情发展至此，汉军仿佛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如果匈奴人此时撤围而去的话，李陵此战所获得的口碑，完全可以媲美第一次河西之战中率领一万骑兵，孤军深入河西走廊的霍去病。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接下来的变化让汉军再一次陷入了绝境。

最先的变化，来自于匈奴内部。尽管单于本人已经心生退意了，但其属下的将领却竭力反对。其理由就是：如果单于亲自率领几万骑兵不能消灭几千人的汉兵。那以后匈奴人就再也不敢南下了。这样也只会让汉朝更加轻视我匈奴。同样的局面，在两千多年后的1940年，也出现在了山西东南部一个叫做“关家垴”的山头。围绕深入根据地腹地的五百日军（冈崎支队），八路军集结了两万部队轮番发起进攻。

这场曾经被电视剧《亮剑》重点表现的战斗，具体的战斗细节以及前因后果，相信大多数朋友已经有所了解了。它与两千多年前浚稽山之战在细节上有哪些可比之处，大家也可以自己总结一下。二者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攻击方在蒙受

巨大损失之后，都因为政治及战略层面的原因，不得不坚持下去。而对于被攻击方来说，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日军是真的有后援，而李陵是真的没后援。

日军有增援部队正在向关家坳靠近的情况，八路军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无论是下死命令要拿下冈崎支队的彭大将军，还是下面力谏保留革命本钱的诸将（这倒是跟匈奴人的情况正好相反），都还能够准确判断出作出决定的临界点在哪。换句话说，即使坚持一定要拼到底的彭，也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撤了（日军援军围上来的时候）。然而匈奴人却并无法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判断这个临界点，因为他们所担心的汉军伏兵根本不存在。

单于帐内最后做出的决定，是继续向汉军发起攻击。如果汉军能够冲出古尔班赛汗山区，进入平地的话再后撤。按照匈奴人自己所划定的这条底线，汉军实际上已经离生的机会不远了。因为从南山穿越整片山地的直线距离，不过四、五十汉里。要是他们能够再坚持一下的话，匈奴人就可能真的退兵了。

由于匈奴内部已经暂时达成共识，古尔班赛汗山区这剩下来的四、五十里山地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因此汉军接下来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拥有绝对兵力优势的匈奴人，在一日之内向南山之间的汉军，发起数十波攻击。只是在汉军的严密防御下，这些攻击又让匈奴人损失了两千多人。

很显然，单于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和嫡系部队再去冒险了，领命出击的是那些坚持再战的匈奴将领。而在他们也接连失利之后，匈奴方面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再一次被动摇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等不到汉军穿越古尔班赛汗山，匈奴方向就会后撤了。问题是，意外无处不在。这一次的变数来自于汉军内部。简单点说，就是像很多狗血抗日剧那样，在关键时刻革命队伍里出现叛徒了。

并不是每一个“叛徒”都有机会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就像当日准备降汉的“左大都尉”，留下的只是一个官名罢了。不过李陵军中的这个“叛徒”名字和官职倒都是有史可查的：官为“军候”，名为“管敢”。在汉军的军制中，军候一职大约管二百人，相当于现在的营、连长一职吧。

这位“管敢”叛逃的原因，据称是受到了更上一级的校尉的侮辱。具体是为了什么受辱并无从得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单于带去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汉军的箭已经快用完了；二是汉军并没有后援。匈奴方面所担忧的，无非是汉军的弩箭对自己杀伤过大。另外汉军又有可能是在行诱敌深入之计。在汉、匈两军都快支撑不下去时，这两个信息的透露，无疑让胜利的天平完全倒向了匈奴一方。

为了进一步体现自己的价值，叛逃者进一步向单于建议，以骑兵冲击汉军军阵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匈奴骑兵应该占据南山之上的制高点，居高临下的用箭射击从山谷中穿行的汉军。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提升匈奴弓箭的射程、射击的精确度；反之，不得不仰射的汉军，对匈奴人的杀伤力就大大降低了。实际上，对于精于防御的汉军来说，上述建议是山地阻击（伏击）战的标准作战方式了。然而匈奴方



面显然并没有这样以静制动的战术思维。在过往的战斗中，只是一味的以机动优势冲击汉军的军阵（加上中间放了把火）。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及之前的游牧民族在战术上的确是乏善可陈。武器、组织性、战术都明显占优的汉军，做到以一敌五并非神话。

当然，战争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正如陈汤所言，西汉后期，汉、匈两军的战力比，已经变化为 1:3 了。而在后来的历史中，随着马镫的发明，以及游牧民族在战术上的进步，中原王朝所面对的北方之敌也越来越强大了。匈奴方面在战术上的调整，让汉军进入了开战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已经完全摸清对手底牌的匈奴人士气大振，很快便全军出动。匈奴人控制了穿越南山的每一条谷地，并将箭雨居高临下的倾倒在试图穿南山而过的汉军头上。

很显然，穿越南山之战极大的消耗了汉军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箭支。要知道，之前那种骑兵冲阵，并不会消耗太多的箭支。至多三轮齐射之后，就能打退匈奴人的一次进攻了。现在的话，夺路而逃的汉军，要想压制住这些身处高地的弓箭手，就必须以更高的射击频率来回击对手。

最终，战术素养极高的李陵军，大部分还是冲出了南山谷地。不过，汉军所携带的箭支也在这一战中消耗殆尽了。其实，如果匈奴方面在战术层面上再完善一下的话，还可在汉军进入山谷后，以滚木礮石封堵山谷两端（再狠点还可用火攻），这样的话，汉军可能连南山也冲不出来了。当然，这毕竟不是一场事先计划好的伏击战，匈奴人此时并没有时间准备这些障碍物和燃烧物。况且与这些阴谋诡计相比，匈奴人还是更愿意相信他们在人数和机动上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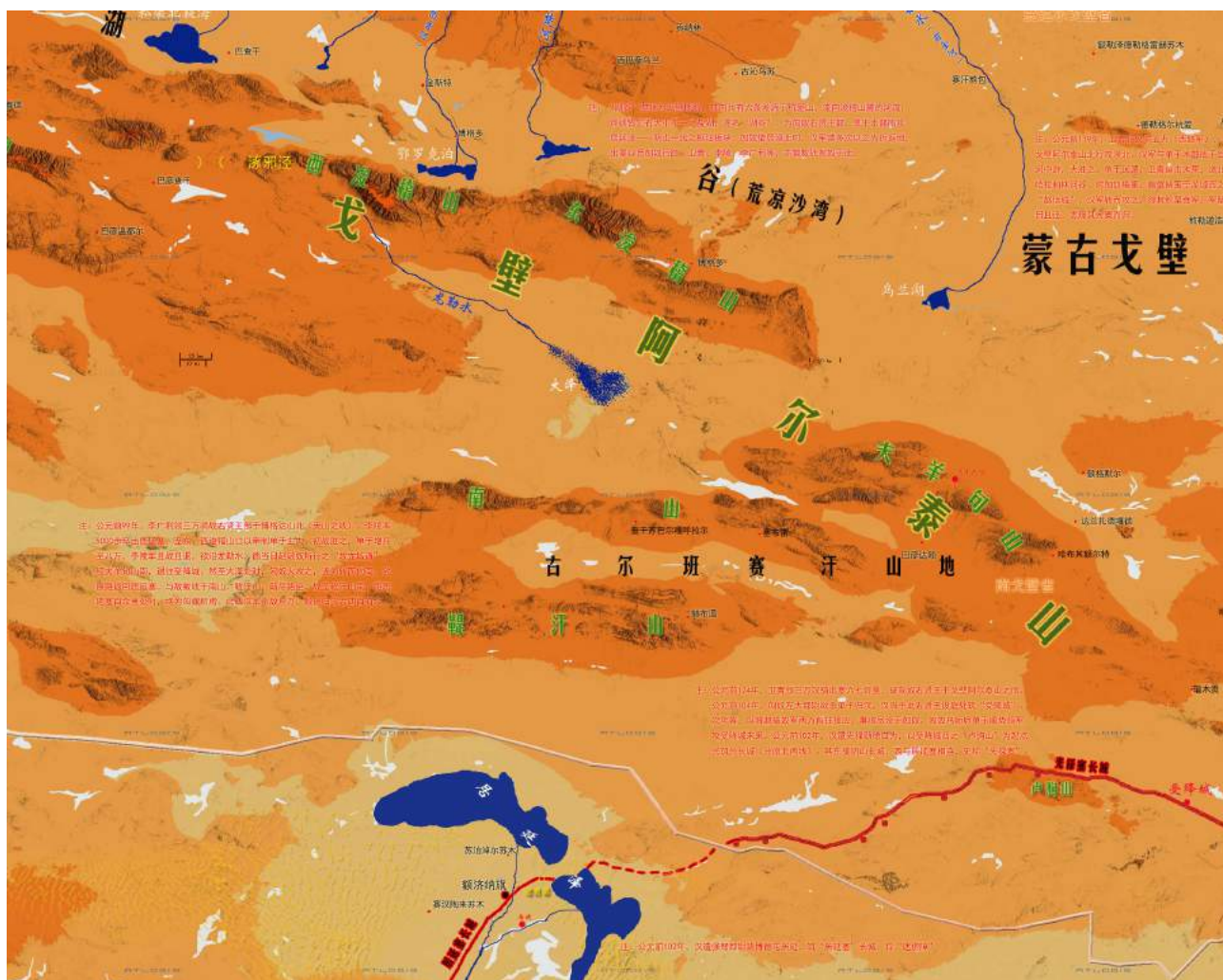
## 第六节 李陵军穿越鞬汗山时伤亡惨重

南山之南，就是古尔班赛汗山最南部的一段山体——鞬汗山了。穿越这段山体，李陵与居延塞之间就是一马平川的戈壁了。单从人数来看，汉军的伤亡率应该是非常惊人的低了。经过那么多场战斗，汉军此时还能剩余 3000 余人。然而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从来不能只看人数和士气（虽然我们过往接受的教育，总是强调这两点才是制胜的关键）。汉军之所以能够在战力上大幅领先匈奴，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而现在，李陵的这支军团不仅用完了所有的箭支，更连短兵相接的兵器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对于大家来说，“箭”是消耗品这一点，理解起来完全没有难度。不过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那些用以近身格斗的兵器本身，消耗量也是巨大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下来，士兵手中的兵器基本上都需要修复或者更换了。从浚稽山至大泽一线的战斗中，汉军手中的近战兵器消耗量应该并不大，在那些战斗中，冲阵的匈奴骑兵基本上都是被弩箭解决掉的。问题是，在南山之北的树林之战中，匈奴方面损失

的数千人，却应该有相当部分是在近身格斗中被斩杀的。

能够在近战中占得优势，说明了李陵军所擅长的不仅是射术了（前提是对方无法发挥机动优势）。如果能够有足够的战马，这支部队骑射技术也绝不会逊于匈奴人（这是李氏家族的看家本领）。只是现在，这剩下的三千多汉军，已经几乎没有再与匈奴一战的本钱了。除了军官手中还能分配到一把短刀（尺刀）以外，普通士兵就只能将车辐砍下来做兵器了。



汉西域全图

尽管武刚车在前期的战斗中为汉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保留它们已经毫无意义了。事实上，在冲出南山之后，这些战车就被放弃了。能够变身成为武器，也算是它们所能发挥的最后价值了。带着这些简陋的装备，李陵和他的士兵终于退入了鞬汗山中。实际上，匈奴人也完全可以把最后的战场，设定在南山与鞬汗山之间的盆地中。问题是，通过之前的南山阻击战，匈奴人明白了居高临下、远程攻击的好处，因此也就不愿意再在旷野上冒险冲阵了。最主要的是，他们此时还无法确知汉军的箭是否已经消耗完了。



再一次进入山谷的汉军，肯定也已经预知到又将承受一场两侧高地，铺天盖地而来的箭雨了。好在汉军应该还有足够多的盾牌配合防御阵型，来保护了自己的有生力量。问题是，匈奴人也在进步。未能在南山之中阻击成功的他们，终于在鞬汗山中想到了“重武器”。这里所说的重武器，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山谷伏击战中的标准装备——滚木礮石。

提出这一战法的，很可能就是汉军中的那位变节者。至于他是在南山阻击战未能毕其功于一役后，向匈奴方面建议的；还是匈奴单于在南山阻击汉军时，就预先派军于鞬汗山上准备这些重武器，就不一定了。匈奴方面从山谷两侧所滚下的这些“重武器”，不仅堵塞了汉军的退路，更让汉军伤亡惨重。能够让汉军获得喘息机会的，就只有黑夜了。只不过天明之后，看清汉军位置的匈奴人，势必会再一次发起攻击。

现在，摆在李陵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了：一条是投降匈奴；另一条则是分散突围（集中突围只能做活靶子）。当然，对于李陵来说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杀身成仁。不过，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李陵并没有这样做。

在《汉书》的记录中，李陵没有杀身成仁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部下举出了赵破奴从匈奴脱逃，仍然得到汉武帝重用的例子。不过同样在《汉书》中（卫将军骠骑列传），赵破奴却是在匈奴滞留十年后，才找到机会脱逃的（公元前103年被俘）。要是这样的话，李陵得到类似建议的时间，应该是在身陷匈奴数年之后了。从这个矛盾的说法来看，也许是班固记混了时间（或者说太想帮李陵说话了）。

其实不管赵破奴归汉的时间，是在浚稽山之战之前还是之后，此时的李陵都不想死。不想死并不代表他怕死，而是不甘心。毕竟李陵身负着重振家族雄风的重任，这又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场大战，并且差一点点就成功了。不管此一役的结果如何，李陵都已经找到了克制匈奴人的战术和信心。如果再有一次机会重来的话，完全有可能复制霍去病的辉煌。

## 第七节 李陵军余众突围后的命运

李陵最后的抉择，一直是后世之人所热衷争论的话题。不过，身处鞬汗山的李陵，此时还需要为自己和部下的兄弟做最后的决定。在投降匈奴与杀身成仁之间，分散突围成为最终的选项。为了走完这最后的逃亡之路，每位士兵分得了两升粮和一片冰（戈壁中已经开始入冬了）。而作为统帅，李陵也为他的这支军队划上了句号，那就是“尽斩旌旗”并埋地下。

古往今来，旗帜对于一支军队来说，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在二战中，日军最后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时，在最后冲锋或者自杀前都会焚烧军旗，以至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竟没有缴获一面日军军旗（步兵联队级才有正式的军旗）。另外，在朝鲜战争中，最为让志愿军和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战利品，就是在那次经典

奇袭战中所缴获的白虎团团旗了。

很多朋友在回帖中感叹，很少见我如此细致的描述一场战役，整个过程已经有小说或者剧本的感觉了。对此我只能说，历史本身远比那些文人闭门造车所写出来的文字，更为精彩。即使他们想迎合现在观众的口味，做一些吸引眼球的艺术发挥的话，也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相应的支点（比如女主角这条线，就可以从那些藏身于车中的女人中延伸出来）。

尽管《汉书》对浚稽山之战过程有详细的记载，以及经由我们的地缘推导，已经基本解开了李陵以五千步军出战匈奴的历史疑案。不过，有一点却暂时并没有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在最后突围之前，李陵在山中所掩埋的不仅仅是旌旗，还有“珍宝”。鉴于李陵此次出击并没有机会攻掠匈奴部落本身，这些“珍宝”显然不可能是匈奴人所贮藏的。然而问题是，李陵为什么要带“珍宝”出征，“珍宝”又指向何物呢？既然史书并没有明示，我们亦无法找到答案，那这个历史包袱倒不妨留给日后的小说家、编剧好了。最起码他们有机会，把一部悲壮的战争片改编成传奇寻宝片（还可加入穿越情节）。

好了，回到正题上来。之所以详写李陵的浚稽山之战，一方面是想通过这场经典战役，使大家更加全面的从技术细节上来了解汉、匈两军的实力对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太史公，毕竟他为了李陵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在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后，李陵和剩下的汉军在夜半分散突围。跟随他与副手韩延年的，还有十几位壮士。与其他士兵相比，汉军的这两位将领似乎更有突围成功的可能，因为他们有马。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两匹战马的存在只会让匈奴人明确自己的目标所在。也就是说，匈奴人完全可以据此判定李陵在哪里。

最终马并没有帮助李陵逃回居延塞，在距离汉长城 100 多里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中蒙边境线左近了），李陵和韩延年被数千匈奴骑兵追上。韩延年战死，李陵就此没入匈奴。让人扼腕的是，此时驻守居延塞的汉军甚至已经能够听到突围汉军的厮杀声了。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你很难要求没有骑兵的守军（而且主将路博德也前往受降城了），在面对匈奴主力时敢于出塞接应李陵部。

事实上，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李陵也并非没有突围的可能。最起码当年他的爷爷李广，就曾经受伤被俘后奇迹般的脱逃过。只不过，有此教训的匈奴人是决不会再给这位飞将军之后被俘之后夺得战马、弓箭的可能了。李陵的机会在于，如果

在最后突围的时候身边还有数十支箭的话，那么他自认为还是有机会在骑射状态下突围的。问题是，他连这几十支箭也没有。于是被匈奴骑兵追上的他，除了杀身成仁以外，就只能选择束手就擒了。

另一种突围的可能性，就是弃马混入士兵之中分散突围。前面我们也说了，作为汉军阵营中仅有的两位骑马者，李陵和韩延年很显然成为了匈奴人追击的焦点。



而在他们吸引了匈奴人的主要目光之后，有四百汉军得以步行突围成功，并最终回到居延塞。当然，作为一位名将之后的李陵来说，即使不能杀身成仁，在最后的时刻化装突围，甚至找人冒充自己，总归是一件有辱家族、个人名誉的事。在他并非单纯为了偷生，而是为了日后在汉军中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能不能在最后的时刻保持军人的尊严，就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了。

至于李陵在没入匈奴之后的曲折，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知晓了，自不用我多言。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视线重新转移到战略层面上。因为此战之后的汉武帝，再也无法容忍这一阶段的失利了，一场少有人知的新“漠北之战”，即将拉开了序幕。

## 第三十九章 汉武帝再次发兵远征漠北

### 第一节 汉军面临兵员和战马的不足

如果不是匈奴人明显进入战略反击阶段，并连续取得了三场胜利的话，远征漠北并不会成为汉武帝的选项。在此之前的几次试探性远征（包括李陵那次）中，都是在浚稽山一带就折返回程的。相比耗资巨大的远征，帝国实际上更愿意把钱花在修筑从罗布泊——阴北草原的“外长城”上。以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将军事重心放在外长城上，也的确更为稳妥。

问题是，自赵破奴两万汉军尽没匈奴之后的几年间，汉帝国已经连续在三场战役中遭遇失败了，损失的精锐汉军亦将近五万。反观匈奴方面损失的兵力，至多也就两万余人。而之前由卫青、霍去病所领军的五大战役，汉军的损失合计也不过六万多，匈奴方面被斩杀、迫降的则达到二十一万之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确很需要再用一场准备充分的大战来挽回面子了。

现在的话，再想组织一场远征漠北的战役，汉军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机动兵力上的不足了。要知道，刚才所说的将近五万人，仅仅是这一阶段对战匈奴的损失。而两次远征大宛，李广利为帝国败掉的军力，更达到十万之数。事实上，早在赵破奴军全军覆没之后，帝国内部对于是否要第二次远征大宛，就存在不同意见。主流意见认为，应该把为大宛之役所准备的二十多万兵力（六万主力骑兵，十八万用于转运补给的步兵）调回，专力对付匈奴。

不管汉武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像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一样），执意要将足以用来远征漠北的兵力耗费在了天山南北是否正确。兵力的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了首先需要消除的障碍。为此，帝国发布了最严厉的征兵令，除了征集志愿从军的勇敢之士以外，同时还将法律上有义务服兵役的人员（所谓“七科谪”，即：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上门女婿、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尽数征入军中。

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兵役法则是当年的秦国原创的，汉帝国不过是萧规曹随罢了。类似的命令，在第二次远征大宛之役中也发布过。不过当时这些被强制征入的兵员，所担负的是转运粮草的后勤工作。这一次的话，他们则应该被编入了一线作战部队（当然，只能做步兵了）。

不管怎么说，对于以农为本，人口众多的中央之国来说，人力终究不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机动能力。说起来，自公元前 104 年 8 月赵破奴出塞接应左大都尉起，至公元前 99 年李陵兵败为止，汉军倒也算是打了五“大”战役。与卫、霍二人所组织的五大战役相比，兵力的得失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五场战役所



损失的战马、畜力几乎不能从对手那里得到补充。有鉴于此，汉军的第二次漠北之战所组织的二十一万一线兵力中，只有七万骑兵。

## 第二节 李广利与匈奴进行余吾水之战

公元前 97 年 2 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第二次漠北之战终于拉开了序幕。由于两军最终的决战地点在东单于庭所处的“余吾水”（图拉河），为了以示区别，我们也可以将第二次漠北之战称之为“余吾水之战”。有了第一次漠北之战的作战经验，在第二次漠北之战中，汉军在选择出击线路上并没有大费周章。只不过，这一次汉武帝心目中既能打仗，又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外戚，就只有李广利一人了。因此，汉军中大半的兵力都被调归了李广利。除了由他亲领从朔方郡（后套方向）出塞的六万骑兵、七万步兵之外，还有从居延塞方向出塞的路博德所率领的一万步兵（主要为弩手）。

很显然，李广利的出击线路是复制了当年的卫青部。至于路博德部与之会合的地点，应该就是在浚稽山了。问题是，七万骑兵中，有六万都调给了这位皇亲国戚。其他将领要想复制霍去病的成功，就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最终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出雁门负责从左路出击的公孙敖，其所率领的一万骑兵、三万步兵，在与左贤王部的对战中落败而归。

公孙敖的落败，固然与兵力较少有关。不过有李陵以五千步兵力敌匈奴八万骑兵的战例在前，也难免会让人假设，如果统率这四万汉军的是李陵的话，是否有机会在匈奴左翼复制霍去病的辉煌。当然，李陵军的战力本身也并非一般汉军所能比的。除了李氏家族在领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数年训练、磨合之外，俱为同出一地的“荆楚之士”，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如果汉军中不得不紧急补充了诸多新兵（特别是来源繁杂，不得不参战的“七科谪”）的话，战力的确会受到很大影响。

除了负责西路军的李广利（包括与之会合的路博德部）、东路军的公孙敖以外，汉军的二十一万兵力中，还有三万兵力是从阴山山脉中部的五原郡出塞的。这支完全由步兵所组成的军团，本身的战役方向并不明确。从方位上看，其出塞路线应该是复制当年李广的线路。很不幸的是，二者的结果也是一样，都是未碰到匈奴人便无功而返了。

事实上，汉武帝应该也没指望这支中路出击的三万步兵有大的作为，“游击”于戈壁南部寻找战机，很可能就是这支部队的战役任务（领军者为“游击”将军韩说）。也就是说，选择让他们从中路出击，更多是摆出一种全线出击的架势。毕竟戈壁腹地虽然荒凉，但也难保拥有极强机动力的匈奴人，会从此方位出击或者迂回至汉军后方。

现在看起来，唯一有机会进入漠北草原，并与匈奴主力决战的，就只有李广利

所统率的十四万汉军主力了。不出意外的话，汉匈两军的决战战场应该还是在燕然山麓。不过这一次，匈奴单于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却并没有在燕然山一带以待汉军，而是东移到了肯特山麓的余吾水。虽然李陵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汉军步兵军团的战力，但以步军远涉漠北，机动性不足始终是最大的障碍。第一次漠北之战中各率五万骑兵出战的卫青、霍去病，选择了在漠北入春的五月出塞。而这一次，汉军则不得不选择在二月就开始向漠北移动了。

很显然，因为汉军的行动迟缓，匈奴方面有了更多的时间搜集情报、调整兵力。在汉军主力明显从自己的右翼袭来之时，匈奴方面所做的相应调整，就是将主力调至肯特山前的余吾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汉军主力如果想与之决战的话，就不得不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补给。

匈奴单于亲领的这次主力，兵力共计十万。相比之下汉军在人数上看起来要更有优势些（六万骑兵，八万步兵），不过匈奴胜在骑兵数量多，地形熟悉上。最终双方在缠斗十余日之后，匈奴方面向漠北草原深处退却，而李广利部在余吾水周边搜索一番，无所收获后也班师回朝。

说到这里，正好回应一下有朋友提到的，关于“瀚海”方面的异议。按之前很多史家的观点，是认为汉史之中所指的瀚海应该是一个大湖，而漠北草原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就只有贝加尔湖了。因此霍去病所登临、饮马的瀚海，当为后来在苏武传中被称之为“北海”的贝加尔湖。不过，由于后世“瀚海”一词亦明确指向大漠戈壁（加之在汉史中，贝加尔湖又明确记录为“北海”），所以霍去病到底有没有去过贝加尔湖，成为了一件疑案。

之所以采信了后一种说法，除了上述原因，以及地缘推导、判断出二军决战之地当在肯特山南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史书所记载的霍去病部出击距离是在二千余里。而如果霍去病想喝上贝加尔湖的水的话，那路程至少在三千里。虽说古人在数字记录上多有虚指，但一般而言总归是夸大其词的。在汉武帝为霍去病之功大书特书时，并找不出理由来压缩这个数字（对卫青倒有可能）。当然，也许霍去病真的带领部分精骑一路追杀到了贝加尔湖。毕竟这个无所顾忌的少年将军，看起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即使仅仅是出于象征意义，他也有可能甩开大部队特意跑到贝加尔湖去喝口水（看他封禅狼居胥山、姑衍山就知道了）。

顺便倒也可以说说“瀚海”的第三种可能解释。在蒙古高原诸板块当中，色楞格河流域的优势在于除了雨水、高山雪水补给之外，其大部分水源来自于丰沛的地下水（泉水）。这使得支流众多的色楞格河流域能做到终年不断流。如果这一年的降水特别多的话，那么春季（阳历四——五月）冰雪消融、夏季普降暴雨之时，河水就有可能暴涨，并漫出河床淹没草原牧场。霍去病出征漠北正是漠北春、夏之季，如果那一年正有洪灾的话，那么这个由肯特山、杭爱山、萨彦岭等山脉围就的浅盆腹地，就将呈现出一派水草交融的沼国景象。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所描述的“瀚海”，



就很有可能指向的是肯特山前的草原地带了。

不管瀚海所指向的是贝加尔湖、戈壁，还是被洪水淹没的色楞格河流域腹地，都不会影响我们对汉、匈决战地的判断。至于李广利本人，就算霍去病真的曾经跑到贝加尔湖去示过威，这种非常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仿效的。因此在匈奴方面向北退却之后，汉军也随之后撤。



色楞格河

史家并没有为我们记载下余吾水之战以及东路军的战损，不过以李广利过往的战绩来参考的话，汉军在人员、物资方面的损失并不会比匈奴方面的少。也就是说，余吾水之战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了。当然，汉帝国家大业大，就是以二换一，看起来也比匈奴人恢复能力更强。遥想白登之围，匈奴集结40万大军包围汉军的盛况，已是不复当年之勇了。虽说收

获没有第一次漠北之战大，但再一次深入漠北，对匈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匈奴人获胜的话，那么信心大增的他们接下来一定会侵扰帝国边境。在收降李陵的次年（公元前98年秋），匈奴就曾经南下攻掠过雁门郡的边市。而在余吾水之战后，匈奴方面过了六年（公元前91年），才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秋季盛宴（攻上谷、五原）。

### 第三节 汉帝国趁匈奴受雪灾发起反击

对于匈奴方面又展开的攻势，汉武帝并不一定要再一次发起大规模战役的，毕竟打一场大战的成本很高。从战略的角度看，倒不如据守住外长城防线，并同时断绝匈奴向塔里木盆地绿洲征税的可能，如此匈奴方面就完全被框死在“草原”之上了。时间一长，一个无法帮助部族获得额外补给的游牧帝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上述战略能够帮助汉帝国耗死匈奴，但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汉武帝还是更愿意主动出击，直接在战场上消耗匈奴的有生力量。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临了，因为刚刚在秋季，南下上谷、五原打草谷的匈奴人，在回到漠北之后，很快就要面临一场严酷的冬季雪灾了。

匈奴人遭受雪灾的信息，从他们次年春季（2月）不得不再次南下，攻击酒泉、五原两郡就可以看出。不过，与匈奴博弈日久的汉帝国，应该不用等到开春就能够

探知匈奴的国力被天灾削弱了。正因为如此，在急于补损的匈奴人南下之后，帝国很快便集结好了十四万兵力，又一次兵分三路，向匈奴境内发起攻击了。这一战，也成为了汉武帝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战。

鉴于汉、匈之间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游牧民族本身又行踪不定，汉军但凡大规模出击，都会采取数路出击的形式。然而公元前90年（4月）的这一次出击，与以往的战役在路线上却有很大不同。简单点说，就是汉军此次攻击的方向，完全在原来匈奴右翼的势力范围内了。

这当然也与匈奴本身的战略调整有关了。之前我们所分析过了，由于乌桓成为汉、匈之间的缓冲者，匈奴方面已经将左、中、右三路的防区向西做了大幅调整。受降城——车师一线，成为了汉匈争夺的主战场。而被匈奴人称之为“天山”的博格达山南北，则升级成为了帝国的西部战区。由于在九年前的天山之战中（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的三万汉骑在撤退中险些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因此这一次，帝国也为第二次天山之战准备了更多的兵力（四万骑兵，重合侯马通领军），由河西走廊出塞（酒泉）以雪前耻。

博格达山及其周边地区，曾经在西域部分被我们划定出了一个包含十五个西域小国，介于匈奴、乌孙、汉帝国三方势力交汇地带的“博格达地缘圈”。再次对其用兵，自然不仅仅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了。尽管在天山之战中，车师国的态度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对于失败的战例，一般都不会大书特书细节的）。但在匈奴人包抄汉军后路的过程中，这个吐鲁番盆地绿洲的控制者，最起码没有帮助汉军预警。而在此战之后，车师很显然会更加坚定的成为匈奴人的盟友（虽然表面上也不会得罪汉朝）。

不管在第一次天山之战中，车师人有没有直接帮助匈奴人切断汉军归路，吸取经验教训的汉帝国，都不愿意再次冒险了。在汉军主力出击之前的一个月（三月），西路汉军通过外交手段征调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个西域国家之兵，又一次的攻击了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并使得这个枢纽国家重新又倒向了汉朝。

比起当日消耗巨大的远征大宛之举，用这种“以夷制夷”的方式来控制西域，显然更有利于汉朝。在两汉经营西域的历史中，政治、外交手段从来都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像大宛之战那样的案例，只能算是异数了。事实上，就连率领六国之兵进攻车师的将领，也是匈奴方面投降过来的一个部落首领（介和王成婉）。在后来汉、匈争夺西域的历史中（包括东汉时期），类似战例也比比皆是。

以夷制夷之法，虽然能够节约帝国的军事成本，但主战场上的胜利，还是要靠汉军自己争取的。然而当四万汉军穿越车师古道抵达博格达山之北后，匈奴方面便知趣的退军了。也就是说在西部战区，汉匈双方实际并没有接战。对于希望以斩获换封赏的汉军来说，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匈奴方面应该是沿博格达山北麓，一路向东退入巴里坤草原的。也许汉军尝试



过追击，不过如果匈奴方面不想接战的话，他们可以继续西北方向穿越今天中蒙边境的“阿济山”（蒙古境内），回到阿尔泰山及大湖盆地。至于汉军，却并没有由此方向深入漠北的经验。在远离帝国核心区，又无农业绿洲的支撑下，驻军天山北麓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从战略上来看，能够通过此一战将车师控制在手，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如果汉军一定要进入大湖盆地攻击匈奴右翼的根基之地的话，由居延塞或光禄塞出塞，向北经浚稽山——涿邪山之间的“涿邪径”，进入燕然山之南是最为可取的路线。通过之前的若干战役，由此方向穿越戈壁阿尔泰山的线路，汉军已是了然于胸了。负责由上述线路出击的汉军兵力为三万（领军者为御史大夫秭侯商丘成），在此次战役的攻击序列中居于其中，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中陆军”。

由于河西走廊的机动兵力都被集中到了西路军，因此中陆军是从河套方向出塞的。他们的集结地是河套平原之南，横跨黄河两岸的“西河郡”。这也意味着，为了这场战役，帝国将那些储备在二线的兵力也征调至了一线战场上。与未能和匈奴接战的西路军相比，中陆军的“运气”要好得多。因为他们遇到上了匈奴右翼的主力，并与之展开了数场战斗。当然，这是不是“运气”，还是要看最后的结果。要是像李陵上次那样，那就是晦气了。只是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在浚稽山北带领三万匈奴骑兵阻击汉军的，正是上一次率领汉军在此苦战的李陵！

#### 第四节 西路汉军遭遇李陵所领的匈奴骑兵

可以肯定的是，初入匈奴的李陵是决不肯为匈奴领军对抗汉军的。其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知晓了，那就是汉武帝诛灭其族。从这一点来看，最应为李陵背汉承担责任的，应该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武皇帝了。其实整个李陵事件，从一开始就是由一系列错误和误会所引发的。在最初的震怒（李陵没有杀身成仁）后，汉武帝也意识到，李陵以五千步军出战匈奴，能做到此种地步已是极致了。他甚至承认，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怀疑李陵有怯战之心）没有坚持让路博德前去接应的话，事情的结果也不至如此。

为了对自己的过失有所补救，在李陵兵败一年多后，汉武帝下诏嘉奖、赏赐了那四百多名在浚稽山之战中突围而归的汉军。另外，由李广利领衔的第二次漠北之战，除了战略上压制匈奴的反攻势头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机接李陵归汉。直接领受这项任务的，是负责从东路攻击的公孙敖。不过结果我们在前面也写过了，东路军并没有突破匈奴左贤王部的阻击，最终落败而归。

实际上，即使公孙敖能够攻入漠北，也很难有机会找到李陵的。毕竟匈奴有足够的纵深，将这位尚有归汉之心的将军藏起来。如果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的话，相信李陵日后还是有机会归汉的（或如赵破奴般寻机出逃，或如苏武般通过外交手段索

回)。然而一个错误的信息，却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由于肩负寻找李陵任务，从俘虏口中收集相关信息也成为了公孙敖战时的工作。他战后向汉武帝所陈述的报告是：俘虏言李陵教单于用兵以防备汉军，因此臣无所获。

最终的事实证明，帮助匈奴训练军队的是另一名归降匈奴，原来驻守长城的汉军校尉“李绪”。很难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匈奴方面所使用的反间计。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将战事不利的原因归结于李陵投降匈奴（使匈奴战力增强），却为东路汉军，甚至整个第二次漠北之战的不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其结果就是震怒之下的汉武帝诛灭了李陵全族。

在这种情况下，李陵的归汉之路被完全堵死了。反过来，匈奴方面也认为可以让这名强悍的汉将真正为己所用了。因此在公元前90年，李陵回到了浚稽山，并成为了中路汉军的阻击者。不过匈奴方面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这位看起来，除了为匈奴效命别无出路的降将。这三万匈奴骑兵并非完全由李陵统帅，而是另有匈奴大将与之联合指挥。换句话说，此一役更像是匈奴方面迫使李陵交出的投名状。

匈奴方面之所以要这个投名状，是因为之前的种种，更多是汉武帝单方面的过失（也通过使者得知了真相）。如果汉廷后来能够直面错误的话，李陵并不排除还会归汉。有鉴于此，李陵此战中应该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权，至多只是在战术上给予匈奴军一些指导。至于是否出工不出力，在缺乏史料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只能从结果上判断了。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额外对李陵此时在匈奴中的政治地位做一个解读了。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提到，李陵没入匈奴后，单于不仅将女儿与之之为妻，甚至封其为“右贤王”。细细想来，当日采信此种说法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潜意识里对李陵的同情（希望突显李陵的价值）。如果纯粹从客观线索来判断的话，李陵没入匈奴之后，所受封的应该是为其专门设置的“右校王”（匈奴原无此职）。

不管李陵做了个什么“王”，此时他都不得不站在汉军的对面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汉匈双方接战的地点并非是与涿邪径相接的匈奴水（拜达里格河）一带，而就是李陵当年与匈奴接战的地点：东、西浚稽山之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路军的战役任务实际上与李陵当年是一样的。在没有遭遇匈奴人的情况下，应该是南穿浚稽山后，沿故龙城道返回受降城。不过，在匈奴三万骑兵追至浚稽山并包围之后，汉军不得不改变方向，沿浚稽山北向夫羊句山北麓方向退却。在向夫羊句山方向突围的过程中，汉、匈两军反复交战了九天，最终汉军在横穿整个湖谷，抵达蒲奴水（翁金河）之后，匈奴方面撤军而去。

匈奴方面之所以在此时退军，表面原因是因为中路军作战顽强，对匈奴人造成了大量的杀伤，但这却并非主要因素。我们知道，当日李陵同样在浚稽山让匈奴人尝到了苦头，却始终未能摆脱匈奴人的追击（包括赵破奴军也是）。换句话说，如果汉军又是孤军深入的话，匈奴人完全可以战至光禄塞北再行退兵。



让匈奴方面不得不退军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汉军真正的主力此时已经深入漠北草原腹地了。李陵及其所属的右翼骑兵，不得不回防色楞格河流域。在我们一开始便交待汉军是三路出击的情况下，大家很自然想到这支汉军主力，应该是西路军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支军队深入漠北却是一个计划外的事件。

## 第五节 李广利率军深入漠北时尽没于匈奴

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西路军的兵力相当于东、中两路汉军的总和，也就是七万人。统帅这支汉军的，毫无疑问的是汉武帝心目中的第一大将——李广利了。与中路军的出击方向有所不同的是，出受降城之后的李广利军，计划是穿越夫羊句山，沿蒲奴水方向攻击前进。其目的地，最多应止于哈拉和林河谷的西单于庭（龙城）。然而在李广利刚刚领军出塞之后，一场始料未及的变故发生了。

这场变故并非发生于军事战场，而是在后方的长安城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自行百度“江充巫蛊案”的词条。简单点说，这是一场因政治斗争而引发的人祸。其对前线汉军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在于，李广利的妻、子因受此案牵连被收监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身处前线的李广利此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

如果此时李广利的家属像当日李陵的家人一样被族灭了，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就此没入匈奴了。然而性命暂保的现状，却让李广利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此战得大功而归的话，当有机会将功折罪。实际上李广利在获知后方有乱的消息之时，西路军已经初战告捷了。两千受命为先锋的属国之兵（之前投降的匈奴部落），在穿越夫羊句山之时，打败了五千前来阻击的匈奴骑兵（匈奴损失数百人）。

夫羊句山战斗的胜利，无疑又可作为“以夷制夷”之策的典型案列。问题是，李广利此时肯定已经无暇去做这些总结了。因为要想从一场牵扯到政治阴谋的案件中脱身，仅仅依靠几百匈奴人的首级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获得更大的功绩，就必须更加深入匈奴境内，寻其主力决战。

以前两次漠北之战的经验来看，李广利应该在燕然山或者肯特山南端，就能够遇到匈奴主力了。然而匈奴人这一次却真的是长进了，他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引以为傲的骑、射，而是漠北草原所赋予的纵深。当戈壁不再成为阻止汉军前进的障碍时，匈奴又为什么一定要将主力集结于草原边缘，与汉军决战呢？（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思路的教训，在红色军队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也总结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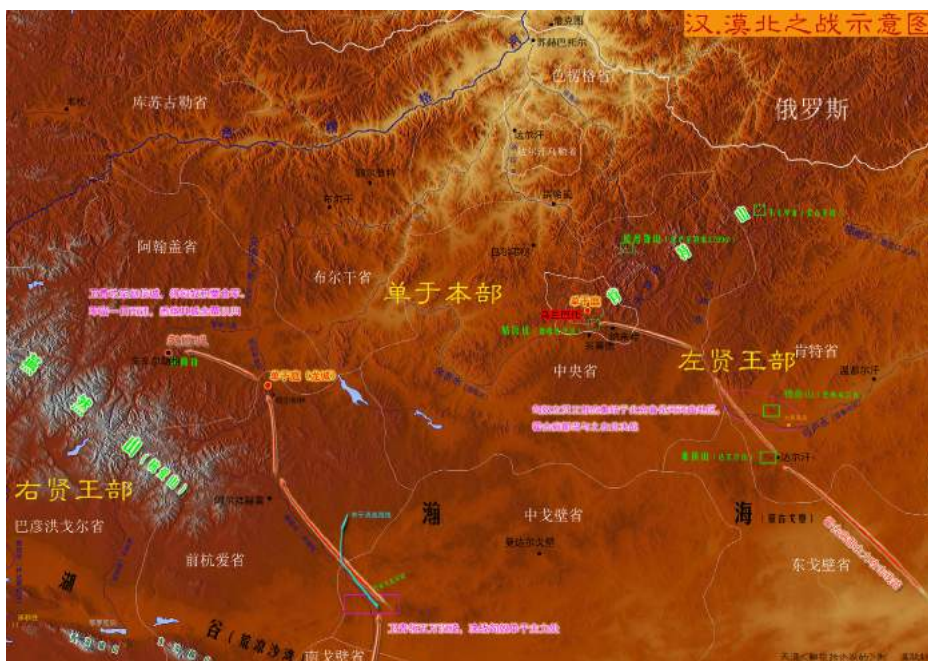
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匈奴方面在听闻汉军大军出动的消息后，就开始大范围的向北进行转移。单于本部将辎重、粮草转移至燕然山北的色楞格河（郅居水）一带；而正面不再有防御任务的左贤王部，则越过余吾水向北后撤了六、七百里，驻扎于肯特山西麓。

如果仅仅是想避祸的话，匈奴左翼部落其实是没必要进入色楞格河流域的。将

左贤王部调至肯特山西，意味着匈奴方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做好了在色楞格草原腹地与汉军决战的准备。不过，做好诱敌深入的准备，并不代表匈奴人就完全放弃在燕然山南与汉军接战的想法了。实际上，在汉军北上的同时，单于本人已经带领数万精兵（包括本部及左翼之兵）沿姑且水南下，准备试探汉军的实力了。

试探性阻击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读过了。向西追击中路军（出涿邪径）的三万匈奴骑兵，以及向南阻击东路军（出夫羊句山峡）先头部队的五千骑兵，都没有获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果断决定将全部兵力，迅速撤至色楞格河草原腹地。如果汉军就此撤军，匈奴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汉军继续进攻的话，那他们就将在一片完全陌生，且更加远离长城的地方与匈奴决战了。

以之前的经验来看，匈奴人应该更相信汉军不会深入自己的腹地。实际上，汉军最初的计划中，应该也最多只会涉及于燕然山麓的哈拉和林河谷（由于没有从匈奴左翼方向攻击的汉军的配合，事前李广利部没有计划对余吾水的攻击）。然而前面我们也说了，为了“将功折罪”，李广利现在的目标只能是匈奴主力了。即使匈奴人退至了汉军从来没有涉足的草原，李广利也必须硬着头皮上。



汉·漠北之战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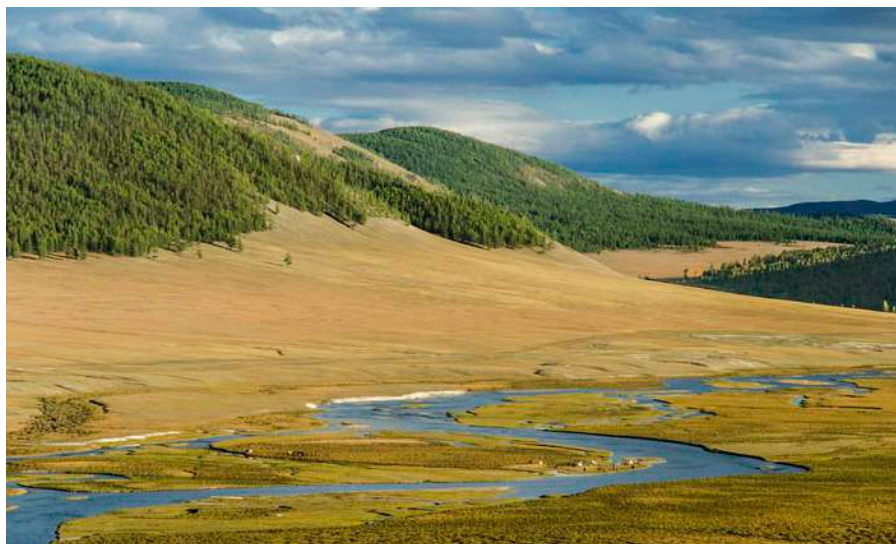
对于李广利来说，肯定是希望越早遇到匈奴主力越好。只不过，匈奴方面既然已经有了打开国门，诱敌深入的想法，就不会轻易与之决战了。在沿哈拉和林河谷北上，穿越安侯水（鄂尔浑河），进入到整个流域的干流——郅居水（色楞格河）之南时，汉军依然没有机会

与匈奴一战。在汉军到来之前，驻防于郅居水南的匈奴人很快便渡河向北后撤了。

在没有碰到匈奴主力这种情况下，李广利只能带领汉军继续北上，向贝加尔湖方向搜索前进。从这一点来说，李广利应该是最为深入匈奴境内的汉将了（如果霍去病没去过贝加尔湖的话）。最终在茫茫漠北草原上，汉军终于咬住了两万由左贤王部所率领的骑兵，并与之一战。单就这一战的结果来看，李广利应该还是满意的。左贤王部死伤惨重的同时，甚至还阵亡了领军大将（左大将）。



以七万兵力对战两万匈奴骑兵，汉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让人意外。只不过，匈奴人在此时与汉军接战，很大程度其实是想试探一下诱敌深入的成果。毕竟汉军已经出塞差不多三千里了，在匈奴人看来，体力和心理上都应该到他们的极限了。尽管左贤王部在此战中败而归，但匈奴单于却也通过接战判断出汉军已经十分疲惫了。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基于这个判断，匈奴方面很快便集结了五万骑兵，准备与汉军展开真正的决战。



色楞格河流域

当匈奴方面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战斗时，李广利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现在的斩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赎罪，他的心里并没有谱。以漠北之战中卫青的战例来参考，当下的战功最多只能做到无功无过罢了。也就是说，李广利的本意应该还想继续在漠北草原游

击，以寻机再战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此深入漠北草原已经严重偏离了最初的战役任务。汉军此时所面临的，不仅是生理、心理上的疲惫，更已陷入了军心不稳的境地。如果不处理好的话，便有叛乱的风险。

事实上，汉军也的确差点爆发内乱。感觉到李广利是为了一己之功，领孤军涉险地的几名高级将领，预谋将李广利控制起来，并率军南归。不过，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事先获知消息的李广利，抢先一步将叛乱的组织者诛杀了。问题是，诛杀叛乱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很显然，这支军队已经面临崩溃的境地，摆在李广利面前的，就只剩下南归一条路了。对于单于来说，汉军南归自然是个极大的利好了。如果汉军此时处于大胜而归、士气高涨的阶段，匈奴人应该并不会有什么举动。而现在，很明显深入自己腹地的汉军，战力已经大大削弱了。最终，原路返回的汉军，在燕然山麓遭遇到单于亲领的五万匈奴主力的截击。

虽然与匈奴主力决战一直是李广利所期盼的，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兵力也不会比对手多了），汉军只能靠最后一口气硬撑了。在最初的交战当中，拼死一搏的汉军和志在必得的匈奴人都死伤惨重。然而，此时的战略优势已经完全掌握在匈奴人手中了。即使李广利能够突破匈奴人的防线，进入湖谷，匈奴方面也会持续增兵，并一路尾随攻击至戈壁阿尔泰山南部。

可惜的是，汉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士气连续作战了。在匈奴方面乘夜在其军前方挖掘几尺深的壕沟，并绕至汉军后方发起总攻后，这支军队便彻底崩溃了。匈奴人的战术，甚至让汉军没有了分散突围的可能。即使败退的汉军能够爬过军前的壕沟（而且必须弃马），他们逃散的方向也只会离汉朝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遭遇了史上最为惨重的损失，七万汉军及汉武帝最为器重的将领李广利，尽没于匈奴。

## 第六节 汉武帝去世与汉匈之战的总结

前面我们也说过，汉军在草原之上几乎无法围歼游牧骑兵，一般情况下只能击溃。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今天李广利七万骑兵却尽没于匈奴，看起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更何况有李陵三千步军面对匈奴数万骑兵，尚且能有四百壮士突围的战例在前。之所以会有这个结局，盖因为李广利这个主将在最后关头主动放弃抵抗，率军投降匈奴。

李广利投降的原因并不复杂，要是他能够将这支部队基本完整的带回去，并加上击溃左贤王两万骑兵（包括斩杀左大将）的战绩，还是存有一丝将功折罪的可能的。问题是，在匈奴主力断其归路的情况下，正面强行突围（或分散突围）对于李广利个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即使他能够带领一两万汉军回到受降城，也只会因兵败而让自己和家人罪上加罪。类似的情况，在赵破奴两万汉骑尽没匈奴之役时，456 也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率军投降匈奴的，是害怕因主将有失，回去受罚的高级军官们。比照来看，造成这两战全军覆没的原因，都在军事之外了。

如果说赵破奴军的全军覆没，更多应该被视为律法严明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最应该为李陵和李广利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无疑就是汉武帝本人了。从微观历史角度看，若李陵当日能全身而退，且汉武帝能以绝对的信任平分兵力，李广利、李陵当有机会在公元前 97 年（余吾水之战）复制 22 年前卫、霍二人漠北之功。假设所有的事情可以从头再来，对于汉武帝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了。公元前 87 年，这位伟大而又长寿的武皇帝，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时年 70 岁）。而汉、匈之间的博弈，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总结汉武帝领导的汉匈之战，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朝战略反攻阶段。在卫、霍二次领军的五大战役（前 129 年——前 119 年）中，汉匈双方的损失比约 6：24；第二阶段为相持阶段（前 119 年——前 104 年），这一阶段双方隔大漠戈壁而治，未有大战发生；第三阶段（前 104 年——前 90 年），则是匈奴战略反击阶段（但战术层面上，主动发起攻击者多为汉帝国）。在这一阶段中，汉军损失在对匈正面战场上的兵力，至少在 11 万 5 千人之上（李陵、赵破奴二役，以及李广利的天山、燕然山之役）。加上二征大宛，以及其他对匈战场的损耗，汉军在这十五年间的兵力损失，超过了二十万。而匈奴方面所损失的兵力，则五、



六万左右。

虽然我们将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奴兵力损失各自相加，会发现双方看起来像是打了个平手。不过不要忘了，匈奴的人口数量与汉帝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即使汉武帝在后期因为自身的原因，让帝国遭遇了不必要的损失，但在他的连续打击之下，曾经强大无比的匈奴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上了衰退之路。

从地缘角度看，汉武帝终其一生将匈奴人逼回漠北；以外长城为界，将阴北草原、河西走廊纳为帝国领土；羁縻塔里木盆地诸国，协乌孙、乌桓两部自立于匈奴之外，以断匈奴左、右臂。凡此种种，无论对于汉匈博弈的走势，还是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最终定型，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一定要划分汉武帝一生功过的话，倒可以套用一个现成的比例——“三七分”。

当然，如果三七分的伟人没有那么长寿的话，他们一生评分肯定会更接近满分了。就汉匈之战来说，事实上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制定了今后的战略走势。在匈奴被迫退入漠北之后，帝国即使完全采取守势，减少匈奴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的机会（包括西域）。时日一长，匈奴帝国也将陷入内乱。

事实上，在李广利兵败漠北之后，汉武帝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后期在战略上所犯的 errors 了。他甚至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反思自己自大宛之战起（也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三阶段了），因好大喜功而过度用兵，造成百姓疾苦的种种错误。

## 第七节 汉帝国对匈作战做出战略调整

通过这些时日的解读，对于汉武帝个人的功过，我们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之前看到有朋友评论说，汉武帝比他的儿子要弱一些，因为是他的“儿子”最终摆脱了匈奴的威胁（实际是曾孙汉宣帝时期）。然而事情却不能这样看，有一个吃馒头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过，并不能因为吃最后一个馒头饱了，就认为最后一个馒头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后世诸帝的对匈战略，也仍然是在汉武帝时期就制定好了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战略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压垮匈奴帝国的。

在最后的总结中（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总结了自己后期的种种过失。在这其中，在后世对匈战略影响最大的有两条：其一是以内政为重，鼓励生产、恢复马政（如果为国养马者可免徭役赋税）。通过这些汉初曾经实施的经济政策，一方面能够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让汉武帝挥霍掉的国力、军力得以恢复元气；

其二则是完善外长城防御体系。尽管在公元前 102 年，以光禄塞为代表，圈入漠南草原之地（包括阴北河西走廊）的外长城体系就开始兴建，但由于在此之后的十余年间，帝国将主要力量都投入到那几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中了，所以整个外长城体系并未完善。这在诏书中总结为“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为此，整顿边塞军务，将军事重点转至长城防线之上，也成为了汉帝国下一步的战略方针。

之前我们也说了，从地缘特点来看，劳师远征漠北的确是“一而再，再而三”之举。比较三次漠北之战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次匈奴人因为掉以轻心，而损失巨大之外（那时他们完全不相信汉军能跨越戈壁作战），李广利所领导的第二次、第三次漠北之战，均以平局、惨败而告终。并且无论胜负如何，汉军都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千羊”与“一狼”的换算比，就是匈奴人总结出来的汉军跨越戈壁，深入漠北作战的经济账。

不过，尽管劳师远征对于汉帝国的国力消耗很大，但却并不代表匈奴人可以躲在漠北高枕无忧了。事实上，汉军一次次的远征，对于匈奴的经济伤害也很大。我们知道，匈奴战力最强的时候是秋高马肥之时。反过来，春季则是熬过寒冬之后的畜群急于补充营养的季节。这一时期，是非常不适合集结兵力、坚壁清野的。也就是说，只要汉军有迹象发起远征（几乎肯定是在春季），匈奴人的生产秩序就将受到极大影响。基于游牧民族脆弱的经济链，这种影响对匈奴的伤害程度，甚至于高于汉帝国（因远征而损失的国力）。

当然，前面我们也同样分析了，即使不劳师远征，仅仅让匈奴无法南下攻略农耕区，漠北匈奴的经济结构也会在经历一次次大灾后，面临崩溃的边缘。因此在公元前 87 年，年仅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之后。帝国就也就此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需要说明的是，很显然一个八岁的孩子并不可能主政。此时帝国的决策者，正是少年将军霍去病的弟弟（同父异母）——霍光。

这并不是一个点评政治博弈的帖子，所以关于那些外戚与汉官之间的恩怨，大家尽可以百度之。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后武帝时代，汉匈博弈的战略走向。从前面的内容，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出，无论谁主政，接下来汉、匈之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大战了。只是在汉军不再主动出击后，匈奴人自是会重新入驻戈壁地带，周期性的向南攻掠了。

依照汉武帝生前制定的战略方向，帝国在随后几年对边塞防务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增强外长城防线的防御力。比如将驻守河套的军队调至河西，另补充进精兵强将入驻河套。其实所谓防线，并不仅仅理解为那些城墙、堡垒了，关键还在于人。所谓“人挪活，树挪死”，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官员，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都会容易滋生腐败。这一点汉武帝也看得很清楚，罪己诏有言：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边疆障候官员派兵士狩猎获皮肉之利，兵士劳苦而烽火松弛）。

当帝国的重心转向长城防务后，对边塞防务的调整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这些修补、整饬防御体系的工作，很快也在防御匈奴的秋季攻势中得到了回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公元前 82 年）。这一年，匈奴人组织了左、右两翼共计二万兵力，分四路展开了他们的秋季攻势。然而受益于外长城防线的烽火预警工作，汉军得以迅速集结兵力，在对手劫掠得手，返回漠北之时追上这些满载而归的匈奴人。除了夺回全部的损失（人口、财务）之外，汉军还斩获了



9 九千余匈奴人。以匈奴的人口数量来说，近万精壮人口的损失是非常大了。这也让他们明白了一件事，当汉军将主要精力用来防御时，汉匈战场的地缘优势，就将转向对手一方了。

此战获胜对于匈奴方面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让其暂时不敢南下。以汉武帝时期的经验来看，汉军的这种反击战，往往是为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势热身。也就是说，匈奴人认为，汉军有可能又一次远征漠北了。更加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惨败还让他们损失了一位重要的部落首领“瓠脱王”。这位匈奴王的领地本身并不肥沃，是在戈壁边缘的荒漠草原地带。匈奴人所担心的是，熟悉地形的瓠脱王在归降之后，会带领汉军觅得新路，穿越戈壁攻入漠北。

为了防御汉军有可能发起的第四次漠北之战，匈奴方面在惶恐之中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公元前 81 年）：一方面调换新的部落入驻原由瓠脱王部负责的戈壁边缘；另一方面再调集九千骑兵，重点布防受降城一带以为预警。不过，这两项准备都不代表匈奴人准备与汉军一战。因为这些军事调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在汉军出击之时，有充足的时间坚壁清野，退入漠北草原腹地。为此，匈奴人甚至事先在余吾水上架桥，以随时接应那些在戈壁中承担预警工作的部众。

其实，为了应对汉军随时有可能发起的漠北之战，匈奴人在这次南侵之前，本来还有意筑城掘井、储备粮草，与可能入侵漠北的汉军展开城防战的。提出这个建议并着手实施的，是又一名投降匈奴的帝国官员——卫律。在匈奴的政治体系中，这位曾经的汉使受封为“丁零王”。

卫律归降匈奴并非其本意，也是受国内政治所累（好友李延年因事被捕，怕被株连）。说起来卫律和之前投降匈奴的赵信一样，本身原也是匈奴人。作为知己知彼的匈奴人，他们都曾试图将自己在中原学到的战术传授给匈奴人。然而“赵信城”在漠北之战中被卫青部攻破，并焚烧粮草的惨痛教训，使得匈奴人并不认为这种筑城以自守的战术适合自己。在李广利最后一次攻入漠北时，匈奴人就把粮草辎重转移到赵信城北的郅居水一带，而不是囤于城中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坚壁清野”防御战术，匈奴人实际上只愿“清野”，而不愿意像汉军那样“坚壁”。

匈奴人的担心自然是有道理的，毕竟以他们的生活习性更习惯于在大草原上机动。所以虽然卫律提出了让当年避祸逃入匈奴境内的秦人后裔（比被迫归降的汉人可靠）来承担城防任务，这一计划也还是在挖了几百口井，砍了几千棵树后被终止了。不过，我们后面会解读到，卫律对汉匈博弈的进程还是有很大贡献的。

最终在匈奴方面精心做好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之后，汉军却并没有主动出击。对于这一点，匈奴人应该是很有些意外的。当然，对于大家来说，通过前面分析，对此应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问题是，汉帝国既然已经选择了依托长城进行长期防御的战略，是不是就此意味着汉军就此再不会集结大军主动出击了呢？事实也并非如此，只是战略既定就不会轻易改变。要想让帝国改变自己的战略取向，除非有重

大战略因素发生了变化。至于到底有没有战略级别的变动发生，引发这一变动的因素是什么，又引发了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 第四十章 汉帝国与乌孙结盟应对匈奴

### 第一节 匈奴西进迫使乌孙与汉帝国结盟

一次失败，并不足以让匈奴人知难而退。在匈奴人已经明显将战略重心向西转移的情况下，他们对收复河西走廊和重新将西域变成自己的后花园还是心存希望的。为此，公元前 80 年，匈奴右贤王组织了四千人分三队对酒泉、张掖两郡进行了试探性攻击。之所以会有这次攻击，是因为情报表明当时河西走廊的驻军战力较之前已经有所削弱了。

不过右贤王准备来袭的消息，却被汉军事先获知了，而消息的来源则是归降的匈奴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试探汉军虚实的匈奴骑兵，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最终能够脱逃的匈奴人仅有数百骑。从战术层面看，这似乎又是一次因为“叛徒”而导致的失败。然而从更高层面看，失败却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战争之后，匈奴帝国的内部凝聚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事实上，这次承担攻击任务的“汉军”主力也并非真正的汉军，而是来自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属国。也就是说，即使匈奴有复占河西走廊之心，那些早先归附汉帝国后能够稳定从农耕区获得利益的叛逃者，也不会再愿意做他们的内应了。这种对游牧民族分而治之的做法，也是后来中原王朝所惯用的。那些愿意依附中央之国的游牧部落，通常能够获准游牧于长城北部的草原地带，并从“互市”交易中获得稳定的收益。而这些从农耕区交换来的商品，甚至还可以转售其他部落，以获得贸易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就不再仅仅是中央之国唯一可以依托的防线了。当匈奴人不再对重夺漠南之地抱有幻想时，他们对汉帝国所能做的就只剩下南下打草谷这一件事了。在进攻河西挫败的第二年（前 79 年），匈奴就组织了数万骑兵南下阴山劫掠。问题是，在汉军长城防线愈发稳固的情况下，即使一、两次劫掠得手，也无法让匈奴恢复元气了。更为致命是，当汉军不再主动出击漠北时，地缘优势就转向汉朝一边了。匈奴的每一次南下，都可能面临有来无回的境地。

站在匈奴人的角度看，当劫掠中央之国所直接经营的那些富庶的农业区变得不现实后，能够成为他们新生存空间的，就只有西域了。然而在与汉帝国争夺西域的博弈中，匈奴人的进展并不顺利。汉军甚至在公元前 77 年刺杀了楼兰王，然后将这个据守西域东大门的国家南迁至了塔里木盆地南沿（改称鄯善）。从地缘结构上看，匈奴与塔里木盆地的接触面较之汉朝并无优势。在汉帝国已屯田至罗布泊以西地区的情况下，匈奴人在巴里坤草原的跳板，就显得有些鞭长莫及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和汉帝国反复争夺车师的控制权，并无助于扭转这种劣势。

唯一能够让匈奴占据地缘优势的办法，就是控制天山草原。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我们之前曾经用大量篇幅进行解读。很显然，如果匈奴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这片草原的话，那么汉帝国控制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北线）难度将成倍增加。问题是，作为汉匈之争第三方的乌孙，此时的态度更趋向于骑墙。一方面，乌孙人仍然奉匈奴为宗主；另一方面，却又接受汉朝的示好，并与之和亲。如果匈奴此时的攻略重心还是阴山——燕山一线的话，对乌孙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倒也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在西域已经成为匈奴救命稻草的情况下，乌孙人再想这样骑墙，就很难为匈奴所容忍了。

匈奴逼迫乌孙表明态度之举，是向乌孙索要汉朝与之和亲的“解忧公主”。在未能如愿之后，匈奴方面则直接出兵攻取了乌孙东境的恶师、车延两地。所谓恶师、车延之地，即为今天准噶尔盆地南部，天山北麓的乌苏市——沙湾县一带，而这也是乌孙的东境。匈奴此举，不仅意在切断乌孙与汉朝的直接联系，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就是伊犁河谷了。既然这个本来应该跟自己亲如一家的游牧国家现在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盟友了，那为什么还要让肥美的天山草原游离于自己的控制之外呢？

很显然，乌孙人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交出公主、摆明态度，成为匈奴人坚定的盟友；要么求助于汉朝，与匈奴彻底翻脸。在一甲子之前，乌孙人应该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匈奴一边。而现在，联盟汉朝以抗匈奴成为了唯一的选项。这不仅是因为汉朝的强大，更在于汉朝对那些游牧民族所看中的天山草原，并无兴趣。

对于汉帝国来说，这是一个迟到了一甲子的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就是联合西迁伊犁河谷的“大月氏”人，以断匈奴右臂。在知晓乌孙替代大月氏人成为天山草原的主人后，这一战略使命的游说对象也变成了乌孙。然而在这几十年当中，尽管乌孙人看起来也愿意与汉朝交好，甚至与之和亲。但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同时也不会得罪匈奴人。其更多是想做一个置身事外，两边取利的第三方罢了。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了，如果没有重大战略因素的变化，现在的汉帝国并不会大规模主动出击（尤其不会深入漠北）。依靠经营长城防线消耗匈奴，已经成为了汉朝的国策。只是现在，乌孙这个第三方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汉匈对抗的地缘格局出现了重大改变。在这种时候要是不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一下的话，就显得太保守了。

实际上，在乌孙求救于汉朝之前，位于匈奴“左臂”位置的乌桓人，本来也有机会成为这个关键的第三方的。不过相比乌孙人之前的两面讨好，乌桓人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一方面，在匈奴不再从东线南下的情况下，坐大的乌桓人并没有经受住富庶农业区的诱惑，多次袭扰帝国的边郡；另一方面，与匈奴人原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他们，又通过挖掘匈奴故单于之冢的举动，示威匈奴。这种两面为敌的后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前解读过了，那就是在公元前 78 年，南、北两线先后遭受汉、匈两



军的攻击（汉军斩首六千，获三王）。

能够在汉、匈两大帝国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不在于乌桓人本身力量有多强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匈奴还是汉朝，都不能通过攻灭乌桓获得额外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倾向于在这个方向存在一个缓冲“国”。相比之下，地缘位置看似更为超然的乌孙，却因为能够关联到西域乃至丝绸之路的利益，而必须做出选择了。

为了准备这次历史性的联手，乌孙方面所准备的兵力是五万人。这个数量相当于乌孙可以调动兵力的一半。如果不是因为乌孙的西、南部，还有一直与之有地缘矛盾的康居存在，相信乌孙人为了这次攻击，甚至会动用倾国之兵。至于家大业大的汉帝国，所集结的兵力就要多出乌孙许多了。

## 第二节 汉帝国与乌孙联合出兵进攻匈奴

公元前72年，刚刚继位两年的汉宣帝（汉武帝曾孙）决定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为此帝国为准备出征而集结于河套——河西一线的汉军，总兵力达到了空前的十六万骑。汉帝国甚至从关东调动大批的精兵强将（各郡国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将吏，凡勇健、善于骑射者一律从军）。其意图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借与乌孙联手之机，给予匈奴致命一击。

汉书五路出击的线路，想必通过之前的内容，大家也能猜到一二了。鉴于匈奴左翼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浚稽山与杭爱山之间的湖谷再一次成为汉军主力出击的目标区域。共计四路人马，合计十二万多骑，由光禄塞（三路，十万余骑）、居延塞（一路，三万余骑）出发，投入了这一战区。最后一路，则由名将赵充国所率领（三万余骑），出酒泉投入天山战区。以方位来划定的话，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东线战场，后者则相应的标定为西线战场。

汉军出击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1年春（二月）。尽管这一次出击的声势极为浩大，但吸取之前教训的帝国，并不打算就此攻入色楞格河流域。沿湖谷那几条南北向的河流，向北扫荡至燕然山南麓，是东线汉军的任务。基于这次所调集的兵力如此之多，如果没有数万级的斩获，很显然是无法让皇帝陛下满意的。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东线四路大军总计的斩、俘也不到三千人，兵力最强的一路（四万人）甚至只有不足挂齿的十九级（另加牲畜百余头）。其实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国力渐弱的匈奴，早已不愿意给汉军决战的机会了。在听闻汉军重兵出击的消息后，匈奴主力以及老弱辎重，都在汉军到达之前逃匿于草原深处了。也就是说，汉军能够收获的只是那些在燕然山以南地区预警的匈奴人。

虽然从战役结果来看，汉军的这次出击只能算是一次示威之举，但在战略上还是又一次削弱及震慑了匈奴人。最起码他们当年的春季生产工作又一次被打乱了。

当然，这些领军的将军们肯定是没办法拿这一点向帝国中央请功了（其中两人还获罪并自杀）。相比湖谷战区的失意，汉、匈双方这些年来在西线反复博弈的“天山战区”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一战场的收获，却并非由领军的赵充国领军完成的，在战后帝国中央的奖惩令中，接受奖励的是一位资深外交家——常惠。

看过苏武故事的朋友，应该对“常惠”之名有印象。正是这位随苏武出使匈奴的副使，将苏武尚在人间的消息透露给了汉使，并最终与苏武一起返回汉朝。由于苏武年事已高，常惠在后来实际成为了帝国对匈事务的第一参谋以及管理者。在这次汉军五路出击匈奴的战役中，常惠的任务则是出使乌孙，协调两军的配合问题。

就战役计划来说，由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的三万汉军，本来是应该北出车师在博格达山北与乌孙的五万余骑会合，再共同向东攻击匈奴右翼在蒲类泽（巴里坤草原）的天山基地的。然而报仇心切的乌孙人，却早于双方约定的会合时间到达，并对巴里坤草原发起了攻击。

想让随性惯了的游牧民族，像汉军那样令行禁止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乌孙人敢于在没有与汉军会合的情况下就率先发起攻击，其实也是因为这次有了汉军作为后盾。换句话说，如果一战而胜，那些匈奴囤于巴里坤草原的人口、牲畜就是乌孙人的战利品了；而如果受挫的话，三万汉骑就会投入战斗，合力击退匈奴人。

不得不说，乌孙人的算盘打得很精。对于作为协调者的常惠来说，说实话也不好因其未按计划与汉军会合而横加阻拦。毕竟气可鼓不可泄，乌孙人既然愿意当前锋率先冲阵，对于汉军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另外，“以夷制夷”本来就是汉家外交家所最擅长的策略，要是说乌孙人抢先发起攻击的想法是被常惠本人挑起的，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对于乌孙人的这次攻击，匈奴方面是有些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之前的战役中，作为匈奴右翼渗透天山南麓的跳板，巴里坤草原一直没有受到过直接攻击。为了经营好这个基地，单于甚至将在匈奴政治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左、右贤王的“右谷蠡王”王庭设置于此。所谓左、右谷蠡王，与左、右贤王又合称匈奴“四角”。结合地缘结构来看，它们所经营的区域也应该是匈奴在前线最为看中的板块。由此，也从侧面印证了巴里坤草原对于匈奴帝国的重要性。

要是没有乌孙人的配合，汉军这次攻击的目标区域应该也还是和以前一样，止步于博格达山北麓。在哈密绿洲尚未得到开发的情况下，帝国并不愿意冒险深入哈密盆地以北的巴里坤盆地。这也让匈奴人形成了惯性思维，即将天山北麓的部众后撤至巴里坤草原就足够安全了。匈奴人的误判让乌孙人的这次攻击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措不及防的匈奴方面，损失的人口达到三万九千余级，各类牲畜七十余万。包括单于亲属在内的一大批匈奴贵族，也随之成为了乌孙人的俘虏。

能够给匈奴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长安城的皇帝陛下自然对常惠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了。而在乌孙之后赶到战场的赵充国和三万汉军，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一个倒



霉的单于使者，及其带领的三百随从。

事实上，天山战区也是赵充国的成名之地。十七年前（前 99 年），李广利率领三万汉骑所打的那场天山之战，在撤军遇伏的时候，正是依靠赵充国所率领的一百多敢死之士杀出一个缺口，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这一次未能建立新功，应该也是相当遗憾的了。不过对于整个汉匈战场来说，让乌孙人成为最大的收获者，却是一件“极好”的事。

如果乌孙人这次只是辅助攻击部队的话，他们与匈奴的外交关系应该还有缓和的余地。现在的话，对匈奴造成如此之大损失的乌孙人，相当于向汉帝国递交了一份出色的投名状。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要是常惠真的挑动乌孙率先发起攻击的话，这也一定是他的主要目的。

不管乌孙是因为何种原因没能与汉军会合，他们当下成为匈奴人最为仇恨的敌人，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了。要知道，上述数字只是乌孙在战场之上的收获。为了将剩余部众紧急撤至阿尔泰山一线，匈奴方面在后撤过程中所损失的部众、牲畜也是相当大的。

为了惩罚这个曾经的小弟，当年冬天单于便亲率万骑对乌孙展开了报复性攻击。然而这个不合季节的轻率之举，却让匈奴人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俘获了少量乌孙老弱部众之后，回师的匈奴人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最终能够回到匈奴境内的部众仅有十分之一。

### 第三节 匈奴面临来自四方的攻击

乌孙人的背叛，对于匈奴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加上东部乌桓人已经站在了匈奴的对立面，现在匈奴在东西两翼的影响力，都已不复存在了。更为致命的是，在匈奴两翼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漠北草原后方的贝加尔湖一带也出现了危机。在匈奴帝国的版图上，蒙古高原最北部是由一支不同于匈奴本部的部族——丁零人所覆盖的。只不过，因其身处匈奴帝国的后方，丁零人并没有取得乌桓、乌孙这样的独立地位。在已知的历史中，之前投降匈奴的卫律，就是匈奴人用来直接统治丁零部落的“丁零王”。

操持突厥语的丁零人，也是后来突厥、回鹘等突厥语部族的祖先。在匈奴人衰弱并被迫西迁，而东胡系的鲜卑人南下中原，并最终被华夏文明同化之后，这些突厥系部落最终填补了匈奴人的空白，成为了亚洲草原的主人。如果不是身为东胡后裔的蒙古人在 13 世纪的崛起，今天从阿尔泰山到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可能也会是一些人幻想“斯坦”的所在。

想看到突厥人的崛起，大家还要再等上几百年了。现在的话，丁零人只是趁匈奴衰弱之机开了个好头。公元前 70 年，乌桓、乌孙、丁零从三个方向同时对匈奴发

动了攻击。而为了应付这些反叛者，匈奴方面又损失了数万人口以及大量牲畜（包括几万匹马）。至于汉帝国，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不过，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虽然收获少，但耗元气）的汉军，并没有动用太多兵力。然而三千骑兵的收获，也已经比前一年十几万人的斩获要多了（俘虏数千）。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匈奴人一下子损失了十分之三的人口（包括因损失牲畜而饿死和背离的）以及半数的牲畜。可以这样说，元气大伤的匈奴帝国从此很难再翻盘了。而“外患”问题凸显所随之带来的就是“内忧”，简单点说就是——匈奴帝国很快就有可能分裂了。

除了强大的汉帝国以外，之前或直接或间接受匈奴节制的乌孙、乌桓、丁零三部，也成为了匈奴人的对手。就匈奴所面临的地缘形势而言，就像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唯一存在的扩张空间，还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小国。

#### 第四节 汉匈争夺吐鲁番盆地使车师分裂

塔里木盆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及了。匈奴人势在必得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这些绿洲的粮食储备，能够帮助匈奴度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饥荒。其实相同的需要乌孙也同样存在，不过乌孙西境与大宛接壤，完全可以从中亚农业区交换、掠夺补给。

争夺塔里木盆地的关键，依然在于车师。对于这点，汉帝国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尽管车师本身不在丝绸之路（汉）的线路上，帝国在公元前 68 年又一次攻占车师后，还是尝试在车师屯田，以备匈奴。然而匈奴对于汉帝国试图建立的这个突出部，自然也是视为眼中钉，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对于是否要争夺车师这个据点，汉帝国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反对方认为，在孔雀河一带的渠犂屯田驻军，就已经足够庇护丝绸之路了；而赞成方则认为，车师位置关键，匈奴一旦侵占，从孔雀河派兵相救就太远了。

说起来，不管汉、匈两边到底准备怎么控制吐鲁番盆地的，车师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个倒霉的一方。在汉帝国一开始决定放弃吐鲁番盆地，并将车师之民尽迁于汉军屯田的孔雀河中游时（公元前 68 年），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靠近汉军屯垦之处安居，又能远离匈奴人，何乐而不为呢？

车师人的这种心情，十年前从孔雀河下游南迁至车尔臣河下游的“楼兰”人，应该最为理解了。与南迁之后的楼兰人更改国名为“鄯善”一样，车师人在孔雀河中游所建立的国家，也被重新命名为了“渠犂”。正因为如此，大家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铁门关南的孔雀河中游，除了人口 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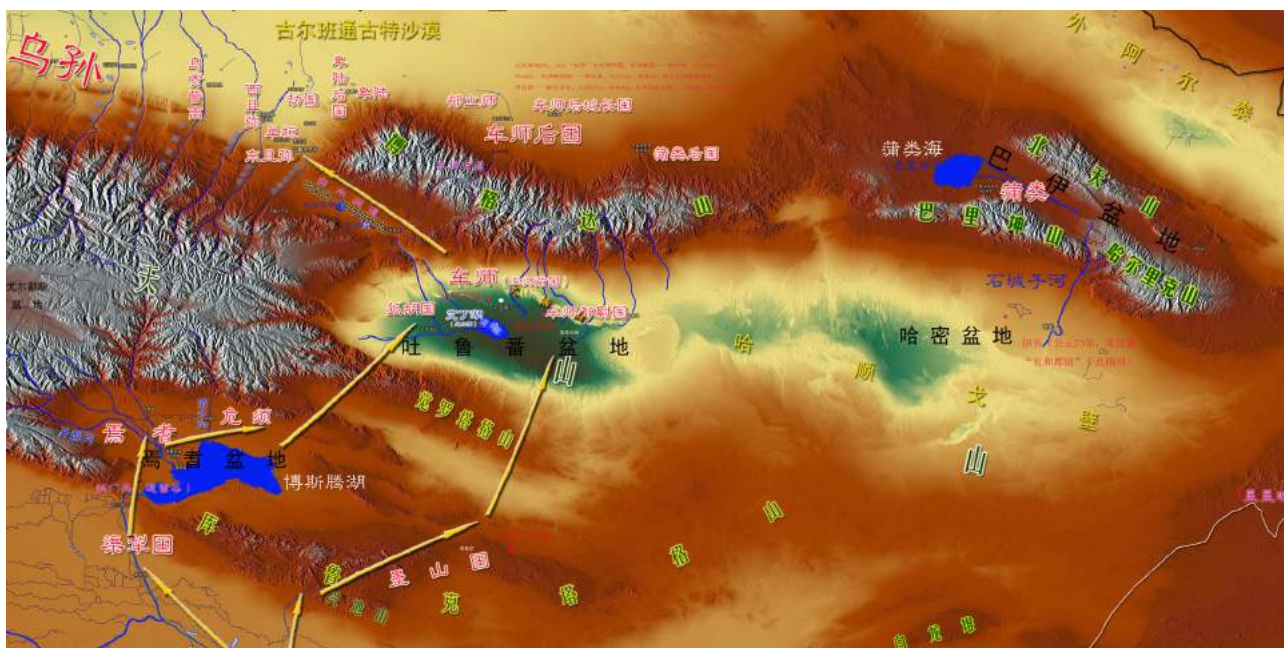
九千六百的“尉犂国”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邻的，人口四千八百的“渠犂国”



（自然选择下，同一地缘板块很难并存两个性质相同的国家或部族的）。

车师之民被迁出吐鲁番盆地，并不代表车师国就此不存在了。在汉迁车师之民于渠犂之后，匈奴马上就重新另立了一个车师王，并帮其收集余部复国。然而汉朝很快就意识到，将吐鲁番绿洲交给匈奴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片绿洲，及其出产的粮食将会成为匈奴渗透塔里木盆地的跳板和补给。所以在第二年（公元前 67 年），汉朝又组织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共击车师，再一次将车师王和他的国民驱离了这片土地。

再次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汉军，终于开始依托吐鲁番绿洲屯田了。至于匈奴方面，当然还是又再找一个车师贵族（车师王的弟弟）做车师王了。只不过再次成立的车师国，却是只能迁往博格达山以北，并没办法留在故土了。



西汉东疆地区地缘结构图

汉匈两国对于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南疆的争夺，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前 66 年，匈奴方面再次在博格达山以北集结了两万兵马，以威胁乌孙和塔里木盆地诸国。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匈奴人已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了。这次屯于博格达山以北的匈奴人，甚至也像汉军一样尝试了屯田。当然，让这些习惯草原生活的游牧者下地种田，一时是很难做到的。真正帮匈奴尝试种植业的，应该是那些投入匈奴的车师人（也可能还包括从西域、汉朝劫掠的农业人口）。

后世入主中原的那些游牧、渔猎民族，都有在经济生活中融入农业因素的过程，而他们进入中央之国越深，农业所占的比例也会越大。当然，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战斗力，这些马上民族一般都会刻意划清自己与农业民族的界限。从这一点来说，匈奴人屯田倒算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了。

如果匈奴人能够重新夺回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应该并不会重新把汉朝开垦的那些农田变回草原的。不过现在的话，博格达山北麓的气候注定了这种农业尝试并不会取得太大效果（只能在小环境尚可的山谷中种植少许作物）。有鉴于此，两年后匈奴派出六千骑兵南攻驻扎于车师城的汉军，试图夺取博格达山南麓那些成熟的绿洲。只不过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汉匈之间争夺吐鲁番盆地的战争，也就此宣告结束。

汉匈反复争夺吐鲁番盆地的直接后果，就是短时间内出现了四、五个车师王。这也使得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很快出现了五个系出车师的王国：后来被迫分裂为了五个国家：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以及孔雀河畔的渠犂国。对于汉帝国来说，顺势将车师分而治之是有好处的。毕竟这个位置最北的绿洲国家，离草原的距离远小于汉朝直接驻军的其他绿洲。

问题是，如果匈奴人还是一直在天山北麓虎视眈眈，无论驻军吐鲁番与否，根本性威胁都没有解决。事实上，在匈奴屯军两万于博格达山之北，誓言报复西域诸国并合兵攻击车师之时，身处塔里木盆地南线的莎车师国，就因此而出现了变故（公元前 65 年）。亲匈奴的势力在刺杀了汉朝扶立的莎车王之后，一方面扬言匈奴已经控制了北道诸国；一方面攻击南道诸国，以建立反汉联盟。当然，莎车的叛乱很快便被帝国所扑灭了，战术上也还是征调了西域各国之兵。只是要想彻底让西域安宁，还是要看匈奴本部何时崩溃。



## 第四十一章 匈奴爆发争单于之位的内乱

### 第一节 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匈奴内乱

匈奴帝国政治体系崩溃的征兆，很快就出现了。在西域——中央之国核心区两线受挫的境地，加之饱受乌孙、乌桓、丁零三族的侵扰，使得匈奴方面试图放手一搏。公元前 62 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公元前 68 年——公元前 62 年在位）集结了十多万大军陈兵于长城之外，准备大举攻汉。由于汉朝此时已将重心转至经营外长城防御体系了，匈奴此前多次南下袭扰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次南下除了从汉朝边郡掠夺人口、财富之外，匈奴方面更希望藉此破坏汉朝所建立的光禄塞长城，以为后来的南下行动打开缺口。

然而在汉强匈弱的当下，汉帝国所倚靠的预警系统早已不只是外长城沿线那些烽火了。事实上在这位虚闾权渠单于继位之初的振声之举（当时准备了两万骑兵攻汉），就被烽火以外的因素破坏了。为汉军提供预警的，是三位逃入汉境的匈奴骑兵。与六年前一样，战前叛逃的匈奴人又一次成为了汉朝的编外“烽火”。在严阵以待的汉军面前，匈奴终究没有胆量攻塞。

在经历过汉帝国数十年的打击之后，十多万骑兵已是匈奴方面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了。由此可见，匈奴对这一战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也可以说，匈奴的政治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再没有一场大战改变现在的颓势，单于的威信就将进一步丧失了。

虚闾权渠单于应该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本人已经不用再承担后果了。因为进退维谷的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快便在军前吐血了。至于撤军的命令是在他病前下达，还是病后所为已经不重要了。回到漠北的单于，需要为匈奴帝国的未来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草原维持统一。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之所以对农业区有那么大兴趣，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方面游牧民族需要很多农业区的出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没有也能活，但品质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大的灾荒，一切身家系于牲畜的他们，需要农业区的储备来救急。战争或者逼迫农业区纳贡，并不是唯一获取这些资源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同样也可以在平时获取这些物资。

匈奴帝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能够帮助草原诸部从农业区获取利益。现在既然依靠武力得不到这些，那匈奴单于所能期待的就只有和汉朝和解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达成和解，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和亲。这种形式，其实也正是汉初由刘邦所尝试的。只不过，这种“和亲”实际上是汉朝在乞求和平，匈奴方面除了定期向汉朝索取财物外，也更愿意经常性的破坏约定，自己到汉朝边郡去

打打草谷。

其实自漠北之战后，面对强势崛起的汉帝国，匈奴就已经有和亲之意了。只不过手握筹码的汉武帝，此时要求的已是居高临下的和亲了。换句话说，汉朝需要匈奴以臣服的姿态来换取和平。对于这点，高傲的匈奴人自然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那些对汉朝国力和潜力有所了解的匈奴人，却是极力主张应该牺牲这点面子与汉朝和亲。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曾经身为汉使的匈奴人——丁零王卫律。

我们之前说过，卫律之所以对于汉匈关系还是有直接影响的，指的就是他的和亲之策。在其死后，当时的匈奴单于也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是这毕竟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在不知汉朝之意的情况下，贸然示弱除了要承担被汉朝拒绝的风险外，还要承担国内鹰派由此而发动政变的风险。时至今日，在熄灭这最后一搏的希望之后，这位郁闷难当以至阵前吐血的单于，剩下的也只有这条路了。

然而虚闾权渠单于在向汉朝派出和平使者之后，并没有等到答复便病亡了。接下来摆在匈奴帝国面前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汉朝的态度，而是权力的争夺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政权都会存在权力的争夺。所不同的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政权，会更趋向于达成一致，以集合力量争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外部利益）；处于衰退期的政治体系，则更容易着眼于内部，出现复杂的权力斗争罢了。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了。

汉帝国从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所获得的第一份大礼，就是西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公元前 60 年，在单于之位争夺中受挫的匈奴日逐王（匈奴贵族大部分认为他更有资格接任单于），率领本部数万人（也有言一万二千人的）由巴里坤草原南下，归降汉朝。

在匈奴内部体系中，直接负责管理天山南部诸国的就是日逐王。日逐王的投降，直接让汉朝在西域的压力骤减。为了接应这位重要的匈奴贵族，也为了示威，汉朝组织了以西域诸国之兵为主的五万大军，穿越博格达山北上。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匈奴屯田的车师人，首先成为了牺牲品（后其地设为车师后部二国）。

汉军之所以声势浩大的接应日逐王，很大程度也是吸取当年赵破奴部接应左大都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这些准备工作也的确发挥了作用。虽然匈奴方面并没有发现并派出主力截击日逐王，但与浑邪王部那些归汉一样，并不是每个日逐王的部下都愿意成为汉朝臣民的。由于准备充分，这些动摇者也都被汉军一一追杀了。

归汉之后的日逐王部，被安排到了黄河上游（青海境），以远离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自此，张骞当日为帝国所规划的经略西域的宏伟蓝图终告完成。公元前 60 年，也就是日逐王归汉之日，制于轮台的西域都护府宣告成立。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一阶段代表汉帝国屯田渠犁，数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率军接迎日逐王的是汉将“郑吉”。这位在民间名气远逊于之前那些人物的将领，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首任都护。因此在《汉书》中，对汉帝国经略西域的这段历史有一句总结即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如果说，汉朝对西域施加影响力的时间，起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公元前119年，那么到真正将西域置于帝国版图内，时间恰为一甲子之数。而这一甲子的时间，匈奴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西域。日逐王的叛逃，只是匈奴内乱的开始。很快，一场“五单于争位”之乱，即将席卷整个草原。

## 第二节 匈奴形成五单于争位的乱局

实际上，接到匈奴和亲请求的汉朝，现在已经同意了罢兵和亲。事到如今，无论谁接任单于之位，这个消息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利好。至于说汉廷，倒也无所谓最初提出请求的那位单于是不是死了，只要接受赐婚的是能够号令匈奴的单于就行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让汉朝方面开始犹豫了。原因很简单，刚刚在第一场争位斗争中，挤走了日逐王（先贤掸）的新单于（握衍胸鞬单于）并不能服众，仅仅在位不到两年，就被另一位由匈奴左地贵族拥立的单于所击败了。

在匈奴这段纷乱的历史中，前后出现了将近十位单于。对于一般人来说，记住这些单于的封号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位在公元前58年，一战而夺位成功的单于，你一定有印象。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者“王昭君”的丈夫——呼韩邪单于。

从血统上来说，呼韩邪单于倒也算是根正苗红，他本人就是那位吐血而亡的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之前被逼叛逃汉朝的日逐王也是前前任单于的儿子。在更崇拜丛林法则的草原上，贵族血统只是一个基本条件罢了。能不能成为草原之主，关键还是要看实力了。呼韩邪单于的上位，看起来似乎应该能结束匈奴的乱象，为汉匈两国带来长期和平了。因为在我们学过的中学历史中，这位对汉朝俯首称臣的单于和王昭君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的赞歌。

假如王昭君此时正在宫中，并被选中出塞和亲的话，她个人应该还算是幸运的了。虽然历史并没有为我们记录下她未来夫君的年龄，但上位单于时的他正值青壮年肯定是无疑的了。只是最终前往草原和亲的汉女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汉朝最终答应和亲的时候，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公元前33年）。而前往和亲的王昭君，只能感叹“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是唐诗，只是意境合此境，借用一下）。

汉朝之所以拖延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勉强作出和亲的决定（公主都没给），原因还是一个字“乱”。因为接下来的匈奴依然还是一片乱象。谁也不敢保证汉家的公主会不会走在路上，才发现自己的夫君已经换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廷并没有必要参与进去。反正分裂的匈奴已经对汉朝边境构不成威胁了。坐山观虎斗，静待事态平息才是上策。

接下来对呼韩邪单于发起挑战的，是由匈奴右地所拥立的“屠耆单于”。从这

点也可以看出，所谓单于争位，实际上就是地缘矛盾在政治上的反应。在这种乱局之下，草原上的每一个地缘板块都希望扩大自己的话语权。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在呼韩邪单于攻灭握衍胸鞬单于时，匈奴右地才保持了中立态度。等到二人两败俱伤后，才起兵攻入色楞格河流域。

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火并，在最初的战争中，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左地部落被迫退回肯特山以东地区。然而入主单于庭之后的“屠耆单于”，同样也没过上安稳日子。因为他派往左地防御“呼韩邪单于”的两位将领在他们的部落拥立下，也自立为了两个单于：乌籍单于和车犁单于。

估计很多朋友已经被这一下子冒出来的几个“单于”之名，搞得头晕了。不过我们之前已经提示过了，这一阶段是“五单于争位”。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单于要出世。现在的话，看起来从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之间的漠北草原，已经被这四个单于瓜分完了。要是再出一个“单于”的话，他的地盘应该在哪呢？

最后这个乘乱也自立为单于的匈奴贵族，地盘并不在蒙古高原，而是阿尔泰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解读过了，匈奴、乌孙两国基本上是以“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也就是今天的塔城地区为界，中分了这个盆地。受封管理此地的匈奴部落为“呼揭部”。因此最后这一位单于，自然也就叫“呼揭单于”了。

### 第三节 呼韩邪单于击败屠耆单于和乌籍单于

没能攻灭掉左地的呼韩邪单于，自己下面又出现了三个新单于，这位屠耆单于的麻烦够大了。不过就实力来说，那三个跟风而立的“单于”并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乌籍、车犁二人率部向右地移动，以和呼揭部联合。由于这三位单于选择了抱团取暖，再有三个单于就不现实了。所以在乌籍、呼揭二人自去单于之号后，共同拥立车犁单于。

变成三单于争位之后，草原上的地缘格局变得明朗了起来。车犁——屠耆——呼韩邪三人，各以匈奴的右——中——左三地为基地，图谋一统草原。这个格局颇有点像后来中央之国的三国格局。而居于其中，占据“中原之地”的屠耆单于，看起来压力最大。因为相当于曹魏的他，将要面临两线作战，以剿灭草原帝国两翼的这两股异端。

当你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的局面时，最好的办法并不会是同时开战，而是一守一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屠耆单于来说，解决那三个抱团取暖的右地部落，要优先左地的呼韩邪单于。因此在部署了四万军队在肯特山麓以备呼韩邪单于后，屠耆单于亲领另外四万骑兵进入大湖盆地，攻击盘踞于此的车犁单于。

集结于大湖盆地的车犁、乌籍、呼揭三部之兵，总兵力也在四万之数。不过从



结果来看，屠耆单于所率的四万主力战力看起来要更强，很快便击败了三个“叛徒”所组成的联军。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三个“单于”各有各的打算，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部众冲在前面当炮灰

战败之后的呼揭王，自然是退回了阿尔泰山南麓的根据地。至于已经没有地盘了的车犁单于和乌籍都尉（前乌籍单于），则向西北方向逃入了唐努乌梁海。这个位于蒙古高原西北角的世外桃源，正是当年李陵受封的领地。不过李陵本人已经在公元前74年病故了，新的右校王正是他的儿子。对于屠耆单于来说，车犁与乌籍二人暂时已经没有威胁了，将那片孤悬于阿尔泰山之南的呼揭之地，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获胜之后，屠耆单于及其所部并没有向西北方向追入唐努乌梁海，而是向西南方向移动，准备在休整之后，穿越阿尔泰山攻入准噶尔盆地。

游牧民族是沿什么路线穿越阿尔泰山进入准噶尔盆地的，相信是很多朋友所感兴趣的，尤其这还牵扯到之前曾经提到过的“阿尔泰山——北塔山盆地”，这块在民国地图上存在，当下归属蒙古国的“领土”。不过汉匈之战始终不是解读这一板块的最好时机（所以当日中止了解读），还是待日后有机会再行解读吧。事实上，屠耆单于也没有完成他进击准噶尔盆地的计划，因为他在阿尔泰山北麓休整的部队，遭遇到了从左地前来的突袭。

很显然，呼韩邪单于并不想等屠耆单于整合好了右地之后，再集中力量来对付自己。在这次突袭之中，屠耆单于的部队损失了上万人（领军者为呼韩邪单于的弟弟）。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右地的军情已不是最紧急的了。盛怒之下的屠耆单于率六万大军急行近千里，准备攻入左地复仇（应该还包括之前留守，以备左地的部队）。当然，也许会有朋友说，屠耆单于应该沉住气，先彻底解决了右地的不稳定因素后再东征。但呼韩邪单于既率先打破了沉寂，就不会在左地坐等屠耆单于回军了。

在派军前往右地突袭的同时，这位后来的汉家女婿，也亲率四万主力进入了色楞格河流域。也就是说，如果屠耆单于不回军的话，他的大本营就会被呼韩邪单于乘虚而入了。既然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双方最终接战的地方就不会在肯特山以东了。至于到底是在哪打的，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知道的结果就是，以逸待劳的呼韩邪部四万人战胜了千里回击（且刚经过恶战）的屠耆单于的六万人。而屠耆单于本人，则在兵败后自杀身亡了。

现在，呼韩邪单于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入主色楞格河草原了。至于五单于争位战中的那三个单于，倒也没有给他增加太多麻烦。地处边地的呼揭王，本来也已自去封号，顺势臣服呼韩邪单于并不会有什么损失；保留封号的车犁单于，在兵败之后也无实力东山再起，也同样识时务的归降了呼韩邪单于。唯一的异数，是那位曾经的“乌籍单于”，在李陵之子的支持下，他又一次复立为了单于。

李陵之子在这次匈奴内斗中，到底出于何种动机参与搅局，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他的血统来说，肯定是不可能亲身参与争位的了（乌籍单于是日逐王的哥哥，也是前单于的儿子）。假如有一天有人想为李陵写个剧本、小说的话，这段故事倒是可以用得上，也有无限发挥的空间。也许李陵之子认为，凭借自己与汉朝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角逐草原最高权力的话，他和他的代理人会有机会得到汉朝的支持。只是当下的话，我们所能明确知道的是，乌籍单于和李陵之子最终并没能成功。在呼韩邪单于的攻击之下，这两个历史人物很快便不知所踪，成为过眼云烟了。

从呼韩邪单于战胜“握衍胸鞬单于”，第一次入主单于庭，到攻杀乌籍单于，结束五单于之乱的时间不过两年时间（前 58 年——前 56 年）。不过这次内乱给匈奴造成的损失，却是非常巨大的。除了那些因为相互攻伐而损失的人口以外，分属不同阵营的匈奴多部因不堪忍受持续的内乱，而纷纷南下投奔汉朝。这其中，甚至包括胜利者呼韩邪单于部下的左大将（及其父）所率的数万部众。左大将和其部众的投降，对于汉帝国来说，这当然是大大的红利了。只是如此一来，名义上重新统一了草原的呼韩邪单于，实力就堪忧了。入主色楞格草原的他，实际所能掌控的部众不过数万。在崇尚丛林法则的草原上，这样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成为各部落的共主。

第一时间出乱子的地区，依然是匈奴右地。屠耆单于的一个堂弟（从弟），率部回到大湖盆地，重新割据为了“闰振单于”，而这并不是呼韩邪单于遇到的最后一个麻烦。在他入主色楞格草原之后，替他统领左地，受封左贤王的他哥哥，很快也等不及接位，自立为了“郅支单于”。

#### 第四节 致支单于击败闰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

闰振单于在右地的出现，致支单于在左地的出现，意味着五单于争位战时期，所形成的匈奴帝国“左——中——右”三板块分裂的地缘格局再现于草原。假如此时你我是生活于当时的匈奴百姓，估计心里一定在唉叹，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看起来，呼韩邪单于现在面临与当日屠耆单于一样的局面了。问题是，当日屠耆单于旗下尚有八万骑兵，在草原上实力首屈一指。而今天，呼韩邪单于手下连同老弱在内的部众，总计不过数万，根本没有实力去应对两线的压力。对于这一点，他的对手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三位单于倒也相安无事。毕竟经历之前那场战事之后，整个草原都需要点时间休养生息了。

这种平静不久之后还是被打破了。公元前 54 年，闰振单于率先挑起战事，从燕然山以西起兵，向肯特山以东的郅支单于发起攻击。如果再以三国类比的话，这一攻击方向，很有些类似吴、蜀之争。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单个 PK，此时占据“中



原之地”的呼韩邪单于，对另两“国”也并不占据优势。

单从战术角度来看，闰振单于略过呼韩邪单于，攻击左地之举也太过冒险了。即使不考虑呼韩邪部会横插一刀（或抄其后路），这种远程攻击本身也会让对手占据更多的地利优势。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获胜之后的郅支单于也得以顺势，统一了匈奴左、右两地。如果说之前三部都没有必胜一个对手的实力的话，那么现在合并了左、右两地部落的郅支单于，就有足够的实力战胜坐山观虎斗的呼韩邪单于了。很快，郅支单于便入主单于庭。而战败之后的呼韩邪单于又将去往何方呢？

之所以要交待一下匈奴分裂的这段历史，一方面是要引出呼韩邪和郅支这两位匈奴单于来。西汉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也正是因他们而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借此验证，我们在当日开始解读蒙古高原时，曾经提到了蒙古高原内部地缘博弈的模式。即漠北游牧民族的内部整合工作，总是围绕着以肯特山、杭爱山为分割线，所划分的“左——中——右”三板块来进行的。在当时，为了让大家尽快理解这一概念，我们试举了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时的案例（蒙古＜东＞——克烈＜中＞——乃蛮＜西＞）。

尽管匈奴当初统一草原时的进程，并没有被详细记录下来，但通过“五单于争位”前后这段历史，已经足够让我们明白，漠北草原内部地缘博弈的模式，最起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而这一块，也正是大家在过往历史阅读中所容易忽视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总是在统一并且南下为患中原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就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内部博弈来说，上述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所体现的只是漠北板块的地缘博弈特点。相比之下，大家应该更为熟悉以戈壁为中心的，漠南草原——漠北草原相争的南北分裂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位呼韩邪单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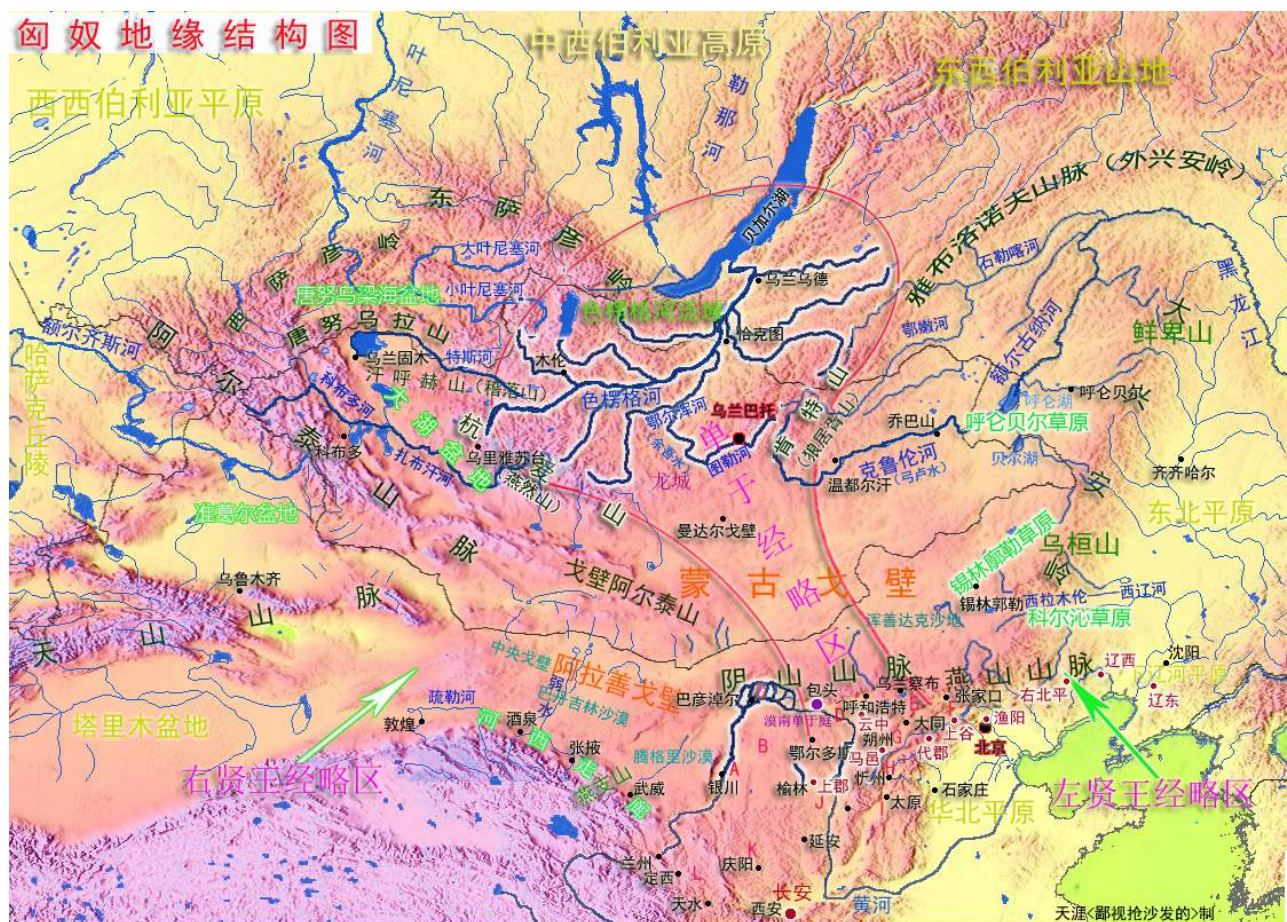
## 第五节 呼韩邪单于臣服汉朝后入驻漠南草原

在漠北草原争夺战中，落败于郅支单于的呼韩邪单于，现在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要么先在漠北找个边缘板块落脚（比如唐努乌梁海）；要么向南暂避于漠南草原。第一个选择实际上是死路一条了。因为不管那些边缘板块土著部落愿不愿意为这位失势的单于赌上自己的身家，已经据有漠北三大核心板块的郅支单于，都不会给他的弟弟以喘息之机的。这一点，呼韩邪单于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不久之前，被自己攻灭的乌籍单于就是前车之鉴。

现在看起来，要想生存下来就只剩下退入漠南草原一条路了。如果只是草原之争，穿越戈壁退入漠南，也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漠北的对手同样会尾随而至，不让你有机会得到休整。真正能够为落跑者提供安全的，是与漠南草原相邻的中原王朝。如果大家仔细研究后世的草原南北对抗模式，就会发现，漠南草原总是在与中央之

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才会开启这种模式的。

由于大多数中原王朝并不会试图在草原上建立控制线，所以大多数时候，盘踞漠南的游牧势力只要和中原王朝达成和解，就有机会与漠北分庭抗礼了。然而对于呼韩邪单于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更为艰难。因为汉帝国已经在漠南草原的边缘修建了以受降城为中心的外长城。如果他想在此休整的话，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俯首称臣的话，汉廷凭什么相信你的诚意，让你进入自己的土地呢？



匈奴地缘结构图

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虽然在此之前，有 N 多匈奴部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并被安排在了汉朝直接控制的草原之上以为属国。但作为匈奴最高权力的象征，单于本人这样做就完全两样了。这意味着呼韩邪单于即使复国，匈奴也只能算是汉朝的臣子了。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呼韩邪单于还是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艰难的选择，不仅派出自己的儿子入质汉廷，甚至还亲身前往长安城，以臣礼朝见汉宣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部族能够栖身于阴北草原，并且有朝一日在汉朝的支持下，重返漠北的单于庭。

当然，简单说自己想来避难，未免太没有外交技巧了。为了打动汉廷，这一请



求被包装成希望能代汉朝，在受降城保卫帝国边疆。外交上怎么包装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不会真的影响汉朝的决定（但站在对方角度提建议，更容易被接受）。对于汉朝来说，匈奴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尽管是落跑的）前来投降，就已经足够了。既然汉朝不可能真的将统治力延伸到漠北，那么挑选一个有资格又有诚意的代理人，成为匈奴之主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有鉴于此，呼韩邪单于在汉廷也受到了极高的待遇。随单于南下的部众，也被安置在阴北草原之外。为此，汉廷还前后转运了三万四千斛粮米，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呼韩邪单于的权威，汉廷还派出了上万骑兵出鸡鹿塞，入驻阴北草原，以帮助他威慑、讨伐那些叛逆者。当然，这样做自然也有监视呼韩邪单于的作用了。所谓忠诚是要用时间来验证的，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手段，谁又能保证单于在重新坐大之后，不会尾大不掉呢？

在汉朝的庇护之下，身居漠南草原的呼韩邪部逐渐恢复了元气。很显然，有了汉朝的支持，不仅他亲自率领南下的部众能够安居乐业，也还会有很多之前归降汉朝的匈奴人，或者不愿受郅支单于统治的漠北匈奴人前来归附。用后来护送呼韩邪单于出塞（呼韩邪单于多次入长安觐见皇帝）将领的话说，就是：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人丁兴旺，连草原上的鸟兽都被他们打光了，力量足以自卫，不用再惧怕郅支单于了）。

## 第六节 致支单于平乱后留驻大湖盆地

呼韩邪单于的坐大，最为不爽的自然就是郅支单于了。事实上，郅支单于也十分清楚，现在的匈奴已经完全不具备和汉帝国对抗的资本了。反过来，谁能够得到汉朝的支持，谁就有机会在内部博弈中取胜。正因为如此，在呼韩邪单于将自己的儿子入质汉廷，以示归附之心时，郅支单于也做了同样的事。这种态度也让汉廷暂时没有选边，而是看起来一事同仁的，享受两位竞争者的朝贡。

然而一碗水总归是很难端平的。相比远在漠北的郅支单于，身居漠南，且数次亲身前往长安城觐见皇帝的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从汉朝得到的好处总归要少得多。这也让郅支单于感到，如果有一天自己与呼韩邪单于重起争位之战的话，汉朝一定会站在自己的对手一边。

正当郅支单于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惴惴不安时，看似应该一统在他旗下的漠北草原内部依然没有太平。出现不稳定因素的地区，还是屠耆单于家族崛起的右地。这次在右地聚拢旧部，自立单于的，是之前曾经投降过呼韩邪单于的屠耆单于的一个弟弟（伊利目单于）。事实上，在呼韩邪单于开始南下归降汉朝时，这位试图代表家族东山再起的伊利目单于就脱离呼韩邪部，带领部众回到了大湖盆地。

在呼韩邪单于南附汉朝之后，一直不稳定的大湖盆地就成为了郅支单于攻击的

方向。很快，大湖盆地的这场叛乱就被镇压下去了。伊利目单于所集结的五万部众也重新归入了郅支单于的治下。基于这段时间草原上不断出现各种试图争夺最高权力的势力，估计大家已经对新出现的这位单于兴趣索然了。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要是郅支单于荡平右地后，自己家族根基所在的左地又出了乱子，相信大家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郅支单于自己不就这样起家的嘛）。

真正引发我们注意的，是右地之战后郅支单于所做的战略决定。一方面因为右地一直不是很安稳；另一方面也是获知汉朝出兵出粮帮助了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对自己能否压倒呼韩邪单于，稳坐单于庭产生了怀疑。基于这些考虑，征服右地的他并没有回到色楞格草原，而是索性留在了大湖盆地。

从战略上看，郅支单于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以中、左之地为经营重心的话，一旦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支持下打了回来，那么向东败退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他以匈奴右地为经营重心，统领漠北草原的话，即使最终呼韩邪单于回到漠北，他也能向西扩张势力范围，并与之相对抗。基于大湖盆地从未直接遭受过汉朝的直接攻击，在此屯居也让郅支单于感到更加的安全。

郅支单于战略性的入驻匈奴右地，并以此为基地向西扩张，为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内部的博弈又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东——西对抗模式。事实上，将本部屯居于大湖盆地的郅支单于，并不看好自己能够仅凭这个板块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要知道，如果呼韩邪单于回归的话，漠北“中——左”两地，以及漠南的匈奴部众，都有可能是他重新崛起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郅支单于在战略上所期盼的，实际上在这三大核心板块之西，汉帝国军力所难以影响到的地区另起炉灶。

熟读历史的朋友，此时心中应该对郅支单于所憧憬的这片新天地有所领悟了。在后来的历史中，最经典的东——西分立模式，就是以阿尔泰山分水岭为界的东、西突厥。不过在匈奴的历史中，阿尔泰山以南山地草原的核心地区，始终没有纳入他们的版图。盘据于伊犁河谷的乌孙人，将是“西匈奴”蓝图上的最大障碍。至于郅支单于的“西匈奴”战略最终有没有成功，我们后面再接着分析。



## 第四十二章 郅支单于渗透西域并被陈汤所灭

### 第一节 乌孙拒与郅支单于结盟并发生交战

郅支单于是否在西迁之时就想好了要吃掉乌孙，并不是十分确定。因为历史记载，单于使者向乌孙所表达的是希望与之结盟。只是这个结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郅支单于真想与乌孙结盟的话，无非有两个想法：一是借助乌孙的力量，成为真正的草原之主（压倒受到汉朝支持的呼韩邪单于）；二是借助乌孙的力量图谋西域。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郅支单于向乌孙示好，只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并出其不易攻入乌孙的核心地区。如果郅支单于能像当年乌、匈联军，一战而从月氏人手中夺取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的话，那么即使他不进一步图谋西域，或者反攻整个蒙古高原，最低限度也可以有资本迫使汉朝将之定位为，能和平相处的“第三方”。因为以之前的经验来看，汉帝国需要的是天山草原与蒙古高原，分属两股游牧势力。至于占据这片土地的是月氏人还是乌孙人，并不重要。

为上述推断提供佐证的证据是，郅支单于在派出使者的同时，已经率主力进入了准噶尔盆地，陈兵于乌孙边境。假如只是想结成战略联盟的话，并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过，不管郅支单于此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他都没有机会突袭乌孙了。因为虽然乌孙其实很满足于做“第三方”，心里也并不愿意与匈奴为敌（上次是被匈奴人逼的）。但在匈奴内乱的情况下，乌孙人也不愿意随便就和哪个匈奴“单于”结盟的。即使要与之达成和平协议的话，也要看汉朝是支持谁。

很显然，在漠南享受汉帝国保护的呼韩邪单于，更有机会成为整个蒙古高原的主人。这一点，即使是那些留在漠北的匈奴诸部和郅支单于本人也很清楚。否则的话，他也不用主动放弃单于庭，试图在西方打出一片天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宝押在郅支单于身上是非常不明智的。

有鉴于此，在收到郅支单于的结盟信息后，乌孙方面马上就做出了自己决定：将使者斩首并送至西域都护处（由此也可看出，郅支单于的结盟要求有直接影响汉朝利益的成分）。同时，派出八千骑兵突袭已经移动至准噶尔盆地的郅支单于部。

从战略上看，乌孙人的选择是明智的，也可以说是识时务的。不过就战术层面来说，仅仅派出八千骑兵去突袭郅支主力，则明显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至于郅支单于，虽然没有直接收到使者被杀的信息，但使者迟迟未归，乌孙方面又有大军向北运动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在双方都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决定胜负的因素主要就是兵力的实力了。乌孙人并不能指望自己的八千骑兵，就能击溃郅支单于亲领的数万主力。然而在击败这支

攻击部队后，郅支单于再想突袭乌孙也不可能了。对于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在匈奴和乌孙之间打出一片进可图谋乌孙，退可反攻漠北，且汉军鞭长莫及的根据地来。

在这样的战略思维指导下，最先成为牺牲品的就是占据半个准噶尔盆地，以阿尔泰山南麓草原为核心的“呼揭部”了。在击溃乌孙八千骑兵后，郅支单于很快便回军进占了呼揭之地。只是这片草原的体量还是太小，作为根据地的话，抗衡乌孙都很困难。问题是，在呼韩邪单于得到汉廷力挺的情况下，蒙古高原核心的左、中，甚至右地诸部，人心都倒向了呼韩邪单于（强行兼并的话，只会内乱）。也就是说，郅支单于想打出一片天地的话，只能在匈奴帝国的边缘板块打主意了。

## 第二节 郅支单于西迁后控制的领地

呼揭部所控制的半个准噶尔盆地，并非是匈奴帝国在西部唯一的边缘板块。在控制呼揭部后，郅支单于紧接着便越过阿尔泰山分水岭，进占了由原李陵家族控制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不过，现在唐努乌梁海的控制者，很可能不是李陵之子了，毕竟他上次押错了宝。在乌籍单于被攻灭的时候，李陵之子很难独善其身。

统领唐努乌梁海的匈奴贵族，目前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以东至贝加尔湖一带的山地，之前都不是由匈奴核心部落所控制。前者所覆盖的部族，被称之为“坚昆”（被认为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后者则是“丁零”（突厥系民族的祖先）。由于这些山地并非完全的草原地带，而是覆盖了大片森林，夹杂部分草原的“森林草原”地带，因此生活于此的土著部落本身，带有浓厚的渔猎属性。也就是说，他们和靠近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地带的东胡部有些类似，属于渔（猎）、牧混合类型（小气候合适的河谷，还会有些农业成分）。

这种混合特质，我们当初在解读唐努乌梁海时，就曾经专门做过分析。今天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土著，仍然根据各自领地的地貌、气候，分别经营渔猎、游牧、农耕三种经济。当然，这些后来被蒙古人称之为“林中百姓”的土著，只要迁入草原，就会很自然的变身为纯粹的游牧民族。不过在匈奴所处的时代，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将这些“林中百姓”整族迁入草原地带。像李陵（右校王）、卫律（丁零王）这些从汉地没入匈奴，拥有更多管理经验的降将，受命管理了这些边缘之地。

在匈奴帝国强大时，这些地缘上拥有独立性的边缘板块，自然是为臣服于单于庭的控制，并在战时出兵、出力的。然而在匈奴人自己都不知道谁才是真正单于的时候，就不能指望这些板块的忠诚了。丁零人脱离匈奴人的控制，南下攻击匈奴本部，以及李陵之子试图乘乱取利之举，都是这种地缘独立性的体现。而现在的话，郅支单于也看中了这一点。

在入主唐努乌梁海之后，郅支单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紧接着越过东萨彦岭，控制了丁零人。至此，在图谋乌孙之地受挫之后，郅支单于很快便凭借自己所控的



资源，在蒙古高原的西、北边缘地带，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贝加尔湖之间，控制了一块能对匈奴本部、乌孙之地同时造成压力（且汉军鞭长莫及）的根据地。用土著部落名来命名郅支单于所控制的三大板块，就是呼揭——坚昆——丁零了。

至于这三大部落是否真心归顺郅支单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郅支单于所亲领的部众在实力上对每一个板块都有压倒性优势（能迫使土著部落臣服）。拥有上述三板块之后，郅支单于也算拥有了与乌孙或呼韩邪单于对抗的资本。如果这个地缘格局能维持下去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将之命名为“西匈奴”了。而这个西匈奴的地缘核心就是唐努乌梁海了。

单就郅支单于现在的控制区来看，将唐努乌梁海作为自己“单于庭”的所在地，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过，只拥有这三个边缘板块的“西匈奴”还是不成气候。要想真正获得与匈奴本部，甚至汉帝国抗衡的资本，郅支单于还是必须得到乌孙之地。因此在稳定根据地之后，郅支单于多次派军南下攻打乌孙，并取得了胜绩。此时，历史已经推进到了公元前 51 年。

### 第三节 郅支单于杀害汉使后与汉朝决裂

尽管西迁之后的郅支单于与汉朝的盟友乌孙一直保持战争状态，但这却并不代表郅支单于就会与汉帝国为敌。此时的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汉朝的支持，让自己有机会名正言顺的成为草原之主。问题是，相比之前（屯驻于大湖盆地之时），现在郅支单于本人又更加远离了汉朝的势力范围。这虽然能让郅支单于感觉更安全，却也让郅支单于在与呼韩邪单于争夺汉朝支持的博弈中，完全丧失了翻盘的机会。

公元前 49 年，虽无大的战绩，却从匈奴内乱中收获大笔红利的汉宣帝病故（公元前 74 年——前 49 年在位），汉元帝继位。然而在这个历史节点，汉廷的政权更迭并不能吸引我们的目光。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时候匈奴内部的地缘格局开始出现异动了。异动的导火索，是呼韩邪单于以部落遭受天灾为名，又一次向汉廷求援，并很快得到了新皇帝的帮助（二万斛谷物）。这也让身处西方边缘之地的郅支单于感到绝望，毕竟政权交替之际，往往也是外交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机。有鉴于此，郅支单于也彻底放弃了获得汉廷支持的想法。他甚至直接派使索回了之前入质汉廷的儿子。

尽管要求索回质子，已经能够让汉廷觉得郅支单于不愿再屈身于汉朝了。但汉廷在接到郅支单于的上书之后，却并没有将之马上定性为决裂之举（“上书”这种形式，表明郅支单于在文字上还是以臣礼事汉廷）。鉴于之前的厚此薄彼之举，汉朝方面也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时的意气之举。事实上，汉廷也不认为仅凭一个质子就能控制匈奴人。在第二年，汉廷甚至将呼韩邪单于所送的质子也送回了匈奴，并诏告匈奴，愿意赦免那些曾经与汉朝为敌的匈奴人。

汉朝做出的这些收心之举，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如果郅支单于能够领悟，汉廷其实也很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匈奴的（分而治之）。然而接下来的事件，却将“西匈奴”彻底的推到了汉朝的对立面。让郅支单于自绝于汉廷之举，就是盛怒之下的他斩杀了护送质子归来的汉使。其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汉朝允许早有返回漠北之意的呼韩邪部回到漠北。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支持下，养精蓄锐将近十年，又在漠北诸部拥有群众基础的呼韩邪单于，再一次成为了匈奴帝国的主人。

很明显，汉朝放呼韩邪单于回归漠北的意图，就是让他去收拾成为“异端”的郅支单于。冲动之后的郅支单于也马上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机会在呼韩邪单于与乌孙人的包夹之下生存下来。虽然从战略上看，这一幕应该迟早会发生，但在对乌孙的战争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就与强大的汉帝国撕破脸，绝对不是步好棋。

大部分的匈奴人可能会选择拼死一搏后，再思考退路。不过从之前的表现来看，郅支单于却并不是这样的人。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漠北出现权力真空时，就放弃色楞格草原西迁，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战略思维的。然而现在，他需要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代价了。

郅支单于所做的战略选择，就是在呼韩邪单于站稳脚跟（在漠北），对其发起攻击之前，就迁出两面受敌的唐努乌梁海。郅支单于这次的选择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乌孙之南的康居之地，成为了他迁徙的目的地。从整个草原的地缘格局来看，这一大胆选择却是有极高地缘战略价值的。

#### 第四节 康居与郅支单于结盟并引其入境

我们知道，乌孙并不是中亚草原的唯一控制者。除了北方渗透入阿尔泰山南麓的匈奴人外，西、南方向，包括哈萨克丘陵、塔拉斯河谷及其以南草原的区域，都是康居人的领地。同样作为草原游牧者，康居人与乌孙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在乌孙饱受匈奴压力的同时，康居人也同样在承受乌孙人的压力。而当乌孙因为与汉朝联合，北方压力骤减的时候，康居人在南方所遭受的攻击也日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康居人也急于希望寻找到一个战略盟友来抵御乌孙的侵袭。

与汉帝国联合固然是一个选择，不过为了应对匈奴的压力，乌孙已经与汉帝国形成了稳固的联盟关系。即使康居人只是想让汉廷出面主持一个和平的局面，汉朝方面也犯不着为他们强出头（没有地缘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康居人把结盟的目标锁定在了匈奴人身上。毕竟作为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民族，匈奴人现在已经和乌孙翻脸。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双方是很有机会南北夹击乌孙的。

以康居最初的想法来说，应该只是希望和匈奴方面达成战略联盟。不过在郅支单于即将被赶出匈奴之地的情况下，这一计划变更为迎接郅支单于南下康居之地，在天山北麓的塔拉斯河谷驻扎，以为康居藩守北疆了。对于康居人来说，这一计划



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要知道，在经历和汉帝国长达百年的战争后，匈奴人在战术、装备上比之其他游牧民族，有了相当的比较优势。最现实的案例就是，只得到匈奴帝国边缘板块之力的郅支单于，在北方已经打得乌孙没有还手之力了。要不是呼韩邪单于已经回到漠北，并凭借汉朝的支持即将整合好匈奴诸部的话，郅支单于还是很有机会从北方逐渐蚕食乌孙的。

当然，从长远来看，引匈奴人入境也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坐大之后会不会反噬自己。不过，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引入一支在军事上拥有诸多优势的生力军，总还是能解决当前问题的。至于郅支单于方面，他本来正在忧愁即将面临呼韩邪单于、乌孙，乃至汉帝国的三面进攻。现在有一个远离汉、匈势力范围，又能让他继续图谋乌孙之地的机会，自然是一拍即合了。

康居人的领地范围，我们在之前的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了。从唐努乌梁海南下的郅支单于部，并不需要经由天山北麓的乌孙之地，再进入康居境内。西南方向由哈萨克丘陵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穿越，就能绕过乌孙人的控制区，进入康居人在天山北麓的领地——塔拉斯河谷了。然而所谓天算不如人算，尽管这一线路并不会遇到乌孙人的阻击；而且为了迎接这位匈奴单于，康居方面也派出了数千牲畜所组成的支援部队前往迎接，但恶劣的天气（应该是暴风雪）却让匈奴人损失惨重。最终顺利抵达塔拉斯河谷的郅支单于部仅有三千人。

对于郅支单于和康居人来说，最后到达塔拉斯河谷的兵力显然有些少了。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康居之地却有他在北方所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那就是紧邻大宛等富庶的中亚农耕区。要知道，相比强大的汉帝国，大宛等绿洲国的军队防御力要差上许多。而匈奴人的战力，又比康居等中亚游牧民族强出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许久未得农耕区补给的匈奴人，很快便从大宛等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被匈奴人敲打之后，为了求自保的中亚绿洲国家，被迫向盘踞于塔拉斯河谷的郅支单于纳贡。

凭借这些就地补给的物资，郅支单于甚至在塔拉斯河谷筑了一座城——郅支城，以为自己的根据地。而休养生息后的郅支单于部也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他们紧接着便和康居人一起（由郅支单于统领），向与之相邻的伊塞克湖及楚河河谷地区发动了数次攻击。联军甚至攻至与塔里木盆地相邻的乌孙冬都——赤谷城，掠夺了大量乌孙人畜。在二部强大的攻势之下，乌孙人甚至被迫放弃了西部方圆千里的土地，向伊犁河谷一带收缩。

此时的汉帝国，原本并没有太在意这支流浪绝地的匈奴人。依传统的地缘格局来看，匈奴全境已经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之下臣服于汉帝国了。即使说日后有变，汉帝国的压力也还是依旧来自于北方。然而对于郅支单于在七河之南的坐大，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

敏锐意识到危机的，是西汉帝国最后一位名将——陈汤。这位当时的西域都护

府副校尉，并不认为郅支单于已经不会威胁到帝国的安危了。因为对于丛林法则盛行的游牧民族来说，一个人数虽少却战力强大的部落，会很有机会吸引周边部落前来投靠，并最终如滚雪球般坐大。尤其是郅支单于本人，还拥有匈奴帝国的政治遗产的情况下。一旦他反客为主将康居诸部纳入旗下，依托从大宛等地强征来的补给攻占乌孙之地的话，那么帝国所面临的地缘格局就将发生重大变化了。

要知道，乌孙人可能会满足于作为第三方经营自己在天山草原的一亩三分地，但匈奴人却绝不会满足于此。如果从饥饿草原到大兴安岭的广阔草原地带，都系出同一部族体系的话，那么即使在一开始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局面，但彼此之间都会有与对方整合在一起的想法（无非是谁吃谁的问题）。类似的局面，1600多年后，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就遇到过。以乌孙之地为根据地的准噶尔蒙古部，不仅凭借地缘优势顺势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甚至进一步渗透了卫藏地区），更在壮大之后进占色楞格草原，侵袭渗透漠南蒙古诸部。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坐视郅支单于坐大的风险，就在于有可能会提前上演准噶尔部由西至东重新统一蒙古高原的一幕。要是这样的话，汉帝国就将面临一个比之前更为强大的草原帝国了。实际上，在与康居联军攻击乌孙的同时，郅支单于也的确在做上述准备。他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威信，让康居人归入他所图谋的“西匈奴”旗下。

## 第五节 陈汤和甘延寿领兵进军郅支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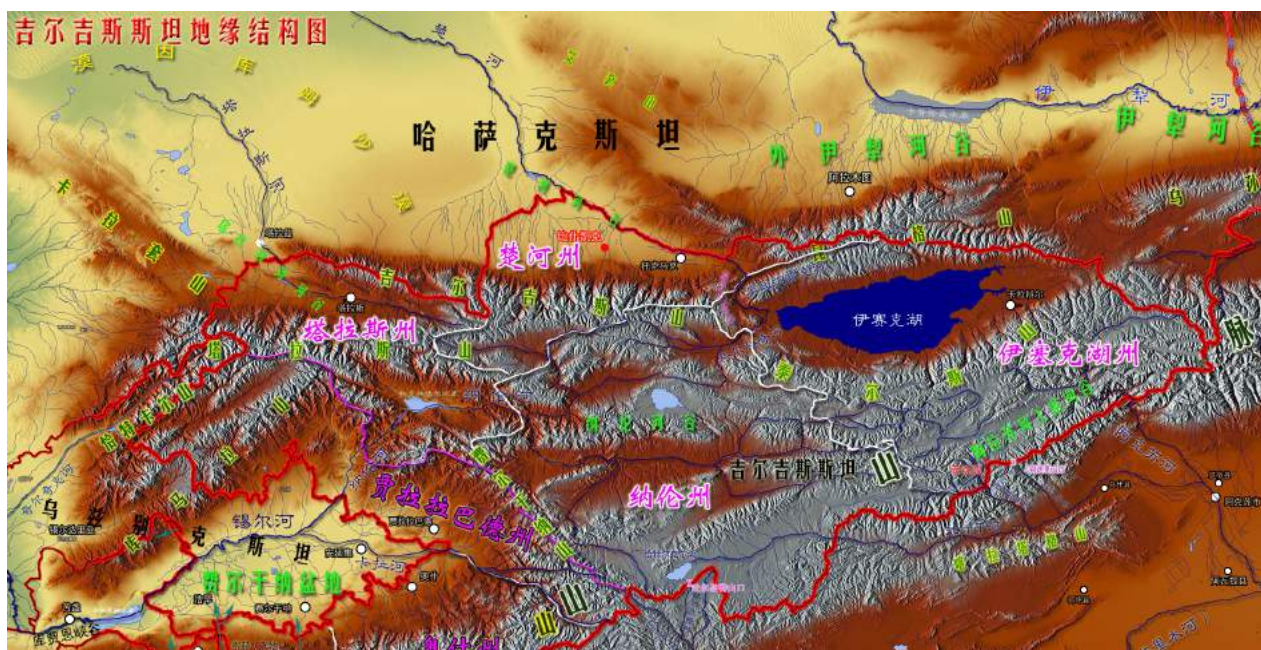
尽管陈汤和后世的我们都能感觉到，郅支单于千里跃进塔拉斯河谷的战略风险。但此时的汉廷在武帝发布罪己诏之后，战略上已经趋向于保守了。这些年来，这种以长城、烽火切断匈奴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的做法，也的确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也可以说，匈奴出现分裂、臣服汉朝的局面，正是这种积极防御政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远征大宛、漠北那样，去远征一片看似与汉朝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草原（即使那上面是匈奴人），看起来也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然而力排众议的陈汤，还是成就了这场伟大战役。那句流传千古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也正是源于此战之后陈汤向汉廷上呈的报告。

为此战而集结的军队总计为四万多人，除部分汉军之外，大部分为西域属国之兵（共计十五国）。依汉军一贯的战术，这些部队被分为了两路。一路沿张骞当年出使大月氏的线路，经疏勒——捐毒——休循境，由阿赖谷北入费尔干纳盆地。再出大宛，沿天山北麓穿南饥饿草原——塔什干绿洲，最终翻越卡拉套山，从西南方向攻入塔拉斯河谷。当我们在地图上沿上述地标画出这路汉军的行军路线时，就会发现这样走绕了一个大圈子。不过从战略角度看，这支部队的作用其实并不在于主攻郅支单于，而是切断其落败后南逃入塔什干及粟特地区的退路。至于正面攻击任务，



由陈汤、甘延寿亲领的主力部队则沿着另一条翻越天山的捷径来完成。

公元前 36 年，由西域都护府所组织的联军，开始向郅支城方向进发。由于最终的战场，是在康居境内（郅支单于算是客居康居），因此这一战我们也可称之为“康居之战”。陈汤、甘延寿所率领的东路军穿越天山的路径，我们在解读阿克苏河谷时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别迭里河，经由姑墨、温宿北入乌孙“赤谷城”的别迭里山口。今天，这个古老的山口仍然在中吉之间的经贸往来中，承担着口岸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地缘结构图

翻越别迭里山口，仅仅是此次天山之旅的开始。接下来，联军可以选择西北方向直插塔拉斯河谷；也可经由伊赛克湖西穿越博阿姆峡谷进入楚河三角洲，再沿吉尔吉斯山北麓向西攻击塔拉斯河中游的“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从历史记载来看，陈汤显然选择了最接近直线的方案，也就是直插吉尔吉斯山与塔拉斯山之间的“塔拉斯河上游河谷”。

正当联军一步步向目标挺进时，意外发生了。由于乌孙人在郅支单于连续的打击下，已经放弃赤谷城——伊赛克湖以西的天山草原。联军此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康居的控制区（此时的郅支单于算是康居的雇佣军）。就在陈汤和他的部队向塔拉斯河谷进发时，一支深入赤谷城东劫掠乌孙部得手的康居人部队，出现在了汉军的后方。

在匈奴人刚刚成为康居雇佣军时，针对乌孙的攻击都是由郅支单于亲自指挥（康居“借兵”给郅支）。不过现在，康居人已经有信心独立向乌孙人展开报复行动了。从战果来看，这支由数千骑兵所组成的攻击部队，收获还算不错。乌孙方面损失了

上千人及大量的牲畜、财物。而当康居人心满意足的准备原路返回时，联军后部的辎重部队又给了他们扩大战果的机会。

就陈汤来说，应该没有想到战火会最先从自己的后方燃起。不过这一变故，并没有让这位名将慌乱。他甚至没有直接动用汉军发起反击，而是把立功的机会给了那些属国“胡兵”。很快，眼中只看到辎重，不知道前方还有大部队的康居人就被击溃了。除了之前劫掠的四百七十名乌孙部众被联军夺回之外（联军所损失的辎重，自不在话下），被斩杀的康居骑兵亦有此数。

尽管初战告捷，汉军甚至因此从康居人那里获得了额外的补给，但联军此行的目标却并非康居人。事实上，在这次远征的计划中，以纵横之术分化匈奴和康居之间的关系，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要知道，康居所拥有的总兵力超过十万，能够在天山一线调动的战士也有数以万计。如果康居人铁心和郅支单于捆绑在一起的话，此次远征的胜算将大打折扣（二者的联合已经打得乌孙无还手之力了）。有鉴于此，陈汤并没有为难俘获的康居人（当中有康居显贵）。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除了严令沿途不得惊扰康居牧民之外，陈汤还特别对接触到的康居贵族（有约请来的，也有俘获的）言明此行的目的，只在郅支单于。汉廷愿与康居结盟，共保天山南北的安宁。从结果来看，陈汤发起的外交攻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那些与汉军接触过的康居贵族中，甚至有人愿意充当向导，带领联军攻击郅支单于。这当中起了最大的作用的，当然是汉帝国强大的声威，以及联军所显然出来的实力了。不过郅支单于本人，却也为康居人的背离做了推手。

事实上，此时康居内部对于匈奴人的到来、坐大，态度也出现了分化。就康居王本人来说，他还是很满意能够借助匈奴人的力量、声威，扭转对乌战争的形势的。虽然有一天郅支单于势必会拥有自己的地盘，但在康居王看来，受损的是他的宿敌乌孙人。在完全击溃乌孙人之前，双方的联盟还是很稳固的。然而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让双方合作产生芥蒂的根源，是匈奴人在合作关系中的地位问题。

在郅支单于看来，自己并非是寄人篱下的雇佣军，而是被康居王请来的上国单于。也就是说，骄傲的匈奴人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双方合作的主导者（所以他只是“借兵”康居，攻击乌孙）。这也影响到了郅支单于对于康居人的态度。他甚至直接征发康居百姓花费了大量人力，用时两年修筑“郅支城”。说起来，到底以谁为主，很大程度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还是在于有共同的利益，或者说有共同的敌人。就面子来说，康居王本人还是给足了郅支单于的。在匈奴人到来之初，他就将自己的女儿送给了单于为妻，并且没有追究郅支单于那些出格之举。而为了巩固双方的关系，郅支单于的一个女儿，也同样嫁给了康居王。

然而并非所有康居人，都有康居王那样的大局观。最起码那位嫁给郅支单于的康居王女，就不认为自己是高攀了匈奴人。这种不经意显露出来的轻视态度，也再一次触动了郅支单于坏脾气。盛怒之下的他，将这位新婚的妻子，以及陪嫁而来的



数百康居人（包括贵族）尽数杀死。甚至将其中部分人肢解投入了塔拉斯河，以泄心头之恨。

郅支单于的这种做法，让请他入境的康居王陷入了尴尬境地。从大局考虑，他并不希望因此而影响与匈奴人的合作。毕竟在匈奴人的帮助下，康居的确扭转了与乌孙的战局。如果此时撕破脸，逼迫郅支单于与康居为敌的话。即使匈奴人不反过来与乌孙人合作，康居人所面临的形势也肯定比之前更加险恶了。虽然康居和匈奴之间的合作并没有因为上述事件而破裂，但郅支单于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已经引发康居民众的反感了。而对于远征至此的陈汤来说，这些反匈情绪也让他分化康、匈联盟的策略，实施得更为顺畅。

## 第六节 汉帝国联军歼灭郅支单于部众

很快，郅支单于就要为自己的冲动再一次付出代价了。以他之前种种战略之举来看，这位曾经统领漠北的单于，并非是不能做出战略判断的人。每当他判断出自己没有获胜把握之时，就会选择避其锋芒。在获知汉朝大兵压境的消息之后，郅支单于最初也的确想的是向西、南方后撤，避免与联军接战。问题是，匈奴人也深知自己在康居人当中已经失去了民意。之前作为帮助康居攻击乌孙的尖刀，还能勉强维持这种合作关系。而现在，要是作为落跑者深入康居境内的话。很有可能等不到联军动手，自己和那三千匈奴人就被康居人吃掉，用来向汉廷请功了。

既然已经自绝后路，郅支单于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外交手段来阻止联军的攻击了。事实上，此时的郅支单于，自认为也还没和汉廷撕破脸（也没这个实力）。为了赢得时间，之前他还特意向汉廷表示，自己已经陷入绝境，愿意再次送上质子，以示臣服。

当进入塔拉斯河谷的联军，在距离郅支城仅有三十里的地方扎营时，对外交努力还抱有一丝幻想的郅支单于，派出了使者前往军营询问汉军此行的目的。而看到匈奴人明知故问，陈、甘二人也顺水推舟的回应道：“单于上书说现在处境困难，愿意归附汉朝，亲自入汉朝朝见。天子哀怜单于离开匈奴的广阔国土，在康居受到委屈，所以派都护将军来迎接单于的妻子和儿女，恐怕惊动了您的左右，因此军队不敢到城下。”匈奴人当然不会相信西域都护府如此兴师动众，跨越天山而来，是为了接自己的妻儿去汉朝享福了。

同样的，陈、甘二人心里也不会认为，能够不战而降服郅支单于。在双方互派几次使者，试探对方虚实之后。联军第二天完成了最后的行程，陈兵于郅支城下。此时郅支城内能够一战的，就是郅支单于所带来的三千匈奴人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郅支单于也算倾其所有，做足了准备。除了布设数百甲士登城守备，以步兵百人于城门两边列阵（鱼鳞阵）以外，还并在主城（土城）之外另筑一座木城，

布设弓箭手以为呼应。除此之外，匈奴人甚至在汉军扎营之后率先派出百余骑兵冲击汉军阵营，以试探联军的战力。

上述准备也可以看出，在经历与汉朝的百年战争后，此时的匈奴人已经具备很高的战术素养了。这也使得郅支单于的这支几千人部队，能够在康居人的后援、辅助下屡胜乌孙。然而这些比较优势，在汉军面前就荡然无存了。更何况汉军此时还能指挥数以万计的西域之兵。

实际上，郅支单于此时也并非没有后援。在匈奴人据城以自守的同时，康居王也派出了一万多骑兵环绕城外，与城内的匈奴人相呼应。这其实也是郅支单于没有在联军压境之前，就弃城而逃的直接原因。在汉军白天攻城未果的情况下，这些康居骑兵乘着夜色也对联军阵营发起了数次攻击。匈奴方面也派出了数百骑兵充当主力，试图借机突破联军的包围圈。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并非缺乏战术指挥的游牧骑兵，而是由汉朝所组织的联军。在展开攻城战的同时，亦有足够的人力在挖掘壕沟等工事，以迅速完善对郅支城的包围圈。



汉西域全图

严阵以待的联军阵营也让前来夜袭的康居、匈奴骑兵遭遇了失败。匈奴方面前往冲阵的骑兵，也几乎全部损失（康居人肯定不会那么出力的）。等到天亮，为联军声势所迫的康居人首先退出了战斗。基于之前的既定策略，他们的退出并不会受到联军的阻拦。只是城内那些剩下的匈奴人，就完全没有退路了。没有康居骑兵在外围的支援，郅支城内的守军也再没有机会组织第二次夜间突围行动了。很快联军便攻入城内，而那位试图建立“西匈奴”的郅支单于也因受伤而亡。三千匈奴人，一半被杀，一半为联军所俘（战俘分给了参与战役的西域诸国）。至此，康居之战宣告结束。

总的来说，康居之战在当时是一场非常冒险的战役。所冒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



军事，而在于政治。因为当时汉帝国的国策，已经不支持这样的远征了。更何况郅支单于的势力，看起来还没有对汉朝造成影响。这场战争之所以让陈汤名垂千古，是因为敏锐感觉到战略风险的他，集结兵力发动远征时，并没有得到汉廷的同意。甚至他的直属上司西域都护甘延寿，都是在木已成舟后，才不得不和他一起赌上一把。

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至于说这种自作主张是否被汉廷事后所认可，更多只能靠结果来决定了。当然，整个战役前后的过程也证明，陈汤并非是在赌博。一则他没有耗费帝国中央的力量，完全靠西域都护府就完成了这次远征。“以夷制夷”（征调西域十五国之兵）的做法，让汉朝所承担的风险降到了最低；另一方面，在远征过程中，以政治手段分化康居与匈奴之间的联盟，也大大提升了成功率。并且不至于在击败郅支单于后，让康居成为汉朝的敌人。

外交为主，军事为辅的战略指导思想，也是两汉经营西域的核心思路。换句话说，具备外交思维的将领，才能够真正维护汉朝在西域的利益。后来投笔从戎，携三十六壮士重返西域的班超，也正是秉承这一思路，帮助东汉帝国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基于上述考虑，尤其是对比了当年李广利耗举国之力，远征大宛的惨淡结果（那种情况，还大受封赏）。汉廷最终还是褒奖了陈汤、甘延寿的这次远征。而这次远征在战略上，除了消除匈奴在西域开辟第二战场的隐忧以外，还极大震慑了身居漠北的匈奴本部。三年之后，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前往长安，提出愿累世称臣，希望汉廷能够同意和亲（公元前 33 年）。

在此之前，由于草原内乱不休，汉廷虽然在战略上已经和匈奴达成和解，但却并不愿意以和亲之举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到底支持谁）。现在，呼韩邪单于终于成为了匈奴帝国唯一的单于，并且显示出了自己对漠北的控制力。汉廷再拒绝和亲的话，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只是今时不同往日，一个宫女（王昭君）就把呼韩邪单于给打发了。

## 第四十三章 中原王朝与匈奴在后世的关系

### 第一节 汉匈和平局面在王莽时期被打破

现在，汉朝的边境看起来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和平。在此之后，西、北边境也的确在长达 44 年的时间里，未再燃起烽火（至公元 10 年）。实际上，如果从公元前 62 年，虚闾权渠单于最后一次陈兵十余万于光禄塞外算起，汉朝的边境在匈奴陷入内乱后，所迎来的和平时间长达 70 余年。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一微观历史中的和平年代并没有足够的地缘支撑。因为抛开那些表层政治之后，我们会发现，此时汉匈双方的地缘格局与汉武帝后期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仍然据有整个漠北草原的匈奴，在休养生息之后，依旧会成为汉帝国的隐患。

这其实也不仅仅是汉帝国所面临的困境了。在中央之国两千年的所谓“封建史”中，农业文明的中原王朝始终没有办法渗透漠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匈奴帝国成为了过去式。草原之上也依然会前仆后继的出现各种力量，继续他们与农耕区的恩怨。相比之下，能够以外长城防线锁定阴北草原的汉帝国，已经算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了。

事实上在和亲之后，汉廷就对外长城防线（主要是光禄塞）是否还要维护展开了争论。在匈奴人和支持放弃者（汉朝方面）看来，既然大家已经和解了，就应该尊重各自的地缘特点，以农牧分割线，也就是内长城来确立双方的控制区。这个理由看起来也的确充分，特别是在这样一条草原长城，本身就在中央之国地缘控制力之外的情况下（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然而这样做的话，相当于又让匈奴人恢复到了最初的控制区，并且可以直接对农耕区造成威胁。因此在经过庭议之后，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以及居安思危的想法还是占据了上风。也就是说，汉朝并没有因为暂时到来的和平而放弃外长城防线。只不过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自然是不能以这样的理由，用来回复呼韩邪单于了。为此，汉廷特意派出使者表示，汉朝需要这样一条长城，并不是防范匈奴，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不法之徒出塞祸害匈奴。匈奴人当然不会真的相信这样的理由，不过相不相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匈奴来说，他们已经没有筹码来要求更多了。

将阴北草原保留在汉朝的直接控制区，并继续让乌桓人游牧于燕北草原（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南下捣乱），的确能够让汉朝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不过这也并不代表绝对的安全，既然汉朝自知无法渗透漠北，那么让漠北草原保持分裂状态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只是当下汉匈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汉廷看起来暂时并没有必要去动摇呼韩邪单于及其继任者的权威。

最终进一步分裂匈奴的想法，是由那位超前的改革者“王莽”来实现的。在取代汉朝建立“新朝”后的第三年（公元 10 年），王莽不仅对内尝试了诸多改革措施，



也对“前朝”略显保守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改变。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儿子尽数立为“单于”。

王莽的这一做法并非首创。当年汉武帝正是以“推恩令”来分裂、削弱国内诸藩王势力的。以结果来看，王莽的这一做法也的确让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内乱。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做法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新朝”直接插手内政感到不满的匈奴人再一次南下攻击汉境。也就是说，汉匈之间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就此打破。

由于王莽的介入，中央之国就此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内乱期。虽然名义上 东汉帝国的开创者——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 25 年就结束了王莽的统治，并以洛阳为都城复建了汉帝国（都城东迁，是为“东汉”）。但这场内乱却使得匈奴得以有机会，反过来介入中央之国的内政。由于匈奴人的介入，东汉帝国直到公元 40 年，才收复阴山一线的五個边郡（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而在此之前，这一地区是由一个假称汉武帝曾孙的诸侯“卢芳”所割据的。

在地缘的技术条件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历史看起来就是一次次轮回。在西汉帝国建立之初，似曾相识的情况也同样在此发生。那时试图依附匈奴图谋自立的，就是那位也叫“韩信”的“韩王信”了。不过地缘关系类似，但结局却是不同。刘邦在击败韩王信之后，旋即在大同盆地陷入了“白登之围”。鼎盛时期的匈奴帝国让汉帝国又花了一甲子的时间，才有机会开始着手解决北方边患。

相比之下，刘秀和他的子孙面临的局面就要好得多了。西汉帝国对匈奴的连续打击，不仅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人心思汉，包括匈奴也是打着恢复汉室的名义南下），让他得以有机会重组汉帝国，更让匈奴帝国就此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 第二节 北匈奴在东汉王朝打击下西迁

在汉帝国重新控制长城防线之后不久，在天灾人祸的助力下（遭受天灾的同时，还遭受乌桓等国的攻击），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内乱。而这一次内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呼韩邪单于的一个孙子（时为日逐王）率部南下，希望仿效他的祖父，依靠汉帝国的力量重返漠北。为了显示自己归附汉朝的决心，这位单于甚至直接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

既然有前例可循，汉廷自然不会反对这位小“呼韩邪单于”留在阴北草原休养生息了。不过这一次，漠北匈奴的控制者却并没有如郅支单于那样“战略性”的西迁。有鉴于此，匈奴帝国开始进入了南、北分立时代。而与归附自己的南匈奴联合，进攻身在漠北的北匈奴，也成为了东汉帝国的首要任务。

有了南匈奴的加盟，只据有漠北草原（最重要的是，没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了）的北匈奴，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北匈奴所面临的新挑战（汉朝

之外),并不仅仅是来自漠南草原的兄弟部落。当年被匈奴所攻灭的东胡系游牧民族,也开始了战略反攻。除了盘踞于燕北草原的乌桓人以外,一直在大兴安岭北部蛰伏的鲜卑人也开始进入匈奴左翼,试图从崩溃的匈奴帝国身上分一杯羹。

在多重打击之下,北匈奴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仅仅是在公元83年至85年,先后就有七十三批匈奴人从漠北南下附汉。公元91年,在苦撑43年之后,北匈奴终于重复当年郅支单于的选择,向西跨越阿尔泰山,开始尝试建立“西匈奴”了。

如果这又是匈奴内部的一次轮回的话,接下来南匈奴应该回到漠北重建匈奴帝国了。然而这一次,情况又略有不同。因为抢先一步填补空间的,是从肯特山之东发起攻击的鲜卑人(留在漠北的匈奴人,都融入鲜卑部了)。也就是说,在北匈奴迁入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后,整个蒙古草原的地缘格局,变成了南匈奴与鲜卑南北分立的格局。

从东汉帝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毕竟让草原由两个不同部族控制,更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有了鲜卑人在漠北,南匈奴也就只剩下依附汉帝国这条路了。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些匈奴人,他们后来甚至被允许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对于汉帝国来说,有了南匈奴取代长城护卫北方边境,固然是一件省力的事,但这也对中央之国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地缘风险。至于风险是什么,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

现下,我们更关心的是退入准噶尔盆地的“北匈奴”又去往何方。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他们真想重建匈奴帝国的话,就必须南下吃掉乌孙、控制西域,就像郅支单于当年所尝试的那样。然而由于汉帝国的存在,这一尝试依旧未能获得成功。公元119年、124年、126年、137年、151年,汉匈双方围绕着巴里坤山南北,在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前后进行了五次战役。最终,既无法吞并乌孙,又无力渗透西域的匈奴人,选择再一次西迁。

以地缘结构来看,匈奴人再一次西迁的方向,只能是康居人的领地了。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两支有共同敌人(乌孙)的游牧民族,是否又一次把联盟的基地设立在了乌孙之南。由于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央之国内部开始陷入内乱,并最终因为游牧民族的渗入,陷入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内乱状态。因此天山南北再发生些什么,已经不是中原史家所能够关注到的了。

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不管你叫这支西迁的匈奴人叫“北匈奴”还是“西匈奴”,他们从此之后与中央之国再无交集。公元五世纪中叶,一支明显来自亚洲草原的黄种游牧部落在征服南俄草原之后,开始攻击分裂之后的东、西罗马帝国。

在对照中央之国的历史之后,这股被西方人称为“匈人”的亚洲游牧势力,与西迁之后的匈奴人对上了号。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北匈奴在脱离与汉帝国的接触之后,花了三百年时间向西渗透。以地缘逻辑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康居人在哈萨克丘陵一带的领地,以及阿兰人所占据的南俄草原,都曾经被匈奴人所



统治过。

不管最终攻击东、西罗马帝国的阿提拉是不是匈奴人的直系后裔，都意味着公元五世纪中叶，在东亚大陆处于因游牧入侵所引发的大分裂时代时（南北朝），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被迫开始接受来自亚洲草原力量的影响了。在此之前，“世界岛”的另一端，以罗马帝国为最终表现形式的欧洲文明，也已经依托地中海文明圈独立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体系。

鉴于现代文明体系是由欧洲人所开创的，所以长期以来地中海文明圈被理所当然的视为人类文明正源（华夏文明及其他文明就被视为旁支了）。所谓“世界史”也被看作欧洲史，及欧洲史的延伸。当然，作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从大历史的角度反驳这一观点，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中央之国对现代文明体系的贡献。不过出于知己知彼的需要，在大致了解亚洲地缘结构之后，我们接下来还是很有必要把视线投向欧洲了。